#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

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

★★★★★ WINNER OF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S
HELEN BERNSTEIN BOOK AWARD



瑪莎・葛森——著
蔡耀緯——譯

# THE FUTURE IS HISTORY

##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

MASHA
GESSE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

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

★★★★★ WINNER OF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S
HELEN BERNSTEIN BOOK AWARD



瑪莎・葛森——著
蔡耀緯——譯

# THE FUTURE IS HISTORY

##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

MASHA GESSEN

# 纪念斯维特兰娜．波伊姆（Svetlana Boym, 1959-2015）註1

註1：译註：出生于苏联，一九八○年代移民美国，曾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文及比较文学教授，也从事散文、小说、戏剧及摄影创作。她对神话、记忆与认同的研究最为着名，曾将怀旧（nostalgia）区分成两种：流亡者社群的反思性怀旧（reflexive nostalgia）承认过去不可能完全重建；而试图原汁原味重建过去世界的修復性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则是当今世界国族主义復甦及反现代国族神话建构的凭藉，具有危险性。由此开展出批判反思现代情境的外现代（off-modern）理论。

# 故事主角[註2]

本书共有七位主角，不时出现在故事之中。我以一种修正过的俄国习惯来称呼他们。任何读过俄国小说的人都知道，俄国人有很多个名字。一个人的合法姓名是由完整的名字加上父名（父亲名字的变格形式）所组成的。但在当代生活中，名字加上父名的组合，通常只用于正式场合或年长者。同时，大多数名字又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暱称小名。多数俄国人在童年时期都会得到一个为他们挑选的小名，而且终其一生沿用下去；即使并非全部，但多数小名显然都从名字衍生而来，所以我们可以从小名倒推出本名。比方说，所有的萨沙（Sasha）原都是亚歷山大，多数的玛莎（Masha）则是玛莉亚。儿童几乎一定是用小名称呼的。

故事中第一次出现时是儿童的人物，在全书皆以小名称之（例如玛莎、廖沙〔Lyosha〕）。第一次出现时是成人的人物，则以正式名字称之（例如鲍里斯〔Boris〕、塔蒂亚娜〔Tatiana〕）。第一次出现时是老人的人物，则在全书以名字加上父名称之。以下是主角名单。还有数十人在本书中也被提及，但他们不在名单上，因为这些人偶尔才现身。

冉娜（**Zhanna**，生于一九八四年）

父亲：鲍里斯

母亲：雷莎（Raisa）

丈夫：季米特里（Dmitri）

祖母：吉娜．雅可夫列夫娜（Dina Yakovlevna）

玛莎（生于一九八四年）

母亲：塔蒂亚娜

祖母：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Galina Vasilyevna）

祖父：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Boris Mikhailovich）

丈夫：谢尔盖（Sergei）

儿子：萨沙

谢廖沙（**Seryozha**，生于一九八二年）

父亲：阿纳托里（Anatoly）

祖父：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可夫列夫（Alexander Nikolaevich Yakovlev）

廖沙（生于一九八五年）

母亲：加林娜

生父：尤里（Yuri）

继父：谢尔盖

祖母：谢拉菲玛．阿达莫夫娜（Serafima Adamovna）

玛莉娜．阿鲁图尼扬（**Marina Arutyunyan**），精神分析学家

母亲：玛雅（Maya）

祖母：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潘克拉托娃（Anna Mikhailovna Pankratova）

列夫．古德科夫（**Lev Gudkov**），社会学家

亚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哲学家、政治运动人士

註2：廖沙、玛莎、谢廖沙和冉娜──这些都是真名──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向我叙述他们的生活。我用上几小时请求他们回顾事件及地点、对话、感受、电影、新闻报导和想法。我运用多种资料来源证实日期、时间，以及电视影片上的描述。要是出现矛盾，我就予以解决（或者在其中一个例子里，记下回忆与实际时间顺序的出入）。同时，我首要关注个人认知。因此，所有对话除非经过录音，全都是参与者以第一人称向我讲述（其中一个例子则由其他人向我讲述）。我们对于谈话内容的回忆难得精确，但这正是我们所接受的境况。阿鲁图尼扬和古德科夫分别花了十几个小时为这本书与我谈话。杜金拒绝受访，但指派他的助手和我谈话；我也访问了他的其他同事，并研读他大量的着作和讲学。在这些资料来源之外，我也仰赖俄国和西方国家丰富的学术研究。只要非出自主要人物的访谈，亦非亲身採访的资讯，我皆註明出处。

# 序章

我听过许多关于俄罗斯的故事，我自己也说过一些。在我十一、十二岁时，母亲对我说，苏联是个极权国家━她把苏联政权比拟为纳粹，对一位苏联公民而言，这种思想与言论不同凡响。我的父母亲都告诉我苏联政权会永久延续，因此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当我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成为年轻的新闻记者时，苏联政权开始摇摇欲坠，然后崩塌成一堆瓦砾，至少故事是这么说的。我加入了一群记者大军，兴奋地记录我的国家拥抱自由和迈向民主的旅程。

我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人生，都用来记录一个不曾真正实现的俄罗斯民主之死。不同的人对这件事都有不同说法：许多人坚称，俄国只不过是向民主进两步又退一步；有些人归咎普丁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其他人则归咎俄国人对铁腕强人的爱好；还有些人责怪自私而专横的西方。我一度确信我的报导将会写到普丁政权的衰亡。可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得第二次离开俄国━这次身为一个带着儿女的中年人。一如我的母亲，我也要和我的儿女们说明，我们为何不能继续在自己的国家生活。

具体事实够清楚了。将近二十年来，俄国公民不断失去自己的权利与自由。二○一二年，普丁政府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镇压。国家同时对内部敌人及邻国发动战争。二○○八年，俄国入侵乔治亚，二○一四年则进攻乌克兰，吞併大片领土。它也对西方民主国家展开概念及事实层次上的资讯战。西方观察家经过一段时间后才看清俄国的现况，但现在，俄国进行的各种战争已为人熟知。在当代美国人的想像中，俄国已经重新扮演起邪恶帝国和生存威胁的角色。

镇压、战争，乃至俄国在世界舞臺上回復的原貌，都是已经发生、也是我所见证的事，我想要说出这个故事。但我也想说出未曾发生的事：未被接纳的自由、未被期望的民主。这样的故事要怎么说？匮乏的理由要放在哪里？要从何处、又要从谁的身上说起？

谈论俄国或其他国家的通俗着作，可以分成两大类：旨在说明该国情况及运作方式的强人故事（沙皇、史达林、普丁，以及他们的亲信），以及旨在呈现该国生活滋味的「寻常人」故事。这两种书籍我都写过，读过的更多。但就算是其中最好的着作，都只能揭开这个国家故事的一角。倘若我们将报导想像成盲人摸象的印度寓言，像我现在这样，多数谈论俄国的书籍都只描述了大象的头或脚。即使有些着作对尾巴、象鼻和身体提供了叙述，试图说明这头动物的全貌，相关着作仍寥

寥无几。我这次的抱负则是同时叙述及定义这头动物。

我决定从苏联政权的「衰落」说起。在此，苏联「崩溃」的说法应该受到质疑。我也决定聚焦在那些以苏联时代结束做为最初成长记忆、或成长记忆一部分的人们身上──也就是一九八○年代前期或中期出生的这一代俄国人。他们在一九九○年代长大，这可说是俄国歷史上最受争议的十年；有些人记得这是解放的年代，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这十年则代表了混乱与苦痛。这一代人的成年生活全都在普丁统治的俄国度过。藉由这个主题，我也在寻找那些人生因二○一二年开始的镇压而遭逢剧变的人。四位出身不同城市、家庭，实际上来自苏维埃社会不同角落的年轻人──廖沙、玛莎、谢廖沙和冉娜──允许我说出在步向开放的国家长大，却又在逐渐封闭的社会中成年是什么样的经验。

我在寻找这些主角时，做了新闻记者常做的事：我寻找的是既「寻常」（意思是，他们的经验足以具体而微地呈现千百万人民的经验）又不同凡响的人们──聪明、热情、自省，又能生动叙述自身故事的人。但对人生之于世界意义的理解能力，是自由的其中一项功能。苏联政权不仅剥夺了人们自由生活的能力，也剥夺了人们充分理解自己被剥夺了什么、以及如何被剥夺的能力。政权的目标在于消灭个人及歷史记忆，乃至学术界对社会的研究。它对社会科学发动的协同战争，使得西方学界数十年来都处在比俄国人更有力的位置来诠释俄国；但西方学界身为资讯取得被受限的局外人，却几乎不可能填补其中的空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已，更是对俄国社会人性的攻击，令俄国社会丧失了理解自身的工具，甚至语言。俄国说出的那些关于自己的故事，就只有苏联理论家们创造的那一套。倘若一个现代国家没有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哲学家，它如何了解自己？它的公民又如何了解自己？我明白了母亲将苏联政权归类，并与另一个政权相比的简单行动，需要非同小可的自由意志，而她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决心移民这一点上得来的。

为了刻划出「丧失理解的智识工具」这场更大的悲剧，我寻找的是那些在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都试图运用这些工具的人。人物名单随之扩充，将一位社会学家、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和一位哲学家纳入。倘若有谁持有定义大象所需的工具，那就是他们了。他们既不是「寻常人」（他们戮力让所处学科死而復生的故事，几乎不具代表性），也不是「强人」；他们是一群「试着理解」的人。在普丁时代，社会科学再次被击败，并以全新的方式被贬低，我的主角们，则面临着新一套进退维谷的选择。

当我将这些故事编织起来，我想像自己正在撰写一部漫长的俄国（非虚构）故事，主旨是同时刻划出个人的悲剧，以及塑造这些悲剧的事件与观念。我盼望结果不只是一部呈现出最近三十年来俄国生活滋味

的书，也是一本呈现出当代俄国样貌、变迁情形及方式的书。大象也真的在书中轧了一脚。

# 第一部　生于苏联

## 第一章　生于一九八四

### 玛莎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当天，身为火箭科学家的祖母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带着玛莎到莫斯科市中心的勇士圣若望大教堂（the Church of St. John the Warrior）领洗。那时玛莎三岁半，比当天教堂里所有其他孩子都大了三岁左右。她的祖母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当时五十五岁，岁数大致上跟在场多数的成年人相同。他们都是老人了—五十五岁是苏联女性的退休年龄，你几乎找不到哪个五十五岁的女人还没当祖母—但年纪还没大到对宗教能在俄罗斯自豪、公开信奉的时代有所记忆。直到不久前，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都不太思考宗教问题。她自己的母亲上教堂，也带她领洗。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大学时主修物理，即使她在「科学无神论导论」这门课成为所有大专院校必修课的前几年就已经毕业，她仍被教导「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註3

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成年人生的大半，都用来研究与宗教恰恰相反的事物：它们是摸得着的，一点都不神祕，而且朝太空飞去。她最近在研发苏联太空梭暴风雪号（Buran）的科技制造集团「闪电」（Molniya Scientific Production Association）里工作，她的任务是设计出让组员在降落后能打开舱门的机制。註4太空梭当时已接近完工。再过一年，暴风雪号终于升空，且成功完成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无人驾驶试飞。计画的资金枯竭了，着陆后从太空梭内部打开舱门的机制也从未派上用场。

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对周遭世界的心情与期望之微妙变化，总是格外敏感。这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是最派得上用场的，得知风向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分别。如今，即使她的职业生活似乎全都上了轨道—这时离暴风雪号升空还有一年—她还是感受得到，她唯一所知的这个世界，也就是建立在物质优先之上的世界，有某些根基的事物正在瓦解。由此产生的裂缝召唤着其他想法（或者更好的是，另一套基础）现身，以填补空缺。彷彿她可以预料到，自己用尽一生建造的坚固、不神祕的事物，最后会落得乏人问津，留下一个形而上的空缺。

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或许学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她或许也跟国内其他人、以及全世界人类一样被告知过，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征服了组织化宗教。但生活在苏联五十多年，她知道事实不尽然如此。回到

一九三○年代，在她小时候，苏联的多数成年人仍然公开表示自己信奉天主。註5照理来说，新世代的人们会完全摆脱宗教，认为宗教仅是全套迷信的其中一环，令其成为必要的过往。但在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九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德军的推进如此迅速，苏联领导人看来又是如此无助，除了天主之外再也无可信仰的了。註6很快地，苏联政府似乎接纳了俄罗斯正教会，从那时开始，共产党人与神职人员携手抵抗纳粹。註7大战结束后，教会又重新成为服务老一辈人的机构，但宗教能在灾祸来袭的不确定时刻提供庇护，这个常识仍然留存了下来。

祖母对玛莎说，他们上教堂是为了亚历山大．孟神父（Father Alexander Men）。孟神父是一位专门为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这样的人服务的俄罗斯正教会司铎。他的双亲都是自然科学家，而他自有一套方法对在教会之外成长的人谈话。他在俄罗斯正教会领受圣职，正教会从二战结束以来始终仰赖克里姆林宫的鼻息，但他自有办法学习和教诲，这使他游走于被逮捕的边缘。註8既然情势正稍微开放，孟神父受欢迎的程度日益显着，聚集在他身边的信众从成千上万增加到数十万，虽然还要再过几年，他才有在苏联出书的影响力。玛莎不懂祖母告诉她大部分孟神父的事蹟或耶稣基督圣训之光，但她并不反对上教堂。十一月七日註9始终是她最爱的假日，因为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这天，一年当中其他三百六十四天要她下厨都不甘不愿、且料理也不太美味的祖母，会烤玛莎爱吃的派。

「你这是搞什么鬼？」玛莎的母亲塔蒂亚娜来接女儿，发现女儿戴着小小的十字架项鍊时问了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但讨论也就到此为止了。塔蒂亚娜并不多费唇舌，她是积极行动的女人。当塔蒂亚娜发现自己怀孕，她就找上研究所的党委会，希望当局能迫使孩子的父亲迎娶自己，那时他至少还有另一个女朋友。这种请求很常见，党委会要介入这种事也很寻常，但在塔蒂亚娜身上却适得其反；玛莎的父亲丧失了研究所教职，从而失去在莫斯科居住的权利，他不得不返回苏联远东地区的家乡，与自己的女朋友「们」相隔数千公里之远。

成为新手母亲带来了更多令人不悦的意外。这让塔蒂亚娜不得不依靠父母。她这一代几乎所有人都运用父母做为照顾儿童的免费资源。註10除此之外的选项有国营的街坊托儿所，那是幼儿监狱和仓库的混合体；或是价格高得令人却步、而且未必合法的私人保母服务。塔蒂亚娜向父母挣得了非比寻常的自由—不同于多数年纪相仿的人，她和父母分居，住在一间只有另一家人和她共同居住的公寓里—但婴儿又重新将她束缚在位于几个街区外的父母公寓里。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和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这对夫妇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有足够的空间照料小玛莎；两人也都是航太工业的资深科学家，闲暇时间多过身为研究生的女

儿。塔蒂亚娜估量，她想要永远逃离父母的家，就得赚钱，还得攀关系走后门。她非做不可的这些事，在限制一切活动、禁止多数事业经营的苏联法律下，不一定合法，但她做的许多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局默许的。

三岁那年，玛莎获准进入一所声誉卓着、筛选严格到几乎无从入学、专供党中央委员子女就读的寄宿幼儿园就读。（事实上，到了玛莎出生时，党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已逼近七十五岁，[註11]因此这所幼儿园除了服务他们的孙子女和曾孙子女，也接受一些像塔蒂亚娜这样出奇积极进取的苏联公民子女。）以下是一位身为前一代学生的作家对这所幼儿园的描述：

幼儿园里，处处散发富足和刚出炉的馅饼臭味。「列宁角落」更是格外华丽，深红色的绒布布告栏上，乌里扬诺夫家的家庭照片有如圣像画，底下还摆了白色的剑兰装饰。在面对森林闹鬼的全景露臺上，党内职官（nomenklatura）的子女正在户外小睡，像小猪一样包裹在鹅毛睡袋里。我抵达的时候，正好是「死寂时刻」（Death Hour）□□苏联人的午睡时间。

「未来的共产主义者，起床！」老师拍手大喊。她狡猾地微笑：「吃鱼脂啰！」……一位魁梧的保母—我还记得她叫卓亚．彼得洛夫娜（Zoya Petrovna）□□手上拿着一大匙黑色鱼子酱朝我走来。[註12]

到了玛莎入学时，列宁角落已经略失光泽，老师们的话语也缓和许多，几乎不在发号施令时，高喊「共产主义者」了。但这里每天仍然配给鱼子酱，这与食物短缺成了日常生活的外界，构成更加鲜明的对比。同样继续供应的还有苏联幼儿园里普遍发放的一块粗谷粉，它可以直立在盘子上。学校维持着每週五天的寄宿课表，这样的奢侈在苏联无人能及。到了週末，玛莎和多数苏联孩子一样，通常都跟祖父母在一起。努力赚钱维持这样的生活，让塔蒂亚娜一週七天不得闲。

玛莎四岁时，母亲教她辨别伪币与真钱。不管携带真钱或伪造的外国货币，被查获都是很危险的事，按照苏联法律，最重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註13]但塔蒂亚娜看来不知恐惧为何物。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她的生计。她也在经营家教事业；起初只是一介家教老师。但她很快就明白，想要真正赚大钱就得增加总量。她开始将找家教的学生—这些客户大多是即将面临大学入学考试艰困口试的高中生—与她的研究所同学配对，而她的同学们可以为这些高中生预作准备。至于她自己的家教工作，则只从事自己培养出来的一项获利丰厚且罕见的专长：帮助年轻学生准备

好面对「棺材」。

「棺材」是特地为犹太裔考生量身打造的考题。苏联的高等学术机构一般可分两类：完全不收犹太学生的，以及严格限定犹太学生人数的。当然，不收犹太学生的规定从未明文公布，却以一种出奇虐人的方式予以实施。犹太裔考生通常与其他有志报考的学生一同参加入学考试，他们也和其他人一起从同一个题库抽出题目单。但他们若是成功答对题目单上的两三道问题，那么，单独和考官们共处一室的他们，就会被随意追加一道问题，彷彿接续着先前的答案而来。这正是所谓的「棺材」。在数学题中，这个问题通常不只复杂，还根本不可解。考生会因此结巴而无法作答。考官接着就会钉牢棺材盖：这位犹太裔考生无法通过考试。换句话说，除非这位考生找了塔蒂亚娜当他的家教，她炉火纯青的教学艺术，不只能教客户答出她设法拿到的某些特定「棺材」问题，还教会他们辨识问题、证明其不可解的一般演算法。这位戴着飞行员太阳眼镜的暴牙金髪女子，能够教导苏联犹太人战胜反犹机器，也让玛莎继续享用鱼子酱，还有噁心的中央委员会粗谷粉。

冉娜

一个人就连想要实现任何看来像是公平竞争的事物，都必须不是犹太人。个人的「民族身分」──美国人称之为「族裔」──记载于所有重要的身分证明文件上，从出生证明到内部护照，再到结婚证书，以及职场或学校的个人档案都是。一经指定，「民族身分」几乎不可改变，而且代代相传。冉娜的父亲鲍里斯却不知为何──最有可能是经由父母的先见与努力──取得了将他标记为俄罗斯裔的文件。他暗褐色的眼珠和黑色浓密的鬈髪，以及父母亲一望即知的犹太名字──吉娜与叶菲（Yefim），骗不了任何人，但他设法藉着不合逻辑地自称「半个犹太人」而避开了多数查问。这样的技巧，加上民族身分正确的证明文件，还有优异的高中成绩，使他得以进入大学就读。还有一个重大障碍：鲍里斯不像绝大多数苏联高中生，他没有加入共青团（Komsomol，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此，毕业证书上将他註记为「政治上不可靠」。他的母亲吉娜．雅可夫列夫娜向高中校方游说，请求修改评语。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但非得做到不可。在这个完全由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博士组成的家族中，每个人都很聪明又有成就。评语被修改了。鲍里斯录取了高尔基国立大学（Gorky State University）无线电物理学系。他毕业时获颁一级荣誉学位，二十四岁那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他的家人和朋友一致认为，他终究会因为量子物理学的研究成果而获得诺贝尔奖。

冉娜出生于一九八四年，也就是鲍里斯完成论文那年。她的母亲雷莎是一位法文教师。按照苏联用语，他们家是一个波希米亚风

（bogema）家庭，意思是说，他们按照看似西化的观念，以持续扩大社交圈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他们租了一间房子，而鲍里斯的姊姊和她的子女则按照规矩，与吉娜．雅可夫列夫娜住在一起。这是一间年代久远的木造房子，位于破败的城市中心，没有浴缸或淋浴设施，只有马桶。这家人还是将就着过日子──他们拿锅子盛水加热，用脸盆冲洗，或到朋友家冲澡──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还没西化到非得每天淋浴不可。但他们西化到了会打网球的地步，这项曲高和寡的运动，让这家人的照片在冉娜年幼时，登上了城市的报纸四处流传。照片里的三人都有一头黑髮，微笑时也都露出白牙，咧开的嘴和脸颊一样宽。他们在这座灰暗的城市里特别显眼。

这座城市名为高尔基，以俄国作家阿列克谢．彼什科夫（Alexei Peshkov）为名，他照着俄国革命的风尚，为自己取了个催人泪下的笔名「高尔基」，原意是「苦人」。当冉娜开始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意识时，她完全不知道有个名叫高尔基的作家曾经存在过；她以为这个地名是对她生活城市的字面叙述。苏联政府似乎也同意，在冉娜出生四年后，政府选择高尔基做为一九七五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全苏联最知名异议人士──物理学家安德烈．季米特里耶维奇．沙卡洛夫（Andrei Dmitrievich Sakharov）的流放地点。沙卡洛夫这个姓氏的字义是「糖」，而冉娜从父亲说他名字的口气，感受到这人身上有一股魔力。当父亲说他要去「沙卡洛夫大楼」，她乞求父亲带她一起去──她并没有意识到，父亲并不是真的要去见那个伟大的人，只是偶尔在大楼外为他守夜──但父亲不带她去。她把自己的小猫取名为安德烈．季米特里耶维奇．沙卡洛夫。

以下是沙卡洛夫的妻子叶莲娜．伯纳（Yelena Bonner）在一九八七年春天对这个城市的描述，那时冉娜还不满三岁：

你会觉得这不是四月初，而是晚秋或冬季开端……我看见行人边走边把脚从水坑里拉出来，大块沉重的泥土黏在他们的鞋子上。风将树梢吹弯到碰触地面。雪混杂着雨从昏暗的天空落下，在某种我不知是否够格称为「地面」的东西表面上，留下骯脏的白色污渍。註14

冉娜十分确定，她居住的城市是地球上最差劲的，城市的艰苦名称，道出了被迫在这儿居住的人们的生活样貌，尤其她的母亲雷莎，得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觅食上。有时她搭火车前往莫斯科──用一夜的时间坐车──然后整个白天都在排队，晚上再搭火车回来。莫斯科最常出产的加工肉品，在高尔基已经好多年不见了。莫斯科本身当然也物资短缺，但

相较于高尔基的商店一一可能除了三公升玻璃瓶盛装、套上锡瓶盖、完全无法辨识的乌黑汁液之外再无其他商品一一莫斯科就算不是丰饶之地，也还是应许之地。有一次，雷莎带了糖果回来，清澈的塑胶袋里满是包装草率的灰棕色圆柱体。它们是大豆混合了糖、碎花生和一丁点可可粉制成的。冉娜觉得自己从来没尝过比这更美味的食物。还有一回，雷莎有位朋友把香蕉装在健身包里带来。它们又绿又硬，而雷莎一一她以前看过香蕉，不像她女儿一一知道，它们应当存放在黑暗的橱柜里才能熟透。鲍里斯并不分担每日採购的义务，但他偶尔会现出他「搆到」的某样东西一一在苏联用语里是指获得很难找到的食物一一冉娜觉得父亲能「搆到」东西，是因为他太高了。基本上，他就是个超级英雄。

冉娜没有固定的就寝时间，既然屋里总有访客围坐在桌边谈话，她就跟他们一起熬夜，直到午夜或凌晨。她父亲也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他会在前往实验室途中顺道送她去街坊的幼儿园，通常是死寂的时刻一一午睡时间一一开始的时候。这很方便，因为冉娜在家总是睡不够。

冉娜快要三岁的时候，老木屋里的桌边谈话内容开始变了。从异常的都卜勒效应或鲍里斯正在思考的任何理论，转向一座核子动力供热厂即将在高尔基兴建这件事。它已经破土动工了。註15此时不过是乌克兰车诺比核电厂发生灾变后一年；政府极力防堵灾变的消息外流，但只能延缓消息流传的速度。此时，损失与危害的严重性开始洩露出来。小儿科医师吉娜．雅可夫列夫娜不断缠着自己的儿子：「当这种东西就要在城市范围内兴建起来，你这个物理学家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在冉娜、雷莎、鲍里斯，甚至吉娜．雅可夫列夫娜的有生之年，苏联人民在政府任意危害自己的生命时，都袖手旁观，但有些事情开始转变了。一九八五年，共产党新任总书记一一也就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一一宣告他所谓的「新思维」。他不是第一个说出这些话的人，甚至不是第一个使用「重建」（perestroika）这个词的人，但如今有些事情确实正在转变。吉娜．雅可夫列夫娜去参加一场集会，抗议核电厂的兴建计画；不过在一年之前，未经党允许的集会都会被视为反国家的罪行，参与者会被逮捕审判。沙卡洛夫则在流放七年后获准离开高尔基，搬回莫斯科。他身为物理学家和苏联第一颗氢弹的研发者，多年来早已成为鼓吹核能安全的斗士。鲍里斯前往莫斯科的公寓拜访他，录下了与这位伟大人物的访谈，他在访谈中公开反对核电厂，而这份访谈纪录刊载于城市的报纸《高尔基工人报》（Gor’kovskiy rabochiy）。沙卡洛夫在访谈最后说道：「我希望你们能够成功改变事态的走向。我完全支持你们。」註16

最终，核电厂计画作废。鲍里斯则在其中找到了一项和物理同样令他感兴趣、甚至让他更感兴趣的事物。「政治」（politika）这个词愈来愈常在餐桌上听见，最后又加入了「选举」（vybory）一词。

*

玛莎和冉娜都生于世界上延续最久的极权主义国家—苏联。她们都于一九八四年出生，也就是西方世界想像中极权主义所象徵的这一年。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着作《一九八四》不可能在它所形容的那种社会中发行，苏联读者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读到它，当时文字审查的限制获得充分松绑，使得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学月刊得以刊载译本。註17但早在一九六九年，一位名叫安德烈．阿玛尔里克（Andrei Amalrik）的记者，就发表了—只是做成打字稿，在朋友之间传阅——篇长度不亚于书籍的论文，题为〈苏联能存活到一九八四年吗？〉（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他认为苏联政权正走向内爆。註18在此之前，身为政治犯、已服过刑期的阿玛尔里克再次被捕，还有一名被控散播这论文的男子也一併被捕，两人都被判刑入狱。阿玛尔里克在法庭上的结辩陈述中说道：「我明白，像这样的审判是为了惊吓大多数人—许多人的确会受到惊吓—但我仍然认为，思想解放的过程已经开始，而且不可逆转。」註19他坐了三年多的牢，随后又在苏联境内被流放三年，接着被迫离开苏联。一九八○年，他在西班牙死于车祸，当时他正要出席一场人权会议。註20苏联政权仍然健在，即使到了一九八四年仍存活着。

但就在隔年，有些事物开始迸裂了。这是由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吆吁改革、宣告开放（glasnost）与重建开始的吗？或者，他只是在表述阿玛尔里克十五年前试图述说的同一个过程？阿玛尔里克说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在这个国家从来不曾站稳脚跟，俄罗斯正教会也丧失了自身权威，少了一套统一的中心信念，这个被欲望各不相同的社会群体往反方向拉扯的国家，终将自我毁灭。

阿玛尔里克是极少数认为这个体制在本质上并不牢靠的苏联公民，其他大多数人都以为体制无可改变，或可以说是建立在苏联式的强化混凝土之上，持续到永远。在阿玛尔里克出庭受审的同一年，另一位异议作家亚歷山大．加利奇（Alexander Galich）写下一首歌，其中叙述一小群朋友聆听他的其中一首录音。有位听者暗示歌者的反苏笑话让他承担了太大的风险。「作者本人无可畏惧，」主人回答：「他一百年前就死了。」註21（加利奇在一九七四年被迫移居国外，三年后在巴黎的公寓因电力意外丧生。註22）

所有思考苏联问题的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同样具有两大障碍：他们必须基于破碎的知识得出结论，并以无法胜任的语言表述这些结论。这个国家不只将一切重要的资讯及多数无关紧要的资讯保护在秘密与谎言的高墙后，它也用了数十年时间竭尽全力对知识本身发动战争。这场战争里最具象徵意义（即使绝非最暴力）的一役发生在一九二

二年，当时列宁下令将两百名以上（歷史学家的估计人数各异）的知识分子—医师、经济学家、哲学家及其他—送上日后以哲学家之船（Philosophers’ Ship）闻名的船只（事实上有好几艘不同的船）驱逐出境。驱逐出境被说成是死刑之外符合人道精神的替代选项。往后几代知识分子就没这么幸运了，被认定不忠于政权的知识分子被捕入狱后，往往遭处决，而且几乎必定被隔离于他们专长所在的学科之外。註23随着政权发展成熟，社会科学受到的限制变得更加广泛，光凭着时间流逝就足以变本加厉。即使军备竞赛驱策着苏联政府重振及培养精密科学与技术，却没有任何诱因—或几乎没有—足以刺激政权鼓励哲学、歷史及社会科学发展。这些学科衰退到了这种地步——一位顶尖的俄国经济学家在二○一五年写道——一九七○年代苏联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竟然无法理解五十年前经济学家的论述。註24

一九八○年代在苏联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不只缺乏资料，还缺乏理解自身社会所必需的技术、理论知识及语言。只有极少数人不顾一切艰难险阻，试着理解社会，而这些人都在黑暗中摸索。

註3：译者按：英语世界的读者通常更熟知这句话的另一个不同版本：「宗教是大众的鸦片。」俄文翻译更贴近原文，但往往在被抽离上下文的状况下习得，在西方大众文化中也是如此。这句话出处的全文如下：「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遭压迫生灵的嘆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开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开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们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Karl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isophy of Right”, trans. Joseph O’Mal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 中译参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一卷上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註4：关于「闪电」的详细资料，参看：http://www.buran.ru/htm/molnainp.htm；太空梭的详细资料，参看：http://www.buran.ru/htm/mtkkmain.htm（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5：Stephen Merritt Milner, Stalin’s Holy War: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Alliance Politics, 1941-1945 (Chapel Hill &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33.

註6：前引书，pp. 32-33。

註7：前引书，内文各处。

註8：Yves Hamant, Alexander Men': Svidetel svoyego vremeni (Moscow: Rudomino, 1994), pp. 104-106.

註9：编按：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时间是十一月七日。由于彼得大帝在一七○○年将教会历改用儒略历（一年365.25天）；到了一九一八年，俄国又将儒略历改成格里历（当今普遍使用的历法，一年365.2425天）所以到了二十世纪时，总共出现十三天的差距。

註10：Jennifer Utrata, Women Without Men: Single Mothers and Family Change in the New Russia (Ithaca, NY,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26-127.

註11：Olga Kryshtanovskaya, Anatomiya rossiyskoy elity (Moscow: Zakharov, 2005), p. 180, http://www.telenir.net/politika/sovetskii_soyuz_poslednie_gody_zhizni_konec_sovetskoi_imperii/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12：Anya von Bremzen, Mastering the Art of Soviet Cooking: A Memoir of Food and Longing (New York: Crown, 2013), pp. 166-167.译者按：本段中译参看安妮亚．冯．布连姆森（Anya von Bremzen）着，江杰翰译，《精通苏联料理艺术：包裹在布林饼里的悲欢离合》（臺北：网路与书，二○一五年），页二三六至二三七，略有改动。

註13：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八十八条，Ugolovniy kodeks RSFSR ot 27 oktyabrya 1960 goda, http://avkrasn.ru/article-2004.html（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14：Yelena Bonner, Postskriptum: Kniga o gorkovskoy ssylke (Moscow: Interbook, 1990).

註15：Boris Nemtsov, Ispoved’ buntarya (Moscow: Partizan, 2007).

註16：A. D. Sakharov, “Intervyu B. Nemtsovu,” October 13, 1988, http://www.sakharov-archive.ru/Raboty/Rabot_20.htm（二○一五年十一月二日浏览）。

註17：1984, translated by Viktor Golyshev, in Novy mir, 1989, nos.2, 3, 4.

註18：Andrei Amalrik, Prosushchestvuyet li Sovetskiy Soyuz do 1984 goda? http://www.vehi.net/politika/amalrik.html#_ftnref17（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浏览）。

註19：Andrei Amalrik, “Posledneye slovo,” http://profilib.com/chtenie/31354/andrey-amalrik-stati-i-pisma-1967-1970-lib-7.php（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浏览）。

註20：http://antology.igrunov.ru/authors/amalrik（二○一五年十一月三日浏览）。

註21：Alexander Galich, “Posle vecherinki,” http://www.bards.ru/archives/part.php?id=4156（二○一五年十一月三日浏览）。

註22：Mikhail Aronov, Alexander Galich: Polnaya biografiya (Moscow: Novoye literaturnoye obozreniye, 2015).

註23：Alexander V. Razin and Tatiana J. Sidorina, “The Philosophers’ Ship,” Philosophy Now, no. 31 (March/April 2001),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31/The_Philosophers_Ship（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浏览）；Paul R. Gregory, “The Ship of Philosophers: How the Early USSR Dealt with Dissident Intellectuals,” The Independent Review 13, no. 4 (Spring 2009), pp. 485-492.

註24：Konstantin Sonin, blog posts “’Udovol’ stviye byt’ sirotoy,’” July 8, 2015, http://ksonin.livejournal.com/574202.html，以及”Drugaya zhizn’,” April 2, 2013, http://ksonin.livejournal.com/490977.html（皆于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浏览）。

# 第二章　被考察的人生

## 杜金

一九八四年除夕，叶甫根妮娅．德布里安斯卡亚（Evgenia Debryanskaya）正在举行派对。叶甫根妮娅是一位三十岁的单亲妈妈，来自乌拉山区最大的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她觉得自己是「外来者」，教育程度不高—她没读过大学—但她有金钱、人脉和美貌，这些都显着增进了她在莫斯科出人头地的志向。她的钱是打扑克牌挣来的—她是个老千，因此也是一位违法之徒。她的关系则来自令人难以置信的出身：她是某位长期在位的莫斯科党委书记的非婚生女儿。註25她的美貌别有韵味：非常瘦，鼻子高挺，剪得不对称的黑色短髮遮住了半张稜角分明的脸；她说话的声音是深沉的中低音菸嗓。这些不寻常的特点组合起来，让叶甫根妮娅得以使用莫斯科最重要大道上—高尔基大街——一间非常庞大的职官公寓。

除夕这一天，人们不停前来，停留到隔天清早地铁发车，或者继续喝酒、抽菸、聊天，直到隔天很晚，甚至后天。这些人是莫斯科的「波希米亚人」：一群疯狂玩乐、从事黑市买卖、知识前卫的人。其中有些人是作家或艺术家，其他人则纯粹藉由生活在官方经济之外、或举办精彩的派对而取得成员资格。有些人可能读过或听过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或是阿玛尔里克的〈苏联能存活到一九八四年吗？〉，这些在他们心境中增添了一丝不计后果。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女演员在男性仰慕者的簇拥下前来。他们一进门，其中一人就脱离人群。他没有跟着人群走进厨房，而是在走廊上一张单独搁在那儿的椅子坐下。他看起来才刚脱离青春期。他向女主人要水喝。

叶甫根妮娅拿了一杯水给他。他啜饮一口，然后问道：「你知道紫罗兰什么时候会在嘴唇上绽放吗？」她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她很爱。她因为他能说出这样美丽得清楚明白、却又完全无法理解的话而爱上了他。隔天他留了下来，后天也是，就这样待了三年，直到她不再爱他。註26

他的名字是亚歷山大．杜金。他来自两人都觉得最为乏味的那种苏联家庭。他父亲接受教育成为了工程师，但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从事某种无趣的祕密职务。他母亲是卫生部官员。他的祖母则是高等党校（Higher Party School）的教务长。这个专门培养党政官员（apparatchik）的制造厂占地数个街区，距离叶甫根妮娅和杜金同居的公寓只有几分钟路程。爱情并不是将他们结合起来的唯一情绪；对苏联政权的共同憎恨让他们靠得更近。一九八五年，想像力所担负的风险更

大于与叶甫根妮娅交往的杜金说，苏联就要完了。那是戈巴契夫宣布「重建」之后。他们那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阿图尔（Artur）以纪念诗人韩波（Arthur Rimbaud）。

叶甫根妮娅向杜金学会了英文和法文，他坚持读书必须要读原文。他们相遇时，杜金二十二岁，刚被一所科技大学退学，但他已经能读法文、英文和德文了。这时，学会一种新的欧洲语言要花他两週时间。他藉由阅读而学习，叶甫根妮娅则藉着和他一起阅读而学习，两人轮流唸出字句。只要她还爱着他，听这些她不懂的字词就从来不会令她厌倦。她和他一起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叶甫根妮娅继续挣钱，但两人都同意杜金才是工作的人。他早起，吃厨房里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然后坐在桌前阅读十八个小时。他经由阅读想填补的空缺很巨大。他聚焦于哲学。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向叶甫根妮娅解释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酒神（Dionysian）概念；她爱上了拥抱混乱的想法，这看来是对治两人周遭沉闷且被严密管制的无聊中完美的解药。接着，亚歷山大告诉她，他找到了一位没人听过的哲学家，一个将尼采发扬光大的人。那位哲学家名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第一部海德格着作的译本—其中短短二十页—直到一九八六年才以俄文刊行。註27由于不隶属于苏联任何机构，除了最小的街坊图书室之外无法使用任何图书馆的杜金，当然也找不到任何一本德文原版的海德格着作。他最后终于取得了一部贮存于微缩胶片上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他没有微缩胶片阅读机，于是改装一部反转胶片（diafilm）投影机—这项苏联技术使用三十五釐米底片，让人们得以在家操作手摇曲柄放映卡通或短片—将书投影于桌面上。当杜金读完《存在与时间》后，他不得不戴眼镜了；他也读完了海德格的思想乃至后半生的基础文本。

## 阿鲁图尼扬

俄国知识人谈论一九八○年代初期时最常用的一句话，大概是「没有空气的空间」（bezvozdushnoye prostranstvo）。这个年代就像俄国的传统木屋（izba）在冬季时将窗户全部填塞起来那样闷热；它隔绝了寒冷，也隔绝了新鲜空气。直到暮春时分，窗户都不会打开一条缝，随着时间过去，人、食物和衣物的气味，混合成一股占去庞大空间、令心智麻木的无差别味道。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苏联统治下的两代俄国人心智里。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知识菁英既是欧洲人关于上帝、权力与人类生活对话的一部分，也是对话的伙伴。经过五十年的清洗、逮捕，以

及杀伤力最强的整肃，当俄国成为孤立的思想宇宙之后，政权仍继续施压毫不松手，留在俄国智识图景里的只剩昔日活泼思想被表述出来的一丁半点。就连共产主义意识型态都大不如前，成了一套循例覆诵、丧失所有意义的字词。列宁早就扬弃了马克思的大部分言论，只挑出一些马克思理念奉为金科玉律。

「随着时间流逝，马克思的后继者们流露出一种倾向，将他的学说当成最终且无所不包的概念，并用来诠释世界。他们自认有责任将马克思的全部着述延续下去，认为马克思的着述实际上是完备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异议人士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写道：「科学逐渐屈服于宣传，结果，宣传愈来愈倾向于自命为科学。」[註28]

玛莉娜．阿鲁图尼扬在一九七三年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心理学系就读，那年她十七岁。这是新成立的科系，研究主题与宗旨并不完全清楚——毕竟，心理学家在苏联社会能做什么，又会做什么？——但它吸引了阿鲁图尼扬这样的年轻人；理性与浪漫的程度相仿，努力要学习人类灵魂的祕密。阿鲁图尼扬知道「精神」（psyche）的意思就是「灵魂」。

阿鲁图尼扬在心理学系的头两年彷佛身处地狱。数不清的教学时数专门用在一门名为「马列主义哲学」的科目上。这是宣传假扮成学术的一个明显事例，尽管年轻的阿鲁图尼扬未必会这样表达，但她仍破解了宣传密码。她开发出一个矩阵，能将任何哲学置放于其上并轻易予以评价。这个矩阵由两条相交的轴线构成。纵轴从唯物（好）延伸到唯心（坏），横轴从辩证（好）到形上（坏），以此划分出四个象限。当哲学家落在形上与唯心重合的左下象限里都是坏的，康德（Immanuel Kant）即是一例。像黑格尔这样结合了辩证与唯心的人好一点，但仍未尽善。哲学的至善在于右上象限，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 Materialism）的顶点。阿鲁图尼扬和几位同学分享了这个矩阵，如今他们也就搞懂了马列主义哲学。

共产党史则是更困难许多的科目。「看看你自己。」教授嘲讽地对她说。他用了一个俄文字「taz」□□意思可以是「臀部」或「脸盆」。阿鲁图尼扬的「taz」显然有问题。她四处张望，感到困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党史课堂上弄脏了实验室的盆子。结果教授是在说她的臀部，他觉得她的臀部太窄，无法为党生出优良的后代。

除了各式各样的宣传科学外，心理学系学生也接受了自然科学的实作指导。他们解剖青蛙，预计接着要解剖大鼠，但阿鲁图尼扬抗拒解剖大鼠，她的小组因此幸运免去了杀害哺乳动物的必要。有一门科目叫「人类学」，但西方人理解的此一研究领域在苏联不被允许，因此这门课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演化论」。其中包含被禁止了数十年、但不久

前重新恢復地位的基因研究，这很有趣。

「高级神经功能生理学」（Physiology of Higher Nervous Functioning）这门课以浸泡在福马林里的人脑为其特色，每一堂课都被带来放在每一张桌子上。阿鲁图尼扬太害怕用手触碰了—要是想戴手套去碰，全国各地可都缺货买不到—于是用笔去戳它，惹得教授大怒。「你在损坏这个脑！」他咆哮。

为了将他们独特的调查范围合法化，心理学系学生也必须在数据及资料分析上接受细密且严格的训练。至于精神本身，则因不存在而引人侧目。要是阿鲁图尼扬在大学生活的头两年学到了什么，那就只有「不存在」背后的基本逻辑。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归根究柢是这么一回事：对人（苏联公民）的理解完全是由他们的社会及其生活物质条件所形塑的。倘若形塑个人的工作正确进行—过去曾经如此，因为苏联社会这时自称已藉由打造所谓「运行于现实的社会主义」，而大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计画—那么，个人就必须随着一整套目标而产生，而这套目标恰好完全吻应了创造他的社会之所需。反常是可能发生的，可被归于两种范畴：犯罪或精神病患。苏联社会自有机制处置这两种人。除此之外，没有哪一种不协调是可能的。内在冲突并非选项。实际上并没有理由探究「精神」这一主题。

直到今天，莫斯科国立大学心理学系的官方网站，仍然负载着精神研究在俄国支离破碎的歷史轨迹。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心理学会在一八八五年创立，网页上自豪地宣称：「它成为俄国哲学生活的中心。」註29一九一四年，学会发展为成熟的学院，兼具教学及研究功能。接着，网页的叙事忽然失去了个性：「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意识型态并尖锐斗争的年代里，学院的领导产生异动。」事实上，学院本身在一九二五年被废除了。六年后，大学校方关闭了所有致力于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系。再过十年，人文学科相关系所重开，但心理学系此时被併入哲学系。直到一九六八年，将近五十年的断裂过后，苏联政府才承认心理学是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全国最顶尖的大学至少在书面上恢復了精神研究及教学。註30新来的学生几乎不可能知道，俄国思想家不到一百年前就读过尼采并与他本人辩论，也不会知道推广俄国伟大哲学家思想、同时让尼采心碎的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是圣彼得堡人。她后来成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早年的学生之一，两人关系密切，并以精神分析学家之身分在德国执业，几乎到一九三七年以七十五岁高龄逝世为止。但她与俄国的联繫，却在死前将近二十年就被革命切断了。註31

布尔什维克国家着手创造「新人」。这个计画的内容与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观念遥相呼应，但它如今不再是哲学操练，而是实践任务。在一段时间里，佛洛伊德学说看来似乎有助于弭平理论与实务的差距。他的着作在革命前就已广泛译介，他和他的学生们也培育出多位俄国精神分析学家。[註32]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权前不久，精神分析在俄国立足的速度曾有一度较西欧来得快。[註33]一九一七年之后，新政权着手将佛洛伊德理论转化为教条，可供庞大机制作为基础，一如它操作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在政权的简化形式里，佛洛伊德主义（Freudism）□□这个词由马克思主义类推而来──「被看作是对于人类基于自身意识真正而非虚构地实现转化，在科学上得到有效的应许。」研究俄国精神分析的歷史学家亚歷山大．艾特金（Alexander Etkind）写道。[註34]

新设立的国营出版社于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三大卷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入门》（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印了两万本──考量时代与题材，这是很大的印量──一个月内就抢购一空。[註35]同年，俄国精神分析学会也在国家的主持下成立。[註36]从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八年，国营出版机构发行了佛洛伊德、荣格（Carl Jung）及其他早期精神分析学家的基础着作，成为整套译本文库。[註37]一所精神分析幼稚园也在莫斯科开办，招收新近产生的布尔什维克菁英子女。这是一项试点计画，是想像中制造未来新人类的工厂原型。

但它未能奏效。精神分析不仅特别不适合以工业化规模再生产，即使在一所菁英幼稚园里，它也有办法制造出不适和不满。在面对孩童性早熟的含煳恐惧中，精神分析实验幼稚园于一九二五年关门。[註38]往后五、六年间，俄国精神分析学会也停止运作。佛洛伊德着作不再出版，佛洛伊德的追随者们也从此失宠，甚至更加不幸。佛洛伊德最重要的俄国学生莎宾娜．史碧尔埃（Sabina Spielrein），是荣格的病人、学生、同僚和情人，也是皮亚杰（Jean Piaget）的老师，以及反移情作用（countertransference）的共同发现者，她在一九二三年就从德国回到苏俄（Soviet Russia），但似乎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一九四二年，她死于南俄城市罗斯托夫（Rostov），由于犹太人身分而被纳粹占领军枪杀。[註39]

俄国精神分析的衰亡，意味着所有心理学研究近乎完全终结；部分是由于精神分析如此支配着心理学，部分则是因为新国家在这时开始拒斥任何未能兼具唯物及简明的人类行为解释。巴夫洛夫（Ivan Pavlov）直截了当的因果理论完全符合这种取径；再来只剩下制约全国人口，让他们变得听话和可预测就好了。艾特金写到敖德萨（Odessa）有位精神分析学家，在办公室悬挂的佛洛伊德肖像背面加装一幅巴夫洛夫像；白天可能有官员上门，由巴夫洛夫面对访客，夜晚则由佛洛伊德迎接暗中

来访的精神分析病患。註40

只有少数几位早期苏联精神分析学家还留在俄国，并存活下来。其中一位长寿的倖存者是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列昂捷夫（Alexei Nikolaevich Leontiev），他在一九三○年代侥倖逃过官方谴责或更坏的下场，註41其后享有漫长的学者生涯，晚年跨足心理语言学领域。但在苏联最黑暗的数十年间，让列昂捷夫得以持续研究工作的原因，则是他的「活动理论」。这项理论专门透过行为视角看待人类，将任何的人类行动都看作是更大群体行动过程的一部分。註42阿鲁图尼扬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就读的时候，列昂捷夫的课程代表了最初几年心理学理论的总和。他的讲课很无趣，令人厌烦和恼火。列昂捷夫的理论只承认生而为人有意识的部分，完全不容许形上的空间，这更让阿鲁图尼扬愤怒。列昂捷夫的教学方法是灌输学生难以记诵的句子，藉以概括反直觉理论。其中一句口号是「将动机转嫁为目的」。比方说，要是一位学生的目标是考试及格，而他开展出对学习主题的兴趣，那么他的动机就被转嫁成了目的。这似乎不曾发生在阿鲁图尼扬身上。

大二过后她就身染重病，因病休学的时间又持续了两年。她復学时年纪更大，或许也更聪明了。用一年时间通过考试之后，她获准復学成为大四学生。大四是学生选择专业、展开研究计画的一年。阿鲁图尼扬选择在社会心理学落脚，她的新生活也开始了。研究生要带讨论课，包括一堂关于吸引力的课。当年轻讲师谈论到男人认知中魅力强大的女人散发出阉割威胁时，学生听了为之疯狂。这可不是什么活动理论，这是性与精神，是他们报考心理学系时梦寐以求的知识。渐渐地，阿鲁图尼扬和一些同学们发现，他们周遭的空间并不是完全没有空气。俄国建筑是为了严寒气候所设计的，其中包含一个独特的发明，叫做气窗（fortochka），那是在大片玻璃窗上凿出的小窗。就算窗户为了漫长的冬季而封住，气窗仍能使用，并经常打开好让空气流通。结果证明，苏联的大学也有自己的气窗，搜寻气窗、得知它们在哪里，然后把整张脸塞进去嗅吸新鲜空气，彷佛能将备用的新鲜空气填满肺部那样。

其中一扇这样的气窗是思想家迈拉卜．马马达希维里（Merab Mamardashvili），他在哲学系授课。他说马克思和佛洛伊德都是知识的革新者，这言论近乎异端，因为阿鲁图尼扬和她的朋友们都认为佛洛伊德宛如上帝，而马克思更像魔鬼，但亲眼见到有人说出自己的想法——真正在思考——而感到振奋。另一扇气窗则是讲授临床心理学的亚歷山大．卢瑞亚（Alexander Luria）。卢瑞亚在一九二○年代曾任俄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註43随后转向研究神经科学而倖免于难，成了伟大的心智说书人。跨越一个世代、一片大洋以及铁幕，他设法启发了奥立佛．萨克斯（Oliver Sacks）。萨克斯认为，卢瑞亚在「神经科学小说」

（neurological novel）这门艺术上是他的老师。註44所有气窗之中最重要的则是大学图书馆，其中包含了特藏图书（spetskhran），这是限制阅览的藏书，但机灵的学生或研究者仍有办法接触使用。特藏图书包含佛洛伊德的个案研究。这是阿鲁图尼扬读过最有说服力、最令人着迷，也最令人惊奇的读物。韶光荏苒，当老一辈俄国精神分析学家的最后一人去世多年后，她才明白所有气窗聚拢在一起所带来的，并不只是那些跟充斥校园且麻木心智的教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新知，更在于这些气窗全都以她想要的理解方式观看及叙述人类。

每个心理学派都有自己对于人类的概念。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一派认为人类基本上是好的，但往往不幸：他们必须受到照料才能变得更好。认知行为学派则想像铭印（imprint）干扰了本该堪用的人类正常运作。精神分析中的人类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有能力反思，但注定在反思过程中犯错，是被赋予了巨大破坏能量的生物。它绝非清白无辜、生来善良的生物，只不过受到外在力量阻碍。这正是阿鲁图尼扬想要研究的生物。她还要再过许多年才能清楚表述这点，但眼下她正在撰写论文探讨认知失调，从而开闢出自己的小小气窗。事实证明，这是做得到的──把苏联人民写得像是可以含有矛盾或内在冲突──只要能用摘录自某本受认可的教科书必备的无意义说法来表述整个故事即可。

## 古德科夫

阿鲁图尼扬囤积的这一切知识要做什么用？在没有空气的空间里，对不是火箭科学家的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而言，能够将理论专长付诸实用是无法想像的奢侈。此时知识分子追求与重视的，是另一种不同阶序的奢侈：在无毒的环境中从事不太繁重的工作、有多余的时间思考，还可以打开气窗吻吸一些空气。这样的索求非同小可，要得到它必须具备运气、智力与关系。双亲都是社会学家的阿鲁图尼扬，在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ology）得到一份工作，这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安排。

那个时代的怪异特徵之一，就是人们往往得委身于跟自己首要兴趣无关的领域工作。这极有可能是体制高度发展所产生的预期效果，用来压抑那些专长精深或热情过剩的人。在阿鲁图尼扬从心理学系毕业、前往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的十年前，有一位只想当社会学家的男子正在撰写学期论文，探讨佛洛伊德的防卫机制概念。列夫．古德科夫起初想要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成为记者。他连续两年都试图考进莫斯科的专门学校──国际关系学院（Institute of Foreign Relations）。这是训练外交官和海外特派记者的学校，其中有很高比例的学生未来都注定要为情报部门工作。古德科夫两次都在入学考试的作文关卡被刷掉，这一关同时按照两种标准评分：形式与内容。在这两年，他的形式都拿到高分，但内容却

不及格；他对那些被认为应当思考的内容不够精通。有一句评语始终困扰着他早年的职业生涯，他被说欠缺「批判性思考」—意思是说，他对任何偏离现行党路线的事物批判得不够强烈。

古德科夫放弃了，转而註册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成为夜间部学生。这是全校要求最低的科系之一，夜间部学生尤其被放任自流。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学系提供了一条几乎毫不费力的途径，让他们下班后听几堂课就能获得大学文凭（时间上的安排较一般课程更久，因为课堂负担较轻）。古德科夫明白，要是他不自己去寻找知识，知识就不可能来找他。他四处寻找，最终偶然选上社会学家尤里．列瓦达（Yuri Levada）开设的一堂选修讲论课。

那是一九六八年，三十八岁的列瓦达自称社会学家，称他的科目为社会学，这件事本身几乎就是革命性的。确切来说，社会学在苏联并未被禁止，但这个学科的名称被贬低成近乎脏话。列宁本人就首创了这个词做为苏联脏话的用法。社会学的问题与精神分析几乎相同，这个研究领域拒绝成为一门能用来创造「新人类」组成「新社会」的科学。哲学家之船出航的前一年，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出版了《歷史唯物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试图做为某种诠释万物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他以平易近人的语言写成，好让无产阶级读懂。布哈林在这本教科书中做了三件事，后来证明对苏联社会学造成了致命后果：他收录了自己确信的先进马克思主义新观念，将副标题命名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A Popular Textbook of Marxist Sociology），还宣告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为它「考察的并不是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而是整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註45列宁憎恨这本书，「社会学」一词尤其惹得他勃然大怒。他在整本书中把这个词圈出来，在页缘提出少少几种评语，像是「哈哈！」、「和稀泥！」、「救命！」这样。註46又过了八年，当布哈林在党内斗争中失势，史达林回想起列宁的怀疑论—他形容布哈林的着作具有「半生不熟理论家那种肥大的装腔作势」。註47最终，布哈林遭到处决。但在更早以前，社会学就已经不得不销声匿迹。

审慎的发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获准承认有个名为「社会学」的学科存在。这个词最主要的出现脉络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因此给了学者研究这些理论的藉口。註48苏联学者们小心翼翼不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社会学」。一九六八年，科学院内的一个单位获准晋升为研究所，但得命名为「实体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crete Social Studies），接受哲学家训练的列瓦达则出任新机构理论部门的负责人。

苏共政治局（Politburo）设立实体社会研究所的这项决议，被标记

为「最高机密」，另一份概述新机构工作范围的文件也是如此。註49这样的机密性，连同机构名称使用「社会」而不用「社会学」，显示政治局认为自己进入了一个敏感、甚至危险的领域，但潜在益处更大于风险。新机构不只奉命批判资产阶级理论，也奉命研究苏联社会。苏共中央委员会本身将批准研究计画，并接收研究成果。那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那一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试图与苏联决裂，自行追求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政治局担心类似的想法也在苏联境内流传。的确，那年夏天苏联坦克车开进布拉格之后，有八位勇气非凡的人士在红场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全部被捕。隔年，阿玛尔里克写下论文，质问苏联能否存活到一九八四年。政治局同样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命令实体社会研究所在一九七一年之前将全部两百五十名研究员招募满额。当然，苏联缺乏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因此新研究所获得特许，可以聘用不具高等学位的人员。列瓦达正是少数自修过社会学的苏联公民之一。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学士，从特藏图书中找到社会学理论加以研读，而后前往中国从事研究；体制对于指向其他社会的探讨总是更加宽容。这时，列瓦达几乎合法地成了社会学家，也在新闻系授课。

列瓦达聪明得令人惧怕，热情得毫不害臊，最重要的是，他精通如何在课堂上说出自己想法的艺术。他指出，苏联境内日常生活的特点可以被观察、审视与理解。比方说，他在一堂课里分析一则短篇故事：「集体农场的农工围坐着等待党组会议开始，一边抱怨提出无理要求的上级和糟糕的工作环境。然后会议开始，工人们轮番赞颂集体农场的成就，吹嘘自己对苏联事业的贡献。当会议结束，他们回到家，又开始抱怨无意义的工作和微薄的薪资。」列瓦达藉此说明━所有听课的人立刻就察觉到━公私行为的分歧，不只可以理解成虚伪，更能理解为一种社会与文化机制。註50

大四的古德科夫着迷其中。现在他想成为社会学家，为列瓦达工作，不过还没有职缺，他得等待。一九七○年九月，终于有个助理工作开缺。谁知道这项工作可以这么令人愉快？每个人都不停开玩笑、说故事，经由每个人对列瓦达本人的爱慕所产生的某种乘数效应，所有人似乎也都爱着彼此。註51但最精彩的部分仍是一场场讨论会。每一位员工都在持续阅读西方社会学家的论着，并为其他成员准备报告及讨论问题。古德科夫选中了韦伯（Max Weber）。他觉得自己像只丑小鸭，不如其他新同事们聪明，但兴奋感与特权意识远远大于不适感。

两年过后，一切都结束了。列瓦达将他在大学的讲课集结成两本名为《社会学讲座》（Lectures on Sociology）的小书，从此惹上麻烦。审查部门放行了这两本书出版，允许一千册问世，但在出版后随即因为一切陈述皆未依循歷史唯物主义概念，以及最严重的「容许含混诠释」

而遭受谴责；换言之，是因为与教条恰好相反，迫使听众与读者「思考」而入罪。註52列瓦达公开承认错误，但仍被褫夺其中一个高等学位，最终不得不从研究所辞职。他所有的员工也全部失业。

列瓦达的前员工们辛苦地找工作。由于意识型态缘故被清洗了，又因曾是列瓦达下属的关系，他们被标记成危险人物。然而在一年之内，所有人都安顿下来，但除了苏联学术机构非常擅长炮制的、空洞的「模仿活跃」（imitation of activity）之外，往往无事可做。最重要的是，列瓦达将他的小组集合起来，每隔两週在晚间聚集开讨论会。往后二十五年间，他们在列瓦达当时任职的任何地点聚会，即使遭到驱逐、不得不迁移至另一个机构、必须改变讨论会的名称（经歷特别严厉的驱逐之后），他们都不曾停止聚会，註53工作模式与使命也维持不变。如同与会者们的说法，这是为了「吸收西方社会学」。他们阅读二十世纪理论，谈论、并撰写不可能发表的报告。为了写出一篇可供答辩的论文，古德科夫必须把自己对韦伯的阅读重写成对韦伯的批判，但他还是花了好多年才获得博士学位。他又一次因为「批判思考」不足以及「资产阶级客观性」（bourgeois objectivity）□□也就是未能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思想罪—遭受批判。

*

来到苏联的西方访客，要是有幸进入莫斯科孤立的知识分子圈，通常会被他们生存其中的那种奢侈的永恆感所吸引。既然职业生涯几乎完全横向发展，曾存在过的理想抱负通常也束之高阁。阿鲁图尼扬、古德科夫，甚至连杜金这样的人，看来都完全是为了求知而学习，就连理论能否以任何方式付诸实用都不太考虑。但在一九八四年，阿鲁图尼扬得知政府正在开闢心理「谘询」服务部门，提供的内容类似家族治疗，它们被称为家庭婚姻中心（Family and Marriage Center），任务是努力遏止离婚潮。各级党委会显然已经丧失了照顾及支持苏联家庭的能力。到了一九七○年代，全国离婚数增加了将近两倍，结婚数却几乎不见增长。註54

倘若心理师拥有硕士及同等学歷，在这些新成立的中心里谘询一次就可收费三卢布；拥有博士学位的心理师，每小时则要价五卢布五十戈比。这点钱跟在黑市买一条牛仔裤的花费相比，不过是零头，但已够买几十条面包了。阿鲁图尼扬这时有了哲学博士学位，但她的第一个案主发现自己竟然只是跟一个瘦小的年轻女人会面就得付出高价，仍然大失所望。阿鲁图尼扬向他展示了学位证书，他还是要求退费，因为他是为了找人开导自己青春期的儿子而来，但那个男孩在前来赴约途中跑掉了。阿鲁图尼扬不为所动：概不退款。

他们每週见面一次，大约持续了六个月。儿子始终不曾出现，但从父亲的回报判断，他们的关系逐渐缓和了。至于父亲自己，他在最后一次谘询时对阿鲁图尼扬说：「一直以来，在我其实应该思考人生的时候，我就只是过日子而已。」

註25：作者访谈叶甫根妮娅．德布里安斯卡亚，一九九○年十二月在纽约（刊登于《站出去／看过来》（Out/Look）杂志）。

註26：作者访谈叶甫根妮娅．德布里安斯卡亚，二○一四年十二月。

註27：M. Heidegger, “Ucheniye Platoa ob istine,” Istoriko-filosofsky ezhegodnik (Moscow: Nauka, 1986), pp. 255-275.

註28：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7), pp. 4-5.

註29：http://www.psy.msu.ru/about/history/history2.html（二○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浏览）。

註30：http://www.psy.msu.ru/about/history/history.html（二○一五年十二月十日浏览）。

註31：Aleksandr Etkind, Eros nevozmozhnogo: Istoriya psikhoanaliza v Rossii (Moscow: Gnozis-Progress-Komplex, 1994), pp. 15-40.

註32：前引书，pp. 112-113。

註33：前引书，pp. 115-116, 127。

註34：前引书，p. 177。

註35：前引书，p. 179。

註36：前引书，p. 183。

註37：前引书，p. 208。

註38：前引书，p. 205。

註39：前引书，pp. 129-168。

註40：前引书，p. 206。

註41：A. A. Leontiev, “The Life and Creative Path of A. N. Leontiev,” Journal of Russian &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43, no. 3 (May-June 2005), pp. 8-69.

註42：Lisa Yamagata-Lynch, Activity Systems Analysis Methods: Understanding Complex Learning Environments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2010), p. 20.

註43：Etkind, Eros nevozmozhnogo, p. 206.

註44：Oliver Sacks, foreword to A. R. Luria, The Man with a Shattered World: The History of a Brain Wou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vii-xix.

註45：N. Bukharin, Teoriya istoricheskogo materializma (Moscow, Leningrad: Gosudarstvennoye izdatel’ stvo, 1925), viewed at http://www.scribd.com, p. 11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浏览）。译者按：此处参看布哈林着，李光漠等译，《歷史唯物主义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页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buhalin/2.pdf （二○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浏览）。

註46：G. Batygin, “Preyemstvennost rossiyskoy sotsiologicheskoy traditsii,” in V. A. Yadov, ed., Sotsiologiya v Rossii (Moscow: Izdatel’ stvo Instituta sotsiologii RAN, 1998).

註47：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p. 310.

註48：Batygin, “Preyemstvennost rossiyskoy sotsiologicheskoy traditsii.”

註49：“Postanovleniye Politburo TsK KPSS ‘Ob Organizatsii Instituta Konkretnykh Sotsial’

nykh Issledovaniy Akademii Nauk SSSR,'" May 22, 1968, and "Postanovleniye Sekretariata TsK KPSS 'Ob Osnovnykh Napravleniyakh Raboty Instituta Konkretnykh Sotsial' nykh Issledovaniy AN SSSR,'" December 10, 1968, http://cdclv.unlv.edu//archives/Documents/iksi_establish.html（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浏览）。

註50：D. N. Shalin, "Garvardskoye intervyu s Yuriyem Levadoy," Sotsiologicheskiy zhurnal, no. 1 (2008), pp. 126-153.

註51：Aleksei Levinson, "Uroki Levady," Neprikosnovenny Zapas 6, no. 50 (2006), http://magazines.russ.ru/nz/2006/50/lev30.html（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浏览）。

註52：Shalin, "Garvardskoye intervyu s Yuriyem Levadoy."

註53：D. N. Shalin, "Yuri Levada: Ya schital, shto bylo by neyestestvenno vesti sebya kak-to inache," Sotsiologicheskiy zhurnal, no. 1 (2008), pp. 155-174.

註54：联邦统计局过去会提供全国的离婚数字，但这些数字似乎已被删除。残存部分可参看：http://www.bad-good.ru/2013/december/marriage-divorce.html（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浏览）。

# 第三章　特权

## 谢廖沙

对谢廖沙来说，一九八五年是他们阖家团圆的一年。註55那年谢廖沙三岁，从他懂事以来，他的家族就分隔两地：他有个姐姐，父母亲都很想念她，所以谢廖沙也很想念她，尽管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见过她。她和谢廖沙的祖父一起住在十分遥远的加拿大。谢廖沙的父母决定把她送到加拿大，让她有机会过更好的生活，但分离似乎造成了严重影响。现在她可以回家了，因为谢廖沙的祖父获准返回苏联。他身为苏联大使而定居于加拿大。对谢廖沙祖父这样的人而言，这是流放。他是这么称呼的：「政治流放。」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可夫列夫是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类。在俄罗斯中部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城外的乡村长大，他对党的最初认知是惩罚穷人和挨饿者的万能巨兽。和他住在同一个村庄的妇女，因为从集体农场田地封冻的土壤里挖出马铃薯而被捕入狱，事实上那些马铃薯因收成时控管无方而被弃置。他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被徵召入伍，那时还未满十八岁。他在前线看到共产党员是最勇敢也是最坚定的士兵，于是入了党。他受过重伤，但倖存下来。战争结束前，他得到就读大学的机会。他和另外四名伤残军人同住一间宿舍。其中一人有几本谢尔盖．叶赛宁（Sergei　Yesenin）的诗集，叶赛宁曾经写过乡野之美，而他所描绘的地点距离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生长的地方不远。然后，叶赛宁过着迷人而放荡的生活，娶了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和她一起到美国旅行，最终在一九二五年于列宁格勒的旅馆房间里自杀。他的着作没多久后就绝版了，往后二十五年内只能祕密流传。他太抒情、太莽撞、太有人性，不属于苏维埃。

冰雪覆盖平原，月色洁白

我的乡野笼罩在裹尸布里。

身披白衣的桦树哭泣，如我所见。

我不知道，死者何人？真的是我吗？註56

这首诗写于他死去的那年。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以一种他仍未形诸于文字的方式，苦思何谓苏维埃、谁属于苏维埃、哪些人事物又不属于苏维埃。叶赛宁如此生

动地写下自己对俄罗斯的爱，以及在俄罗斯美丽却贫穷的乡野度过的童年岁月，则因为某些缘故而不属于苏维埃。这时，苏联红军从纳粹战俘营解放了自己的公民；同时，这些公民却又因为任由自己成为俘虏而被谴责为卖国贼。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来到火车站，观看载运牲口的列车载着这些俘虏从纳粹战俘营前往苏联劳改营，他看到妇女们为了与失踪的丈夫重逢而来，哪怕只看一眼也好；也看到一只只手将揉绉的纸团丢出车厢外，纸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住址，希望有谁可以让心爱的人知道自己还活着。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不明白这种事怎么可能是正确的。但党待他不薄，让他接受教育，并且开始快速提拔他。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将自己的疑惑搁在一边。到了一九五三年史达林去世时，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已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了。当史达林一驾崩，他最近的一些决定立即被推翻。一场计画中的作秀公审取消了，某些党内菁英的亲戚也从古拉格劳改营获释。一九五六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新任苏共总书记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谴责史达林不够格做为列宁的接班人，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咒骂用语「个人崇拜」称呼史达林的统治时期，同时否定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註57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正是在此时失去了将自己长年搁置的质疑与党的路线互相调和的能力。他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好去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首先在莫斯科，随后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一年。这个练习奏效了，既是因为他发现马克思主义令他深深信服，也因为美国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时期，相较于苏维埃体制，冷战实在不是吸引人的替代方案。他返回苏联，重新投入马列主义事业。

但他仍是一位思想家，与多数党内职官愈益相反。一九七二年，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非歷史主义〉（Against Ahistoricism）的论文。在那些能从它枯燥乏味的苏维埃语言中奋力解读出蛛丝马迹的人来看，这篇文章传达了激进的抗议讯息，反对在苏联日渐增强的民族保守主义—那是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所见，基于颂扬某些想像中的农民阶级传统价值观所发展而来。註58「政治流放」到加拿大则是他发表这篇文章所受的惩罚。註59十多年后他返国，成为新任总书记戈巴契夫改革党国计画的谋士。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起草一份文件，提倡激进改革：

重建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下：

一、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利率按劳力支付。

二、有产者做为自由行动者。

三、民主与开放，由此带来资讯公开。

四、反馈机制。註60

不可否认，他的民主概念是有限度的。他在写给戈巴契夫的一封信里，建议将共产党一分为二，组成社会党与人民民主党，再由两党组成一个名为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 Union）的实体，好掌管国家。他提议设立总统一职，由共产主义联盟提名人选，并交由人民投票，任期十年。他认为所有这些事都必须做到，因为苏联政府必须努力争取先机。註61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准确地预测了事态的大致走向。共产党不曾一分为二，但苏联仍在数年之间举行了一连串混合式选举：提名由高层处理，选出的立法机构有着拐弯抹角的结构，用意在确保共产党的优先地位。但苏联公民七十年来终于在投票时第一次有了不只一个选项；戈巴契夫确实也当选了苏联第一位总统。但他也是最后一位，因为抢得先机的计画失败了。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与戈巴契夫必定是在一九八五或一九八六年夏天，一同在克里米亚的一处党别墅避暑。谢廖沙认识了戈巴契夫的孙女克谢尼娅（Ksenia），再过一、两年，两人将在黑海专属党内职官的儿童夏令营共度夏日；但这个夏天，当两个男人没完没了地讨论治国大计，谢廖沙多半都得自求多福。他在被围篱围住的地盘上闲逛，这样的区域看似漫无边际。他在设计得看似城堡、还有地下隧道连结的建筑物里探索。他向下爬进隧道里。谢廖沙直到后来才想到，那些地盘全都戒备森严，他随时都处于监控之下。再到后来，他会怀疑、也会牵挂自己所记得的童年时光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他是否真的曾经独自一人，是否真的被身边围绕的人们爱过。就像祖父别墅里的那位厨师，他似乎很宠爱小谢廖沙，但谢廖沙的姊姊后来告诉他，那位厨师曾是国安会的上校，这让谢廖沙疑惑，那份爱是不是他任务的一部分。

*

谢廖沙是一位党内高官的孙子，而非儿子，因此他早年生命的某些部分，是在他当时及后来所认为的「一般」苏联状况下度过的。他的家庭一如其他人家，也面临食物短缺，从厕纸到墙面涂料等其他消费品也都短缺。小谢廖沙也轮流排队，掌心上用原子笔写着号码──当需要排队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候，分配号码成了一种额外措施，以维持自我组织和人们所认为的公平。但谢廖沙和双亲居住的地方，在地方话里被称做「沙皇村」（tsarskoye selo）。最初的沙皇村──一个被正式命名为沙皇村的真实地点──是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夏宫的所在地。沙皇村在苏联时期被更名为普希金，因为这位诗人在当地接受教育；但「沙皇

村」这个称号开始与苏联菁英居住的街区和小社区产生联繫。

这些地方的商店存货较多，即使它们也会受到货料短缺的影响。建筑的规划和建造品质更良好，註62空气也比城市里其他地方更棒—莫斯科西部的社区比其他区域有较少的工厂和较多的公园。註63在反对不平等的抗争中所建立的这个国家，却创造出举世仅见最错综复杂、也最僵化的一套特权体系。它从第一批布尔什维克党人搬进宫殿、或豪华旅馆后开始的。布尔什维克俄国诞生的最初数年，特权的主要机制就被定义和创造出来。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列宁就提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不会带来人人平等：「财富差异仍将维持不公正的差别。」就在革命后一週，列宁写道，高素质的专业人士「就目前而言」有必要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游手好闲的富人必须被剥夺财产，但训练有素的人才必须劝诱来为新政权效力。「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被更为实用的措施取代，也就是尽国家所能去供养高级专业人士，好从他们身上取得最大的回报。往后数年间，劳力最受国家珍视的人员名单，以及对他们的补偿机制全都建立起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他们所谓的「创作知识分子」提供津贴，包括作家、艺术家，特别是电影导演，以及学者和科学家；军官的层级则更高。但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看重的还是自己：「政治工作者」的特权与利益胜过所有其他群体。

理由不只出于实用，也出于意识型态。「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从创立之初就抱持着强烈的菁英主义心态。」研究苏联社会的英国学者默文．马修斯（Merwyn Matthews）在一九七○年代写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得到启蒙的一群，理解歷史进程，注定要带领苏联人民—实际上更是全世界—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为自己及其亲友确保特权，好匹配那些了不起的理想。」註64

苏联特权阶级有权得到更高的薪资、一套额外的财务报酬、更大也更好的公寓、获取消费品的优惠，还有教育及旅行的某些特权。註65特权的价值及规模在史达林统治的三十年间增长，财富差距也随之扩大。赫鲁雪夫统治的十年间，由于国家推动大规模的住宅增建计画，差距略有缩小，但在一九六四年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掌权后，原先扩大的差异又捲土重来。註66

弔诡的是，苏联经济体制的特点，造成被国家赋予不同价值的公民群体之间，界限变得更鲜明，也更难以穿越。赋税是最小限度的，财富重新分配也不是经济体制的目标。註67由于特权阶级获得的额外补偿多半并非货币，也由于全部的额外补偿都由中央调控，某一特定「种姓」的成员在社会及地理上都群聚在一处。政治局成员与其他政治局成员住在同一栋楼，在同一个配销中心取得消费品，送子女就读同一间学校，在同一家诊所看病，在同一个地区分得几片土地兴建週末或夏季使用的木

造别墅，也在同一个疗养所接受矿泉疗养。科学院成员也是一样，有自己特殊的基础设施，任何「创作协会」的成员，像是作家、艺术家或电影摄影师，也都是这样。

不同公寓的施工品质及舒适程度逐栋不同。每位政治局成员的家人平均能得到更多平方英呎的空间，还有更大的窗户、更加挑高的天花板，楼板使用的木材也更坚实。学者较少，「创作者」又比学者更少，工程师则更次之。低阶劳动者通常住在铺着油布地板的宿舍房间里，并且共用盥洗设施。

身在最高层的人们不论是出于羞耻感，或仍残留着对堡垒安全感的嚮往，都筑起高大坚固的围墙保卫自己的生活。异议创作歌手亚歷山大．加利奇（Alexander Galich）写过一首歌，名为〈在七道围墙之外〉。歌词的叙事者是一名普通苏联公民，他碰上了围绕着共产党领导人地产的围墙，开始想像这些围墙藏匿着什么：不受践踏的新鲜草地、洁净的空气、很难买到的巧克力薄荷糖、不同种类的鸟、知道有围墙保护而安心享用的烤肉串，以及最厉害的，在夜里「他们播放娼妓的电影」。叙事者再也受不了，动身返回城市，一路上都得收听火车广播系统放送着赞颂苏联平等主义的演讲。他又想起了这些领导：「回到那里，在七道围墙之外／在七道门锁之外／他们不必听这种演讲／他们只要吃烤肉串就好。」这样的想像描绘出一幅苏联终极特权的图像：养尊处优的生活，还可以观赏好莱坞电影，而无须聆听领导人自己的宣传内容。註68

谢廖沙的人生多半在围墙里头度过。每逢週末，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公务车—苏联制汽车的最高典范—装着令它有权忽视交通规则的闪灯，载送谢廖沙一家人出城。他们走的是百万富翁街（Rublyovskoye Shosse），这是一条专供苏联菁英使用的平坦狭窄道路。伏尔加公务车在充满坚固围墙的卡屈加村（Kalchuga）停下。其中一道围墙的自动门会打开，汽车驶入一处专供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使用的政府别墅庭院。而在平日，另一辆类似的伏尔加公务车沿着同一条路，将谢廖沙载往另一处不同的围墙。那是专供苏联最高层菁英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比起玛莎母亲设法买通关节才进得去的中央委员会幼儿园更高一等。在城里，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居住的建筑物本身就构成了自身的围墙：那是一整片街区，所有出入口都面向一座大广场，穿制服的守卫看守着分隔建筑物与外界的门。谢廖沙发现这些人很有趣，试着对他们说话以吸引他们。他知道自己很有魅力—人人都这么说，人人都同意他非常可爱，白白胖胖、还有一头金髮。但他顶多得到这些人的一抹微笑。

## 廖沙

廖沙与谢廖沙的生长环境不尽然是苏联阶级光谱的两端，但两者之间确实大相迳庭，而且差距无法弥合。他的家庭也享有特权，廖沙在成长过程里意识到这种特权。他的祖父是集体农场的农民，一生都在地方党组织服务，这意味着他在地方苏维埃会议这样的立法机构任职多年后，拥有一些追加薪资，以及日后一些可取得的非正式特权。他在一九七八年六十岁左右去世时，拥有的财产比其他村民多了一些：他留给家人一头牛。他的遗孀，也就是廖沙的祖母，在两年后把牛卖了，好让五个子女能有一人到最邻近的大城市彼尔姆（Perm）读大学。苏联的高等教育是免费的，持续得到好成绩的学生每月还能获得助学金，但在食物短缺、乃至其他生活必需品也都短缺的时节，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理性地指望不靠家里支援就能存活。

廖沙的母亲加林娜是家里第四个孩子，也是手足之中最聪明的一位，她幸运得到了援助。她的长兄服完义务兵役之后就读军校，但她母亲的钱不够送其他任何一个孩子上大学，甚至不够帮助他们离开村庄。两个姊姊先后嫁到外地去，即使她们过没多久都成了寡妇。祖父留下了牛，这头牛又被卖掉，加林娜才得以前往彼尔姆。大学毕业后，她成了歷史教师。她不须搬回村庄，因为她被派往索利卡姆斯克（Solikamsk）市镇工作。身为教师，她在那里有资格获得一个房间，后来甚至有了自己的一间小公寓。

索利卡姆斯克是乌拉山区最古老的聚落之一；从十五世纪开始，盐矿就在那里开採。一九三○和一九四○年代，这个市镇被劳改营填满，数万名囚徒从俄罗斯其他地方送来，后来又从被占领的波罗的海各国及战败的德国送来。註69到了一九七○年代晚期，加林娜前来时，劳改营早已不復存在，但这个市镇一如大多数苏联市镇，看起来臃肿不堪—约莫十万位居民大多像短暂寄居者那样，生活在临时搭建的住处。

三十一岁时，加林娜成为城内一所职业学校的副校长，她正与另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交往，而对方已婚。她怀了身孕，想要堕胎。这可能并非她第一次堕胎，而这种情况很正常，在缺乏预防怀孕的措施下，避孕药在苏联根本无法取得，而保险套的品质低劣又缺货，于是堕胎成了常见的生育控制方法。就在加林娜怀孕的一九八四年，俄国的堕胎数量是出生婴儿数的将近两倍。註70堕胎并非丢脸之事，因此计画也无须保密：加林娜的家人听说了，而她的妹夫说服她打消念头。他指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她已年过三十，仍然未婚，要是这次堕了胎，往后恐怕再也无法怀孕。就统计数据来说，他是对的。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俄国女性在三十岁前就结婚了，註71三十岁过后极少有人生育儿女。註72

加林娜同意了。她会留下孩子并独力抚养。这也是一种寻常的做法。数十年来，苏联一直想尽办法试图弥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古拉格劳

改所造成的惨重人口损失，然而却始终失败。由赫鲁雪夫首倡的人口政策，宗旨是尽可能让最多的女性为相对稀少的倖存男性生育子女。政策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男方不用负责抚养孩子，而是由国家在财务补助和儿童保育两方面帮助单亲妈妈，甚至可以依其需要，不限时间长短、不限次数将孩子留在育幼院里，而不至于丧失亲权。国家奋力消除单亲妈妈及生下非婚生子女相关的任何污名，并求助于育幼院。女性可以在子女的出生证明上编造一个男人的姓名做为父亲—甚至可以直接填上真正的生父，而生父无须担心自己得承担责任。「新计画旨在鼓励男性与女性双方建立非婚姻的性关系，以促成生殖。」歷史学者中地美枝（Mie Nakachi）写道。[註73]加林娜的儿子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九日—胜利日[註74]—诞生，她给儿子自己的姓氏米萨林娜（Misharina）和父名尤里耶维奇（Yurievich），藉此示意生父名叫尤里。廖沙的正式全名是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米萨林（Alexei Yurievich Misharin）[註75]。

加林娜在一间所谓的「矫正学校」当上了校长。这个名称其实令人误解。这所学校与其说是矫正机构，倒不如说是国家为了补偿学生遭遇的任何严重错待，额外做的努力。矫正学校提供了被认定没有能力在主流学校出人头地的学生来就读。多数矫正学校在週间或一整年里提供寄宿；有些学校为身心障碍儿童准备了特殊设施。

加林娜在一间「最常见」的矫正学校服务。这类矫正学校是为了那些不被父母照护的儿童所设立，原因通常是酗酒。她的学生来自廖沙儿时居住的街区与学校之间的小社区。虽然他和加林娜住在一栋常规的混凝土空心砖楼里，这个小社区却是索利卡姆斯克人口爆炸时，那些古拉格劳改营囚徒遗留下来的木造营房所构成。人们称之为营房区（barachnyi）。像加林娜一週六天上下班那样步行穿越营房区，在人们看来是危险的；她随身携带一把刀防身。有时她得带着廖沙一起穿越营房区，通常是为了寻找某个失踪的学生。廖沙发现，营房区既厉害又可怕。天花板看来像是要倒塌下来，还有一股臭味，比他闻过的任何味道都更强烈刺鼻。大多数的居民都喝醉了，包括加林娜偶尔会进行长谈的那些家长们。廖沙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贫穷的一种作用。他也在心理上将贫穷与「自杀」一词联繫起来，加林娜谈到自己的学生时，规律地用到这个词。其他字词包括「怀孕」、「酒精」，后来还有「毒品」。他们是酗酒、怀孕、自杀的孩子，她清楚表明。他们的年纪虽然比廖沙大，但仍是孩子。廖沙理解到，这些字词不适用于他和加林娜的世界，其本身便是特权的一种作用。

其实人们无需走到营房区，就能看见赤贫；在廖沙和加林娜住的街区里也看得到。住在隔壁栋的女人严重酗酒，她的子女们进了矫正学校。某些夜晚她喝得不省人事，孩子们就被锁在门外。在这些夜晚，他

们常常就睡在加林娜家的过道上─廖沙思量，他们选择那里，是因为知道她不会伤害他们。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加林娜在某些早晨开门、带廖沙去幼儿园的时候，过道便会臭气冲天：因为这些孩子就把过道当成厕所。最终，到了一九九○年代，楼房的住户在前门加装了一道锁，将他们及其他闯入者拒于门外。

廖沙的幼儿园时光很漫长。他在早上六点被带到幼儿园，然后母亲再步行半小时到她的学校上班，通常不到晚上十点不会来接他，那时幼儿园里只剩下夜班警卫。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因为加林娜独力抚养廖沙，工作繁重，廖沙的外祖母又住得太远，不能每天来帮忙。加林娜对廖沙说，他的生父住在大城市彼尔姆，那也是她读大学的地方。彼尔姆在一百二十公里外，但说到人们去那儿的频率，恐怕跟数千里以外的地方没什么两样。有时会有一位友善的男人路过，和他们一同生活。加林娜要廖沙叫他尤拉叔叔。

廖沙大约三岁的时候，加林娜开始无时无刻开着电视。有时她坐在黑白电视机前，连看几小时萤幕上灰色的男人们说话，其他事都不做；偶尔提高声音。加林娜对廖沙说，这些男人─她似乎和他们有私交─在电视上讲的事有着紧张感，还有认真和重要性，因此并不无趣。廖沙学会了一些人名，包括戈巴契夫，他是最重要的人，前额有块大大的记号。年纪比廖沙大上许多的表哥对他说，那块记号是苏联地图，因为戈巴契夫是总统。当廖沙告诉加林娜这件事时，她大笑说那只是块胎记。她说的必定没错，但表哥听不进去。加林娜带着廖沙去投票，向他解释这是他们的「公民义务」。他们的公民义务究竟是什么并不明确，但廖沙喜欢投票，因为投票所以红布装饰，还能买到萨拉米香肠三明治。

到了夏天，廖沙和祖母一起待在村里。诸位堂表兄弟姊妹也被送去那里，他们的父母来来去去，有时停留一、两週，有时只度过週末。他五岁时，有一天阿姨说：「我们去领洗。」于是他们全都到了另一个村庄，站在一座严重毁损的教堂里，最近几次小规模的维修更只凸显出整座教堂的破败。一个身穿礼服的男人抓住廖沙的头髮，把他的脸浸在一桶水里，那一刻廖沙恨透了这个男人和他自己的阿姨。但过了几分钟，他又喜欢上这个男人放在他舌头上的面包与酒，也爱上了男人为他挂在颈上的小十字架。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廖沙跑向母亲，一面叫嚷「看看我拿到什么」─他指的是小十字架。加林娜退后一步，表情看来像是要昏倒。她后来向他解释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以及身为无神论者的意义。

廖沙很爱听加林娜解释事物，尤其是跟歷史相关的事物。家里有很多歷史书，廖沙崇拜这些书，特别是关于伟大爱国战争的书籍。他读了《荣耀的花环》（The Wreath of Glory）这套红色人造皮面的厚重书

籍。这部巨大的选集收录了虚构和非虚构着作，每一卷都用来刻划战争的某一面向：一册关于莫斯科保卫战，一册关于列宁格勒围城，另一册关于胜利本身。註76他也听战争歌曲黑胶唱片，包含啰唤人们奋起的伟大进行曲，关于失去爱人、为爱人战斗的抒情歌谣，以及悼念阵亡袍泽、令人心碎的战后歌曲。廖沙确信自己的生日绝非巧合，他不仅出生于胜利日，更出生于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四十周年纪念日上。当亲戚朋友来访为他庆生时，他总会追问他们对战争史的认识。当他长大了一些，他把仪式转变成测验，花几天的时间准备伟大的史达林格勒之战和库斯克会战等考题。他尽力在钢琴上弹奏战争歌曲。他的一位表哥在某一年生日送他一套伟大爱国战争乐谱。廖沙学的是演奏手风琴而非钢琴，但他能读乐谱，也有强烈决心。他用一只指头在钢琴上弹奏。

註55：编按：事实上，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可夫列夫似乎是一九八三年从加拿大归国的，而谢廖沙不记得这个时间点。但他的回忆是全家团圆与重建时期的开端同时发生。

註56：http://samlib.ru/w/wagapow_a/yesen.shtml#Im_tired_of_living, trans. Alec Vagapov（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7：“O kulte lichnosti i yego posledstviyakh,”Nikita S. Khrushchev’s presentation at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 http://www.hrono.ru/dokum/195_dok/19560225hru.php（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浏览）。

註58：Alexander Yakovlev, “Protiv antiistoritsizma,” 原刊于Literaturnaya gazeta in 1972，复制自http://left.ru/2005/15/yakovlev132.phtml（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浏览）。

註59：A. N. Yakovlev, Gorkaya chasha: Bolshevizm I reformatsiya v Rossii (Yaroslavl: Verkhne-Volzhskoye knizhnoye isdatel’stvo, 1994), pp. 9-12.

註60：前引书，p. 22。

註61：前引书，pp. 211-212。

註62：Denis Romodin, “‘Tsarskoye selo’ v Kuntsevo—premium-klass epokhi SSSR,” Proekt Sovetskaya Arkhitektura, http://sovarch.ru/273/（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浏览）。

註63：莫斯科市内的工厂地图，参看http://www.subcontract.ru/Docum/DocumShow_DocumID_728.html；空气品质地图参看http://www.moscowmap.ru/imap_eco.shtml（皆于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64：Mervyn Matthews, Privilege in the Soviet Union: A Study of Elite Life-Styles Under Commun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8), p. 20.

註65：前引书，pp. 59-90。

註66：前引书，pp. 91-92。

註67：前引书，p. 20。

註68：Alexander Galich, “Za semyu zaborami,” http://www.bards.ru/archives/part.php?id=4162（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69：http://solikam-sk.narod.ru/index/0-3；http://www.memo.ru/history/NKVD/GULAG/r3/r3-175.htm（皆于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70：“15 novykh nezavismykh gosudarstv: Chislo abortov na 100 zhivorozhdeniy, 1960-2014,” Demoskop weekly, no. 663-664 (November 16-29, 2015), http://demoscope.ru/weekly/ssp/sng_abo.php（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71：Sergei Zakharov, “Brachnost v Rossii. Istoriya I sovremennost’,” Demoskop weekly, no. 261-262 (October 16-29, 2006), http://demoscope.ru/weekly/2006/0261/tema02.php（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72：D. Zhdanov, Ye. Andreev, and A. Yasilioniene, “Polveka izmeneniy rozhdaemosti v Rossii,” Demoskop weekly, no. 447-448 (December 13-31, 2010), http://demoscope.ru/weekly/2010/0447/tema03.php（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73：Mie Nakachi, “Replacing the Dea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1944-1955,”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p. 191.

註74：编按：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投降书生效时欧洲中部时间为五月八日，而莫斯科时间为五月九日，因此俄国等东欧国家与西欧庆祝的时间相差一天。

註75：编按：俄语文法有性别之分，女性姓名大多以母音「a」结尾。此例显示虽然廖沙跟着加林娜同姓，但正式拼写时还是略有差异。

註76：Venok slavy, 12 vols. (Moscow: Sovremennik, 1987).

# 第四章　苏维埃人

乍看之下，「重建」是个不可能的概念。党早已运用自己的指挥体系，让国家和组织比较不被命令所驱动。因此，首要问题即在停滞与不知变通的体制下，着手改革自身。或许最严重、也无从解决的问题，在于这些穷尽一生巩固权力及个人影响力的人，被期望构思出一套改革方案，来拆解权力的槓桿阶序，而且有可能反把自己扫地出门。体制本能地抗拒改革，许多人有意识地密谋破坏改革。

身为被戈巴契夫指派思考「重建」，并对「重建」予以指导的人选，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每天都要面对这项任务的徒劳。党内不少领导人由于惧怕丧失权力而抗拒改革。那些看似欢迎改革的人，其中以莫斯科市委书记鲍里斯．叶尔钦（Boris　Yeltsin）最引人注目，但最终也受到权力欲驱使，使他们彼此成了不可靠的盟友。苏联多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监控及遏止民族主义势力上，也变得懈怠：数十年来，苏联始终将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者指控为国家公敌，但「重建」使得民族自决的言论在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乔治亚，乃至名义上属于俄罗斯共和国的地区都得以松绑。它开始让国家分崩离析，在苏联最无力负担的时刻制造出紧张与不稳。如今获得更大自由、甚至被鼓励探讨棘手议题的媒体（部分归功于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努力），却时而被动、时而保守，甚至反动。至于大众，就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所能追踪到的大众思维来说，似乎也在不适当的被动与同样不适当的行动之间左右为难。开始发声的人，似乎总是选择极端的立场，无论是支持民主化，还是支持镇压以保卫苏联的秩序。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开始把这些人全都称作「极端分子」。

身为一个辛苦自学、又必须教会自己思考的人，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能同情抗拒变革的大多数人，他们的抗拒就只是因为不曾接触过党教条之外的任何事物。一九八八年五月，他说服中央委员会批准一项齐心协力的工作，以便恢復国内的思想与知识。「如今到了这样的地步，西方有些学者对本国的歷史比我们自己更为精通，」他在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演说稿里写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包括很多在书籍中、研讨会上，以及诸如此类的场合里受到热烈争论的概念，其实有很多最初都由我国的思想家阐述。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酝酿革命的年代里，俄国知识探问的渴求程度远甚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建议由五、六位编辑组成团队，匯编一套俄国哲学家文库，册数约三十五到四十册，其中包括早已停止出版的十九世纪思想家，以及那些坐上哲学家之船被放逐学者的着作。他自己编纂了一份名单，要将三

十九位思想家回復到俄国思想全集之中。他写道，要是能顺利进行，歷史和经济学（他仍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书籍就能比照办理。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註77

*

在计画中的文集实现之前，期刊上开始刊载先前被噤声的哲学家着作。就连海德格的论述都能印行。对杜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令他大惑不解的时期。一方面，他再也不需要花费时间索求禁书，或试图阅读投影在木桌上面的微缩片伤害视力；另一方面，他的整个人生正是建构在这一点上──拼搏学会困难的概念，成为全国极少数懂这些概念的人，并继续他的自我学习过程。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世界上──这个令他憎恨的静止世界──有用不完的时间。倘若世界不再静止，倘若知识不再被禁制，杜金又是何许人也？

叶甫根妮娅离开了他。她加入了一群聚集在一名古怪女人瓦莱利亚．诺夫德沃斯卡亚（Valeria Novodvorskaya）身边的群众。这古怪的女人年近四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一再进出惩罚性精神病院。她是不合群的激进异议人士。此时，她身边头一次聚集了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从一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约有八十人参加的讨论会开始；这样的人数，不过几个月前仍无法想像。即便到了一九八七年四月，发起人还是很惊恐。他们从研读苏联的歷史开始──诺夫德沃斯卡亚宛如一部活的百科全书，她主讲的次数比任何其他人都来得多──过没多久就开始对研读的每一个主题发起抗议行动。他们举行小规模的示威，纪念苏联公民不被允许知情的事件。叶甫根妮娅开始经常遭到拘留。她似乎乐在其中，也很享受随着苏联报纸开始报导街上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知名度。她再也不住在与亚歷山大同居的公寓里了。她设法被分配到一个自己的住所，有一个房间加上厨房，位于一座一九七○年代建造的混凝土空心砖塔楼，距离市中心只要一段短短的地铁再转电车就好。如今，有数十人挤进这个空间，他们全都是叛逆的怪胎，每天都有多达十二辆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务车在前门彻夜戒备。註78他们的儿子阿图尔这时由亚歷山大的母亲照顾，叶甫根妮娅则在週末带他，只要她没有忙着抗议或被拘留在某个警局的话。

诺夫德沃斯卡亚的团体开始自称政党──在一个七十年来只有一党存在的国家──这个新政党在一九八八年五月经由歷时三天的「代表大会」后创立，约有一百人出席。部分议程是在叶甫根妮娅的公寓举行的。与会者遭受骚扰，有的被拘留、有的受到粗暴对待。原订要举行第三天会议的一处别墅遭到国安会特工查抄，被弄得乱七八糟无法使用。只有大约五十位与会者敢签署新政党的纲领。註79这是一份骇人听闻的文件，其中呶吁解除华沙公约，将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

—称为「占领区」，并主张它们及其他有意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应当获准脱离苏联。它废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死刑及徵兵制。诺夫德沃斯卡亚和叶甫根妮娅还有可能走得更远—她们的观点结合了自由意志与无政府主义，这两者在当时的她们看起来是西方思想的极致—但团体其他成员阻止了她们。实际上，有几位曾因反苏活动罪而入狱服刑的资深异议人士认为，这份文件太过针锋相对。[註80]这甚至算不上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用「极端分子」一词所指的意思，只不过是他所指涉的极端分子讽刺画版本。一名检察官威胁以叛国罪起诉诺夫德沃斯卡亚，最重可求处死刑。但运动者们以一种完全非苏维埃的方式回应。他们没有因恐惧而停止，也没有顶撞检察官，就只是对他的威胁置之不理。所有活动发起人都收到传唤通知，他们也全都不予理会。他们继续召开代表大会，即使有几个人在会议进行中遭拘留，监禁一週左右。共产党之外的苏联第一个政党，命名为「民主联盟」（Demokraticheskiy Soyuz）。[註81]

诺夫德沃斯卡亚后来写道，叶甫根妮娅和她自己一样，其实都没有那么反苏维埃（anti-Soviet），而是「非」苏维埃（un-Soviet）。[註82]叶甫根妮娅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中，她投入、她展演、她受到仰慕、她也在恋爱。事实上，她过得实在太快乐，以至于民主联盟都受不了她，最后以讦发阴私为由（通常在喝醉后）将她开除。到了一九八九年，当成立新政党这件事本身也不再激进时，她与人共同创立了跨国激进党（Transnational Radical Party）俄罗斯支部，这是一个倡议反战且不参与选举的政治团体，总部设在义大利。义大利人送了叶甫根妮娅人生中第一部电脑，但后来激进人士也把她开除了，因为她在前往罗马尼亚大使馆门口示威当天睡过头。她认定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兴趣强过政治，于是创立了俄罗斯自由意志党（Russian Libertarian Party）。她也出柜成为同性恋者—那份驱动她政治生活的爱，是女性之爱—并发起了全国第一个酷儿团体：性少数协会（Association of Sexual Minorities）□□「男同志」或「拉子」之类更具体的身分词汇，当时还不是俄国人耳熟能详的。[註83]

*

一九八○年代晚期，有许多变得愈来愈令人困惑的事物，其中之一是左右对立。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使用「右派」一词时，只不过是用来替代「保守派」一词最基本的词意：只想事物维持原状的人。但这些人走的依旧是「左派」路线，可是共产党本身就是最保守的势力，因此几乎没有人想要自称「左派」，这使得所有人都成了「右派」，或者相对保守派而言更趋近于「激进派」或「民主派」。叶甫根妮娅先后创立的激进党（这在欧洲应属极左派）和自由意志党，两者与共产党的差别大约等距，这使得从一个党跳向另一个党看来像是挪动了一小步。事

实上，她所有的观点全都属于同一个范畴，这比众所周知（因此可疑）的政治区分更为重要：它们都是西方概念。在认识诺夫德沃斯卡亚之前，叶甫根妮娅曾短暂参与了一个名为东西方互信组织（Group for Trust Between East and West）的团体，其唯一议程就是应对苏联宣传中最基本的前提：西方即是威胁。就连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修辞里，这个前提似乎也不容侵犯，即使他未必真是如此思考。他每次写信或演说谈论苏联的现况，几乎都会提到西方危害苏联的企图，以及西方破坏重建本身的阴谋。因此，如果有人想要像叶甫根妮娅那样成为非苏维埃的人，首先最好从接纳众多的政治立场开始。从自由意志到反战主义，一个比一个更西化；同性恋权利、药物合法化、死刑废除，以及取消一切国家管控，支持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主宰一切——所有主张都自然而然趋向一致。

至于杜金，失去了心爱的女人、儿子，乃至不预设后果的密集学习之后，他必定要去追寻并找到与一切事物相反的立场。他首先漂流到了一九八○年代兴起的祕密组织「记忆」（Pamyat）。该组织长年偷渡反犹太言论，从《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到当代世界锡安主义阴谋；这时，它一方面与戈巴契夫的重建政策结盟，另一方面又与想像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復兴结盟。註84这样的结合简直是出自直觉：苏联国族主义修辞只是贬值的空洞意识型态其中一个面向。尽管重建之前的苏联官方媒体定期放送反犹太主义，但一般而言，体制仍会压制赤裸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如今这个锅盖被掀开了，许多不同种类的仇恨涌现出来，「记忆」则是其中最显眼的。苏联领导人也许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最好，也或许是不愿意回应，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无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都大动肝火。「我不是犹太人，」一九九○年三月，他在高等党校（Higher Party School）的演讲中说道：「但我每天都收到『记忆』发来的传单，说我是『苏联的犹太—共济会客厅主人』。就我所知，会有这样的说法只出自一个原因：我确实在着作和演讲中，在每个地方和我能力所及的任何地方都公开发声，反对所有民族主义的表现，包括反犹太主义。而我认为，谁支持这样的种族仇恨意识型态，都是俄国知识界成员以及所有俄国人的耻辱。」註85

在数十年没有固定型态的地下活动之后，「记忆」组织得到了一位充满魅力的领袖，他名叫季米特里．瓦西里耶夫（Dmitry Vasilyev），当过摄影师，而他立刻就开始谴责全世界：犹太人大屠杀是犹太人的阴谋（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犹太人）；摇滚乐是撒旦的诡计（慢速播放的黑胶唱片传出了对撒旦的唱诵）；瑜珈是西方传来的祸害（西方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要玷污俄国文化）。註86

在它向戈巴契夫宣誓效忠所展现的苏联保守主义，和它反对西方、

反对一切外来事物的立场之间，「记忆」组织的确是民主联盟的背反。一如叶甫根妮娅，杜金过没多久也和他加入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分道扬镳。但相较于叶甫根妮娅短暂地成为一连串激进团体的发起人，杜金则展开了一项新的知识计画。

如今，他从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的着述中得到启发，这位死去多时的法国人出版过十多本探讨形上学的着作，其中两部以印度教信仰为重心，但他也探讨伊斯兰教、宇宙主义，以及「但丁的隐微论」。杜金在这套兼容并蓄的文库里觉察到一套连贯的世界观，或至少是一个连贯的探问：追寻传统，或可说是单一传统。他写下自己的第一部着作《绝对之道》（The Ways of the Absolute）。这是一部浓稠的文本，有些部分除了杜金自己之外没人能懂，但其中含有一个明确的命题：将一切既有的信仰体系、一切习得的事物全都放下，转而信奉他所谓的「完全传统主义」（total traditionalism）□□一种涵盖宇宙的后设意识型态。实际上，它是这么无所不包，或许更适合以它明确拒斥的事物来定义之：「『现代世界』本身。」现代性是传统的相反，因此杜金追求的本质传统只能藉由剥离一切当代观点及事物，朝过去回溯才能发现。另一个与「现代」同义的词可能是「西方」。杜金藉由运用一位执迷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法国哲学家之观念，得出这种传统观。歷经这番周折，他回到了刚被遗忘不久、俄国思想家早年发展的概念：他们主张俄国应当背离欧洲，走向亚洲。註87

杜金踏上了前往西欧的朝圣之旅。一九九○年，他前往巴黎，在那里见到了比利时的新右翼思想家罗伯．史托克斯（Robert Steuckers）。这是一位来自西方的知识分子，思想激进一如盖农，但他活在此刻、正对着杜金说话。史托克斯向杜金介绍了地缘政治概念，更广泛地说，他让杜金对自己的想法可能在世局变迁中发生什么实际影响有了概念。他也建议杜金将自己的想法与某种名为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National Bolshevism）的事物结合。杜金在一年之内会晤了欧洲其他许多新右翼知识分子，受邀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族群民族主义智库──欧洲文明研究与学习组织（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É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会议，并由义大利一家新右翼出版社发行着作。註88

一九九○年，杜金介绍盖农观点的着作在俄国出版，同时还有许多书籍问世，试图找出一种形上、隐微、超自然，或恰好相反的超理性、数学论证方式，用以解释突然变得如此复杂的生命与世界万象──有几本写得不错，但没几本出自擅长阅读者之手。同时，杜金自己则在正教信仰里找到他所想望的单一传统──不是当代正教会，而是十七世纪分裂出去，从此力图坚守信仰而不顾现代世界变化的旧礼仪派（Old

Believers）。

*

这个年代的套语是「闸门」。任何领域的每个人都断言「闸门」打开了。就阿鲁图尼扬看来，情况更像是气窗开得更大了，然后再加大，接下来整扇窗户都被推开。有位在莫斯科心脏病医学中心（Moscow cardiology center）工作的朋友告诉阿鲁图尼扬，那里有名医师正在举办研讨会，讲授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的施行方式。这项全世界最普及的人格测验，自一九三○年代就在使用，一九七○年代开始有些苏联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学家加以研究。註89他们试图将它改编为俄文版，而这项任务证明了极其困难。首先，俄文文法上的字词性别区分得很彻底：大多数第一人称陈述都有阴性和阳性形式，而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包含了五百六十六个第一人称陈述。因此，第一次的改编行动创造出两个测验版本——一个给女性，一个给男性。

更重要的是，测验原版乃是奠基于美国的现实，歷经多年的实验后才确定最终版本，并且广泛投入使用。苏联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学家则几乎没有机会测试临床实况。如今到了一九八○年代晚期，他们之中才有人获准在研究中纳入圈外人，这使他们得兼具学者、协作者及施测者三种身分。他们要如何应用这套外来的测验？俄语还是他们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包括区分阴阳性。测验里比较难的是像第五十八题这样的陈述：「一切都变得如同圣经的先知所说的那样。」但苏联人的现实里没有先知与圣经。这句陈述在最初的改编版成了：「人类的未来是被预先决定的。」註90但测试结果显示，这个替代很差劲。最后，更合适的版本是「天气好的时候我更开心。」第二五五题「有时我会在选举时投票给所知甚少的候选人」，这变成了「有时我会正面评价所知甚少的人。」而第五一三题「我认为林肯比华盛顿伟大」，则改写为「我更喜欢与提供明确指示的上司共事，而非给予更大发挥空间的上司。」迴避了对歷史的可能歧见。

到了一九八九年，原版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在美国功成身退，取而代之的更新版顺应了美国社会以及临床医师对社会理解的变迁。选举问题里的「男人」改成了「人们」，林肯和华盛顿也被删去了。註91在苏联，第一版测验的改编版本，就在现实产生剧变之际投入使用。这个原本为了现实状况而修改的版本，包括删去一切指涉选举的做法，如今可能显得多余、更适得其反。尽管如此，为数不少新近的心理学家，接受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的训练，并规划向一般大众施测—不是精神病患或罪犯，而是以往未被病理化、未被治疗也未被研究的普通苏联公民—仍是一项创举。

无论它在苏联做为一种诊断工具有何局限，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倒是成功激发了对心理学家的信赖：这套古怪把戏能以一系列看似不相干的问题作为基础，对某人的人格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不仅能够指出兴奋、愤世嫉俗等特征，或是身体罹患了哪些不可解释的病症，在魔法与科学之间取得了完美平衡。它显示出即使心理学家少了医师的白袍，他们还是知道一些受试主体所不知道的事。更棒的是，他们对受试主体的了解，比受试主体对自己的了解更多一些——就在这么多苏联人民开始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并不像原先以为的那样多的时候。

同时，心理学家也开始学习成为临床医师。莫斯科国立大学心理学系抛开了大半审慎，发起了一系列为实务心理学家举办、由实务心理学家主持的工作坊。自我标榜为心理医生的人，从未经许可或无照看病的公寓里，或在特藏图书区阅读佛洛伊德着作的图书馆中现身，开始互相帮助，将彼此的知识予以系统化。另外还开设了家族疗法、完形疗法及精神分析的工作坊。

随着铁幕开始出现裂缝——错综复杂的签证系统仍在运行，来访的外国人活动仍高度受限，但这时有些人已因某些缘故而受到欢迎——西方心理治疗师开始前来教学。卡尔．罗杰斯在一九八七年来访。罗杰斯身为人文主义式的个人中心治疗创始者，也是非指导式谘商的先驱，他成为第一位在苏联授课的西方重要心理学家，这件事不仅异乎寻常，而且石破天惊。他的取径首先将个人安放在事物的中心，其次则是不向当事人发号施令。邀请他来访的一位活动发起人回忆，罗杰斯自己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你们要我们在这里做的事很危险……因为人们要是学会为自己赋权，他们可能就不会按照你的期望行事。这恐怕不适合这里的文化。」註92

罗杰斯接着开始带领一些他生平仅见最怪异的团体。在莫斯科大学进行一场大规模演讲后，他规划用四天时间和一个顶多三十人的团体合作。结果挤在教室里的大约有五十人，聚集在门外的另外有十二人，他们花了第一天时间彼此叫嚣和争斗，只为了在团体里得到一席之地。罗杰斯后来写道，他「吓坏了」——他特地把这个字斜体标示。「就算有过，我也难得听到像这样针对团体现有成员个人而发的凶恶敌意。」註93到了第二天，他记载：「事情变得很明显，他们多数的个人问题与频繁的离婚有关。在这个受过教育、见多识广的团体里，状况跟美国类似。有个女人说到她和丈夫逐渐努力达成了更良好也似乎更持久的关系。她绝对是例外。其他每个人几乎都说到『当我离开第一任丈夫』；『我和再婚的子女们处不来』；『要是我离开第二任妻子』。有人谈到与前任伴侣子女的不安全感与疏离感；子女远在外地时维持关系的困难；前妻与前岳母的插手——各式各样。」註94即使教室内平静下来之后，学生们仍

没有听别人说话的能力，这继续让罗杰斯大吃一惊。但数日后的正式简报却让罗杰斯确信，他的学生们做为治疗师，深受他建议的「应当保留判断甚至指导」原则所影响。实际上，他们试图按照罗杰斯的方式组织一场本应正式且公式化的「学术委员会」会议，罗杰斯本人将这项成就称为一种「奢侈」。但身为人，俄国参与者似乎让这位伟大的治疗师感到悲伤。他和这次访学的共同主持人，都提到「某种『失落感』……一种到处瀰漫、认为生命意义应当不只如此的感觉，对于能否找到意义，深切绝望。」註95

全世界最着名的家族治疗师维琴妮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于隔年来访。她从爆满的礼堂逐一指名听众上臺，由此说明她取径的最基本理念，也就是对每个人本性善良的信念：「我知道他是一个美好的人。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是拥有这个身分的人，他是整个世界唯一一个如其所是的人。」註96维克多．法兰可（Viktor Frankl）也来到苏联讲授存在治疗。莫斯科的心理学家们得以在最后一群伟大的参与者离去之前，一睹二十世纪心理学的专业对话。罗杰斯在一九八七年去世，萨提尔在一九八八年去世，法兰可多活了十年，但他造访莫斯科时已经年过八十。

阿鲁图尼扬试着同时聆听和学习这一切，而后她逐渐了解到，想要帮助一个人，就必须选择一套框架来理解他。她就在这时做出结论：精神分析中提到的那些有缺陷的、复杂的、偶尔可怕的人类，才是她的选择。她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知道，精神分析一样有许多不同学派，每个学派也各自呈现出一套对个人不同的看法。

*

古德科夫第二次受邀与尤里．列瓦达一同工作，是二十年后的事了。经过二十年自家举行的讨论会之后，列瓦达将团队重组为苏联官方机构的一部分。一九八七年七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为了研究及运用苏联人民对社会经济最迫切问题的舆论，将在工会当局与劳动部主持下新设一个中心。」这份文件及后续文件明确指示，日后的全联盟舆论研究中心（All-Unio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事实上将不只是研究机构，它被期望积极构思并形塑舆论。註97监督机构的选择与策略合乎逻辑：党中央控制的工会和劳动部负责掌控人力资源，也就是苏联全体人民──按照这个思路，他们如今将被适当地监控与引导。

新中心在混乱与混淆之中上路。工会提拨五十万美元──美元是强势货币──购买最新的电脑设备，社会学家却立刻被一名冒充加拿大科技供应商的骗徒骗走全部金额。註98但从好的一面来说，员额都补齐了；列瓦达清楚知道须研究的主题，手边也有全副人力进行研究。

列瓦达的假说形成于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不只在苏联境内，也包含一九五○年代在中共新政权工作的经验：每个极权主义政体都会形成一种为了稳定政权而产生的人类型态。塑造「新人」是政权明确的计画，但成果与其说是装载政权意识型态的容器，倒不如说是装备最齐全、最能在给定的社会中生存的个人。相对来说，政权的持续存活也愈来愈仰赖这种新塑造的人类型态。

列瓦达假定了一幅苏维埃人（Homo Sovieticus）的详尽图像。体制在数十年间藉由奖励服从、守纪及恭顺而哺育之。註99列瓦达指出，苏联社会的成功人物相信自我孤立、国家的大家长式管制，以及列瓦达所谓「等级制平等主义」（hierarchical egalitarianism），同时患有「帝国症候群」（imperial syndrome）。註100自我孤立对国家与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策略：既然苏联以铁幕将自己与外界隔离，苏联公民也同样将自己与其他所有不可信赖的他者分开。意识型态藉由强调「阶级仇恨」支持这种分离，特别在大规模恐怖的时代，将社交圈保持在最小也是一种明智的生存策略，因为过度信任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註101对大家长式国家的信念与完全依赖，则由苏维埃国家的本质哺育了苏维埃人；列瓦达写道，苏联与其说是一套如同现代国家的复合式机构，不如说是一个超机构。他将它描述成一个「前近代大家长式的普遍性机构，伸入人类存在的每个角落。」註102苏维埃国家是终极的家长：它包办了公民的衣、食、住与教育；它给予公民工作，为他的人生赋予意义；它奖赏善行、惩罚恶行，不论过失有多微小。「究其本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极权主义的，因为它绝不能留给个人任何独立空间。」列瓦达写道。註103这段对极权主义的描述呼应了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对极权政体如何利用恐惧的解释：「它在个人之间替界限和沟通管道换上了一条铁鍊，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似乎他们的多元现象已经消失在大规模的一个人（One Man）中一样。」註104她写道，人类被剥夺个性，因此也被夺去了有意义地与他人互动的能力，接着变得极其孤独，这使他成了极权国家的臣民与完美产物。註105

由于国家掌控了所有事物和所有人，苏联社会也就具有一种简单的垂直结构，这使得苏联公民的思考根本上都是阶序式的。即使确切的等级与特权体系对外保密，国家分发物品与宝贵服务所凭藉的基本逻辑，仍操控着每个人的生活。在此同时，官方意识型态则颂扬平等，国家也会惩罚那些拥有太多或想要多得的人。对苏维埃人而言，这就意味着群体内部的平等价值—受到严格执行的一种对个人身分的遵从。这正是列瓦达称呼的「等级制平等主义」。註106这个词也是列瓦达所谓「悖论」的一例—悖论这个哲学概念，指的是看似合理的单一命题彼此之间有所矛盾。按照列瓦达的说法，苏维埃人的世界是由一组组悖论形塑而成，

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列瓦达所谓的「帝国症候群」。一方面，苏联一如其所继承的俄国，无庸置疑是个帝国。它的国力、宽阔度和幅员全都是公民自豪的来源。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苏联占有的领土面积是全世界各国间最大的—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

我的祖国如此辽阔，
有许多森林、田园和河流。
我知道，没有别的国家，
能让人如此自由嗯吸。

这首流行爱国歌曲明确做出了连结：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国土规模本身的其中一项功用。另一方面，每个苏联公民也都不断被提醒自己的民族身分，这是不可更改的，记载在每一份提及自己的档案里。唯有最大一个民族的成员—俄罗斯人—能够偶尔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究其本质，苏维埃人在基因上就受到挫折，面临民族身分与超民族身分之间无法两全的选择。」列瓦达写道。註107

这些悖论使得苏维埃人必须将自己的意识切成碎片，以调和两种互相矛盾的立场。列瓦达借用了乔治．欧威尔的词汇—「双重思想」。苏维埃人如同《一九八四》书中的角色们，能够同时抱持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这些信念同步展开，只要它们确实不会有交集，就不至于产生冲突。苏维埃人可以视情况运用一组悖论的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命题，有时则迅速地两者连用。

但列瓦达对苏维埃人最重要的信念，却是他认为苏维埃人正在消亡。苏维埃人是由革命与大恐怖时代左右开攻而产生的：前者带来了它的理念与价值，后者则教会苏维埃人顺从以求生存。但在史达林死后三十年的此刻，被这样塑造的人正在消亡。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会变得不一样。相对来说，这也意味着政权再也不能倚靠他们藉由自身行为确保政权的存续，也就意味着政权（现有的苏联体制）将要瓦解。这与工会当局、劳动部，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想法大相迳庭，但它正是列瓦达如今要求他的团队证明的理论：苏维埃人符合他的描述、苏维埃人现象仅限于老一辈。这意味着苏维埃人很快就不再是苏联国内的主要社会型态，而苏联本身也将走向终结。

*

证明某种社会型态存在、现居于主导地位，而后很快就会消亡的这项任务，实在太过循环论证，简直不可能办到。但这还不是这项研究最

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列瓦达麾下的社会学家们没有一个做过这种研究。他们都忠实地参与讨论会二十年之久。他们都读过西方社会学家的论着。其中有些人够幸运，能在官方工作中处理一些数据，像是古德科夫。但他们中间没有人曾经做过调查、投票，或任何一种实地研究。

他们都是理论家，因此对问卷应当如何设计略知一二。他们当然精通于选择样本──这也是他们有生之年第一次被允许这么做。但他们要拿这些资料怎么办？他们全都没受过统计分析训练：他们得自己训练自己。缺乏电脑使计画看来更像闹剧，而非悲剧。他们花了两年时间才能设计及实行研究。但仔细再看一次，他们知道该怎么设计调查，这说法也很可疑。在他们研究过的西方社会学里，调查必然建立在早先的调查之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长时间进行的大众对话之上。问题近似于改编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在社会学领域，没有这种测验可供改编。苏联一直都没有大众，原因正在于没有对话：「大规模的一个人」必须以单一声音说话，并且只在被要求说话时说话。

你要如何提出一个不曾被讨论过的题目？你要如何从无权拥有意见的人们口中探问他们的意见？你要如何进行没有语言的对话？古德科夫开始把自己的研究群想成是一支地理远征队，启程确认一处磐石构造。他们首先必须从一次「试爆」，也就是足以暴露苏联社会本质的一次人为干扰开始。古德科夫发明了一种专供此类用途的工具，那就是去问人们「应当如何处置」某些异常群体。在苏联社会成为异常者并不难，许多人也被当成异常者──比方说，听摇滚乐的人们（他们通常被称为「摇滚客」），以及嬉皮（这个词到了一九八○年代晚期仍然通行，因为人们留长髮、弹奏木吉他唱歌的次文化仍然存在）。他们提供给应答者一系列选项，从「放任不管」到列宁主义式的「肃清」。古德科夫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探出宽容的限度，更切中要点的是，有助于衡量潜在的攻击程度。

这部分问卷得到的结果令研究群大感意外。苏维埃人显然是向世界敞开的，他们甚至对最异常的群体都能通情达理地平静看待，例如同性恋者：整整百分之十的人相信同性恋者应当「任其自生自灭」，另外百分之六认为他们应该接受「帮助」（问卷并未具体说明他们应当得到何种帮助），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同性恋者应被「肃清」。註108考虑到同性恋行为仍属犯罪，最重可判处入狱三年，古德科夫认为这是较低的攻击程度。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应答者想要「肃清」摇滚客，将近百分之八想要「肃清」酗酒者。但有多达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要求放任摇滚客不管，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则想看到酗酒者获得帮助。在缺乏任何其他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做出结论：这些结果反映出苏联朝向更

宽容发展的趋势。想要「肃清」同性恋者的人，最高比例来自五十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应答者；处在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则明显较不具攻击性。註109

还有其他很多好消息。首先，列瓦达的苏维埃人假说多半得到了证明。调查发现了列瓦达所描述的特徵，并且充分记录了苏联式双重思想在日常生活中运行的方式。欧威尔对双重思想叙述如下：

既知道又不知道；既意识到完全的真实、又说出小心翼翼建构的谎言；同时抱持两个彼此抵销的意见，明知它们相互矛盾，却还是两个都相信；运用逻辑对抗逻辑；既否定道德又自命有道德；相信民主并无可能，然而党就是民主的守护者；忘记任何必须忘记的，然后又在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事情回收到记忆里，旋即再度遗忘。最重要的是，把同样的程序应用到这个程序本身之上。这是最极致的窍门：有意识地引出没有意识的状态，然后对你才刚做过的催眠行为再一次变得毫无意识。就连理解「双重思想」这个字眼，都牵涉到运用双重思想。註110

研究显示出双重思想持续自我重复的过程。苏联人民需要信奉及宣扬的事物与实情恰好相反，而信奉及宣扬的要求，本身不过是一种控制机制，原因正在于它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苏维埃人过着一种不断与全知全能的国家讨价还价的生活，讨价还价本身既是个人唯一的生存策略，也是一种控制工具。社会学家们辨识出几个至关重要的协商区块，他们称之为「游戏」。

有一场游戏叫做「工作」，一个最常被人复诵的苏联笑话完美描述了它：「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钱。」另一场游戏叫做「照护」，「他们」（国家）在游戏中假装照顾公民，公民则假装感恩。让这听来单纯的游戏瞬间复杂起来的，则是它完全不是闹着玩的：国家确实掌控着公民的命运，公民能存活下来可说多亏了国家。在这样的意义上，「共谋」游戏也类似：苏维埃人假装参与国家事务，使他成为国家一切所作所为的共谋。另一方面，「协议」游戏则是直截了当地讨价还价：公民宣誓支持国家，藉此换得些许隐私（隐私通常是异议人士首先被迫牺牲的事物）。「共识」游戏则是「协议」的必然结果：它容许苏维埃人的私我（private self）对国家漠不关心甚至轻蔑—只要公众的、集体的公民向国家表示忠诚及热烈支持即可。註111

研究群将它设计的一百题调查发放给来自苏联不同地区，年龄及背景各不相同的两千七百人，以下是他们没有得到的答案：相信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的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追随者。调查提供了大量机

会让真正的信徒宣示信念。但在回答「你认为一个人所关怀的问题可以从何处找到答案？」这一题时，只有百分之五点六的人选择「马克思与列宁的教导」，它在不同环境里会是「正确」答案。将近一半的人选了「我自己的常识」。被问到是否情愿由党员同志管理，只有百分之十点三的人回答「是」，百分之二十一点五的人表示他们宁愿向非党员报告，其他人则说他们不在乎。註112

苏维埃人并非被灌输而成的。事实上，苏维埃人似乎并没有任何种类、特别强烈的意见。其内心世界由悖论构成，目标是求生，策略则是不断讨价还价—双重思想游戏的无尽循环。

但研究者们看到了希望。年轻人似乎不那么「苏维埃」了。比方说，应答者在被要求定义喜庆场合时，五十岁以上的人最常选择官方节日，从宣扬军威的节日开始（苏联建军节和胜利日）；至于年轻人则会说「当你走运的时候」，或是「和朋友相聚喝酒的时候」。被要求叙述自己最惧怕的事，年长者会回答「战争」，年轻人则说是「羞辱」。被要求举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年长的应答者最常回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年轻人则最常提到史达林主义下的恐怖时代。註113

列瓦达得出结论：他的假说主张苏维埃人正在消亡，其第二部分也是正确的，而且消亡必然发生。「与魔鬼的这些交易产生的后果之一，」他写道：「交易在此指涉苏维埃人不断玩着的那些『游戏』—就是人格结构本身的解体。」苏维埃人被困在无边无际的谎言螺旋之中：假装是、假装拥有、假装相信、假装不信。伪装涉及了最基本的事实与最根本的价值，螺旋到底则是缺乏；「就连理解『双重思想』这个字眼，都牵涉到运用双重思想。」体制摧毁了个人及社会结构。当一切都缺乏时，就没有任何事是可能的。列瓦达认为由此导致了「教育、文化、道德标准的下降，导致整个社会堕落。」倘若苏联人最终只是缺乏，他就不可能繁衍。「因此，我们可以将苏维埃人视为一项暂时的歷史事件。」列瓦达总结。苏维埃人会绝种，因此苏联也会消亡。

註77：“Postanovleniye Politburo TsK KPSS i zapiska A. N. Yakovleva ob izdanii serii ‘Iz istorii otechestvennoy filosofskoy mysli,’” in A. A. Yakovlev, ed.,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1985-1991: Dokumenty (Moscow: Mezhdunarodny fond ”Demokratiya,” 2008),

註78：Valeria Novodvorskaya, Nad propastyu vo lzhi (Moscow: AST, 1998); Dmitry Volchek, “May 1988-go: Vospominaniya o pervom s’yezde DS,” program aired by Russian Service of Radio Liberty, May 21, 2008; transcript: http://www.svoboda.org/content/transcript/448783.html（二○一五年十二月十日浏览）。

註79：Volchek, “May 1988-go.”

註80：Novodvorskaya, Nad propastyu vo lzhi, p. 22.

註81：前引书。

註82：前引书，p. 19。

註83：Aleksei Alikin, “Vy slovno khodite po lezvuyu nozha,” Russkaya planeta, May 28, 2014, http://rusplt.ru/society/debranskaya-10104.html（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浏览）。

註84：Walter Laqueur, Black Hundred: The Rise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Russi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pp. 204-209.

註85：“Otvety A. N. Yakovleva na voprosy slushateley Vysshey partiynoy shkoly v Moskve,” in 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p. 424.

註86：Laqueur, Black Hundred, p. 208.

註87：Alexander Dugin, Puti absolyuta, http://modernlib.ru/books/dugin_aleksandr/puti_absolyuta/read/（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浏览）。

註88：Anton Shekhovtsov, “Alexander Dugin and the West European New Right, 1989-1994,” in Marlene Laruelle, ed., Eurasianism and the European Far Right: Reshaping the Europe-Russia Relationship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5), pp. 35-54.

註89：I. L. Solomin, “Lichnostnyi oprosnik MMP: Metodicheskoye rukovodstvo,” http://reftrend.ru/396397.html（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浏览）。

註90：L. N. Sobchik, SMIL-566-MMPI-test. Metodika Minnesotskij Mnogoaspektnyj Lichnostniy Oprosnik-Standartizirovanniy mnogofaktorniy metod issledovaniya lichnosti, http://psycabi.net/testy/472-smil-566-mmpi-test-metodika-minnesotskij-mnogoaspektnyj-lichnostnyj-oprosnik-standartizirovannyj-mnogofaktornyj-metod-issledovaniya-lichnosti-sobchik-l-n（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浏览）。

註91：John M. Reisman, 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Brunner-Routledge, 1991), p. 367.

註92：Ruth Sanford (with additions by Irina Kuzmicheva), “The Other Part of the Soviet Story,” http://ruthsanford.tripod.com/the_other_side_of_the_soviet_story.htm（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浏览）。

註93：Carl Rogers, The Carl Rogers Reader, ed. Howard Kirschenbaum and Valerie Land Henders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 lin, 1989), p. 484.

註94：前引书，p. 486。

註95：前引书，p. 492。

註96：Virginia Satir in the USSR 1988, film produced by Dr. Bob Spitzer and L. B. John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6XM6_vsf4（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浏览）。

註97：Boris Grushin, “Na dal’ nikh i blizhnikh podstupakh k sozdaniyu VTsIOMa,” polit.ru, December 10, 2007, http://polit.ru/article/2007/12/10/vstiom/（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浏览）。

註98：Tatiana Zaslavskaya, “Kak rozhdalsya VTsIOM,” in Boris Dubin, Lev Gudkov, and Yuri Levada, eds., Obshchestvennyi razlom in rozhdeniye novoy sotsiologii (Moscow: Novoye izdatel’stvo, 2008), pp. 8-14.

註99：Yuri Levada, ed., Sovetsky prostoy chelovek: Opyt sotsial ‘nogo portreta na rubezhe 90-kh (Moscow: publisher unknown, 1993), p. 11.

註100：前引书，p. 23。

註101：前引书，p. 14。

註102：前引书，p. 16。

註103：前引书。

註104：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p. 465-466. 译者按：本句参看鄂兰着，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臺北：左岸，二○○九年），页四六七。

註105：前引书，页四七五。译者按：论证参看鄂兰着，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页四七六至四八二。

註106：Levada, Sovetsky prostoy chelovek, pp. 18-19.

註107：前引书，p. 22。

註108：前引书，p. 286。

註109：前引书，p. 288。

註110：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1961). 译者按：本段参看欧威尔着，吴妍仪译，《一九八四》（臺北：木马，二○一四年），页三七至三八。

註111：Levada, Sovetsky prostoy chelovek, pp. 30-31.

註112：前引书，pp. 292-293。

註113：前引书，pp. 274-276。

# 第二部　革命

## 第五章　天鹅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下旬，玛莎和母亲搭上一列火车。她们正要到波兰过新年。塔蒂亚娜这两年都到波兰去；由于莫斯科的商店完全没有存货，家教工作也无法再让她们买到像样的东西，她成了俄国第一批「梭客」（chelnoki），这些人靠着进口数量少到足以当成随身行李携带的货品谋生。塔蒂亚娜夹带的是前一年仍然新奇、但如今已是寻常消费品的商品：卫生棉、情色杂志，以及人人都需要、却无人拥有的其他贴身物品。莫斯科到华沙的旅程歷时舒适的二十一小时，火车在中午启程，隔天早上抵达。从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Belorussky Station）出发数小时后，火车跨越了一道看不见的边界。

「白俄罗斯。」塔蒂亚娜说：「就在这里。昨天它还是我们的。今天就成了不同国家。」

那时小学二年级的玛莎，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

「波兰还是我们的吗？」她问。

「嘘！」塔蒂亚娜制止了她，望向同一个卧铺车厢里另外两个波兰女人，确保她们没有留意。

讨论到此结束。在那年的其他场合，塔蒂亚娜试着再向女儿说明，但通常都把玛莎搞得更煳涂。一月，塔蒂亚娜对玛莎说她们再也不能去立陶宛旅游了，前一年八月她们才在那里的波罗的海度假胜地帕兰加（Palanga）度过，这时她却说，「我们」在那儿做了坏事，立陶宛的人民会永远憎恨俄罗斯人。玛莎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我们」俄罗斯人的一分子。在中央委员会幼儿园里，老师说的「我们」是「苏联人民」。比方说，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实际上，很难想出「苏联人民」还共同完成了哪一件事，但话说回来，伟大卫国战争也就够用了──足以知道人民是谁，而玛莎又是谁。

一年级时，玛莎的老师也谈到了伟大卫国战争和苏联人民，但在这个范畴加上了一个儿童的子集：一年级学生要加入苏联共产党为七到十岁儿童设立的分支──儿童十月团（Little Octobrists）。数十年来，儿童十月团也跟随着党的扩张轨迹。这个团组织一开始是小规模且志愿性的，吸收具有政治动机的学童；但到了一九六○年代，所有小学生在一年级时就会集体入团。註114入团仪式通常在秋天举行，从那时起，每个孩子都会在制服翻领别上儿童十月团的别针。那是一颗金属制的红色五

角星，中央的圆圈里有一幅幼儿时期一头捲髮的金色列宁像。一旦入团，儿童十月团员就会被编组成「小星星」五人小组，每组有一名组长向班长报告，班长再向校内少年先锋队（苏共十到十四岁青少年的分支）中的领导报告。

玛莎入学那年，入团仪式由于儿童十月团别针短缺而必须延后，因此她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期待。每一本宽格线、大方格的绿色小学笔记本，封底都印有儿童十月团规章，共有五条：

儿童十月团员是未来的少年先锋队员。

儿童十月团员是用功的孩子，认真读书、爱护学校、尊敬师长。

儿童十月团员是诚实正直的孩子。

儿童十月团员是爱玩的孩子，他们读书和画画、游乐和歌唱，同在一起。

只有认真努力、坚持不懈的孩子，才有权利争取儿童十月团员的称号。註115

在孩子们等待的同时，他们也学到了共党领袖的童年神话。他们读了米哈伊尔．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一九四○年写成的《列宁的故事》（Stories About Lenin），数年后左琴科就被打成反苏作家，写给成人的短篇故事全遭查禁；但列宁故事仍然保留在学校课程里，只是略去不提作者。这些故事将列宁描绘成杰出的学生和忠实的朋友，但玛莎印象最深的故事则是〈花瓶〉。故事中的小瓦洛佳（Volodya）在姑妈家和兄弟姊妹们嬉戏时，不小心打破了花瓶。他对这件事撒了谎，接下来感到良心不安，两、三个月后才哭着向母亲说实话，母亲想办法让姑妈原谅了他。这个故事声称来自列宁姊姊安娜的回忆，其中添加了明显虚构的细节，说其他孩子们都忙着玩耍，没人留意是谁打破了花瓶──藉以宽贷他们不向当局举报弟弟的反苏过失。註116

玛莎也得知另一位布尔什维克领袖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很小就成了孤儿，在孤儿院度过一段童年。但她没有学到基洛夫在一九三四年被暗杀了，而他的死被当作藉口，成了史达林时代杀人最多的一波恐怖行动。不过，她学到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死亡。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基洛夫，以及她还不知道名字的其他人）杀死了沙皇。对沙皇的名字，或是和他一起死去的妻子儿女，都很少被提到。杀害沙皇以一种毫无戏剧色彩的中立方式，做为一次歷史规律决定的事件被呈现出来。

塔蒂亚娜说，这是错的。列宁不是英雄。他是坏人。这意指沙皇是好人吗？不对，也不是这样说。

事实上，当玛莎终于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成为儿童十月团员时，全家没有一个人和她分享喜悦。她的祖父母说，这没什么好光荣的。没错，他们断言，列宁是坏人。他发动了他们所谓的「红色恐怖」。切博塔列夫（Chebotarev）家族和共产党不合。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的父亲曾是一位高阶党官，但他在一九四○年代晚期史达林的反犹太清洗中，无法站出来保护自己的犹太裔妻子。他的经歷其实是相当典型的困境。最有名的例子，是史达林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rotov）亲眼看着他的犹太裔妻子被捕。玛莎的祖父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自己也有厌恶党的理由，尽管他不曾直接提及。他在一九四五年十八岁时被红军徵兵入伍，并直接送上前线，当时战线已经推进到德国境内。随后六年他都在柏林度过，在他一向称之为「占领军」的部队里服役。他用一句无比愤恨的陈述，转移掉任何关于服役期间的问题：「我恨德国女人和犹太人。」要是被追问了，他只会再补上一句：他恨犹太人，因为他们发明了共产主义。

而在十二年前，当玛莎还没出生时，仍是学生的塔蒂亚娜被要求入党。大学的一名代表告诉她，物理系奉命推荐一名最优秀的学生入党，塔蒂亚娜正是人选。那时二十四岁的塔蒂亚娜是个阅读地下书刊（samizdat）、对苏联愤世嫉俗的人，入党在她看来是个投机的、道德冷漠的选择。她的父母亲则坚守原则、完全反对，这令她大感意外。「这种事不能做！」他们说。大学党委会不接受拒绝这个答案：它得补足配额。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和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开始在上班时间接到电话：「你的女儿为什么不入党？」这是毫不遮掩的威胁：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和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都是为苏联祕密机构工作的非党员。由于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的父亲在党内的地位，以及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的六年兵役，他们成了由来已久、经过讨论决定的例外，但他们的地位随时可被撤销。最后，塔蒂亚娜设法确保自己得以破例。她当时正为一名同学做家教，那位同学服完兵役后以终身党员身分来到物理系，他凭藉自己的例外地位通过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系上需要他，而他需要塔蒂亚娜才能继续学业，她也需要他让党委会远离她。

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在一九九○年从建造太空梭的工作退休。将她引进教会的知识分子神父亚歷山大．孟在一九九○年遭人杀害，但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的精神探索早已带着她远离宗教，来到电视机前，一位名叫阿纳托里．卡什皮罗夫斯基（Anatoly　Kashpirovsky）的催眠师经常登上萤幕。他有治癒能力，一如现场表演所展示的，让加林娜．

瓦西里耶夫娜也和千百万苏联公民一样，拿着装满自来水的广口玻璃瓶靠在电视机上，好获取治癒力量。玛莎的祖父也在电视萤幕前花掉太多时间，即使他完全不需要卡什皮罗夫斯基。生平第一次，他对自己工作以及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愤恨感之外的事物产生了兴趣：政治。他喜爱他所谓的「民主派」。这是一群相对少数的人，在定期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两千两百四十九位代表中顶多只占三百人。其中最有名的异议者是物理学家沙卡洛夫，还有许多新近政治化的学者专家，以及一些非正统的共产党官员。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团结力量，除了所有人都支持沙卡洛夫反对共产党在苏联政治及国家事务中居于首位的主张。沙卡洛夫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去世后，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尔钦成为「民主派」的唯一领袖。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热爱叶尔钦，彷佛过去从未爱过其他人。叶尔钦正与戈巴契夫殊死搏斗，戈巴契夫的改革信念出现动摇，而且不愿分割共产党。一九九○年，叶尔钦宣布退党。一年之内，约有四百万人也跟着退党，超过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註117

一九九一年三月，也就是玛莎加入儿童十月团的那个月，戈巴契夫禁止莫斯科的街头抗议，试图将叶尔钦及其支持者消音。战车在街道上部署，但抗议群众还是上街了，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和数十万人一同前进，呣喊着「叶！尔！钦！」。六月，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和千百万人一同投票选举叶尔钦为俄罗斯总统—考虑到俄罗斯当时仍是苏联的一部分，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这个举动的意义，但这是斗争的重要一环。

*

谢廖沙的祖父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不想离开共产党。到头来，这由不得他作主。两年之内，他就从政治局里（中央委员会四百位委员之中，有十二到十四人是政治局委员註118）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沦落为党内贱民。

在戈巴契夫掌权之前超过一代的时间里，政治局委员一般而言是终身职。当一位委员去世，照惯例会由一名长期候补的人选递补，新任者通常不会比逝者年轻多少。戈巴契夫开始一年替换几次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是一场引进新血、同时也为他自己巩固地位的苦战。比方说，他在回忆录里提过，一位政治局委员开始在会议中打瞌睡之后，他选择换掉这个人—这段描述的语气表明了这是常见的徵状。註119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做为正式委员加入政治局时，戈巴契夫任命他主管意识型态。隔年九月，戈巴契夫对官僚组织展开其中一次规模最大的改组。他引进了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uychkov），这位高阶国安官员受到亚歷山大．尼古拉耶

维奇强烈推荐。克留奇科夫这时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戈巴契夫也释出了主管外交的政治局委员席次──他决定把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调到那个位子上。註120这时，他在最敏感的职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精挑细选的人员。

往后一年多的时间，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监督了东方集团的迅速解体。歷史学家史蒂芬．柯特金（Stephen Kotkin）将东方集团称为苏联的「外帝国」（outer empire），一如欧威尔《一九八四》里的「外党」（outer party）。註121倘若拥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苏联是内帝国，那么华沙公约的其他会员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则构成了外帝国。苏联在二战后与盟国的谈判中，对这六个国家取得了支配权。最初的安排还包含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但这两国分别在一九四○年代及一九六○年代挣脱了苏联的影响。它们各自追求着国家领袖的社会主义版本──南斯拉夫是较苏联社会更自由的版本，阿尔巴尼亚则坚守强硬的史达林主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波兰，多年来都试图分道扬镳，但这些尝试都被苏联铁腕镇压──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派兵攻打；一九八一年则在波兰近乎先发制人地实施戒严。这时，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命令则是不作为。他没完没了地接待着来自他在报告中称为「朋友」的人──各个卫星国家共产党的访客和代表，这些人是来试探风向、请求支援、指导和许可的。他们确定能得到的以许可最多。

东欧国家一个又一个允许示威抗议，抗议规模迅速扩大；它们也开放国界，尝试某种程度的自由选举，由迅速组成的非共政党参与。在大多数地方，执政党都在所谓的「圆桌」会议坐下来与反对党谈判，而后和平地、或不甚体面地退场，留下前异议人士、学者、学生运动者和工会组织将就组成的团体，设法解决烫手山芋，把实施统制经济和一党制的苏联式国家转变为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在共产党不愿退让的罗马尼亚，反抗军则捉拿并处决了共党独裁者及其妻子。但其他地方的革命，则同时被当地媒体及西方媒体称为「天鹅绒革命」。

这些变革内含的柔软与舒适，由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监督下的被动消极所保障。在卫星国家的政权转移之后，苏联开始从这些国家撤出军队、祕密警察和政工干部。这一行动复杂、昂贵又准备不周，往往在这些事先未被告知巨变将至、却在巨变中除役的人员身上，施与了道德伤害，更添加一层来自母国的侮辱。一位当时派驻在东德城市德勒斯登的国安会特工，日后形容这次经验可怕又屈辱。註122这位特工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普丁。

按照重建的逻辑，撤出东欧是必然的：「外帝国」带给苏联的支出

太大，继续占领这些国家在开放的新意识型态下也不合理。但戈巴契夫和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都想像，这样的连锁反应总会停在苏联的边界上，「内帝国」仍会完好无损。

*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从来不认为苏联是个帝国。没有人这样认为，就连苏联的敌人都不这么看──即使当美国总统雷根将这个国家称为「邪恶帝国」，他的重点也全都放在「邪恶」上，而他的邪恶是不信神的意思。註123沙皇俄国是一个帝国，而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的内战中，红军对抗的是许多支不同的民族解放军，与其说他们是反抗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如说是反抗中央权力。沙俄帝国的大片疆域分裂出去，各自独立建国：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以及乌克兰。这些国家之中，只有环绕波罗的海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五国得以维持独立，其他则被莫斯科重新征服。往后数年间，苏联政府发展出一套完全新颖的措施，治理可能惹出麻烦的地区。歷史学家泰瑞．马丁（Terry Martin）将此体制称作「优惠性平权帝国」（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优惠性平权帝国的基础建立在这一信念上：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假面意识型态」（masking ideology），当阶级意识确立，更强大的社会主义认同发展出来，民族认同需求就会剥离，民族利益自然会被阶级利益替代。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民族认同与民族利益必须得到承认──但只在不至于威胁苏联国家统一的范围内。布尔什维克党人创造了一套错综复杂的民族共和国──起初有四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共和国），然后再加以分割、征服新领土，将总数增加到十一个。在这些共和国内，以民族语言进行教育和文化生产都是受到鼓励的。其中最大的俄罗斯则是例外：俄罗斯民族认同的表达与培养都被强烈压制。但居住在俄罗斯共和国领土上的其他民族，则被敦促要主张自我。实际上，小族群被「发现」了，苏联的民族数量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增长。但到了一九三○年代，政策反转了，不论是来自俄罗斯人的愤恨、史达林的偏执（他惧怕自己的臣民可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族人有所联繫），或是政策与其理论基础之间的矛盾变得太过醒目──或是因为所有这些理由，促进民族教育和文化的实践被限缩了。俄罗斯民族获得官方恢復，实际上，俄罗斯人的优先地位开始受到大多数宣传强调。这种新取径的官方表述是「民族友谊」。优惠性平权帝国结束了。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但俄罗斯民族是「平等民族中的第一位」。这句话首先出现于《真理报》（Pravda）的一篇头版社评：

（苏联的）一切民族都参与了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计画，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自豪。从最小到最大的所有民族，都一样是苏联的爱国者。但俄罗斯民族是平等民族中的第一位，俄罗斯工人、俄罗斯劳动者，他们在整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从第一场胜利到今日革命开展的光辉时期，扮演了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註124

这时是一九三六年━在欧威尔的《动物农庄》揭示「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这条原则的前十年左右。

竭力宣传俄罗斯语言、文化、艺术及人民的运动随之展开。俄罗斯语被指定为苏联所有语言之中最重要的一种。一九三七年的一篇社论宣告：「在苏联各民族的伟大家庭中央，矗立着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受到苏联全部民族的热爱，是所有平等民族中的第一位。」註125一九三六年通过的宪法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下列各个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权自由退出。註126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间，依照史达林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苏联併吞了前沙俄帝国的部分领土，包括波兰的一部分（併入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的一大块（成为摩达维亚）、芬兰的一部分（最终成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它们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理论上有权退出。由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协助起草的一九七七年宪法，补上了苏联是「多民族」的联盟国家这句话。同时，这部宪法又给予中央政府控制政策的全权，包括统制经济，且不保障加盟共和国代表进入中央政府。註127每个加盟共和国也都各有一部千篇一律的宪法，可连在名义上都几乎不让它控制法律、政策或预算；但每个共和国在名义上又是「主权国家」。俄罗斯共和国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十六个同样属于「国家」的「自治共和国」，加上另外数十个自治体组成的联盟。但这些自治共和国和自治体都没有退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权利。註128

在苏联人民的日常经验里，生活在这个或那个加盟共和国没有多大意义。生活品质取决于个人特权，其次则取决于邻近中央的程度。对于来自其他共和国的访客，波罗的海国家的生活看起来明显不同━多半是因为这些共和国较晚被併吞，还保留一些之前的基础建设与文化；那里说俄语的人更少，反观其他共和国数十年来都不得不学一切语言中最重要的一种。然而，所有苏联公民也都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分，那从来不是「中立」的资讯━它可能在优惠性平权残存之处带来裨益，也可能在某人的族群遭受猜疑之际，令他成为官方歧视或迫害的对象。因应苏联

不同民族而制定的政策及实务经常任意改变，人们必须提高警觉，才能平安穿越「民族友谊」地带。

换言之，治理各共和国及其内部众多族群的苏联体制，本身就具有矛盾性。苏俄一度自称为世界第一个多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实践方法却是帝国式的。这是苏联国家玩弄的另一场游戏，很像「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钱」的游戏。

个人通信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有些数学问题就是无解。它们无法被解开。数学有方法能够证明一个问题无法被解答。

卡拉巴赫（Karabakh）就是这种问题。它无法被解决。没有一个最佳解。想得到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有一方无法接受。註129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写了这张字条给戈巴契夫。数月以来，高加索山区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为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地区变得愈来愈剑拔弩张；这个地区是亚塞拜然的一部分，族群上却是亚美尼亚人的飞地。这是苏联第一个对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游戏发出抗议的地区。这个问题很明显是不可能解决的：亚塞拜然不可能把这片土地割让给亚美尼亚，而亚美尼亚也绝不可能甘愿让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历史上属于亚美尼亚的土地，却由亚塞拜然统治。当然，人们可以说苏联公民住在哪里都无关紧要，因为加盟共和国没有实质权力，但象徵与实际生活经验、认同与认知之间的脆弱平衡却被打破了。

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申诉，请求帮助。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对冲突的深度感到震惊。他一直认为民族主义是退步的意识型态，信奉民族主义的人已先站在错误的一方，因此其对手总是正确的。这时他看到了全世界族群冲突的全貌：没有哪一方是正确的。「该是停止浪费时间精力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了，反倒要为我们所处的窘境找一条出路。」他写信给戈巴契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提议由莫斯科对该地区施行直接统治，同时为了减轻紧张情势，对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两国重新实施全面的书报检查制度。他提议：「除了事先核准的正向性质材料之外，完全避免使用任何视觉资讯（电视画面、照片、纪录片片段等等）。」註130

这么做没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写下这封信约一个月后，直

到那时为止都只是仪式性机构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议会，决议脱离亚塞拜然，加入亚美尼亚。两天后战斗就爆发了。政治局试图藉由撤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党委书记进行干预。亚塞拜然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莫斯科又将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的共党总书记撤换。两个共和国都投票认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领土的一部分。莫斯科站在亚塞拜然一方。更多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随之发生。亚美尼亚开始驱逐亚塞拜然人。戈巴契夫下令逮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分离运动领袖（他们六个月后获释）。亚塞拜然最高苏维埃表决通过退出苏联。反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在亚塞拜然首都巴库爆发，这是个繁华的大城市，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石油之都之一，亚塞拜然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及其他各民族在这里繁衍了一百多年。如今却有九十个亚美尼亚人遇害，巴库的其他亚美尼亚人也都成了难民。世界西洋棋冠军加里．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是出生于巴库的亚美尼亚人与犹太人后裔，他雇用了一架包机，将自己的家族以及尽可能多的亚美尼亚人予以撤离。苏联军队在屠杀爆发后一星期进驻巴库，杀了将近一百三十人。亚美尼亚投票决定退出苏联。註131这时是一九九○年八月——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写信劝说戈巴契夫寻找出路、而非解决方案的两年半之后。

苏联开始沿着边界四分五裂。或许戈巴契夫没有确切地听从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建议，但他除了寻找出路之外，什么也没做。自称「人民阵线」的组织——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首创这个词——开始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接连出现。它们全都宣称以支持重建为目标，但不久后便真相大白，他们的目标与戈巴契夫并不相符。註132对苏联时代之前的生活仍有鲜明意识的波罗的海共和国们，想要把自己的独立争取回来。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多达两百万人牵手组成人链，将三个共和国的首都维尔纽斯、里加、塔林连接起来。要是人数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地区每四个居民就有一个参加了这场称为波罗的海之路（Baltic Way）的和平抗争。这一天正是希特勒与史达林将波罗的海三国划入苏联的密约，签订五十周年。这些人要的不是脱离苏联：他们要的是结束占领。

就在五天之前，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才接受了他一生中或许最困难的一次专访：他告诉《真理报》，这份名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的密约，以及其他瓜分欧洲的祕密协议全都存在。五十年来，苏联始终不承认这些协议存在。就在密约签订五十周年的十星期前，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才匆忙召集一个委员会，构思一个符合开放政策的新姿态来看待这份密约。他缺乏准备，一开始甚至不能完全确定这份密约存在：苏联并未保存密约的正本。但他还是认为莫斯科官方有必要表态，一方面拉开戈巴契夫与史达林的距

离，另一方面也能缓和波罗的海的紧张情势。註133他在《真理报》专访里採取的做法是承认密约，但不承认占领：莫斯科仍然宣称波罗的海三国是自愿加入的。这个避险做法失败了。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打击了苏联在二战期间所作所为正确无误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神话，但在波罗的海各国看来，他的揭露却恼人地不尽不实。数月之内，立陶宛就向独立跨出了宣告性的一步：立陶宛共产党决定与苏联共产党组织断绝关系。这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造成了双重打击。

*

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换言之，共产党垄断一切。党和国家两套官僚机构同时存在，但同一条生涯路径就足以供应两者，苏联领导人于党和国家的职位之间往返移动，通常将两者结合。

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全国人民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着新近当选的沙卡洛夫吆吁废除宪法第六条。他警告，要是国家无法分权，重建就会失败。註134他提出的意见就连代表大会上的盟友们听起来都觉得不可能。但在区区六个月内，当支持民主的派系组成了他们称为民主俄罗斯（Democratic Russia）的运动后，他们宣示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对抗共产党的垄断。註135沙卡洛夫在一星期前逝世。叶尔钦成了民主俄罗斯的唯一领袖。他是从党的统治阶层一步步升上来的，但他的观点转变得比任何其他共产党高层更快。

一九九○年春天，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布，让它们成为苏联一部分的所有文件全部丧失法律效力。六月，如今已有自己的国会、由叶尔钦担任议长的俄罗斯共和国，表决通过维护「国家主权」，尽管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次月，叶尔钦退出苏联共产党，这意味着苏联最大的共和国，所有平等民族中的第一位，这时有了个非党员的领袖。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讨厌叶尔钦，讨厌他赤裸裸的民粹和毫不遮掩的野心。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决心要的是体制被改革，而非摧毁它，但随着重建进行，改革与摧毁的区别变得愈来愈模糊。有时，相对于摧毁的改革看来就是办不到。到了一九八九下半年，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得出结论：苏联必须转型成联邦，每个成员国都会有实质的司法独立与经济责任。註136但他期望每个共和国要有耐心与信任。一九八九年十月，波兰出生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与极权主义研究学者、为接连几任美国总统提供建言的兹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造访莫斯科，在许多问题之中，他特地问了亚歷山大．尼

古拉耶维奇：要是波罗的海各国加强了他们对独立的诉求，情况会变成怎样。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回答，重建会到此为止，因为戈巴契夫需要所有人作为一个联盟共同度过难关。註137布里辛斯基不为所动。他把自己的下一本着作命名为《大失败》（The Grand Failure），在书中不只宣判了苏联的实验失败、也宣判了戈巴契夫的改革失败。他预言只有波兰和匈牙利有可能和平转型，迈向后共产时代的未来。至于苏联，他则列出了五种悲观的设想，其中两种是军方或国安会发动政变，另一种则是体制完全瓦解。註138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害怕重建失败的心情，或许多过其他事物。他持续抨击党内保守派阻碍重建过程，有时似乎连戈巴契夫都完全不再听他说话了。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在任何时刻寻求一个权宜措施、一种方式，好在绝境边缘稳住摇摇欲坠的联盟。一九九○年夏天，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之后（无论意义为何），党内保守势力向戈巴契夫施压，要求实施紧急状态。他只做了半套：废除了苏联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以总统直接控制的内阁和国家安全会议代之，但他拒绝宣布紧急状态。不过，在一九九一年一月，他未经任何正式宣告，就同意国防部长、内务部长以及国安会主席试图夺回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这发生在巴库血案整整两年之后，位于帝国不同的边陲上；而这次行动造成了十九人死亡：维尔纽斯十五人，里加四人。註139因此玛莎的母亲才会对她说，立陶宛再也不会欢迎她们了。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对计画中的干预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记者对维尔纽斯杀戮事件的看法。他好多天没和戈巴契夫说到话了。他甚至无法确定自己还有没有工作。不过他这时倒是确定一件事，他对苏联本质的想法改变了：他确定「民族友谊」顶多只是错觉。註140

维尔纽斯事件过后数日，有些苏联公民推测、其他人则惧怕保守派接管了国家，总之重建结束了，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改革会以多快速度在多大程度上被推翻。但戈巴契夫在面临日益加深的绝境下，仍在继续进行他的平衡措施：这时双方都确定了，他随时都在过分偏袒另一方。戈巴契夫安排了一次公民投票决定国家的前途。只有一个问题要求苏联人民思考：「你是否认为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将其转变为一个各国人民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是必要的？」这个问题的法律和实务后果并不清楚，就连它的意义都不明确，因为除了「转变为联邦」这几个字之外，它的叙述和现行苏联宪法完全相同。说真的，这与其说是公民投票，倒不如说是民意调查，而且只提了一个设计不良、负担过重的问题。

苏联中央公民投票委员会回报，将近一亿五千万人，也就是八成的合格选民参加了公投，并压倒性地投票支持保留苏联：贊成票占百分之

七十六点四。问题在于，所有这些选民只来自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九个。波罗的海诸国和亚美尼亚拒不参加。乔治亚和摩达维亚只有几处边陲地区进行了投票。哈萨克则提出了修改版的公投问题，删去了「联邦」一词或任何提及保障人权的内容。註141中央再也无法施展充分的权力，迫使不同的共和国合作以相同的问题进行公投。几乎没有法源基础来确定大多数苏联公民下了有志一同的结论，但戈巴契夫仍将这样的结果解读成起草新联盟条约的授权来源。叶尔钦则加紧进行俄罗斯建国工作。三月下旬，就在公投后十天，戈巴契夫禁止莫斯科示威游行，藉以阻止支持叶尔钦的集会。战车封锁了市中心的某些街道。示威者仍然上街了，结果并未流血。再一次，没有一方获得胜利；叶尔钦和戈巴契夫之间、保守派与民主派之间、联盟主义者与支持独立势力之间的斗争，仍步履蹒跚地持续着。六月十二日，叶尔钦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俄罗斯共和国总统。新联盟条约则预定在八月二十日签署。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感受由惊骇转为沮丧，最后是愤怒。四月下旬，他致函戈巴契夫，警告保守势力正在占上风。唯一的前进之道是停止戈巴契夫在政治上无止尽的拐弯抹角。要是戈巴契夫不打算领导决定性的政治及经济改革，那么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就会试着自己来。「我必须，我绝对必须在我的祖国、我的人民、我自己面前诚实！」他写道：「我会找到堂堂正正的方式，和冒出头的法西斯主义及党内反动势力战斗，为我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而战斗。我没有多少时间了。」註142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倒不是在说他个人剩下多少日子——这时他六十八岁，只比戈巴契夫和叶尔钦两人年长八岁——而是他觉得，对国家来说，改变的机会之窗几乎要被关上了。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决心协助组织一场新政治运动—民主改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Reform）。这个运动有三项基本纲领：一、政治上放弃苏联做为统一国家的远景，转而建立一个在中央与会员国之间明确区分权责的联邦。二、经济上开启向市场体系转型的明确程序，国家在过渡时期只保留三分之一的国有财产。最重要的是三、它会建立一套保障机制，照顾受到经济改革冲击最大的人们。註143「运动」与「政党」的区别，在苏联一如其他层面，实在令人困惑。运动是为了创造改变而存在，政党则努力争取治国。但在苏联的新现实中，运动可以包含好几个政党。但这时，一个大党—唯一的大党—正开始涵盖不同的运动。对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来说，他不必脱离共产党就能成为新运动的领袖之一，这点至关重要。他仍然盼望共产党的庞大重量能倒向有利改革的一方。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他在新运动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说，谈到自己痛苦的发现，其中大多都发生在重建展开的这六年之间：

我们落后全世界整整两个纪元。我们错过了后工业时代和资讯时代。结果，我们的社会身染重病，我们的灵魂恆久空虚。我们长大成人之后随时都在预设每个人有罪，于是创造出数十万卫兵，审查我们的道德、良心、世界观纯净程度、是否顺从当局愿望。我们把真理变成了犯罪。我们把自然掠夺到奄奄一息。我们创造出罪行、队列、粗俗和腐败，从商店的卸货员到政府部长无一倖免。我们放逐了理智主义，培养出无知的体制……

今天，我们彷彿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旧的史达林主义世界不愿离去，把持着仍足以支撑它的一切事物。新世界则在旧结构里挣扎求生，往往开始遵照旧规则行事……

过去七十年来，苏联共产党并非政党，而是一套行政指挥组织，整合进入国家架构之中，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立法者、分配者、掌控者，以及真理的独占者……以上这些话都不是为了指责。它们是教训。马克思意想不到，他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会在权力斗争中转变成意识型态武器。也不该责怪我们伟大的人民追随着自己轻信他人的本性，以及对更好生活的热情信仰，而使自己易受操弄。将批判指向千百万普通共产党员也不对，因为他们受到一个党霸种姓所支配。註144

这是宣战。共产党领导层开始讨论要把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开除党籍。从史达林时代到现在，还没有一位最高层党员被开除党籍；这种命运似乎比死更惨。死亡是另一个选择：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听说自己有可能被暗杀。他起草了一封信，当他遭遇不测时就公开发表，然后在克里姆林宫走廊上找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过去提拔的后辈克留奇科夫。「告诉你的手下，他们判断错误了，」他说：「我起草了一封信，要是我出事的话，就会有三个不同管道同时发表。」註145八月十五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一如其名，是为了控制共产党员、惩罚违反党纪的人所设立──经过表决，提案将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开除党籍。註146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从广播里得知这个消息。八月十六日，他写了两封信。较短的一封註明党证号码「00000051」，宣布自请退党。註147较长的一封则题为〈告共产党员书，论復仇主义之危害〉（An open letter to Communists on the danger of revanchism）。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写这封信写了三个月，结果正好在共产党开除他的当天写完。两天后的八月十八日，他向民主改革运动的另一位发起人，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里．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出示了信件草稿。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想要

在寄出之前确保内容清楚明白又有充分论据。「悲剧有可能发生，」信中警告：「因为改变业已影响了统治菁英的利益。」但这封信未曾寄出。註148

*

八月十八日，玛莎的母亲到她祖父母的别墅接她。她说得带女儿去莫斯科一趟，申办新的外国旅行护照。三个月前，戈巴契夫签署了一部关于苏联人入出境的新法律。铁幕正在逐步撤除。起初只有极少数人获准离开苏联到外国旅行，而且只在具备正当理由，还有工作单位、居住单位，以及最好由党组织开具大量无可非议的品行证明书之后才能放行。外国旅行护照受到严密保管，只获准在出国期间发放，任何人都不能把护照放在家里。一九八○年代中期开始，审核过程逐渐放宽。如今这项新法让普通苏联公民也能取得有效期限五年的外国旅行护照，甚至在法律一字不差获得遵守的情况下，免除他们每次出国旅行都必须申请出境签证的义务。註149经常到波兰做生意的塔蒂亚娜，长久以来一直运用自己的人脉取得加盖长期出境签证的外国旅行护照，但有了新法律，她想她也可以为女儿取得一本护照。

八月十九日，塔蒂亚娜和玛莎搭乘通勤列车进入莫斯科市中心，然后转搭地下铁，再转乘路面电车到她们居住的街区。当电车穿越沃洛科拉姆斯科耶公路（Volokolamskoye Roadway）一处隧道时，玛莎看见两辆战车从反方向开来。

「哇，酷喔！」玛莎说。

「妈的！」塔蒂亚娜说。

她想了一会儿。

「我们得离开这个国家。」她说：「我们下车。」她计画直接前往护照办事处，但不为玛莎办新的护照，而是将玛莎的名字加註在塔蒂亚娜的护照上。然后她们就直接到美国大使馆去，根据传闻，任何人只要出现在那里便可以获得签证。再来她们就可以出国了。

护照办事处的女人拒绝加註的请求，也不收红包。她的上司说：「一星期后再来。」一切都结束了，就算再帮玛莎申请护照也没有意义。于是母女俩走了。

她们不能回家。塔蒂亚娜设法摆脱自己的室友已经将近两年，因此她们的公寓不再有人共同居住；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全都由塔蒂亚娜和玛莎享有，但这时塔蒂亚娜却受到敲诈者（reketiry，新发明的俄文字）骚扰，这是正在成形的黑手党，试图依附着同样在成形的私人事业牟利。这些人大多经营简陋的收取保护费生意，他们承诺「罩」

（krysha）你，庇护你不受其他同类组织骚扰。最近他们在塔蒂亚娜的公寓门口建立了永久据点。她不想带孩子到那里去，于是她们去了塔蒂亚娜父母的公寓。

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塔蒂亚娜打开电视。电视上播放芭雷舞剧《天鹅湖》。她转台，看到的还是《天鹅湖》。太无聊了。玛莎到门外的庭院，和名叫维塔利克（Vitalik）的男孩玩耍。

*

当天早上六点钟和八点钟，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夜间收播过后又恢復播出，一个熟悉的男声开始播送：「苏联副总统令。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无法履行苏联总统职责……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y Yanaev）自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起代行总统职权。」接着，这位主播宣读了两份由这些自称「苏联领袖」的人向苏联人民发表的文告。首先是枯燥乏味的一份，宣布紧急状态自当天下午四点起生效。然后是激情的一份：

同胞们！苏联公民们！

在这个祖国与我国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刻，我们向你们发言！致命危机正笼罩着伟大祖国！戈巴契夫开展的改革……陷入了僵局。热忱与希望已经被不信任、无感和绝望取代。

它责怪改革挑起民族之间的冲突，杀害数百人，让五十万人沦为难民。

每位公民对于明天愈来愈感到不确定，对子女的未来深深担忧。

它责怪改革造成了国家的经济危机。

向人民说实话的时机早已错过。少了急迫而决定性的稳定经济步骤，不久的将来必定要发生饥荒，以及新的贫困浪潮。

它责怪改革造成犯罪率升高。

国家深陷于暴力和无法无天的泥淖。

它承诺要恢復苏联的骄傲、安全与完整—也就是说，在新联盟条约预定签署前夕，要将帝国恢復旧观。这份在广播和电视上宣读、并刊登在早报上的文告，由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署名，成员共有八人，包括戈巴契夫的副总统亚纳耶夫、国安会主席克留奇科夫，以及总理、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近期围绕着戈巴契夫的所有保守派干部。註150读完这三份文件费时十分钟。之后，继续上演《天鹅湖》。

冉娜当时正在高尔基城外的乡下陪伴祖母。她的父母亲前一天就去了莫斯科—他们预计只在前往黑海度假的途中路过。在这则新闻播报全被《天鹅湖》取代之时，冉娜的祖母确信自己的儿子必定捲入了莫斯科发生的任何事态，因此担心得要死。冉娜也一样。

她们担心得没错。冉娜的母亲雷莎正在白宫前，这座巨大的白色混凝土高楼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尔钦宣布以白宫做为抵抗政变的总部，数百人聚集在白宫周围。经过一番斟酌，他们开始构筑路障。冉娜的父亲鲍里斯则在白宫里。

*

在索利卡姆斯克，廖沙的母亲加林娜已从电视上观看政治动态两年之久。现在，每个人都在收看电视播的芭蕾舞剧。成年人看起来闷闷不乐。就在《天鹅湖》播出前几天，加林娜的同事们才到公寓来讨论课程计画；新学年再过不到两个星期就要开始，歷史似乎又改变了，因此歷史课教法也得跟着改变。同样的事前一年夏天也发生过，再前一年夏天也是。这时他们都沉默了。到了某个时刻，芭蕾舞停止了，六个老男人身穿不同灰阶的西装，一幅灰色的画面出现在电视上。其中一人介绍其他人，每个人听到自己的名字就欠身致意。廖沙记得中间一个男人的名字：亚纳耶夫。他说戈巴契夫不能再执行总统职务，由他亚纳耶夫代理。廖沙也记得「福罗斯」（Foros）这个词—亚纳耶夫说这是戈巴契夫正在养病的地方名。註151

接着，出现一名站在战车上的男人，这位大个子男人被许多小个子男人围绕着。他手里拿着一张纸，说某些事情是违法的。註152廖沙问母亲这人是谁。「这是我们的总统。」加林娜说。

然后电视上又出现一架飞机，在漆黑的夜空中引擎声渐弱，戈巴契夫身穿浅色休闲外套走下梯级，面带微笑。他的孙女跟在后面，身披毛毯，戈巴契夫的妻子雷莎搂着小女孩。戈巴契夫和几个人握手，然后他的整张脸孔出现在画面上，有个声音说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过去三天来，全国都在可怕的紧张气氛中度过，极度担忧自己的总统、自己的未来，以及民主的命运……」註153廖沙哭了。他太爱戈巴契

夫了，自从听说戈巴契夫生病以来，他就真的如此担忧、如此紧张。

所有这一切在廖沙看来就像是全部发生在一天之内一样—芭蕾舞剧、三个总统在电视上轮流出现，然后是戈巴契夫的孙女裹着毛毯，还有眼泪。事实上，前后歷经了三天。八月十八日，由政变首脑派遣的四个人飞往戈巴契夫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福罗斯的别墅，成功将他胁持起来；隔天早上，电视台转播紧急状态公告，然后切换成《天鹅湖》。叶尔钦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们在白宫内坚守岗位，较疏远的支持者们开始聚集在白宫周围，同时间军队开进市区。正午时分，叶尔钦爬上一辆停在白宫外的战车，宣布紧急状态违法—但当天或隔天的电视都不会播放这个画面。反倒是灰衣男人们举行的记者会，并透过电视转播。白宫外的群众这时已多达数千人，他们开始构筑挡不住战车的路障，并发放防毒面具，但数量远远不够分配给所有人。隔天，白宫外面和内部的谈判都在焦急的期盼下度过；奉命率军攻打白宫的将军不愿在接获命令时执行，但他也不愿倒戈。八月二十一日清晨，三位青年在试图阻止装甲运兵车队开往白宫的路上丧生，但军队距离白宫仍有一英哩远。下午三点左右，包括国防部长及国安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内的六人飞往克里米亚。两小时后，反对政变的一方也有三人飞往克里米亚。隔天凌晨约两点，戈巴契夫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乘坐同一班飞机的克留奇科夫立刻被监禁：俄罗斯检察总长已下令逮捕全体政变的策划者。八月二十二日中午，一面白蓝红三色条纹的俄罗斯国旗首次在白宫升起。那天下午，戈巴契夫举行记者会，表示：「我回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他说，有人企图将国家回復成极权主义国度，但失败了。在某个时刻，戈巴契夫开始用「极权」一词，形容这个如今终于看来要垮臺的政权。他说，排除这个阻碍之后，他现在要开始全力推动新联盟条约。他已经任命新的部长，取代政变者在苏联政府中的位置。註154

*

对于曾在戈巴契夫被胁持的城堡别墅里度过夏天的谢廖沙来说，这次流产政变带来的景象平淡无奇。他认识那个在全国人民面前裹着毛毯走下飞机的女孩。他很习惯在电视上看到亲近的人。让他印象更深的是父亲和他的短暂对话。阿纳托里说，他在白宫前待了三天。他憎恶地说着这件事：他痛恨面对战车时手无寸铁的无助感。

谢廖沙的祖父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则在莫斯科市议会大楼里，地方政府在那里组织着自己的抵抗行动。他也对群众讲话。「可能发生的一件最可怕的事，如今发生了。」他说：「我们的国家不曾有过这么悲惨的日子。」註155戈巴契夫虽然感谢了叶尔钦及其盟友协助对抗政变，但对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却没有一句感谢。他回到莫斯科时也不见自己这位老盟友，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时，他斥责亚歷山大．尼古拉

耶维奇向强硬派屈服的退党之举。看来在戈巴契夫自称返回的这个新国家领导层中，不会有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一席之地。

但这个国家又是什么？「苏联还在吗？」成了那一天、那个星期、那个秋天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苏联似乎还健在，但它的型态却捉摸不定。叶尔钦的俄罗斯共和国立即吸收了苏联的一部分决策机制。叶尔钦显然也强迫戈巴契夫取消了政变后某些最初的人事任命。更重要的是，叶尔钦让戈巴契夫任命了一个由他挑选的局外人执掌苏联国安会，然后在描述这个人的职责时加上了「解散国安会」。註156八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两天，叶尔钦先后签署命令，终止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共和国共产党的活动。

八月二十七日，政变五天后，叶尔钦任命冉娜的父亲鲍里斯．涅姆佐夫出任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地区首长。俄罗斯八十九个行政区中，只有三个行政区首长由选举产生，这些职位都是在重建时期新设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长，以及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总统。其他行政区仍由党组织掌管，但共产党如今在名义上与实质上都被废除了。叶尔钦开始向这些地区任命总统「代表」，一天之内就签下数十个名字；大多数人他并不认识，是由他的幕僚仓促找来的。涅姆佐夫则是例外。叶尔钦认识他，也喜欢他，在白宫共度被包围的三天之后，他们只要有时间就会一起打网球。涅姆佐夫那时三十一岁，他如今要负责治理俄罗斯第三大城及周边地区。这是叶尔钦较为深思熟虑的一项人事任命。註157

同时，联盟条约正在崩溃。戈巴契夫持续进行协商，但叶尔钦也在协商。俄罗斯总统最后向苏联总统施压，要他承认波罗的海诸国独立。就连政变前看起来支持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此时也逐一宣布独立。然而戈巴契夫仍持续召开会议，争取签订条约。但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这时抵制会议。最终在十二月七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领袖召开会议，策划将苏联正式解体，同时发明出安慰奖——一个名为独立国家国协（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的空洞实体。戈巴契夫没有受邀出席，甚至不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他是在叶尔钦致电美国总统老布希之后，才被白俄罗斯领袖通知此事。数日后，戈巴契夫向记者们发怒：「我认为我国人民还不理解他们正在失去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不存在了！」註158

不到两星期后，十二月二十五日，戈巴契夫最后一次以总统身分向同胞发表谈话：「鑑于独立国家国协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在此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註159苏联不復存在。

这时，玛莎和母亲正在开往波兰的火车上，一个不存在国家的有效

护照，收在塔蒂亚娜的提袋里。

註114：V. V. Lebedinsky and N. P. Chesnokova, “Oktyabryata,” Bolshaya sovetskaya entsiklopediya, 3rd ed. (Moscow, 1974), vol. 18, pp. 1080-1081; “Chto v SSSR delali pionery, kak prinimali v komsomol i kto takiye oktyabryata?” Argumenty i fakty, May 19, 2014, http://www.aif.ru/dontknows/eternal/1170643（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115：苏联小学笔记本的封底图片，参看http://bigpicture.ru/wp-content/uploads/2014/01/sovietschool02.jpg（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116：Mikhail Zoshchenko, “Grafin,” in Rasskazy o Lenine, http://lib.ru/RUSSLIT/ZOSHENKO/r_lenin.txt（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浏览）；A. I. Ulyanova, Detskiye i shkolniye gody Ilyicha, chap. 3, http://libelli.ru/works/chapter1.htm（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浏览）。（事实上，写作的年代顺序，以及破碎的花瓶图像出现在安娜．乌里扬诺娃〔Anna Ulyanova〕更早之前一段完全不同的回忆之中，让整个故事看来像是虚构的，但这在神话的用途上无关紧要。）

註117：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p. 31.

註118：“Sostav rukovodyashchikh organov Tsentral’ nogo komiteta Kommunisticheskoy partii—Politburo (Prezidiuma), Orgburo, Sekretariata TsK,” Izvestia TsK KPSS, no. 7 (1990), http://vivovoco.astronet.ru/VV/PAPERS/HISTORY/KPSS/HISTORY.HTM（二○一六年一月二日浏览）。

註119：他提到的这名政治局委员是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参看Mikhail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Moscow: Novosti, 1995), vol. 1, p. 408。

註120：前引书，p. 409。

註121：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

註122：我在The Man Without a Face: The Unlikely Rise of Vladimir Puti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2) 一书中详细叙述了这段经歷。

註123：雷根在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年度大会上发表的评论，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Orlando, Florida）。http://www.reaganfoundation.org/bw_detail.aspx?p=LMB4YGHF2&lm=berlinwall&args_a=cms&args_b=74&argsb=N&tx=1770（二○一六年一月三日浏览）。

註124：Peredovaia, “RSFSR,” Pravda 31 (February 1, 1936)，转引自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52。

註125：Peredovaia, “Privet izbrannikam velikogo naroda!” Literaturnaya gazeta, no. 3 (January 15, 1937)，转引自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p. 455。

註126：一九三六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http://www.hist.msu.ru/ER/Etext/cnst1936.htm（二○一六年一月三日浏览）。

註127：一九七七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http://www.hist.msu.ru/ER/Etext/cnst1977.htm#iii（二○一六年一月三日浏览）。

註128：一九七八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http://constitution.garant.ru/history/ussr-rsfsr/1978/red_1978/5478721/（二○一六年一月三日浏览）。

註129：A. A. Yakovlev, ed.,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1985-1991: Dokumenty (Moscow: Mezhdunarodny fond “Demokratiya,” 2008), p. 165.

註130：前引书，p. 166。

註131：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132：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註133：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pp. 321-351.

註134：“Vystupleniye na pervom syezde narodnykh deputatov SSSR,” in Andrei Sakharov, Mir, progress, prava cheloveka (Leningrad: Sovetskiy pisatel, 1990), pp. 111-116.

註135：M. R. Zezina et al., Chelovek peremen: Issledovaniye politicheskoy biografii B. N. Yeltsina (Moscow: Novy khronograf, 2011).

註136：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pp. 361-362.

註137：前引书，p. 381。

註138：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90).

註139：Plokhy, The Last Empire, p. 38.

註140：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pp. 602-605.

註141：Soobsheniye Tsentral’ noy komissii referenduma SSSR Ob itogakh referenduma SSSR, sostoyavshegosya 17 marta 1991 goda, http://www.gorby.ru/userfiles/file/referendum_rezultat.pdf（二○一六年一月六日浏览）。

註142：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pp. 620-634.

註143：A. A. Yakovlev, ed., Aleksandr Yakovlev, Izbranniye intervyu: 1992-2005 (Moscow: Mezhdunarodny fond “Demokratiya,” 2009), p. 382.

註144：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pp. 659-681.

註145：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Izbranniye intervyu, p. 37.

註146：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p. 823.

註147：前引书，p. 689。

註148：前引书，pp. 690-695, 824。

註149：Zakon SSSR ot 20.05.91 no. 2177-1, http://www.lawrussia.ru/texts/legal_178/doc17a990x543.htm. 实际上，出境签证规定直到一九九三年才完全取消：”Vyyekhat’ za rubezh poka ne legche, chem ran’ she,” Kommersant, January 11, 1993, http://www.kommersant.ru/doc/7029（二○一六年一月八日浏览）。

註150：GKChP, “Obrashcheniye k sovetskomu narodu,” http://dok.histrf.ru/20/zayavlenie-gkchp/（二○一六年一月八日浏览）。

註151：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记者会，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xH4e3Rfes（二○一六年一月十日浏览）。

註152：叶尔钦对群众发表演说，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oOkFZsPT8（二○一六年一月十日浏览）。

註153：戈巴契夫返回莫斯科的新闻片段，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nkbL6KV6o（二○一六年一月十日浏览）。

註154：戈巴契夫记者会，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http://rutube.ru/video/985c0f40c9416286f1a91d20b6bd8961/?bmstart=4133；戈巴契夫向全国人民进行电视讲话，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qB16clLmN4（皆于二○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浏览）。

註155：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Perestroika, p. 695.

註156：Vadim Bakatin, Izbavleniye ot KGB (Moscow: Novotni, 1992).

註157：Petr Akopov, “Sud’ba komissarov,” Izvestia, August 23, 2001, http://izvestia.ru/news/250769（二○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浏览）。

註158：戈巴契夫答记者问，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Wzf1Ze2tk（二○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浏览）。

註159：戈巴契夫辞职讲话，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jrmckJiMk（二○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浏览）。

# 第六章　白宫处决

谢廖沙记得这件事。他正从学校返家，在地铁列车上，当列车驶出隧道、开上跨越莫斯科河的大桥时，谢廖沙看到了战车。他在下一站下车，搭上反方向的列车，好再次跨越大桥看战车。然后他重复一遍、又一遍、再一遍，直到天黑。

成年之后，他开始怀疑这段记忆是一九九一年还是一九九三年。他查过维基百科，但忘记了。他又查了一遍，还找出帮助记忆的诀窍，却再次遗忘。最后他只好认了，每隔六个多月就查一次。

*

谢廖沙始终无法确认他所生长的国家究竟发生过什么事，这是情有可原的；更年长的人们、博学的观察家，以及热烈参与事件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困难。最后还出现了多种叙事。哈佛大学歷史学者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认为，苏联之所以瓦解，是因为这个帝国置身于欧陆帝国数百年来的终结过程之中。或许因为苏联国家建构及意识型态的独特性，苏联瓦解的过程歷时更久，衰亡的样貌也不同于其他帝国，但裂解苏联的力量仍旧势不可挡。註160预言了苏联解体和一九九一年政变的兹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写道，一个根本的悖论会把这个国家拖垮；它的经济陷入绝境，经济要存活就得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则必定摧毁国家的全套体制。但他设想，国家若要保存政治体制，经济就必定失败。註161

十多年后，普林斯顿大学歷史学者史蒂芬．柯特金则写道，苏联瓦解的过程是戈巴契夫自己促成的，因为他对追求改革的立场摇摆不定，也不能持续试着抵抗由自己启动的进程。註162而在其他学科中，柏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者阿列克谢．尤尔查克（Alexei　Yurchak）也曾论及，苏联是被自身的悖论给拖垮的，陷入统治意识型态与生活现实之间的落差—这道鸿沟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而且都会引发危机。註163当然，列瓦达和他的社会学家团队也预言苏联会灭亡，因为支撑着苏联一切机制的苏维埃人将绝种。

除了极权主义学者理论家布里辛斯基，以及提出苏维埃人模型的列瓦达之外，所有这些解释都试图从不同社会移植大不相同的术语来理解苏联的衰亡。社会科学在苏联的丧失，让这种做法不可避免—苏联社会被禁止理解自身，也没有土生土长的语言叙事来定义所发生的事。偶然开启自我检视契机的「气窗」通常太小，让学者们无法调整或改编进口的理论基础模型，或自己创造模型。在苏联长大，但一九九○年代在美国读研究所的尤尔查克，或许正是不适应外国模型的最明显例子。他缺

乏工具去探索意识型态与生活现实之间的落差，以及在苏联和在西方国家中有何差异，况且他使用的模型是为了西方国家而设计的。在正常运行的民主政体中，公开宣称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其矛盾可以被指出、也经常被指出，并导致社会与政治的变革。这并不会消除内在固有的落差，但能以某种方式间歇地让社会变得更民主、消除多一些不平等。极权主义意识型态却不容许这样的修正机制。汉娜．鄂兰断言，任何意识型态都有可能变得极权，但要变得极权，它得先被化约成一个简单概念，然后再被转变成假託而来的「歷史法则」，并以恐怖手段强制实施。註164极权意识型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对外封闭。它自我标榜能解释全世界和世间万物。极权意识型态与现实之间不存在落差，因为极权意识型态将所有真实都包含在内。

苏联意识型态的那种性质，也是浦洛基「苏联因为是帝国而灭亡」这一论点的问题所在。苏联国家不但不认为自己是帝国，更自称是帝国的相反。这样的自我概念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不曾改变，当俄罗斯变成了由不同领土、文化及族群组成的联邦之后也不曾改变。当然，人们可以说帝国并不因为自己的否认就不算是帝国—狗不会只因为牠和朋友们自认自己是猫就不再是狗—但帝国无疑是一套社会政治构造，它对自己的认知也就变得重要。要像二十世纪其他帝国那样进入后帝国的未来，俄罗斯就必须对自身认同做出相应的变革。但就连叶尔钦这个或许对解体苏联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人物，都没想到要这么做，他也不认为苏联是帝国。

柯特金对苏联国家解体的解释，本质上就是归因于管理不善：戈巴契夫乱搞一通，直到药石罔效。柯特金是由上而下观看体制崩溃的过程，列瓦达则是由下而上预测这个过程。但两人都未能聚焦于个人与机制之间的连结，而这样的连结才是凝聚社会的力量。

当西方人在非正式谈话中使用「极权主义」一词，它召唤出的形象是一个随时随地向每个人施加强制力的骇人社会。当然，这样的形象异乎寻常地缺乏效力，尤其不适用于像苏联这样极其低效的国家。极权社会的武力节约（economy of force）是经由恐怖而达成的。极权主义自行建立一套社会契约，其中多数人在多数时候都不会受到暴力危害，只要他们停留在特定边界之内，承担并确保其他公民同样不逾越界限的责任。边界则是不断变动的—鄂兰形容，极权社会创造出一种经常变化和不稳定的状态註165—人们需要随时警惕才能随时跟上变动。对于讯号的高敏感度（hypersensitivity）是必备的生存技能。

*

苏联公民如何学会对讯号高度敏感？练习的场域其实是对私生活的

控管。在苏联歷史上，党对于家庭的路线不断变化。就在一九一七年革命过后，婚姻被废除了，家庭被驱使走向衰亡。不到二十年后，家庭又被官方挽救回来，更被封圣成「苏联社会的核心」。註166革命过后数年间，同性恋行为受到宽容（但与人们的迷思恰好相反，它并未被颂扬，甚至不曾被真正接受），但在一九三四年再次被法律明定为犯罪。註167随着钟摆往回摆盪，离婚的难度变得令人望而生畏，一九二○年代既合法又常见的堕胎也成了违法。註168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骤减的危机，苏联先是让离婚变得更加困难，接着又逆转政策走向，改採实际上将多重伴侣合法化的措施，鼓励单亲妈妈自立。註169但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堕胎又再次合法。註170

因法律变迁而要求苏联公民随之改变的不只是行为，还有他们对生命的展望—这套社会契约规定，当国家释出尚称明确的讯号时，大众得随之反应。讯号经由报刊、电影、书籍上的宣传，接着修订法律，再经由执行而释出，藉着惩罚极少数人示众，确保了大多数人循规蹈矩（惩罚人数相对于守法人数的比例，在史达林死后也发生改变，由此巩固了运用令人惧怕的榜样实施教化的原则）。在一九九一年崩溃的，正是这套示意与回应系统。

崩溃的转捩点有大有小。一九八八年，戈巴契夫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同年，诺夫德沃斯卡亚和她的盟友们举办了那次骇人听闻的大会，创立全国第一个替代政党「民主联盟」，无视国安会的恐吓与传唤（国安会正是这个政党倡议要废除的组织）。按照戈巴契夫的迂迴作风，释放全体政治犯并不表示异议人士今后不会再被捕入狱—这正是民主联盟对国安会讯号的拒斥，使得祕密警察对他们无计可施。一九九一年三月，戈巴契夫把战车开上莫斯科街头，释放出自己决心终结支持叶尔钦示威的讯号，但数十万莫斯科人无视这个讯号。也是在那个月，全国准备联盟公投之际，中央委员会官员紧张忙乱地想尽办法控制国家局面。他们禁止了一场原定在莫斯科城外两小时路程的原子科学城杜布纳（Dubna）举行的妇女论坛，因为他们看到了报纸上披露的与会人员，除了此刻正对性别理论求知若渴的年轻学者、持续发行地下女性主义期刊的老异议人士、专攻妇女权益的劳工运动者、十多位外国名流，还有两位出柜的美国女同性恋者要来参加。但其中一位外国来宾—来自纽约的记者暨学者、长期以来与苏联菁英关系深厚的柯蕾特．舒尔曼（Colette Schulman）□□出面干预，即便报社及两位女同性恋者拒绝了政府希望他们不来参与的请求，主办单位的安排最终还是得以恢復。註171

俄国政治家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在回忆录中叙述了类似事件。一九八○年代晚期，他是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党员》

（Kommunist）的经济版编辑。

《共产党员》的内容这时也包含了各种无法想像能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词汇：通货膨胀、失业、贫困、社会不平等、预算赤字。我们刊登了第一份对国防预算的务实估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通电话从中央委员会总部打来。

「你们在干嘛？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公开讨论了？」

这种电话一般来说很容易应付。我会反问：「你不知道吗？」打电话来的这个无法确定党的最新路线的官僚，就会退缩不再来烦我。註172

党的示意系统停止运作了，相对来说，这使得意识型态不再密不透风—实际上是不再极权。

妇女论坛过后四个月，两位美国女同性恋运动者和她们的苏联伴侣举办了一次男女同性恋电影节，以及一系列工作坊，首先在列宁格勒、随后在莫斯科举行。她们谨记女性主义者的遭遇，预先拟定了备案以防失去场地。电影节在列宁格勒市中心「文化宫」及莫斯科一家同样位于市中心的电影院顺利举行。这两个场地都是国家所有，但这时只要数百美元租金即可租用。主办者们也能将同性恋主题的电影胶卷携带入境，即使书报检查制度或同性恋行为的刑事处罚都还没废除。电影节结束时，她们甚至租用了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举办全国第一次公开的同性恋派对。这时的莫斯科有几家「合营」餐厅—重建时期对新近合法化的私营事业所做的折衷—但这家餐厅并非合营，同性恋派对是在中央艺术工作者之家（Central House of the Workers of the Arts）举行，此地六十年来接待的一直都是为意识型态服务的菁英。

而在妇女论坛与同性恋电影节之间的四个月，政府对同性恋或是更广泛的人民私生活都不曾改变态度，但在政治的急速变化与新的经济急需之间—每一处设施都需要强势货币—苏联社会的社会契约，也就是这套示意与回应系统，化为乌有。电影节来到莫斯科举行的某个时刻，警方怯生生地从街上拿工地旗帜围住电影院，试图将它封闭。同性恋者们用剪刀将这些旗帜剪断，继续照常放映。再过三星期，参加过同性恋电影节的许多人都聚集到莫斯科白宫前，准备抵挡战车进攻。美国社运人士送给莫斯科同性恋团体一部影印机，如今它派上用场，向人民印发叶尔钦的演说。

战车在白宫前布阵，但并未朝抗议群众逼近。日后，盖达尔记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至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那天，无论是俄罗斯或苏联歷史，都无法带给人们即便抵抗也不被残酷镇压的期待。毕竟，政变领袖们显然就准备好要残酷镇压。只需要一个愿意为大规模流血和大肆镇压承担直接责任的人，一个组织及命令军队行动的人，一个能找出最可靠、最值得信赖、最有决断力的将领，让他登上前导的战车，亲自粉碎示威的人。换句话说，必须有这么一个人物，能够克服军方固有的惰性及不愿承受骂名的压力。结果，政变策划者之中没有这样的人。因此产生了你来我往、行动不协调、推诿责任于他人的意志，以及军方的原地打转。註173

换言之，政变策划者们仅藉由发布几道命令，以及将一国总统软禁起来—这在讯号阶序中必须是数一数二重要的—就试图让示意系统重新运行；但社会契约却无法因此復活。军方并未回应强硬派的讯号，也没有理会叶尔钦从白宫发出的讯号、站到抵抗运动这一边。它只是一动也不动。

*

对于后苏联知识界、西方记者以及政治人物来说，一九九一年八月最重要的一刻发生在政变失败之后，苏联祕密警察缔造者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一尊巨大铜像，从卢比扬卡广场（Lubyanka Square）中央的基座上被拉了下来；这里距离克里姆林宫只要走一小段路，距离中央委员会一个街区，且就在对角线上遥遥相望着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以及儿童世界百货公司正前方。这次推倒铜像的行动是由莫斯科市议会授权的，他们出于安全考量，在欢欣鼓舞的群众聚集之前拆卸完毕，这象徵着极权主义两大支柱被同时拆除：意识型态与恐怖。当铜像被吊车举起，这个巨大的纪念物露出了空洞的内里。

发生政变的决定性时刻，玛莎、廖沙、冉娜、谢廖沙都不记得电视上转播过拆除捷尔任斯基铜像的过程。他们记得街道上的战车、电视上的芭蕾舞剧、登上战车的叶尔钦，以及飞机上的戈巴契夫。廖沙也认为自己记得戈巴契夫被软禁的画面，但这或许不是真正的记忆，而是日后习得的记忆。总体而言，他们记得政变并非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开始），没有一个强烈的象徵性结尾，而是一连串令人困惑、兴奋、时而惊恐的事件，这些都与他们往后的生命紧紧结合。廖沙还有这一桩遭遇：留着鬍子、高唱扣人心弦的流行歌曲、颂扬（俄罗斯的，而非苏联的）全新爱国精神的青年歌手伊戈．塔尔可夫（Igor Tarkov），在一九九一年下半年遭到杀害。廖沙的母亲这时有了男友谢尔盖—这一年结束前，两人会结婚—他热情追逐新兴流行文化。如同其他所有俄罗斯人，

谢尔盖热爱塔尔可夫。他正在收看电视转播的年度歌谣大赛，这时主播说：「塔尔可夫中弹了。」在沙发上排排坐的谢尔盖和廖沙，看着歌手被担架抬了出来；他身上只穿内裤。谢尔盖哭了，廖沙也哭了。那是他所看过最可怕的一件事。

最起码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八月政变似乎只是一连串重大事件之一──以叶尔钦的观点来说。他那一整年都在为了俄罗斯发动战争。他至少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对抗反对一切改革的共产党保守派，也对抗仍想约束俄罗斯和叶尔钦个人政治野心的戈巴契夫。叶尔钦在那年赢得了好几场战役：三月，他在莫斯科街头的战役打败了戈巴契夫；六月，当俄罗斯发布主权宣言，他同时战胜了这两个对手──这是争取俄罗斯人心的战役。当叶尔钦战胜了八月政变，他也清除了其中一条战线。强硬派溃不成军，此后只剩下他对决戈巴契夫。而在这条战线上，胜利几成定局。

在知识界的神话里，一九九一年是俄罗斯不流血革命的一年。但它并非不流血：受害者包括八月在莫斯科丧生的三名男子，一月在维尔纽斯和里加被杀害的十九人，一九八八年以来在亚塞拜然丧生的数百人，以及一九八九年乔治亚首都提比里斯暴力镇压示威游行所造成的伤亡。註174它也不是革命。一九九一年剩下的时间里，叶尔钦不仅集中心力摧毁苏联国家机制，也集中心力取而代之。他为自己新独立的俄罗斯取得了军队、中央银行，以及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席位。西方的常识以为这是好事一桩，毕竟苏联大多数的核子武器会集中在一处，俄罗斯也不会像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那样拒不承认前政权的外债。

在一个十分乐观、十分反苏联的人来看，叶尔钦似乎是对付极权主义体制的支柱，摧毁其意识型态与恐怖机器。他禁止共产党活动，并将废除国安会的工作交给新任国安会主席执行（名义上仍是戈巴契夫的国安会）。但仔细观察，禁止共产党运作攸关经济活动──叶尔钦有充分理由惧怕共产党机构会把剩下的党产全都侵吞。而废除国安会一事，实际上是依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将它切割成十五等分，这就确保俄罗斯也继承了一组正常运行的苏联式祕密警察。註175

到了一九九一年底，叶尔钦有了一整个国家要经营。但即使苏联国家的原有机制完全由他掌控，他在治理手段乃至于运用治理手段的人员方面，仍面临严重短缺。他任命俄罗斯联邦各个主体领导人──某些情况下，都已经是在地方崛起的领袖，不论他们自称「州长」、「市长」还是「总统」。其中只有少数人像鲍里斯．涅姆佐夫那样对叶尔钦个人效忠，决心实践他的政治议程，集中力量即刻引进市场经济。涅姆佐夫着手将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商店及其他财产民营化。涌进城市里和他谈话的外国人──潜在投资人、西方顾问、记者、名流──多得一望无际。因为

叶尔钦没有别的地区领导人能向他们展示。

在几个地区里，尤其在车臣和鞑靼斯坦，当地领袖是因民族独立运动被拥护上台的。而在其他地区，例如俄国金刚石矿业基地，位于极北地区的雅库特（Yakutia），分离运动则以经济自利的说法表述。就连圣彼得堡的一个团体，都以宣布独立作为地区目标，不过是半开玩笑的性质。俄罗斯共和国宪法与苏联宪法不同，并不保障退出联邦的权利，但这时看来似乎无关紧要。

这时拉动俄罗斯的力量，竟怪异地近似于早先裂解苏联的力量。还有其他令人迷惑的新问题。俄罗斯是一个濒临经济崩溃的国家，周边围绕着其他濒临经济崩溃的国家。它和这些国家共用货币、边界松散，但俄罗斯对它们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其中，乔治亚正陷入内战，而俄罗斯邻近乔治亚的北奥塞梯（North Ossetia）及车臣地区也已经捲入战事。乔治亚境内的南奥塞梯，则为了脱离乔治亚、加入俄罗斯而战斗。在西部，摩尔多瓦境内名为聂斯特河沿岸（Transdniester）的小片地区也为了加入俄罗斯而战斗，它与俄罗斯如今被国土狭长、独立的乌克兰隔开。俄军也捲入了当地的冲突。俄罗斯这时也得到了一块飞地：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原先是东普鲁士城市柯尼斯堡（Königsburg），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苏联併吞并且俄罗斯化，如今与俄罗斯大陆之间被独立的立陶宛隔开。

新国家的法治及政治基础并不完全明确。它有某种像国会一样的机构，这是一九八九年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时间点在俄罗斯宣告主权之前。一九八九年五月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一千零六十八位代表之中有九百二十人是苏联共产党员。註176一年后，只有七百六十七人仍是共产党员。即使在叶尔钦禁止共产党活动之后，多数代表（六百七十五人）仍保有党籍。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通过立法，包括宪法修正案。总统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案有否决权，不过人民代表大会仍能以简单多数决推翻总统的否决。註177

也有法律。如同其他每一个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继受了同样的刑法与民法，其中禁止任何形式的私营事业、禁止操作强势货币、禁止无业及其他事项。俄罗斯也继受了一套宪法，其中几乎不包含关于国家构造、政治主义及身分认同的任何讯息。这几乎是所有前东方集团国家共同具备的问题。东德除外：对于自己，他们最先知道的就是他们不再是从前的自己。和平革命叙事（拿来形容东方集团其他国家更为准确）迫使他们必须在旧法律基础上打造新国家，成功与否则多半决定于其中默示的政治理解。各国都修正原有的共产主义宪法，令其能派上用场，多年来也将就于随之产生的拼装事物。但在这方面，俄罗斯的问题根源更深，因为它所继受的宪法宗旨甚至不在于创造国家的某种幻影。

一九九一年晚秋，叶尔钦仓促组成了一个可运作的内阁。他最迫切需要找个人来负责经济事务—政变之后，经济从不景气走向完全停摆。对统制经济当局的信任与恐惧全都消散了，集体农场不再输送谷粮给中央的配销中心，不再交易毫无价值的卢布好履行社会主义义务，反而就地拿谷粮以物易物。经济上由军工复合体支配的俄罗斯大城市受害最重，因为它们没有物产可供交换。「全国处于高度焦虑状态，」经济学家盖达尔在回忆录写道：「一九九一年秋天充斥着对灾难的预期、饥饿，还有运输及暖气系统瘫痪。可携式煤炉供不应求。日常对话的最主要话题是求生。」註178配给证在全国各地早已行之有年，但地方政府就连最低限额的配给都再也无法确保供应。

叶尔钦要求盖达尔想办法让国家活下去。那年三十五岁的盖达尔是苏联权贵家庭的后裔，他是苏联最受尊崇的两位作家的孙儿，也是一位大作家的女婿。註179除了短暂担任过编辑之外，他只在研究机构工作过。他找来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组成团队，起初有六人，后来又加入几位。这些人全都年岁相当，出身学界。他们没有任何政府或行政管理经验，除了最近几次到西方短期旅行之外，并不曾看过教科书之外的市场经济。他们遭逢的窘境，与列瓦达的社会学家试图设计出第一份真正的问卷调查时不无相似，但这群理论家如今既被要求阻止饥荒、避免全面崩溃的基础建设，同时又要重振全国经济。

整个一九九一年秋天，这个团队都藏身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处政府别墅。最初几个星期，他们得知情势比自己原先设想的更严峻。国家没有货币或黄金储备—大多被花掉了，剩下的则似乎被劫走了。由于消费品多年来供不应求，也因为一切货品价格都由政府决定，从不顾成本或需求，人们手上积累了大量未曾花用的卢布；没人说得准究竟有多少。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又无能控制经济活动中的卢布供给（就连邻近国家也能印制卢布），就算消费品可供购买、解除价格管制，想要遏制通货膨胀也近乎无望。但消费品可供购买的唯一方法，看来就只剩解除价格管制一途。「事情变得很清楚，局势无情地决定了唯一一种选择：引发最多冲突、风险也最大的改革设想。」盖达尔写道。註180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叶尔钦任命盖达尔以副总理一职兼任经济与财政部长。叶尔钦决定不任命总理，自行主导内阁运作—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没有人想接受自杀任务—这意味着盖达尔实际上要掌管政府。为确保改革得以进行，叶尔钦取得了颁布牴触现行法律之命令，只需国会追认，即可生效。

*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政府解除了对消费品价格的管制，只有面

包、牛奶和酒类除外。两星期之内，商品就开始在货架上出现。不到一个月，价格就飙涨三点五二倍。俄国人看作是储蓄、盖达尔则认为是危险现金结余的那些钱，全被花个精光。註181政府努力要避免持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大多数俄国公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支付大把钞票的同时，却又买不起如今到处向他们招手的大多数商品。一九九二年一月，叶尔钦签署命令将私人经商合法化，普通公民开始进行交易。他们手持物品站在人行道上贩卖，有时就是不加包装的一块生牛排或炸鸡，因为那既是亏损、也是奢侈。许多人都把叶尔钦的命令从报纸上剪下来，钉在外套上，以免警察找麻烦。苏联城市里整齐的灰色街道活了过来，跃动着各种不同物品的景象、人们叫卖的声音，以及压倒一切的不确定感。盖达尔的改革或许避免了饥荒和基础建设全面崩坏，但改革带来的焦虑，远远超过先前发生过的一切。冬季结束时，叶尔钦和国会的蜜月期也随之告终。

多数人民代表采取的立场，近似于重建时期，当时国会以挑战中央权威为主要任务。国会要求停止甚至逆转改革，并要求盖达尔下台。叶尔钦不肯退让，他的内阁也继续照原定计画施政。在地方政府配合的地区，商店和服务都被民营化了。到了夏天，政府停止补助一切消费品，包括面包、牛奶和酒类。通货膨胀远低于恶性通货膨胀的稳定水平。在盖达尔和他的团队看来，这是一大成就；但在大多数俄国人看来，这就是失业，而且不再像旧政权那样可以用假装工作、假装付薪水来掩饰。失业不但明摆在眼前，更因生产下降、薪资水准荒唐可笑而变本加厉。国会开始撤销总统命令——例如一道援用破产作为选项及程序的命令。盖达尔写道：

当我们继续前进，就遇到愈来愈多阻碍。我们的进展显得怪异。它不像是爬山：无论山有多么险峻危险，其结果都只决定于你自己，你的力量和你的不屈不挠。它更像是涉渡沥青湖：你脚下的路径不稳定，莎草戳刺你的皮肤，蚊子叮咬你的双眼，踏错一步就会让你栽进液态的黑暗之中。註182

而在其他领域，叶尔钦也走着同样不确定的路。三月，几乎就在戈巴契夫对苏联全国进行民意调查整整一年后，叶尔钦组织了联邦条约（Federation Treaty）的签署。这是缔造新俄罗斯联邦的文件。但这个国家的起步实在不令人看好：文件内容空泛，签署过程不顺遂。联邦包括三种不同的成员资格——独立于中央的程度各不相同。鞑靼斯坦和车臣两个共和国拒绝签署，它们都自认为是独立国家。此外，距离莫斯科两

小时远、无足轻重的卡卢加（Kaluga）地区，在另加一条但书后签署了。圣彼得堡则加了三条—其中一条是，拒不承认莫斯科当局有权在圣彼得堡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註183结果国家随即实施了紧急状态，但不是在圣彼得堡，而是北奥塞梯和印古什（Ingushetia），这两个地区在一九九二年因领土纠纷而爆发冲突。註184

到了一九九二年秋天，就连经济改革的代表人物涅姆佐夫都在请求内阁放慢脚步，註185但内阁反倒更加急迫地推进。内阁在年底批准了一项全俄罗斯皆可民营化的方案，依照这个方案，全国一亿四千八百万公民人人都能获得一份凭证，这份凭证可以兑换成任何刚从国营事业民营化的股份。国会普遍厌恶这个构想，但同意让它实施。过没多久，人民代表们就要求叶尔钦撤换盖达尔—若不撤换，他们就会将总统的一切提案全部驳回。

俄罗斯新任总理维克多．切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看来更适合扮演俄国官员，或者不如说苏联官员这个角色。他那年五十四岁，出身南俄草原一个小城里的工人家庭，在共产党内从基层逐步晋升，而且未曾退党。他曾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员，加入内阁前的最后职务是全国天然气独占事业的首脑。註186他向国会承诺遏阻生产下跌，不让人民变得更穷。「市场经济体系未必非得是个市集。」他说。註187

切诺梅尔金失败了。他试着逆转盖达尔的某些政策，但得不到内阁多数成员的合作。俄国政治又回到了政变前的状态：总统和他的内阁绝非统一战线，但他们对国会全面开战。仓促修补又再修补的旧苏联宪法让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它并未界定政府各部门的权责。随着大型工厂开始民营化，贪腐再次成为一股强大力量，官员们争相瓜分财产，不管自己是否有权如此。註188既然总统与国会处于战争状态，也就不可能颁行新宪法。国会转而开始喋喋不休地讨论弹劾叶尔钦。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日，叶尔钦在电视演说中宣告，国家的政治危机源于「人民与旧布尔什维克反人民体制的深刻矛盾，到现在都还没倒下，如今还要收復失去的权力。」註189叶尔钦表示，他要撤销国会驳回总统命令的权力，并预定在四月二十五日举行公民投票。俄国公民将被要求确认他们对总统的信心，并对新宪法草案投票。

这么做没用。叶尔钦的举动本身就不符宪法规定，被宪法法院判定无效。叶尔钦可以举行公投，但只能问以下四个问题：

一、你是否信任俄罗斯联邦总统B．N．叶尔钦？

二、你是否认同俄罗斯联邦总统与内阁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实行的社会及政治政策？

三、你是否认为有必要提早改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四、你是否认为有必要提早改选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註190

直到投票为止，叶尔钦的支持者在广播电视中铺天盖地播送着这句口号：「是—是—不—是」（Da-Da-Nyet-Da）。同样韵脚排序的传单则在每个街角发送。本质上，这是后苏联俄国的第一场选战。叶尔钦几乎得到了每一张他想要的票：俄国人对四个问题全都答「是」，但第三题的差距很小。宪法法院裁决，提前选举需要取得全体合格选民的多数同意，而不只是参与公投的选民，第四题也没达到这个条件，即使投「是」的人数两倍于「否」。叶尔钦宣布获胜，但他并不具备安排议会改选的法律基础。

就在公投过后数日，叶尔钦将他的副总统亚歷山大．鲁兹科伊将军（Gen. Alexander Rutskoi）免职，因为副总统支持国会一方，同时开始推动内阁认定的重要措施。其中之一是对俄国刑法与诉讼法进行一连串更改，让它们符合欧洲最低标准，包括使用或不当使用生化武器的刑罚、绑架入罪化，以及同性合意性行为除罪化。註191所有这些变更都是俄国成为欧洲理事会会员的必要条件。但这项立法未被大多数人注意，就连监狱当局都没注意到，它们疏于指示典狱长释放被控鸡姦的男性。因为当天还有更重大的新闻：叶尔钦公布了新宪法草案，并邀请联邦各加盟共和国开始提交修正案。註192

一星期之内，俄罗斯的政治格局就又退回到公投前的状态：持续且缓慢恶化的危机。人民代表自行提出了宪法草案，至少有两部。但这些文件全都没有机会取得政府所有部门的充分支持，以开启为这片国土制定根本大法的程序。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叶尔钦颁布命令解散国会，并预定在十二月十二日重新选举。国会拒不承认这项命令，转而指定鲁兹科伊将军为新任总统。就在八月政变终结苏联仅仅两年后，歷史重演成了一齣B级片。这时架设路障固守白宫的是反对叶尔钦的一方—数百名男子和一些妇女，他们的支持者则在外面聚集。这个国家又一次同时有两人自称为总统。再一次，自认为拥护民主的人们支持叶尔钦，他们认为叶尔钦对政敌拖延了太久才採取行动。要是他们有任何恐惧的话，他们怕的是叶尔钦无法贯彻到底。服务于全国首屈一指、站在新兴企业家阶级立场的大报《工商日报》（Kommersant）之年轻记者维若妮卡．库茨罗（Veronika Kutsyllo），当时正与另一群记者一起待在白宫里：

午夜的钟声敲响前，我们得到机会在餐厅拿些咖啡，并且讨论情势。我们的结论是：所有人长久以来都在热烈期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总统终于违反了宪法（「他把宪法踩在脚下」我做了这点补充说明），这意味着依照宪法第六修正案第一百二十一条，总统已被自动免职。鲁兹科伊因而成为总统，国会也满意了。但显然叶尔钦不会退让。这就产生了僵局。他需要採取下一步行动，必须是决定性的行动，但会是什么？我们爱好和平的领袖肯定不会想要动用武力把代表赶出白宫。註193

一九九一年政变暴露了苏联社会契约的瓦解，而这个空缺还没被填补上。俄国公民仍然携带着封面印有镰刀与鎚子的苏联护照，支付绘有列宁侧面像及苏联国玺的苏联卢布购买食物，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国名。它叫俄罗斯吗？俄罗斯联邦？宪法仍然称这个国家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宪法是要被踩在脚下的，而叶尔钦最重要的支持者—新生代的新闻记者们认为，他做这件事的魄力还不够。

即使叶尔钦用了几个月时间斟酌解散国会这一步，他的准备仍不比两年前的政变策划者充分多少。要是人民代表完全遵循宪法规定而拒绝解散，叶尔钦也缺乏行动方案。更糟的是，反对他的一方与军方、警察、国安会的关系显然更密切。而且不同于一九九一年的叶尔钦，此刻架起路障守在白宫里的男人们（还有一些妇女）持有武器。他们开始将武器发给街头的支持者。同一时间，国会表决通过法案可对叶尔钦的重要支持者判处死刑。内阁的回应则是切断联繫白宫的电话线。註194

双方僵持了将近两週，期间不时被愈发恶毒的公开声明打断。宪法法院院长和俄罗斯正教会居间安排谈判，但谈判破裂。十月三日，国会的武装支持者们冲入莫斯科市长办公室和联邦电视中心。电视画面一度变黑—或者应该说变灰—并附上白色字体的公告：「第一频道和第四频道的播送，由于武装暴徒强行闯入大楼而中断。」将近一百人在进攻电视中心期间丧生。鲁兹科伊将军指挥的这些武装暴徒接着又冲入通讯部、海关局及其他联邦办公大楼。此时重返内阁担任经济部长的盖达尔发表广播演说，再次呼吁公民们像两年前一样，站出来保卫叶尔钦。十月三日晚间，莫斯科人开始走上街头。内阁之所以动员公民，是因为无法确信军方会站在自己这边：没有法律或势力能驱使军方这么做。

然而这次，军方选边站了，选择支持叶尔钦。十月四日早晨，战车在白宫前停下。早上七点，战车瞄准较高楼层开火射击，显然是为了给予人民代表及其支持者撤离建筑物的选项。尽管如此，当军队终于强行破门而入，他们还是寻获大约四十具尸体。二十名军人在进攻中丧生。白宫一直延烧到入夜时分，方圆数英哩外都能看见火光，远远高过邻近

地区的所有建筑物。天亮时，它看上去就像颗巨大的蛀牙。总计一百四十六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还有至少两千人被捕。註195

叶尔钦在十二月安排了国会选举。同一天也要对他的俄国新宪法草案举行公民投票。法案内容将不会交付国会讨论，因为国会在选举完成之前并不存在。这一年半，几乎可说是自苏联终结以来，叶尔钦第一次牢牢掌握权力。他掌握权力的基础不是法律，而是武力。但叶尔钦能够诉诸武力这件事，源自对俄国社会的一种全新理解，即使在这次被称为「白宫处决」（The Execution of the White House）的事件刚发生过后，任何人一时都还看不清这种理解的本质。

*

阿鲁图尼扬注意到，白宫处决事件发生后没多久，人们就开始把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的事件混为一谈。两套路障、两群藏身白宫的政治人物、两次电视画面变灰，以及两套死亡与逮捕全都合而为一。这一切都做为「政治」而安顿在记忆里，白宫烧焦的废墟则凸出于莫斯科地景，每天提醒人们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在政治之中。人们看到它，就会想要离政治愈远愈好。

玛莎的祖父一度是叶尔钦的狂热支持者，这时在政治上变了心。如今他把时间都用来阅读新兴的极端民族主义报刊，这在政治光谱上近来以「红褐派」闻名，结合了共产主义与褐衫队（纳粹冲锋队）的狂热。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开始高声朗读反犹太的文章段落。塔蒂亚娜将这种行为诊断成衰老，对女儿说，这就是上了年纪的悲剧：一生都条理分明，即使一向安静地反对共产党，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如今却自己去跟那些不只是棕色、而且还是红色的人们站在同一阵线。不过更重要的是，在对政治的短暂热恋过后，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如今既愤怒又幻灭，而「红褐派」媒体正是他对政治表达憎恶最直接可用的载体。

叶甫根妮娅不再参与任何政党。在叶尔钦废除刑法的鸡姦罪条文、理由却与俄国真正的男女同性恋无关之后，同性恋运动也突然失去方向。她决心抵制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选举。选举这个主意显然是为了创造一个听话的国会，强行通过闭门起草的宪法，而她不愿与其中哪一件事扯上关系。但如果要决定投票给谁的话，她会选择弗拉基米尔．季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及其所属的自由民主党。註196该党的政纲乃至季里诺夫斯基的公开声明，既不自由、更不民主。西方媒体称他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俄国人则更倾向将他看作小丑或说真话的人。

除非我们能收復俄国的歷史疆界，至少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存在的

疆界，或是符合一九七七年苏联宪法的疆界，否则我们就会逐渐堕落和灭亡。……这就是西方想要的。西方害怕我们，这种形势必须在俄罗斯復兴之中充分运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被指控为「法西斯分子」、「恐吓其他民族的希特勒」。我们被人惧怕了一千年。这正是我们的资本。註197

一九九三年一场演讲中的这段话，还有其他许多类似言论——季里诺夫斯基是一名多产的演说家——听来当然像是极端民族主义。但他的演说既不尽然如此，也不仅只是如此。歷经重建时期要求的多年灵魂探索，以及叶尔钦时代枯燥乏味的经济与法条辩论之后，它们承诺要将一切回归简单明瞭。它们洋洋得意地反政治。

倘若叶甫根妮娅和鲍里斯．米哈伊尔洛维奇只是在聆听那些逗弄极端民族主义与法西斯言词的人，那么，杜金则是直溯本源。他对希特勒的哲学及治理体系愈来愈着迷。他制作了一套名为《世纪之谜：第三帝国神祕主义》（The Mysteries of the Century: The Mysticism of the Third Reich）的纪录片，并亲自配音，这是一部混合了档案研究与传闻的细緻探讨。第一集提问，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取得「古代知识」，由此促成原子弹发明。杜金也公开质疑：纳粹撒旦崇拜行为的证据，是否有可能从纽伦堡大审的文字纪录中被删略了。这部影片暗示西方阴谋隐匿希特勒力量的真实性质，同时大概也承诺要揭示出一个幻灭的社会如何能被带领团结起来。「满街都是失望的德国人，随机进行着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一九三○年代前期柏林片段的旁白解释：「但某种魔幻的催化剂已在这群大众中间落下一滴，混乱很快就会变为秩序。在这个趋利决策与过时宗教教义的荒废世界中失败的任何人，都会得到转化。他会跟从圣杯，圣杯将赋予他支配全世界的力量。」画面随即切换成德国人列队行进，举臂行希特勒式敬礼的片段。註198这套三集的迷你剧一九九三年秋天在俄国两个最重要的联邦频道播放，而在萤幕上每次出现几分钟、浏览着貌似档案文献之物、述说神祕主义与支配世界故事的杜金，从此成为知名人物。

选举当夜，全国最重要的电视频道都在现场转播投票结果。百分之六十选民支持新宪法——恰好足够按照叶尔钦在九月命令所设定的极低门槛，令它成为全国根本大法。而在这场极其短促的选战里能够赢得选票的十三个政党之中，八个政党的得票数足以取得国会席次。季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以百分之二十三稳居领先。盖达尔领导的执政党——俄罗斯选择党，得票率百分之十五点五。共产党则以百分之十二点四得票率名列第三。「俄罗斯，你们疯了！」受邀上节目担任客座评论员的着名作家尤里．卡利亚金（Yuri Karyakin）不禁咆哮，然后起身冲出摄影

棚。註199

註160：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註161：Zbigniew Brzezinski,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90), pp. 41-102.

註162：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163：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註164：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 465.

註165：前引书，p. 391。

註166：Wendy Z. Goldman, Women, State and Revolution: Soviet Family Policy and Social Life, 1917-1936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註167：Dan Healey, Homosexual Desi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 and Gender Dis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註168：Viktoriya Sakevich, “Chto bylo posle zapreta aborta v 1936 godu,” Demoskop Weekly, no. 221-222 (November 7-20, 2005), http://demoscope.ru/weekly/2005/0221/reprod01.php（二○一六年二月七日浏览）。

註169：Mie Nakachi, “Replacing the Dea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1944-1955,”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註170：Sakevich, “Chto bylo posle zapreta aborta v 1936 godu.”

註171：其实我就是《莫斯科共青团报》（Moskovsky Komsomolets）那篇报导提到的两位女同性恋者之一；另一位是来自旧金山的社运人士茱莉．朵夫（Julie Dorf）。同时，因为柯蕾特．舒尔曼从苏共中央委员会打电话给我，所以我也见证了其中一部分谈判过程。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她在纽约市向我讲述了整个事件经过。

註172：Yegor Gaidar, Dni porazheniy i pobed (Moscow: Alpina, 2014), pp. 58-59.

註173：前引书，p. 93。

註174：Zaklyucheniye Komissii S’yezla narodnykh deputatou SSSR po rassledovaniyu sobytiy, imeushykh mesto v g. Tblisi a aprelya 1989 gola, http://sobchak.org/rus/docs/zakluchenie.htm（二○一七年五月三日浏览）。

註175：Vadim Bakatin, Izbavleniye ot KGB (Moscow: Novotni, 1992), pp. 75-82.

註176：编按：两处原文记为一九九○年，译文更正。

註177：“S’yezd narodnykh deputatov i Verkhovny soviet RSFSR/Rossiyskoy Federatsii (16 maya 1990-4 oktyabrya 1993),” http://www.politika.su/gos/ndrs.html（二○一六年二月十日浏览）。

註178：Gaidar, Dni porazheniy i pobed, pp. 97-98.

註179：编按：叶戈尔．盖达尔的祖父是共产党儿童文学作家阿尔卡季．盖达尔（Arkady Gaidar），外祖父则是童话採集与转述者帕维尔．巴若夫（Pavel Bazhov）。他的遗孀玛莉亚．斯特鲁加茨卡娅（Maria Strugatskaya）则是科幻小说作家阿尔卡季．斯特鲁加茨基（Arkady Strugatsky）之女。

註180：前引书，p. 123。

註181：前引书，p. 156。

註182：前引书，p. 209。

註183："Federativniy dogovor" (Moscow, March 31, 1992), http://constitution.garant.ru/act/federative/170280/#100（二○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浏览）。

註184：Nikolay Andreev, "Voyna na territorii Rossii—real'nost': Yeltsin vvodit chrezvychaynoye polozheniye srokom odin mesyats po Severnoy Osetii i Ingushetii," Izvestia, November 2, 1992 (Moscow evening edition), p. 1, http://yeltsin.ru/uploads/upload/newspaper/1992/izv12_15_92/index.html（二○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浏览）。

註185：Gaidar, Dni porazheniy i pobed, p. 212.

註186："Chernomyrdin, Viktor, premier-ministr Rossii v 1992-1996 godakh" (biographical article), lenta.ru, https://lenta.ru/lib/14161208/（二○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浏览）。

註187：Mikhail Berger, "Glava rossiyskogo pravitel'stva obeshchayet strane rynok bez bazara," Izvestia, December 15, 1992 (Moscow evening edition), p. 1, http://yeltsin.ru/uploads/upload/newspaper/1992/izv12_15_92/index.html（二○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浏览）。

註188：Gaidar, Dni porazheniy i pobed, p. 281.

註189："Iz obrashcheniya k grazhdanam Rossii prezidenta Borisa Yeltsina," Moskovskiye novosti, March 28, 1993, p. A2, http://yeltsin.ru/uploads/upload/newspaper/1993/mn03_28_93/FLASH/index.html（二○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浏览）。

註190："Vserossiyskiy referendum 1993 goda. Spravka," RIA, April 25, 2011, http://ria.ru/history_spravki/20110425/367914805.html（二○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浏览）。

註191："Zakon no. 4901-1, O vnesenii izmeneniy I dopolneniy v Ugolovnyi kodeks RSFSFR, Ugolovnoprotsessual'nyi kodeks RSFSR i Ispravitel'notrodovoy kodeks RSFSR," http://base.consultant.ru/cons/cgi/online.cgi?req=doc;base=LAW;n=3934;fld=134;dst=100070;rnd=0.1744973356835544（二○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浏览）。

註192：Vasily Kononenko, "Prezident Rossii nachal obeshchanniye peremeny oglasheniyem proekta novoy Konstitutsii," Izvestia, April 30, 1993, p. 1, http://yeltsin.ru/uploads/upload/newspaper/1993/izv04_30_93/FLASH/index.html（二○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浏览）。

註193：Veronika Kutsyllo, Zapiski iz Belogo doma: 21 sentyabrya-4 oktyabrya 1993 g. (Moscow: Kommersant, 1993), p. 19.

註194：Gaidar, Dni porazheniy i pobed, p. 304.

註195：前引书，pp. 300-313；Kutsyllo, Zapiski iz Belogo doma, pp. 111-155。

註196：作者访问叶甫根妮娅．德布里安斯卡亚，二○一三年十一月在莫斯科。

註197：Vladimir Zhirinovsky, The Destinies of Russia (Moscow: RAIT, 1997), p. 144.

註198：Alexander Dugin and Yuriy Vorobyevsky, author-producers, Tayny veka: Mistika Reikha: 1. Ahnener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HKwKNmYoY（二○一六年二月十四日浏览）。

註199：Andrei Sidorchik, "Odurevshaya Rossiya: Kak Vladimir Zhirinovsky pobedil na vyborakh,"Argumenty i fakty, December 12, 2013, http://www.aif.ru/politics/russia/odurevshaya_rossiya_kak_vladimir_zhirinovskiy_pobedil_na_vyborah（二○一六年二月十四日浏览）。

# 第七章　人人都想当百万富翁

对冉娜来说，政治结束于一九九一年。直到那个秋天为止，电视上发生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涅姆佐夫家的厨房—首先是在高尔基市中心那间怪异的木屋，然后是在距离市镇中心几个巴士站之外、派发给他们的那个两房一厨的家。当谈话不是选举与改革时，就以食物和物资短缺为题，由此又立刻导回改革与选举。

当鲍里斯在一九九一年被任命为州长时，他们搬到了城外一处专为共产党菁英设立的村庄中一栋别墅里—令冉娜大感宽慰的是，这座城市不再叫做高尔基或「苦人」了，而是恢復了苏联时代之前的旧名—下诺夫哥罗德。这座村庄的设计，是为了让人感觉到人间天堂处处皆有，因此涅姆佐夫一家人看起来彷彿同时离开了熟悉的时间与空间。冉娜大多数时候都骑着单车环游村庄，在四周葱郁的树林里採野莓，并和她的猫儿安德烈．季米特里耶维奇．沙卡洛夫玩耍。粮食再也不是重大议题了，因为他们有大量的食物。曾经是厨房餐桌上热烈讨论的政治话题，成了鲍里斯宛如咒语般挂在嘴边的一套难懂字眼：「民营化」、「投资」、「基础建设」。这些魔幻的字眼似乎让冉娜的父亲摇身一变成了名人。涌进城市的外国顾问在下诺夫哥罗德克里姆林宫（Nizhny Novgorod　Kremlin）住了下来，这座中世纪城堡如今是鲍里斯的办公室；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与和平工作团顾问在那儿比邻而居。註200新闻记者与外国官员前来观看莫斯科所标榜的「下诺夫哥罗德奇蹟」。

「那么，在这座古老的商人城市里，在这个毫不掩饰自诩为对商业开放的地方，地方官员经由快过全国其他地方的实际经济改革而推动真正的创业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形势？」《芝加哥论坛报》一位特派员在一九九二年九月提问。他的报导褒贬参半。下诺夫哥罗德就在五个月前首次举行了杂货店的公开标售，从那时起，也将全市三千家小型企业的百分之二十二民营化。涅姆佐夫为了解决事业民营化最恼人的问题，而构思出一个别出心裁的计画—商店与餐厅出售时将勾销债务，新业主也不需承担留用旧员工的义务；但每一笔标售的部分收入将存入一笔基金，用于照顾因此失业的人们。同时，民营化也是暂时的—多数情况下，新店主只能确保五年租约，因为他们的事业坐落于次年才会进行民营化的大型公寓楼中。更糟的是，店主的经营能力分别受到新旧基础建设的干扰—苏联时代的独占货运事业控制了供货，税率则逐月变动，一度飙涨到利润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还有，一个美国人开了一家餐厅，却不得使用城市的自来水；有间旅馆的经理，「以欺诈外国顾客为乐，不许他们在餐厅用餐，还往往逕

自拒绝出租房间给他们。」这偏偏是全市唯一一间得到合理修缮的旅馆，因此多数外国访客想尽办法留下来，令自己承受百般羞辱。註201尽管如此，这位记者还是找到了一个惊人的正面范例：原先的市立第十一乳酪店，在全市第一次标售中由员工买下，经过清洁和重新进货，更名为德米特里耶夫斯基（Dmitrievsky），甚至正午时间也不再关店吃午餐了。

退休的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柴契尔（Margaret Thatcher）在一九九三年来访。如同她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的，涅姆佐夫全力投入「一套某些人称作柴契尔主义的激进计画」，传闻传到了伦敦被她听到：

我发现，下诺夫哥罗德的救星年轻得惊人（三十五、六岁），出奇俊美，还兼具天赋的智慧与机灵（两者未必能同时兼具）……

州长和我沿着波克罗夫斯卡亚大街（Bolshaya Pokrovskaya Street）散步。每家商店都是私人所有的。我们每走几码就停下来和店主谈话，看他们贩售的商品。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与莫斯科单调乏味的整齐划一对比更大的了。有一家商店带给我的记忆尤其鲜明。它出售乳制品，可供选择的不同乳酪是我在一家店里看过最多的。我试吃了几种，都很好吃。我也发现它们全都是俄国生产，比英国的同类商品便宜很多。我热切地表达谢意。或许因为我父亲是开杂货店的，我对这些事总是怀抱着信念，当我的话被译成俄语，立即爆出一阵欢呼，有人高喊：「柴契尔选总统！」註202

从那时候起，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店主就在柜檯摆放三幅画像：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柴契尔夫人。註203

来访的外国人还包括一位美国年轻人，他似乎跟随涅姆佐夫到处走，冉娜喜欢这个人，因为他总是在开玩笑。但整体而言，她憎恨父亲的新工作，因为他总是晚回家，没时间陪她做功课。他请求一位经常待在别墅的物理学家友人帮冉娜做功课，但她觉得他的解释令人困惑、无法理解。她开始恳求鲍里斯带她一起去上班，但很快就明白她痛恨这件事：她父亲的工作日似乎都在开车——一个城镇接另一个城镇或一个集体农场再接下一个。每当他开到城镇间的边界时，就停下车来，在引擎盖上铺开桌巾举行盛宴。既然伏特加是每场宴会最重要的元素，冉娜父亲每过一小时，说话内容就变得愈来愈无精打采，到了下午三点就完全无话可说了。

涅姆佐夫多年之后写的回忆录里，说明了这种怪异的饮宴习俗从何而来。最初上任的时候，他的副手是一位更老、也更有经验的政治家；

他对涅姆佐夫说，想被认真看待的话，就得跟自己辖区里的每一位地方头人喝酒，包括大约五百家工厂的厂长，以及大约七百五十个集体农场的负责人。涅姆佐夫将名单减少到四百人，然后开始进行这个和他们每个人共饮一瓶伏特加的计画。大约过了一年，他就明白自己的健康恶化了，他的身体变得永久浮肿，而且大多时候都表现出多数俄国人熟悉的酒精中毒症状。他也留意到自己吸收了苏联政治建制的典型心态，那就是怀疑任何不喝酒的人。註204

在某种意义上，涅姆佐夫证明了自己比小女儿适应得更好。她虽然很快就习惯了别墅，但她就是无法跟如今早上载她去上学、长久以来的共党职官用车—黑色伏尔加轿车—共处。她请求在校门口外大约五百码的地方放她下车，即使人人都知道她是州长的女儿，也期望她有专人接送。即使冉娜很高兴自己的母亲再也不必花时间奋力取得食物，可是别墅里食材应有尽有的模样却让她不安。而在假日—新年、胜利日，还有每年十一月的伟大十月革命纪念日—门前臺阶上还会出现某些奢侈得可怕的东西，像是一整头烤乳猪，彷佛有双苏联特权机器看不见又斩不断的手拿到那儿似的。

*

在冉娜迟迟难以接受汽车和烤乳猪的同时，谢廖沙某天一觉醒来就失去了它们。他的祖父仍然领导着一个政党、仍在委员会任职，但在一九九一年，他和整个戈巴契夫官僚一样，在此时的国家机制中变得无足轻重。谢廖沙的父母在那年离异，他的父亲搬走了。如今一切都大不相同了。

谢廖沙转了学。他原先读的学校就在社区里，那儿的同学是其他出身沙皇村的孩子，白白胖胖、满头金髮。每天早上都有好几辆伏尔加轿车停在大楼旁—在一个打从一开始就让谢廖沙想起电影监狱场景的地方—放他们下车。课间休息时，学童们在学校穿堂绕圈子走路，男女配对牵着小手。要是有孩子在上课时间要求上厕所，他也同样要跟另一位异性同学一组，那位同学得在厕所外面看守。这样的异性配对是一种同侪控制制度：孩子们实际上不能一起进厕所，由此确保两人无法串通旷课。让孩子们和异性一起绕圈子走路—在那样的年纪，异性不可能成为朋友—会让他们厌烦到听话。

谢廖沙的新学校位在混乱的莫斯科市中心一栋破败的大楼里。学生不穿制服，不列队行进，其他方面也都不像谢廖沙以前的同学。第五十七中学长久以来一直是莫斯科的自由思想绿洲—这所学校在旧政权时期是一所数理高中，为了鼓励培育出有助于苏联军工复合体的聪明学生，意识型态的控制在这里稍有放松。到了重建时期，这所中学获准开办小

学教育。谢廖沙这时加入了首批入学的一年级新生。他们的家长有语言学家、作家，还有一位精神分析学者。他们对于一位党内职官子女要来跟自己的孩子成为同学感到焦虑，但后来逐渐接受了他，因为时代应当转变了。

对于谢廖沙来说，进入第五十七中学多少有点像是他祖父酷爱前往的俄式澡堂：一连串不和谐的温暖舒适、过度刺激的高热、再浸入冰冷池水。他喜欢学校的课程—其中大多数的主旨，是希望透过实验，将世界上一切现象分类成「包裹」或「连锁」，意思是集合与顺序，十分清楚易懂。但学校的社交世界却严酷而晦涩。班上区分成不同「种姓」，金字塔顶端是四个出奇聪明又富有魅力的男孩组成。他们设计游戏，这些游戏对他们来说就是世界，由规则与情节支配，唯有设计者及其亲自挑选的玩伴才能参与。谢廖沙几乎没被邀请过。当他被允许可以偷窥一眼时，却看见鬼魂、幽灵和宇宙殭尸。第二层是由父母亲与最顶层男孩的家长们同属一圈子的男孩和女孩—这个圈子是如今感到自信与自由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谢廖沙大致上是被第二层种姓所接纳的，但他感觉到自己与他们有些不同，或许是因为他的语言与习惯来自另一个世界，也或许因为他们的家长对他怀抱猜忌。在谢廖沙心目中，他属于第三种姓，或许只有他自己而已。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属于底层的孩子—被其他阶级称为「不可接触者」的畸零人—要是没被冠上其他更羞辱名称的话，例如流浪汉（bomzh）。这个词是首字母的缩写，用来指称一种新社会现象：无家可归的人。註205

这些十岁孩子所创造的区分是如此僵化而残酷，以至于他们的老师有一天为了教他们《苍蝇王》（Lord of the Flies）的故事情节，而删除了原定的生物课。每个人都印象深刻，但班级动力的运作方式毫无改变。谢廖沙觉得，班上发生的事正是成年人新生活方式的写照。他出生在一个所有人立足点相等，只因自身存在、而不是特地做了什么事就能获得肯定与赏识的小世界。成年人这时对这回事谈论了很多，他们使用的词汇—「势利」与「不平等」—也同样描述了他的体验。

或许正是因为其他孩子不曾在高耸的围墙后面度过童年，谢廖沙觉得自己比其他所有人更像个大孩子—或更准确地说，其实比其他所有人更渺小。就在他终于和班上的两个男同学成为哥儿们后不久，这两个朋友竟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并争风吃醋，谢廖沙为了他的朋友彼此觉得痛苦又带给彼此痛苦，而他却无法减轻甚至理解他们的痛苦，最后在回家后哭着入睡。

谢廖沙的母亲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任教，光靠她的薪资无法维持生计（这在过去多半无关紧要，因为党内职官的分配体系提供了社会安全网）。但她与其他教授不同，她还有在沙皇村的大公寓，此时，她收留

了一位比利时男人寄宿。他有一辆车，他付一美元请谢廖沙帮忙洗车。这笔钱足够在红场的一个新摊位买两罐可口可乐，从第五十七中学走路十分钟就到。仪队仍然踢着正步走向他们在列宁陵墓前的岗位，并且纹风不动地肃立于岗位上，但人们不再大排长龙等待瞻仰躺在水晶棺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白宫处决事件之后，叶尔钦命令仪队撤离，一九九三年十月六日，最后两名值勤士兵在离开时漫不经心地挥手道别。註206一九九○年时，谢廖沙和前一间学校的同学们，在红场入口处的歷史博物馆加入了儿童十月团。如今他在这里请新同学喝可口可乐。那感觉就像自由。

谢廖沙的祖父看来也经歷了类似的事。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不再拥有高耸围墙后的中央委员会别墅，但他在科学院村被核发了一栋别墅，只在特权阶序上稍低一阶。这间房屋按照苏联标准，乃至大半个世界的标准来说都算是豪华的，但谢廖沙从未见过比这更小的房子。尽管如此，它仍坐落在一片充满百年松树的土地上，这些树木加上庭院的规模，让它看来就像是方圆数英哩之内唯一的房屋。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一直都想要一片拥有池塘、池中有鱼的庭院，这时他的儿孙们正不眠不休地将装满手推车的泥土推到外面去，而有朝一日要成为池塘的地方则愈挖愈深。在过去，挖土和推车的工作会有义务役军人代劳，但如今，谢廖沙理解到，雅可夫列夫一家的生活跟一般人没有两样，这正是祖父一向更喜爱的生活方式。

谢廖沙八年级的时候，他父亲和一些朋友决定为子女开办一所家庭学校。谢廖沙和第五十七中学的孩子们断了联络。往后四年，他只在家庭学校里和自己的家人及另外两名青少年说话。他们并没有成为朋友。除了祖父之外，在这世上没有朋友或别人能理解他。

*

在廖沙看来，经济改革是从肥皂开始的。廖沙的母亲大量积聚了当时所谓的「家用肥皂」—坚硬、边缘尖锐的块状物，看似绿棕色的砖块。买不到味道更好闻、外型更好看的进口替代品之前，这些高硷性肥皂可以用来洗濯衣物、碗盘、皮肤和头髮，甚至可以做成洗鼻剂，据说能治感冒。青少年说它能消灭粉刺。有些人说它能烧掉疣。它大概有办法杀掉它所接触的一切—使用「家用肥皂」洗过头髮之后，人们还要用醋再洗一次，才能防止头髮失去生命而掉落。「家用肥皂」是加林娜在一九九一年使用配给证所能取得的唯一物品，因此她大量囤积。这些块状物在他们家的浴室里堆砌成第五道墙。

同一年，廖沙看到前所未见的事物：一只只有鸡腿的鸡肉。直到那时为止，「买只鸡」的意思都是把一个看似橡胶的泛蓝物体带回家，加

林娜将它放在瓦斯炉火上煮，烹调前先将大量残留的羽毛烤焦。如今她带回家的是全鸡腿，每一条几乎都跟一整只鸡一样大。她说这些是「布希腿」（Legs of Bush），接着解释，布希是美国总统的名字，他和戈巴契夫达成协议，把鸡的暗色肉部分送给俄国，那刚好是美国人不爱吃的。这就是大多数人说的「布希腿」故事，跟事实也只有些微出入。一九九○年，在谈判多年苦无进展之后，老布希与戈巴契夫终于签署了贸易协议。协议使美国制造商能向苏联出售谷粮和鸡的暗色肉，这确实是俄国人更喜欢、而美国消费者特别避忌的。可苏联并没有现金购买这些谷粮与鸡腿，因此布希总统在一九九○年十二月向苏联提供贷款，这就使得鸡的暗色肉在俄国以他为名，一直持续到他卸任总统多年以后。註207

「布希腿」标示着更好时代的开端。在它们出现之前，索利卡姆斯克一度能买到的唯一食物，就只有甘蓝菜罐头，排队购买的人潮延伸到几个街区之外。在「布希腿」之后，其他食物品项开始出现，廖沙的母亲也买得起其中几种。当加林娜服务的学校不再发薪资给教职员，她就在另一所学校找到工作。这时，她和男友谢尔盖结婚了，他的薪资帮助一家人度过难关。谢尔盖是一名矿工。许多矿工也领不到薪资，因为他们和教师一样由国家僱用，而国家遵行盖达尔的货币紧缩政策，发不出现金。谢尔盖工作的矿场早已民营化，这就意味着他能领到薪资—只要他能在上工前保持清醒够久。

跟廖沙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酗酒家庭，看起来落入了极度绝望的境地。有些人开始捕杀流浪狗为食。以前睡在廖沙家过道上的那些孩子们开始自己想办法赚钱。年纪大约五岁和六岁的两兄弟为当地十来岁的男孩们服务，那些人一次付一卢布，后来一次十卢布，要两兄弟帮他们口交。这点钱几乎买不到东西。

丰衣足食的祕诀在民营事业之中，这点事实倒是很清楚。当加林娜服务的学校现金用完后，校方就不再支付薪资，但继父的矿场资金缺乏时，公司仍设法以实物支付薪资。谢尔盖带着味道怪异的瑞士糖果—想必是甘草糖—还有泡在盐水里的小香肠金属罐头回家。加林娜的一位朋友也是歷史教师，他辞去教职，成为索利卡姆斯克纸厂的经理，这是俄国第一批民营化公司。註208在这个报刊復兴的时代，这家公司是全国最大的新闻纸制造商之一。它的办公大楼很快就翻修得美轮美奂，十分醒目。加林娜的前同事成了有钱人。加林娜一家人每次到他家晚餐，都会看到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食物与用品—钢笔、笔记本、碗盘，还有廖沙通常以为是纪念品的其他东西。

和所有俄国人一样，廖沙一家在一九九二年也得到了民营化凭证，这是一张大约五英吋乘以三英吋大小、有浮水印的证书，中央的椭圆框

里是莫斯科白宫的图像。他们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决定要出售、投资或忽视这张凭证。他们用全家的三张凭证交换了多卡披萨店（Doka Pizza）的股份，这家新餐厅的广告张贴在全城各个广告看板上。但他们从未获得任何分红。加林娜的一些朋友对她说，她其实应该跟他们一样，买下其中一家新近民营化的石油公司股份，那些股份再过几年一定值钱。

在这个充斥凭证、民营公司和投资的新世界里，有个故事引起廖沙的注意。一家名为MMM的公司用三十二支广告渗透了广播电视播送时段，内容都在介绍一个叫作廖尼亚．戈鲁布科夫（Lyonya Golubkov）的土气中年男子的理财生涯。一开始，廖尼亚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手上急速丧失购买力的卢布，然后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将一文不值的现金转换成MMM的股份，靠着红利生活。这使得他能买一双黑色皮革牛仔靴、一件毛皮大衣送给太太，还送她车子和房子。这位在一开始的广告里相较于廖尼亚显得太高又太年轻的妻子，如今身穿粉红色家居服坐在椅子上吃着软糖，样貌不再妩媚，而是成了完美的家庭主妇，廖尼亚则浑身散发着新得到的理财自信。廖尼亚的哥哥是一位矿工，他批评廖尼亚无所事事，但廖尼亚自有一套说词，主张自己绝非懒惰虫，而是用血汗钱赚钱的精明投资人。当廖尼亚买到机票去美国观赏俄国和巴西国家队的足球赛时，和他并肩坐在观众席的哥哥，终于泪流满面承认廖尼亚说得对。註209

一如任何金字塔骗局，MMM终究也倒闭了，事情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将毕生积蓄交给这家公司的人多达千百万。当MMM的创办人因为逃漏税而被逮捕，数百位投资人在莫斯科的公司总部前扎营露宿要求放人，也要求让他们持续信任的公司復业。而在索利卡姆斯克，九岁的廖沙大受打击：他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廖尼亚．戈鲁布科夫，但这个人如今从电视上消失了。

*

金字塔骗局到处充斥着。一家名为希望者投资（Hoper-Invest）的公司主打一支片长五十二秒的广告，一名兴高采烈的军官走进一间外观时髦的办公室，那儿有两位身穿商务洋装、长相几乎一样的女性倒茶给他喝，同时将分红付给他。註210千百万人在全国各地二十四个分公司认购了希望者的股份。註211另一个自称查拉银行（Chara Bank）的庞式骗局则捨弃电视广告，改用口耳相传，都市里受过教育的阶层将自己的积蓄交付给它，换取金额可观的每月分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熟知内情。这些公司发出有浮水印的证书，外观不多不少就跟国家的民营化凭证一样正式，MMM承诺靴子、轿车和美国之旅；希望者投资则以想像中走出来的西化办公室、员工的外貌与礼仪当作愿景来劝诱；查拉银行担保

能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享有无忧无虑的未来；政府则说，所有人都能富裕起来。一九九二年八月，民营化工作总负责人阿纳托里．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宣告，假以时日，每张凭证都会与两辆伏尔加轿车等值。註212所有这些承诺听来同样新颖又怪诞。

一九九○年代初期，列夫．古德科夫试图理解俄罗斯人与财富之间产生的新关系。他发现，调整期望是一种创伤过程，这个过程在世代之间拉开了差距。在战后苏联，每一个接续的世代都生活得比上一代人稍微富裕一些。同样一些志向从父母传给子女，中间只略经调整。多数苏联公民都希望，他们自己或成年子女能从共居公寓里的一间房，晋升到一间自己的一房一厨公寓，再到两房一厨。幸运的话，他们最终还能再多拥有一栋别墅，和一辆国产的拉达轿车。除了菁英阶层之外，没有人梦想拥有一座宫殿或伏尔加轿车━菁英们安稳地藏身于七道围墙和七道门锁之后，不为人所见。现在，俄罗斯人在电视上看到的大多数内容━广告、政府公告，甚至似乎是人人必看的拉丁美洲肥皂剧━都在对他们说，要渴求更多。唯有电视上仍在播放的苏联电影，能让疲惫的双眼和心灵，在往昔令人宽慰的朴素装饰中得到安歇。

古德科夫和他的团队开始不只向调查的应答者询问他们的收入，也询问他们的生活所需得花费多少钱、宽裕生活的所需又是多少。一项极其庞大的研究━共有将近七万五千位应答者━显示，真实所得稳定成长，但每个人对富足生活所需花费的认知也随之提高。后来，有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发掘俄国统计资料之后得出同一个结论：在整个一九九○年代，平均生活空间扩充了（从每人十六平方英呎增加到十九平方英呎），以观光客身分出国旅游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多，拥有电视、吸尘器、冰箱和洗衣机的家庭增加了，私人拥有的车辆也增加两倍。註213相较于一九八○年代苏联的生活，俄国人其实更富足了━但他们觉得自己贫穷。

一般常识以为某些人变得极为富有、其他人则沦入赤贫，但古德科夫的研究资料无法证明这点：资料看来像是贫富差距仍维持稳定，甚至略有缩小。的确，某些遮蔽了苏联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屏风被撤除了，让人们得以看到其他富人━如果只是因为原有的祕密分配中心多半关闭之后，而富人如今更有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上街购物的话。但这种揭露无法解释古德科夫所看到的结果。他聚焦于如今得以出国旅游的千百万人：到了一九九五年，将近百分之十七的成年人曾离开俄罗斯去过外国。这些人都觉得自己不只是穷人，还是来自贫穷国家的人。随着这种自我认知巩固，古德科夫的某几项调查结果：「你赚多少钱？」和「你维持生计需要多少钱？」这两题答案之间的差距也缩小了。这并不表示人们觉得自己赚得够多，而是觉得情况不可能更坏了。他们对自己需要

多少钱才能活得宽裕的想法，则持续遥不可及。

即使国家似乎正处于跟私营事业热恋的动盪时期，古德科夫的常用问题之一—「谁在俄罗斯活得富裕又快乐？」—仍然引来了老一套的苏联时代答案：无赖、骗子、官僚、罪犯和企业家。幸福与财富都属于他者。被问到觉得自己赚的钱比其他技能和经验相当的人更多还是更少，三分之二的应答者说「更少」—这个统计上的不可能（statistical impossibility），使得俄罗斯人注定陷入妒忌。註214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在MMM公司倒闭之时，希望者投资也停止支付红利，卢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贬值了四分之一。这三件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这年稍早发生的另一件事有关：政府放松了货币政策，开始印行卢布—这对金字塔骗局是一大助益，同时也让卢布价格注定下跌。註215 多数俄罗斯人的核心信念就这样得到确认：政府并不比自封的投资王更值得信任，经济困难与社会不正义是人生唯一确定的事。

*

阿鲁图尼扬这时开始出国参加培训研习：西方精神分析学家仍然慷慨提供时间与专长，帮助他们缺乏经验的同仁。在其中一场以英文进行的研习上，她注意到自己如今能分别「嫉羡」（envy）与「妒忌」（jealousy）这两个词的意义了。前者是一种「渴望他人已拥有而自己却缺乏」的情绪；后者则是「某人将属于自己的事物占为己有而憎恨对方」。当某人拥有的金钱比你更多，你的感受会是嫉羡；当你觉得他的这些钱曾经是你的或应当属于你，你的感受会是妒忌。这两种情绪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是坏的体验，但嫉羡也有可能产生建设性—它可以鞭策你行动—甚至会是仁慈的，例如你嫉羡某人拥有慷慨待人或创造成效的能力。当代俄国并不具备这种区分，这是有理由的—三代以来，一切事物都被说成是人人共有的，拥有更多则被说成是可耻的。妒忌是唯一合宜的情绪。

或许人类生来就是妒忌的—这种情绪源自一种基本生存本能。如今的情况彷彿阿鲁图尼扬的案主全都脱卸到只剩最纯粹的自我，只能感受到最基本、最痛苦、最强烈的情绪。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抢了。财富的视觉象徵是某人必定在外国私立学校看过的覆盆子色运动外套—搭配胸口袋上的金色刺绣标志，成了新兴炫富阶级的制服。另一个象徵则是宾士车。这两种极端富裕的符号，一如极端财富本身都极其罕见，简直像是幽灵一般，但只要看见区区幻影就能引发激烈的妒忌。炫富在过去始终是不可接受的行为。阿鲁图尼扬的母亲记得自己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和史达林的女儿同班。她说，史达林的长女是全年级穿着最难看的学生，她的驾驶也总在距离学校两个街区外放她下车。这就是苏联对外彰

显的禁欲精神，冉娜幼儿时—当特权发生在她身上以前—必定也吸收了这样的精神。引人注目的新财富是双重羞辱，不仅因为它在审美上违背社会常规，还因为这些新兴富人不同于过去的共党职官，不具备拥有权利所需的资格：他们是谁？凭什么富有？

巨富少得几乎难以觉察这点，更让问题火上加油。只有一件事比感觉像是个失败者更糟，那就是感觉像是个身为一整个社会的失败者其中之一。妒忌几乎不会表现成妒忌。浮上檯面之前，它通常都转化为另一种不同情感—觉得被利用、觉得愤怒、觉得恐惧。

有些人具备充分理由觉得恐惧。据说，新兴事业家们无论左派右派都在互相残杀。对大多数人来说，暴力和巨大财富是同等抽象的事物，但害怕在火拼时遭殃的恐惧，却并非全无根据。阿鲁图尼扬的一个朋友，有一回大白天里就在莫斯科街头闯进枪战现场。和阿鲁图尼扬共享同一间办公室的，是一位认知行为治疗师，他们一起租用一间小公寓，轮流在那里与案主见面；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终于鼓起勇气，请求其中一位身为企业家的案主，前来晤谈时先把枪放在玄关衣柜里。

阿鲁图尼扬第一个来自企业家新世界的案主并没有带枪。他和刻板印象恰好相反，是个出身教授家庭、有教养的年轻人，背景与阿鲁图尼扬自己并无二致。他不愿透露自己从事的确切行业，但阿鲁图尼扬推测与石油相关。他前来求助是因为他开始突然暴怒。只需要几次晤谈—但阿鲁图尼扬后来才意识到，次数太少了—就可以得出结论：愤怒来自潜抑性焦虑（repressed anxiety）。过没多久，这个男人决定停止治疗。碰触自己的情感是一个风险过大的提议。「我是个走钢索的人，」他解释：「想想看，要是我停下来思考，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他可能会显得软弱。他甚至可能会哭。勃然大怒并（举例）把某人打成肉酱，肯定是安全许多的选项。阿鲁图尼扬和这位案主都不曾提起他可以改行，从事其他危险性显然较低的工作。在新的现实里，每个人都被预设成想要当事业家。

*

玛莎的母亲已经很久不再从波兰进口贴身必需品了。她现在经常旅行到中国，购买漆皮手提包。它们看起来与众不同，玛莎觉得很难看，但某种时尚机遇的乖僻，却让它们成了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间俄罗斯女性「必须拥有的」包包。塔蒂亚娜如今在加里宁大街（Kalininsky Prospect）有了自己的摊位，那是一条宽敞的市中心大道，两旁各有一列高楼，在一九六○年代一度显得时髦。她在摊位贩卖手提包，也供货给其他摊商。

有一天，玛莎走进地下铁车厢，注意到车厢里的每个女人都有一个

她母亲一此外没有别人一进口的手提包。那班地铁列车上的每一个女人都有。「我们一定很有钱。」玛莎想着。但富有的印象一点都不符合她和塔蒂亚娜的生活方式。她们还是住在两房一厨的屋宅里，而不是宫殿。她们在浴缸里亲手洗衣服。玛莎在学校还是被霸凌。因为年纪比所有其他同学都小、因为她穿的衣服，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别人。要是她们真的有钱了，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不是吗？

註200：Alessandra Stanley, “Nizhny Novgorod Journal: Camelot on the Volga, with 2 Bold Antagonists,”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94, http://www.nytimes.com/1994/04/29/world/nizhny-novgorod-journal-camelot-on-the-volga-with-2-bold-antagonists.html（二○一六年二月二十日浏览）。

註201：Howard Witt, “Capitalism Is a Pain in Russian Market,” Chicago Tribune, September 10, 1992,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1992-09-10/news/9203220563_1_reforms-heart-attacks-infarction（二○一六年二月二十日浏览）。

註202：Margaret Thatcher, Statecraft: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pp. 65-68.

註203：Stanley, “Nizhny Novgorod Journal.”

註204：Boris Nemtsov, Ispoved’ buntarya (Moscow: Partizan, 2007), pp. 38-39.

註205：编按：Bomzh是「无明确居所」（bez opredelyonnogo mesta zhitel’stva）这句话的缩略—在户籍登记制度开始瓦解之际，由苏联法律与秩序发明出来的。

註206：John-Thor Dahlburg, “Yeltsin Withdraws Honor Guard from Lenin’s Mausoleum: Moscow: The Soldiers’ Ritual Was a Red Square Fixture,”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7, 1993,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3-10-07/news/mn-43289_1_honor-guard（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207：Charles J. Abbott, “Bush, Gorbachev Agree on U.S.-Soviet Grain Pact,” UPI, June 2, 1990, http://www.upi.com/Archives/1990/06/02/Bush-Gorbachev-agree-on-US-Soviet-grain-pact/9662644299200/; Andrew Rosenthal, “The Trade Decision: Bush, Lifting 15-Year-Old Ban, Approves Loans for Kremlin to Help Ease Food Shortag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90, http://www.nytimes.com/1990/12/13/world/trade-decision-bush-lifting-15-year-old-ban-approves-loans-for-kremlin-help-ease.html; Nadia Arumugam, “The Dark Side of the Bird,” Slate, January 26, 2011, http://www.slate.com/articles/life/food/2011/01/the_dark_side_of_the_bird.html（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208：Solikamskbumprom website, http://www.solbum.ru/eng/company/（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209：“Lyonya Golubkov: vse reklamniye rolik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Fi-bNXHMo&ebc=ANyPxKrdpUczITDhf4SwmrGHlzXMlbGCbnLsG1fiu5jLmt4to4D2F2Xuzxj07BEt3srIoSi
○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210：“Hoper Invest 1994 god, reklam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cIjMncME0（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浏览）。

註211：Vasily Fedorov and Aleksei Ivanov, “Anatoly Chubais: Nu vot ya i v Khopre!” Kommersant-Dengi, December 14, 1994, http://www.kommersant.ru/doc/18410（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浏览）。

註212：Dmitry Butrin, “Itogi kapitalisticheskoy desyatiletki,” Kommersant-Vlast’, March 3, 2002, http://www.kommersant.ru/doc/312965（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浏览）。

註213：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A Normal Country: Russia After Commun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 no. 1 (Winter 2005), pp. 151-174.

註214：L. D. Gudkov and M. V. Pchelina, “Bednost i zavist: Negativny fon perekhodnogo obshchestva,” Informatsionny bulleten’ monitoringa,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 31-42.

註215：Yegor Gaidar, “Ot chernogo vtornika k kommunisticheskomu subbotniku,” Otkrytaya politika, January 1995, pp. 25-31, http://gaidar-arc.com/file/bulletin-1/DEFAULT/org.stretto.plugins.bulletin.core.Article/file/4346（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浏览）。

# 第三部　崩解

## 第八章　被压抑的悲伤

一九九○年代中叶，不时造访后苏联国家的西方精神分析学家，为这些在精神分析传统一度断绝的国家中工作的同仁举办了正式训练课程。阿鲁图尼扬参加了在波兰举行的一系列训练课程。她从事精神分析工作差不多有十年了，顶多只差漫无目标的一、两年。如今，她已经有很多年能够自由接触心理学文献了。她也在瑞典治疗师于俄国开办的一所学校里学习心理剧。她是个教养良好、面面俱到的精神分析学家，不再是初学者了，因此她有个能称呼自己的词汇，说明她在新课程开始时遭遇到的状况：自恋冲击（narcissistic blow）。她观察大师们的实务工作，同时意识到自己连人家的一半都不到━并非这些讲师们天生就更能干或聪明多少，而是因为他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前辈又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前辈的前辈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反之，阿鲁图尼扬却站在一片空无之中，觉得自己空虚。她的观念说好听点是过时的，说难听点则是幼稚的。她感受到灼热的毁灭性妒忌：这样的娴熟、流利与深度，本来都应该属于她。

后苏联的精神分析学家缺乏这门专业最重要的资格：他们自己不曾被分析过。德国、捷克共和国与荷兰的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开始为俄国人扮演分析师与导师的角色，俄国人会前往导师们所在的城市接受数週的分析，他们自己的案主则暂时等候，直到他们回国继续执业。即便人在俄国，仍经由电子邮件接受指导。有些同仁指出这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参与者们记得，早年佛洛伊德的门徒也是像这样穿梭往返的。阿鲁图尼扬开始固定前往德国三星期，每日接受分析。她的晤谈以英语进行，对分析师和案主双方来说都不是母语。使用一种对这些情绪陌生的外语来表达情绪，有时似乎就是不可能。其他时候，阿鲁图尼扬则从被迫使用扼要英语予以陈述中获益：不容易发生混淆。随着她分析研究钻研得愈深，她留意到语言的无意识把戏━像是她的梦中出现了她认为自己无法理解的德文词汇━但她能够记住这些字，经由翻译之后，它们正确无误地揭示了意义。

排程固定、间隔时间长的穿梭往返，几乎不适合如此精细又不可预测的工作。阿鲁图尼扬往往在莫斯科案主的分析过程中最不巧的时刻离开，回来时又处于被改变且易受伤的状态，使得问题更形恶化。每星期与导师之间的电子邮件则要求她整理自己。「那该从何说起？」导师在信中会这么说，挑战她对某个出奇困难时刻的诠释。「会不会是因为，

从你自己的分析被剥离开来让你感到沮丧，而你在报复造成分离的那个人？」那个人会是她的案主，而案主在这种局面全然无力自卫。阿鲁图尼扬感到无力自卫。整个俄罗斯似乎也都感到无力自卫。继续努力进行自己的分析，以及对案主的分析，是一种让她勉强坚持住自己是谁的方式。

*

廖沙的母亲鼓励他报名参加全市歷史论文大赛。这是她所从事的那种工作──她毕竟是个歷史教师，而她指望自己的独生子表现得比她更好，一如她的成就远高于自己不识字的母亲。论文题目是「我的家族在二十世纪歷史里的故事」。廖沙觉得这个题目很时髦──媒体公开揭露史达林和古拉格劳改营恶劣作为的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已经过去，往后很久都被经济改革与政治冲突所掩盖，但最近，廖沙和加林娜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家族故事。学校里的老师也都建议，探究自己的根源是赢得学生竞赛的康庄大道。但廖沙几乎没有别的家人，当然也没有什么歷史。他甚至不再冠上家族姓氏：当他母亲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与谢尔盖结婚，她就把廖沙的姓氏从米萨林改成戈什可夫（Gorshkov），父名也从尤里耶维奇改为谢尔盖耶维奇（Sergeevich），彷佛廖沙一直都是继父的儿子。那是场乱七八糟的婚礼，廖沙在婚礼上被告诫不要妨碍成年人的庆祝，那时他就下定决心，他憎恨婚姻，只要还活着就绝不结婚。他的继父在婚前看来是这么有趣的人，会跟廖沙一起连看几小时电视上的流行音乐表演，如今看来却是个沉默、懒惰的酒鬼，就只是茫茫然地坐在电视机前。廖沙决心要憎恨关于继父的一切，尤其他的吃相──彷佛再也没得吃似的。廖沙也憎恨他的新父名和新姓氏。

加林娜说，她可以告诉他一些家族史。她说，廖沙的曾祖父母是十八世纪晚期落脚于伏尔加河沿岸一个庞大德语社群的一分子。註216按照革命的标准，这家人被定为富农（kulak）□□拥有土地和家畜的农民──因而成为阶级敌人。廖沙的曾祖父被剥夺一切财物，从此下落不明。他的曾祖母及其子女则成了新建立的集体农场社员，生活赤贫。在丈夫／父亲失踪两年后，廖沙的曾祖母和子女被安排上一辆载运牲口的列车，和其他德国裔人士一起载往乌拉山区，在索利卡姆斯克郊外一处偏远乡间落脚。他们在那儿和廖沙的曾祖父团聚，在新的集体农场里靠先前未开垦的土地另起炉灶。廖沙的祖母那年十岁。全家人被赶上火车时，有个士兵抢走了她唯一的玩具，一个木头娃娃。到了乌拉山区，当局把她的名字从艾玛（Emma）改成了谢拉菲玛。她在遣送之后未曾受过教育，因此成了功能性文盲。在这场灾难来临前，这家人只说德语，小女孩则运用德文圣经学会阅读。

这个新村庄里的每个居民都是日耳曼人。廖沙听到这段觉得很耳熟

—索利卡姆斯克有一个区域以前叫德国村，即使住在那里的德裔人士在重建时期全都搬走了。他们留下亲手打造的乡村式房屋，小巧又整洁，还有令廖沙着迷的那种有秩序的生活记忆。谢拉菲玛十八岁时，有个来自邻村的青年男子决心娶她为妻。按照加林娜的说法，他的决心是单方面的，而且最后才定论。他是俄罗斯人。他带着谢拉菲玛搬到自己的村庄，她在那儿由于身为德国人和天主教徒而被村民憎恨。她的新丈夫是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但丈夫的母亲是俄罗斯正教徒，没在教堂举行过婚礼就不愿承认谢拉菲玛是自己的媳妇。事实上根本没有婚礼—那是一九三○年代早期，婚姻仍然被当成是布尔乔亚的时代谬误。

谢拉菲玛的新丈夫酗酒，有过很多恋情和性关系—至少还有另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是他太太—同时在党内和集体农场里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他最后当上了集体农场主席，也是最高苏维埃的一员。一九三五年，一辆黑色囚车（voronok）在家门前停下：有人指控谢拉菲玛的丈夫偷窃砖块盖自己家的房子。幸好谢拉菲玛习惯把所有事物整理得井井有条，包括购买砖块的收据，她的丈夫因此躲过牢狱之灾。

一九四一年，谢拉菲玛的丈夫离家去跟德国人打仗，独自和一个小婴儿留在家中的谢拉菲玛则从社会弃儿沦为敌人。她自己的小叔会在半夜喝得醉醺醺地上门来砸破她的窗户，同时叫骂着：「德国人！」

一九四○年代晚期，在苏联政权重新认可婚姻很多年后，随着廖沙的祖父在党内步步高升，他终于登记了自己与廖沙祖母的婚姻关系。谢拉菲玛沿用了丈夫的俄文姓氏米萨林娜（Misharina）。承载着德国姓氏克劳瑟（Klauser）的最后一人，也就是廖沙的曾祖父母，在他出生很久之前就去世了。廖沙看过他们丧礼的照片，也问过他们棺木上装饰着的、在他看来十分怪异的基督教十字架，但没人回答他的问题。这时加林娜解释，她的祖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她的妹妹也记得，谢拉菲玛的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小时候都会在说德语的村庄度过暑假，他们的祖父会用糖果逗他们，让他们愿意开口说几句德语，或朗读德文圣经。谢拉菲玛的父母亲去世之后，就没有人说德语了—她的孩子们现在都不记得怎么说—与克劳瑟家族成员的联繫也断了。他们曾经给廖沙的祖父写过信，有些信从家人的另一处流放地哈萨克写来，其他则从他们在大战期间设法逃去的德国和纽约写来。

谢拉菲玛为廖沙确认了整个故事，并且补充了关于五个子女的个人细节。其中两个女儿—廖沙的姨妈们—如今都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因为她们也和谢拉菲玛一样嫁给酒鬼。其中一个丈夫酒醉后淹死，另一个死于酒精中毒。至于加林娜，廖沙的祖母说，她说廖沙的生父住在彼尔姆，其实是在骗他。廖沙的生父就在索利卡姆斯克—他就是「尤里叔叔」，在廖沙的继父出现后便不再来访。和继父不同，尤里是受过教育

的人，在新经济里如鱼得水，晋升到一家制造公司的经理职位。他来自同样被放逐到这一带的波兰籍犹太人家庭。他已婚，育有一女，比廖沙大十岁左右，任职当地的儿童图书馆。廖沙开始更频繁地前往那间图书馆。他幻想着在还书时夹进一张字条给自己同父异母的姊姊。「你不认识我，但我们有些重要的相同之处。」或是：「我每星期都会见到你好几次，我想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我们很像。」这个计画的安排很不明确—要是有别人找到那张字条呢？—后果也不可预测，因此廖沙始终不曾这么做。

他所思考的若不是身为生父的儿子，就是身为德国人。如今一切都说得通了：他守时、对整洁的执迷、他对所有合理事物的爱好，以及他无法容忍谢尔盖吃喝的声音。廖沙不是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戈什可夫，甚至也不是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米萨林：他是阿列克谢．克劳瑟（Alexei Klauser）。他赢得了歷史论文大赛首奖。

同时，加林娜向萨拉托夫（Saratov）的国家档案馆请求查询，她知道自己的家族是从这座伏尔加区的大城市被放逐的。现在可以这么做了—查询曾被史达林的国家宣告为叛徒、罪犯或人民公敌的家族资讯。档案确认了廖沙的曾祖父曾经「被镇压」—按照当局说法。至于廖沙的曾祖母，她的档案则被放错地方，因而无法提供任何资讯。

*

「得知关于自己的事，是学习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挑战。」研究后苏联文化经验最具洞见的学者之一亚歷山大．艾特金写道。他这段话写的是苏联遗产特有的恐怖之处：

受害者与加害者混杂在同一个家族、族群，以及同一条血缘里……如果说纳粹的大屠杀消灭了他者，苏联的恐怖时期则是自杀。苏联恐怖施加于自身的性质，使得构筑后灾难世界所需的三种能量流动起来更形复杂：力图了解灾难的认知，哀悼受害者的情绪欲望，以及追寻正义、向加害者报復的主动欲望……苏联暴行的自杀本质使得报復几乎全无可能，就连得知都极为困难。註217

重建时期之前，异议歷史学者试图在资讯几乎完全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知晓」这项工作。即使大恐怖随着史达林的死亡而结束、即使赫鲁雪夫选择公开恐怖，但赫鲁雪夫仍先窜改资讯，再将删节过的故事列为机密。当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成为共党总书记，在一九八○年代首次查看其中一部分祕密档案时，他感到震惊、作呕，无法相信—不只是为了发生过的事，也因为这些事是奉党之名，由他的党所干下的。註218

一九八九年，戈巴契夫任命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为新设立的回復名誉委员会（Rehabilitation　Commission）主席，负责审查档案文献，为史达林时代遭受不公正惩罚的人们洗刷污名。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带着比戈巴契夫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开始得知恐怖，既是因为他年纪够大，在党代表大会上听过赫鲁雪夫发表祕密报告，也因为他在伟大卫国战争过后，亲眼看见载运牲口的列车将苏联战俘载往古拉格劳改营。但当他在重建时期研读相关文献时，眼前所见仍令他反胃。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看到史达林亲自签署了四万四千人的死刑执行令。这些人史达林根本不认识，要是真有案卷存在的话，他也没读过这些人的案卷—他就只是签署了这漫长的名单，显然是因为他享受这个过程。註219他看见祕密警察彼此竞争的证据，有正式的竞争—像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前身）下属的不同部门，争先恐后地冲高政治调查的业绩—也有非正式的，像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三名高官带着三千份案卷乘坐火车旅行，喝醉之后展开竞速比赛：谁能最快看完一叠案卷，然后在每个案卷上全都标上字母P。他们完全没细读这些案卷。字母P在俄语的发音为英语的R，意指「处决」（rasstrel）。他也看见数千人的命运在特定日期里被决定的证据。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史达林和他两名最亲近的顾问—莫洛托夫和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十二份名单，其中包含一千三百五十二个即将被处决的人。十二月七日，他们签署了十三份名单，内有两千三百九十七人，其中两千一百二十四人被处死。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另外两名布尔什维克高层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和拉札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也加入他们，合计签署二十二份名单，内有两千五百四十七人，其中两千两百七十人被处死。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二十九份名单，两千七百五十人中，两千三百七十一人被处死。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三十八份名单，六千零一十三人中，四千八百二十五人被处死。

这样的日期和人数实在太多，使得它们难以纪念或归纳出意义。有些名单由特定人士组成。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共同签署了一份十五名女性的名单，她们被归类为「人民公敌之妻」。其中十人是家庭主妇，两人是学生。她们全部被处决。她们的丈夫比她们早被逮捕，在她们之后也被处死。註220其他名单看来完全是随机的，尽管人们每次都为了弄清楚它们而费尽心思。

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Lidiya　Chukovskaya）的丈夫是一位物理学家，在一九三八年被处死，得年三十一岁。她强烈挞伐这种试图

理解荒谬的习惯：

真相太原始、太血腥。政权为任何想像得到的理由攻击自己的公民，毒打、凌虐和处决他们。我们要如何理解这般异想天开的理由？要是你逐渐接受这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这么做「没有别的理由」，杀手杀人就只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那么你的心脏就算没被子弹打穿，也会被撕裂，你的心智即使还在完整无缺的头壳中，也会岌岌可危。正视事实真相会变得像是逼视枪桿子，因此人们都想要悄悄避开。註221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没有读到这些话；楚科夫斯卡娅用了数十年时间起草、又重写了这本书。或许她仍希望写成一套完整论述。直到作者去世五年后，该书才在二○○一年由楚科夫斯卡娅的女儿出版。书名叫《节略》（Elision）。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最后得到了结论，恐怖是无法理解的。他的同事和众多歷史学家提出的解释──史达林有精神疾病，受困于偏执妄想──什么都解释不了。这个暴君把他的许多亲戚，以及妻子的许多亲戚都给处死了。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发现，有一回，史达林邀请他在乔治亚的一位老友到莫斯科相聚。他们一起吃饭喝酒，史达林对自己的好客，以及他亲手拟订的菜单都引以为傲。註222就在这一夜稍晚，这位朋友在旅馆房间内被逮捕。他在黎明前就被处死了。这完全无法用任何人类所能想到的语言或观念解释。註223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无法理解，但他可以尽力描述：苏联国家奠定在惩罚的基础上。从进入少年先锋队开始，青年就被教导在团体情境中互相批评及自我批评，沉湎于缺陷的细节、罪咎的纷杂、悔改的狂喜，以及预想中的精确惩罚。共青团与党组织本身同样是执行机构，「劳动集体」（labor collective）□□苏联术语中的「工作场所」──也是，定期召开会议「揭发」过错并「採取措施」。註224

一九八九年，回復名誉委员会在成立第一年内就审查了二十八万件法庭案卷，为三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人回復名誉。註225按照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估计，这是工作量的将近百分之二。从他这时能够完整取得的现存档案来看，大恐怖的伤亡人数约有两千万人。这还只是史达林的部分；更多人死于史达林掌权之前的集体化运动时期，而惩罚机器在史达林死后仍持续运行，即使速度大减。註226就算这个委员会继续维持第一年那样的审查速度，它仍然无法在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有生之年完成平反工作。

回復名誉委员会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持下成立的，这意味着一九

九一年叶尔钦停止共产党一切经济活动后，委员会变成了没有资金的非政府组织，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则成了不支薪的召集人。他决心要确保自己取得的文件至少获得出版。他规划将祕密警察和史达林首要帮兇的相关文件编成几册，然后是关于共党对外活动的一系列书册，其中一本专门处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镇压。要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白纸黑字上的事实，想对歷史说谎就更难了，他如此推断。这些文件或许也让真相有可能述说出来──要是有人找到方法、开始理解过去的话。他组织了一个十人小组（要是把行政助理、会计和打字员都算进去），开始进行分类、验证与交叉比对的工作。註227关于一九二一年失败的反布尔什维克军人叛变，在一九九七年发行了第一卷。谢廖沙也开始帮忙，首先是打字，而后从事些更复杂的任务。他的祖父总是着急──他说他必须在他和国家再也拿不到这些文件之前，尽可能将它们出版。

依照法律，关于大恐怖的资讯必须向大众开放：叶尔钦为此在一九九二年六月颁布了命令。註228起初，就连一些异议歷史学者都贊同更审慎的做法。他们认为，他们在档案中瞥见的某些资讯，未经深入分析不能公诸于众。举例来说，有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打了一份报告，内容涉及她名声更响亮的朋友。报告作者写到，那位大作家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赞颂史达林。看来这位不为人知的作家有可能纯粹是为了保护朋友不受猜忌和迫害，而做出这种宣称──实际上也因此同意成为线民。但如果文件不加评判就予以公开，有可能败坏那位伟大作家的名声。再举一个例子：国安会的一名低阶特工报告，他和一位被判处国内流放的异议人士会面，对方同意停止一切反苏行为。但众所周知，此人在流放期满之后仍持续积极参与异议运动，那么这份报告该做何解释？那位国安会官员在说谎？异议人士为了结束对话而对他说了他想听的话？还是有理由相信这位异议人士在流放过后成了奸细？波兰发生过类似的事，祕密警察档案里突然发现了关于团结工联发起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后共产时代首任总统莱赫．华勒沙（Lech Wałęsa）的卷宗。要是这些卷宗可信的话，华勒沙曾是支薪的祕密警察线民。华勒沙的声望和人气胜过了这些卷宗可能造成的损害，但这些活动纪录仍纠缠了他许多年。註229

俄罗斯并未立即开放全部的祕密警察档案，还有个更深层的理由。採行这个做法的东方集团国家──其中包括波兰、德国和捷克共和国──将这些文件当成是占领势力遗留下来的。但苏联机构在一九九一年之后成了俄罗斯机构，很快地，俄国官僚就开始像捍卫自身机密那样捍卫了许多苏联机密。按照这些机构的逻辑、而非法律规定，政府组成了委员会逐一审查档案文件，决定它们能否解密。随着时间过去，能公开的文件愈来愈少。从国安会到外交部，甚至到制图部门，所有这些过去是「全苏联」而今变成「全俄」的机构，都不再向理论上有权予以解密的政府

当局释出任何一部分档案。苏联的机密就此固定下来。註230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集中心力印行的那些他已经确定取得的文件—光是这些就足够用一辈子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处理。对悲剧的无能理解持续困扰着他：不只是发生过的事件找不出一个理由来解释，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线。他很早就决定要以个案为基础聚焦受害者，不论这个受害者先前的经歷。但如果某人受害是因为他当上了刽子手呢？就以史达林的最后一波恐怖为例，它被委婉地称为「反世界主义运动」（anti-cosmopolitan campaign）。这场运动，表面上围绕在全国最杰出的医师身上，但因为他们多数是犹太人，所以本质上是反犹太的。他们被控藉诊疗之机毒害党内菁英。当这场抹黑运动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展开，全国都得知一位俄罗斯医师揭发了这些犹太混蛋。她的名字是利季娅．季马舒克（Lidia Timashuk），随即因其警觉而被大张旗鼓地颁授列宁勋章。这场运动在苏联及东方集团国家造成数千人受害，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随着史达林死亡戛然而止。医师们不久就被宣判无罪，这枚列宁勋章也被悄悄撤销了—但撤销得太安静，使得季马舒克仍与陷害犹太人的阴谋永远联繫在一起。註231

直到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史达林死后十三年，季马舒克才上书党领导，要求恢復她的名誉。她写道，她从来不曾宣称医师们是人民公敌，更没说过他们是兇手。多年以前，她就只是不同意一位资深同事为一名政治局高阶委员选定的疗法。结果显示，她的不同意有理—那位资深医师将心脏病发作误诊为慢性病—但她在人们记忆中却成了对苏联犹太人发起丑恶运动的女人，而不是做出正确诊断的医师。註232季马舒克写到，她从来不曾诽谤犹太医师，就连被祕密警察讯问时也没有，这有可能是实话，也有可能不是。但她受的苦当然比其他医师更少，他们都被囚禁和拷打，其中一人更死于审判前的羁押。季马舒克抱怨自己在医师阴谋案过了十年后被迫提前退休，因为那些曾被运动锁定的医师都拒绝与她共事。当然，就刽子手来说，她不是最重要的，但她也绝非毫无争议的受害者。她在一九六六年写下这封信时，后史达林时期的解冻已经结束，她的申诉也石沉大海。等到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读到这封信时，季马舒克已经去世了。他决定发表这封信。

其他更明确的刽子手个案，则是法律上的难题，而非道德上的。史达林的恐怖机器每固定一段时间就会处决掉刽子手。光是一九三八年，就有四万两千名曾参与过工业化规模大清洗的调查员遭到处决，祕密警察首脑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也无法倖免。最后一名高阶杀手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y Beria）则在史达林死后处决—但他被指控的罪名不是谋杀、酷刑和滥权，而是为十四个不同国家充当间谍。其他刽子手也因为虚构的罪名受到惩罚。在法律上，这是恢復名誉

的基础所在。但在道德上，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决定，只要他还领导回復名誉委员会一天，他就绝不为任何一个刽子手恢復名誉。他也决定只要他还健在、还有能力，他就要继续掌管这个委员会。在叶尔钦统治下，这个委员会再次被纳入国家管辖，所有联邦执法部门的首长都加入成为委员，尽管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仍继续不支薪服务。为数千万苏联公民恢復名誉，是他的志愿。註233

*

有个女人为了十一岁的女儿向阿鲁图尼扬求助，这是个可爱的女孩，除了不断发生奇怪的意外，让她的母亲开始怀疑这是否不尽然是意外。例如有一次，她不小心点了火烧掉窗帘。还有一次，她则是不小心锁上阳臺的门，那时她祖母（女人的母亲）人在外面，身上没穿外套困在严寒之中。家族动力够清楚了：三代女人住在一起，形成一个孤立的家庭单位—相当典型的组成。祖母如同暴君一般统治全家。母亲执行祖母的一切命令，不论多么无理；也容忍祖母的一切干预，不论多么刻薄。例如有一次，母亲翻修了整间公寓—这项工作昂贵又艰鉅。全部完工之后，祖母又要求换掉壁纸，母亲也照做。还有一次，老太太跑到孙女的学校，痛骂孙女不认真做功课。

很显然，女孩的「意外」是母亲极力压抑的攻击行为外显出来了。阿鲁图尼扬和她的案主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女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她面临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身为一个有爱心的女儿，她暗中盼望自己的母亲死去；然而糟糕的是，她这个有爱心的母亲，却让自己的女儿承担了无法掌控的情绪。最后母亲发现了一件事：祖母曾在古拉格劳改营里当过守卫。

如今这个家被改造成劳改营，包括毫无前途、纯属穷忙的工作。纪律至上，个人界线完全废除。由此看来，阳臺事件尤其怪异，它复制了一种惯用的酷刑手法，强迫囚犯站立在营房外的酷寒之中。阿鲁图尼扬记得读过这样的理论—那时她还只能取得佛洛伊德的部分着作—人类会扮演自己根本不记得的事物。

有个男人，为了明显存在于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而前来求助。这个男人的人生看来就像是一幅无趣的苏联文化讽刺画。他生长在一个墙上全都贴满口号的房间里。他就寝和起床时，都要看到「人！这个字的音调令人自豪。」（作家高尔基的名句）、「勇气不在于缺乏恐惧，而在于压抑恐惧的能力」（教育家安东．马卡连柯〔Anton　Makarenko〕的名句）诸如此类的话。没有留下任何一吋空白，这一切宣言所传递的讯息总合起来，就是在说小男孩的灵魂或身体不该有一丝空闲。当弄断双臂，他不敢告诉父亲，因为他害怕承认自己胡乱嬉戏。他也不能承认自

己觉得痛，墙上的口号教导他这是软弱的表现，因此他从来不哭。男孩的父亲也没有在心智中腾出思考和认知的空间，因此完全没注意到儿子受伤。来找阿鲁图尼扬的男人如今双臂活动能力都受限，因为在痊愈期间没上石膏固定。

阿鲁图尼扬和这个男人一起重建了家族故事。伤害他如此之深的事物，显然也对他父亲造成创伤。按照男人的描述，父亲是个完全没有内心世界的人。他唯一最害怕的似乎就是有一丝自己的想法。最终真相大白，先前这一代人非常惧怕被捕，于是设计出一套极端拟态的策略：他们要表现得比那些有可能指控他们不够苏维埃而逮捕他们的人更加苏维埃。这套策略或许奏效了──或者，这个男人的亲戚可能刚好是那些没被捕的数千万人之一──但在阿鲁图尼扬的案主出生时，苏维埃的面具在脸上已经戴得太紧也太久，使得面具下的人们被冻结于固定状态之中。

尽管这个案例是如此极端，前进的方法却也相当清楚。当案主最大的恐惧仅是动脑反思，只要一个不加批判的他者现身，就能帮助他明白他的思考不会毁灭世界。这段路程痛苦至极，但自由就在路的尽头。

*

整个一九九○年代，以研究创伤和极权意识型态创伤效应而闻名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召集了一群东欧心理治疗师，试着理解他们和他们的案主所遭遇的特定问题。必定出现的故事主题，总是围绕着人们从家族秘密中发现自己的歷史。「通常，父母会为了不想危害子女而隐藏事实。」由此产生的论文集中，俄国撰稿人费奥多尔．康可夫（Fyodor Konkov）写道：

他们推断，遭受过清洗或排斥的家长所表现的无知，将会保护子女不跟政权惹上麻烦。但就我所理解，从孩子的观点看来，发生在这种情境里的是一片空白，一个在身分认同中扩大的空洞。註234

这种策略有双重保护性目的──实用的与心理的：

家长以为，要是我否认坏事曾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否认并防止自己对这样的创伤流露个人情绪，我就能拯救孩子免于这些情绪的痛苦。但倖存的家长同时也阻止了自己有可能因为分担痛苦而与孩子更形亲密。藉由这种行为表现，家长训练儿女去否认他已经觉察到的蛛丝马迹……不难理解，如此养育成人的孩子会在情绪生活中经歷断裂，从而影响他们创造及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许多理解层次都丧失了。註235

「康可夫博士描述了一种具体的情感状态，一种孩子在悲伤受到压抑时会经歷的内在空虚状态，当他们觉得关于父母或祖父母的生与死，自己都被蒙在鼓里。」利夫顿和合编论文集的精神分析学家雅各．林迪（Jacob D. Lindy）在评注中补充道。註236或许这正是卡尔．罗杰斯访问苏联时，令他感受到如此强烈的那份空虚的本质—他当时也观察到，和他对话的人似乎全都没有能力维持亲密关系。

利夫顿和林迪也提到这些治疗师遭遇的一个特定问题，他们在其他曾治疗过创伤症候群的心理学家身上也过：某种反移情作用。「每个案例中，这种强烈反应都是一条线索，指向案主的伤害（共产时代的遗产）与治疗师在同一段创伤歷史中所受的伤害产生联繫的各种方式。」註237

*

阿鲁图尼扬确信，伤害会在某些事物消失不见、刻意不被记得之时形成。她自己的家族非比寻常地选择将故事说下去，这为她带来了有利条件。她是按部就班得知整个故事的。阿鲁图尼扬必定是在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向母亲问起为何家族相簿中没有一张她祖父的照片。祖父的缺席十分醒目：全家人的生活除此之外都在视觉上得到确实纪录，或在阿鲁图尼扬眼中是这样。有一张她的母亲玛雅婴儿时的照片，摄于一九二五年。玛雅的母亲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Anna Mikhailovna）也有很多照片，随着她逐步攀升到苏联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科学院院士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路累积了荣誉和奖赏，每张照片都看起来既严厉又鼓舞。没有任何一张照片是安娜的丈夫、玛雅的父亲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雅克文（Grigory Yakovlevich Yakovin）的。阿鲁图尼扬知道他很久以前就死了，在二战之前，甚至知道他是被处决的。但总该有照片吧？

「他们怕连累我，」玛雅说：「所以把照片都毁了。」

「他们」是指玛雅的母亲和祖母。但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无辜的人会被判有罪。要是他们的家人不跟他们划清界线，儿女就会有危险。」玛雅抽出一册《苏联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这是本蓝黑布装帧的巨着。那本是第五册，开头和结尾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词汇：别列兹纳（Berezna，乌克兰地名）和窝囊废（Botokudy）。玛雅将书本翻开到一张全页肖像，是个头顶秃去大半的中年男人，有张圆脸和完美的薄唇，戴着一副圆形无框的夹鼻眼镜。他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底下长达四页的文章形容他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J．V．史达林的忠实学生与同志。」如此这般。这人不是阿鲁图尼扬的祖父──他是史达林的头号刽子手。在他被处决之后，《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订户收到了一封信，也就是玛雅这时向她出示的这封：

《苏联大百科全书》国家学术出版社建议，二一、二二、二三、二四等页，以及装订于二二和二三页之间的肖像，应予撤除，换上随信寄赠的新页。

使用剪刀或剃刀将上述页面割下，注意保留内侧页缘，以利黏贴新页。

替换页面的内容是一篇讨论白令海峡的文章。註238

「你看，会发生的事就像这样。」玛雅解释：「近亲出事的话，你就一定要非常小心。」

这个答案很有趣，有一丝冒险故事的味道。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雅克文在形体与肖像上的失踪被记载成了谜团，而非悲剧。

其后，到了中学时代，阿鲁图尼扬读到了《陡峭之路》（Steep Road），註239这是一位女性歷史学者、忠贞党员的回忆录，她被错误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托派），在古拉格劳改营里度过十年，随后又被国内流放十年。这本书是一位明眼人对人类苦难的记录：

当我年轻时，我喜欢复诵这句话：「我思，故我在。」如今我会说：「我伤，故我在。」

回到一九三七年，我第一次承认自己对所有发生过的事应负责任时，我梦想着歷经痛苦而得到救赎。到了一九四九年，我明白痛苦只有一时的功效。当它延伸到了数十年后，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它就再也没有救赎的能力。它就只是把你变成一块木头。

肉体的痛苦淹没了内心折磨的痛苦。

这是一齣恐怖剧场，某些演员被指派扮演受害者，其他人扮演刽子手。后者的境况更惨。註240

这本书是在西方出版，再被偷运进入苏联的，阿鲁图尼扬就只是发现它横躺在父亲或母亲的书桌上。这时，她一翻开就再也无法放下。她睡不着。她无法停止哭泣。她从学校把最亲近的朋友找来家里。她们花了一整夜边读边哭──这本书不能被带出公寓。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阿鲁图尼扬追问父母亲。

「我们跟你说过。」他们说。

「不是这样说的！」

她在这次对话之后再次回头追问他们，想知道关于祖父的细节。几番询问过后，玛雅递给她一首诗，它以地下书刊风格印在「香菸纸」上──这种纸跟捲菸纸一样薄，顶多能用碳纸和手写抄录翻印四次。

「喏，读读这个。」玛雅说：「事实不完全符合，但这就是你奶奶的故事。」

这是流亡诗人纳乌姆．柯尔扎文（Naum Korzhavin）创作的一首长诗。以第二人称书写，向一位女性说话，如果这首诗可信的话，这名女性全心全意且盲从地对党付出：

你以理想之名说谎，
但说谎的传统，
被那些更适合，
坚决说谎的人延续下去。
我们都是血肉之躯。
我们的热情表现出我们是谁……
你以更高欲求之名，
拒绝所爱，
但你爱过吗，
哪怕一生中只爱过一次？

这首诗说，没有，这个女人从来不曾爱过。它又自我反驳，其实是有的，她爱过一回，爱过一个和她一样的党员知识分子，一个瘦巴巴、戴眼镜的犹太人。他的观点落在主角的右边──意思是说，被党的路线划为右派──他们争辩着这些问题，直到他被捕。她被要求作证，而她毫不迟疑。

党的事业神圣，
毫无温情余地。
坚持本质，

抛弃其他。

她「向他们全盘托出」。这是理所当为，但当她得知他死去，她哭了一整夜。按照这首诗的记载，这时她自己也进了古拉格劳改营。诗写到结尾，女主角显然倖存下来──即使经歷过这一切，她仍是党的真诚信徒。对于和她讲道理，作者完全绝望了：

你为了斗争付出一切，

包括不能放弃的事物。

所有的一切：

爱的能力，

思想、感受的能力。

全部的你，毫无保留──

但，

少了自我，你怎么活？註241

倘若这就是她祖母的故事──阿鲁图尼扬出于本能怀疑这个说法──那么，她的祖父又被省略了一次。这首诗描写的是背叛，而不是被背叛的那个男人。玛雅终于对女儿说了自己知道的情况。她的父母亲都是革命家，沙俄时代的地下工作者，内战时期的战士，后来成为学者。他们相识时都是红色教授学院（Institute for Red Professors）的学生，这所学校是为了培养一批大学讲师干部、取代被放逐或逮捕的师资而设立的。时间大约在列宁逝世、史达林掌权前后。玛雅刚出生的时候，她的父母亲奉派到德国进修一年。他们回国之后，经党的安排到列宁格勒教歷史。过没多久，玛雅的母亲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公开谴责丈夫的托派思想。阿鲁图尼扬不知道托派是什么意思，玛雅解释：托洛茨基是害怕史达林建立恐怖统治而反对史达林的人。随后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带着小玛雅前往莫斯科。玛雅从此没再见过父亲，即使他在此后又活了十二年。他被逮捕、流放、再逮捕，最后被处死，从头到尾他都不曾牵连他人、不曾在假口供上签字，信念也从未动摇。

这一切听起来全都疑似阿鲁图尼扬在学校里读布尔什维克准圣徒们的生平时，会学到的那套故事：充满英雄气派，却毫无人情味。玛雅也用同样的史诗语言谈论她的母亲。她很纯粹。她爱党也爱丈夫，后来当她成了有权有势的女人，她总是为失势的人挺身而出，总是捍卫他们的

列宁主义资歷。玛雅说，回到一九二○年代，她的母亲曾获准探望入狱的丈夫。玛雅不确定这是她母亲的念头还是党的，但她知道，探监的目的是要让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断绝错误的信念，重回史达林党的怀抱。他很高兴能见到妻子，但他一得知她真正的目的，就把她赶走。

就这样，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失去了她唯一真爱的男人。从那时候起，她全副身心都只属于党。但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玛雅十岁前后，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也因为一位导生的论文被认定含有牴触当前「后反帝」（post-anti-imperial）主旋律的民族主义口吻，而被开除党籍。她和同时失势的最好朋友相约自杀，并留下一封遗书：「党可以没有我，但我没有党活不下去。」女佣破门而入撞见她，将她救了下来；她最好的朋友则已经死去。随后一名资深学者介入，将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安插到一所偏省小学教歷史。此后多年，玛雅都由祖母负责抚养。但在战后，史达林决定要在中央委员会安插一名女性，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不但得以恢復党籍，更一举登上职涯顶峰。

阿鲁图尼扬发现，这套叙事无法令她满足。这在她听来不只是一齣、而是两齣烂戏：一齣关于不幸的恋人，另一齣则是关于一个英勇到无法想像的男人。这时她阅读的已够多，知道拷问、羞辱和威胁的体系足以让最杰出的菁英屈服，当今这一代人没有立场去论断他们。

这时是一九七○年代初期，在阿鲁图尼扬成为专业心理学家之前，但她无须接受特殊训练就能看穿家族神话。这一切都是补偿作用。玛雅爱自己的母亲，她需要一个够壮丽的故事来弥补母亲的背叛。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夺走了玛雅的父亲——而且是两次：先是谴责他，然后又抹灭他留下的一切痕迹。她也一再抛弃玛雅，首先是在婴儿时——一九二五年那张美丽的照片拍摄于柏林的儿童之家，当父母亲出外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挺身抗争，小女孩就被安置在那儿。照片背后字迹完美的文字说明写着「亲爱的母亲，亲爱的女儿」（Liebe Mutter, liebe tochter），让阿鲁图尼扬看了心碎。当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前往远方的城市教书，她甚至没说再见——她就这样消失不见。没寄过一封信，只有一则匿名讯息提到玛雅的母亲「一切安好，在不同城市生活。」如此巨大的创伤需要同样巨大的神话，因此玛雅非得召唤出如此英勇的父亲、如此长期受苦的母亲，他们唯有在她的想像中才可能存在。这也说明了玛雅为何相信柯尔扎文悲剧而浪漫的诗篇和自己的母亲有关，即使故事细节不符。倘若诗人对主角怀抱着这般同情，那她必定配得上。阿鲁图尼扬也是个有爱心的女儿，所以她从不对别人说起自己的疑虑。

*

这段对话过了二十年后，偏偏就是在慕尼黑一位朋友家的厨房里，

阿鲁图尼扬见到了一位研究地下书刊的歷史学家，他是当今拥有最多自行出版俄文着作的收藏者。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非得提起那个关于柯尔扎文的诗作〈谭卡〉（Tan’ka）是为她祖母而写、关于她生平的家族传说。这位档案工作者感到好奇。过了一天，他回到那个厨房，告诉阿鲁图尼扬，他查到了那首诗的一份早期手抄本，其中的题赠献给A．M．潘克拉托娃，也就是她的祖母。他提到这句题赠在后来的传抄过程都被略去了，以免危害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的家人—阿鲁图尼扬和她的父母亲。

玛雅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可是当阿鲁图尼扬告诉她确认了这首诗的传说，她双眼含泪—或许因为这么多年前她对女儿说的话女儿都还记得，也或许因为女儿终于相信了她。

玛雅在一九九九年去世。阿鲁图尼扬在她的文件中找到了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的日记。玛雅向女儿引述过日记里的句子，但从不让女儿看，她说日记太私密了。的确如此。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夜）

我们才刚分开，我像只鸟一样飞回房间里，这么难以置信、疯狂、不合情理的快乐。

「为何我这么爱你？」他问：「为什么见到你让我这么快乐？」

「真的吗？」我问。我还不能相信，但我感觉得到爱火席捲了我。

我们正站在楼梯上，讨论党的事业。

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终其一生都怀抱着这份爱，如同玛雅所言。她后来的笔记包含了一连串按照时间顺序无疾而终的风流韵事。「格里绝不会做这种事，」她会写下这些话，斥责某个可能的追求者，将对方和已故的丈夫相提并论。「不，他不是格里。」她也写下这些话，排除另一个人。

阿鲁图尼扬请求一位精通史达林时代档案的密友，为她查阅祖父案件的卷宗。她给予他为了这一目的聘请律师的权力—直到此时，查阅档案的权限仍仅止于家族成员。

一切全都查证属实。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完全是玛雅故事里的那名英雄。他不曾牵连他人、不曾丧失尊严、从未向拷问者退让一小步。他的审问纪录千篇一律：

「我认为提到别人名字是不适当的。」

「我否认。」

「检察官和调查员会关注行为，而不是意见及动机。……我不认为有必要为了意见而作证。」

「我不记得了。」

「我不会说出任何人的名字。」

「这是谎话。我不知道有这种团体。」

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探监抢救失败，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也证明属实。她受党指派，试图劝诱意识型态不受约束的分居丈夫回到党的怀抱。他暂时获释，由她监护。两人在一间旅馆里共度三、四个晚上，直到不可调和的意识型态歧异将他们永远分离。阿鲁图尼扬的朋友甚至得以复制照片—两次逮捕时拍摄的脸部特写。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容貌英俊，有着鲜明的五官和满头的黑色捲髮。他长得完全不像柯尔扎文诗中那个「瘦巴巴、戴眼镜的犹太人」。关于他还有些稀少却更精准的描述，包括流亡革命家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回忆录里的这段话：

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雅克文，年方三十，从德国回来，刚写成一本关于该国的精彩着作。他是一位体育热衷者，智能总是保持敏锐，长相俊美，魅力自然洋溢……註242

智利作家罗伯托．博拉纽（Roberto Bolaño）也在他的史诗小说《二六六六》里，让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客串了三行：「格里高利．雅克文—当代德国史大专家。」註243曾经见过在世时的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的最后一人—玛雅—去世后数年，阿鲁图尼扬终于得以看清楚祖父的面目—从她的歷史学家朋友研究过案卷后写下的一篇学术论文。註244

*

阿鲁图尼扬发现，自己为了母亲没能活着读到她父亲的法庭案卷而感到遗憾。然后她开始疑惑，玛雅为何没有运用一九九○年代初期短暂的开放之窗，亲自去查明父亲的案件（身为歷史教授的她从事这类研究，应当很有把握才对）。玛雅自己心里也有疑惑吗？她的资讯毕竟完全来自母亲，母亲将死去的丈夫当成偶像，即使在母亲死后数十年，玛雅还是会害怕损及母亲的权威。

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和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这一代人承载自

身信念的方式，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老派。「在后史达林主义的幻灭世界里，持守革命年代的价值被看作是个人虚荣。」文化史家艾特金写道。註245在后史达林时代，从普世到小资产阶级规模不一的欲望与野心被视为一种美德，一种人性逐渐恢復的迹象。这使得景仰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维奇、并同理安娜．米哈伊尔洛夫娜变得费解，为他们哀悼就更加困难。史诗与深邃的事物是哀悼的工具，但在史达林之后，人们只信任小我情绪和软性范畴。「如今，莎士比亚看来太过认真、严峻、僵硬了；他的庄重则显得可笑。」艾特金写道。註246

至少在阿鲁图尼扬这一代人之中，最明确反对苏联政权的人，是那些最怀疑华丽姿态与宏大宣言的人。或许这正是人们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政变后数日之内就停止拆除苏联纪念碑的理由之一。被推倒的捷尔任斯基，以及一座史达林像、一座赫鲁雪夫头像，还有一对非常巨大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像，都被运到莫斯科市中心一处新近落成的艺术家之家后方的巨大空地，但即使不到成千也有上百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人、少年先锋队无名英雄，以及不再具有实质意义的镰刀、锤子和五角星，仍旧点缀着莫斯科的公园、公共广场和大楼正面。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提议将十月广场（Oktyabrskaya Square）上全市最大的列宁纪念碑拆除，替换成苏联恐怖时期全体受难者的纪念碑—但沿用广场名称，「做为对后世子孙的教训。」註247然而列宁依旧耸立，大约三层楼高，广场却改名了。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叶尔钦在伟大十月革命七十九周年纪念日当天，将这个始终在十一月七日庆祝的国定假日更名。从今以后，这一天名为「和谐与和解日」（Day of Agreement and Reconciliation）。隔年是十月革命八十周年，也是大恐怖六十周年，则将是为期一年的「和谐与和解之年」。註248就在这一年，后种族隔离的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近似于阿根廷、智利、尼泊尔等国家内部运行的许多「真相调查委员会」。不过叶尔钦却忽略了过程中的事实查明，仅只聚焦于和解或至少达成和谐。实际上，叶尔钦打算完全抛开艾特金描述灾后復原所需的三种「能量」—认知、悲伤和正义—直接进展到某个将清算抛到九霄云外的空想未来。

叶尔钦再也没有和共产党继续搏斗的力量，或者该说是民意支持。倘若他继续按照原定计画审判共产党，就有全盘皆输的风险—即使没在宪法法院败诉，也会输掉大众舆论。既然主宰全国的情绪是愤恨，叶尔钦承担不起让大众对抗过去的歷史。案卷多达八十册的控告共产党诉讼，以及永久禁止共产党活动的主张，如今全被搁置了。一九九一年政变的策划者和一九九三年武装反抗的领导者—共有三十六人—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俄罗斯国会首次通过大赦时就得到赦免，不是因为两次冲突在

俄国国会议员心中被合而为一，而是因为这两次冲突都必须消退与遗忘。註249就连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回復名誉委员会里沉默的埋头苦干，也似乎愈来愈像在寻衅生事。一九九七年，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提交了两份恢復名誉令——一份关于在古拉格劳改营被监禁的儿童，另一份关于恐怖时期被处决的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政党党员—但叶尔钦不予理会。註250

对大众情绪的感知从不出错的叶尔钦，愈来愈疏远年轻一辈的激进改革者，转而亲近许多保守派。他看来很乐意遗忘和原谅一切，包括人身侮辱和叛国行径。「他让自己在共产党员里成了笑柄！」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说。一九九七年四月，叶尔钦本着和解精神，向俄罗斯共产党的年会发送贺电。当臺上宣读祝词时，整个会议厅充满了嘘声和口哨声，然后他们大笑。註251

註216：Fred S. Koch,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註217：Alexander Etkind, Warped Mourning: Stories of the Undead in the Land of the Unburi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9.

註218：作者按：戈巴契夫在二○○八年二月与我和其他一小群人聚会，讨论为古拉格劳改营设立博物馆的计画时，讲述了这段经歷。

註219：A. Lipsky, “Vlast’ opyat’ sporit s istoriyey,” Novaya gazeta, May 5-11, 2005, in A. A. Yakovlev, ed., Aleksandr Yakovlev, Izbranniye intervyu: 1992-2005 (Moscow: Mezhdunarodny fond “Demokratiya,” 2009), pp. 372-374.

註220：N. Rostova, “Vozhdi ochen’ toropilis’, kogda rech shla o rasstrelakh,” Nezavisimaya gazeta, October 26, 2001, in 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Izbranniye intervyu, pp. 311-314.

註221：Lidiya Chukovskaya, Procherk (Moscow: Vremya, 2013), p. 259.

註222：Anya von Bremzen, Mastering the Art of Soviet Cooking: A Memoir of Food and Longing (New York: Crown, 2013), p. 126.

註223：Rostova, “Vozhdi ochen’ toropilis’, kogda rech shla o rasstrelakh.”

註224：Lipsky, “Vlast’ opyat’ sporit s istoriyey.”

註225：“O khode raboty po rassmotreniyu voprosov, svyazannykh s reabilitatsiyey grazhdan, neobosnovanno repressirovannykh v period 30-40-kh i nachala 50-kh godov,” memo from A. N. Yakovlev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 December 12, 1989, http://www.alexanderyakovlev.org/almanah/inside/almanah-doc/76205（二○一六年二月十九日浏览）。

註226：N. Zheleznova, “Osvobozhdeniye pravdy,” Literaturniye vesti, July-August 1998, in 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Izbranniye intervyu, pp. 256-262.

註227：前引书。

註228：“O snyatii ogranichitel’nykh grifov s zakonodatel’nykh i inykh aktov, sluzhivshikh osnovaniyem dlya massovykh repressiy I posyagatel’stv na prava cheloveka,” presidential decree no. 658, June 23, 1992, http://www.bestpravo.ru/rossijskoje/rf-instrukcii/c2v.htm（二○一六年三月十九日浏览）。

註229：Camila Domonoske, “Polish Institute: Files Show Lech Walesa Worked with Communist-Era Secret Police,” npr.org, February 18, 2016, http://www.npr.org/sections/

thetwo-way/2016/02/18/467209160/polish-institute-files-show-lech-walesa-worked-with-communist-era-secret-police（二○一六年三月二十日浏览）。

註230：Nadezhda Nekrasova, “Mekhanizm rassekrechivaniya, slozhivshiysya v seredine 1990-kh godov . . . dolzhen byt’ otmenen,” polit.ru, June 3, 2008, http://polit.ru/article/2008/06/03/memorial/（二○一六年三月七日浏览）。

註231：Joshua Rubenstein, The Last Days of Stal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61-140.

註232：Letter from L. F. Timashuk to the presidium of the Twenty-third Party Congress, March 31, 1966, http://www.alexanderyakovlev.org/fond/issues-doc/69205（二○一六年三月二十日浏览）。

註233：Rostova, “Vozhdi ochen’ toropilis’, kogda rech shla o rasstrelakh.”

註234：Jacob D. Lindy and Robert Jay Lifton, eds., Beyond Invisible Walls: The Psychological Legacy of Soviet Traum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31.

註235：前引书，pp. 132-136。

註236：前引书，p. 139。

註237：前引书，p. 11。

註238：Bolshaya sovetskaya entsiklopediya, 2nd ed. (Moscow, 1950), vol. 5, pp. 21-24，以及致订户函，未署日期。

註239：编按：这本书的英文书名通常译为《走入旋风》（Into the Whirlwind）。

註240：Yevgeniya Ginzburg, Krutoy marshrut: Khronika vremyon kul ‘ta lichnosti (Moscow: Sovetskiy pisatel, 1990).

註241：Naum Korzhavin, “Tan’ka,” in Naum Korzhavin, Vremya dano (Moscow: Khudozhestvennaya literatura, 1992), pp. 189-197.

註242：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ed. Richard Greenman, trans. Peter Sedgwick with George Paizis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2), p. 243.

註243：Roberto Bolano, 2666, trans. Natasha Wimm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p. 716. 译者按：本句参看Roberto Bolaño着，赵德明译，《2666》（上海：世纪文艺，二○一二年），页六八四，略有改动。

註244：B. I. Belenkin, “Repressirovanniye trotskisty—organizovannaya politicheskaya gruppa levogo soprotivleniya stalinskomu rezhimu (1927-1938): Bor’ba kak norma zhizni. Na materialakh sledstvennykh del G. Ya. Yakovina,” in Problemy istorii massovykh politicheskih repressiy v SSSR (Krasnodar: Ekoinvest, 2010), pp. 352-367; Boris Belenkin, “’Tan’ka! Tanechka! Tanya! . . .’ Zametki na polyakh poemy Nauma Korzhavina i biografii Anny Mikhailovny Pankratovoy,” in Pravo na imya: Biografika XX veka: Sed’miye chteniya pamyati Veniamina Iofe (St. Petersburg: Memorial, 2010), pp. 14-32.

註245：Etkind, Warped Mourning, p. 137.

註246：前引书，p. 158。

註247：A. Gubanov, “Plokhoy chinovnik vsegda sovetskoy shineli,” Rossiyskiye vesti, January 20, 1998, in 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Izbranniye intervyu, p. 240.

註248：Ukaz Prezidenta Rossiyskoy Federatsii ot 07.11.1996 g. no. 1537, “O Dne soglasiya i primireniya,”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10231（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浏览）。

註249：“Obyavleniye amnistiy v Rossii: Dosye,” TASS, http://tass.ru/info/841359（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浏览）。

註250：A. Gubanov, “Yesli by gosudarstvo moglo priznat’ svoye ugolovnoye proshloye,” Rossiyskiye vesti, October 30, 1997, in Yakovlev, Aleksandr Yakovlev, Izbranniye intervyu, p.

233.

註251：Gubanov, “Plokhoy chinovnik vsegda sovetskoy shineli,” pp. 239, 435.

# 第九章　老歌

一九九四年的除夕令人沮丧。列夫．古德科夫和他认识的多数人一样，觉得被吓呆了──或者就只是震惊而已。俄国对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开战了。歷经数月的传闻、威胁，以及几次拙劣的秘密行动，叶尔钦决定要终结邻接土耳其和乔治亚的北高加索小共和国──车臣──强大的分离运动。他动用军队想将当地政府拉下台。但车臣抵抗运动不但武器精良，决心更强过俄军十倍，而且熟悉地形、得到当地人民支持。原计画实质上是一次警察展开的闪电攻击，结果转变成大军竭尽全力的进攻。十二月三十一日，作战开始后第十二天，莫斯科发动一连串空袭，将格罗兹尼（Grozny）这个同属俄国的城市被炸成冒烟的废墟。几位已过中年、坐过监牢却没经歷过武装战斗的资深异议人士这时来到了车臣，记录当地的战争暴行，并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吸引全世界关注。整个莫斯科记者团似乎也都在车臣。从车臣流出的资讯，宛如从破裂的动脉流出的鲜血。过剩的恐怖细节产生的效应，是古德科夫未曾体验过的惊骇与沮丧。

这种效应更因为民意调查中心刚完成的调查结果而变本加厉。从最初的「苏维埃人研究」过后五年，列瓦达的团队决定进行复查。这又是一项难以设计的调查；国家的疆界、国名及政府体制在第一次研究之后都改变了。有些问题必须捨弃，其他一些问题也得修改，还有一些新问题必须另行设计。

调查里还是有好消息：当人们被问到古德科夫「爆炸性」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置各种异常群体──他们的回应整体上表现出比五年前更多的宽容。支持「肃清」异常人士的整体比例从百分之三十一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三，支持「任其自生自灭」的人数比例则从百分之十二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九。「肃清」身心障碍者的人数比例从百分之二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十八，「帮助」身心障碍者则从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按照西方标准，这种数据骇人听闻，但在此并不适用西方标准：社会学家只是想知道心态改变有多大，又是往哪个方向改变。可是就连这种取径所产生的一丁点乐观，也被其他问题得到的回应泼了冷水。对宗教派别成员「放任不管」的人数比例从百分之五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支持「孤立」或「肃清」的比例则显着上升。「摇滚客」也发生了同样的状况：想要「肃清」他们的人从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六。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是罗夏克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没有人能确知「摇滚客」一词的含义。它一度指涉那些演奏或聆听西方音乐的人，但国家禁止摇滚乐的年代早已结束。倘若并没有一个受到排斥、甚至可资

识别的群体叫做「摇滚客」，这些应答者想要「肃清」的人是谁？又是为什么？社会学家们得出结论，这个词成了「他者」或「异类」的借代，之所以引来攻击性的反应，正是因为所谓「摇滚客」不同于同性恋者或身心障碍者，不论他们是谁，都不属于任何公共讨论的话题。

调查的其他部分也没有太多怀抱希望的余地。说自己不幸的人数是五年前的两倍多—从百分之十四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尽管说自己幸福的比例稳定维持在百分之四十六）。让这么多人如此不幸的原因，在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中露出了线索：应答者被要求排比国内各项转变的重要程度。仅仅一半的应答者列出了可被称作成就的事物，诸如政治自由，得以出国旅游、工作及求学，自行创业的权利，以及社会学家所说的「无须顾虑国家而生活的选项」。压倒性多数将国家的失败列为最重大的转变：失业率上升、「人民陷入贫困」及「俄罗斯的团结被削弱」。当人们被要求指出国家自古至今最重要的事件，他们仍诉诸苏联歷史书写，举出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伟大卫国战争；即使从史达林与希特勒的军事同盟开始，新公开的资讯极为丰富，后者的象徵意义光彩似乎仍未减损分毫。整体而言，人们似乎不再有兴趣知道更多关于史达林、他的统治和他的恐怖。百分之二十五的应答者如今认为，史达林在歷史上发挥了正面作用（这个回应不具备比较基准，因为在五年前，当史达林恐怖统治的公众对话处于高潮期间，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可思议）。他的排名落后戈巴契夫和叶尔钦不远，这两人的「正面」评价比例分别是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三十。这些结果反映了对重建时期新产生的晦暗观点，压倒性多数的人们表示，重建导致了苏联的可悲解体。一九九一年的民主革命—也就是极权主义的失败—这个事件存在于社会学家心中，却不存在于应答者心中。

古德科夫回想起自己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政变失败之后，参加一场庆祝集会。一位德国友人也陪同前往。群众高喴「伟大俄罗斯万岁！」这时古德科夫察觉友人紧张了起来。古德科夫注意到德国人对民族主义的表达极其敏感，但他自己并不关注群众的情感。如今他开始疑惑，自己当初是否应该更加留意那样的语调，以及口号里的语言戏法。一开始喊的口号是「民主俄罗斯万岁」，可是在几小时内，「民主」就被去掉而替换成「伟大」。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当真在明显获胜之时就被遗忘了吗？

俄国人在一九九四年被问到过去五年来哪一项重大转变对国家弊大于利时，他们对于自由的反应冷淡：只有百分之五十三认为言论自由是正向转变，其他新的自由权利排名则更低。只有百分之八认为苏联解体是正向发展，百分之七十五认为它带来的伤害更大，这也是整个调查中最高的单一数据，俄国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加一致。

就古德科夫所能判读到的，应答者倒也未必真想重返苏联时代：食物短缺、贫穷和气氛凝滞的记忆，此时仍然鲜明。俄国人想要的是确定性，对于自己是谁、以及国家是什么的明确认知。

社会学家试图梳理出国族认同概念的样貌。所有个人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藉由「与他人相反的程度」定义自我，对一九九四年的俄国人来说，做为出发点的形象则是一种对欧洲人的概括刻版印象。这个想像出来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积极的—而且是他者。俄罗斯这时刚走出一段极力自我贬抑的时期，那时社会在亲眼看见了过去被教导的「腐败西方」之后，正在设法处理自己所受的震撼。事实证明西方是闪耀的、幸福的，也是寻常且遵守法律的。许多年来，报章上都用「文明社会」这句话指称俄罗斯不属于的那个世界。这时俄国人显然厌倦了再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当成低人一等。那么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人内在的正向品质是什么？这个开放性问题以两千九百五十七份问卷为基础，收集到三种最重要的品质：「开放」、「单纯」、「忍耐」。看来，理想的俄罗斯人是个没有特性的人。就古德科夫看来很明显，这是俄罗斯人长期在敌对且暴力的政权统治下映照出的空白镜像。

汉娜．鄂兰曾经论述过极权主义对人们形成意见的能力，乃至将自我定义成不同于社会其他成员、不同于政权本身的能力予以剥夺的方式。註252如今，这个被掏空的人将空虚标举为自己最重要的德行。倘若「开放」和「单纯」描述的是俄罗斯人不做区别的本质，那么，按照古德科夫对这些回应的解读，「忍耐」就是指俄罗斯人对暴力的忍受。相对于想像中的欧洲人一切品质都描绘出能动性，这些应答者将自己看作一个凭藉武力施行统治的政权之臣民。这也使得在古德科夫交友圈里多数人看来是一次悲剧异常的车臣战争，实际上却似乎成了民之所欲的合理表现。

不过，这项调查的最坏消息，是它与列瓦达最早提出的苏维埃人概念互相牴触：回到一九八九年，他曾预测随着极权主义的臣民灭绝，苏联体制也要跟着崩溃。但这项调查却显示，苏维埃人仍然维持原状。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个社会学类型在年轻人之间的普遍程度低于父母亲的世代。苏维埃人的核心特徵—双重思想，不分年龄层完全展露无遗。应答者们继续运用悖论思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悖论如下。多数应答者同意以下这句陈述：「苏联统治七十五年来，我国人民已经变得不同于西方人民，如今想改变已经太迟了。」稍微再多一点应答者则同意这句：「俄国迟早要走上一切文明国家共同经歴过的发展途径。」大多数人同时同意这两句陈述，以及他们看来确实是在肯定前者、且让后者看似不可能成真。註253

要是列瓦达最初的假说有错，那么社会学家对苏联解体的诠释就须

要修改。列瓦达很久以前提示过，苏联社会如同钟摆一般，在极端压迫时期与赫鲁雪夫时代、戈巴契夫统治初期的相对自由化之间摆盪，这些循环遵循的是一套实用逻辑。自由化时期允许被压抑的不满──以及更重要的，表达这些不满的人──浮上檯面。随着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来到明处且积极活动，镇压必然随之发生，将他们消灭。长远看来，这些循环确保了政权稳定。社会学家将这样的镇压称为「周期性阉割」（periodic castration）。

重建时期看似开始了另一段暂时放松控制的时期，但随后钟摆似乎摆过头了，把整个体系都给拉倒。但要是发生的事并非如此呢？要是它其实就只摆动到所需最远的距离，让循环得以持续下去呢？要是疆界、国家架构和法律的变动，其实并未反映或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呢？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家的主要电视频道第一频道，播放了一套全新的节目。新年除夕的传统自重建时期以来就一直变动不定。一九八六年，戈巴契夫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谴责苏联电视太过枯燥。广电领导阶层急忙做出回应，重新改定节目编排，其中包括将已经播送了一整个世代的新年综艺节目《蓝色火焰》（The Blue Flame）作废。这时，将近百分之九十三的俄国家庭都会收看的第一频道，开始播送一部听来不可思议、像是旧时代节目的影片。註254这部影片名为《主旋律老歌》（Old Songs Abo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编排得如同音乐剧。其中的人物角色类似一九三○年代和一九五○年代的宣传音乐剧，通常呈现集体农场工人的生活、朋友间的竞争，以及纯真的恋爱角色激励伴侣关系中较不完美一方的自我成长为主要内容。往往也会出现阶级冲突，为和缓的意识型态批判提供契机，结局总是共产主义战胜邪恶。

《老歌》的登场人物包括集体农场工人、一名卡车驾驶、一名刚復原的军人、一名教师、一名布尔乔亚、一名刚获释的罪犯、一名「摇滚客」（因为他蓄长髮、穿时髦的城市服装，所以看得出来），还有一名「适婚处女」（这个角色在演职人员名单上如此登载）及其他角色。故事情节虽说不太多，但提供了这群演员演唱二十一首苏联歌曲的机会，其中大多是抒情歌，有多首曲子都提到了伟大卫国战争。不过这部影片并非苏联电影的改编。片中各阶级全都和睦相处，实际上任何种类的冲突都未曾发生。有许多求爱过程，不时点缀女性如何坚持拒绝婚前性行为，但始终不曾达到高潮──没人结婚、没人发生性关系，没有任何跌宕起伏。片中唯一清楚标明为他者的人（「摇滚客」）用乌克兰语唱了一首歌，这种语言尚未被认定为外语，而是一种很难听懂的俄语方言。事实上，片中什么事都没发生，看来这正是它所传达的怀旧讯息之宗旨：

在后苏联的俄国——车臣战争进入第二年——报上没完没了地报导犯罪、冲突和持续不断的经济问题，而该片直接从苏联报纸当中想像出一个过去，任何事在此都不会发生，只会发生在西方。人们在《老歌》里愉快地消费苏联制品，像是空心滤嘴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Belomorkanal）香菸（得名于古拉格劳改营最大规模的工程计画），以及一种嚼不烂、名为友谊（Druzhba）的人造乳酪，但他们自愿购买，而且无须排队，就能在一间存货充足的商店里买到，男顾客将受到臀部肥满、身穿晚礼服的女服务员热情招呼。苏联时代被改编成浪漫的太平之世，苏联政权则是仁慈的。片中最怪诞的一幕，是一男一女依偎在小小的划桨船上。

「你知道你的脚为什么这么可爱吗？」男人问女人。

「我知道，」她回答：「因为我们的苏联政权是这么美好。」

「就是这样。」他说，接着先是吻她的脚，又起身吻她的脸（或者想当然耳是这样，因为镜头羞怯地从他们身上移开）。这一幕参照了苏联时代对苏联宣传的戏仿，那些宣传将无限的力量和无尽的宽大都归于政权。若说这些经由地下书刊、或纯粹被当成笑话流传的苏联时代戏仿是尖锐的，那么这段戏仿则是柔软圆滑的。影片来到结尾，包括「摇滚客」、布尔乔亚和罪犯在内的全体演员团聚在一张大桌旁，横躺在桌面中央的是苏联特权最独特的可食用象徵之一——一头烤乳猪—就像冉娜的父亲当上州长之后，每年除夕就开始收到的那些烤乳猪一样。在这段重新想像的苏联过往当中，每个人都分到了猪肉。註255

《老歌》由即将在俄罗斯电视界取得最大影响力的两个人创作，註256并立刻大获成功。这些老歌的全新翻唱，在隔年及其后响彻全国各个街角，摊贩们迅速开始销售双卡带专辑。续集也接连上映：《主旋律老歌》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四集。隔年，联邦另一个最重要的广播频道重新制播了苏联的新年除夕节目《蓝色火焰》，这样的竞争如今显现出这般巨量的一群怀旧阅听人。当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在数年后站稳脚步，就有一个完整频道开播，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播送苏联电视节目。这个频道名叫「怀旧」，频道标志显现在画面的边角，包含了一组红色的鎚子与镰刀。

电视制作人正在运用古德科夫和他的同事记载于调查中的这些情绪。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四年两次研究之间，俄罗斯人已经厌倦了思考未来。他们正从过去汲取认同感，并额外为这段过去注入一股有益健康的保守主义气息。

*

「开放」、「单纯」而不具特性的俄罗斯人，将自身能动性外包给

了更强大的事物或人物。到了一九九五年底变得清晰可见的怀旧要素之一，是对一位强人领袖的嚮往，这样的领袖有能力行使苏维埃人始终准备好承受的那种强制力。叶尔钦看来再也不适合这个角色：他被动、通常不在场，总是身陷与国会又一次的冲突之中，即使这些冲突看来已经很久不再具有重大意义。他的军队正在与车臣的俄国公民打一场无望的持久战，而一度看来很了不起的叶尔钦，连这个展示决心的机会也搞砸。车臣反抗者两度在邻近车臣的地区挟持大批人质，试图逼使俄国谈判。叶尔钦第一次不见人影，总理不得不代行交涉；到了第二次，叶尔钦则发表了语无伦次的电视演说。註257这场战争使他丧失了资深异议人士，以及为他的政府工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加强了近几年来愈益显着的一种倾向：叶尔钦在身边任用了愈来愈多前苏联老手。就全国人口整体而言，这场战争不得人心，但还不足以引发任何有规模的抗议活动。几番尝试之后，组织示威的努力转变为每週一次微型集会，更大程度上是几位运动人士在莫斯科市中心包下一张桌子进行资讯说明。战争并未挑起激情，可是叶尔钦的支持度在一九九五年暴跌到只剩个位数。註258到了一九九六年，在他第一任总统任期届满前夕，他的政治生命似乎要终结了。

尽管叶尔钦是民主派，他对挑选接班人却有一种显着的君王式执迷。一九九四年八月，他乘坐一艘内河游轮，顺着伏尔加河航行到下诺夫哥罗德，登岸时向群众发表演说，宣告自己确立了接班人：鲍里斯．涅姆佐夫。「我只是要说，他已经成长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可以放眼他当上总统了。」叶尔钦说。如此笨拙的措辞说明了这是叶尔钦的决定，而非年轻人自身的决定。註259涅姆佐夫一直是接班的不二人选，直到他开始出声反对车臣战争。一九九六年，下诺夫哥罗德人民募集了一百万人的签名连署反对战争──当地有三百七十万人口，这意味着地区内几乎全部成年人都签了名。涅姆佐夫乘坐一辆下诺夫哥罗德制造的货车，将连署送往克里姆林宫。他让驾驶在城堡外停车，然后大步走进叶尔钦办公室，手里拿着其中一个附有连署的厚重纸板活页夹。

「你认为呢？」叶尔钦问道，用一种人们可能用来应付小孩的亲暱语气对他说话：「这些签名是支持我还反对我？」

「你停止战争的话，他们就会支持你；你不停止战争，他们就会反对你。」

涅姆佐夫离开的时候，认为自己再也不是叶尔钦选定的接班人了。他接连几个月没听到总统的消息。註260

一九九六年三月，前总理叶戈尔．盖达尔来到下诺夫哥罗德，请求涅姆佐夫参选总统。他和涅姆佐夫一同参访一处集体农场，而他的见闻

更确认了他的决心。在这四年半的斗争与极其复杂的改革期间担任州长的涅姆佐夫，在这个地区受到真切的爱戴。不同于盖达尔的名字和俄罗斯政府每一项不得人心的措施全都脱不了关系，他的举止与相貌也看似高高在上、纡尊降贵；涅姆佐夫则是天生的政治人物，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展现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盖达尔论证，涅姆佐夫有能力成为真正的民主派候选人，在大选中同时击败叶尔钦和捲土重来的共产党。涅姆佐夫则说，自己不能背叛叶尔钦。盖达尔力主原则应当优先于个人忠诚，但他未能如愿。註261

最终，大选看来会是叶尔钦单挑共产党，而且他会输。但国家的新富阶级和总统团结一心，他眷顾过的政治人物也是如此──最后也包括多数反战的官僚在内──新兴的自由媒体也是。不过最重要的是，叶尔钦自己也拼了。歷经看似在抑郁和狂饮之间摆盪的几年，总统终于动起来打选战了。「人民突然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总统，一个被他们遗忘的总统：那是一九九一年的叶尔钦，以他独有的能力对人民说话，经由他的能量和干劲争取支持。」盖达尔后来写道。註262

列瓦达中心举行的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在这次选举期间想要三件事：终结经济动盪、终结车臣战争、恢復国家的光荣。社会学家们自己也开始讨论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创伤。他们写了一份又一份备忘录给克里姆林宫。古德科夫写了其中一份，断言叶尔钦要是找不到方法结束车臣战争，就会败选。叶尔钦打电话给涅姆佐夫，召唤他前往莫斯科一处政府机场；他们要一同前往车臣，发出战争开始收尾的信号。註263叶尔钦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车臣，授权他们不计任何代价促成和平。古德科夫看着电视上谈判从停火迅速进展到缔约的报导，对社会学襄助真实生活的结果大感惊嘆。

倘若车臣和平这个目标是困难的，那么另外两个目标──终结经济困难、恢復俄国荣耀──则是办不到的。叶尔钦选择直接对抗高涨的怀旧浪潮。他的阵营设法运用排山倒海的讯息淹没《主旋律老歌》，其中大多数讯息内容都很骇人。卡通片设想共产党统治的未来，冰箱里空无一物，电视只播送一个节目。一位摇滚乐明星恳求歌迷们投票给叶尔钦，因为「我不要我的国家再次沦为共党集中营。」一段由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的内战黑白片段构成的影片吆吁：「阻止内战和饥荒还不嫌晚。」註264一九九六年七月，叶尔钦赢得大选。

*

叶尔钦显然心里明白，他胜选靠的是鼓动情绪，而非提出方案。选举过后十天，他就设立一个委员会，寻求俄罗斯的新国家观念。他指派特助乔治．萨塔罗夫（Georgy　Satarov）主持这个委员会，限期一年产

生结果。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日报》（Rossiyskaya gazeta）宣告举行一场徵文比赛，能在七页之内陈述最精彩的国家观念，就能赢得巨额首奖——一千万卢布，相当于约两千美元。身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萨塔罗夫连忙向大众保证，委员会绝不会制作出一套苏联式意识型态，并强加于全体国民。它的目标反而是协助表述国民都能认同、或许早已达成共识的理念。萨塔罗夫自己则向委员会提议，西德在后纳粹时期的行动方案可供效法，其中将一套经济疗癒方案与他所谓的「全国悔罪」（national penitence）结合起来。这项提案失败了。徵文比赛无疾而终，首奖也未曾颁发。註265

「根据传闻，莫斯科郊外的政府别墅，被几十个俄国『最聪明的人』挤满了，」最重要的民族主义刊物《我们这一代》（Nash sovremennik）在一九九七年五月写道：「他们浪费了数以吨计的纸张想要表述观念。但看来有些事就是行不通。」註266

克里姆林宫记者团在一九九七年秋天得到传闻，则是说叶尔钦会在访问下诺夫哥罗德期间揭橥俄罗斯的国家观念，那儿仍是后共产转型的成功典范。据传，叶尔钦会说俄国如今是资本主义国家，正朝着「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的光明未来迈进。这个说法的构造近似前苏联的宣传范式，当时苏联说自己是个迈向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句流行语显然是为了表达新国家观念的本质而创造出来：「机会平等资本主义」（equal-opportunity capitalism），与多数人民认知中人脉优越者才能致富的俄国现状恰好相反。

传闻有可能部分或全部错误，或者叶尔钦有可能改变了主意。他造访下诺夫哥罗德时，的确随口提到了「机会平等资本主义」这个说法，但并未将它呈现为俄国的新观念。记者团得出结论：克里姆林宫里的保守派阻挠了这个提案，又一次在宫廷密谋中取胜。註267

*

古德科夫和同事们的研究显示，关于现在和未来的讯息全都无法吸引俄国人的心智，他们如今牢牢盯视着过去。对未来提不出新方向的一年后，叶尔钦开始应对过去，他终于提出了全国悔罪这个概念。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他显然出于冲动，在预定行程之外前往圣彼得堡，来到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及其家人重新安葬的典礼上发表演说。这天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五位子女，以及另外四人，在他们被关押数月的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一间房屋的地下室遭到处决的八十周年纪念日。

这间房屋在执行处决之后成为革命博物馆，随后又用作地方次级行政机构的办公楼。沙皇尼古拉一家人的下场，其细节从未公诸于世。没

有人知道他们被埋在何处。苏联小学生只会学到俄国的末代沙皇被废黜，十月革命胜利。为确保处决沙皇的一切记忆全部湮灭，党中央在一九七○年代下令拆除这间房屋，那时在当地担任党委书记的叶尔钦切实执行命令。但处决沙皇仍在当地传说中留下了不甚确切的记忆，到了一九九一年，被认为是沙皇及其家人的遗骸出土。基因分析歷时七年—检测遗骸的科技那时才刚诞生—最后，遗骸确认是沙皇、皇后，以及五名子女的其中三人。如今他们要遵循俄国正教的礼仪下葬。

叶尔钦在当地州长，以及政府遗骸辨识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涅姆佐夫的簇拥下，步入圣彼得堡的一座大教堂。「尊敬的同胞们，」叶尔钦说道：

今天是俄国歷史性的一天。自从俄国最后一位皇帝和他的家人遭到杀害，已经过了八十年。多年来，我们隐瞒了这桩恐怖的罪行，不过说出真相的时候到了。叶卡捷琳堡屠杀是我国歷史最可耻的其中一页。当我们安葬这些无辜受害者的遗骸，我们也为祖先的罪恶寻求救赎。罪责归于犯下这一暴行的人，以及数十年来为这种行径辩护的人。罪责归于我们所有人。我们无权欺骗自己，无权使用政治形容词替无谓的残暴辩解。处决罗曼诺夫（Romanov）註268家族肇因于俄国社会不可补救地分裂成「我们」和「他们」。我们至今仍被这种分裂的后果折磨。藉由安葬叶卡捷琳堡惨剧受害者的遗骸，我们首先採行了人类正义之举。它象徵着民族的团结与共同罪咎的救赎。我们全都有责任保存我们人民的歷史记忆。因此我今天必须来到这里。这是我生而为人、作为总统的责任。我向这些遭无情杀戮的受害者鞠躬。

叶尔钦低下头来，默哀片刻之后，教堂唱诗班开始齐唱。确切说来，这是国家电视频道上播送的过程。註269实际上，叶尔钦又多说了两分钟：

当我们建立新俄国，我们必须在歷史之中找到立足点。罗曼诺夫之名记载于祖国歷史的某些光荣篇章里，但这个名字也和人类歷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之一联繫起来：运用暴力改变我们生活的任何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不论我们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民族身分，我们有责任经由悔罪与和解为这个世纪画下句点，它对俄国来说成了流血和无法无天的一世纪。歷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当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我们必须做到这件事，为了今日健在的人们，也为了后世。让我们纪念仇恨与暴力的无辜受害者。愿他们安息。註270

无论是删节版还是完整版，这都是一篇绝佳的演说，更惊人之处在于：叶尔钦虽然充满个人魅力，却向来不是个特别鼓舞人心的演说者。

沙皇和他的家人重新安葬那年，廖沙十三岁。他在四年前读过一本关于沙皇一家人遭处决的书，决心要痛恨杀害儿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母亲几年前就把书桌上的列宁半身像藏起来，同时开始把这一类书籍带回家。当学校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开学时，廖沙全班都在讨论叶尔钦的演说。他们得出结论：如今在这场葬礼之后，苏联时代终于结束了。

但这意味着什么？索利卡姆斯克开始重建一座被布尔什维克党摧毁的大教堂。苏联时代被改成监狱的一所男子修院，也重新开设为修院。某种意义上，这些事件在廖沙看来全都与叶尔钦在圣彼得堡那座华丽大教堂里的演说直接相关，就在叶尔钦鞠躬之后，镜头转而拍摄那片精美穹顶与壮丽的吊灯。

叶尔钦的简短演说包含两个关键讯息：全国团结的需要，以及全国悔罪的需要。但只有团结的部分获得注意，或许是因为这种话之前就听过，当时搭配着「和谐与和解」。但救赎与承受苏联时代罪行责任的观念，却只在面向全国的讲臺上响起这么一次，就在那一天的圣彼得堡，而它们仍在彩绘华美的穹顶下某处飘盪着。涅姆佐夫对自己一九九○年代的政治生涯写下了详尽的回忆录，却只字不提自己身为遗骸辨识委员会主席的角色。至于叶尔钦，他把整个「国家观念」主题从回忆录中完全捨去。就在葬礼仅仅两年后，叶尔钦于二○○○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将自己在重新安葬典礼上的演说「引述」如下：

多年来，我们隐瞒了这桩恐怖的罪行，但说出真相的时候到了。叶卡捷琳堡屠杀是我国歷史最可耻的其中一页。当我们安葬这些无辜受害者的遗骸，我们也为祖先的罪恶寻求救赎。罪责归于犯下这一暴行的人，以及数十年来为这种行径辩护的人。……我向这些遭无情杀戮的受害者鞠躬。……运用暴力改变我们生活的任何企图都注定要失败。註271

在这个演说版本里，罪责完全外部化了。共同承担责任的主题以及这一刻歷史意义的概念，全都被略去。涅姆佐夫和叶尔钦这两人的遗漏，显现的是对这两个政治人物而言，象徵领域在多大程度上退居于实质之后。叶尔钦的省略同时意味着，他在代表自己的国民承担「流血和无法无天的一世纪」沉重责任的唯一一次尝试过后，再度变卦。

*

廖沙成为青少年的时候，他对苏联的全部电影作品已经如数家珍——苏联制作的电影数量之少，又在电视上反覆播放，他才有办法全都看过。他喜欢和母亲一起观赏一九三○年代和一九五○年代的宣传音乐剧，以及一九七○年代略带苦涩的喜剧——眨眼微笑、心照不宣地讽刺布里兹涅夫统治——但他的最爱仍是刻划伟大卫国战争的电影。他每一部都喜欢：一九五○年代的通俗剧、一九七○年代过分煽情的英雄电影，以及唯一一部承载着沉重而复杂弦外之音的一九七○年代电影（片名是《二十日无战事》〔Twenty Days Without War〕）。基本上，他热爱伟大卫国战争。

多数俄国人也是如此。一九九四年的调查显示，歷经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的这一切动盪之后，他们比以往更加依恋这次在国家歷史中占有明确地位的事件。古德科夫阅读着问卷回应，将这场战争想像成一辆理想的车。这辆车的头灯照亮了苏联跻身世界强权的未来，尾灯则将赐福的光芒投射在战争前苏联政权的罪行上；它的重量便利地掩盖了苏联军人的惨重伤亡，以及让苏联得以用牺牲换取胜利这种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古德科夫还想像不到的是，像廖沙这样出生于重建时期开端的人，却完全认同一场早在他出生前四十年就已经结束的战争。

玛莎也爱这场战争。随着她进入前青春期，她和母亲展开了一场不对称的争执。塔蒂亚娜对于她们何以继续在剥落的灰泥里过日子，表述得愈来愈露骨。她说，俄罗斯的生活什么都不是，也算不上任何一种生活。她当然不是在说她们过得不好——这时已经很清楚，她们多少称得上有钱人家——但她的意思是，非得包红包才能办成任何事的生活，是每天受人羞辱的生活，为了表示抗议，她持续故意不重新粉刷、重贴壁纸，也不买洗衣机；她们反倒将洗衣工作交付给一家新开的、名叫黛安娜（Diana）的洗衣摺衣店，它在全市各地都有收货点和交货点。这个举动的含意在于她们总有一天要到别处过值得过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出了俄国才有。

为了反抗母亲的抗议行动，玛莎加入了青年水兵俱乐部（Young Seaman Club），虽然他们接受一个女孩的姿态多少有些屈尊。俱乐部提供射击练习、无止尽地谈论俄军的强大，以及电脑程式设计课程——最后一项才是塔蒂亚娜允许玛莎加入的理由。距离塔蒂亚娜和玛莎同住的破败公寓一小段电车车程的希姆基水库（Khimki Reservoir）一解冻，青年水兵就会开始训练，划着小小的划桨船绕行水库一圈。他们航行到圣彼得堡参观真正的海军船坞，但玛莎不能同行，因为那艘船无法为女性提供住宿空间。

但身为唯一的女青年水兵，玛莎获得了参加一九九五年五月九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门票。世界各国的领袖都会前来，

即使要安排他们前来绝非易事。叶尔钦正因车臣战争而遭受国际批判，美国总统柯林顿（Bill Clinton）直到三月都还在犹豫。做为让步或劝诱，叶尔钦承诺取消有战车和飞弹参加的红场阅兵游行。这样的游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举行，首先是为了震慑潜在敌人，二战之后则是为了庆祝胜利，但一九九○年之后就不再举行。一座小教堂甚至在红场入口处重新建造起来，一九三一年之前它就坐落在这个位置，其后由于阅兵日的武器装备需要进出，又被拆除。为了纪念胜利五十周年，官僚再次策划举办阅兵典礼，但叶尔钦主动提议改到他处进行，让外国领袖得以检阅红场上的二战老兵分列式，但避开军队游行。

柯林顿来了，英国首相梅杰（John Major）、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德国总理柯尔（Helmut Kohl）及其他许多外国元首也来了——这是同盟国在一九四五年之后首度齐聚俄国领土上，也是莫斯科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名流盛会之一。註272来自世界各国的军乐队在红场旁的歷史博物馆前游行，玛莎得以参加的正是这一部分纪念活动。她觉得非常精彩。就连塔蒂亚娜也不得不承认，她看得出这些活动的吸引力。玛莎得意洋洋地紧紧攒着一位美军铜管乐队队员送给她的熨烫补丁贴。

*

歷史博物馆仍旧呈现了自石器时代起一路延续到苏联的故事，不少儿童十月团员留下的印象是史前人类竟然直接演化成了列宁；在没有胜利日阅兵的日子里，它成了吸引各式各样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磁石。男人在它的走廊上闲晃，偶尔女人也加入，对着每日排队入馆的数千人发表演说、即兴组织小组讨论、发送传单，以及最重要的，贩售书籍和期刊。人们来到这儿购买《我们这一代》杂志，以及其他自我标榜的「爱国」出版品。俄国和俄国人主题的书籍重到把摺叠桌压得变形，这些书籍从乘坐哲学家之船离境的学者论着到《锡安长老会纪要》，不一而足。

远比其他书籍更显眼、数量也更多的，则是列夫．古米廖夫（Lev Gumilev）的着作，这位多产的民族志学者，其着述在苏联时期无法被一般大众读到。古米廖夫是俄国歷史上最伟大诗人之一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与身为沙俄军官的诗人、最后被布尔什维克党处死的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Gumilev）两人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在一九三三年首次被捕，但为时不久，当时他才二十一岁，两年后又再度被捕。这次他被关押数月，获释后也遭大学退学。他在一九三八年又一次被捕，往后五年都在古拉格劳改营度过，获释之后几乎立刻被徵兵入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终于得以重返学术研究，在三十六岁那年通过博士论文口试。然后他再次被捕，判刑十年、服刑七年之

后，由于赫鲁雪夫谴责史达林的政治迫害而获释，在四十四岁时终于得到自己的第一份研究职位。不过他说自己最重要的概念，是在劳改营里构思出来的。註273

古米廖夫的思想核心是族群溯源（ethnogenesis）概念，按照他的理论，不同族群经由这个过程而形成，并取得代代相传且与众不同的特色。一个族群，或古米廖夫所谓的民族（ethnos），由两股最强大的力量塑造：他们生活的地理条件，以及来自外太空的辐射。古米廖夫在他讨论族群溯源的着述中，详细说明了他对辐射及其导致基因变异的概念，而他的歷史着述则跟随地理决定论，汲取欧亚主义（Eurasianist）理念──这个思想学派大约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同时诞生，显然是对革命的回应──主张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困境决定了俄国独特的发展过程。註274

古米廖夫获释并恢復名誉之后，只勉强见容于苏联学术建制，其思想大多受到避忌。但在一九九二年去世前夕，他仍得以享有一、两年的人气，甚至名声：他录制了一系列演讲，经由电视播送而让千百万人得以收看；原先写给学界读者的书籍，印刷次数随后更打破了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切纪录。他是后苏联时代完美的知识界英雄，虽然受害于政权，心智看来却战胜了伤天害理的逆境。他鼎鼎大名的母亲最着名的诗作是一首令人心碎的组诗，名为《安魂曲》，在苏联祕密流传，说的正是他被捕入狱的故事。

拂晓时他们把你带走，
我像是送殡似地跟在你身后，
孩子们躲在小屋里哭泣，
蜡烛在神龛前融流。
你嘴唇上还留有小圣像的冷气，
额角上渗出冰冷的汗滴……这岂能忘掉！
我要像古代射击手的妻子们那样，
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哭号。註275

古米廖夫的知识探问，可以被看成是社会科学在苏联命运的本质（或讽刺画）：花了数十年在敌对环境下工作，与他人的思想隔绝，奋力在一片黑暗中发明轮子。单打独斗的古米廖夫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宇宙论，其中包括外太空辐射。他的全套理论及其科学光环，必然吸引那些后苏联心灵，他们才刚丧失对世界的一套通盘解释。民族成了俄国人日

常对话的内容，古米廖夫发明的其他概念也是，像是热力值（passionarnost’），这是一个民族最初吸收辐射、终至拥有民族特有能力的程度计量值。

其他提供整体性及科学语言的思想学派，也正在俄国站稳脚跟。比方说，社会学特别受到小企业主和小城市官僚的欢迎。但有两种属性，使得古米廖夫的思想完全符合这个歷史时刻的需求。他对族群根本性质的坚持，有助于解释帝国所承受的痛苦；他的地理决定论则非常适合俄罗斯命运独一无二的观念，列瓦达的调查已经揭示出这种观念对俄国人来说何其重要。

玛莎的祖母被古米廖夫的理论吸引了。玛莎的母亲反对这套说法。她选择了数学家阿纳托里．福缅科（Anatoli Fomenko）发明的一套完全不同、但仍包罗万象的修正主义理论，他宣称自己的计算改写了全部的世界歷史。歷史在他的故事里更短、也更浅显易懂：中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帝国，俄罗斯位于世界中心；在这之前几乎一无所有。传统的歷史纯属虚构，由统治世界的俄国人编造出来以自娱自乐。福缅科是典型的阴谋论者：他藉由以随机数学假设为基础的坚定逻辑来证明自己的论断，并将所有相反事证一概斥为敌人的捏造。福缅科在精密科学群体里尤其受到欢迎，就连世界西洋棋冠军卡斯帕洛夫有一阵子也是大力宣扬的拥护者。註276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位数学家，他崇拜福缅科，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更将福缅科拔擢到校内数学层级的最高位置，为其理论添加更多可信度。註277这成了家庭内部争吵的又一个理由：玛莎的祖母滔滔不绝地高谈族群溯源论；玛莎的母亲向她咆哮道，数学证明了万事万物其实都是另一回事；玛莎的祖父则用最高声量吼叫着说，一切全都是犹太人的阴谋。有时他也会扯到同性恋者，不过玛莎的母亲这时总会指出：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者，却是伟大的俄国作曲家。她还会对玛莎补充道：皇后合唱团的佛莱迪．墨裘瑞（Freddie Mercury）也是同志。

*

杜金吸收了古米廖夫的整套学说，做为自己的科学基础。古米廖夫的语言成了他的语言，他也运用古米廖夫的前提推导出自己的新见解。他写作的速度几乎跟阅读一样快，先是为爱国媒体发表文章，再将这些文章以每年大约一、两本的速度集结成书。既然可以读到的出版品近乎无限量，他信手拈来都能找到可用的观念。德国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是希特勒最喜欢的法学家，他成了杜金的灵感来源，但创造出「开放社会」概念的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同样也是他的灵感来源。出生于匈牙利的美国亿万富豪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解体的东方集团各国设立许多基金会和教学

机构，数十年来他一直景仰波普尔，他所设立的大多数机构名称里都包含「开放社会」一词。波普尔的理念代表了俄罗斯如今自称想要成为的一切，而他本人曾经提出一个二元对立：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金想要成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一九九四年，杜金发行了《保守革命》（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一书。他在这本书中展望一场运动，对抗他所谓的「极端人文主义」（extermist humanism）□□认为世界各地所有人类都享有权利的理念一及社会依法建立的概念。他解释，这些从西方输入的观念之所以错误，正因它们与俄罗斯人根本是异质的，俄罗斯民族按照自身命运而发展，地理位置则让俄罗斯天生就以美国和英国为敌。註278

杜金和两位比他年长、也比他有名的人物搭档：一位名叫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的摇滚乐明星，和一位名叫爱德华．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的作家。两人都是身穿皮夹克的波希米亚人，用尽一生对抗他们所遭遇的任何体制。利莫诺夫是苏联时代的地下诗人，于一九七○年代待在纽约，自认为是同志暨流浪汉，一九八○年代又在巴黎成为前卫作家，后来借道南斯拉夫返回俄国，途中与波士尼亚塞族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同行，枪杀波士尼亚穆斯林取乐。这时的利莫诺夫正在想方设法，要让自己的声音在后苏联俄国的众声喧哗中被听见。他们三人一同接受了比利时人罗伯．史托伊克斯在三年前向杜金提倡的理念，成立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ational Bolshevik Party）。对于利莫诺夫、列托夫，以及另一位立刻加入这个大名如雷贯耳团体的前卫音乐家来说，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是一项艺术实践。杜金则更认真地将它当作一项长程计画，既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在往返穿梭欧洲各地，参与新右翼集会将近四年之后，杜金不再出国，集中心力处理俄国事务。他起草了创党宣言，以下是部分内文：

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精准也最完备的定义如下：「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开放社会的一切敌人普遍拥有的超意识型态。」它不只是与开放社会为敌的其中一种意识型态，更具体地说，它是完全有意识地与开放社会全部且在本质上相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建立在完全且激烈地否定个人及其中心地位之上。註279

不管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还是纳粹党人，都不曾宣示得这么露骨。

註252：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p. 466-468.

註253：Yuri Levada, “’Chelovek sovetskiy’ pyat’ let spustya: 1989-1994 (predvaritel’niye itogi

sravnitel’nogo issledovaniya),” Monitoring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no. 1 (1995), pp. 9-14.

註254：Richar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89; Yulia Larina, “Krasno-belo-goluboy ogonyok,” Kommersant, December 26, 2005, http://kommersant.ru/doc/2296344（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255：Stariye pesni o glavnom 1 aired on ORT on December 31, 1995, http://www.1tv.ru/cinema/fi=8630（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256：编按：该片的制作人是后来成为第一频道执行长的康斯坦丁．恩斯特（Konstantin Ernst），以及日后成为堪称后苏联时代最知名也最受喜爱的电视主持人和导演列昂尼德．帕菲诺夫（Leonid Parfenov）。

註257：Oleg Orlov and Alexander Cherkasov, eds., Rossiya-Chechnya: Tsep’ oshibok i prestupleniy (Moscow: Memorial, 1998).

註258：Kirill Rodionov, “Byli li chistymi prezidentskiye vybory—1996?” Gaidar Center, July 30, 2015, http://gaidar.center/articles/transparent-election-1996.htm（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259：叶尔钦一九九四年八月访问下诺夫哥罗德的影片，参看Alexander Gorski, “On mog byt’prezident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jtIQJZ9Kbk（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260：Boris Nemtsov, Isproed’ buntarya (Moscow; Partizan, 2007); Ludmila Telen’, “Soprotivleniye materiala: Boris Nemtsov pytayetsya sovmestit’ zhizn’ s politikoy: Obe soprotivlyayutsya,” Moskovskiye novosti, June 18, 2002, http://nemtsov-most.org/2016/03/29/the-resistance-of-the-material-interview-part-i/（二○一六年四月二日浏览）。

註261：Viktor Yaroshenko, “Yegor i Boris: Kommentariy k zabytomu telereportazhu,” Fond Yegora Gaidara, February 26, 2016, http://gaidarfund.ru/articles/2541（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262：Yegor Gaidar, Dni porazheniy i pobed (Moscow: Alpina, 2014), pp. 383-384.

註263：Boris Nemtsov, Provintsial，手稿撰写于一九九六年，出版资讯不详，PDF档取自网路，p. 78。

註264：叶尔钦一九九六年的竞选影片，可见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AnpikvpZSI&index=24&list=PLsyd8Y6Pb3j3IuKcRm_dYfOVYUHBUNbgS，以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ddyATMuTM&index=33&list=PLsyd8Y6Pb3j3IuKcRm_dYfOVYUHBUNbgS（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265：Timothy J. Colton, Yeltsin: A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pp. 389-390.

註266：“Boris Yeltsin ishchet natsional’nuyu ideyu,” Nash sovremennik, no. 5 (1997), p. 248.

註267：Yelena Tregubova, Bayki kremlyovskogo diggera (Moscow: Ad Marginem, 2003), p. 69.

註268：编按：沙皇最后的王朝名。

註269：“Tsarskiye pokhorony: Rech Yeltsina,” RTR report, July 17, 199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JDMp_OrlA（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270：“Prezident Rossii Boris Yeltsin na tseremonii zakhoroneniya ostankov chlenov semyi imperatora Nikolaya II v Sankt-Peterburge,” http://yeltsin.ru/archive/video/51553/（二○一六年四月三日浏览）。

註271：Boris Yeltsin, Prezidentskiy marafon (Moscow: AST, 2000).

註272：Igor Sulimov, “Istoriya voyennykh paradov na Krasnoy ploshchadi,” Voyennoye obozreniye, May 9, 2013, http://topwar.ru/27770-istoriya-voennyh-paradov-na-krasnoy-ploschadi.html ; Bernard Gwertzman, “Yeltsin to Alter Parade on V-E Day to Draw Clint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95, http://www.nytimes.com/1995/03/17/world/yeltsinto-alter-parade-on-v-e-day-to-draw-clinton.html?pagewanted=all ; Mark Matthews, “Clinton Agrees to Meet with Yeltsin in Moscow,” The Baltimore Sun, March 21, 1995,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5-03-21/news/1995080017_1_clinton-moscow-50th-anniversary ; “Victory Day: The World to Celebrate in Moscow,” The Moscow Times, April 15, 1995,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victory-day-the-world-to-celebrate-in-moscow/340359.html（皆于二○一六年三月三十日浏览）。

註273：Sergei Lavrov, Lev Gumilev: Sud’ba i idei (Moscow: Airis-Press, 2007).

註274：Mark Bassin, “Nurture Is Nature: Lev Gumilev and the Ecology of Ethnicity,” Slavic Review 68, no. 4 (Winter 2009), pp. 872-897; Mark Bassin, “Lev Gumilev and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and After the Soviet Era,” in Athena Leoussi and Steven Grosby,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osymbolism: History, Culture and Ethnicity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3-160; Alexander S. Titov, “Lev Gumilev, Ethnogenesis and Eurasian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2005.

註275： Poem no. 1, Requiem, from Anna Akhmatova, Selected Poems Including “Requiem,” trans. A. S. Kline, http://www.24grammata.com/wp-content/uploads/2014/08/Akhmatova-selected-poem-24grammata.compdf.pdf, p. 141. 译者按：本诗中译参看阿赫玛托娃着，乌兰汗（高莽）译，《安魂曲》（臺北：人间，二○一一年），页四七。

註276：作者访谈加里．卡斯帕洛夫，二○○五年七月在莫斯科。

註277：Sergei Novikov, “Matematiki—gerostraty istorii? (Ne pogibnet li rossiyskaya matematika?),” http://hbar.phys.msu.ru/gorm/fomenko/novikov1.htm（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浏览）。

註278：Alexander Dugin, Konservativnaya revolutsiya (Moscow: Arktogeya, 1994).

註279：Alexander Dugin, “Metafizika natsionalbol’shevizma,” in Tampliery proletariata (Moscow: Arktogeya, 1997).

# 第十章　一切再度从头来过

赢得选战之后，叶尔钦又开始到处寻找接班人了。如今这项任务的象徵性虽不那么强，却更加急迫了。一九九三年的宪法规定他的第二任期就是最后一任。尽管他可以在法律上论证自己第一次竞选时，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这么做有悖他自己的原则。而且在一九九六年秋天，叶尔钦接受了心脏多重绕道手术，加上他为了连任，进行了非打不可的艰辛战斗，这些事想必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同时，一九九六年的总统选举（后苏联俄国举行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也并未传达出国家今后将由大众选贤与能、产生人才的这层意义。它带来的是反效果，揭示俄罗斯的权力斗争是氏族之战，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哪一方更能有效动员。

古德科夫花了很多时间试图理解这种效果，以及这段叙述肯定也适用于某些西方民主政体的运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美国）这回事。差异存在歷史脉络之中。俄罗斯的氏族是苏联职官名录体系的直系后裔。苏联解体后的五年之内，没有产生培养领袖、公共政治人物，乃至政府官僚的任何新机制。真要说的话，情况恰好相反。从苏共的附随或非直属机构进入政府的年轻一辈都被排挤出政府之外，像是盖达尔和他的内阁成员，他们多半转而投身私营事业。註280前苏联政府、共产党和国安会的人马，填补了官僚体系每一层级的许多空缺，并且重新开始沿着权力阶层向上攀升，彷彿苏联的终结只是让他们暂时休假。在这些老面孔当中只有少数例外—几位民选州长，还有几名投身政界的高阶将领—而叶尔钦恰好不喜欢这些例外之中的多数人。

但鲍里斯．涅姆佐夫不在此限。涅姆佐夫的指定接班人地位在抗议车臣战争之后被中止了，但战争既已结束，他又可以再次受宠。叶尔钦对晚辈鲍里斯的态度始终是家长式的—既关爱又纡尊降贵—这让涅姆佐夫更容易重新得到宠爱。三十七岁的涅姆佐夫被任命为两名第一副总理的其中一位，成为内阁第三号人物。他被带到了莫斯科，所有媒体都把这项人事任命报导成指定储君。

在冉娜看来，这项调动是父亲在政治上自恋的又一步。他当上州长之后，就开发出欣赏自己在电视上模样的这种品味。当他上了新闻—他常有上新闻的机会，因为他是个活跃又极受爱戴的州长—全家人都得收看。他取笑冉娜爱看一部名为《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肥皂剧，他开玩笑说，要是他奄奄一息，而《圣塔芭芭拉》正在播放，她就不会注意到自己。这让他听来彷彿在妒忌一齣电视剧，但冉娜更加荒诞，她妒忌父亲对自己在电视上形象的痴迷。每年年底，地方电视臺通

常都会准备两小时的年度回顾特别节目，事实上这是以鲍里斯．涅姆佐夫为主角的节目，而他会黏在电视机前整整两小时。对冉娜来说，政治现在就是这个意思：父亲对萤幕上的自己有着贪得无厌的品味。如今这份努力，带领全家人离开冉娜所爱的别墅、离开森林和她的单车，来到了莫斯科。

鲍里斯允诺，他们到了莫斯科也会住进森林里的别墅。他没有说谎，但也不完全是事实。那确实是一栋别墅，位于昔日的共党权贵村庄里，配备布满灰尘、毫无人味的家具。冉娜的学校位于莫斯科的正中央，就算内阁阁员享有行车特权，前往学校的车程也好像没完没了。这所学校过去专供苏联菁英就读，如今则由新富阶级子女栖息，他们被学校英语教学优秀的名声吸引而来。这些学生包括铝业大王的女儿、游戏节目主持人的女儿和媒体巨头的女儿。冉娜那年十三岁，侷促不安再加上她来自外省的身分。她的衣着平凡，对奢华品牌一无所知，也对昂贵的名车闻所未闻。她不出国度假，也没想过未来要到哪一间昂贵的西方学校就读。她不属于这里。

在学校过了一季之后，冉娜宣布她要回到下诺夫哥罗德。父母亲知道不要跟她争辩。她的老师说：「你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无论她放弃的未来是否如老师所暗示般那么光明，冉娜一点也不想要。她回到下诺夫哥罗德和祖母同住，回到以前的学校读书。

回到莫斯科，她的父亲也正在经歷与她近似的沮丧和羞辱。约莫在抵达莫斯科之时，涅姆佐夫出版了自己前一年撰写的书。这本小书名叫《外省》（Provincial），即使书名讽刺地想保持一定距离，但内容却贴近莫斯科当下。它显露出一个过于自信的年轻人被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所眩惑。全书最有声有色的内容，是涅姆佐夫对他有幸遇见的所有男性名人──以及一位女性，玛格丽特．柴契尔──的一系列简要介绍，从叶尔钦到李察．吉尔（Richard Gere），其中包括涅姆佐夫对某些他如今要在莫斯科共事的人所做的简短侧写，以及对他们至今为止的进展毫无恭维之意的描述：

我们生活在无形的时间里。有何改革可言？真正的改革未曾发生！消费品价格解除了管制、所有人的自由权利得到宣告，这些算什么改革？改革包含了逐渐放松缰绳，过程中稳定掌控压力水平。你必须有能力辨别自由和完全缺乏监督两者间的差异！註281

涅姆佐夫写道，政府不仅忽视了自身的监督功能，更任由自己被新富阶级操弄。他将这些人的影响力，与神祕主义者格里高利．拉斯普丁

（Grigory Rasputin）在一九一○年代对俄国末代沙皇施加的影响力相提并论：

俄国始终受拥有职衔和身分的官方当权者掌控，也受非官方的当权者控制。比方说，我们有过格里什卡．拉斯普丁。如今我们有了某种拉斯普丁集团。人数很多，但全是无名小卒。格里什卡是个非凡之人，有自己的天赋。但对于今天围绕在沙皇身边的这些人，你实在没办法这么形容。註282

涅姆佐夫发明了两个词：「寡头」和「强盗贵族资本主义」（robber-baron capitalism）。这两个用法都延续下来。註283他一到莫斯科，就想出一个让有钱人循规蹈矩的计画。有了在下诺夫哥罗德有效施展权力的五年经验，他确信就任新职之后，把联邦政府整顿得井然有序就纯粹只是意志问题。註284他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叶尔钦，概述他称为「克里姆林宫收归国有」的这个计画。备忘录解释，克里姆林宫（涅姆佐夫和其他所有俄国人以此借代「国家的政治权威」）就像商店和石油公司那样被民营化了，如今必须由民选产生的合法主人收回。涅姆佐夫的「收归国有」包含了小规模和大规模的措施。克里姆林宫核发给寡头们、让他们得以进出城堡不受限制的身分证必须收回；由克里姆林宫核发、令他们不受交通规则约束的牌照和蓝色闪光灯也是一样。进一步的民营化必须公开透明，为所有潜在投资人创造出公平竞争的环境。股票担保融资（loans-for-shares）的标售行为必须停止。这些标售藉由将多数股票担保的信用贷款借予大公司，让投资人得以掌控公司，因为他们知道公司还不起贷款；标售本身通常就是由潜在的贷方所组织。

叶尔钦喜欢这个计画—涅姆佐夫日后写道，关于寡头出入特权的那部分想必特别令总统感兴趣，因为这让总统想起了昔日共党分配及控管额外待遇的体系，那正是叶尔钦曾经强力挞伐的对象。但政府一旦开始试图实施民营化竞争环境的均等方案，寡头们立刻对政府开战。涅姆佐夫严重误判了形势：他以为自己在地方上磨练出来、用以对付权力衰退的旧苏联式头人那套工具，同样能够对付扶摇直上的寡头们。他也倚靠自己身为政府官员的威信，却没有意识到权力在莫斯科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某人与叶尔钦的亲近程度，以及叶尔钦是否予以眷顾。总统在理论上仍继续支持涅姆佐夫的计画，但他对舆论战以及涅姆佐夫缺乏的应战技巧却是愈来愈恼火。註285

涅姆佐夫公开质疑寡头们的正当性和能耐已经侮辱了他们，现在他还要夺走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潜在财富。然而他们拥有媒体。他们通常

运用媒体彼此交战，但如今他们联手来对付他。莫斯科的记者们嘲笑他的理由，和冉娜在学校里被有钱同学霸凌时完全一样：他对衣着和车款一窍不通。他在夏季的大热天穿白长裤，在机场迎接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亚塞拜然总统。如此丢人现眼地违背外交礼节，在电视上被反覆播出。註286至于车款，涅姆佐夫当时正在游说，要求明文规定政府部门只能使用俄国国产车接送各级官员。此时的莫斯科官员已经在使用宾士S-Class了，涅姆佐夫被描绘成不只对车款无知、更有贪腐嫌疑，因为他要求使用的伏尔加轿车，是在下诺夫哥罗德生产的。全国最受欢迎的电视主播之一谢尔盖．多伦科（Sergei Dorenko）指称涅姆佐夫参加了性爱派对，僱用脱衣舞孃表演，却没付钱给她们。註287涅姆佐夫后来写道，多伦科几年后对他说，是他自己僱用了那些性工作者在萤光幕前诋毁涅姆佐夫。註288

涅姆佐夫的全国支持度在他来到莫斯科时将近五成，这时却跌落到低于检测水平。註289他再也不是叶尔钦的指定接班人了。

*

一九九五年，玛莎的母亲放弃了零售生意。她不再往返穿梭进口难看的韩国手提包。她用挣来的钱在莫斯科西北的伊斯特拉河（Istra River）买下一间别墅，并且重回大学读书。她想要再次活用自己的智能，但物理学显然不可能让她赚到钱。有人告诉塔蒂亚娜一个新领域，名为精算学（actuarial science）□□这在俄国是新鲜事。也就是说，市场需求催生了它，但够格研究这个领域的人极少。塔蒂亚娜思忖，靠她的统计物理学背景，她能学得成，而且很快。然后她在修课时认识一个来自军人保险公司（Military Insurance Company）的男人，他给了她一份工作。

一如许多新事业，军人保险公司也是新需求结合旧有资源及管道所孕育的产物。塔蒂亚娜的新老闆是退役军方高层，他们运用专长和人脉创立了公司；一开始的事业成就多半利用了法律漏洞，让客户得以运用保险政策中看似保费的部分逃税。但他们的某些业务确实是保险，而塔蒂亚娜证明了她新近习得的精算技术十分宝贵。退役上校们喜欢她。这是她未曾接触过的陌生环境，但他们善待她和玛莎，有时玛莎会在塔蒂亚娜似乎不曾离开过的办公室待上一会儿。

塔蒂亚娜并没有完全改变她对俄国未来这一课题的看法—她仅仅是把自己的期望调整了一个世代。她自己大概不可能去别处生活，但她的女儿可以。为了这个目的，她不但确保了一份体面且稳定的收入，还把大部分的钱用来为玛莎请家教，如今玛莎的任务是考取莫斯科国立大学，日后再把学位增值为一张出国读研究所的门票。

接着，在一九九八年八月某日，塔蒂亚娜的银行提款卡失效。她们在世上所有的财产全在那个户头里。这个词叫做「违约」（default）。俄罗斯不再偿还国债，这意味着卢布重贬、物价飞涨、恐慌大作、人们奔向银行挤兑现金，银行则切断客户使用户头的管道。在几个案例中，这种作法仍不足以避免银行倒闭。

玛莎必须停聘家教，也不能再拿衣物去送洗。但真正令玛莎惊恐的，是不用卫生棉将就过日子的可能性。她最近月经来潮了，塔蒂亚娜对她说，她们在苏联时代得用棉花度过经期（她省略了一件事：不见得能顺利获取棉花）。要是玛莎下次经期来临前塔蒂亚娜还没取得现金，她是不是就得用棉花呢？要是「违约」的意思是卫生棉会从商店完全消失呢？这些想法严重到令她无法承受。她们认识在宝硷公司（Proctor & Gamble）工作的某人，才刚领到牙膏、棉垫等产品代替薪水，玛莎说服母亲设法用任何物品换回一大盒量贩用卫生棉。

这份恐慌并未持续很久。数月之内，塔蒂亚娜就定期领到薪水，她们又开始将衣物送洗。她们家的迅速復甦得归功于军人保险公司时来运转，公司刚确定和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Bureau, FSB）签订一份大手笔的新合同，就在叶尔钦任命一位新局长之后。他是一名来自圣彼得堡的上校军官，名叫弗拉基米尔．普丁。

*

对一位生活在索利卡姆斯克的教师来说，復甦则歷时更久。廖沙的母亲和她认识的其他教师一样，在整个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学年里都无薪工作。她的丈夫仍然从矿场获得一份薪水，但让他们得以维生的是廖沙母亲的马铃薯园。他们没吃马铃薯的时候，就吃义大利面拌糖──从加林娜儿时流传下来、制造饱足感的一道菜。他们接连数月不知肉味。

*

一九九八年夏天，冉娜同意回到莫斯科，但有个条件：她要去读一所普通人念的学校。第三一二小学普通到连不抽菸、不喝酒的学生，在那儿都显眼地尴尬。但还没等到九月学校开学，冉娜就经歷了永生难忘的一天。

他们当时住在花园环路（Garden Ring）上，这是围绕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条环形大道。叶尔钦在那儿分配给涅姆佐夫一间公寓──此时这种做法简直成了各级政府的常规：法官会从市长那儿获赠一间公寓，地方议员得到州长赠予的公寓，涅姆佐夫这样的内阁阁员则由总统亲自拨给。这套报偿体系与前苏联特权分配体系的差异，在于新的做法更为个人化而非系统化──每间公寓都依照上级的意愿，由上级决定赠予。此外，不同于苏联的公寓名义上为国有财产，这些新公寓成了受赠者的财

产，无论他在职几年或是几个月。

花园环路上的一间公寓是特权与声望的标志。它同时是个非常便利也非常不舒适的居住场所。你从那儿前往市区任何地方都很快，但花园环路本身却时时刻刻都有大量车流，使得人们甚至不能打开面向道路的窗户，因为有太多噪音和脏东西会涌进屋内。他们紧闭窗户，看着薄薄一层黑在窗外愈变愈厚，覆盖住他们。

但在八月那一天，冉娜走到窗边却什么也看不见。本应拥挤不堪的道路上只看得到几辆车—它们彷佛大逃亡行列的掉队者。一定有坏事发生。她父亲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经济危机迫在眉睫。那必定就像现在这副模样。

涅姆佐夫一直在对俄国日益积累的国债发出警告。涅姆佐夫确信，充满误导又假扮成自由的政府放任心态，完全无法为走向内爆的经济承担责任。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可夫列夫透过自己身为苏联领导阶层一员亲身经验的视角观看这个问题，看到的是他在重建时期最难对付的那个集团获得胜利。他们是苏联工业的首脑，在计画经济体系里进入政府担任部长职务，但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就只称他们为「黑手党」（Mafia）。註290他确信这群人又一次合谋获取（并掠夺）大笔金钱。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e）经济学者克利福德．盖迪（Clifford Gaddy）提出了激烈的断言：一九九○年代前期俄国的一切改革措施，全都无法动摇统制经济的巨兽们，使它们继续以一切不合逻辑和极其无利可图的方式支配俄国经济。按照盖迪的说法，新经济的一切表象—理应由市场主导的物价、具竞争力的薪资、课税—纯属错觉，别无其他。他称之为「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早在这个形容词产生不一样且更迷人意义的很久之前就发明了它。他的意思是，这个国家假装自己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但实际上交易仍靠以物易物，且从未完全履行任何金钱给付义务。他同样归咎于那些未经改革且政治势力强大的统制经济核心—令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担心的那帮黑手党—所经营的那些低效能却庞大的公司。涅姆佐夫所忧虑的那些「强盗贵族」是「虚拟经济」之王。註291

不论这些批判者—包括内阁第三号人物—聚焦于债务、苏联经济游说集团犹在的影响力，或是俄国新经济的想像本质，他们对局面无以为继、政府矢口否认倒是所见相同。涅姆佐夫一直在提倡货币改革，包括将卢布贬值—或许能藉此让整个货币体系少一些「虚拟」—但这些提案都被驳回了。俄国反倒变本加厉地举债，好支撑通货。国债堆叠成了金字塔，终于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崩塌。这就是「违约」—涅姆佐夫从新闻电讯里读到这个词，冉娜则从广播中听到。俄国不再清偿国债，人们陷入恐慌，银行不再发出现金，车辆不再奔驰于花园环路上。

涅姆佐夫想要辞去内阁职务，但雷莎说：「违约的人又不是你，也轮不到你辞职。」叶尔钦说了本质相同的话：他开除了多数内阁阁员，但留任涅姆佐夫。但叶尔钦的政治力量因经济崩盘而大为衰弱，再也不能指望促使国会通过他亲自指定的总理人选。七十岁的对外情报部门资深官僚叶夫根尼．普里马可夫（Yevgeniy Primakov）最终获得国会确认执掌政府，他体现的是苏联官僚绉巴巴灰西装的精神特质。涅姆佐夫辞职了：他无法在普里马可夫的内阁施展拳脚。

时间马上就走慢了。新年过后，涅姆佐夫一家人飞往美国。他们在哈佛停留一个月。涅姆佐夫以俄国经济为题举行讲座，他主张俄国经济亟需巨大重组及深层清洗。註292这家人在大学宿舍分得一个房间，天花板的灰泥剥落、上下铺床嘎吱作响，后来还发现了床蝨。鲍里斯提出申诉，于是一位教授将他们安顿在自己没在使用的公寓。冉娜获准在剑桥一所邻近的私立学校上课。她很开心。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许多年来更好。他们在哈佛之后又到了纽约，持续着缓慢而亲密的暂时流放生活。

*

回望俄罗斯，政治却在加速。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开始轰炸塞尔维亚，以回应南斯拉夫出兵攻打科索沃一事。空袭开始时，普里马可夫总理恰好正在前往联合国途中。这次行动的侮辱与伤害完全一览无遗。俄罗斯长久以来都认为信仰正教的塞尔维亚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盟友。科索沃在法律上则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穆斯林占多数、意图分离的一部分—与车臣近似之处十分明显。普里马可夫才刚抵达美国几小时，而美国总统柯林顿至少也该口头上先问过他一声，连这么做都没有就是存心侮辱。普里马可夫下令掉头，原机折返俄国。

隔天，玛莎的班级前往列夫．托尔斯泰大街上的托尔斯泰图书馆校外教学。他们最近刚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的情人—令人无限渴望的渥伦斯基（Vronsky）在故事尾声志愿参战，为塞尔维亚人对抗土耳其帝国。这些十年级生沿着托尔斯泰大街散步，一边讨论着北约空袭塞尔维亚一事。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暴行、背叛，实际上是美国攻击俄国。对玛莎来说，她脑海中最具权威和最热情的两种声音—前者来自练兵备战的水兵俱乐部，后者来自爱看电影的母亲—此时终于匯聚成了一种热情。美国人正在大导演埃米尔．库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的国土上，轰炸玛莎的塞尔维亚兄弟。

古德科夫的同事们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代表多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应答者表示，他们对空袭感到「愤慨」；高达百分之九十二表示，他们确信这次轰炸是非法行为。百分之二十六应答者说他们觉得「焦虑」，

百分之十三则承认自己感到「恐惧」。註293古德科夫感受到，愤慨、焦虑、恐惧这三种情绪全都是「羞辱」的替代，羞辱感来自俄国在世界舞臺上丧失地位的事实被无情地摆在眼前。普里马可夫在大西洋彼岸骤然动怒，更增强了这种情感。

五月九日，空袭开始一个半月后，红场举行了十年来第一次胜利日阅兵游行。这次游行并未像过去那样出动战车、飞弹，只有全副武装的军人列队行进，他们的行进方向也与苏联时代红场入口处小教堂修復之前相反。但队伍最前端四个踢正步的军人──三名年轻军官跟随一名领队──高举一面镰刀与鎚子红旗，样式如同一九四五年插上德国国会大楼的那面红旗一样。叶尔钦并未站在苏共总书记传统上的位子──列宁陵墓顶端，但他在这位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遗体死后七十五年仍然公开展示的这座花岗岩建筑正前方设置指挥臺，仍旧承担了监督游行的传统角色。这是伟大卫国战争五十四周年纪念日，但电视旁白宣告这个数字时宛如它具有特定的象徵意义，并且接着强调：「不论今天有谁试图贬低我们战胜的意义，它在人民心目中永远都是伟大胜利。」註294无需明指，人人都知道试图追溯既往「贬低我们战胜意义」的，正是发动轰炸的北约。

古德科夫想着，叶尔钦终于打出了他长久以来始终不肯打的一张牌：用伟大卫国战争的神话维繫自己的正当性。

*

胜利日阅兵过后三天，叶尔钦开始检阅一连串接班人选。他不信任而且摆明不喜欢的普里马可夫首先出局。他任命了四十七岁的原任内政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Sergei Stepashin）接任总理。官僚生涯都在执法部门度过的斯捷帕申，这十年来频频进出政府，因此是个熟面孔──即使他欠缺人格力量，不足以触发任何特定情绪反应。如今他藉由出任总理而成了叶尔钦的指定接班人。

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在五月结束，经由谈判达成的协议，使得科索沃事实上成了西方强权的保护国。维持和平部队开始进驻科索沃地区各处要地，显然要长期驻扎。六月十二日，恰好在俄罗斯独立纪念日这天，英国维和部队原定要进驻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Pristina）的机场，但在前天深夜，两百名驻守在波士尼亚的俄国维和部队官兵突然跨越边界，进入普里什蒂纳并抢占机场。这次行动似乎没有任何战略目标，甚至未经规划──俄军对后勤补给毫无安排，最终得仰赖同情他们的北约部队接济。而在俄国本土，这次毫无意义且不受抵抗的军力展示却大有效果。玛莎和她的朋友们为这次包围机场行动喝采，一如他们为俄国足球队战胜荷兰队时欢呼那样。一星期后，俄国同意派遣三千六百名

官兵前往科索沃，与西方维和部队合作，实际上修復了双方在空袭开始之后决裂的关系，但俄军不受北约指挥。註295

不到三个月时间，叶尔钦对接班人一事再次变卦。他开除了斯捷帕申，任命另一个阴沉而不起眼的人物。但这次的指定接班人近乎没没无闻，他是叶尔钦不久前挑选掌管祕密警察的上校—弗拉基米尔．普丁。

那年夏天，玛莎在中学最后一学年来临前，和一位朋友以及朋友的母亲一同去了克里米亚。他们在阿卢什塔（Alushta）租了一间单人房。他们到海滩游玩，也看电视。玛莎阅读阿赫玛托娃和马克西米连．沃洛申（Maximilian Voloshin）的浪漫诗篇。他们遇见了来自乌克兰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和基辅的青少年，这些人对他们说，他们讲话有莫斯科腔调。玛莎不承认自己说话有腔调，他们才有。他们大笑。他们常常一起喝酒。朋友的母亲先行离开、塔蒂亚娜接替之后，他们更自由了。他们没有门禁。他们深夜在码头上喝酒。某个夜晚，一个疯狗浪把他们全都打下码头，但他们成功脱身，笑得开怀。

「我厌倦了克里米亚。」玛莎有一次这么说：「我想回俄罗斯。你知道的，白桦树、蚊子，还有怀旧。」

塔蒂亚娜觉得滑稽—谁会厌倦大海？玛莎也觉得好笑。但她们前往自己的别墅度过剩余的夏天。那时是八月初。

「所以他现在要当我们的总理？」塔蒂亚娜说：「怪了。」她和这个人谈判过保险合同，对他没有太多印象。

但玛莎对他刮目相看。他是一位情报员。苏联情报员是一群特殊人种。玛莎有一次卧病在床，在祖母的公寓里没完没了地观赏呈现这群人的电影。有一部迷你影集叫做《塔斯社获准宣告》（TASS Is Authorized to Declare），故事内容是一位完美无瑕又才华洋溢的国安会官员揭发莫斯科的美国间谍。指挥这些间谍的美国人约翰．格拉布（John Glabb）是纯粹的邪恶，他不但在非洲小国组织亲美军人政变，还从贫穷国家购买婴儿，把海洛因装进他们体内走私，并且不惜为此杀人。他还娶了一位纳粹富豪的后裔。註296另一部影片名为《死寂季节》（Dead Season），片中有一名苏联情报员卧底潜伏，捕获一名如今为西方强权效力的前纳粹医师。这名医师研发出一种消除个人意志的药水。註297

玛莎也读了做为这些影片改编基础的大量着作。她祖母提供的这类书籍多得数不清。亮光纸制成的书封都遗失了，因此这些书全是素朴的褐色或灰色。书籍外观在美学上的整齐划一以及内容上可靠传达的轻微紧张，与接续而来的天下太平感受互相匹配。大约在八年级时，玛莎读完了这些灰褐色书，开始读红字印刷的黑色精装书，那是八卷本的亚

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作品集全译本。这些书的紧张感更强，但带来的道德满足程度较低。玛莎想念那种感受。

「我希望他成为我们的下一个总统。」她说的是普丁。

*

古德科夫和他认识的多数人一样，猜想普丁只是个临时角色，是一个感到迷失方向的领袖挑选出来的占位符。但古德科夫又不同于他认识的多数人，他痛苦地明瞭多数俄罗斯人对国家下一任总统所寄予的期望：他们要一个救世主，一个不只果断、更有支配力量的人。普丁几乎不适合这个角色：他既没有存在感、也没有履歷。

随后数月发生的事看来令人难以置信。自一九九九年八月到十一月，对于「你是否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丁整体而言表现称职？」这个问题回答「是」的人数，从百分之三十一暴增到百分之八十，回答「否」的人数则从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十二。以图表显示则彷彿两条垂直线，蓝色那条上升，红色那条下降。註298古德科夫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的状况。

更深入的提问则揭示出一个近乎魔术的过程。俄国一直处于一种古德科夫只能称之为抑郁的状态—心理抑郁大于经济萧条。一九九八年的金融危机就在生活看似开始再度回復正常、希望看似得到保障时发生，将人们拖入最黑的黑暗之中—正因为它扼杀了极其脆弱的希望新苗。人们在经济上相对快速地重整旗鼓，但情绪却跟不上—直到普丁出现，十个俄国人有八个光是看着他就奇蹟般地重燃希望。

就政治而言，表面看来情况完全称不上有希望。八、九两月，一连串公寓大楼爆炸案震惊了全国，总共造成两百九十三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政府以这些爆炸案为藉口，对车臣发动新一波进攻，重新挑起了一度让叶尔钦差点赔上总统大位的战争。但这次，古德科夫观察到，即使俄国人为奉命参战的年轻人而心痛，看来却几乎没有人同情他们名义上的同胞—再次惨遭轰炸的车臣公民。还有一点让这场战争不同于第一次车臣战争：这一次，俄军的进攻似乎有了一位领袖带头。倘若叶尔钦在一九九四年发动战争时表现得孤注一掷又漫无章法，那么他的总理时隔五年重启的战端，则表现得英勇无畏，展现出俄国一般人民捍卫者的派头。这种印象主要是基于普丁回应公寓爆炸案的一段讲话：「不论恐怖分子在哪里，我们都会追捕他们。他们跑到机场，我们就追到机场。意思是，抱歉，要是在厕所里抓到他们，就把他们淹死在马桶里，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这样，话题到此为止。」

大多数人在普丁的措辞里看到了勇气与决心，这让他不同于叶尔钦。有些人着迷于他所示意的正派与理性—「抱歉」和「如果有必要」

对这样的阅听人很受用。整体来说，他表现出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又已经准备好领导人民。

谁是「人民」？列瓦达团队进行了第三次苏维埃人调查，结果令他们大受打击。初始研究十年后，这个假说已经完全失效。苏维埃人完全没有像列瓦达所提示的那样消亡。他不但存活下来，反而更持续繁衍——这就意味着他夺回了在人口中的主导地位。

根据一九九九年的调查结果，俄罗斯人比过去更加怀旧了。「你是否情愿一切回復到一九八五年之前的状态？」——也就是重建时期开始之前——获得了明确多数应答者的认同：从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四十四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八。正向看待一九九○年代初期以来变迁的人数比例持续萎缩，表示自己无力应付变迁的人数比例则显着增加。更遥远的过去变得更迷人：如今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人相信史达林统治有益于国家，一九九四年时则是百分之十八。对这位苏联独裁者抱持负面观感的人如今成为少数。俄罗斯人持续认为自己多半「开放」和「忍耐」——提及这些品质的人数比例提高了。同时，应答者似乎对「异常者」更为开明了：如今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想要「肃清」同性恋者，比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二十二更少。但「放任不管」的人数同样从百分之二十九下降到百分之十八。俄罗斯人如今压倒性地想要「帮助」同性恋者——这个选项暗示着某种帮助受苦者的中世纪景象。放在对苏联过去充满怀旧的这个脉络下来看，这些结果全都说得通：它们象徵着重返家父长制国家的又一种方式。註299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俄国举行了后苏联时代第三次国会选举。这看来是新时代极少数无可置疑的成就之一：众多不同政党在尚可称为公平、公开的过程里竞争。它们瓜分全民投票的方式，显示出支持特定政党的庞大群体存在，彼此差异显着。但有些特徵使得这次选举与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选举大不相同。得票领先的政党在选前数月甚至数週才组成。这种状况同样发生在后苏联时代的头两次国会选举，但在俄罗斯自我重塑过程的早期阶段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现在，古德科夫发现自己正穷于理解政党在歷次选举之间被抛弃的因素为何。

这次选举另一个棘手的特徵，则是公众礼仪的变化。地方及联邦政府官员都比非选举时期更加努力争取在电视节目亮相——这很正常。但他们这次不再表现得关心选民；他们始终流露出一脸胜券在握的姿态，让选举听来更像仪式而非竞赛。他们的语气令古德科夫想起了苏联时期的官僚权限。

看着这些资料，古德科夫和他的共同作者鲍里斯．杜宾（Boris Dubin）得出结论，此次国会选举的这两项特徵，都是同一个问题的癥

状：这次选举具有政治竞赛的一切表象，却缺乏实质。看似变革的民主程序本身，如今成了盖迪所描述的「虚拟经济」在政治上的对应━一套拒绝改变的结构所戴上的面具。

俄国当前名义上的多党体制，源自于党国的瓦解。其发展过程和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十多年前向戈巴契夫提议的将共产党一分为二，以开展政治竞争并无二致。这个建议在当时或许看似幼稚，但立意良善：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试图弥合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之间的隔阂。如今看来，这个隔阂无法弥合：旧体制的各种机制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古德科夫和杜宾发现，俄国人不分候选人和选民，全都确信政治权力属于官僚，这不仅合情合理，成为官僚的首要资格便是在官僚体制中的资歷。要是一个政党推动的政纲与现行政策有重大分歧，这个政党就会先验地被看作边缘。选举成了只在非常狭隘的政治圈里进行的支持度测验，居于领先的候选人从本质上来说所见相同。当然，某种程度上许多西方民主政体也是这样，有可能任何西方民主政体都是如此。但西方民主政体并未从歷时七十年的极权政体中继承狭隘的政治视野，它们的未来也并非取决于推动社会根本变革的能力。

如今看来很明显，即使在一九九六年，叶尔钦与共产党挑战者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之间充斥着极端怨恨的竞选期间，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纲领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两者都包含了空泛的承诺，声言建立一套体现人性的市场经济。如今，在这个一年内被两股强烈情绪团结起来的国家里━首先是对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回应，而后是对公寓爆炸案和车臣战争更强烈的反应━完全容不下一丝差异空间。两个新政党就在选举前夕产生。其一是由克里姆林宫专门为了支持普丁继任总统而组成的团结党（Yedinstvo）。另一个政党右翼力量联盟（Union of Right Forces）名义上是团结党的自由派对手，但它同样支持普丁，也支持车臣战争。它们的差异多半在于作风，右翼力量联盟━包括名列五位发起人之一的涅姆佐夫━诉求的对象是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众，正是最大声疾呼反对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同一群人。在索利卡姆斯克，十四岁的廖沙清楚观察到这种干净俐落、其实毫无区分的区分。他的姨妈们从他有记忆以来始终支持共产党，如今则支持团结党，而他母亲更有见识的朋友们，则穿上右翼力量联盟带来城里发的T恤；衣服上醒目地印着「你是右的／对的（Right）」这句话。但母亲的友人和母亲的家人并无意见不合之处，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完全为普丁倾倒。

古德科夫开始觉得，「政党」和「选举」不过又是两个无法适用于俄国的西方词汇━除了产生误导之外。更精准的说法或许可向列瓦达多年以前要古德科夫研读的韦伯借用。韦伯的说法是「鼓掌通过」

（acclamation）让被统治者藉由此一过程，确认统治者早已替他们做出选择。註300

但俄国人鼓掌通过的不只是官僚替他们选择的候选人—普丁是候选人之首—他们也将自己鼓掌通过，获取一份归属感，一份与苏联一併失去的随众感。他们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感受到的空虚逐渐转化成了怀旧，如今则得以聚焦于一人。正是普丁的毫无出众之处，让古德科夫一度以为他只是个临时角色，事实上这使他完美体现了苏联式的领导作风。个人魅力与官僚体系在他身上合而为一。

古德科夫和杜宾将这些观察加进了他们探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国会选举的论文里，论文题目为〈「灰色人群」的时代〉（Time of the "Gray People"）。他们的意思是，想像中彼此竞争的政党之间，区别就像灰色与黑色的差异那样微小—具体说来，所谓的改革派已经将自己的纲领稀释到唯有以全面对苏联怀旧的一片漆黑做为背景才能彰显出来。这个题目也有个文学上的典故，出自阿尔卡季与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Arkady & Boris Strugatsky）兄弟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上帝难为》（Hard to Be a God），一九八○年代的苏联知识人阅读和引述这部小说时，态度一如圣经。小说描述一个未来世界的学术史实验，其中包括一个人为组装的文明，从人类史上的中世纪发展而来。小说中的「灰衣人」是由一个男人派出的突击队，此人似乎是个过渡领袖，由更强大也更黑暗的力量派来清理大地。灰衣人对他们眼中危险的自由派思想，乃至启蒙运动本身发动战争。灰衣人与他们身为领袖的灰衣主教看似无能，表现得更像破坏者而非政治家，但他们最终却拥有无穷无尽的持续力。註301不过古德科夫和杜宾倒是没想过这种局面；当他们为自己的论文选定题目时，只想着灰色相对于黑色的意象。註302

註280：Lev Gudkov, Boris Dubin, and Yuri Levada, Problema "elity" v segodnyashney Rossii: Razmyshleniya nad rezul 'tatami sots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ya (Moscow: Fond Liberal'naya Missya, 2007), p. 27.

註281：Boris Nemtsov, Provintsial，手稿撰写于一九九六年，出版资讯不详，PDF档取自网路，p. 33。

註282：前引书，p. 60。

註283：Ludmila Telen', "Soprotivleniye materiala: Boris Nemtsov pytayetsya sovmestit' zhizn' s politikoy: Obe soprotivlyayutsya," Moskovskiye novosti, June 18, 2002, archived at https://nemtsov-most.org/2016/03/29/the-resistance-of-the-material-interview-part-i/（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浏览）。

註284：Boris Nemtsov, Ispoved' buntarya (Moscow: Partizan, 1997), p. 28.

註285：前引书，p. 24。

註286：前引书，p. 23。

註287："Nemtsov s prostitukami,"一九九八年多伦科节目片段，时间不详，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e-i3e80EA（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浏览）。

註288：Nemtsov, Ispoved' buntarya, p. 23.

註289：Telen', "Soprotivleniye materiala."

註290：B. Generalov, "Ya s temi, kto chesten do kontsa," Otkrytaya politika 7, no. 9 (November 1995), http://www.alexanderyakovlev.org/fond/issues-doc/1009799（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291：Clifford G. Gaddy and Brian W. Ickes, Russia's Virtu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註292：Tiffany C. Bloomfield, "Former Russian Official Advocates Tax Reform: Nemtsov Gives First of Three Presentations," The Harvard Crimson, February 9, 1999, 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99/2/9/former-russian-official-advocates-tax-reform/（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293："Krizis v Kosovo i rossiyskoye obshchestvennoye mneniye—Issledovaniye VTSIOM," polit.ru, March 31, 1999, http://polit.ru/article/1999/03/31/477071/（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294："Voyenniy parad v Moskve (9 maya 1999 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6t8EbHIXuU（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295：Robert Burns, "Russia, U.S. Announce Agreement on Troops, Ending Impasse," AP, June 19, 1999, http://amarillo.com/stories/1999/06/19/usn_russia.shtml#.VyLlTTArI2w（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浏览）；"Confrontation over Pristina Airport," BBC News, March 9, 2000,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671495.stm（二○一六年五月四日浏览）。

註296：TASS upolnomochen zayavit' (Mosfilm, 1984).

註297：Mertvyi sezon (Lenfilm, 1968).

註298："Indeksy: Odobreniye deyatel'nosti Vladimira Putina," Levada Center, http://www.levada.ru/old/indeksy（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浏览）。

註299：Yuri Levada, "'Chelovek sovetskiy' 10 let spustya: 1989-1999 (predvaritel'niye itogi sravnitel'nogo issledovaniya)," Monitoring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3, no. 41 (May-June 1999), pp. 7-15.

註300：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chap. 14.

註301：Arkady Strugatsky and Boris Strugatsky, Trudno byt' bogom (Moscow: AST, 2015).

註302：Lev Gudkov and Boris Dubin, "Rossiyskiye vybory: Vremya 'serykh,'" Monitoring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2, no. 46 (March-April 2000), pp. 17-29.

# 第四部　復活

## 第十一章　死后的生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廖沙和母亲、继父、阿姨及阿姨的儿子一起驾车到乡间，和廖沙的祖母一同庆祝新年。谢拉菲玛．阿达莫夫娜在门廊上招呼他们。她看来伤心欲绝。

「叶尔钦要走了。」她说。

他们所有人呆站在原地，被这个消息重重打击。他们被遗弃了。这怎么可能呢？

屋里的电视机开着。叶尔钦已经宣布辞职，这时新闻主播正在讨论这个消息，播放着叶尔钦演说的片段——他看来泫然欲泣——和其他影片，显示廖沙一家人还在路上开车时，国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叶尔钦在演说中表示：「俄国绝不会再回到过去。从今而后，俄国会继续前进。我不应该挡路。当国家有一位强人够格成为总统，我不该再花费六个月继续掌权——几乎每个俄国人如今都将未来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註303

接着，有两个人出现在克里姆林宫一间办公室，其中一人身穿海军制服，另一人穿着灰色平民服装。叶尔钦和他们两人都握了右手。他们的左手各自拿着一个硬壳手提箱，以及一件看似相机包的东西。这段没有旁白——只有俄罗斯国歌演奏的乐声——但这四件物品合在一起，显然构成了口语所说的「核按钮手提箱」。这两人接着和普丁握手。然后他走近叶尔钦。普丁腋下挟着一个红色档案夹。叶尔钦抹去左眼的眼泪。他这时看似活动能力受限——他的模样显得臃肿——左手因为儿时的意外只剩三根指头，这一切结合起来让他显得笨拙而脆弱，宛如巨大的幼儿。廖沙觉得普丁看来像是迷失了方向，对自己缺乏信心。廖沙的祖母也迷失了，而且很害怕，即使在这一天来临前的几个月，她兴高采烈地大量引述普丁的话，通常是要把恐怖分子淹死在马桶里的那段话。电视上，俄罗斯正教会的牧首头戴顶端缀有金色十字架的白色高帽，正看顾着整个权力转移过程。

接着，萤幕上出现了身穿大衣的叶尔钦，为身上只穿套装的普丁打开一扇门。「这是你的办公室。」叶尔钦说，同时用他只剩三根指头的那只手示意。镜头转向总统的书桌，书桌旁有一株经过装饰的小小新年树。註304

然后，叶尔钦身穿大衣、头戴毛皮帽步出走廊，普丁跟随在他身边，仍然只穿套装，看来像是东道主暂时走出屋外送宾客离去。叶尔钦登上一辆加长型宾士轿车，驶出克里姆林宫外，普丁则在其他几个人簇拥下站在门廊上向他挥别。註305

*

有时谢廖沙觉得自己疯了—不然就是别人都疯了。这一整个权力转移的格局都令他感到怪异，也许还很不真实。他在新年夜问道：「他在耍我们吗？」但就连一向是谢廖沙的政治盟友，为整个家族指引方向的祖父都说，普丁说了些合情合理的事，提出了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早就提出的论点。他听说普丁对政府的社会责任—健保、教育、文化—发言，而这些话叶尔钦似乎从没说过，这为他带来一些希望。他很审慎。他说自己害怕看到普丁掉进重振旗鼓的官僚们—也就是他所谓的「职官怪兽」—设下的圈套，当他听说普丁谈论国家强大的必要，他的忧虑就更深了。但他仍然认为值得给新总统一次机会。註306对他而言，普丁看上去当然比去职的俄国总统更加理智。

每个人似乎都表现得像这整件事完全正常，全然接受这位小个子灰衣人将成为总统，然后看着他在三个月后登上大位—每个人对此处之泰然的模样，让谢廖沙感到疯狂。他愈来愈频繁地这么觉得。

在谢廖沙当下攻读电脑程式设计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每个人看来都在等待普丁降临。谢廖沙甚至没注意到他的肖像从何时开始出现，连同那些他先前也没留意到的爱国用品：普丁所属团结党的旗帜和传单，以及吆吁每个人在仓促决定日期的总统选举日请踊跃投票的海报。这场由几乎感受不到、却早已被预先决定获胜的候选人所参与的假选举，让谢廖沙觉得自己几乎不存在。他的领域几乎不需要和同学有任何社交接触，这或许是件好事；就算他想要，他也理解不了他们的现实。

*

二○○○年八月，廖沙和母亲一起去了黑海海岸。他们在海滩上度过白天，那儿拥挤到他们得早早前往才能找到一个地方把毛巾铺在沙上；晚上则在租来的公寓厨房，吃着甜腻的在地葡萄并收听广播。新闻和南方的空气一样缓慢流动，直到一桩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广播提到，一艘俄国核子潜艇库斯克号（Kursk）在莫曼斯克（Murmansk）外海沉没。一部分船员还活着，却被困在巴伦支海海底。广播说，俄国救援队无法接近潜艇。广播也说，挪威提议协助，但俄国拒绝。广播还说，普丁总统决定不中止他在索契（Sochi）的假期。

日子过得更慢了。在失眠夜晚和循环反覆的白日梦迷雾中，廖沙不停想像冰冷海底的水兵等待着无法前来的救援，那些男孩都只大他几

岁，而总统，那个由叶尔钦把办公室移交给他的小个子男人，就在离此不远处，躺在一片焕然一新且毫不拥挤、专为他不受打扰地度假而保留的沙滩上做日光浴。

想着这一切是种解脱，因为在潜艇灾变之前，廖沙想到的事情更糟。廖沙来到海滩的第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当他看见其他男孩、跟他一样的青少年或青年男子，只穿着跟他一样的黑色小泳裤时，他感到热力剧烈地穿透身体，兴奋而不可见的悸动开始产生。这在第一次之后每天都在发生。它带来的想法简直不堪设想。他想着，我是变态，我生病了。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这种感受的人。如今这些糟糕的话语和水兵在海底奄奄一息的画面，在他心中叠合起来。

理智上，廖沙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者。他的班级在七年级时每週参访一处家庭计画中心，那儿有位心理学家和他们谈论父母不跟他们说的事。这个计画由美国亿万富豪乔治．索罗斯资助，学校与中心签约，七年级生的家长必须签署同意书允许子女参加。这位心理学家恰好是廖沙一位朋友的母亲，廖沙每一堂课都和这个女孩同桌。她和他一样不受欢迎，不被其他孩子喜欢，也不被老师喜欢，老师似乎怀疑她在他们面前卖弄聪明。至于廖沙自己，则不知为何在同年级学生当中得到「死玻璃」（faggot）这个外号。有一天在中心，心理学家说到除了「同性恋」家庭之外，也有「同性恋」个体。这个想法突如其来又充满刺激，就像美国亿万富豪索罗斯那样陌生。

隔年八年级时，某天有个高年级女生冲进他们教室，高声质问：「你们知道你们这年级出了个妓女吗？」她说，有十三个男生把这个女生反锁在地下室，轮流和她性交。「她逃不出去，」这位控诉者说：「而她很爽。」其后数日之间，这个故事被转述了很多遍，参与的男生吹嘘自己发挥的作用。他们的受害者停学数週，回到学校之后，她和廖沙成了朋友。如今他们成了三人组：玻璃、妓女、装逼（Snob）。

随着年岁渐长，有些同学似乎开始对他们的智慧以及学习、解释和论证事物的能力产生敬意。到了十年级，也就是中学生活倒数第二年，廖沙比以前更用功读书，因为这看来是驱除掉从八月起在黑海开始折磨他的那些想法的唯一方法。学年结束时，他获选为班长。不论他的某些同学怎么看待他，不论他们为什么叫廖沙「死玻璃」，他们一致认同廖沙是在学校行政当局面前可代表班级利益的最佳人选。

二○○一年五月，十年级结束前，廖沙和两位朋友在住家大楼后面的游戏场闲晃。当然他们年纪太大，不是要去游戏场玩的，但在缺乏其他公共空间的情况下，索利卡姆斯克所有年轻人都会到游戏场闲晃，尤其在天候宜人的日子。有个女孩散步经过──她是以前曾经睡在廖沙家过道

的孩子之一，但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她向另一个恰好路过的人嚟喊，那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那人晃悠过来。她指着廖沙。

「死玻璃。」她说。

男人向前冲刺一小段，飞踢廖沙的下背部。接着再踢一脚。他的眼神同时闪动着疯狂、空洞和暴怒，廖沙知道他会被打死。

廖沙的继父恰好就在那时走到阳臺来。这让他清楚看见在游戏场发生的事。

「滚开。」女孩咆哮。

廖沙逃走了。

他在急诊室里得知自己在出血，目前的病况是「游离肾」（floating kidney）□□字面上的意思是，他有颗肾不再被周边组织结构稳定支撑住。痛苦极其剧烈，想要缓解—并且避免开刀—就得卧床两星期。廖沙的母亲想要向警方报案，但廖沙害怕自己被打的理由会就此揭露。因为若要解释自己的遭遇，他就必须说出：「我是同志。」

「我是同志。」他对自己说。他从有线电视频道上播放的电影学会这个词。被殴打让他相信了这个词适用于自己。

学校来了一位新的辅导老师，刚从大学毕业，她清楚表明自己想成为廖沙的朋友。这时他从病床上打电话给她，他的母亲和祖母则在隔壁房间熟睡。不过她一接起电话，廖沙的勇气顿时烟消云散。他们这通电话讲了五小时，填塞时间的闲扯和可怕的沉默来回交替。

「是违反法律的事吗？」她问。

「嗑药？」她问。

「还是你想告诉我你是同志？」她问。

「我是同志。」

她对这件事反应平静—不只是平静而已。廖沙突然开始倾吐自己的想法与感受，而她在一切适当之处嘆息和发笑。他甚至能够和她讨论性，或者他想像中性的样貌。其后，他又对自己的表哥说了，表哥这时是军校入伍生。表哥说他无法接受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但他还是爱廖沙。

廖沙决定不要告诉自己在学校的两个好友，即便如此，情况也不像一年前在黑海边那样绝望了。他在某次谢尔盖喝醉闹脾气时突然不再对继父感到害怕，廖沙这回抄起厨房板凳敲他的头。他的中学生活只剩最后一年，毕业后就要永远离开索利卡姆斯克去读大学。他比以前更用功了，想得到的任何学生竞赛他全都参加，替自己争取大学入学的最大机

会。

到了二○○二年五月，事情显而易见，廖沙会以银牌奖的成绩毕业，这项杰出的学业表现令他有权跳过大学入学的通识考试，只须坐等他选择就读科系的入学考试。毕业前一晚，廖沙把自己的浏海染白一半。在早餐桌上，身穿经年不换白汗衫背心的继父，从发出噁心声响的吃喝之间停下来问他：

「你是个玻璃还是什么的吗？」

「不干你的事。」廖沙说。

*

毕业之后，班上有个男生在父母亲的别墅举办派对，大约十五人参加。他们跳舞喝酒。到了清晨五点，几位宾客已经烂醉得不省人事。其他人聚在厨房里吃冰淇淋。廖沙站起身来说：「我是同志。」

「为什么？」有个女生问。她看来很生气。

「我知道。」另一个人说。

对话继续。廖沙获得了中学毕业证书。五天后他就要到市长办公室领取银牌奖。他要离开这里了。

然后他突然明白，他没有回头路了。过不了多久，他出柜的消息就会传遍全城。他的人生如今完全取决于考上大学。

*

玛莎想当军人。这个愿望带来很多问题，塔蒂亚娜的震惊与恐惧大概只是其中最小的。玛莎想要入伍当军官，但不是在俄军，而是某个强大光荣国家的军队。她有时觉得自己是某种境外爱国者：给她一个国家，她就会以其为傲；给她一件军服，她就会为之效劳。但她得到的偏偏是俄罗斯，而这里令她心中充满绝望，思想中充满人生不值得活的意念。

塔蒂亚娜说，心智如此空洞的玛莎是进不了大学的。她说的「大学」是指莫斯科国立大学，这是全家每个人都读过的学校。其他一切学校都算不上高等教育。科学之外的一切也都不算是知识。同时，玛莎的化学成绩恰好在及格边缘。她开始补习，发现自己其实喜欢化学。她宣告自己以申请莫斯科国立大学化学系为意向。塔蒂亚娜说，这比读军校好太多了，要是玛莎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入学的话。

玛莎在二○○○年五月从中学毕业，这是她十六岁生日后一个月。她参加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以一分之差未能取得正式入学许可。在后苏联的格局里，国立大学如今有两种入学管道：最优秀的学生免付

学费入学，成绩略差的学生则要缴学费。塔蒂亚娜有能力供应玛莎学费，但她拒绝了，她引述自己生命中的最重要原则做为理由：「绝不要让自己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人（绝对不当出头鸟）。」玛莎得在军人保险公司帮忙打杂一年，再次试着挑战免付学费入学。

二○○一年六月，她录取了。这是真正人生的开端，玛莎一开始也很成功。这时塔蒂亚娜谈论着要买下一间公寓，让她们在往后五、六年同住，直到玛莎出国攻读研究所。她们去看了邻近地区正在兴建、较被看好的几座公寓大楼。玛莎说，她想要一间可以望见莫斯科河的卧房。她们会在秋天时正式开始购买公寓——在玛莎得到应得的休息、从黑海回来之后。她要和阿姨一起去度假；塔蒂亚娜则留在莫斯科工作，她这时是负责利率的资深主管。

玛莎和阿姨在八月二十五日返回，那时是开学前一週。那年玛莎十七岁，高□而黝黑，金髮的颜色前所未见地浅白。那天晚上，塔蒂亚娜告诉她，自己罹患了第四期乳癌。

随后数月，玛莎照常上学，塔蒂亚娜也继续上班和接受化疗。有时她住进医院。二○○二年五月底，医院放她回家：化疗到此为止。她体重减轻，然后又增重，因为肝脏不断肿大。六月中旬，她不再上班。

在公寓，不断有女人来按门铃，说是玛莎的阿姨请来的信仰治疗师。玛莎的祖母推荐了无穷无尽的书籍，书名都是《癌症可以治癒》这一类型。所有人都坚持要塔蒂亚娜领洗。这时是莫斯科的酷暑，天色暗得很晚，气温下降得更晚。唯有到了深夜，玛莎才能多少平静地和母亲独处。

六月三十日，塔蒂亚娜要玛莎去附近的综合诊所领取一张吗啡处方笺，苏联解体十一年后，综合诊所仍拥有开立管制药品的独占权，而且只能供应给户籍资料上居住于诊所邻近地区的公民。

「时间还没到。」医师说。

「好哦，时间几时才到，你何不直接告诉我？」玛莎说。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样跟我大小声？」医师质问。

「从我妈快死了开始。」玛莎说。

医师找来诊所的院长，把玛莎赶出诊所。

*

那天深夜，塔蒂亚娜在摇椅上睡着。当天色终于全黑，玛莎把母亲从摇椅抱起，让她平躺在沙发上。玛莎正要到房里的摺床上小睡片刻，这时一群鸽子落脚在外面窗臺。塔蒂亚娜说了些话。玛莎起身开灯。塔

蒂亚娜注视着窗外。玛莎将母亲的躯体扶起，抱在怀中。

她打电话给阿姨，告诉她情况，然后放下话筒。她想稍坐片刻，或许试着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阿姨接到电话后必定採取了行动，因为救护车来了，然后是警察，接着是殡仪馆的人。他们说，玛莎得去叫醒邻居，因为必须有人见证才能搬走尸体。那时是凌晨三点，玛莎对于要吵醒邻居感到不妥，但她担心天气很快又要变热，尸体会开始产生变化。当她还在试着决定要先做哪一件事时，殡仪馆的驾驶先离开了。警察还留在现场，正在要求玛莎付钱（贿赂），即使玛莎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她又打了电话给阿姨。阿姨来了，玛莎的祖父母也来了。尸体这时已经冷却，皮肤开始变色。玛莎说，天气很快就要变热了。

祖父对她咆哮起来，大概是说她只会担心尸臭，却为什么没哭？

她为什么没哭？因为她需要独处才哭得出来，也需要来一根菸，此时此刻，她想抽菸的欲望胜过一切，但她刚满十八岁，而她还是觉得不能在祖父母面前抽菸。

军人保险公司派人来，查看了家里的状况，说玛莎需要帮助。公司的后勤部门主任被派来处理流程安排。他和玛莎的祖父母与阿姨一起组织了在教堂举行的追思仪式。玛莎试图告诉他们这个主意行不通，但她不知该如何解释。他们问她信不信上帝，她说她相信，但也爱母亲和尊重母亲，而母亲一生是个无神论者，他们也该尊重她。他们说，塔蒂亚娜如今与上帝同在。

在此期间，玛莎得知，就在塔蒂亚娜死后数小时，一架俄国客机在德国南部上空与一架货机相撞，造成七十一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十多个儿童。註307从那时候起，她会跟别人说母亲是在乌伯林根（Überlingen）空难当天去世的。如此一来，这一天对其他人也有了一些意义。

*

廖沙申请了彼尔姆国立大学歷史学系。有了银牌奖，他只要在歷史口试时得到高分就能入学。他抽了一张他们所说的「籤」——这是一张印有考试题目的卡片：

冰上战役（Battle on Ice）註308与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苏联文化

廖沙侃侃而谈。他熟悉这个题目，但觉得自己未能发挥应有的水准。满分五分他只拿到四分，但他需要拿到满分才行。

歷史学系无望了。政治学系隔天要审查申请入学的考生。他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说，他日后会发现政治学很无趣，但他不能回到索利卡姆斯克。他把申请表格带去政治学系缴交，然后到图书馆为下一场口试做准备。

他开始尽可能以一种最执拗、最事倍功半的方式研读，而他自己也知道。他想要弄清楚自己在刚结束的口试时遗漏了什么。他抽出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y）的经典巨着《自古以来的俄国歷史》（Russian History Beginning in Ancient Times），开始阅读。他知道自己早该参阅这部书，正如他知道现在弥补缺失已经太晚。

隔天的口试委员仍是前一天的同样两位教授。廖沙抽了籤，翻开来，读出题目：

冰上战役与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苏联文化

「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其中一位口试委员问。

廖沙做了补充。他得到五分满分。可以就读政治学系了。

结果证明，政治学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使得廖沙对事物有了不同理解—既有他亲眼见证的事件，也有他两年前在黑海旁身心全被其他忧虑压倒时所泰半忽视的事件。正如他现在从莫斯科政治学者奥尔嘉．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Olga Kryshtanovskaya）的论文中读到，普丁当时改组了政府，此时四分之一的首长职位由军方将官出任。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写道，这被称为「军事政体」（militocracy）。註309回到宿舍，廖沙和那些刚结识的年轻女性朋友聊天时说道：「普丁让我想起某种缩小版的军事独裁者。」这些女生都同意。

廖沙讲的「缩小版」并非真的在指涉普丁的身材—更多是一种泛泛之感，不论新参考书上的字眼多么吓人，它们所形容的现象感觉起来却不太真实。首先，廖沙并未感受到自己生活在军事独裁或军事什么的、或任何独裁之下。他就读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自由派的科系，系上教师毫不留情地嘲弄普丁，彷彿在参加某种最俏皮的贬抑语竞赛似的。但事实摆在眼前—短短两年内，普丁就设立了联邦监察机制来监督州长，大幅削弱民选官员的权力，同时赋予联邦中央政府将民选州长免职的权力；他还将司法改革逆转，并将全国播送的电视频道国有化，由克里姆林宫掌控。因此，尽管他的政权还称不上极权，看来却似乎正往极权方向发展。廖沙得知，此一转型状态叫做「威权情境」（authoritarian situation）□□意思是威权主义有可能在此产生。

廖沙在大学第一学年的那个十月，一群自称车臣人的武装男女在音乐剧演出期间突然占领了莫斯科的一间剧院，劫持九百多名人质。对峙持续了三天，然后联邦军警向剧院攻坚，杀死恐怖分子并解救人质。军警攻入剧院时，廖沙正在前往索利卡姆斯克度週末的路上，当他抵达母亲的公寓，只能在电视上看见剧院一片空荡、只有恐怖分子尸体四散于座席间的片段画面。座椅是红色绒布，恐怖分子全都身穿黑衣，这一幕不知怎地令廖沙想起了西洋棋游戏。他从广播得知，有一百二十九名人质在攻坚过程中丧生，由此听来，这次行动搞砸了──为了瘫痪恐怖分子而灌进通风系统的麻醉气体结果毒死了许多人质，即使没有其他人质尸体的画面。那么，廖沙想着，这就是威权情境的样貌。一副西洋棋盘。

*

有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以枯燥乏味的慢动作进展。古德科夫并非中心行政团队的一员，因此未曾与闻起初的某些讨论；但在他听说之时，情况已经很明显：他们陷入了势不可挡的大麻烦。有传闻提到，普丁在某场官方活动看到列瓦达摆出不适当的脸色，自认为受到冒犯。新任总统此时开始有了敏感又记仇的名声，年老的社会学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苏联时代经验，却向来不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传闻可能属实或不实，发生在中心的事到头来也无须解释。

最初是在工会当局和苏联劳动部主持下成立了全苏联舆论研究中心（All-Soviet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那是在苏联时代，每个机构都是国家机构，舆论研究中心做为国家机构，看来也不比工会做为国家机构更荒谬多少。接着苏联解体，中心成了全俄舆论研究中心，这时则由俄罗斯劳动部和国有财产部门主持。这完全依循了机构从旧帝国移转到俄罗斯新国家的逻辑。如同其他众多国家机构，中心并未直接获得政府资助，但能以固定费率向政府租用办公场地，随着莫斯科地产价格高涨，这个费率看来低得可笑。中心名义上的创办者──劳动部和国有财产部门──有权指派主任，但不得以其他方式对中心的工作或人事施加控制；它们甚至不具备在主任的五年任期届满时予以撤换的权力。倘若有哪个在中心工作的人宣称这看来是防止政府干预的充分保障，那必定是谎话。事实上，没有哪一个中心人员关注他们是否被保证不受政府干预。

但社会学家的工作在于观察机构的运作逻辑与文化，普丁上任没多久，他们就清楚看到了。他采取行动，不仅重新主张行政部门对媒体的控制，还扩及对司法的控制，以及对经济更广泛的控制。他开启的税制改革由于引进均一所得税而受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赞扬，但改革的其他条款却又把小型企业推入暗处；同时，普丁开始安插自己的人马掌管国有的大公司，甚至某些不属于国家的大公司。他与寡头们的关系似

乎遵循着涅姆佐夫的「国有化克里姆林宫」概念：他指示最富有的人们放弃政治权力—有时连确保政治权力的资产也一併放弃。掌握全国性电视公司的两位寡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被迫流亡国外，但在流亡前得先交出他们对自家媒体渠道的控制权。情况也很清楚，在普丁统治的俄国，所有权即意指积极控制：电视节目的基调与内容急遽转变。首先被删去的便是任何取笑克里姆林宫的节目。

全俄舆论研究中心并未嘲弄克里姆林宫和它的新主人。多数时候，它所提供的消息是奉承普丁的—人民不仅喜爱他们的新总统，也喜欢与新总统一起度过的生活。列瓦达在二○○○年按照传统写下年终总结时，提到这一年对俄国人来说，或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好的一年。他们有了希望。人民很少或几乎不忧虑自由派知识分子极其担忧的问题，像是国家接管广电媒体，或是俄罗斯国歌如今恢復使用苏联国歌—只将歌词略作改动、删去提及列宁或共产主义光明未来之处。尽管如此，库斯克号核子潜舰灾变仍名列这一年迄今最重大的事件；还有已歷时一年半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普丁的支持度明显下滑等等。註310

过了两年，在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之后，中心回报有百分之八十一的俄国人认为自己未被告知事件的全部真相，还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认为俄罗斯国安部门首长必须为人质遭到劫持承担首要责任。註311

接着进入选举年。这次国会不再全面改选—普丁重新解释了一九九三年宪法中一项文意含煳的条文，将上议院改由总统任命—但下议院的四百五十席将在二○○三年十二月投票选出（普丁自己则将在二○○四年三月面临改选）。执政党如今更名为统一俄罗斯党，而在选举年开端，中心的民调显示执政党的支持度骤降。註312

列瓦达被劳动部召见。距离合约届满还有两年，但这时他面对一小群官僚，其中一人对他说：「你不年轻了。」他们说，他需要一个接班人，而他们已经帮他选定了。事实上，他们所提议的接班人也在现场，就在隔壁房间，等待引见给列瓦达。他不久就进来了。他刚满二十九岁，工作经验多半仅限在总统大选期间效力于打造普丁政治形象的其中一组团队里。列瓦达奉命指派这个年轻人担任自己的副手，为期六个月左右，然后退休。和列瓦达对话的人没等他答覆，就直接告诉他不服从的后果：他会以刑事罪名遭到起诉。只要够仔细审阅中心的纪录，必定能找到税务及其他财务不符常规之处。

列瓦达拒绝了，中心随即被判死刑。古德科夫害怕看到列瓦达被控犯罪，或被拖到媒体上公审。同时间，列瓦达则努力向国家请愿，要求允许员工买断中心，将它转型为共同持股公司。请愿被驳回。每一位曾

与政府高阶官员交好、或为高层进行调查工作的员工，这时也都透过人脉请求援助。这些高阶官员都答应出力，但随后也都承认他们帮不上忙。

最后，列瓦达被开除了。这是违法行为，但已经无关紧要。他告上法院的话也会败诉。中心的每一名员工全都提出辞呈，合计一百多人。会计部门的一位年长女性决定退休。其他人则着手开设新公司。它再也不是全俄舆论研究中心了──这个名称如今属于别人；新公司的名称只会是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相较于苏联时代列瓦达一次次被迫失业的遭遇，这次的经验其实算是进步，整个团队如今还能聚在一起，他们只需要从头再来。

列瓦达被迫离开他所创立的中心一个月后，俄罗斯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被捕。他无法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他没有远离政治──他向政党及公民社会组织提供金援──并在一场为了给有钱人向普丁宣誓效忠而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上，公开谈论日益严重的贪腐。过没多久，国家随即接管他的事业，过程一如早先清洗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两位寡头，或甚至清洗列瓦达一样，除了涉及的金额更加庞大以外。霍多尔科夫斯基接到警告却没有听从，如今他遭到逮捕并被控逃税。短期之内，他的公司（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商）就被普丁家族没收。古德科夫带着苦涩的满足观察到，即使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与其他人被捕之间，只有事业规模的差异，但这至少终于让某些他认识的人开始对普丁语带保留了。

二○○三年十二月，统一俄罗斯党以百分之三十七得票率赢得国会选举，註313在国会取得绝对多数。这是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国会第一次没有任何一个站在自由派、支持改革，并且整体上是后苏联立场的政党在里头。另外三个获得足够票数拥有国会席次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十多年来倚仗激进民族主义话语运作、取错名字的自由民主党，以及又一个克里姆林宫支持的新政党──祖国党（Rodina）。涅姆佐夫在选举当夜与朋友和盟友喝得烂醉，试着枚举右翼力量联盟得票一塌糊涂的理由。他认为他们主打的选战广告不佳、推出了错误的候选人，也没能与其他右翼自由派政党结盟。註314但如果他在三年前便读过古德科夫的分析，或许就会注意到，他的政党会败选其实完全不同于以往，而且更加简单：它这次不再是由克里姆林宫安排的「其他」有力政党。他或许也会注意到，两党制游戏的某些基本玩法转变了。在一九九六和二○○○年，执政党的陪衬都更加自由派，也都主张更大规模的经济及社会改革。今年扮演陪衬的祖国党，却表明了比官方政治主流更加民族主义、更为保守的立场。差别仍始终保持微妙──灰色相对于黑色──但国家的政治走向却反转了。

*

塔蒂亚娜去世后最初六个月，玛莎都得开着灯入睡。这间公寓里发生过的一切，如今回想起来都成了令她惊恐的记忆，就算事情刚发生时她还太小，或觉得太过安全而不感到害怕。例如地方政府指派给她们一对从车臣逃难来的俄罗斯裔夫妻，做为公寓新室友的时候。还有那对夫妻搬走，塔蒂亚娜拼尽全力将公寓留给她和玛莎母女两人，而国宅部门前来破门、塔蒂亚娜改装了撞不破的钢门的时候。还有一九九五和一九九七年，玛莎吸食海洛因成瘾的前同学两度从窗户爬进屋里偷东西变卖的时候。在深夜刺眼的灯光里，公寓看来糟到不能再糟：剥落的壁纸、龟裂的灰浆、所有颜色都褪淡了。玛莎忽然想到，塔蒂亚娜反覆表述的「人生在他方」这个想法，意思其实是她期望人生晚一点来临。如今她去世了，得年四十三岁。

塔蒂亚娜为了她想买下的那间公寓存了一些钱──存在她的签帐卡帐户里，但她临终前却想不起密码。她没有留下遗嘱。冗长晦涩的俄国法律给予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优先继承权──不管怎么说，十八岁的玛莎也不太可能跟亲戚们争。钱没了。玛莎的祖母要了别墅。玛莎得到公寓。玛莎和阿姨的关系也断了。军人保险公司始终没有捨弃玛莎──每个月付给玛莎一小笔款项──这笔钱加上大学的助学金，合计每月两百美元左右。清偿了公寓的所有帐款之后，玛莎剩下的钱还足够买荞麦和奶油支撑一个月。一九九○年代以后，她觉得自己对贫穷的样貌有了明确的概念，如今她正与贫穷四目相对。她的男友出身富裕家庭，男友的亲戚们对玛莎的廉价衣着指指点点。

二○○三年三月，如此这般过了一个学期之后，玛莎从大学休学。她在一家名为数位摄影（Digital Foto）的店铺找到了「谘询顾问」的工作，意思其实是推销员。如今，她和与父母同居的年轻人一起度过白天，对他们来说，莫斯科国立大学做为一种现象，就跟英格兰之类的一样陌生。

玛莎意识到，能够让自己不再怕黑的唯一方法，就是一头栽进黑暗中。有一天晚上，她关了灯。

到了夏天，玛莎存够了钱，请来一组人把公寓变「漂亮」。她用了这个词，工人们也听懂她想要什么。资金开始流入莫斯科，每个人都在美化自己的公寓：加装塑胶外壳的双层式玻璃窗，把厨房漆成黄色，再从城外新开幕的宜家家居（IKEA，它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地铁站）购买毛茸茸的浴室地垫。玛莎养了一只猫。

她需要重返自己的世界。她回到大学读书。她在一个名为「job.ru」的新网站上张贴自己的履歷表，然后接到两家公司打来的电

话。她来到一家为化妆品产业进口化学品的公司工作，由于各行各业都在起飞，化妆品产业也在起飞，加上石油价格飙涨的结果，使得俄罗斯进入消费高潮，其规模远远超出一九九○年代的改革者所能想像。巨大闪亮、照明充足的购物商场在莫斯科到处开设，导致交通堵塞，所有商场都有一、两家化妆品百货，存货搀杂了真品和赝品，制造这些商品则需要使用大量化学品。这些化学品必须仰赖进口，玛莎的工作正是安排进口流程。她谈判—她学会使用英语通电话—安排进口，并且办理报关；她也学会了送红包。她与供应商会面时模样也很漂亮，只要喝了酒，她就能用英语说笑话。

化学系有一个线上非官方首页，名为「chemport.ru」，在它的众多功能之中，有一项是匿名评鑑系上教职员。这意味着一群着迷的阅听人，其中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和教授。在玛莎看来，这也意味着这个网站应当可供营利。谁不在这个时代赚钱，谁就是白痴。她找到架设这个网站的人，他名叫谢尔盖．巴隆诺夫（Sergei Baronov）。他是一位研究生，最近刚离婚，因此住在宿舍里。她把自己的方案告诉他：他们必须为化学公司的销售经理们设立订阅服务。他们只需要想出一套服务，提供给这些人做为交换—他们只想找到方法花掉公司的预算。谢尔盖问她知不知道世界各国为何放弃了金本位制，改用黄金与货币储备。为什么？玛莎问他—她问问题的方式略带敌意，而她改不过来—他开始解释。他完全不是白痴。她喜欢能让自己明白新事物的人。她后来发现，他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同时开课讲授放射化学。他们成了伴侣，「chemport.ru」网站也开始赚钱。

谢尔盖说，他们应该生孩子。这听来合情合理。玛莎并不算是爱上了他，但他们确实是事业伙伴。金钱正倾泻在两人身上，还没有理由认为获利会停止。但其他事物有可能是短促的。玛莎的「事物」指的是人。她二十岁，他二十五岁，他们最好趁现在生个小孩。他搬进了她漂亮的公寓。他们开始试图受孕，但没用。尝试人工授精，也没用。他们放弃了，喝醉再做，结果有用。

玛莎怀孕八週时，医师说胚胎没有心跳，转介她去接受子宫扩张刮除手术（Dilatation & Curretage）流产。她回家嚎啕大哭，然后检索了「胚胎心跳」。她回去找医师，告诉他心跳可能出现得比八週更晚。

「你哪位啊，这里最聪明的人吗？」医师问。

「我是啊。」玛莎说。

註303：“Yeltsin: Ya ukhozhu i proshu u vas proshcheniy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9FS3OdoAQ（二○一六年五月六日浏览）。

註304：编按：当苏联政府在一九三○年代恢復革命前生活的许多传统习俗，圣诞树也转世成了世俗传统中的新年树，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装饰以资庆祝。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註305：“Yeltsin vedyot Putina v Kre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DG_85gCo0（二○一六年五月六日浏览）。

註306：O. Solomonova, “Lovushka dlya prezidenta,” Trud, July 13-19, 2000, http://www.alexanderyakovlev.org/fond/issues-doc/1010066（二○一六年五月六日浏览）。

註307：Steven Erlanger, “71 Die When Two Jets Collide High Above Southern Germany,”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02, http://www.nytimes.com/2002/07/02/international/02CND-CRAS.html（二○一六年五月十一日浏览）。

註308：编按：一二四二年四月五日，诺夫哥罗德公国的亚歷山大．涅夫斯基亲王（Prince Alexander Nevsky）在佩普西湖（Lake Peipsi）上击退波罗的海十字军的进攻，阻止日耳曼人东进扩张，保卫了俄罗斯正教。由于决战在结冰的湖面上进行，而称为「冰上战役」。

註309：Olga Kryshtanovskaya, “Rezhim Putina: Liberal’naya militokratiya?” Pro et contra 7, no. 4 (Fall 2002), pp. 158-180.

註310：Yuri Levada, “2000 god: Razocharovaniya I nadezhdy,” Moskovskiye novosti, December 25, 2000, archived at http://www.levada.ru/2000/12/25/2000-god-razocharovaniya-i-nadezhdy/（二○一六年五月九日浏览）。

註311：“Vzglyad na sobytiya Nord-Ost mesyats spustya . . . ,” Levada Center, December 4, 2002, http://www.levada.ru/2002/12/04/vzglyad-na-sobytiya-nord-ost-mesyats-spustya/（二○一六年五月九日浏览）。

註312：L. A. Sedov, “Yanvarskiy opros: vyborochnyi analiz,” Levada Center, February 10, 2003, http://www.levada.ru/2003/02/10/yanvarskij-opros-vtsiom-vyborochnyj-analiz/（二○一六年五月九日浏览）。

註313：“Rezul’taty vyborov deputatov Gosdumy,” Rossiyskaya gazeta, December 9, 2003, http://rg.ru/2003/12/09/rezultaty.html（二○一六年五月十一日浏览）。

註314：Boris Nemtsov, Ispoved’ buntarya (Moscow: Partizan, 2007), pp. 66-69.

# 第十二章　橘色威胁

鲍里斯．涅姆佐夫担心自己的女儿无法在世界上生存。他确信，像她这样严厉又强硬的人，不可能找到另一半。这就意味着她必须自力更生—但就他所知，她缺乏志向。他对这点判断得没错：冉娜缺乏志向这点与母亲很像。但雷莎和冉娜不同，她很识时务也容易相处。鲍里斯说这很好：他不想要自己的女人太聪明或太积极—女儿除外，她太任性了，需要一套备案。某天她跟随他一起前往支持民主派的大广播电臺莫斯科回声（Echo Moskvy）接受访问时，他突然有了灵感。

「嘿，」他以一种当情况需要自己发挥影响力时所使用的过度亲热语气对电臺臺长说：「你们何不收我女儿当实习生？」

实际上也没什么不好。冉娜才十五岁，还不到全职工作的法定年龄，但这点几乎无须顾虑。她有个大名鼎鼎的姓氏，而且认识很多人—更准确说来，很多人知道她是她父亲的女儿。冉娜录取了。她的工作是打电话给叶尔钦的新闻发言人，查询总统的健康状况。发言人不像对待其他记者那样粗鲁地打发她，而是尽责地允许她录下一、两句话，证明总统健康无虞。

不打电话给总统发言人的时候，冉娜就执行取件、复印及其他典型的实习生工作。重点在于养成一种令她适存的工作伦理，即使她的性格令人难以忍受毫不圆融。她早上九点上学，最后一堂课放学就直接赶到电臺，从下午四点开始上班到午夜。那是地狱般的生活，但她可以在班尼顿（Benetton）买一件黑灰色羊毛衫了。那件衣服要价不菲，而这是她自己挣来的钱。

然后叶尔钦辞职了—电话在除夕当天打来，那是鲍里斯赢得国会议员选举数週之后，全家正在法国的滑雪胜地度假。没过多久，他所属的新政党右翼力量联盟就开会讨论他们在总统选举中的立场。他们要自行推派候选人吗？叶尔钦的辞职时机经过安排，使得推举候选人的努力成为徒然—实际上，他将投票提早了四个月，三月就举行。传统的耶诞和新年假期不会有人留在莫斯科（事实证明，只有叶尔钦和普丁还在），准备时间已经先被吃掉两週。普丁的民意支持度高不可攀。前总理盖达尔和另外两位党领导人主张，这种形势下的理性选择是跟随众人支持普丁。鲍里斯则主张，只要这位推定的总统人选没有提出政治纲领（普丁并未提出），就没有理由支持。他输掉了表决。

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弗拉基米尔．普丁当选俄罗斯总统，冉娜也年满十六岁。她对这两件事几乎同样的漠不关心。她在几个月前辞掉了莫斯科回声的工作，找到了自己的志向。她如今的人生目标是考上美

国的大学。鲍里斯告诉她必须自力更生的时候，他可从未想过这回事。国会议员的女儿在美国读书，这件事的社会观感不太好。但他说，他不会妨碍她。

他也不会帮助她。冉娜取得了所需的教科书和学习资源，以自力更生的方式进行。她在托福考试（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拿下创纪录的高分，学术水准测验考试（SAT）也得到很高的分数。她录取了纽约市的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当然，她的目标更远大，但现在她有个计画：先在福坦莫读一、两年，然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二○○一年八月，她告别了花园环路的公寓，移居美国。

她想像不到独自一人在纽约市会是什么滋味。她住在学校的曼哈顿分校附近，在中城的摩天大楼之间，与当地人称作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的躁动社区比邻。她唯一认识的是一位俄国寡头的女儿，刚从纽约的一所学院毕业，在谘询顾问公司上班。她每週平均工作八十小时，她对冉娜说，她未来也会是这样。接着，在冉娜抵达的两週之内，纽约市街道上充斥了警笛大作的车辆、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们，还有恐慌。冉娜走进市中心，尽可能深入到警方的封锁线，她亲眼看见世贸双塔中的第二座倒塌。然后她见到传单在街上到处散发，上面写着地址，供人们前往捐血。冉娜走到其中一个据点。

她打电话给身为小儿科医师的祖母。一通越洋电话要花美金十元，可能还更贵，因此得长话短说。

「奶奶，快跟我说，我的血型是什么？」

「O型阴性。」

冉娜挂了电话。电话另一端的吉娜．雅可夫列夫娜想像着，不堪设想的状况在被恐怖袭击的城市里发生在孙女身上。而在纽约，冉娜排队四小时等待捐血。她被告知她的血型是急需的宝贵血型，因此会尽可能最大量抽取。她离开医院时头昏脑胀，拖着身子走到一家熟食店，没完没了地坐在那儿，靠着吃东西让自己有力气起身。

她请求鲍里斯不要告诉任何人捐血的事——她在电话里听得出来，他迫不及待想跟别人说——但他实在太以她为荣，于是终究把事情说了出来。从苏共宣传报转型成小报的《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下了这样的标题：「冉娜．涅姆佐娃将鲜血献给美国」。註315

九一一事件过后，纽约外籍大一新生的孤绝状态令人无法忍受。冉娜又设法应付了一个月，然后请求鲍里斯为她订一张返回莫斯科的机票。他很兴奋。他也动用了一些人脉，让冉娜得以进国际关系学院就读，这是共党职官子女迈向外交和国际贸易职涯的摇篮。《共青团真理

报》报导，恐怖攻击发生后，冉娜由于身为外国人而被全班同学避忌。註316

她回到家的第一晚，鲍里斯的一位寡头朋友米哈伊尔．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来访。父女团圆的喜悦让他看了怒不可遏。「白痴，」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们都疯了。」意思是说，放弃在美国追寻未来而回到俄国来，肯定是发疯了。

*

俄国人对美国遭受恐怖攻击的反应，有些令人忧虑。古德科夫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俄国人的自我轻蔑表现在它看待美国的心态上，这时他看到对美国的一切憎恨与焦虑全都浮上檯面。一九九九年，俄国人回应北约空袭科索沃作战时的那波强烈怨恨，在数月之内就消退了，国家因而重回某种反美情绪的底限；但现在，古德科夫却看到它在九一一攻击过后不协调地捲土重来。民调显示，俄国人起初同情与怜悯美国，但这些情绪很快就被别样情绪取代：想方设法将这场悲剧归咎于美国人自身。

部分原因必定与俄罗斯做为一个社会，应对自身在二十世纪所经歷的战争、恐怖、暴力与贫困而发展出来的一贯迟钝有关。相对来说，这种迟钝做为原因和结果，又同时与缺乏社会或文化机制协助传达感受。所有这些对俄国人应对自身悲痛的方式也同样属实：他们让自己迟钝下来，并展开新生活。但如今涌现的这种憎恨，却明确指向俄国人对美国人的感受。

苏联歷史上一贯将自身定义为美国的对立面。这长达一世纪的认同，包含几个不同时期。一开始，苏俄早年以美国模式为基础，使用美国机器设备推行工业化革命。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制工业器材与俄国需求通力合作。史达林说「我们要赶超美国」（Dogonim i peregonim Ameriku），苏联工厂里的机器也经常刻上「赶超」（DIP）一词，向这句充满雄心壮志的口号致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竞争暂且搁置以便进行军事合作。两国这时是盟友。但随着冷战开始，美国不再是伙伴，更非竞争对手：它成了敌人—实际上是生存威胁。这种形象为苏联的最后四十年定了型，成为苏联动员及控制体系的基础。

当苏联瓦解，俄国人仍然继续看向美国这面镜子。他们如今看到的尽是羞辱。美国正在发送救济品给俄国人，把美国人自己不爱吃的「布希腿」及其他食物送给他们。美国不只比俄国更富有—其他许多国家同样比俄国富有，有些国家甚至比美国富有，像是瑞士和沙乌地阿拉伯。但美国不同于古老的欧洲国家，并不依照根深柢固的阶级结构分配财

富：它是人人都能成功且机会均等的国家—至少它是这么自诩，俄国人也相信这部分。它也不是沙乌地阿拉伯这样的独裁产油小国。美国正是现代性的定义本身；它是俄国未能成为的那个国家。这正是苏联式双重思想的杰出范例：美国同时拥有魅力又充满威胁，值得效法而又可恨至极。

仇恨美国成了苏联的政治及社会传统。如今，俄国对自身传统的追寻，为这股仇恨注入了新的力量。「我恨，故我在。」古德科夫写下这句话，试图描述这种新反美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九一一事件为仇恨火上加油，因为它引发了焦虑。调查显示，俄国人惧怕这些恐怖攻击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使参战各方由谁组成并无明确共识。尽管如此，这却是很可怕的可能性（或许格外可怕），而这都是美国的错。

超过一半的应答者说，提高国防开支的时机已到，即使这意味着其他领域开支必须缩减。对一个才刚摆脱严重经济萧条（二○○一年时，多数人民对此几乎无感）的国家，这种结果看来很怪异。话又说回来，这种攻击性的反美姿态在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更富裕的应答者身上，却最为显着。这正是当今新兴菁英的一部分—包括军警人员，以及普丁总统任内抬举的那些新传统主义者。註317

*

既缺乏政党或既定选举偏好等政治机制，也缺乏政治歷练，新兴菁英们开始大大仰赖一群自称「政治技术专家」（political technologist）的人。他们宛如被夸大到讽刺画程度的西方政治顾问。他们从无到有创造出总统、政党和政纲。他们雇用一小队人马设计标志和网站、媒体拍照活动，还有漫无边际的政治行话。这些团队的多数操盘手都还很年轻—即使并非所有人—通常都还是大学生。不管是携手合作或单打独斗都能大发利市。

包括政治技术专家及其所代表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多少（有时压根没有）自己的理念，而政治技术专家的一部分任务，则是发掘并整合他人提出的概念。首屈一指的政治技术专家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曾在莫斯科担任编辑，在普丁投入选举之前为他制造出公众形象，这时他找到了杜金，并为杜金宣扬理念。杜金拥有一种本事，能将菁英们普遍感受到的焦虑化为文字，而且这些话听起来很聪明。九一一事件后，他和另外六个人一同上电视参与一场政治圆桌会议，这时他说：

自由民主体制的深层危机已经暴露了，这是价值观的危机。自由民主复合体包含两大要素：自由主义与民主。我们通常以为两者是同义

词。但要是回顾西方的歷史，我们就会发现民主要素做为一种反极权主义的工具，被积极运用于对苏联集团的战斗中。但当苏联体制瓦解，民主就丧失了它的根本战略功能。自由主义的功能则维持下来。我确信自由主义未必非得跟民主结合不可。它可以单指自由贸易、市场机制，而我们知道，它们在最严格的威权政体、甚至近乎极权的政体里，都完全能存活下来。

他接着预言，美国会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捨弃它的民主实验。註318杜金误用了「自由主义」一词，彷彿它的存在仅仅用于表示统制经济的反面，而他在宣称美国正处于放弃民主的边缘时，对「民主」的定义也不明确。但他的说法完美概括了古德科夫的调查所反映出的世界观。在这套图景里，美国以对俄关系定义自身，一如俄国以相对于和相较于美国为自我定义。同样在这套图景里，既然苏联不復存在，美国如今放弃民主也就说得通了。最重要的是，这套图景确认了一个概念：同时建立市场经济与极权（或「近乎极权」）政体，不仅有可能做到，而且是正确的。

就在几个月前，即二○○一年四月，杜金为一场新政治运动举办了成立大会。他已经和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分道扬镳很久了。身为政治技术专家，他曾协助普丁的团结党，以及另一个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短命搅局党俄罗斯党定型，但他如今决定要发起自己的运动了。成立大会在一个名为「荣誉与尊严」、近似私人俱乐部的机构举行，机构所有人是联邦安全局的反恐特战部队「阿尔法」（Alpha）。几名阿尔法老兵获选加入新运动的主席团，许多军警相关人员也出席了大会。

杜金将这场新运动命名为「欧亚」（Eurasia），大会则强调运动与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房间里有两幅大标语，其一写着：「V．V．普丁：俄罗斯是欧亚国家。」另一幅则是：「欧亚高于一切。」可想而知，报刊上对这次大会的其中一篇报导（每一家报社都做了报导）直接以「欧亚高于一切」（Eurasia über Alles）这句话为标题。

「欧亚高于一切。」杜金在成立大会的演说结尾又重复一遍。他的演说内容完全用在讨论以下的概念：全世界，至少是俄国，被欧亚与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t）这两股背反的力量撕裂开来。杜金说，就连叶尔钦也早在一九九○年代开始看出大西洋主义的徒劳，但「唯有普丁的统治，才带来了欧亚主义思想的真正胜利。」他说，为了这个理由，「我们完全且激烈地支持总统。这令我们位居完全而激进的核心地位。」

这是句难以理解又令人着迷的话，如同他十五年前对叶甫根妮娅说

过的「紫罗兰在嘴唇上绽放」。新运动最年轻的成员伊戈尔．尼古拉耶夫（Igor Nikolaev）来自遥远的雅库特，在他的演说中更清楚地阐释了欧亚自我认知，他说这篇演说脱胎于中学时写的小论文。「个人主义与独立意见都是欧洲的典型特徵，但我们不属于欧洲，」他说：「服从与热爱领袖才是俄罗斯人的特徵。」註319

*

「欧亚主义能拯救俄国吗？」这是二○○二年六月在电视上播送的那次政治圆桌会议的主题。杜金从讨论来宾晋升为题目拟订者，欧亚主义也从边缘政治运动一跃成为普世解决方案。它对俄罗斯歷史提供了替代视角，按照这种解读，一百五十年的蒙古鞑靼统治不再是破坏时代，反倒是至关重要的文化融合时期，确定了俄罗斯走上不同于欧洲的特殊路径。杜金向广大公众解说欧亚主义时，徵引了流亡国外的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亲王（Nikolai Trubetskoy）在一九二○年写下的一本书。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他是结构语言学的开山祖师之一）聚焦他所谓的「文字魔法」。他主张欧洲人（更精准地说，是德国人）藉由运用「人类」、「普世性」、「文明」及「进步」之类的字词，欺骗全世界（或者更精准地说，是斯拉夫民族）接受这套世界主义思想。实际上，特鲁别茨科伊论证，德国人的「人类」指的是他们自己和其他同类民族，他们的「普世性」、「文明」与「进步」概念也同样是唯我论的──或者按照特鲁别茨科伊的说法，是「自我中心的」。因此，当斯拉夫人接受这套世界主义思想，就有丧失自我身分认同与文化之虞。註320

特鲁别茨科伊的着作名为《欧洲与人类》（Europe and Humanity），杜金在八十二年后为电视观众摘要这本书时则表示，这位亲王认为欧洲对人类构成威胁。他解释，在那之后，情况又转变了：欧洲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但美国对人类构成威胁。「西方社会的计画被强加在所有其他民族之上，」杜金说：「只要西方执意将普世性标榜成自身价值，执意将这些价值强加于他人并试图支配，不论是运用殖民手段还是新殖民手段（全球化正是新殖民手段），欧亚主义者就会继续反对西方。」註321

这些话在广大电视观众耳中听来句句真实。西方正在扩张。即使俄罗斯已经对美国的一切幻灭，它的邻国却出乎意料地向西方靠近。二○○三年，由倾向西方的青年政治运动人士领导的一场不流血革命，推翻了乔治亚政府。普丁的克里姆林宫与被赶下臺的乔治亚总统爱德华．谢瓦纳兹（Eduard Shevardnadze）彼此厌恶，后者曾出任戈巴契夫的外交部长，然而这场革命仍令莫斯科忧虑。普丁派外交部长前往乔治亚首都，协助交涉政权转移，但他和俄国媒体全都坚持将那儿发生的事称为「政变」而非「革命」。普丁在对内阁演说时，间接向乔治亚的新领袖

发出警告，他强调：「俄罗斯数百年来始终与乔治亚人民有着兄弟关系。」註322事实上，乔治亚数百年来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除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年短暂独立，以及苏联解体至今十多年外。「兄弟关系」近似于苏联时代的「民族友谊」话语，他确有此意。他也有意提醒乔治亚人，俄罗斯在自己固有的活动范围里，仍是「平等民族中的第一位」。

苏联解体过后十二年，俄罗斯仍然认为先前的属国是自己的一部分。不同于有着明显差异的外国，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被称为「邻近外国」（near abroad）。（赫尔辛基与维也纳距离莫斯科更近于基辅和提比里斯，但这个名称指涉的是心理与政治距离，而非物理距离。）与「邻近外国」的关系甚至不是外交部职掌的一部分：它们由总统办公厅自行处理。这大概是苏联的机构在一九九一年由俄国继承、却不顾时空逻辑保存下来的最显着事例。「本质上，这维持了苏联体制中加盟共和国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的那一部分，」俄国记者米哈伊尔．札加尔（Mikhail Zygar）写道：「既然总统办公厅沿用的建筑物正是旧广场（Staraya Square）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这个传统恰好也已经维持了数十年，即使苏联早已不復存在。」註323所谓的传统，即是对名义上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今它们不再是俄罗斯联邦成员）施加控制，并由莫斯科指派领导人。

二○○四年，乔治亚革命后一年，莫斯科牢牢控制了乌克兰选举。俄国政治技术专家涌入乌克兰首都基辅。他们的任务是防止亲西方的挑战者当选，现政权是莫斯科能接受的。投票前三天，亲莫斯科政府举行阅兵，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基辅解放六十周年（真正的周年纪念日其实是九天后，但他们等不了那么久）。普丁莅临了，在观礼臺上站在即将卸任的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以及后者亲自挑选并得到莫斯科支持的接班人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身边。苏联军人在一九四五年插上德国国会大楼的那面红旗──「胜利旗」，也被带到基辅参与阅兵。註324普丁将自身权威、俄国最重要的国族神话，以及神话最重要的实体象徵，都提供给了亲莫斯科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

但这些全都没用。亚努科维奇输掉了投票。他仍然自称胜利，但也没用：乌克兰人民走上街头。他们在基辅中央广场扎营露宿，拒绝解散，不顾十一月的严寒，然后是十二月的冻寒，直到乌克兰最高法院介入，裁定重新选举。採取亲西方、完全独立于莫斯科立场（甚至娶了加拿大女子为妻）的候选人维克多．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当选总统。

*

玛莎发现尤申科并不讨人喜欢，他的反莫斯科话语更侮辱到她个人。她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关注。「该死，这是我第一次对别人的选举这么激动，」二○○四年十一月，她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写道：「我再说清楚一点。这是我第一次对任何地方的任何选举这么激动。」

「那只是因为在俄罗斯和莫斯科，我们这时代的所有选举结果都是注定的。」一位朋友在留言区回应。註325

确实如此。二十岁的玛莎年纪只够参加一次地方选举、一次国会选举和一次总统选举投票，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众人皆知的。普丁不可能在二○○四年输掉连任；从玛莎上小学开始就在位的莫斯科市长，地位同样根深柢固；普丁的统一俄罗斯党看来也会永远掌控国会。玛莎甚至不知道她或任何认识的人有可能对现在的选举产生热情—直到乌克兰展现给她看。

整个俄罗斯如今都被基辅的场景给惊呆了。一年前的乔治亚革命在此引起的关注相对稀少，但如今，乌克兰革命让人们开始怀疑（或期望）一个模式。它也会在俄罗斯发生吗？这样的想像无视于两国的关键差异。比方说，在普丁第一任总统任内将俄罗斯选举机制掏空的同时，乌克兰的选举机制则逐渐发展成熟。而且乌克兰有个独立且正常运作的最高法院能够介入化解僵局，反观俄国宪法法院实际上则被行政部门吸纳。

鲍里斯．涅姆佐夫被乌克兰的事态演变激励了。二○○三年十二月输掉国会选举之后，他整个人无所事事。这是他从一九九○年投入政治以来第一次败选—实际上，他曾经很习惯压倒性的大胜。他接受了一家银行的管理职，待遇优厚、工作乏味。但现在有了乌克兰，有了真正的政治战斗和实际上高风险的社会运动。他开始穿梭往返基辅。他接受了一项志愿职务，成为尤申科总统的顾问。他戴上一条革命颜色（橘色）的围巾，在抗争第一天来到广场演说。几天后，他在莫斯科的一次电视专访中，将乌克兰标举为俄罗斯的榜样：

以往，基辅的人们曾经仰望莫斯科。如今有很多莫斯科人，也不只莫斯科人，更是全体俄罗斯人，想必会仰望基辅，看人们如何为权利而战，为真理与自由而战。註326

奉命去处理乌克兰事务的政治技术专家们回到莫斯科，如此解释自己的失败：都是美国的错。根据他们的说法，美国人（他们通常是指美国政府，以及乔治．索罗斯）从二○○○年推翻南斯拉夫的斯洛波丹．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开始，就在资助及组织东欧革命。然

后他们袭击了乔治亚，随后是乌克兰。就是这样：一切对于美国扩张的恐惧全都得到确认。

普丁长久以来都在谈论俄国面临的外在威胁。他最近一次提及外在威胁，是在俄罗斯高加索山区小镇贝斯兰（Beslan）一所学校的人质危机过后。二○○四年九月的这次人质劫持事件造成三百多人丧生，其中多数为儿童。这次由车臣恐怖分子主导的攻击事件过后不到两週，普丁宣告了俄罗斯政治体制新一波全面变革。州长今后改由官派而不再民选。下议院全部席次今后将依照各政党在全国投票的得票比例分配（在这次公告之前，下议院一半席次按政党比例分配，另一半两百二十五席则是全国两百二十五个地区人民投票选出的代表）。普丁解释，这些措施将使政治机制获得巩固，创造出保卫国家不受外在威胁所需的凝聚力—学校人质事件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外在威胁实例。如同他先前的诸多改革，这些措施影响的是正式的政治机制，以巩固政权为目的。但要对抗它认定由美国推动、索罗斯资助的人民革命威胁，克里姆林宫需要将焦点集中在公共领域，它需要将公共领域动员起来好保卫政权。数年后，澳洲政治学者罗伯．霍瓦斯（Robert Horvath）发明了一个词汇描述这个过程：「预防性反革命」（preventive counter-revolution）。註327

*

彷彿在证实克里姆林宫对革命的恐惧，俄罗斯全国各城市在二○○五年冬天爆发了大规模抗争。数万人民这时抗议的是一连串名为「应得权利货币化」（monetization of entitlements）的措施，按照这些措施，接受公共援助的人民（五十五岁以上女性、六十岁以上男性、提早退休人士及身心障碍者）将不得再享有无限制大众运输服务及其他实质福利，而是获得一笔定额款项。这是一套降低成本的措施，接受援助的人们准确察觉到：即使受到告知，但他们得到的金钱与原有的福利并不等值。他们正在丧失的是对许多人而言攸关存亡的援助。

克里姆林宫未能预期到这一波强烈反弹。这些抗争是噩梦的材料。抗争者是老弱人士，就算他们在全国各城市堵塞车道、或是在圣彼得堡街道上扎营露宿，国家也不能对他们动用武力。

抗争的还不只有退休人士。大量青年组织似乎突然现身了。有些是激进组织，像是从全国各地吸纳青年新血后年轻化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和领取年金的人们并肩示威，或是代为示威。其他则是由传统政党衍生或分裂的青年团体；他们往往在策略上以推翻了米洛塞维奇的南斯拉夫青年运动「抵抗」（Otpor）为榜样。他们发起小规模的街头流动戏剧演出。

最后，全国最知名人士之一，西洋棋冠军加里．卡斯帕洛夫宣布他

要结束运动员生涯，全力投入政治抗争。他发起了一个名为联合公民阵线（United Civic Front）的组织，这个伞状联盟能够将年金受领者、「抵抗」的效法者，以及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等诸如此类的群体团结起来，完全是因为他们全都反对普丁和他正在建立的威权政体。他们一同发动示威游行，名为异议者游行（Marches of the Dissenters）。

玛莎是从乌克兰大选期间开始在「livejournal.com」上写部落格的，这个网路平臺风行于美国青少年之间，可是在俄国则被自发地改变用途，成为一套初阶的社群网络（即使这个词汇在当时尚未使用）。到了二○○五年春天，玛莎在这套网络里已经有了影响力，也开始阅读几位参与青年政治组织人士的发文，并与他们讨论。她参加过几次「防卫」（Oborona）运动的聚会，这个团体由一位名叫伊利亚．雅辛（Ilya Yashin）的年轻男子发起。「防卫」运动在各方面都意图效法「抵抗」运动，包括名称的发音在内。但谢尔盖反对：他不要自己的妻子和政治流氓扯上关系。到了年底，玛莎怀孕了，于是听从了丈夫的告诫。

参加抗争，甚至知道抗争正在发生的其实只是少数人。除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创造出一个广大的在地行动者网络之外，每个青年团体都只有少数活跃成员。上街抗争的年金受领者相对多数，但没迫切需要国家援助的俄国人多半忙于自己的生活，而如今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美好。由于石油价格飙涨，俄罗斯在二○○五年进入了连续第六年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

金钱是克里姆林宫用以平息丧失权利者抗争的利器：年金大幅调涨，普丁也宣告了新的承诺，要对社会福利项目全力提供支出。接着政府着手镇压组织抗争的青年，以及整个公民社会。将繁琐的登记及匯报要求施加于非政府组织的一项法律通过了。公民社会团体用尽全力抵抗这项法律，就连美国国会都在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中对新法表示关切━从而证实了克里姆林宫将俄国非政府组织视为西方代理人的看法。为了回应所遭受的反弹，立法内容稍有软化，这导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以及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俄国境内完全无法运作的相关条款被删除了。但普丁在二○○七年一月签署施行的这项法律，仍让非政府组织陷入了无用的文书工作之中，旨在耗尽其资源。

异议者游行则遭遇了有形镇压，而非书面镇压。警察开始在游行预定时间数小时前或数日前围捕行动者。设法按时参加的人们则先被手持警棍的镇暴警察殴打，再被拘留。社运人士们在这些战斗中坚持了几年，但游行仍在二○○八年初终止。

克里姆林宫将视为威胁的人员及组织从公共领域封杀，也用自己的

支持者填补空缺。在苏联时代，公共空间是铁板一块，由共产党及其对应于不同年龄的附随组织填满。其中没有非政府组织，而是由国家工会当局营运的工会类实体参与。如今，政治技术专家们开始创造出各种组织，以营造多元的假象。克里姆林宫自行设立了基金会，由基金会向它所挑选的组织核发补助。政府补助制度本身未必是压迫的工具━许多欧洲国家也都拥有主要由国家资助的公民社会部门━但在此毫不遮掩的预设是，克里姆林宫资助的团体要遵照克里姆林宫的要求办事。政治技术专家大量制造出以保卫克里姆林宫为宗旨、必要时不惜进行街头武斗的青年团体。这些团体的名称包括「我们」（Nashi，显然与「他们」截然不同）和青年近卫军，后者得名于一群被传诵成神话的苏联青少年反希特勒游击队。莫斯科有一群学生发行了几期名为《行动》（Aktsiya）的报纸；新炮制的团体则以一份拥有办公室、高薪员工及规律印行时程的报纸回应，他们命名为《反动》（Reaktsiya）。这些新团体有自己的训练营和潮T，还会在某些小城市为苦无休闲娱乐去处的年轻人举办舞会及其他娱乐活动。他们策划街头行动，包括毫无讽刺意味地将自己的游行命名为同意者游行（March of the Consenters），与异议者游行应对。早在十五年前，重建时期的着名政治家与歷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Afanasyev），就将这样的人称为「攻击性的顺从多数」（the aggressively obedient majority）。

在这个脉络下，杜金应许的「完全而激进的核心」开始说得通了。他如今自命为对抗「橘色威胁」斗争的领袖，而他将所谓的橘色威胁描述成大西洋主义针对欧亚的阴谋，甚至是美国对俄罗斯发动的圣战。欧亚运动催生了自己的青年侧翼━欧亚青年联盟（Eurasia Youth Union），以反橘阵线（Anti-Orange Front）先锋自居，杜金宣称这个实体有两千五百名成员。杜金说，俄国要防范橘色革命，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建立特辖区（oprichnina），也就是沙皇伊凡四世以「恐怖伊凡」之名被世人铭记的那套恐怖统治。

在重新设计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克里姆林宫也改变了行事历。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十一月七日，过去一向与除夕、五一劳动节、胜利日并列为一年之中的四大国定假日。叶尔钦将它更名为和谐与和解日。如今，普丁显然是担心革命组织会想要利用这个纪念日发动抗争，他废除了这个国定假日。俄国人在十一月还是会放假一天，但会在十一月四日，而这天纪念的是一次过去不曾出现于俄罗斯歷史建构中的事件：一六一二年波兰占领军被逐出莫斯科。杜金身为「预防性反革命」领袖之中的知识分子与歷史学家，当仁不让地构思出这个新假日。二○○五年十一月四日，欧亚青年联盟发起一场穿越莫斯科市中心的游行，他们命名为俄罗斯游行（Russian March）。欧亚青年行动者们打头阵，高举大

书「俄罗斯反对占领者！」（Russia Agianst the Occupiers）的宣传横幅。还有另外几个团体加入欧亚主义者的行列，他们的口号则是赤裸的种族主义：「我们要俄罗斯人的俄国！」一位讲者的结语是：「荣耀归于俄罗斯！」另一位讲者则慷慨陈词：「我们还要忍受这些害虫，忍受所有这些『拉脱维亚』、『波兰』和『乔治亚』多久？我们宣告今天是民愤之日。俄罗斯人，站起来吧！」註328

「当局藉着放行（欧亚青年联盟的）这种反西方仇外思想，为极端民族主义更加偏激、变种的拥护者们制造了机会，」霍瓦斯写道：「随着温和的反对派被驱逐到边缘，极端民族主义者获准进入俄罗斯的公共领域。」註329

*

「我想到好主意了！」鲍里斯于二○○五年夏天打电话给人在葡萄牙的冉娜，在电话里吼叫着说：「你应该出来竞选。」他的逻辑很简单：他和「防卫」运动的参与者见了面，那一年至今为止发生的事件，令他确信年轻人（非常年轻的人们）是政治的未来。他的女儿比起其他人多了一项优势，因为她有大名鼎鼎的姓氏，这时他把自己的姓氏说成了一种品牌。

冉娜不感兴趣。坦白说，她对很多事都兴致缺缺；她仍然缺乏志向，或者该说再次缺乏志向。她刚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在校成绩够好，即使她对自己的课业或同学都只有最低限度的接触。她在学院里的多数时间，社交生活都以一群年纪稍长的同性恋男性为中心──这些人在城里最好的新俱乐部玩得最愉快。之后，在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她接到母亲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快来，我帮你介绍一个非常可爱的银行家。」这位银行家名叫季米特里，他确实十分可爱，但他也大了冉娜十五岁，正在第二段婚姻之中。不过，春天来临时他分居了，冉娜开始与他同居。季米特里世故而周到，是个好厨师，也很会逗人开心。冉娜的朋友喜欢他，父母亲也喜欢他──季米特里总有办法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受重视。他们的关系只有一个小麻烦，那就是季米特里热爱一切华丽的事物，他随时都想看到冉娜身穿昂贵的洋装和炫丽的高跟鞋。但他的一项特徵远远胜过了冉娜对高跟鞋的不适：他喜爱冉娜的所有想法。因此他们这时才会在葡萄牙。冉娜在国际关系学院选修了葡萄牙语做为第二外语，她想利用毕业后的夏天在当地人之间练习。她在最好的地方度过最美好的夏天，鲍里斯却带着他疯狂的建议乱入。

「玛格丽特．柴契尔在二十二岁那年第一次参选。」这是鲍里斯提出的最终论证，毫无道理的是，它成功说服了冉娜。她回到莫斯科，宣布竞选市议员。她和鲍里斯对所有人说这是她自己的想法，而父亲对她

参选心存疑虑。冉娜对记者说，她比鲍里斯「更温和」，记者们普遍将这个说法理解成她并不顽强反对普丁。註330看来鲍里斯自己也相信了这个说法：他对冉娜说，她必须自行募款。他确实借给她两万美元左右，以支付「参选保证金」—在开票前交付託管的金额—要是她的得票比例低于百分之五，国家就会没收这笔钱。

冉娜说服了一位大学同学出任她的竞选总干事。母亲的一位朋友奥尔嘉也加入。奥尔嘉十分擅长对大众说话。季米特里和往常一样支持她，为她出钱拍摄定装照。冉娜身穿全白衬衫的照片经过修图，好让候选人看来不至于太过年轻而显得可笑，这张照片登上了广告看板。她的标语是「冉娜．涅姆佐娃：联合候选人」。看板上列出了支持冉娜的五个政治团体。它们全都是亲民主派团体，都处于从主流落入边缘的某个阶段。

没有什么政治纲领可言。她父亲很喜欢谈论所谓的「民主价值」，但这在冉娜看来老套得一塌糊涂。「民主价值」看来也并非她在莫斯科北区的选区居民所关心的事。冉娜认真学习，与选区居民会面，也向唯一一个长期在位、还没被普丁任用的一波新职官权贵淘汰掉的在地政治人物请益。这个选区首先关切的是交通运输—地铁并未向北延伸得这么远，巴士班次也不可靠—以及住房存量。数千人居住在一度被规划为临时住所的破败建筑中。

鲍里斯安排冉娜与金属业巨头—诺里尔斯克镍公司（Norilsk Nickel）共同所有人米哈伊尔．普罗霍洛夫（Mikhail Prokhorov）联繫。或许他会想要为选战出一份力。普罗霍洛夫花了一小时用近乎机智问答的问题轰炸冉娜，想要引导她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然后他说，要是她换个选区的话，他会很乐意提供资金。他正在莫斯科南区资助一名执政党候选人，而他愿意付钱给冉娜挑战那位候选人。他想找乐子。她感到愤怒。他打电话给鲍里斯，大笑着说：「你女儿是个社会主义者。」

没有哪一个特定时刻让冉娜意识到整个赛局受到操纵。但在投票日来临时，她感觉自己始终都知道这点。现任者是个平庸之辈，连名字都让人记不得，不过他还是会胜选，因为他属于普丁的统一俄罗斯党。投票日当天，奥尔嘉在一处投票所监票，看见军人被巴士载来灌票。这是其中一种操纵手段。另一种手段则是资讯饱和（saturation），到处都会看到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的姓名和肖像，即使没人真正知道他是谁。这如果是场诚实的选举，冉娜估计自己大概会输给共产党候选人。结果，共产党候选人名列第二，冉娜则是第三—得票比例百分之十，足够收回自己的「参选保证金」。冉娜对此感到自豪，特别是因为鲍里斯也以她为荣。然而鲍里斯说，他如今明白了另一件事：「光有姓氏还不够

—政治人物必须有一部传记。你得去工作。」

*

这一切全都只是怪异的名称，别无其他，只是民主的拟态。候选人都在抄袭彼此的政纲。你可以预先知道他们会说出什么话。他们真正在做的是创造一党体制，这正是迈向极权主义之路。我们大概会看到政党假装成反对党或准反对党，它们会轮番向政府叩头和批评政府。但它们真正的功用是支撑一党体制。要是布尔什维克党更聪明一些，他们自己就能做到这点—创造出十几只这样的臭虫，在社会体上跳来跳去。

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可夫列夫从来不曾让自己的公开发言听来这么暴躁。但在二○○五年四月，他刚结束一趟走遍全俄国的巡迴演讲行程，放弃了让自己的发言听来文明的意志与愿望。「我们替自己决定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未来，」他对一位记者说。「民族主义」一词在他的字典里仍是最强烈的咒骂字眼之一。「我现在每天到处都看见史达林的马克杯公开展售，而人们照单全收。那是一张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杀人犯的脸孔。但我们被告知，其实他细看之下没那么坏。」

「你会为了你和戈巴契夫没有解散祕密警察感到遗憾吗？」记者问道。

回想在中央委员会的时候，我们都假装自己负责掌权。但真正发号施令的其实始终是契卡（CheKa），註331也就是国安会。未经他们允许，我们甚至不能出国。就以我为例—我是政治局委员，而我被十五个国安会特工监视。两位厨师和管家都是军官……

权力中心从克里姆林宫移转到联邦安全局了吗？

一直以来都在那里……

为何有这么多人把过去给理想化？

这是「领袖原则」。註332这是一种病。这是俄国传统。我们有自己的沙皇、亲王、总书记、集体农场主席，诸如此类。我们活在对上级的恐惧之中。想想看：我们不怕地震、洪水、火灾、战争或恐怖攻击。我们害怕自由。我们不知道该拿自由怎么办……法西斯团体同样由此产生—他们是明日的突击队。

橘色革命有可能在我国发生吗？

我们不会像乌克兰那样的……我们仍与一种简单的三位一体共存。

国家在最顶端，而我们持续让它更强大。社会悬浮在国家下方某处。依照国家所愿，社会可以是公民的、半公民的，或者只不过是人群。去看看欧威尔贴切的描述。小不点般的个人则在底层某处跑来跑去。註333

这是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留下的最后一次重要访谈。他在二○○五年十月逝世，距离八十二岁生日只差几星期。他的儿子继续编纂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所出版的歷史文件。已有四十三本书问世，但还有更多文件尚待汇编。这项计画对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来说，也成了挫败感的来源之一，因为有一种新回应变得愈来愈普遍：人们来信表示，这些文件述说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但书还是得继续出版，因为其中许多文件又再次锁进档案里不对外公开。

不过，谢廖沙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帮忙的义务了。祖父去世之后，他可以自由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他选择了乌克兰。那儿有个女孩，而且基辅恰巧是如今人人都想要定居的地点。

*

选举落败之后，冉娜又回復到胸无大志的状态。这没什么问题：她刚结婚，季米特里的薪资让她无须工作。

她身边的每个人都在赚钱，然后用赚来的钱再赚更多。她的父亲和母亲各自开始投入市场，母亲证明了自己特别拿手。季米特里成为一家银行的副总裁，他的朋友大多都在金融业服务。冉娜观察了他们将近一年，然后决定自己也来试试身手。她在一家投资公司找到工作，学习买卖期货。赚钱是这世上最简单的事。俄国市场就只是不断增长，找出上涨速度最快的股票则是场好玩的游戏。

自一九九九年起，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成长曲线，与普丁在一九九九年秋天的民意支持度曲线形状大致相同：一条垂直线。俄国经济并未变得更有效率——实际上，真有改变的话，是它变得更缺乏效率——但无论如何，它都在急遽成长。克利福德．盖迪叙述的「虚拟经济」问题并未解决：将近一半的俄国工业持续贬值。但这些公司并未在俄国小小的股市中呈现，股市完全由石油及天然气公司主导——因此股市不停上涨。到了二○○五年，石油及天然气的租金远远超出了联邦预算需求，使得金钱得以存入储备基金里，转而在紧急状态下动用——例如年金受领者的抗争火苗必须扑灭之时。註334

*

玛莎在二○○六年九月生下一个男孩。他们将他取名为亚歷山大，简称萨沙。婴儿出生后五天，玛莎开始出血。她被救护车送进医院。一名

魁梧的护士为她做了检查—那比生产更痛，玛莎尖叫起来。

「我敢打赌，你们相干时一点都不痛！」护士咆哮。

玛莎随后在这个充斥烂医院的城市里最低劣的一家医院度过两星期。她的室友从两人到五人不等，病人在没有帘幕隔开的病房里，被放置在下陷的铁床上。医院只有从二十世纪中叶沿用下来的最粗陋药物和设备。玛莎的一位室友怀孕二十六週后胎儿停止发育，但引产的药物无效或剂量不足，结果她躺在病房里好几天，奋力产下死胎。

几天之后，玛莎发现自己成了医院腐败生存策略的一环。俄国建立了一套强制健康保险体系，这项政策由国家营运并提供医院给付。但这家医院是个没有人会自愿选择前来的医疗设施，因此救护车在夜间将投保人送来这家医院，好赚取回扣。玛莎遭遇的正是这种状况。她一被安排住院，医师就将她安置在传染病隔离病房，让她不可能转往其他医院。

而在家中，怪事发生在谢尔盖身上。他没有採取任何正常丈夫在这种情况下的做法—请求自己的母亲或玛莎的祖母前来照顾婴儿，而是跟自己的儿子亲近起来。当玛莎出院回家，她看到谢尔盖如今比她更像个家长。他让她加入，接下来一整年他们都待在家里，一面照顾婴儿、一面营运网站。

玛莎随后进入一家分销公司工作。不过这个名称多少有些误用。她所参与的这条业务线，或许应当称为「促进贪腐」。

普丁对年金受领者抗争的回应，是宣布政府对社会服务进行鉅额投资。投资分成四项不同的「全国优先发展计画」。俄罗斯在第一年内对这四个计画投资了将近二十亿美元，隔年投入的金额更高。最大一份金额投入了全国健康计画，其宗旨是将俄国医药彻底现代化。註335

医疗保健及研究机构开始进口大量的医疗设备，以及设备运行所需的化学品及零组件。由于资金来自联邦政府，所有採购都必须由卫生部经手，卫生部抽取的回扣占了支出的八成到九成。但外国供应商受到母国法令约束，无法迁就这套回扣方案或向海关行贿。这正是「分销公司」介入斡旋之处。玛莎的工作就是确保贪腐的附加费用得到支付，但在文书资料上则一切清白。她得到一笔丰厚的薪资。

註315：“Zhanna Nemtsova prolila krov’ za Ameriku,” Komsomol ‘skaya Pravda, October 19, 2001, http://www.kompravda.eu/daily/22658/12897/（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316：前引书。

註317：Lev Gudkov, “Otnosheniye k SShA v Rossii i problema antiamerikanizma,” Monitoring obshchestvenogo mneniya 2, no. 58 (March-April 2002), pp. 32-48.

註318：Chto delat’? Vyzhivet li mir posle sobytii 11 sentyabrya v Soyedinennykh Shtatakh? 该

节目原先于二○○一年十二月一日播放，存档参看：http://trueinform.ru/modules.php?name=Video&sid=46746（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319：Grigory Nekhoroshev, “Yevraziytsy reshili operet’sya na Vladimira Putin,” Nezavisimaya gazeta, April 24, 2001, http://www.ng.ru/events/2001-04-24/2_support.html; Igor Maltsev, “Yevraziya uber alles: Sozdano novoye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oye dvizheniye,” Kommersant, April 20, 2001, p. 9, http://www.kommersant.ru/doc/254580; 欧亚运动对于自身成立大会的网路讨论区，http://arctogaia.org.ru/FORUMS/messages/47/622.html?993838577；（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320：N. S. Trubetskoy, Yevropa i chelovechestvo (Sofia: Rossiiskobolgarskoe knigoizdatel’stvo, 1920)，文本取自：http://www.philosophy.ru/phil/library/vehi/nstev.htm（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321：“Chto delat’? Yavliayetsya li Yevraziystvo spaseniyem dlya Rossii?”

註322：“Putin: perevorot v Gruzii proizoshel iz-za oshibok prezhney vlasti,” lenta.ru, November 24, 2003, https://lenta.ru/vojna/2003/11/24/putin/（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323：Mikhail Zygar, Vsya kremlyovskaya rat’: Kratkaya istoriya sovremennoy Rossii (Moscow: Intellektual’naya literatura, 2016), p. 107.

註324：前引书，p. 123。

註325：http://ponny1.livejournal.com/6806.html .

註326：Robert Horvath, Putin’s Preventive Counter-Revolution: Post-Soviet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Spectre of Velvet R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33-34.

註327：前引书。尽管我个人对下一小节所叙述的多数事件都做过报导，我仍受惠于霍瓦斯的这个概念架构。

註328：Nataliya Kholmogorova, “Probuzhdeniye: Russkiy March 4 noyabrya,” specnaz.ru, http://www.specnaz.ru/article/?808（二○一七年三月十六日浏览）。

註329：Horvath, Putin’s Preventive Counter-Revolution, p. 121.

註330：“Doch Nemtsova zaregistrirovana kandidatom v deputaty Mosgordumy,” newsru.com, October 31, 2005, http://www.newsru.com/russia/31oct2005/nemcova.html ; Mikhail Tul’skiy, “Iz zhizni Zhanny I Mashy,” Vzglyad, August 31, 2005, http://vz.ru/politics/2005/8/31/5272.html（皆于二○一六年五月三十日浏览）。

註331：编按：简称「契卡」的全俄肃反委员会（Chrezvychaynaya Komissiya），是苏联祕密警察最初的名称。

註332：编按：雅可夫列夫使用的字词是vozhdism，有时翻译成德文的Führerprinzip。

註333：A. Samarina, “Rodonachal’nik glasnosti—o kontrreformak,” Nezavisimaya gazeta, April 19, 2005, archived at http://www.alexanderyakovlev.org/fond/issues-doc/1010283（二○一六年五月三十日浏览）。

註334：Glifford G. Gaddy and Fiona Hill, “Doubling GDP and the Illusion of Growth,” The Moscow Times, November 12, 2003, archived at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3/11/12russia-gaddy（二○一六年六月三日浏览）；Clifford G. Gaddy and Barry W. Ickes, “The Virtual Economy Revisited: Resource Rents and the Russian Economy”，復兴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第四届股权投资大会演讲提要，二○○五年十月二十日于纽约，文本参看：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speeches/2005/10/20russia-gaddy/gaddy20051020.pdf（二○一六年六月三日浏览）。

註335：Mikhail Mel’nikov, “Ne chokayas’: vspominayem prioretetniye natsproekty,” Russkaya planeta, October 21, 2015, http://rusplt.ru/society/ne-chokayas-vspominaem-prioritetnyie-natsproektyi-19327.html（二○一六年五月三十日浏览）。

# 第十三章　全都在家庭之中

廖沙头一次看到另一个男同志，是在大学第一学年的十二月。那个男生来拜访宿舍里的一位女生。他的名字也叫阿列克谢，同样来自索利卡姆斯克，这一切全都是如此美妙的巧合，廖沙立刻爱上了他。

他也立刻搬去跟阿列克谢同居。在那之后，全都不如廖沙的预期。阿列克谢年纪较大（他二十一岁，而廖沙十七岁），是个大学中辍生。他的小公寓很脏乱。廖沙起初几天都花在彻底刷洗，再把它打理成共同生活的家。阿列克谢显然也从不下厨。公寓离彼尔姆唯一的同志俱乐部很近，阿列克谢的许多朋友都习惯在独自或结伴饮酒一夜之后前来打地铺。他们喝了很多酒。阿列克谢有几个朋友罹患肝硬化。某人死于肝硬化。另一个人自杀了。他们的性爱粗暴又疼痛，阿列克谢也和其他人发生关系。尽管如此，最重要的还是廖沙有了男友。

现在该是向母亲出柜的时候。当廖沙回到索利卡姆斯克过新年，他马上着手进行。

「妈妈，我们得谈谈。」

他们在厨房的餐桌前坐下。

「妈妈，我爱你。」廖沙说，接着开始不可抑制地抽泣。

加林娜等他把自己平復下来。他做不到。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喜欢男生？」最后她问了。

「对。」

「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她冷静地做出结论。

加林娜随后三天一语不发，但在这三天每一次家族新年聚会上，她都会很快地接连将三杯伏特加一饮而尽。她平常不喝酒的。

情况在往后六个月也很难熬，即使加林娜恢復对廖沙说话，继续供应他租屋的钱。他知道，她逼自己在廖沙和社会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了自己的儿子。这时她正在适应这个选择的后果。在家族之中，每次有人试图藉由取笑廖沙还没交女朋友和她搭话（在十八岁这样的高龄，其他年轻男生都在考虑结婚生子），她会直接严厉地用一句「他觉得时候到了，就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打断对话。她也对他明说，她不想知道任何细节：她不提问，不欢迎任何心事，但也不说任何贬抑的话。但在廖沙与阿列克谢分手之后，情况似乎好转了些。加林娜看来松了口气。

事情是这样的，廖沙在家的时候，阿列克谢带了另一个人回家。廖沙不情愿地同意进入开放式关系，但这令他难以忍受。廖沙结束了这段

关系，但他也对自己许下承诺要抛弃妒忌—这种情绪毫无助益。要是他还能再交男友，他会留意各式各样经验的需求，只要男友不同时爱上别人，他也能容许性关系的不检点。与阿列克谢的关系让廖沙变得更明智。搬回宿舍之后，他当起了有模有样的爱情大师：女同学来向他请益，班上其中一位女同学的母亲也来找他商量。

廖沙在一次造访索利卡姆斯克时遇见了萨沙。事实上，廖沙不是遇见他，而是看到他：萨沙在新开的轨道购物中心（Orbita）有一处常驻摊位，贩售音乐光碟和录影带。这家购物中心的大小或许只有彼尔姆新开商场的四分之一，但同样有着令人目眩的霓虹灯和光滑的磁砖地。有人对廖沙说，萨沙有个爱人，那个男人年纪更大，或许也更有钱。另一个人对廖沙说，萨沙想和他见面。

廖沙开始花时间去轨道购物中心。他在学校每个假期和某些週末都来到索利卡姆斯克，并且在那儿闲晃。他和当地所有的朋友见面，找不到朋友的话，他就独自去轨道购物中心。萨沙会走过来向他借火，但他总是搂着一个女孩前来，或在廖沙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前来。严格说来，他们还没真的认识彼此。

最后，廖沙发现自己来到一场生日派对，萨沙也是宾客之一，有人为他们相互引见。萨沙向廖沙问起和他研究相关的具体问题，以及廖沙最近前往莫斯科参加研讨会的旅程。萨沙对廖沙做的研究与了解，显然和廖沙对他做的一样多。廖沙自己已经知道，萨沙出身经济困难的家庭，他的父母都酗酒，有六个兄弟姊妹，而他两、三次报考彼尔姆理工学院都落榜。这时，他们诡异的求爱过程已经歷时数年。

他们和一位年轻女子一起离开派对。他们陪她走回家，然后萨沙陪廖沙走回家，他解释：街上很危险，而他回市郊公寓的路程还有这么远，绕点路根本没差。两人没有肢体接触：廖沙冷静、开放但不鲁莽。隔天早晨他就后悔了。

派对过后什么都没变。廖沙还是搭上巴士，单趟五小时，几乎每个週末都来到商场闲晃，萨沙也还是向他借火。最后廖沙构思出一个计画，他要单独跟萨沙说话。他在轨道购物中心外面的巴士站等待萨沙下班搭上巴士。廖沙也搭上同一班巴士而没被察觉—人群和冬季的黑暗让这么做变得容易。他在萨沙下车的站牌跟着下车，徒步尾随一小段之后赶上了他。

「萨沙，我们得谈谈。」

萨沙看来一点也不惊讶。他看来确实预先准备了自己的答案。

「你不该屈服于你的幻想，」他说：「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话。」

廖沙在一封信中倾吐自己的心迹，请一位共同友人到商场亲手交给萨沙。萨沙打电话来。这次，他没有对廖沙说什么不要相信别人的话。他甚至没有说自己是同志。他只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一再重复着「我做不到」。

廖沙决定了，他们需要面对面谈话，但不是在商场或街头，而是私下谈。萨沙只是需要觉得安心。廖沙找到一张报纸的分类广告，人们在上面提供日租公寓的资讯。他打电话联络、付了租金、拿到钥匙，打电话告诉萨沙地址。他煮了晚餐，然后等待。萨沙来了。

他说：「我做不到。」

他说：「对不起。我不该让这一切继续下去。我做不到。希望你能原谅我。」

廖沙说：「不要叫我原谅你。我只希望你可以原谅你自己。」

廖沙觉得这一切都太像电影情节，而且是一部很长的电影。不知怎地，他们花了四小时对彼此说出这些话。然后萨沙离开，廖沙也离开了，因为他现在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这间公寓过夜。

*

萨沙的故事在二○○六年一月画下句点。开始同志生活三年来，廖沙和一个男人有过性关系，爱过两个男人，并且探索了自己所能得到的每一个选项：衣柜和阴沟。或者，至少这些是他的同志身体与同志性情所能得到的选项。他的同志心灵还是能够翱翔。他决定自己也要在学院里当个同志。

隔年，廖沙为自己的大四毕业论文进行答辩，论文题目为〈性少数做为政治问题〉。让系上批准这个题目很难，但他设法办到了，然后前往莫斯科进行研究。在所有人仍用旧名「列宁图书馆」称呼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里，设有国内所有曾经合法发行的期刊资料库中，廖沙看到了一九九○年代早期的男同志和女同志刊物。结果证明，原来在俄罗斯曾经有人写过同志权利、同志运动、立法及政治纲领的相关文章。这些人听来比廖沙如今认识的任何人更加自由开放与见多识广。他们似乎栖息于一个廖沙几乎无法想像的公共空间里，与信赖他们自身重要性的努力紧密相连—这对于一位名叫叶甫根妮娅．德布里安斯卡亚的女性来说尤其属实，这位女同志运动者如此直言不讳，以至于廖沙还在读小学一年级时，全国似乎都听过她的大名。她如今是一位企业家，和另外几位过去的运动者一样；其他人则远走国外，还有一对伴侣死去。

「当代俄国社会基于性取向进行社会区分的威胁，与种族主义、仇外思想及国族主义散播的威胁同样显着。」廖沙在论文导论写道。他提

到，对性少数的接纳尽管在一九九○年代有过增长，这时却日益衰退——这与其说是能以实证支持，倒不如说是他的直觉，因此他可能省略了一个註脚。註336他指出二○○三年提案的一项立法——两位国会议员要求禁止「同性恋宣传」。註337这项法案未被通过，但廖沙论证，它正意味着反同思维的反扑。这篇论文可能会让廖沙的教授们感到有些危言耸听，或许还很唯我论——似乎很难看出人们会对他们几乎不相信存在着的事物有什么反扑——但它却是教授们读过最渊博也最严谨论证的论文之一。註338做为一名出色的学术研究者，廖沙获得了留在系上读研究所的机会。

但有个条件：廖沙必须扩充自己的主题。比方说，他可以将其他少数群体一併纳入研究范围。他不得不同意，因为全班同学都在烦恼毕业后的出路，前一年的毕业生找到了政治技术专家的工作，但随着公共政治萎缩，需求也急遽下降。尽管如此，在研究所第一年，廖沙还是提出了以下的研究题目：「政治论述中的性少数」。

「我很喜欢这个题目，」他的指导教授说。「但你必须理解，我们的学术委员会非常保守，有些成员是虔诚的教徒，恐怕他们不会允许你论述这个题目。」他们平起平坐地对话，因为他现在也是学术社群的一员。他们最终将题目定为「公共政治中的少数论述」。廖沙要探讨性少数与少数族裔，以及在政治中身为少数群体的女性。

廖沙开始教课，协助一位年岁略长的朋友教授全校唯一一堂性别理论讨论课。他也开始进行学术发表：系上的年鑑收录了他探讨女性身为政治少数的报告。他的研究令人振奋。他发现了「酷儿」这个词，写了篇报告探讨这个概念的演进，同时认定这个词也适用来描述自己。

二○○九年秋天，廖沙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提交初审。结果指导教授建议的扩充主题，产生了几乎绝非她本意的颠覆作用：廖沙将这些不同的少数群体论述得彷彿彼此平等一般。他确实指出了俄国的同性恋者仅被给予最低限度的法律权利——不被当成罪犯的权利——至今尚未达到与多数人一样的完全平等。尽管如此，他叙述同性恋群体的方式一如叙述女性及少数族裔。他的论文强调这样的假定：他所描述的是一个各种不同群体不可阻挡的合法化与机制化过程，所有这些群体终将实现自身潜力，不仅成为政治客体，也成为政治主体。註339

廖沙讲述了二十分钟，然后面对十二位审查委员史无前例的一小时半诘问。

「你有没有意识到，同性恋在我国是禁忌话题？」一位委员问。

「但它存在。」廖沙回应。

这是唯一一个与廖沙的实际题目相关的问题。只有一位审查委员对引用资料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廖沙觉得他是个对性向保密的男同志。其

他的问题全都是焦虑的自由联想式提问。审查委员们听起来对廖沙很生气，气到他们不能或不愿让自己跟他的着作扯上关系。他们的评语表现出他们认为这样的研究不该存在。

「我刚去圣彼得堡参加一场会议，与会学者说，性别问题不復存在。」其中一人说。

「到底『少数群体』指的是什么？」另一人问。

廖沙满头大汗，用尽各种他所能想到的技巧，不让自己怒形于色。

几星期后，他听说那位在答辩过程中给了他帮助的教授，被人看见在他自己的讨论课上挥舞着廖沙的论文摘要小册子，愤怒地咆哮：「这是意识型态宣传！这是鸡姦文宣！」再过几星期，廖沙听说委员会允许他参与口试时，几乎惊呆了。

根据各种说法，这次口试十分精彩。口试委员无异议通过授予学位。

廖沙的学术成就立刻转换成行政权力。他接手了以前曾经帮忙带过讨论的那堂全校唯一的性别研究课，将它重新设计，纳入了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部分。先前避忌他的老一辈教师们如今很客气，小题大作地欢迎他加入。他感觉到这些人在背后用恶毒的话指摘他，但他选择将这种行为理解成他们对他新近获得的权威感到无能为力的一种癥状。

*

那是在彼尔姆成为一位年轻学者的大好时光，理由则源自莫斯科。二○○八年，普丁将总统大位移交给季米特里．梅德维杰夫（Dmitry Medvedev）。普丁已经依循俄罗斯宪法的容许范围连任了两届总统，在这种局面下，他做了全世界威权统治者都会做的同一件事：让出职位而不让出权力。普丁成为总理，长期追随他的班底梅德维杰夫则成了国家名义上的总统。权力中心转移到如今由普丁掌管的内阁。一夜之间，总统办公厅成了仪式性的存在，梅德维杰夫只有少数班底，实际上也无法行使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但梅德维杰夫的办公厅仍让他有义务持续公开现身。「对弗拉基米尔．普丁和季米特里．梅德维杰夫来说，俄罗斯公民不是选民，而是听众。」俄国记者马克西姆．特鲁多留伯夫（Maxim Trudolyubov）在二○○九年写道：「普丁先生与梅德维杰夫先生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们各自应付不同的听众。」普丁向多数大众演奏：中年或年纪更大的人、中产或更贫穷的人、电视频道的广大阅听人。梅德维杰夫则向普丁两届总统任内泰半忽视的教育程度较高、生活较富裕的少数人演说。註340这群如飢似渴想要得到关注的阅听人，则从审慎到狂喜不等的热情，回应梅德维杰夫的示好。他们很快就把这个新

时代称为「解冻」。

这个词通常是指一个更早之前的年代，一九五○年代末到一九六○年代初的苏联──从尼基塔．赫鲁雪夫谴责史达林个人崇拜的演说，到苏共党内政变推翻赫鲁雪夫为止。那是最早的气窗开启之时：某些先前被查禁的着作得以出版，小规模的公开讨论及更小规模的自我组织得到容许。「解冻」一词如今流露出的是低限度的期望。最初的解冻并没有带来根本的改变──它只不过是让体制多少显得不那么残忍。接续而来的则是布里兹涅夫的封冻，它并未回归史达林主义的恐怖，但它终结了任何民间倡议，更重要的是终结了对改变的任何期望。「解冻」一词反映出人们相信普丁的一党统治体制，以及不断缩小的公民社会、媒体及抗争空间是根深柢固的。这使得新解冻所呈现的不管是怎样的短期契机，都变得更加宝贵。

彼尔姆恰好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契机。这个城市做为石油生产地区的首府，在二○○○年代的经济起飞时期财富呈指数增长。它也拥有一位怀抱西方式志向的州长。由普丁任命的奥列格．丘库诺夫（Oleg Chirkunov）出身国安会，经由零售业而投入政界。他曾在瑞士工作，即使在他成为公职人员之后，他的家人仍然定居瑞士。註341他是梅德维杰夫的听众群最典型的代表：有钱、倾向西方，具备欧洲所理解的艺术及文化品味。普丁在第一届总统任内实施的联邦制度改革，不仅剥夺了俄罗斯联邦各组成地区的大半政治独立性，也剥夺了它们的财源。彼尔姆之类富含资源的地区，如今要向莫斯科缴交愈来愈多的税收。如此一来，生活水准也就远远落后于地区经济成长。成为政治人物的加里．卡斯帕洛夫第一次来到这里巡迴演讲，就以中央榨干地方这个问题，做为他想传递的最主要讯息。但丘库诺夫无意想方设法对抗普丁，他寻求的是无须对抗莫斯科，就能提升彼尔姆的生活水准，同时另闢收入来源。当石油价格在二○○七年暴跌，他对解决方案的追寻也就更加急迫。他决定要以文化做为彼尔姆的出路。註342

丘库诺夫推行文化计画的合伙人，是两位来自莫斯科的有钱艺术爱好者。其一是谢尔盖．戈尔捷耶夫（Sergei Gordeev），他在莫斯科的房地产市场获利至少十亿。他热爱的是当代建筑，他慷慨出资保存莫斯科的构成主义地标。丘库诺夫任命戈尔捷耶夫为代表彼尔姆的两名参议员之一。普丁的新体制将各地区的所有高阶官员由民选改为官派，这样的人事调动因而可行。丘库诺夫能给予戈尔捷耶夫权力（至少是象徵性的）及影响力，以换取他投资彼尔姆的计画。戈尔捷耶夫从来不曾在彼尔姆居住过，甚至对这里所知不多：他造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直待在旅馆里。在他参议员任期的第四年，有一天夜里，他花了四个小时在城里到处乱走，因为他分不清东西南北，也没法拦计程车，他的皮夹里只带

了五张欧元百元钞。註343尽管如此，他仍尽责地推广彼尔姆，也出席在这座城市举办的高规格活动。

马拉特．盖尔曼（Marat Guelman）是另一位来到彼尔姆的莫斯科人，他从艺术品经销商转行成为政治技术专家。一九九九至二○○○年间，他对于打造普丁的公众形象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后也一直都是局内人。但随着选举政治濒临灭绝，政治技术专家不再被需要。俄国艺术品市场也在二○○七至二○○八年的金融危机中瓦解。生活费与房产价格低廉、体制也较为友善的彼尔姆，提供了盖尔曼一个完美的解冻式文化–政治–经济三合一契机。这三人投注了他们个人和整个地区的影响力及金钱，期望能让影响力及金钱效果加乘。他们毫无讽刺意味地将自己的作为推销成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们公开宣示的目标，是要让彼尔姆获选为欧洲文化之都——这是由欧盟授予的头衔，但非欧盟城市也可以争取。这个头衔能为城市带来观光人潮，并为推动者带来声望。

戈尔捷耶夫投资，盖尔曼策展。一座当代艺术馆在一处匆促翻修的旧内河码头开幕。然后是一座实验剧场，以及一所重新活化的歌剧院。这一切的中心则是一场夏日节庆，一整个月的展览、表演，以及内容远远超出艺术范围、深入媒体与经济的小组讨论。几乎每一夜，开着闪灯的警车都护送着从莫斯科搭乘包机前来的数十位名流，自彼尔姆机场搭乘巴士抵达新近翻修的旅馆。这个节庆名为「白昼之夜」，研究彼尔姆二十年之久的美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罗杰斯（Douglas Rogers）写道，它「有意办得盛大」。

彼尔姆白昼之夜的中心，是一处以围篱圈出的节庆村，就建立在彼尔姆大广场上的地区行政大楼前方。节庆村的大小仅仅略大于三公顷，包含一大两小的户外舞台，供音乐会及其他表演之用；许多条设有小卖店及展示的小路；两家餐厅和两家咖啡馆；一个节庆俱乐部，排定举行将近五十场讨论及演讲。为因应夏日必然产生的泥泞，修筑了木板路形式的人行道，在不同地点之间输送人潮；它们几乎每天夜晚都会重新刷白。人行道沿途架设的小帐篷，为民俗艺人及其他文化生产者提供展演及贩售器物的空间，人行道之间的草地则举行小规模的表演及展览，从小丑到铁匠不一而足。到处都有小型展览或表演涌现——其中许多都在节庆村一端的两座巨塔里。让许多观者最感震惊的是，甚至还有个「节庆海滩」：一座广大的圆形池，每次可供数十位儿童戏水，兴建于一处足以容纳数百名日光浴客的高台上。淋浴间及更衣室位于下方的沙地。註344

彷佛整座城市不曾移动位置，就从它怪异的日常身分——不向外界开

放的前军工城市，转移成了某种想像中的闪耀欧洲。做为交换，欧洲总有一天也会让彼尔姆获得应有的名声—文化之都，千真万确。这份狂乱的抱负很有感染力，尤其因为丘库诺夫和他的人马明确表示，他们的眼界远远超出艺术之外：州长承诺要打造一套新的「知识经济，我们在此不用双手，而是用头脑创造。」註345

大学也为自己开展出了一套身为欧洲学术机构的愿景。廖沙知道他在其中适应良好。他自己的愿景是很快就能主持俄罗斯唯一一项LGBT研究计画。目前，他和一直以来讲授唯一一堂性别研究课的友人达莉娅，共同开办了一所性别研究中心。达莉娅的父亲是大学另一个科系的系主任，这层关系很有帮助。达莉娅和廖沙经由举办会议、发行会议论文集取得一些资金。他们的出版品在大学里不具正式地位，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无须面对学术审查委员会。

廖沙很幸运。他听说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有一位法律学者讨论LGBT权利的博士论文不被准许口试。註346二○一○年，廖沙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场会议上报告。他的会议论文题目是〈政治学的性别隔阂〉。只有一个人向他发问，那是一位来自圣彼得堡的教授。

「你知不知道，」她问：「俄罗斯没有女同性恋者？」

「我也听说，」廖沙说：「苏联时代没有性行为。但你就在这里。」

会议论文集出版成书，他的论文被排除在外。

*

人们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不讲这些事—不讲廖沙对那位圣彼得堡教授说的话，也不讲他在报告里讨论的事。这里的社会科学听来大不相同。

回到一九九○年代早期，莫斯科国立大学首创社会学系之初，创办者们所联繫的西方学界同侪，与自由派的学术主流大相迳庭。他们找到的其中一人是亚伦．卡尔森（Allan Carlson），这位美国歷史学者任教于密西根州极端保守的希尔斯岱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卡尔森是一九二二年被送上哲学家之船放逐海外的其中一位俄国思想家皮特林．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信徒。索罗金随后在哈佛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他一生的大量着述包含了对西方文明堕入衰颓的末世预警，卡尔森自己的思想正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卡尔森写过六本专书，每一本的书名都有「家庭」一词，内容也都在论证家庭是文明的基础，是人类持久存续的唯一关键所在。註347

卡尔森在一九九五年访问莫斯科国立大学，当时主导着社会科学（以及大部分媒体版面）的课题，是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国家人口已经

持续减少了五十年。人们生下的子女人数更少，寿命也更短。男性预期寿命在欧洲排名垫底——一九九○年代初期是六十五到六十六岁—而且这个水准会持续十五年不变。註348这意味着生活在一九九○年代至二○○○年代的多数俄罗斯成年男性，都活不过六十五岁。

美国经济学者尼古拉斯．艾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对俄国人口问题着述广博。他探讨俄国人口危机的专书，其中一章题为「俄国死亡率与疾病率的不祥模式：开闢新而现代的疾病与早逝途径」。他揭示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死亡率像俄国这样高。艾伯施塔特写道，按照二○○六年的数据，俄罗斯男性在十五岁时的预期寿命，还比不上衣索匹亚、甘比亚和索马利亚。俄罗斯人不成比例地被杀害，因素看来有两个：心血管系统疾病，以及诸如伤害、中毒等外缘因素，也包括自杀在内。

艾伯施塔特仔细检视了所有常见的可疑因素：营养不良、吸菸、缺乏运动、环境污染、经济震盪及其所带来的贫困，当然，还有伏特加。但这些因素全都不足以充分解释这个问题，就连它们全部加总起来，顶多只能解释一半。俄罗斯人的饮食确实富含脂肪—但富含脂肪的程度仍不及西欧人。此外，俄罗斯人似乎也更少暴食。没错，俄罗斯人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但死于呣吸道疾病的人数只略多于西欧—死于人们预期中由污染直接造成的肾脏疾病人数则更少。俄罗斯人经歷过严重的经济动盪，但没有迹象显示现代社会的经济震盪会迅速导致、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率升高—比方说，经济大萧条时代就没有这种现象。健康保险服务骤减也不足以解释，俄国的健保支出大致相当于较不富裕的西欧国家。俄罗斯人抽很多菸，但不如希腊人和西班牙人那样多，而他们的平均寿命则与其他西欧国家相当。俄罗斯人也喝很多酒，但不如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那样多，而这些国家人民的预期寿命在脱离苏联集团之后不久就开始提升。註349伏特加及其他酒类对心血管疾病，以及死于暴力及意外的高比率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还没大到能够解释俄国的人口窘境。事实上，虽然伏特加是最流行的解释，却同时也是最矛盾的。有些研究实际上显示，饮用伏特加的俄罗斯人活得比不喝伏特加的人更久。註350

美国人类学家蜜雪儿．帕森斯（Michelle Parsons）是另一位研究俄国人口的学者，她为这个显而易见的伏特加悖论提出一个解释：姑且不论好坏，酒精或许能帮助人们适应令他们羞愧得无地自容的现实。帕森斯将自己的专书命名为《不被需要而死去》（Dying Unneeded），她论证俄罗斯人之所以早死，是因为缺乏做为生存目标的人事物。艾伯施塔特最后也得出结论，认为原因与心理卫生有关。他运用长期统计数据演示，俄罗斯人这时所谓的「人口危机」其实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出生率和预期寿命在大半个二十世纪后半叶都在下降。只有两段时期成了这一趋势的显着例外—赫鲁雪夫的解冻和戈巴契夫的重建，俄罗斯人在这两段短暂的时间里期待过更美好的未来。看来在其他时候，俄罗斯人是因为缺乏希望而凋零的。

亚伦．卡尔森则提出完全不同的解释：俄罗斯人日渐消亡，是因为他所谓的「自然家庭」正在衰落。他在访问莫斯科国立大学期间，与社会学系的教师们决定举办一场会议，讨论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好对抗颓废的西方对家庭制度的攻击。这场会议命名为「世界家庭大会」（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一九九七年在布拉格集会时共有近七千人出席。西方各国与会者以那些阻止同性恋权益有所进展的保守宗教组织代表为主。东欧与会者则来自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很小，而这些国家全都在奋力抗拒文化及经济变迁；他们全都受到生存恐慌驱动—俄罗斯人也一样。

会议组织者们受到出席人数鼓舞，决定将世界家庭大会转型成常设组织，致力于对抗同性恋权利、堕胎权及性别研究。新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伊利诺州，但精神中心则在俄国，就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註351往后十年间，起初是卡尔森门徒的这些俄国人成了组织的资深成员，在政府与俄罗斯正教会支持之下，他们得以施展政治力量。

普丁在二○○六年国情咨文演说中，将人口减少说成是国家最急迫的问题。「我现在要对最重要的事务发言，」他说：「最重要的事务是什么？国防部的弟兄们都知道是什么。」在普丁的大男人幽默语汇里，这句话应当是要示意，他接下来要谈的是军人—真男人—随时都在思考的事：

是的，我确实是要谈论爱，谈论妇女和儿童。谈论家庭。还有当代俄罗斯最严重的问题：人口。……你们知道，我国人口平均每年要减少七十万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却还没有采取任何实质作为。註352

普丁提出了一项财政解决方案：将更多资金投入全国健康计画（也就是玛莎正在促成八到九成回扣拿得到手的那项计画），将更多资金投入分娩中心，以及最重要的，提供母亲更多金钱补助。他开始向任何生下第二胎的女性（俄国妇女当时平均生下一点三名子女註353）相当于八千多美元的一次性补助。这笔日后被人们称为「母亲资本」的款项，至今仍是俄国国家对待自身公民一次无与伦比的慷慨之举，足以展现总统本人对其臣民生殖意愿的高度重视。

二○○○年代，世界家庭大会註354设置了他们所谓的大使职位——活动于包括联合国在内，各式各样国际组织及欧洲组织的说客。这些工作由俄国人担当，他们运用俄国代表团背后奥援的重量，组织非正式同盟推动反同性恋倡议，并反对推进LGBT权益的措施。註355在美国，南方贫困者法律扶助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则将世界家庭大会列为仇恨团体。註356

*

回到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持续接收一套极端的保守主义话语——此外别无其他。「身为这个系的毕业生，我可以依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学生在那儿接受的教育内容，绝对经不起学术与实务的检视。」一位一九九六年的毕业生，在二○○七年的访谈中这么说。这位毕业生名叫亚歷山大．毕克博夫（Alexandre Bikbov），他採取了苏联时代莫斯科国立大学学生想要学习知识时的同一套做法——他设法自学——如同一、两个世代之前的古德科夫和阿鲁图尼扬。「那时还有可能去图书馆或校内其他系所，弥补社会学系系统性制造的知识匮乏。」毕克博夫谈起一九九○年代。「然后，在决定性的大考时刻，要是我可以展现出自己对题目瞭若指掌，我总能指望自己不受反驳。」但毕克博夫说，到了二○○○年代，情况日益恶化。「如今，那儿的考试受到公然反智的审查。当学生表现出自己『知道得太多』，就会得到更低的成绩、受到更严厉的惩处威胁。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研讨会上，某些教师叫学生不要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东西，或以最侮辱人的姿态毫无例外地阻断一切讨论。」註357

毕克博夫不屈不挠地研究莫斯科国立大学不让他学习的社会学。他自学法文，将布迪厄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这部现代社会学经典之作译成俄文。他开始在国际上发表着作。他当上了教授——当然不是在容不下他这种人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而是在俄罗斯人文大学（Russian Humanities University）哲学系，这个教学机构的规模和歷史都远远不及莫斯科国立大学，它没有自己的社会学系。他在这儿发起了自己的常设研讨会，如同列瓦达在一九六○、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的研讨会那样，用以协助青年社会学者获取无法从官方管道得到的知识。数十位学生在录取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个系按照毕克博夫的说法，是「一个怀有极端主义情结的商业组织」，他们都来到毕克博夫的研讨会学习。

二○○六年，毕克博夫组织了一场会议探讨监狱社会学。两位着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前来发表，还有毕克博夫研讨会的参与者，以及在一九八○年代成立、叙述古拉格劳改营故事的「纪念」（Memorial）组织担任志工的几位青年。题材、学者、学生与运动者共处一室，擦碰出一发不

可收拾的火花。学生们决心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系要求改革。註358

二○○七年的一学期之内，学生们发动一连串抗议。「本系的教育是谎言！」他们的第一张传单宣告。传单宣称，系上教师被禁止从事原创研究；他们反倒只能使用系主任弗拉基米尔．多布连科夫（Vladimir Dobrenkov）撰写的多卷本教科书，做为一切教学内容的基础。

课表上充满荒谬的必修课，包括宗教教育！

系外研究者及教师不得进入社会学系。系办尽其一切所能，阻止学生获取实务知识及选修有趣的课程！

系办隐匿任何外国学者（在莫斯科）举行的演讲资讯，禁止学生与外国院校交流。

传单列举了系上最近发生的某些事件，其中包括：

全体学生都必须阅读系主任办公室发送的手册，题目为「俄罗斯土地为何遭受清洗」（Why Are Russian Lands Being Cleansed），内容指控共济会成员「发动世界大战，首先制造原子弹」，并宣称「锡安主义说客……决定了美国与英国外交政策，将世界金融体系握在手中，包括美元印行，实质控制了一切最重要的大众媒体及传播手段。」俄国被称为「正义之国」，美国则是「禽兽之国」，《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被认真引述成了可靠的史料。註359

抗争持续了一整个春天，成了普丁实施「预防性反革命」以来，俄国第一场具有高度公共性的持久抗争。全国最高学府如此发声行动，迫使总统办公室做出回应，指派委员会调查社会学系并提交报告。一群专家得出结论，认为该系教学水准低于大学水平，多布连科夫的教科书内容则充满抄袭。註360

另一方立即反扑。一个名为正教公民联盟（Union of Orthodox Citizens）、领导人包含几位着名政治人物的团体，註361发表声明捍卫社会学系：「无庸置疑，在俄罗斯最重要的大学里应外合地挑起『橘色革命』的努力，为激进青年及其所招募的学生提供了行动的后盾。」他们写道。实际上，社会学系将要成为一处「青年『maidan』的训练基地」──maidan是乌克兰语的「广场」，但在此专指基辅的独立广场，也就是橘色革命的地理中心。然后这个广场就会扩散到其他高等院校。这份

宣言又说，学生造反连同异议者游行，以及「鸡姦者游行」，「极有可能在秋天来临时将红场变色，令它成为扩及全俄的彩虹『广场』。」註362

这份宣言完全应验了廖沙在论文里提过的那个看似不太可能的断言：俄国社会正沿着性别认同界线而分裂。同志解放的幽灵显现成了妖魔鬼怪，一如共济会成员、犹太復国主义者和美国金融家。

二○○七年秋天，系方发动镇压。六位领导抗争的学生遭开除。註363 隔年六月，社会学系主办一场国际会议，名为「社会规范与社会发展可能性」。系主任多布连科夫在开幕致词时对同性恋的威胁发出警告：

德行与道德的问题必须成为今日最重要的课题。没有德行与道德，俄罗斯就没有未来……有鑑于此，我们怎能讨论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权利？举办同志游行、在学校引进性教育的所有这些企图—这一切全都是为了玷污我们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明确而坚决地向它们说「不」！不然我们就会失去俄罗斯。註364

「所有这些企图」其实指涉的是一项努力，莫斯科的一位年轻律师提出在莫斯科举行同志骄傲游行的申请，藉此迫使大众对LGBT权利展开对话。申请被否决，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二○○七年五月前来参加莫斯科同志游行的少数人则先被殴打、再被逮捕，连一名前来声援的欧洲议会义大利籍议员也遭到拘留。註365

这次会议的明星是美国人保罗．卡麦隆（Paul Cameron），他吆吁俄国从美国的错误中记取教训。「正是同性恋者带来了人口灾难！」他说：

他们对社会造成了巨大而不可估量的伤害。根据我们的数据，伊利诺州监狱的囚犯有三分之一是性掠食者或他们的受害者。其中百分之二十到四十是同性恋者或其受害者……根据官方数据，伊利诺州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居民与儿童发生过性关系，主要是同性恋癖好的后果。这种罪行百分之二十发生在收养家庭中。

卡麦隆引述伊利诺州的情况，因为他就住在伊利诺州，他同时指出，当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巴拉克．欧巴马（Barack　Obama）也是伊利诺州人。

俄国有着绝佳机会，能够避免西方国家由于接纳同性恋在道德上遭受不幸命运，并选择自己的传统与道德价值。我要问各位：你们难道要像我们这一路走来那样愚蠢吗？註366

卡麦隆在莫斯科以美国着名学者的身分受到引介，但他在一九八三年被美国心理学会开除，一九八六年又被美国社会学会开除。后者提出的理由如下：「保罗．卡麦隆博士一贯坚持曲解及不实表述关于性倾向、同性恋及女同性恋的社会学研究。」註367

二○○八年九月，社会学系开启了一项新的研究计画，由编制内教师的一位新成员领导：亚歷山大．杜金将要主持保守主义研究中心。杜金在中心成立仪式上说明它不属于什么：「这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团体，也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团体。」他解释，苏联思想及其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俄罗斯都失败了。「但俄罗斯至今还没有一个欧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知识或学术中心。即使事实上人民和政府的感受都是保守的。」如今，全国最重要的大学将要担负起打造思想概念、以符合这些情感的任务：

保守主义研究中心的目标，是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型态的研发中心……我们也需要培训一群胸怀保守思想的学术及政治菁英，没有理由隐瞒这个事实。他们必须成为保守主义理论家。我们必须安插人马掌握权力，并取得学院中的权威地位。註368

这位大学中辍生费尽辛苦，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他很久以前就得到了公众名声与显着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也想要学术资格。二○○○年十二月，他在俄国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所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他的第二个博士（俄国人传统上会先取得一种初级博士学位，然后再取得高级博士学位）则是于二○○四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另一所大学通过答辩。德国政治学家安德里亚斯．乌姆兰（Andreas Umland）在二○○七年指出：

在理解杜金现象上，杜金热切想要成为一个被完全接受的学界成员这点尤其发人深省。它同时表明了他对自我的理解，以及长期来说他在俄国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杜金能否取得进入象牙塔的地位、能否将他的传单转换成教科书，并被学术社群接受，都是评价杜金自我理解的行动方案时最重要的问题。註369

乌姆兰提出这个问题不到一年后，杜金获得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任用。他开的课如今成了系上学生的必修课。这个安排令各方皆蒙其利──系主任多布连科夫引进了杜金所积累的政治力量，今后谁也动不了他，不论官方委员会对他的抄袭及系上教育品质的低落会做出何种结论。另一方面，杜金在知识上取得了正当性，也获得了他寻觅已久的讲坛。

*

相较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实际上是相较于俄国任何其他大学来说，廖沙在彼尔姆的地位恐怕太过得天独厚，因而难以为继。现实主义者会说，彼尔姆国立大学政治学系这样的一小片绿洲，如同俄罗斯的一切差异那样将会遭到蹂躏，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但乐观主义者则说，俄罗斯的未来正是从外省大学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型实验空间里创造出来的。廖沙一直没有放弃乐观主义，直到他去了一趟乌克兰。

二○一一年，他赢得一次论文竞赛，得以参加一场以三年为期、为后共产国家的教师们举办的研讨会。他参与的组别是「性别、性向与权力」。这些研讨会由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资助，而这个基金会在俄罗斯已经停止运作；但这是区域性计画，会议将在乌克兰举行。他们在乌克兰西部的边陲小城乌日哥罗德（Uzhgorod）进行第一次集会，而廖沙第一次觉得自己置身于同类之中。他再也不是学者中的酷儿或酷儿中的学者，他置身于一群思考和谈论的事物与自己相同、某些感受也与自己相同的人们之中。唯有在这一点顿悟上，他才是孤独的──其他与会的英国人、美国人和乌克兰人，都和自己的同类一起生活和工作。他得知乌克兰有三十七个合法登记的LGBT团体。这个数目令他难以想像。他一直以为乌克兰是俄罗斯单纯的外省表亲，但这个国家的几所大学里都有性别研究和酷儿研究理论家。他们也不是廖沙这样的革命性探索者，他们有自己的师承。廖沙有达莉娅，她只大了他几岁──她是同侪，是充分支持他的朋友，令他偶尔忘记了她是系主任的女儿，而且是异性恋者。但接着他想起来了，这里的人们师承于一九九○年代在西方国家学习的人们。廖沙的感受与将近二十年前的阿鲁图尼扬并没有两样，那时她在国外参与培训课程，并承受了「自恋冲击」。他和她一样，看见人们站在前辈肩膀上，前辈又站在前辈肩膀上，前辈的前辈站在巨人肩膀上──而廖沙孑然一身。

他带着困扰和启发回到彼尔姆：他觉得自己如今对研究工作的样貌有了愿景。「很高兴你参加了那些研讨会，」系主任对他说：「那对你来说就像是避静。但你回来之后，可要记得自己身在何处。」她以这种

方式提出这个话题：廖沙必须重新决定研究主题，否则二○一二年的系上年鑑不会收录他的论文。

「这里没有未来。」廖沙对自己说。他不确定这意味着自己此时得做些什么，但他知道这句话是真的。

*

廖沙在乌克兰的见闻与他的预期相反，他看到了不同的文化。没错，他的乌克兰同事们说俄语，他们的第一语言多半是俄语，但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指涉不同，政治期望更与他大不相同。橘色革命并未带来革命者们要求的改变—实际上，一度落选的亲莫斯科候选人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在二○一○年终于当选总统—尽管如此，乌克兰还是脱离了苏联。

向西更远处，波罗的海三国都在二○○四年加入了北约组织和欧盟。包括乌克兰和乔治亚在内的另外几个后苏联国家，也正在与这些国际组织谈判，期望升格为正式成员。俄罗斯却背道而驰。普丁在二○○五年四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强调，俄罗斯必须「首先承认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我们有数千万同胞最终遗落在我国边界之外」。演说的其他内容是耳熟能详的大杂烩—包括明确肯定俄国是欧洲国家，重视人权及公民社会—但大表悔恨的陈述为整篇演说，乃至普丁的政治事业定了调。註370为了减轻冲击，克里姆林宫的英文翻译将这句话翻成「本世纪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註371但再过两年，这一层伪装也被抛开了。二○○七年二月，普丁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国际安全会议上演说时表示：

会议安排让我得以免除繁文缛节，无须用圆滑、悦耳和空洞的外交辞令说话。会议安排让我得以表述我对于国际安全议题的真正想法。註372

包含德国总理安琪拉．梅克尔（Angela Merkel）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盖茨（Robert Gates）在内的与会者们，全都大感意外。看来没人事先预期到会发生争论。註373普丁指责北约组织接纳新会员国的行动：

我认为事情很明显：北约的扩张过程完全无关于联盟本身的现代化，或提升欧洲的安全层次。恰好相反：这是降低互信层次的严重煽动性因素。我们有正当理由公开质问：北约扩张针对的是谁？华沙公约解体之后，西方伙伴提供的保证怎么了？那些宣言又怎么了？现在甚至没

人记得。但容我斗胆提醒各位，当时说了些什么话。我要引述一九九○年五月十七日，北约祕书长曼佛雷德．沃纳（Manfred Wöhner）在布鲁塞尔的演说。他当时这么说：「正是我们不准备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界之外部署北约部队，为苏联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这些保障都到哪里去了？註374

这段话确实出自北约祕书长沃纳的演说，但它几乎无法等同于普丁此时宣称被毁弃的承诺。首先，沃纳很小心地使用了含煳的条件语句：他说的是北约「不准备」扩张━而非绝不扩张。更重要的是，他看似在提供的有条件保障，适用对象是苏联这个一年半之后就不復存在的国家。俄罗斯与德国之间如今被一道双重地带隔开：第一圈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及波罗的海三国，第二圈则是前华沙公约国家━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及其他。其中大多数国家这些年来都曾经明确要求，有时甚至乞求、恳求北约提供保护。

约莫与普丁的慕尼黑演说同一时间解密的美国档案文件，则为沃纳的陈述补足了脉络。它是在一九九○年二月到七月之间，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多方会谈期间提出的。苏联当时想要看到德国成为中立国━既不属于北约，也不属于华沙公约；北约和柏林围墙倒塌后选出的德国新政府，则想让德国成为北约的正式会员国。最终达成协议时，德国成为（或者有些人会说，仍是）北约会员国，但北约不在前东德境内驻军。沃纳的陈述一如发表陈述的协商过程，与北约扩张进入前华沙公约国家的问题完全无关，因为参与协商的各方当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华沙公约会继续存在（它在一年半之后的一九九一年三月解体）。註375在德国统一会谈期间，普丁是派驻东德的国安会官员，很可能对相关的约定瞭若指掌，但在他的回忆里，这些协商却成了「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开端━也是西方背弃俄国故事的一部分。慕尼黑演说传达的讯息是，俄国不再愿意接受后苏联、后华沙公约的状态。

*

就在慕尼黑演说之后数週，这种新倾向的意义变得昭然若揭。爱沙尼亚政府在无意间提供了机会。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爱沙尼亚政府将首都塔林市中心的青铜战士像（the Bronze Soldier）迁移到市郊的军人公墓。这座青铜战士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苏联当局建造的，树立于东欧各国首都，是纪念苏联在这些国家战胜的数十座此类纪念碑之一。但在爱沙尼亚的歷史解读里，苏联所认为的解放其实是占领。爱沙尼亚在后苏联时代的法律及政策，皆由以下的前提出发：该国从一九四○到一九九一年间遭到非法占领。首先是苏联依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

密约加以占领，随后是纳粹德国，其后又是苏联。这个前提的其中一层意义，则是只有一九四○年之前的爱沙尼亚公民及其后裔，才能自动成为独立爱沙尼亚的公民；其他所有人—被推定的占领者及其后裔—都必须通过爱沙尼亚语及歷史考试才能成为公民。即使非公民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而获得与公民一视同仁的待遇，甚至在地方选举也有投票权，该国为数众多的俄语少数群体—大约占人口四分之一—仍然认为这项公民法具有歧视性。双方的歧见是根本上的。说俄语的人们不认为、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占领者，因此在他们看来，差别待遇显然是基于族群身分。俄国反对这项公民法，而在二○○五年普丁的「地缘政治灾难」演说向「我们在国外的同胞」发出啕唤之后，对爱沙尼亚公民法的批判大幅增强。塔林的青铜战士像逐渐成了激进团体的集会场所，包括那些要求拆除（并经常予以毁损）的团体，以及要求恢復苏联的团体。政府决定将青铜战士像迁离市中心。

塔林随即发生暴动。而在莫斯科，「我们」运动和青年近卫军，以及至少两个亲克里姆林宫的青年团体，开始围困爱沙尼亚大使馆，要求大使回国。警方不予干预，使馆被迫停止运作。一週之后，大使搭机返回塔林，官方理由是回国休假。各青年团体宣称胜利并解除包围。註376「围困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可能会成为违反外交法的一个经典范例，日后将与涉及外国使馆的其他非法事件记载一同列入教科书，包括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间德黑兰人质危机这样的严重事件。」一位爱沙尼亚国防分析师在那年稍晚写道。註377

除了暴动和围困大使馆之外，还发生了一种全新型态的攻击：网路攻击。为了瘫痪伺服器而发出的电子指令蜂拥而来—分散式阻断服务（DDoS）攻击—使得爱沙尼亚所有政府部门、两家银行和几个政党陷入停摆，阻断了所有信用卡交易，并且严重损害了国会运作。北约和欧盟委员会的调查员无法确切将这些网路攻击追溯到俄罗斯，註378但两年后，「我们」运动声称这次网路战是由他们发动的，该运动表示，配备电脑的大量志愿者实施了这场网路战。註379这些攻击重重打击爱沙尼亚特别自豪之处—该国可说是全世界电脑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并将它转变成致命伤，由此揭示了不论小国变得多么先进、何等密切地融入西方国际组织，仍有可能被大国不计其数的兵卒所践踏。

*

俄罗斯的下一场战争也涉及网路攻击，但这场战争的核心是传统的，甚至近乎老套。二○○八年八月八日，俄国入侵乔治亚。

自从二○○三年乔治亚爆发玫瑰革命，由热切亲西方的政府接管政权以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就持续升高。二○○六年，俄国禁止乔治亚矿泉水

及酒类进口，它们是这个小国十分可观的收入来源，同时开始对供应乔治亚的天然气进行限制。俄国也开始在边界聚集重兵。这些行动及其他行动的首要目的，是要持续煽动乔治亚境内两处意图分离的地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Abkhazia）歷时已久的冲突。两地都自称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独立共和国。两地自一九九○年代早期以来，也都以一种不战不和、既非独立亦非统一的状态存在。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初期衰弱而举步维艰的中央政府，使得这种僵持状态相对容易持续。但乔治亚的新政府软硬兼施，试图将这两个共和国重新纳入掌控；俄国则以加倍援助这两个地区，并且加强与乔治亚政府敌对的行动还以颜色。一个显而易见的目的是要破坏乔治亚加入北约的企图──二○○八年四月，乔治亚的申请遭到否决，至少有一个被提及的理由是冲突尚未解决。两週后，普丁（按照法律，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两週）签署命令，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建立政治及经济关系，这些关系的本质近似于莫斯科与俄罗斯境内各地区的关系。接着，歷经一整个夏天各式各样的小型冲突，全面战争终于爆发，地面上砲兵互相轰击，俄军则从空中展开轰炸。

开战十天后，法国和德国居中促成了停火协议，但俄国立即毁约。到了八月底战斗停止时，俄国实质控制了乔治亚的大片领土，并核发俄国护照给当地居民，即刻将他们转变成「同胞」。註380在文书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宣布独立，俄国予以承认，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太平洋小国诺鲁也予以承认。註381传达给乔治亚（及其他有意效法的后苏联国家）的讯息是：要是企图和北约结盟的话，就会丧失人命和领土，而且肯定会永久受困在北约门外不得加入。

向西方国家和俄国公民传达的，则是另一条不同讯息：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一如科索沃，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是因为它与邻国阿尔巴尼亚更为亲近。北约为了科索沃而出手干预，俄国因此得到了道德权利，为了协助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而出手干预。自一九九九年以来事实上处于保护国状态的科索沃，即将在二○○八年宣布独立。情况很明显，达成独立所必需的支持，联合国多数会员国很快就会承认它是国家。俄国认定科索沃独立是一种冒犯，正如它认定一九九九年北约的干预是一种侮辱──如今它得以报復了。就在科索沃宣布独立前几天，俄国官员召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领导人前来莫斯科会谈，俄国外交部长则发布声明：「科索沃宣布独立并获得承认，将促使俄罗斯调整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立场。」註382

就在俄国入侵乔治亚之后，杜金成立了他的保守主义研究中心。他在开幕演说中滔滔不绝地谈论这场战争：「我们进行了干预，而现在我们要说，我们的干预不只是例外而已，只要认为时机适当，我们还会继续採取干预行动。」註383进行干预的理由将会包括俄国认知的保护「国

外同胞」需求，抵抗单极世界的永恆需求，以及在俄国所认定的势力范围内维护俄国利益的必要。

倘若总统说，俄罗斯的友善区域代表着特权利益区域，意思就是说这个区域在俄罗斯掌控之下。有谁想要挑战的话，不只是在挑战那个特定国家，也是在挑战拥有核子武器的俄罗斯。

杜金自称在诠释及预测俄国的外交政策上，他的主张如今有了可信度。就在那年夏天，他才去过南奥塞梯，手持卡拉什尼可夫突击步枪，站在一辆战车前拍照。那年夏天也标志着他第一次亲眼看见自己的口号风行起来，完全进入主流，在电视上一再复诵，又在车辆保险桿贴纸上复制。这句口号是：「把战车开进提比里斯！註384」（Tank to Tbilisi!）杜金写过这些话：「不支持『把战车开进提比里斯』这句口号的人，就不是俄罗斯人……『把战车开进提比里斯』应该要写在每个俄罗斯人的额头上。」註385

这句口号和这场战争都奏效了：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普丁的民意支持度飙升到歷来最高的百分之八十八。梅德维杰夫也达到百分之八十三，同样前所未见。註386

註336：列瓦达中心的这项调查结果，与他的结论不符：Masha Plotko, “Strakh drugogo: Problema gomofobii v Rossii,” Levada Center, December 3, 2013, http://www.levada.ru/old/12-03-2013/strakh-drugogoproblema-gomofobii-v-rossii（二○一六年六月十日浏览）。

註337：Vita Lukashina and Yelena Rudneva, “Duma snimet s golubykh rozoviye ochki,” gazeta.ru, September 10, 2003, http://www.gazeta.ru/parliament/articles/52010.shtml（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浏览）。

註338：Alexei Gorshkov, “Transformatsiya otnosheniya k seksual’nym men’shinstvam kak politicheskaya problema sovremennogo rossiyskogo obshchestva,” senior thesis, Perm State University, 2007.

註339：Alexei Gorshkov, “Instituonalizatsiya men’shinstv v pole publichnoy politiki,” doctoral dissertation, Perm State University, 2009.

註340：Maxim Trudolyubov, “Who Runs Russia, Anywa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1/20/opinion/20ihtedtrudolyubov.html?_r=0（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浏览）。

註341：Douglas Rogers, The Depths of Russia: Oil, Power, and Culture After Socialism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89-290.

註342：前引书，p. 291。

註343：我那次恰好陪着戈尔捷耶夫走那段路。他邀请我去剧院看演出，接着再参加一场派对，但我们无法从剧院走到派对地点，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身上没有俄国货币，也不能让我这个女人付计程车费。

註344：Rogers, The Depths of Russia, pp. 309-310.

註345：前引书，p. 299。

註346：二○一○年九月十六日，克谢尼娅．基里琴科（Ksenia Kirichenko）在她的VK个人页面上发出这篇文章：「家事法博士论文：寻求建议与指导教授。情形如下：我在研究所写了一篇探讨家事法的博士论文，却被教授们拒绝指导。我现在在寻求口试答辩机会……我努力靠自己争取答辩机会，但我不愿包红包，而我发现包红包是我至今为止的唯一选择。」https://vk.com/topic-215303_23501181（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浏览）。

註347：例如Allan Carlson, The "American Way":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Wilmington, DE: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2003); Allan C. Carlson, Family Ques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Social Crisis (Piscataway Township, NJ: Transaction, 1989); Allan C. Carlson and Paul T. Mero, The Natural Family: A Manifesto (Dallas: Spence, 2007)。

註348：World Bank data,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countries/RU—XR?page=1&display=default（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浏览）。

註349：Nicholas Eberstadt, Russia's Peacetime Demographic Crisis: Dimensions, Causes, Implications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0).

註350：Michelle A. Parsons, Dying Unneeded: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Russian Mortality Crisi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35-138.

註351：作者访谈亚伦．卡尔森，二○一六年五月十六日于提比里斯。

註352："Poslaniye Federal'nomu Sobraniyu Rossiyskoy Federatsii," Rossiyskaya gazeta, November 5, 2006, https://rg.ru/2006/05/11/poslanie-dok.html（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浏览）。

註353：World Bank fertility rate data,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page=1（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浏览）。

註354：世界家庭大会在进行某些这类活动时，会使用一个合法的替身，它承认这个替身的组成与议程几乎完全一模一样。这个替身组织名为霍华德中心（Howard Center）。

註355：这些代表包括派往联合国的阿列克谢．柯莫夫（Alexei Komov），以及在欧洲机构活动的帕维尔．巴芬捷夫（Pavel Parfentiev）。参看"FamilyPolicy.ru CEO Pavel Parfentiev Appointed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Ambassador to the European Institutions," familypolicy.ru, March 2, 2013, http://en.familypolicy.ru/read/231（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浏览）。

註356：Cole Parke, "Natural Deception: Conned by the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 January 21, 2015, http://www.politicalresearch.org/2015/01/21/natural-deception-conned-by-the-world-congress-of-families/#sthash.DJXMcOU7.a9bkcdgH.dpbs（另刊于The Public Eye, Winter 2015，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浏览）。

註357：Anait Antonyan, "Sotsfak MGU: Kommercheskoye predpriyatiye s ekstremistskim kompleksom," polit.ru, March 16, 2007, http://www.polit.ru/article/2007/03/16/bikbov/（二○一六年六月十八日浏览）。

註358：作者访谈亚歷山大．毕克博夫，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巴黎。

註359："O situatsii na sotsiologicheskom fakul'tete MGU im. M. V. Lomonosova," flyer distributed February 28, 2007, archived at http://www.klubok.net/article2147.html（二○一六年六月十八日浏览）。

註360：V. V. Radaev, "Zaklyucheniye o prepodavatel'skom sostave i uchebnykh materialakh otdel'nykh kafedr fakul'teta sotsiologii MGU im. M. V. Lomonosova," polit.ru, July 18, 2007, http://www.polit.ru/article/2007/07/18/radaev2/（二○一六年七月一日浏览）。

註361：V. P. [Vladimir Pribylovsky], "Soyuz pravoslavnykh grazhdan (SPG)," Antikompromat,

undated, http://www.anticompromat.org/s_pg/spr_spg.html（二○一六年六月十九日浏览）。

註362：“Advokaty gey-parada boryatsya s pravoslavnymi ideyamii v stenakh MGU,” statement by Union of Orthodox Citizens, March 24, 2007, pravoslaviye.ru, http://www.pravoslavie.ru/21471.html（二○一六年六月十九日浏览）。

註363：访谈毕克博夫；作者访谈叶卡捷琳娜．塔诺夫斯卡娅（Ekaterina Tarnovskaya），二○一六年六月十日在莫斯科。

註364：“Vladimir Dobren'kov: 'Glavnoy zadachey vlasti dolzhno stat' vozrozhdeniye chelovecheskikh dush,'” Russkaya liniya, June 18, 2008, http://rusk.ru/newsdata.php?idar=177296（二○一六年六月十九日浏览）。

註365：“Arrests at Russian Gay Protests,” BBC News, May 27, 2007,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6695913.stm（二○一七年三月十六日浏览）。

註366：“Pol Kameron: 'Neuzheli vy khotite stat' takimi zhe gluptsami kak i my?'” Russyaka liniya, June 18, 2008, http://rusk.ru/newsdata.php?idar=177294（二○一六年六月十九日浏览）。

註367：“Paul Cameron Bio and Fact Sheet,” Dr. Gregory Herek's blo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website, http://psc.dss.ucdavis.edu/rainbow/html/facts_cameron_sheet.html（二○一六年六月十九日浏览）。

註368：“Rech Dugina na nulevom zasedanii TsKI,” Tsentr konservativnykh issledovaniy, September 16, 2008, http://konservatizm.org/speech/dugin/310109151801.xhtml（二○一六年六月十九日浏览）。

註369：Andreas Umland, “Post-Soviet 'Un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leksandr Dugin: A Case Study of the Extraparliamentary Radical Right in Contemporary Russ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7.

註370：“Poslaniye Federal'nomu sobraniyu Rossiyskoy Federatsii,” Kremlin website, April 25, 200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931（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371：“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Kremlin website, April 25, 2005,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931（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372：“Vystupleniye i discussiya na Myunkhenskoy konferentsii po voprosam politiki bezopasnosti,” Kremlin website, February 10, 2007,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373：Stephen J. Cimbala, “Nuclear Arms Control After a Time of Troubles,” in Mark Galeotti, ed.,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in Modern 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08.

註374：沃纳的发言，引自“The Atlantic Alliance and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address to Bremer Tanaks Collegium, Brussels, May 17, 1990, NATO website, http://nato.int/docu/speech/1990/s900517a_e.htm（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375：Mark Kramer, “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2, no. 2 (April 2009), pp. 39-61.

註376：“Dvizheniya 'Nashi' i 'Mestniye' prekrashchayut blokadu posol'stva Estonii,” RIA, May 3, 2007, http://ria.ru/society/20070503/64852572.html（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浏览）。

註377：Kadri Liik, “The 'Bronze Year' of Estonia–Russia Relations,” Esto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Yearbook, 2007, http://www.vm.ee/en/yearbook-2007, p. 71.

註378：Stephen Herzog, “Revisiting the Estonian Cyber Attacks: Digital Threats and Multinational Respons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4, no. 2 (Summer 2011), pp. 49-60.

註379：“’Nashi’ priznalis’ v organitsii hakerskikh atak na estonskiye saity,” lenta.ru, March 12, 2009, https://lenta.ru/news/2009/03/12/confess/（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浏览）。

註380：Svante E. Cornell, Johanna Popjanevski, and Niklas Nilsson, “Russia’s War in Georgia: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Georgia and the World,” policy paper,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ugust 2008.

註381：Andrei Fedyashin, “Skol’ko v mire ‘gosudarstv na sokhranenii’?” RIA, August 26, 2010, http://ria.ru/analytics/20100826/269199864.html（二○一六年七月二日浏览）。

註382：C. J. Chivers, “Russia Warns It May Back Breakaway Republics in Georgi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08, http://mobile.nytimes.com/2008/02/16/world/europe/16breakaway.html（二○一六年七月二日浏览）。

註383：“Doktrina Med vedeva: Pyat’ printsipov rossiyskoy vneshney politiki,” Tsentr konservativnykh issledovaniy, September 16, 2008, http://konservatizm.org/speech/dugin/011009193240.xhtml（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384：编按：提比利里是乔治亚首都。

註385：Anton Shekhovtsov, “Aleksandr Dugin’s Neo-Eurasianism: The New Right a la Russe,” Religion Compass 3, no. 4 (2009), pp. 697-716.

註386：“Odobreniye organov vlasti,” Levada Center, running indices, http://www.levada.ru/indikatory/odobrenie-organov-vlasti/（二○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浏览）。

# 第五部　抗议

## 第十四章　未来就是歷史

二○○八年三月，谢廖沙飞回莫斯科，参加总统选举投票。他在基辅住了一年，几乎没在关心俄国政治，但他知道自己必须投票。他的祖父也会这么说。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总是谈论着谢廖沙有多么幸运，能在拥有选举的时代成长。或许正因如此，谢廖沙觉得自己一定要飞回莫斯科，在户籍地的投票所投下选票，而不是在基辅的俄国大使馆投票。

飞行歷时一小时。到了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Sheremetyevo International Airport），谢廖沙搭上一辆接驳车（一辆摇摇晃晃的小巴）前往最近的地铁站。小巴一辆辆接踵而至，速度更慢的大巴士也一样，因此地铁站里挤满了旅客，其中多数人都经歷了比谢廖沙更久的旅程而显得疲惫。谢廖沙排队前往售票窗口：当然，每个人都刚从外地回来，身上都没有为莫斯科人节省排队时间的多次乘车储值卡。地铁站又挤又吵，空气中瀰漫着每个人一路上的征尘。行李使得空间感更加欠缺。疲累的孩子们抱怨。疲累的大人们厉声制止。队伍看似漫无止尽。

实际上，他排了五十分钟。要是谢廖沙到达售票窗口时都已经累了，其他人的状况又该是如何？

「六十次乘车卡，谢谢。」他说，把一张卢布千元钞推过窗口。按照窗口上张贴的那张机器打字的票价表，六十次乘车卡是提供购买的最高面值票券。每张价格五百八十卢布，相当于二十美元左右。

谢廖沙取票之后，走到闸门前，尽可能大声地说：

「我刚才排了五十分钟的队！我不要你们也得排队五十分钟，就只因为你们从外地来！我买了六十次乘车卡！请你们刷这张卡进站。」

人群停顿下来。许多人看来是听见他说的话了，但不愿相信他。然后，有个女人走来。谢廖沙将票卡放进闸门，闸门吐出票卡，亮起绿灯，女人进了站。然后又来了一个人，然后是一对夫妻，接着，一位年轻的警官把自己刮得干干净净的脸逼近谢廖沙。

「你得跟我走一趟。」

谢廖沙去了。警官带着他穿过大厅的一道黑色铁门，走进地铁站的警察局，里面坐着一个更高阶的警官。他完全谢顶的脑袋胀红，汗珠流淌，即使他就坐在金属桌后方，脸色和呼吸却彷彿刚爬过楼梯。他们一

走进来，这个冒汗的男人就开始对谢廖沙咆哮，脏话如连珠炮般倾泻而出，从来没有人这个样子吼过谢廖沙。谢廖沙脸上必定也流露出情绪了，因为年轻警官这时又把他带出门外，在那个冒汗的男人听不见之处，他试着用自己的话让谢廖沙知道他使用车票的方式不对。但他实在无法说清楚讲明白，甚至讲不完一句连贯的话，这让谢廖沙很想帮他一把。

「听我说，」他说：「这不是诈欺行为。我确实买了一张六十次乘车卡得到优惠，但我没有从中获利，还为大家省下了时间和麻烦—包括收银员！」

「转卖车票是违法的！」年轻警官说。

「我没有转卖。」

「你会害收银员惹上麻烦的，她可能会被开除。」

「她为什么要被开除？她什么都没做错！谁都没做错。」

「你以为你是谁啊，上帝吗？」

就在那一刻，发生了某些转变。谢廖沙感到平静而清醒。「禅」这个词在他心中浮现，然后是一句构造完整的话：「这个人的心智运作模式，我永远不可能理解。」

「我懂了。」谢廖沙说着，从年轻警官身边走开。谢廖沙把票卡放进闸门，穿过闸门。「麻烦你了，请收下！」然后把票卡塞进第一个对他这句话停顿够久的人手里。谢廖沙用不着剩下的五十五次了。

他直接前往投票所。投票所设在一所学校里—六个临时架设的投票亭，房间中央有两个透明的塑胶投票箱。他拿了选票，但还没踏进投票亭就停下脚步。选票上的第一个人名和履歷如下：

波格丹诺夫，安德烈．弗拉基米洛维奇（BOGDANOV, Andrei Vladimirovich）。生于一九七○年，莫斯科居民。工作处所：俄罗斯民主党，政党。职称：中央委员会主席。工作处所：莫斯科市阳光地区（Solntsevo）议会。职称：兼任副议长。推荐人：自己。依据选民连署而获得登记。所属政党：俄罗斯民主党，领袖。註387

这激怒了谢廖沙，然而警官和他满头大汗的上级，以及他们编造的所有规定都还不足以激怒他。这是彻头彻尾的嘲弄。普丁时代的新法律规定，独立候选人（不具备国会议员身分的候选人）必须提交两百万份选民连署，才能登记为候选人，而且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得超出五

万份连署。註388这需要鉅额金钱或庞大的全国性草根行动者网络──最好两者皆有。许多人在那一年都尝试过。加里．卡斯帕洛夫就连一开始聚集支持者所需要的公开集会都无法召开，因为无论他出多少钱，都没有人愿意租借场地让他举办这类活动。鲍里斯．涅姆佐夫中途退出，全力支持另一位参选人──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Mikhail Kasyanov），但卡西亚诺夫获得的连署却被强行作废。註389

但这里却有个叫做波格丹诺夫的人，完全名不见经传，表面上代表一个其实从一九九○年代初期之后就不再活动的政党，政治经验是在一个小而无权的区议会里兼职议员，就连这一段都可能是伪造的──谢廖沙却得假装相信，这个小丑蒐集到了两百万选民连署？这种感觉就像当初谢廖沙觉得每个人都疯了，全都突然接受无名小卒普丁成为总统热门人选那样。只差在这次更恶劣。比起普丁将总统职位交给梅德维杰夫，彷彿任他随意出借用品的那副场面，这个独立候选人对人类智商的侮辱更加严重。谢廖沙把空白选票丢进投票箱里，走出投票所。他搭上一辆计程车返回机场。

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波格丹诺夫得票率为百分之一点三。梅德维杰夫在第一轮投票就以百分之七十点二八得票率获胜。两位无役不与的候选人──共产党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和自由民主党的弗拉基米尔．季里诺夫斯基（两人都是国会议员，因此不须徵求选民连署即可成为候选人）则平分剩下的选票。註390

*

那天发生在谢廖沙身上的这两件事，都是「循环连坐」（krugovaya poruka），或者列瓦达所谓的「集体劫持」（collective hostage-taking）之范例：列瓦达写过，这是效力最强、道德上也最令人憎恶的苏联机制之一。它独立于任何法律之外、且通常超越法律，将每个人都转变成既存秩序的执行者。在地铁排队的例子里，警官本能地感受到自己的职责就是确保所有旅客全都维持在同等痛苦的状态，防堵旅客自我组织的任何企图。而在投票所，由荒谬到近乎虚拟的候选人名列第一位的那张选票，将每个投票的选民都变成了共谋者。经由投下选票，人们确认了这种作为的正当性。经由在缺乏可信替代人选的情况下投票给梅德维杰夫，人们同意假装成积极支持者，象徵性地进入了这个「循环连坐」体系奠基于其上的圈子。（早先的选票上还有「不支持所有候选人」这个选项，但二○○六年的一项法律废除了这个选项。）

更早之前，就在普丁第一次当选总统后不久，古德科夫决定自己需要从民调结果分析中抽出一些时间来，书写另外一件事：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极权主义。过去十年来，这个词其实使用得不多。一九八○年

代晚期听到苏联领导人（首先是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可夫列夫，然后是戈巴契夫本人）开始用这个词描述苏联体制，曾经很令人激动。那是史诗般的诚实与开放时刻。但接着，在苏联政权看似瓦解成一堆灰烬之后，这个词立即变得无关紧要，极权主义结束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是改革、经济，以及人们假定俄罗斯即将建立的新体制。就连极少数顽固坚持回应过去遗留问题的人，通常也选择聚焦于苏联歷史的一个特定时期—史达林主义，以及苏联体制的某一部分—国家恐怖。但自从列瓦达的研究持续揭示苏维埃人兴盛且持续繁衍、关于苏联机制萎缩的最初假设早被驳斥之后，回头思考创造出机制与人的体制本质，似乎是个好主意。

「极权主义」一词最早是从一九二○年代晚期开始使用，就在最早的极权政体形成之后不久。起初它纯粹是描述性用语，那些意图彻底转变社会之政权（像苏联、义大利和随后的德国领导人那样）的反对者及支持者都会使用它。事实上，第一个使用「极权主义国家」这个说法的人，可能就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他在一九二五年的一次演讲里，颂扬将整个社会集结于单一国家实体下的美德。那时的「极权主义国家」倒不如说是愿景而非体制，但这个愿景明确反对在它看来软弱的西方民主政治安排。就其寓意而言，极权主义国家将从匯集一切力量（包括每个人支持政权的力量）成为单一整体而获取实力。德国人和义大利人都将苏联看作是实现此种匯集的成功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些思想家试图描述极权主义政权与以往存在过任何政权的不同之处。一九三六年，义大利天主教神父、流亡国外的政治人物路易吉．斯图尔佐（Luigi Sturzo）确认了极权主义国家的四项特徵：

一、行政中央集权被推到极致—压制的不仅是地方的一切自主性……还有一切公共或半公共机制、慈善组织、文化协会、大学的自主性……立法及司法独立完全消失，就连政府都降格成了附属于领袖的实体，而领袖在统帅（Il Duce）、元帅或元首的美称之下成了独裁者……

二、执政党军事化。若非由它控制军方，就是由军方与当道势力结盟，双方的武装部队合作或合併。全国青年军事化，集体生活被当成是军旅生活，復仇之梦或帝国之梦，以及国内外冲突滲透了整个社会结构……

三、人人都必须信仰新国家，并学会热爱它。从小学到大学，光是情感一致还不够；对于新国家来说，必须要有知识与道德的全然屈服，轻信的热情及宗教的神祕主义……除了学校教育的努力之外，还要创造出全新的道德环境。因此，官方教科书、由国家启发并统一规格的报

纸、电影、广播、体育、学校社团及奖项颁赠，不仅被控制，更被导向同一个目的—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崇拜，不论其旗号是民族、种族或阶级。整个社会生活都在游行、节庆、盛会、公民投票、体育赛事中被持续动员，经过精心计算以捕捉民众心智、想像及情感。要激发这种超升的集体精神，对国家、阶级或种族的崇拜本身仍太过含煳。必不可少的情绪焦点是个人、英雄、半神人—列宁、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本人是神圣的、言语则是先知的事工……

四、极权主义国家不可能容许资本家或工人的经济自由。自由工会或自由经营者协会没有存在空间。反之，存在的是国家工团或国营公司，它们没有行动自由，在国家内部为了国家需要而被控制及组织。註391

二战结束后，来自德国的另一位流亡者，发表了最详尽也最完整可靠的极权主义定义。汉娜．鄂兰的三卷本《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在鄂兰看来，极权主义国家最关键的特徵在于意识型态与国家恐怖。意识型态的实质，甚至它有无实质并不重要：任何意识型态都有可能成为极权主义体制的基础，只要它能被概括并与恐怖搭配。恐怖是用来执行意识型态的，同时也为意识型态添加燃料。构成意识型态基础的任何前提，不论是特定种族、还是特定阶级的优越，都被用来推导想像中的歷史法则：只有某一种族或某一阶级注定能够生存。这些「歷史法则」使得表面上为求生存所需的恐怖成为正当。鄂兰也写到了公共空间的臣服—实际上是公共空间的消失，藉由剥夺个人的界限及能动性，令个人陷入极度孤独。她写道，这正是意识型态与恐怖结合之下的产物。按照这样的模型，墨索里尼统治的义大利不再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国家，不论墨索里尼自己怎么说。鄂兰接着写到了纳粹德国和苏俄，即使她对前者的认识远远多过后者。註392

《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专注于探讨极权主义的根源与起因，而非描述由此产生的国家：她在一九五三年为该书写下最后一章「意识型态与恐怖」。註393同年，另一位德国流亡者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在一场探讨极权主义的会议上发言（鄂兰也是那场会议的讲者），对极权主义社会提出了五项简明的定义：

一、官方意识型态，由一套涵盖所有个人生存不可或缺之要素的官方教义所组成，社会中的每个人至少都应当被动服膺……

二、单一群众政党，由全体人口中相对低比例（顶多百分之十）的男女，热情且毫不质疑地献身于其意识型态，准备好运用一切方式推广

意识型态所获得的普遍接受，这类政党则以阶级严明而寡头的方式组织，通常由单一领袖领导，一般而言优越于官僚政府组织，或与之完全混合。

三、对一切武装战斗的有效手段……视技术条件而定，近乎完全独占控制。

四、对一切大众传播的有效手段……同样视技术条件而定，近乎完全独占控制。

五、恐怖主义式的警察控制体系，取决于上述第三点及第四点的效力，其特徵在于不仅针对可资证明的政权之「敌人」，也恣意针对人口中被选定的阶级。註394

过了三年，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学生──来自波兰的流亡者兹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一同发表了《极权独裁与专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书，篇幅比《极权主义的起源》薄了许多，其用意倒不是描述，而是要定义极权主义。他们在弗里德里希先前的清单上增补了第六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註395

弗里德里希和鄂兰一样，强调纳粹与苏联政权本质近似，因此有正当理由将它们列入同一个范畴，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其后许多年间，这个概念的多数批判者都聚焦于此一前提上。有些人论证一切工业化国家内部都包含着孕育纳粹德国体制的种籽，例如另一位德国流亡者赫伯特．马库色（Herbert Marcuse）。註396其他人则主张以纳粹德国研究为基础而产生的模型，不太符合苏联生活的现实，甚至有可能只为了诋毁苏联政权而存在，这样的人尤以出身左翼传统的西方社会学家为甚。在苏联解体之后，研究该国相较于以往变得更容易，学者开始注意到苏联的私人生活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丰富，苏联意识型态反覆无常且被普遍漠视，以及警察执法在史达林死后相对温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牴触了这个模型。以澳洲裔美国歷史学家席拉．费兹派屈克（Sheila Fitzpatrick）为首的一群学者合力写成了论文集，专门考察纳粹与苏联体制的差异。他们将论文集命名为《极权主义之外》（Beyond Totalitarianism）。註397

不只是在俄国，就连西方研究俄国的学者也早已不再使用这个概念，但古德科夫有个想法：现在正是重新思考这个概念的时候。若是仔细思考，极权主义的定义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问题。首先，即使最早研究极权主义的所有学者都是极权国家的流亡者，他们的叙述却是在国外产生的。他们无法接触到某些特性。比方说，从外部看向国内，就无法区别人们参加游行是被迫到场还是真心渴望参与。研究者们通常的假

定非此即彼：人民若非被动的受害者，就是热情的信徒。但从内部看来，这两个假定都是错的，对于参与游行（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的所有人和单一个人都不成立。他们不觉得自己是被动的受害者，但也不觉得自己狂热。他们觉得正常。他们是社会的一分子。游行及其他各种集体生活形式给了他们人类通常所需的归属感。他们不能对照其他社会的此等风险━估量自己不属于社会的风险，不能想到这件事━比起在西方民主国家被标记成外人，在苏联被标记成外人会带来更大、更不可估量的惩罚。要是他们说自己想要成为游行或整个集体的一分子，他们必定没有说谎。要是他们向其他人施压，要求对方也成为集体的一分子，那他们是自愿这么做的。但这不足以让他们成为西方人想像的那种意识型态真诚信徒：意识型态就只是实现团结的要诀，是集体共享的语言。此外，按照鄂兰的说法，极权主义意识型态的特徵在于其密闭本质：它的解释将整个世界排除在外，没有任何论证能戳破它的泡泡。苏联公民活在意识型态之内━那是他们的家园，他们觉得稀松平常。

不言可喻，极权主义的两大支柱━意识型态与恐怖，近看之下也和远处所见大不相同。同样不言可喻的是，研究者有可能高估了意识型态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文本，而文本反映意识型态更甚于其他一切。知识分子总是掉进将书写文字误认为真实生活写照的陷阱之中。

在苏联，意识型态证明了是多变的。官方政治路线激烈转变，从国际主义转为「民族友谊」，从家庭被看作是布尔乔亚的时代谬误，到家庭被当成苏联社会的根本单位。唯一不变的是围绕着各种意识型态的动员工作，以及国家出类拔萃的概念之重要地位。倘若意识型态本身做为极权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不那么重要呢？恐怖又怎么说呢？鄂兰在犹太人大屠杀过后不久写下她的着作，而史达林主义恐怖当时每年仍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但在一九五三年大恐怖终结之后，苏联又存活了数十年。或许恐怖在极权政体创建时是必要的，但政权建立之后，它能否藉由在内部承载着恐怖时期的记忆与其各种机制而维持？

大约在二○○四年，普丁第一任总统任期届满前，西方记者开始审慎地用「威权」一词称呼俄罗斯政权。鄂兰曾经论证，威权政体本质上不同于极权政体，更像是暴政，因为它们要求臣民遵守某些可知的法律及规则，而非完全臣服。极权与威权政体的另一个不同区别，随后由一位双重意义下的流亡者胡安．荷西．林兹（Juan José Linz）提出。林兹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幼年离开德国，成年后又从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出走。这位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写下一部着作《极权与威权政体》（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在其中提出以下三个差别：威权政体的国家与社会界限并未减弱；威权政体拥有的是

心态，而非意识型态；威权政体不同于极权政体，社会动员程度不高。根据林兹的定义，威权政体的臣民是被动的，他们就只是接受了一党或一人统治。威权政体极度非政治。註398

但这个范畴看来不太对。一切事物都成了政治。普丁统治下的俄罗斯正在动员，从话语到重新举行的阅兵游行，乃至最重要的，克里姆林宫组织的青年运动及其训练营，全都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一度模糊不清的国家与社会界限，如今完全被抹灭了：接管媒体和打击公民社会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将俄国政权称作「威权」还有一个问题：它并未考量苏联遗绪，而古德科夫愈来愈觉得，苏联遗绪是理解现政权本质的关键所在。他碰巧也认为，苏联社会实际上是在现实生活中最趋近于极权主义理论模型的，这与西方多数苏联研究学者的确信恰好相反。随着苏联社会机制得到保留并復甦的证据愈来愈多，古德科夫开始认为俄罗斯是极权主义体制的置换。为了理解它，古德科夫决定以苏联经验为基础，自行提出一套极权主义定义，包含以下七点：

一、党与国家共生……社会以阶序严明的方式组织起来，由上而下建构……社会因此被上下颠倒：掌权的上层迟早会成为最无能、最缺乏见识的阶层，欠缺发展及加强工作效率的潜能。每次大搬风都把一个更不积极、更无能的人物带进最高层……

二、经由垄断大众媒体，加上严格审查制度而产生的强迫性社会共识，为全体人民不断动员，随时准备执行党国决策创造了条件。……臣民的注意力显着集中在国内事件上，而国家对外孤立；由此产生出例外主义感受，对「我们」的集中关注，以及强大的异化障碍，拒绝知道或理解「另一方」的事件。

三、由祕密警察、特务组织、法外行动的民兵机构执行的国家恐怖……一方面存在着祕密警察与集中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官方宣传和文化生产，为「双重思想」创造了条件。……恐怖的规模与性质可能相差甚远，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间，以及一九三○年代到一九五○年代的大恐怖，到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人数及影响相对较小的异议人士迫害。

四、社会及经济军事化……从顶端到底层、从一切教育机构……到体育俱乐部等等，穿透社会的动员结构行动……其用意未必是要让全体人民准备对外敌作战，更多是为了有系统地训练全体人民……执行政权任何及全部的倡议，因为「领袖高瞻远瞩」。

五、分配性的统制经济，以及随之产生，不可避免的物品、服务、资讯等长期性短缺……短缺不只是亏损，也是经由获取物品及服务的官

方等级结构，将社会组织起来的方式……由非正式的影子经济结构补充。

六、长期贫困状态……极权主义在贫困日益加剧的状态下得以巩固—当大部分人口对美好的未来毫无指望，而将希望投射在某些政治非常措施上。极权主义靠着维持极低生活水准而得以存续。

七、静止不动的人口，横向及纵向社会流动都受到严格限制，除非由国家为其自身目的而实施。註399

古德科夫并未将意识型态纳入他的极权主义特徵列表，因他得出结论，意识型态只在最初阶段对极权统治者夺取权力时至关重要；夺权之后则由恐怖发挥作用。其后，顺从的动力则扮演首要角色。由此产生了古德科夫对「双重思想」所下的定义：那不是欧威尔描述的怪异状态，反倒是人们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境下，面对不同事物时，思考的彻底背反——一种习惯性且近乎被动的碎片化—不论他们在那个特定时刻为了顺从而需要思考些什么。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确保苏联境内不可能发生有力的抗争，支离破碎的人民无法缔结及维持团结关系，也无法发挥想像力策划未来，但任何群体行动都少不了对未来的想像。

定义苏联极权政体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辨析俄罗斯从中继承的事物。这份清单很长。在文书上，一党统治被废除了—但人民维持不变。前朝职官权贵继续主宰官僚，而官僚继续支配社会，维持着上下颠倒的结构。要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一九九○年代的动盪加速了轮替过程，结果使得更没见识、更无能的人被提拔到最高层。审查制度废除了，但在短暂的自由过后，大众媒体再次被国家垄断。国安会被更名了，丧失了某些职权（某些功能被其他机关取代，如边境管制），但司法仍继续为行政权力服务，法治未能确立，执法部门则认为自身的功能在于保卫国家。在社会解除军事化这方面，普丁逆转了整个过程—实际上，就在叶尔钦辞职、他开始代理总统当天，普丁抽空签署了一项内阁措施，重新对小学生实施军训。註400经济不再由中央计划部门统制，但仍维持分配性质；克里姆林宫在一九九○年代的民营化过程中分配资产及使用权，普丁即位之后又开始着手重新分配公司及财富。这种分配方式在食物链下端通常被叫做贪腐，但又不尽然如此，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个别官僚，而出在这套限制、分配与服务的体系本身。反过来说，这套体系又以集体劫持为基础——一套强化低层次期望的体系，正如谢廖沙所遭遇到的地铁票事件，它不是在贩售服务，而是在分配服务。

那么，俄罗斯的体制应当如何称呼？它不再是昔日的极权政体了，但在拆除了某些极权机制（例如党国或总动员）之后，它又开始重新创

造它们，或近似于它们的事物。可是在古德科夫看来，它们更像是极权主义机制的仿制品。西方记者使用「威权」一词，是因为他们似乎认为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的精简版，但这个政权也不是威权政体。古德科夫认为，它或许可以称作「拟似极权主义」（pseudo-totalitarianism）。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政权不可能发展成为正常运行的民主政体。事实上，它似乎完全没有能力发展。它大概也不能重新创造出前朝的恐怖体系及完全动员体系。至少在古德科夫写下这些的二○○一年当时看来，它唯一的目的只是尽力支撑，维持着恰好够用的惯性。它在这方面的首要资源，则是深受代代相传的双重思想与集体劫持薰陶的俄罗斯公民：苏维埃人。

*

在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定义极权主义之际，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则试图理解及解释它。古德科夫没有多大耐心阅读他们的大多数着述，部分由于他们一般而言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部分是因为其中几位是怀抱使命感的德国流亡者—他们要警告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极权主义有可能在那儿出现。他们亲眼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在正常运行的民主政体中掌权，希望自己的知识能提供警讯。古德科夫的经验则不同，他这时对极权主义如何推展的兴趣更少于极权主义如何拒绝终结；但他在书写苏维埃人时试着描述的某些内容，其实早在七十年前就被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留意到了。

佛洛姆一九三四年逃离德国，一九四一年写下一部急迫的着作，名为《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试图叙述纳粹主义的心理起源，就连他也小心翼翼地这么说：「纳粹主义的确是心理问题，但心理要素必须被视为受到社会经济因素所造成的结果；纳粹主义也是经济和政治问题，但它对人们具有的掌控，却必须在心理学的基础下才能适当地被理解。」註401

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佛洛姆向上追溯到中世纪。当时：

一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农夫、工匠、骑士，但不会是恰好从事某种职业的某人。社会秩序被视为自然秩序，个人身在其中好获得安全与归属感，竞争关系相对来得少。人一出生便进入特定的经济地位，藉由被传统所决定的谋生方式而获得生活的保障……註402

这段描述同样适用于晚期苏联社会，正如古德科夫所见，它以限制社会流动做为最重要的控制工具之一。人们通常在社会经济阶层中既不

上也不下——他们也不太可能在与父母亲大不相同的领域里工作。谢廖沙在苏联解体前不曾遇到过任何一个党内最高阶职官子女之外的孩子，他生长在一连串字面意义上的围墙背后，但将其他苏联公民与不同群体成员隔绝开来的不可见之墙却也同样有效。超越这些界限的人们，例如离开乡村去读大学的廖沙母亲，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与决心才能做到，而且他们总是异类——加林娜就连在自己的家庭中都是异类。尽管如此，她还是只能从自己起初的位置向上移动一阶，再向旁边移动一格：她在靠近母亲工作的集体农场所在村庄最具规模的市镇上当了学校教师。

佛洛姆写道，宗教改革开始之时，个人获得了决定自身出路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对地位和自我的确定感。佛洛姆将人们新得到的自由分成两种——「积极自由」（实现自我的自由）与「消极自由」（免受侵扰的自由）。倘若前者是正向的，后者则会引发不堪负荷的焦虑：「世界变得无限宽广，同时成为一种威胁。失去了封闭世界的稳固地位，个人丧失对人生意义的解答，产生对自我及人生目标的质疑。」註403马丁．路德与约翰．喀尔文则带来了解决这种焦虑的办法：「接受自身的微不足道，极力自谦自卑，放弃个人意志，弃绝并谴责个体力量，个人就能为上帝所接受。」註404换言之，个人得以一举恢復对未来的确定感（未来如今交託于上帝手中），同时摆脱掉最不堪负荷的重担：自我。

在佛洛姆看来，一种全新的人格由此开始，并且迅速盛行于某些社会的中产阶级。他将这种人格描述为可能会被精神分析师诊断为「施虐受虐欲」，但在社会心理学层次则可称作「权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部分是由于个人关系中的施虐受虐倾向通常会被理解成病理，但社会中的同样行为却可能是最理性且「正常」的策略。权威性人格藉由将自身力量交付给佛洛姆称作「神奇救星」（magic helper）的某个外在权威（上帝或领袖）而存在。这位神奇救星是指引、安全感及骄傲的来源，因为将自己交付出去换来的是一种归属感。权威性人格由其与权威的关系所定义：

权威性格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性别：一种是权势者，另一种是无权者。权威性格者所具有的爱、崇拜及愿意顺从他人等心情，会自动地被权力挑起，不论是来自某人或某组织拥有的权力。权力之所以会使这些人神魂颠倒，并非由于该权力具有的任何价值，单纯只因为它是权力本身。就好像权力会自动在他心中引发「爱」的感受，同样地，无权势的人或组织，也会自动在他心中引发轻蔑感。只要看到无权力的人，就会让他想去攻击、宰制或羞辱对方。註405

权威性人格的另一项关键特徵，则在于他对「歷史决定与永恆」的嚮往和信仰：

之所以会有战争、之所以某些人要被某些人统治，都是命运。命运同时决定了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永远不会减少。……权威性格崇拜过去，因为过往发生的一切将永恆如此。期盼或致力于追求以前没有过的事物，不是疯狂就是罪恶。「创造」的奇蹟—创造永远是奇蹟—完全在权威性格者的情感经验之外。註406

佛洛姆和在他之后论述极权主义威胁的思想家—马库色和阿多诺（Theodore Adorno）註407—都确信，这种性格在现代社会很常见。社会与经济的大规模动盪，有能力促使权威性人格主导整个社会，并扶植权威性格者成为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正处于这种状态。原有的确信消失无踪，社会结构大乱，世代之间出现裂痕：

老一辈在社会各项剧烈变动、尤其是通货膨胀之下感到迷乱与困惑，他们无法像灵活又年轻的一代那样适应新的社会处境。因此，年轻一代自觉优于长辈，再也无法认真看待长辈和他们的教诲。而且，中产阶级的经济衰退使得父母不再有能力扮演对子女经济资助的角色。註408

这段话用来描述一九九○年代的俄罗斯，与它所描写的一九三○年代德国同样精准。鄂兰形容这样的状态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註409确信的根基如今成了空洞；自由的重担变得难以承受。希特勒做为一名最典型的权威性格者而崛起，他拥有一套投合其他权威性格者心意的方案。他憎恨威玛共和，因为它积弱不振，一如他的听众们憎恨自己的长辈。佛洛姆并不认为纳粹意识型态的实质有多么重要—实际上，他在那套意识型态里完全没看到实质。鄂兰也强调，希特勒（以及列宁）的意识型态前提，在旁观者看来「简直『原始』到荒谬的地步」。註410佛洛姆在那套意识型态里看不出丝毫的逻辑：「纳粹主义从来就不具有任何政治或经济原则，我们必须理解的是，纳粹主义所拥有的唯一原则就是极端的机会主义。」註411按照佛洛姆的说法，纳粹意识型态及其实践所拥有的，是满足其听众受虐渴望的仪式：

他们一而再地被教导：个人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社会大众应该要

接受个人的无意义这项事实，融入更高的权力当中，以分享那份权力的力量与荣耀，并且感到骄傲。註412

至于权威性人格的施虐一端，这套意识型态则提供了一种「比其他人类优越许多」的感受，佛洛姆写道，这些心理要素「足以（至少暂时如此）弥补他们在经济或文化面十分匮乏的事实」。註413

*

二○○八年春天，全国最大的电视频道宣布举办一场线上竞赛，选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俄国人。竞赛的名称叫做「俄罗斯的名字」（The Name of Russia）。到了七月中，投下将近两百五十万张选票之后，主办单位宣布投票暂时中止，因为有人（或团体）作票，让史达林成为第一。当投票重新开始，排名出现遽变，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成了领先者。但主办单位接着又说，这同样是骇客攻击的结果。註414再过数週，终于公布了胜利者：不是先前这两位大受欢迎的领先者，而是亚歷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多数俄国人只从歷史课本里依稀记得这位十三世纪亲王，同时记得他是谢尔盖．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一九三八年导演的电影《亚歷山大．涅夫斯基》中，那场史诗般冰上战役的俄军指挥官。

廖沙很愤怒，人人都能看出实情是怎样。史达林在大众投票中领先，令电视臺高层感到困窘，他们决定按照现实生活里选举官员操作时所使的必要手段来伪造结果。只差在他们必定误解了自己收到的讯号：他们以为俄国的末代沙皇是安全的人选，却没考虑到他被废黜、向革命屈服所代表的意义。他是软弱的，如今他受到轻蔑。更糟的是，叶尔钦曾经为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杀害沙皇全家而公开悔罪，承认了罪恶的遗绪──这样的承认在当前的新倾向看来同样软弱。因此，甚至没入围票选名单的亚歷山大．涅夫斯基，看来就成了政治上的安全人选：任何人都只知道他打过仗。

「他算什么歷史英雄？」廖沙怒斥：「他在俄罗斯歷史书写中完全没有地位！」

「但他跟日耳曼人打仗！」另一个廖沙说：「而且打赢了。」

另一个廖沙是廖沙的男友。这年稍早，他开始在「接触」（VKontakte）註415社群网站上传讯息给廖沙。廖沙表现得冷淡。他其实真的很冷淡。他从两年前开始採取的昇华策略有了效果。他对自己的研究和朋友圈很满意。他把全部时间都投注在博士论文上。他和一位女性友人及其丈夫同住一间公寓。他远离同志群体，因为他们惊吓到他：那感觉像是深渊。

另一个廖沙锲而不捨。过了几个月，廖沙同意见面。接着他软化了。他以为自己如今已经够坚强，不会再让自己产生任何感觉。但过没多久，他的感受就变得慌乱。另一个廖沙有自己经营关系的一套独特方式。他每天下班都会到廖沙的公寓来。廖沙为了防止另一个廖沙搬进来只能这么做，但实际上，另一个廖沙如今还是住进了公寓。另一个廖沙说，他们是一家人了。廖沙说，他反对传统的家庭模式，但另一个廖沙说他是俄罗斯正教徒。他戴着一条十字架项鍊，谈论着传统。两个男同志在自己完全不会被看见的这个国家里能有什么传统？二十三岁的廖沙所期望的那种传统，是在关系的各方面都成为主导另一个廖沙的伴侣，他才二十岁。或者，这是另一个廖沙自己的说法──即使如今是廖沙觉得自己被人主导。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争吵。这些争论都很怪异。另一个廖沙就只是对廖沙说的每件事唱反调。廖沙很快就意识到，另一个廖沙不停招惹他是为了得到关注，但他就是忍不住，因为另一个廖沙经常拿廖沙真正关切与理解的事情挑衅。另一个廖沙说他喜欢普丁。

「你怎么能喜欢普丁？」廖沙说。

「我才刚开始就业，普丁的计画（Putin’s Plan）是很妥切的计画。」另一个廖沙回答。

这个答案在各个层面上听来都是无稽之谈。首先，根本没有普丁的计画这种东西，这是国会选举期间使用过的一句话，但没有一本书、甚至没有哪张传单写到过这个计画的可能内容。彷彿每个俄罗斯人都应该凭直觉就知道普丁的计画是什么，宛如那是天意或自然法则一般。另一个廖沙又说这个计画「妥切」，彷彿它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而且还跟他的职业生涯有关！另一个廖沙担任彼尔姆市议会的自由派议员尼基塔．贝利赫（Nikita Belykh）的助理，贝利赫是涅姆佐夫发起的右翼力量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廖沙想过要不要问另一个廖沙，要是普丁的计画这么妥切，他为何还帮贝利赫工作，但他明白自己其实不想知道答案。他可以想见另一个廖沙会说，自己替贝利赫工作是为了赚钱，不过这更糟糕，因为这是谎言，他其实是个不支薪的助理：「金钱」在当代俄罗斯可以当成是「权力」的委婉说法。此外，另一个廖沙还是亲克里姆林宫的青年运动「青年俄罗斯」（Youth Russia）的成员──这个团体参与的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前一年夏天围困爱沙尼亚大使馆。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一名年轻女子，一同参加了在谢利格尔湖（Lake Seligher）举办的军训夏令营。

另一个廖沙从来不缺相骂本。他为了戈巴契夫挑起一场争吵，他憎恨戈巴契夫摧毁了苏联，而且继续争论，即使他年纪小到根本记不得自

己在戈巴契夫时代过着什么生活。他说叶尔钦「不过是个酒鬼」。终于在一次争吵中，廖沙情绪失控。他动手打了另一个廖沙。

他不敢相信自己会做出这种事，当场就和另一个廖沙绝交。但另一个廖沙忠于他令人费解的自我，看来很陶醉于这次事件。往后几个月，他都在跟两人共同的朋友间吹嘘廖沙是个「暴君」。

*

佛洛姆想必不会觉得另一个廖沙有什么难解之处：他就是权威性人格活生生的一幅讽刺画，就连他自动乐意崇拜一位十三世纪军队统帅这一点都是。

古德科夫在「俄罗斯的名字」竞赛中也没看到任何令他费解或意外的发展。列瓦达中心团队从苏维埃人计画开始以来，就一再要求应答者提名「自古至今最伟大的人物」。这些年来的结果仅仅略有出入。史达林稳定攀升━从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十二，上升到二○○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二○○八年下降四个百分点，可能跟「俄罗斯的名字」票选网站据传被骇客入侵的讨论有关）。史达林在一九八九年还排不上前五名，但随后每次调查他都名列前茅，一九九四和一九九九年排名第四，二○○三和二○○八年则名列第三。其他始终排名前五的人物还有彼得大帝、普希金和列宁。拿破崙和率领红军攻入柏林的朱可夫元帅（Georgy Zhukov）也在不同年份登上前五，此外还有俄国第一位科学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以及第一位太空人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普丁在二○○三年头一次被百分之二十一的应答者提名，到了二○○八年则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成为自古至今最伟大人物的第五名。註416

在古德科夫看来，这张名单从一开始看来就很不妙，随着每次调查而更加每况愈下。俄罗斯人显然认为伟大的人物全是俄罗斯人━而且除了凯萨琳大帝之外，全都是男人。他们以军队统帅和国家领袖（后者通常也会做为军队统帅而受到评价）为首的选择，则显现他们视伟大等同于权力。（身为极少数外国人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一九八九年开始时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九，但很快就下跌，被希特勒赶上。）

这一切全都恰如其分。对权力的热爱，聚焦俄罗斯而排除全世界━或许只对拿破崙或希特勒例外，他们的权力甚至胜过了做为敌人的身分，但他们之所以与俄罗斯产生关联，正是因为他们入侵过俄罗斯━这项调查结果与其他结果相加起来，就成了极权主义心态。唯一让古德科夫停下来斟酌的，是对未来看似完全缺乏概念这点。他所学过的极权主义会预设出一套光明未来的意象。但在研究过共产主义与纳粹意识型态之后，他得出结论，这两种话语的吸引力，都建立在古老而原始的意象

上：一个简单的社会，「我们」的世界，一个部族。事实上，佛洛姆根本不承认纳粹意识型态里有未来意象这回事，他强调纳粹的「过去崇拜」。

*

或许可以更精确地说，苏联体制提供的不是对未来的愿景，而是预知未来的能力，类似封建时代的匠人那样，以及对未来做出规模极小、易于应付之决策的能力。阿鲁图尼扬在研究自己的家族史时想到了这点。她的曾祖母身为一名革命前的农妇，如何能想像自己的未来？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每个儿子都死于酒精中毒，女儿却成了学者和苏共中央委员？未来是这么难以理解，使得她在未来发生之后仍然无法充分理解：她只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个重要人物」。

但在阿鲁图尼扬成长的一九六○年代，未来在苏联公民眼前伸展开来，宛如一条窄小、但照明相对充足的走廊。人们要是像阿鲁图尼扬这样出身于受过教育的家庭，就会去读大学。她的祖母是歴史学家，父母亲是社会史学者和社会学家，阿鲁图尼扬则获得了心理学学位，在社会学研究所任职，也和一位社会学家结婚。但这样的未来得面临许多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是：要不要加入共产党。入党保证了职业生涯更长远的进展及其他可能的便利，最好的是有能力出国旅行。不入党则似乎提供了一点小小的自主性。每个专业领域也各有自己的一系列次要选择。比方说，莫斯科的一位剧场演员可以选择留在首都表演定目剧，或是搬到外省成为地方剧院的主角。

一九九○年代，窄小的走道迸裂成了辽阔的空间。这令阿鲁图尼扬兴高采烈，它正是自由的本质。没错，人生变得不可预测，有时令人感到艰难——一九九○年代初期好几年，阿鲁图尼扬都是一家四个成人、两个孩子之中唯一养家餬口的人。她的父母和丈夫都固执地坚守社会科学，即使他们的同事都另谋他就，寻找赚钱门路。但阿鲁图尼扬正在学习成为一位精神分析学者，如同她一直以来的梦想，而且她也出国旅行——她曾经几乎不敢想像。在佛洛姆的分类里，她的一切体验都是「实现自我的自由」。

数年之间，她看到愈来愈多案主受苦于「免受侵扰的自由」不堪负荷的重担。他们的痛苦多半来自悔恨：一九九○年代回想起来变得更黑暗，他们没能选择的道路带来了太沉重的烦恼。一位案主离开了学术界（他原先是位生物化学家）进入一家制药公司工作。公司破产了，他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如今只能开计程车维生。他无法不去想自己走错了哪一步。他当初是否应该在学界坚持下去？留在学界的前同事们似乎都过得更好。

俄文有句明确的说法：「这里没有未来（budushchego net）。」彷佛未来的确是可以被删除的。人们会在某个特定的未来愿景崩坏时说出这句话。对许多人来说—在她陶醉于自己「实现自我的自由」之际，这样的人比她当时意识到的还要更多—未来在苏联解体、那条窄小的走道消失时即已随之终结。其他人挣扎着前进，但不确定感带来的焦虑迫使他们无力採取有意义的行动。二○○○年代初期，随着普丁来到，他简明的话语让世界再次能被理解，通货膨胀也在石油价格高涨的威力下减退，其中许多案主觉得好转了。他们又可以正常运作了。他们确信普丁与他们的好转有关。「稳定」是当时的通关密语—它正是恐惧与焦虑的对立面。

二○○○年代对阿鲁图尼扬来说也是稳定期。二○○五年，她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授证的正式会员，是十一位拥有这个身分的俄国人之一。同年，莫斯科精神分析学会获准成为一个研究组织，让它距离全世界精神分析学会的正式成员身分更近一步，阿鲁图尼扬则成为学会主席。对她来说，未来的轮廓愈来愈明确了—但她不曾盼望过这样的未来，而且唯有在这时才意识到，这让她在俄国社会里成了何等的局外人。

註387：二○○八年俄罗斯总统选举选票的图片，参看：http://pachkov.ru/wp-content/uploads/2008/03/bulleten_2_marta.jpg（二○一六年七月二日浏览）。

註388："Vybory prezidenta Rossiyskoy Federatsii," RIA, March 1, 2008, http://ria.ru/spravka/20080301/100371195.html（二○一六年七月二日浏览。）

註389："Boris Nemtsov otkazalsya uchastvovat' v prezidentskikh vyborakh," Rossisykaya gazeta, December 26, 2007, https://rg.ru/2007/12/26/nemcov-anons.html; Polina Matveeva, "Poslali Kasyanova i ushli v otpusk," gazeta.ru, January 21, 2008, http://www.gazeta.ru/politics/elections2008/2008/01/28_a_2606841.shtml（皆于二○一六年七月二日浏览。）

註390："Danniye o chisle golosov izbirateley, poluchennykh kazhdym iz zaregistrirovannykh kandidatov na dolzhnost' prezidenta Rossiyskoy Federatsii," https://cdnimg.rg.ru/pril/21/38/55/4608_1a.gif（文件于二○一六年七月三日自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下载）。

註391：Luigi Sturzo, "The Totalitarian State," Social Research 3, no. 2 (May 1936), pp. 222-235.

註392：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註393：Hannah Arendt, "Ideology and Terror: A Novel Form of Governmen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5, no. 3 ( July 1953), pp. 303-327.

註394：Carl J. Friedrich,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otalitarian Society," in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53), pp. 47-59.

註395：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註396：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2n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註397：Mark Geyer and Sheila Fitzpatrick, eds., 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398：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註399：Lev Gudkov, "'Totalitarism' kak teoreticheskaya ramka: Popytka revizii spornogo ponyatiya," Monitoring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5, no. 55 (September–October 2001), pp. 20-29 & 6, no. 56 (November–December 2001), pp. 13-30.

註400："Postanovleniye Pravitel'stva Rossiyskoy Federatsii no. 1441 ot 31.12.199, Ob utverzhdenii Polozheniya o podgotovke grazhdan Rossiyskoy Federatsii k voyennoy sluzhbe," http://pravo.gov.ru/proxy/ips/?docbody=&nd=102063823&rdk=&backlink=1（二○一七年五月三日浏览）。

註401：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enry Holt, 1994), p. 206. 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臺北：木马，二○一五年），页二三六。

註402：前引书，页四一。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六六。

註403：前引书，页六二。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八四。

註404：前引书，页八一。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一○○，略做改动。

註405：前引书，页一六六。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一九二。

註406：前引书，页一六九。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一九四。

註407：T. W.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註408：前引书，页二一四。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二四三。

註409：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vii. 译者按：此处参看鄂兰着，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页二二。

註410：前引书，页四七一。译者按：此处参看鄂兰着，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页四七四。

註411：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p. 218. 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二四七。

註412：前引书，页二三一。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二六○。

註413：前引书，页二一九。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二四八。

註414：Susanna Al'perina, "Zaigralis'," Rossiyskaya gazeta, July 17, 2008, https://rg.ru/2008/07/17/imena.html（二○一六年七月七日浏览）。

註415：编按：俄罗斯当地最大的社群网站，功能几乎与Facebook雷同。

註416：Boris Dubin, "Vydayushchiyesya ludi vsekh vremyon i narodov v rossiyskom obshchestvennom mnenii," Levada Center, August 31, 2008, http://www.levada.ru/2008/08/31/vydayushhiesya-lyudi-vseh-vremen-i-narodov-v-rossijskom-obshhestvennom-mnenii/（二○一六年七月七日浏览）。

# 第十五章　「这里没有未来」

「这里没有未来。」冉娜在二○○八年秋天时对母亲这么说。原因和金钱有关，那时冉娜正在和雷莎反常地争吵—为了赔掉的钱而互相指责。赚钱成了冉娜的志业。这倒不是说她想要成为超级富豪。她在这方面很像父亲：他们都喜欢享受美好假期和盛大派对，鲍里斯也很喜欢自己那间可以眺望克里姆林宫的楼中楼公寓，但相较于他的寡头朋友们所拥有的游艇、车队和多楼层酒窖，涅姆佐夫一家觉得自己还是一般人。冉娜喜爱金钱，一如她父亲喜爱物理；金钱能让她的头脑活跃起来。想赚钱的话，你必须敏捷而全神贯注，知道该在什么时机独排众议勇敢下注。在这层意义上，操作市场与从事政治恰好相反，这正是冉娜与鲍里斯的分歧所在：她喜爱前者，而父亲喜爱后者。

这项工作几乎毫无风险，也助长了冉娜的大胆。二○○七年，冉娜进入水星资本信託（Mercury Capital Trust）工作时，俄罗斯市场就只是不断成长，工作内容则比其他竞争者成长得更快一些。冉娜随时都在想钱的事。她开始为了准备特许金融分析师考试而读书。二○○七年底，俄罗斯市场达到歷史新高。

二○○八年八月，冉娜和季米特里正在泰国度假。莫斯科市场开始交易的时间，正是泰国的近午时分。冉娜会看一下，可能做些调动，然后去海滩。八月八日那天，她看到的情况让她以为某处的电脑系统一定当机了。俄罗斯股市正在暴跌。

其实就在两週前，冉娜已经见证过一次股市下跌。那天，普丁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会议，会议主题是金属工业的现况。其中一位金属业大亨缺席，普丁（这时官方职称只是总理）不太高兴。他表示，联邦反垄断局（Federal Antimonopoly Services）应当检查梅切尔集团（Mechel）的业务，该公司的多数股权持有者正是当天缺席的企业大亨。「或许就连检察总长室的调查委员会也应该研究一下，」他说；「我们得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指控该公司以低于市价的条件输出原料，导致国家税收蒙受损失。梅切尔集团的老闆当天缺席是因为住院治疗。「当然，生病了就是生病了，」普丁说：「但我们可能得派个医生过去，治好他所有的毛病。」註417

在普丁把霍多尔科夫斯基关进监狱，并没收其公司之后，他还没有像这样公开点名过某家公司或某个企业家。就在威胁发出的数小时内，梅切尔的股价在美国股市下跌三分之一。隔天一早轮到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开市时，该公司的股价在本国继续下跌。其他公司也随之下跌。俄国股市退回了四个月前的水准，而莫斯科的外匯兑换则损失了近两年的增

长值。註418

那时的情况很糟，但冉娜估计市场会復甦。她甚至不听雷莎的建议，没赶紧把所有金属公司的股票都脱手。这时她无视的还不只这些，她知道在理论上，当市场陷入暴跌时就应当卖出，但她无法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她没有卖出。她只是看着俄国市场崩盘。

就在那一天，也是俄罗斯对乔治亚开战当天，市场价值损失了超过百分之六点五。往后数日，随着市场持续下跌，情况变得很清楚，市场復甦遥遥无期。西方市场仍维持稳定或成长—即使次级房贷危机正在美国扩大。石油价格也维持不变。由此观之，这次崩盘显然是战争造成的。註419市场的跌幅与普丁支持度的涨幅恰成反比。正是这点让冉娜说出了「这里没有未来」。除了这件事，还有她和雷莎损失了她们所有的积蓄。

冉娜和雷莎相依为命已经将近六年了。二○○一年最后一天，也就是冉娜搬到纽约，然后又回国的那糟糕的一年，一通电话打来。雷莎接了电话。来电者报上姓名，她是卡佳．奥金佐娃（Katya Odintsova）。雷莎知道她是谁—她是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位电视名人，也知道她的长相：长长的金髮和一双长腿。她大约比雷莎小十岁。

「你知道吗？」来电者问。

「知道什么？」

「我和你先生有个孩子，现在还怀着另一个。」

「所以呢？」雷莎问。

「所以，有些事非做不可。」

「那么，我想你应该做些什么。」雷莎说完就挂断电话。然后她拨打冉娜的手机号码。雷莎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她的世代和社交圈里—包含下诺夫哥罗德略带波希米亚主义的知识分子、住在莫斯科的权贵与富豪—婚姻不必预设忠诚，尤其是男方，但出轨理当谨慎小心。这通电话、这个在下诺夫哥罗德跟她丈夫长得一样的小学一年级生、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鲍里斯的婚外情已经持续多年，以上全都撕毁了心照不宣的约定。尽管如此，雷莎还是对自己在整个通话过程中保持冷静感到骄傲。

当年还只是十七岁的冉娜，却完全不觉得母亲的矜持算什么勇敢，对这个局面也没有别种解读方式。她直接冲到父亲在国会的办公室，闯进门内，把她对他这个人和他的行为做何感想全都告诉了他。她离开办公室之后才意识到，她完全记不得自己说了什么，但绝对充满愤怒，而她当然说得没错。她要母亲离婚。父母两人都觉得走到这一步有点太激

烈了──她父亲完全不想去跟另一个孩子的母亲同居──但冉娜的话带着原则与确信，父母亲则是不确定和犹豫不决，所以她赢了。

两人分居了，即使他们不想费力去走法律程序离婚。父亲搬进了一间出租公寓，把花园环路的宽敞住所和一笔钱留给母女俩。在冉娜结婚之后，仍由母女两人共同管理的这笔钱，如今全都赔掉了。她们甚至缴不出花园环路公寓的管理费。唯一可能的解决方式是出租，但在这种经济状态下，又有谁会来租一间位于市中心，总面积一百八十五平方英尺，拥有四房的豪华公寓？

结果答案揭晓，是一位在国营银行工作的某人。金融危机期间，官股银行接管了衰败的小型私人银行。这个过程为国营银行的高阶员工带来了许多机会。官僚在接管过程中造成的混乱，以及接连引发的恐慌，使得侵吞资金变得轻而易举。一位国营银行员工在二○○八年以每月三千美元的租金承租了公寓。雷莎搬回下诺夫哥罗德，她和冉娜平分这笔钱，足够两人各自生活了。

冉娜得到了教训：这里没有未来。她没有多想这个国家的政治──克里姆林宫两度造成股票暴跌──但她思考的是，她生活在一个这种事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国家里。于是在二○一○年，她在公寓恢復原有价值之后坚持将它脱手。鲍里斯和冉娜不同，他不断谈论这个国家的政治，仍坚信俄国还有未来。他试图劝说冉娜在莫斯科买个新住处，但她坚持不肯。她把这笔钱留在身边，直到她看见一个机会：随着欧元区债务危机扩大，冉娜派遣雷莎到希腊、西班牙和义大利探路。然后她们一起旅行到义大利加尔达湖（Lake　Garda）畔的一个村庄，鲍里斯正好在那儿度假。他们决定在此地投资。二○一三年，冉娜和雷莎将出售花园环路大公寓所得的钱，投资在湖畔村庄的一间小公寓。冉娜开始学义大利语，这是她对未来的投资。她和雷莎一起在加尔达湖畔度过的那年夏天，她还没学会多少义大利文，她们就因为读不懂通知而被断电了。隔壁邻居出手相助，电力恢復了，冉娜和邻居很快就成为朋友。冉娜想像着自己有一天会定居在这里。无论如何，她和雷莎今后每年都会在这里度过夏天──这是冉娜的永恆，是她的未来，即使她还在莫斯科上班。

除了花园环路公寓，还有其他事物也在二○一○年终结。冉娜和季米特里离婚了。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对他人失去兴趣──对自己和妻子的朋友都一样──彷彿被关掉了开关一般，从活在当下变得心不在焉。然后她看见丈夫对自己也心不在焉，而她大概不该等他提出离婚。但他一提出离婚，冉娜就在当天搬走。她住进一间迷你旅馆──其实只是一条行人街上改装公寓里的出租房间，距离父亲早已不再上班的国会大楼只有一个街区远。

鲍里斯这时成了全职的政治运动者。二○○四年输掉选举之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会在政府关系（Government relations，GR）这项工作上名利双收。毕竟，他认识每个人，人人都知道认识别人是多么重要。官僚系统每年都变得更强大，法规不断改变，能在俄国政府的不透明结构中穿梭自如的人，就有能力拯救一家公司。鲍里斯在一家银行里当上了政府关系专员。但政府关系需要的外交手腕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坚持了一年，赚了些钱，买下了俯瞰克里姆林宫的楼中楼公寓，然后辞职。

他和卡斯帕洛夫及其他人组成团队，其中多数人完全不为媒体及公众所知。二○○八年，他们共同成立了一个组织，命名为「团结」（Solidarity），向一九八○年代波兰的反共抵抗运动致敬。他的朋友们都取笑他。这些人以前被称为寡头。如今在普丁统治下，他们放弃了政治势力，并将自己标举为妥协艺术与智慧的楷模。策略性妥协可以让一个人避免像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坐牢，或是流亡国外、全部财产都被剥夺。你将某些使用权或资产让给那些普丁想要提拔的人，放弃一点就能保留大半。够聪明的话，这些交易都以微妙的方式、用间接的语言协商。以上这些努力，使得鲍里斯的朋友们在向强大的一方退让时，觉得自己还算聪明。鲍里斯的行为却截然相反：他既不灵巧又鲁莽。他们取笑他的认真和幼稚。他也发自内心跟着大笑，因为冉娜知道，他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幼稚或认真。

二○○九年十月，鲍里斯五十岁了，他让冉娜负责举办生日派对。他喜欢授权，而她喜欢承担责任。她租了一间餐厅，那儿有着米色墙壁、白色桌巾和灰色绒布座椅。它面向一座高尔夫球场的绿色草坪，彷佛完全不在莫斯科。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出席，这是一群富裕而美丽的人。着名电视记者帕维尔．舍列梅特（Pavel Sheremet）制作了一部半小时的影片，名为〈涅姆佐夫：会计报告〉（Nemtsov: An Accounting）。片名仿效鲍里斯最近的工作：他开始编纂及出版报告书。他的第一本报告书于二○○八年二月印行──普丁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书名为《普丁：会计报告》（Putin: An Accounting）。这本薄薄的册子包含九章：

一、贪腐正在侵蚀俄罗斯

二、被遗弃的军队

三、道路破损失修

四、俄罗斯正在衰亡（论人口减少）

五、年金体系陷入危机

六、腐败的司法

七、践踏宪法（论取消选举及俄罗斯联邦构造）

八、「全国计画」的失败

九、尽人皆敌，中国除外註420

这份报告书并没有新的发现──书中大部分内容都取自其他人的报导──但这些资讯结合起来，就成了一幅毫不留情的景象，明显不同于克里姆林宫志得意满的报导，也不同于大众印象中那个更富强也更健康的俄罗斯。

鲍里斯的下一份报告书命名为《鲁兹科夫：会计报告》（Luzhkov: An Accounting），详尽记载了莫斯科市长尤里．鲁兹科夫（Yuri Luzhkov）将这座超大都会转变成私人采邑的种种行径。鲍里斯和团结组织的行动者在地铁站附近发放这些报告书。他们通常会架起一张摺叠桌，鲍里斯则为读者签书，以潦草的字迹写下题赠，同时在熟悉的群众仰慕中取暖。

影片里也出现了这些签书的片段、鲍里斯漫步在大街上、展现运动能力的片段──在俯瞰克里姆林宫的公寓练习室里操作一部椭圆训练机、在一处地点不明的海边玩风筝冲浪、在一座乡下房屋里拉单槓。这座房屋是他现任女友伊琳娜和他最小的女儿索妮娅同住的地方。影片呈现了他的所有子女（如今有四位），但省略了他们出自三个不同母亲的这件事。旁白说：「他拥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大家庭。」影片结尾，旁白对片名反悔了。他说，现在做会计报告或许还太早了。鲍里斯还没当上俄国总统，或许在二○二五年才会当选。註421

鲍里斯有钱有权的朋友们在影片中赞美他：他很有趣、他很勇敢、他很诚实。他们也参加了派对。接着，完成了这次或许在他们看来还清了友情债的致意后，他们都消失了。只有一个富豪──金属业大亨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二○一○年还出席了鲍里斯的五十一岁生日派对。说实话，自从鲍里斯在二○○五年离开跟政府搞关系的工作、成为全职运动者后，这些人就愈来愈不常拜访他。五十岁生日是他们最后也最精彩的一次努力。就连从前每星期都要到花园环路公寓的厨房喝几次茶的寡头弗里德曼（二○○一年冉娜从纽约回国，说她此举真是发疯的人正是他，因为「这里没有未来」），也早就对鲍里斯说过，和鲍里斯有瓜葛对自己的事业「有害」。他说，任谁都不会相信那些「会计」报告书不是由他资助的。註422

冉娜留意到，她父亲和运动者们相处，比过去和寡头们相处起来更

自在。他的老朋友们举手投足都是一副自己拥有全世界的模样；他的新盟友们则外表貌似羞怯，却又准备好战斗。他们穿着廉价的衣服，看起来总有些衣衫不整。其中一位工作是教导严重自闭症的儿童。另一位科学家则从一九八○年代晚期以来就持续在街头上抗议。还有一群戴着眼镜、髮型难看的瘦小男青年。鲍里斯和他们讲电话，详尽且重复地策划抗争时，总有着无尽的耐心，而这些抗争也只有他们会到场。冉娜在某个时刻理解到，她原先以为的耐心其实是欲望。鲍里斯很享受这些电话交谈、策划，以及小而孤立的抗争。策划与讨论的过程──和她记忆中鲍里斯尚未从政之前、在下诺夫哥罗德他们家厨房进行的政治讨论、乃至更早以前的物理学讨论流程完全一样──比起风筝冲浪和美酒，更令他全心投入，也更完整地支持着他。

*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冉娜和父亲一起上街抗议。一年半以来，行动者们在每个大月的三十一号那天，都会聚集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凯旋广场（Triumfalnaya Square）。他们的集会是为了要求政府遵守俄罗斯宪法第三十一条，保障人民的集会自由。他们有时遭到施暴，有时被拘留数小时。但警方近来似乎对他们稍加放任──或许是因为在前一年除夕，警方打伤了卢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Ludmila Alekseeva），八十二岁的她是俄国最老也最着名的社运人士。今年除夕，市政府甚至向这场抗议核发了许可，确保平静无事。阿列克谢耶娃规划穿着新年服饰再来参加，她要装扮成雪姑娘（Snegurochka）。註423它实际上是一场派对。鲍里斯提议父女俩一起去参加，接着再到乡下的伊琳娜家庆祝新年，也就是他被拍下拉单槓影片的地方。冉娜在洋装和高跟鞋外面多穿了一件羽绒外套，她的新朋友安吉莉卡（Angelica）也是，后者是一位保险公司员工，最近也刚恢復单身，他们一起前往凯旋广场。

「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是一场真正的派对。」鲍里斯后来在自己的部落格写道。

发言者都戴着红帽，阿列克谢耶娃完全展现雪姑娘的风采，她身穿一件闪闪发亮的蓝色刺绣长大衣，看来比她的体重更重。她的声音颤抖着，只讲了几分钟：

要是你们仔细想想，宪法赋予我们的所有权利都被夺走了，只有一个例外：出入境的权利……

因此为了宪法第三十一条站出来才会这么重要。因此我们能够连续第二次在这里，在凯旋广场集会而不受干扰，才会这么重要。

这是由那些倔强地在每月三十一日来到这里的人们所实现的，即使

他们都知道镇暴警察就在这里等他们来。註424

这一次现场没有镇暴警察—只有数百位抗争者，以及数十个看来百无聊赖而平静的警察。就在阿列克谢耶娃离开后几分钟，多数抗争者还在现场闲晃，用人们想让场子感觉起来更有实质内容的那种方式闲聊。这时镇暴警察却突然出现，冲向群众。冉娜抓住安吉莉卡的手，两人开始奔跑。一开始她们只跑了几码，躲到一个摊位后面，然后当冉娜四下窥视，看见警察把人们压制在地，拖上囚车，她们开始像生来第一次学会跑步那样狂奔。她们在五分钟内跑了一公里半，跑完了广场与下一个地铁站之间的距离。她们是怎么踩着高跟鞋办到的？

她们乘坐地铁回到冉娜才刚租用、暂时栖身的公寓。冉娜打电话给伊琳娜，告诉她鲍里斯被拘留了，他们无法出席。结果，冉娜才得知前夫季米特里也带着新女友出席新年派对。伊琳娜显然想要安排某种家族大团圆。这时冉娜对于自己新年这天躺在床上一边打电话，一边看着电视上有没有抗议活动的报导感到松了口气。电视上只字未提。

鲍里斯在新年当天从单独拘留中打电话来。两天后，他设法偷运出一张手写字条：

牢房是一间宽一点五公尺，长三公尺的水泥包厢。没有窗户，没有床或床垫。只有水泥地板，此外一无所有。

我被荒谬地以行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起诉，据说是违抗警察命令罪。最高刑期是拘役十五天……

不过当局有个问题：我被捕的过程有影片纪录，在影片中可以看到警察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对法律、假日，以及我们的抗议获得许可全都无视。我知道他们就只想惊吓我们。他们想要惊吓反对人士，还有我的家人。这是我女儿冉娜第一次参加抗议，让我非常骄傲。

我知道政权害怕了。它很愤怒，而它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反对人士。它害怕了，乱挥乱动，为它自己和俄罗斯带来耻辱。此时我们没有权利放弃。我们不会放弃。

朋友们，新年快乐！

鲍里斯在一月三日出庭受审。这时俄罗斯人人都在放假—这是新年与正教圣诞节之间的死寂週（dead week），包括证券交易所及所有银行在内，所有机关行号全部休息—但有个法官得来上班，她是个和冉娜

差不多岁数的女人。冉娜当然到场了，安吉莉卡也来了，即使她经歷过这一切；而运动者们在走廊上席地而坐的景象——为了阻止他们前来而故意把椅子撤走——与安吉莉卡所能想像到的一切完全不同，她这时也亲眼看到了。座椅短缺的危机似乎普遍存在于法院之内，整个法院只有被告席有一张椅子，而在水泥方格里待了三天的鲍里斯，这时则站了四个小时，因为他的辩护律师是位老人，有权坐下。法官传唤了十多位证人，完全不管他们回答些什么，然后宣读判决，说得又快又轻柔，没人听得懂。鲍里斯被判拘役十五天。

冉娜回家为父亲煮饭。她想宠溺父亲，于是做了自己所能想到最花俏的一道菜：洋李干拌炒鸡肉。但当她隔天携带这道菜到拘留所时——由一位崇拜名人、异常友善的警察带着父亲前来大厅与她相会——鲍里斯却向她坦白，监狱生活让他只想要简单的食物：农民吃的肉和马铃薯，还有苏联时代的零食糖果。

服刑期满，冉娜带着换洗衣物来接鲍里斯，他们直接去吃晚餐。她听他说监狱里的故事。他在牢房里和另外五人共度了两星期，其中三人是长期服刑的暴力罪犯，另两人由于行为不检而被捕。他让这些人全都开始关心政治。註425这时他开心大笑，陶醉于自己新得到的英雄地位。冉娜则对他说，她不是英雄，在有生之年，她绝不会再去参加抗议。她当然还是会支持他的工作。她说从今而后，报告书的出版由她出资。

当他们走出咖啡馆，有两个年轻男人冲向鲍里斯，试图用一张捕鱼用的大型抄网罩住他。鲍里斯转过身来，设法推开了其中一个袭击者。这种事至少已经持续了三年。回到二○○七年，在西伯利亚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鲍里斯反过来用攻击者的武器捉住了他，那是个长着粉刺的瘦小孩子，他坦承自己大老远从莫斯科飞来，就是为了羞辱这位政治人物，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克里姆林宫组织的任何青年运动成员。註426二○一○年，三个年轻男子在索契把氨水泼在他脸上。二○一一年，就在渔网事件之后几个月，又出事了：有人在莫斯科从墙外把一个马桶丢到他的车顶上。警察到了现场，但拒绝立案。註427冉娜始终无法想像，父亲怎么还能如此保持冷静。

*

玛莎则是在莫斯科说出「这里没有未来」的，那时她从一位小儿神经科医师的办公室走出来。萨沙当年四岁，但他还不会说话。他接受过各种评估、脑部扫描，以及要把管线插在他金髮脑袋和整个小小身体上的各式各样检测。医师们说他的脑部看起来不妙。他们说看到了液体，而应该小的部位看起来较大、应该大的部位看起来比较小。玛莎多少相信他们的话，因为事实上萨沙就是不会说话，她首先是为了这个理由带

他来做检查的。同时她却又不相信他们。她的儿子不只是她生下的宝贝，他也是她的朋友。他们做什么都在一起，像是一起在泳池游泳；当她请求他帮忙，他也总是乐意—就连她在土耳其一处全包型度假村，半开玩笑地要他到开放式酒吧帮她拿杯酒也不例外。她把这件事说给所有人听，不只因为它很有趣，更因为它确切证明了儿子的脑袋没问题。因此，她多半不相信医师。

而现在，这位她努力了好几个月想要排队挂号、却又害怕见到的着名小儿神经科医师，浏览过萨沙的病歷，其中充满了要命的检测结果和专家意见；她检查了萨沙，然后说：「你的孩子没有问题。」她接着说：「你做的每件事都没错。继续做下去就好。把这份病歷扔掉。」她把厚重的活页夹还给玛莎。

玛莎完全听懂了医师的意思。萨沙身上堆积如山的那些诊断，意味着他绝不可能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要是玛莎不想让他被转到心智障碍的轨道去，就得销毁他的一切医疗纪录，贿赂某人重做一张可信的新病歷，然后确保他到了一年级入学的时候，已经能和其他六岁半的孩子一样正常说话了。

或者，她有可能是稍后说出「这里没有未来」的，当谢尔盖表明这不是他想要的。一个不会说话的四岁孩子，别人对此提出的一切问题，还有玛莎从网路上找来、据说能修好这个残缺男孩的所有练习与活动—谢尔盖再也无法忍受。他有了另一个女人，现在要去跟她同居了。

或许玛莎也不是在那时说出「这里没有未来」的。或许她那时真正说的是：「好啊！赡养费拿来。」她存了很大一笔钱，至少十万美元，在这张安全网与赡养费之间，她得以辞去工作，攻读教育学研究所。她有个计画：她要找一所好学校当老师。那样一来，萨沙也能去就读。她的工时会很短，让她能给予萨沙所需的关注。

在二○一○到二○一一学年间，萨沙学着说话，但玛莎几乎什么都没学到—除了得知莫斯科不是个教导小朋友的好地方，即使她就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学位。还有其他事物是她觉得莫斯科乃至全俄罗斯都不可能发生的：一个新丈夫—她将近二十七岁，还有个孩子，因此这件事早有定论—以及让萨沙接受好的教育。她构思出一个塔蒂亚娜也会同意的计画，或许这正是它显得不证自明的理由之一。她要到牛津大学研究教育心理学，然后在英格兰成为科学教师。但在她当上教师之前，萨沙会得到成长发育所需的良好环境。她也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玛莎这样的母亲可以在那儿求援，而不是非得伪造孩子的医疗病歷—才能让孩子的未来有一丝可能。她做了所有必要的测验，也让萨沙加入一个英语幼儿班—他现在的说话能力已经足够开始学习第二外语了。

谢尔盖说不要。他不愿意签署让她带萨沙出国所需要的文件。她就在那时想到「这里没有未来」。没有未来了。

註417：“Putin prigrozil ‘Mechelu’ zachistkoy,” Interfax, July 24, 2008, http://www.interfax.ru/business/23352（二○一六年七月八日浏览）。

註418：“Zayavleniye Putin obrushilo aktsii ‘Mechela’: Takikh zayavleniy ne bylo so vremyon YuKOSa,” newsru.com, http://www.newsru.com/finance/25jul2008/mechel.html#7（二○一六年七月八日浏览）。

註419：“Voyna v Yuzhnoy Osetii vyzvala obval rossiyskogo fondovogo rynka,” newsru.com, August 11, 2008, http://www.newsru.com/finance/11aug2008/rtsobval.html（二○一六年七月八日浏览）。

註420：Putin: Itogi, February 2008, http://www.putin-itogi.ru/putin-itogi-pervoe-izdanie-doklada/（二○一六年七月九日浏览）。

註421：Nemtsov: Itogi, film by Pavel Sherem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QEUBLkxcE（二○一六年七月九日浏览）。

註422：Mikhail Fishman, “Mikhail Fridman: ‘Ne tak mnogo ya vstrechal lyudey, kotoriye mne blizki v zhizni,” Slon, undated, https://slon.ru/special/nemtsov/fridman（二○一六年七月九日浏览）。

註423：编按：雪姑娘是冰霜老人（Ded Moroz）的孙女，圣诞老人从苏联传统中改头换面的世俗版本。

註424：Boris Nemtsov, “Novyi God v odinochnoy kamere,” Echo Moskvy, January 2, 2011, http://echo.msk.ru/blog/echomsk/738807-echo/（二○一六年七月九日浏览）。

註425：Boris Nemtsov, “S Rozhdestvom!” blog post, January 7, 2011, http://b-nemtsov.livejournal.com/2011/01/07/（二○一六年七月十日浏览）。

註426：“Okhota nachinalas’ s sachka: Boris Nemtsov v Krasnoyarske, 2007 g.,” https://kinostok.tv/video/490936/ohota-nachinalas-s-sachka-boris-nemtsov-v-krasnoyarske-2007（二○一六年七月九日浏览）。

註427：Andrei Polunin, “Boris Nemtsov: Mne plesnuli nashatyr’ v glaza, no ya uspel dobezhat’ do umyval’nika,” Svobodnaya pressa, March 23, 2009, http://svpressa.ru/politic/article/6227/; “Na avtomobil’ Nemtsova brosili unitaz,” lenta.ru, June 10, 2011, https://lenta.ru/news/2011/06/10/unitaz/（二○一六年七月九日浏览）。

# 第十六章　白丝带

玛莎不是唯一一个计画移民的人。她有一个朋友也决心要就读柏林的洪堡大学。另一个朋友则跟随玛莎的脚步──更准确地说，玛莎说服了她申请牛津大学。二○一一年五月，第一位朋友启程前往德国，第二位朋友也去了英国。玛莎还有一位密友，但她们刚吵过架。玛莎开始计算自己更大的交友圈，结果意识到多数人都已经先离开了，前往西方名校或不太有名的大学攻读研究所或博士后。就连她的前夫谢尔盖也在美国读过研究所。这时他（稍微）软化了，告诉玛莎他会同意让她出国读书，并带着萨沙去，只要是暂时的就行。玛莎报名了马尔他的一间社会学夏日学校。学校很有趣，岛国又小又拥挤。日復一日从头上飞过，前往轰炸利比亚的军机，则提醒了玛莎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充满政治、人群与热情──但她在夏季结束时得返回莫斯科。她不知道自己回到莫斯科要做什么。她只知道一件事，她不想再当掮客处理回扣与贿赂。

九月时，她试着成为家庭主妇──单亲妈妈也可以是家庭主妇。她的工作是接送萨沙去上空手道、绘画、小提琴，以及英语幼儿班。在空手道和绘画课上，其他母亲会花上几小时讨论为丈夫打包午餐最好用的容器。小提琴课则只有玛莎一人等候。英语幼儿班的母亲们则更有趣一些（其中有几位记者），但她们多数时候还是在享用可颂面包和卡布奇诺之余闲聊，然后各自埋首于笔电或出发上班，把孩子留给保母来接。

九月二十五日，幼儿班的母亲们都被激怒了。就在前一天下午，普丁和梅德维杰夫发表联合声明：梅德维杰夫预定在隔年三月举行总统选举时，将总统职位交还给普丁，他自己则重回总理一职。「你能相信吗？」母亲们互相询问：「他们现在甚至连个样子都不做了。」她们的意思是指选举的表象。玛莎并不太震惊。但她大受打击。她只能想到，现在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国家了。每一个人。

到了晚上，萨沙入睡之后，玛莎在Skype上和洪堡与牛津两个最好的朋友一同打发时间。她们同步在网路摄影机前打开酒瓶。玛莎的朋友们在做学校的功课；玛莎则在网路上漫游。

她正是因此得知了弗拉基米尔．马卡洛夫（Vladimir Makarov）的案件。起初看来令人难以置信。在读过她所有能读到的资料之后，她知道这是真的，但她还是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理解。一个无辜的男人被控猥亵自己的女儿而入狱多年。

*

弗拉基米尔．马卡洛夫是一位年轻公务员。他在二○○九年搬到莫斯

科，任职于市府交通局。他把出租公寓打点好之后，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也前来团聚。二○一○年夏天，马卡洛夫的七岁女儿从家中的攀岩墙摔落，断了一根椎骨。一位检验师认为自己在女孩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时採捡的尿液样本里发现了精虫痕迹。一名护士向警方报案。同一份样本随后接受的检测都无法确认结果，体检也没有发现性侵迹证，无论是小女孩、母亲还是其他任何人，也都不曾提出明确的证词可以指控马卡洛夫。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监禁，先被审前羁押一年，再以性侵亲生女儿的罪名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註428

他提出上诉，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莫斯科市法院将控罪从强暴降格为猥亵行为，刑期则减为五年半有期徒刑。註429这大概是整个恶劣故事里最坏的一刻：法院取消了强暴控罪，从而否认了整个案件的唯一根据──「据称」在女孩尿液中发现的精虫痕迹。即使是这样，这个没有犯下任何过错，且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一年的男人，还得再继续坐牢四年。为什么？

正因为是这样。在美国接受教育、研究执法部门多年的俄国社会学家艾拉．潘妮亚赫（Ella Paneyakh）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最可怕的事如今发生了〉（And Now the Most Frightening Thing of All Has Happened）。文章开头这么说：「一如习惯，灾难总是袭击我们最无法预期之处。」潘妮亚赫以「红轮」（Red Wheel）一词指涉辗压马卡洛夫的那股力量。《红轮》来自作家亚歷山大．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创作的三部曲书名，他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叙述俄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摧毁的故事。潘妮亚赫运用这个词指称俄国的执法部门。她的论点在于，执法部门本身同样是不可阻挡的灾难：

它完全忘记了遭遇抵抗是怎样一回事。它缺乏内建的妥协、退却功能，甚至说不出「细查证据后予以开释」这样的话。可用于这一目的的一切机制，早已因闲置不用而朽坏。事实上，这部机器面对抵抗的唯一可能回应就是镇压。註430

换句话说，马卡洛夫一旦被错误地怀疑性侵女儿后，他的命运就注定了。他对抗控罪的一切尝试──要求进一步检测、进行彻底辩护、再对判决提出上诉──只是让执法机器更不留情地追究他。

这不是新的机制。执法机关和法院长久以来都是这样运作──事实上，它们在苏联时代就是如此，而这套体系在一九九○年代过后从未遭到拆解，只是弱化而已。但在后苏联时期的多数时候，惩罚力量几乎只

用来对付某些被明确定义的人群：捲入产权纠纷的企业家、被选定的政治人物（他们多半也是涉及产权纠纷的企业家），以及激进的政治运动者。换言之，人们唯有在冒险进入政治领域之后，才有被红轮辗压的危险。潘妮亚赫写道，如今的改变在于「国家再次找到了时间、手段与精力，将触角伸入个人的私生活—比起一般人愿意让国家深入的程度……深得多了。」这个过程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多数的俄罗斯人都没有注意到—部分是因为他们已习惯认为自己与国家并不相干。

在人们不曾留意之际，国家开始控管人们的饮食——再基于政治的理由推行看似随意的规定—像是禁止乔治亚酒类进口，或禁止拉脱维亚的鲱鱼。管制机构总是以必须保护人民不受潜在危险物品危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

国会正在讨论禁制堕胎。它已将药物法规加严到就连严重疼痛登记在案的病人，都几乎不可能取得止痛药的地步。俄国监狱中的一百多万受刑人，大约有一半因触犯药物相关罪名而服刑，因为就连微不足道的量都有可能让人被判刑。随着新法律不断累积，为数不多的政治讨论则以保护儿童的需求为重心：保护儿童不受药物、堕胎，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免于恋童者的危害。玛莎记不得自己第一次听说恋童癖的威胁是什么时候—那听起来就像是始终存在于环境中的背景噪音。

*

廖沙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着恋童癖威胁如何形成。他在大学毕业论文里写过这件事。彼尔姆重要的工厂老闆和政治人物，也是统一俄罗斯党党员伊戈尔．帕斯图霍夫（Igor　Pastukhov），在二○○三年先是被控性侵一名十六岁男孩。不久，指控被撤销，控告这名政治人物的原告似乎也消失无踪。但在二○○五年，第二位青少年出面指控。彼尔姆当地的传闻认为，地方上另一位势力强大的商人炮制了这起案件，以摧毁帕斯图霍夫的名誉。但廖沙见到了多位男青年，他们也说自己有过同样的遭遇。帕斯图霍夫的手下惯于在「巡游」（cruising）区域的里外周边，猎捕年龄幼小的男子，要不是引诱他们上车，引诱不成就强押，送给帕斯图霍夫及其友人加以性侵。

帕斯图霍夫受审时，彼尔姆的报纸头条写着「同性恋游说团突袭彼尔姆」、「玻璃们（Faggots）自以为凌驾于法律」，以及「当局最好为他们矫正性向」。审判庭上提交的些微证据全是间接证据，指控帕斯图霍夫的原告也从未现身。帕斯图霍夫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註431廖沙在论文里费力描述帕斯图霍夫案。一方面，这场审判是在歪曲司法正义。另一方面，廖沙确信帕斯图霍夫真的犯下了这种罪行。然后是媒体报导的问题，他们将恋童癖和性暴力等同于同性恋。后来，廖沙学会了将这

些事实与观念彼此区别开来。俄国法庭听信检察官的说法，对稀少的、不成立的证据，甚至毫无根据的证据都照单全收，但这并不表示被判有罪的每个人都是无辜的—这只意味着包括犯罪者在内，没有人接受过公正的审判。而在这起案件中，帕斯图霍夫受到的指控包含同性性行为，这令媒体兴奋起来。毕竟性侵女孩或少女的类似暴行，更有可能被当成权力的正常展示。比方说，普斯科夫（Pskov）的一位银行老闆和政治人物伊戈尔．普洛夫金（Igor Provkin），六年之间被好几个不同的年轻女性指控性侵。他终于被提起公诉，是因为在莫斯科市中心引诱一名年轻女子上车，并在车上加以强暴。他表示认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并得以缓刑。媒体对这起案件关注甚少。註432

到了二○○八年，廖沙完成论文口试的隔年，恋童癖威胁在大众话语里成了老生常谈。杜金嗯吁俄罗斯男人一看到恋童者立刻杀掉。而在圣彼得堡，退休拳击手亚歷山大．库兹涅佐夫（Alexander Kuznetsov）因为杀害一名十九岁男子而被起诉，他宣称撞见这名男子企图性侵他的八岁继子。企图性侵的任何证据从未呈堂，但这位拳击手（即使前科累累，却未曾受到羁押）却立刻成为名人。「他在圣彼得堡的街上难以行走，」《消息报》（Izvestia）报导：「人们一直叫住他，要和他握手，并请他签名留念。」註433杜金对记者说，他支持库兹涅佐夫。「他为自己的孩子挺身而出，」他说：「我相信所有俄罗斯人，所有正常人都应该採取同样行动。要是你看见这样的罪行发生，就应该制止。要是有办法干掉那个恶棍，那就有必要先把他干掉，随后再处理掉。这是我们能够改变大众舆论，让立法者们回应的唯一方式。」註434引用杜金言论的这篇报导题为〈如何对付恋童癖：死刑还是阉割？〉这显然是提议辩论的用语—辩论的设计方式则近似于苏联时代，「关切的社会成员」要求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人（像是全世界锡安主义阴谋的成员，或作家鲍里斯．巴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採取限制措施，国家机器则应允。

库兹涅佐夫仅仅入狱服刑一年多。註435他在二○一○年获释时，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群国会议员提出一项法案，将性侵儿童的性犯罪刑度提高。这项法案起草得太过仓促，以至于对同一罪行具体要求的新刑责在不同段落有所出入。註436法案因此受到延迟，这使得国会家庭委员会主席叶莲娜．米兹丽娜（Yelena Mizulina）指控统一俄罗斯党内窝藏着「恋童癖游说团」。米兹丽娜本人是公正俄罗斯党（A Just Russia）党员，这是克里姆林宫最新制造的政党，模仿民粹主义的选举替代选项。统一俄罗斯党则反驳说，政界最近一桩恋童癖丑闻，正是涉及一名公正俄罗斯党党员（这是伏尔加格勒〔Volgograd〕一名国会议员助理的案件，他在警方前来逮捕时逃逸）。不管是哪个政党在发言

（也不管它在怪罪哪个政党），国会里都形成了一种共识：议员中间有个「恋童癖游说团」阴谋破坏保护儿童的努力。一位共产党籍的国会议员哀叹，她的许多同事都落入一个「强大的性变态秘密组织」网罗之中。註437

恋童癖指控在政治战场上成了强而有力的武器。在国会议员彼此大肆指控之际，政治学家安德里亚斯．乌姆兰发现俄国和乌克兰媒体都在报导他被控性侵儿童的消息。报导里充满了乌姆兰法律问题的细节描述，但所有内容全是虚构。乌姆兰追溯到最早的报导来自一家俄罗斯网路新闻，由此，可再回溯到杜金及其欧亚运动所使用的网际协定位址（IP address）。註438

杜金的媒体自从乌姆兰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将杜金的运动比拟为纳粹主义以来，就一直在攻击他。「德国的多数自由派社会学者都是同性恋，」一篇评论乌姆兰的文章写道：「正如我们所知，其中百分之六十感染了爱滋病毒。问题来了：患有爱滋病的同性恋凭什么教导我们谁对谁错？」註439后续的另一篇文章则宣称：「有恋童癖倾向的乌姆兰，已经因为对同事进行同性恋勾引，而被史丹佛、哈佛及牛津等大学开除。」註440

俄罗斯国会里忙于征战的议员们，始终不曾设法釐清法案文本中的矛盾之处，于是克里姆林宫提出了自己的法案版本。提高性犯罪刑度的立法在二○一一年秋天通过。註441性侵累犯如今可被求处终身监禁—俄国任何犯罪行为所能判处的最高刑罚—但斗士们还是不满意，继续坚持要化学阉割。新法律引进了一个新概念：罹患恋童癖的人。被诊断出恋童障碍的被告，如今必须强制接受精神治疗。精神科医师则必须接受训练，让他们得以诊断出「恋童性倾向」。註442指令传达到了全国每一家精神科诊所。註443大型精神病医院指派医师前往莫斯科的谢尔布斯基社会及法医精神病学中心（Serbsky Center for Social and Court Psychiatry）参与培训课程，该中心曾是苏联时代异议人士被送去接受惩罚性治疗之处，因此恶名昭彰。谢尔布斯基培训课程的学员受到教导，不同种类的性变态通常会被一起诊断出来—比方说，恋童癖经常与同性恋有关。註444

甚至当国会还在辩论反恋童癖新措施时，警方就已经加强执法。二○一一年七月，内政部长报告，执法部门正在追究一百二十八件不同的案件它们涉嫌在网路散播未成年人色情图片，这只是今年一月到三月的数字，而这个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积极的公民也开始追查恋童者。沃罗涅日（Voronezh）一名二十一岁的大学中辍生，全职投入这场猎捕行动。安娜．列夫琴科（Anna

Levchenko）自称在六个月内确认了八十名恋童者的姓名及网路位址。「儿童性侵案件在去年几乎增加了两倍。」她在「livejournal.com」的个人首页上宣称。接着是一篇充满粗体字重点标示的宣言：

恋童者什么都不怕，谁也不怕……他们到处存在。他们很团结。共有数十万人……他们向整个世界张开网罗。他们挑战我们整个社会，还嘲笑我们。他们想要告诉我们，谁都不可能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他们危害。我会证明他们错了。要是执法机关不能处理，社会自己就要振作起来保卫儿童。我在网路上确认恋童者，蒐集他们的罪证。我确保他们被刑事起诉。我和一群理念相同的人们携手合作。我们每星期撰写数十份报告。每天都有数千人阅读我的部落格。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捉拿杀害孩子的凶手……唯有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的努力才能打败这个威胁。你提供的任何支持，都会帮助我们拯救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并防止新的犯罪。註445

列夫琴科自行发展出一套诱捕手段，接着训练其他年轻人运用。她在二○一一年夏天参加了在谢利格尔湖举行的克里姆林宫青年训练营，并被安排觐见梅德维杰夫，向他报告自己的工作成果。她告诉总统，自己的运动有三百位志工参与。梅德维杰夫赞扬列夫琴科的努力，并提议在联邦中央的犯罪防治单位—调查委员会—特设反恋童癖计画，将她的团队整合进来。总统办公厅儿童权利专员帕维尔．艾斯塔霍夫（Pavel Astakhov）大概是害怕被排除在外，立即向列夫琴科提出一份助理职缺，即使不支薪。註446

马卡洛夫案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展开的。

*

谢廖沙不太确定自己第一次听说这个案件是什么时候—二○一○年，他才从基辅搬回莫斯科没多久—但从某个时候起，他对这个案件着迷了。目前没有其他说法，他得知道一切。关于这个案件的每篇报导他都读过几遍，确定自己掌握了每个细节。他也因此开始阅读《新报》（Novaya　Gazeta），这份莫斯科週报专攻人权议题及调查报导。该报已经有几位记者遭到杀害，包括报导车臣问题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虽然谢廖沙听说过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杀一事，但他却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这家报纸存在。他加入了一个名叫「马卡洛夫案」的网路社群，下载了其他成员提供的每一份文件，并撰写详细的评述。不必花多久时间就可以理解罪名全是假的，但谢廖沙还是觉得，这些文件可以釐清某些事。有一项基因研究，由一位参与过沙

皇家族遗骸鑑识的科学家进行—应当有些重要性，对吧？这位鑑识遗传学家的结论是，尿液样本中没有任何性交的迹象。但这项研究不被採纳为证据。最终，法庭唯一认可的专家意见出自一名年轻的心理学家，他要求疑似的受害者画一头不存在的动物—心理筛检测验中常见的操作—然后得出结论：这只有着不成比例的毛茸茸大尾巴黑猫，暗示了女孩曾被猥亵。

谢廖沙也尽力去瞭解马卡洛夫一家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彼此相爱也爱女儿。马卡洛夫和女儿共度的时间，多过典型的俄国父亲。但这不知怎么地让整个案件变得更悲惨。谢廖沙没见过多少像这样看起来单纯、幸福出自直觉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却被摧毁了。而这个小女孩，这个所有检察官、警察和心理学家据说全都试图保护的女孩，也同样被摧毁了。

谢廖沙一开始阅读《新报》，就察觉到这个案件其实并不罕见。报上刊载了许多篇关于谢尔盖．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的报导。二○○九年，这位会计师在莫斯科一所监狱中被凌虐致死。他的前雇主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英国金融家，这位金融家自行展开调查，明确得知了马格尼茨基无意间得罪了侵吞国家资金的掌权高官，因此他被关进监狱，并遭杀害。这个故事让人非常难受，但多少说得通：马格尼茨基妨碍了权贵侵吞公款。但马卡洛夫不曾妨碍过任何人。他的人生和家庭被摧毁，只因为医院工作人员奉命要密切注意恋童者，也因为红轮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就是这样而已。谢廖沙的感受正如他看完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电影《在黑暗中漫舞》（Dancer In The Dark）之后的感受，电影中也有个无助的女人被诬指犯罪，最后被处决。这部电影让谢廖沙身体不适好几天。马卡洛夫案却发生在真实人生中。必须设法做些什么，不是吗？

*

马卡洛夫案网路社团的其中一位成员写到，申请示威抗议需要三个人。玛莎打电话给他—歷经一番调查工作才得知他的电话号码。她想要志愿报名并提供时间。这时是十一月下旬，她已经成为单亲家庭主妇将近三个月，她得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她聘请了一位保母，正要开始找工作，但目前来说，她对抗议活动可能派得上用场—即使她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抗议是徒劳的。

那个男人对于抗议的计画始终没有成真。马卡洛夫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得到终审判决—五年半有期徒刑。一星期后，有个旧相识打电话来，那是当年参与过抗争青年团体「防卫」的某位成员，当时玛莎想加入，但谢尔盖反对；对方邀请玛莎参加一场抗议。这场抗议是关于选举的，

而非马卡洛夫案，但玛莎去了。

国会选举就在前一天举行。按照惯常的设定，由四个政党参加：普丁的统一俄罗斯党、克里姆林宫的傀儡民粹主义者—公正俄罗斯党、共产党，以及自由民主党。国会中的共产党、自由民主党都在投票中与统一俄罗斯党意见相当一致，至于人数少到不足以影响结果的公正俄罗斯党，则偶尔批判克里姆林宫—比方说，像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保卫孩子、不受想像中的恋童癖游说团危害的运动。任何批判总好过完全不批判，玛莎固定浏览的许多部落客也都投票给公正俄罗斯党。按照官方计票结果，公正俄罗斯党的得票率只略高于百分之十三，在国会四百五十席里可获得六十四席。统一俄罗斯党将会继续掌控过半数席次，即使席次不像前一届国会那样多。 註447

重点与其说这些熟面孔按照惯常比例分配了选举结果，倒不如说这种可预测性本身—克里姆林宫不允许任何生面孔参与选举，因此选举无须作弊。但选举还是被操弄了。投票箱遭到灌票，得票数被篡改、不存在的投票所回报票数，义务役军人则经常一大早被巴士载来投票。甚至这一切也无关乎谁当选国会议员，因为国会的存在照例就只是为了批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但这齣邀请你上臺千分之一秒、却不让你开口的烂戏，更是一种侮辱。国会选举同时也是预定在二○一二年三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之预演，这次选举又会照例通过普丁重返总统大位。

玛莎穿得漂漂亮亮去参加示威。这是在三个月单亲家庭主妇生活后第一场社交活动，因此她穿了高跟鞋。天空下着雨，举行抗议活动的公园地面，很快就在数千双脚下成了一团噁心的黑色烂煳。玛莎的鞋跟在下沉。她发现自己和一群身穿毛皮大衣的女人站在一起，或许她们也觉得天气会更冷，但她们要站在这里喊口号（或是做人们在这些场合会做的事）好几个小时。或者她们就想盛装打扮。不管怎样，这时她们的毛皮大衣都被雨淋溼了。没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演说，但她们听不见也看不见演说的人。

「你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吗？」玛莎问。

「不知道。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那些毛皮大衣溼透的女人回答。

这时终于有个演说者声音够大了。那是阿列克谢．纳瓦尼（Alexei Navalny），玛莎一直都在阅读他的部落格。他写文章讨论贪腐。许多人都这么做，包括涅姆佐夫在内，但纳瓦尼有个技巧，他从可被公众取得的资料中发掘，反覆揭露两种最令人震惊的交易。首先，俄罗斯政府在最简单也最便宜的事物上花费荒唐的金额，例如厕所。此外，俄国官员名下拥有的房产和车辆，按照他们的公职薪资是绝对买不起的。玛莎

对这一切如何运作再清楚不过，因为直到不久之前，她都是贪腐供应链的其中一环，但她读他的部落格毫不厌倦。然而，这让她同时感受到两种相反的情绪：愤怒，因为纳瓦尼讨论的是她的纳税钱；以及羞耻，因为他所描述的这个体系，她也参与其中。他将这个决定了俄罗斯运作方式的体系称为「骗子小偷党」（Party of Crooks and Thieves）。

纳瓦尼带领一群人高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或者他试图如此——看来只有数百人跟着喊，声音很快就减弱下来。然后他大吼：「我们去卢比扬卡！」

卢比扬卡是十五分钟步行距离之外的广场，那儿曾经树立着捷尔任斯基的巨大铜像，如今仍是联邦安全局和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所在地。玛莎不确定纳瓦尼的目标是其中哪一栋建筑物，但她确定自己不想跟着游行。至少不想穿着高跟鞋游行。玛莎往地铁站的方向走，但有数千人也朝着同一个方向—地铁会比尖峰时刻更挤。她向左转，走上了通往卢比扬卡广场的米亚尼茨卡亚街（Myanitskaya），同时意识到她已经成为纳瓦尼游行队伍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她走在有意参加游行的一群人中间。但这群人被镇暴警察抓住、扔去撞墙或压制在地，然后沿着潮溼的街道拖行。玛莎把身体紧贴着一栋大楼的墙壁，并贴着墙壁蹑手蹑脚走到下一条小巷，然后隐身进去。

她收到安娜塔西亚（Anastasia）传来的简讯，那是邀请她前来参加抗议的朋友。安娜塔西亚在一家咖啡馆里，恰好就在这条小巷的巷尾。这时玛莎快步前行。她闯进咖啡馆里—是个低调的潮人小店—玛莎甚至不知道莫斯科有这种地方存在。

「我要到哪里报名成为行动者？」这其实不是问句。「因为外面发生的事完全烂掉了！」

安娜塔西亚说，听说明天预定还有一场抗争，在凯旋广场。

「我去。」玛莎说，语气彷佛在对安娜塔西亚和她的朋友发出威胁。

*

冉娜从电视上看到了这场抗议。她知道这有多么不寻常。她此时就在电视台工作。她刚成为交易员的时候，就开始收看RBK电视台，这是一个有线电视财经新闻频道。所有交易员都收看这一台。在那儿工作的人都是金融天才，他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十五分钟，现场进行数字即兴接龙，这让冉娜觉得他们知道这世界的运作方式，也想要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当她正在准备特许金融分析师考试时，也有考虑去RBK求职。最后也如愿以偿了。一开始，所有人都确信她能加入只是因为她有个名人父亲。她实际上偶然听过一位高层主管向另一人评论：「愚蠢的名人女儿

并不以通过特许金融分析师考试闻名。」但在几个月后，她获准进行现场直播，在节目中即兴接龙数字。这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天才。

RBK是财经新闻频道，但它仍是俄国电视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现场直播抗议行动简直不可想像，但这时它们就在重要的国营频道—第一频道上播送。冉娜心里感到一阵剧痛：为什么她不在那儿？

她知道原因。她在父亲被逮捕时逃离警察追捕的那次经验就够她受了。而且她还想结婚。自从冉娜离婚以来，再婚就一直是她的目标，而她对这个目标专心致志，一如追求在RBK工作一样。离婚之后几星期，她就开始和某人约会，这人正是她想要结婚的对象—她经常告诉他这点，每当她没提到一起生下孩子的时候—即便她很坚持，可他无动于衷。但同时，他是那种想要两人当下一起共度的男人。就在莫斯科城外的一个乡村俱乐部，电视机开着……他不是那种会欣然接受冉娜抛下一切、亟欲赶回城里参加抗争的那种男人。她心无旁骛，抛开了参加抗争的念头。

她的父亲在现场，站在冷雨之中。为这场抗议取得许可的正是他的组织「团结」，一如过去五年来数十场抗争那样。先前状况好的时候，那些抗争会有数百人参加。因此当他们为两个礼拜后的抗议提出申请—预期选举会为抗争提供好动机—他们在文件上写到预计将有三百人参加。他们做的是乐观预估，即使天候恶劣、十二月的业务清算期（December　wind-down）也已经开始。结果，按鲍里斯的估计，当天有一万人前来参加。警方的估算则是三千人—仍比许可通知上的人数多了十倍。其中一位瘦小、戴眼镜的团结组织运动者，名字也在许可通知上的伊戈尔．古科夫斯基（Igor Gukovsky）由于人数不符而遭罚款，还被另行监禁十五天。但他被捕一事并未引起多少关注，就连参与抗议的人们也没有关注，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过他。抗议人士中最知名的纳瓦尼，以及「防卫」运动领袖伊利亚．雅辛也被监禁十五天，在米亚尼茨卡亚街上被逮捕的数十人也是一样。警方在那一夜总共逮捕了将近七百人。或许是因为法庭和拘留设施无法同时应付这么多人，大多数被捕者在只有站立空间的牢房里度过一夜之后，都被允许回家。註448

*

谢廖沙在《新报》的网站上读到了预定的抗争讯息，但他无法参加，因为他所撰写的一个应用程式正在交件期限。但他一读到现场发生的事，就决定隔天要去凯旋广场。人们必须要求政权遵守规矩。谢廖沙是个现实主义者。身为现实主义者，他承认过去数十年来，某种理解已经在俄罗斯生了根。谢廖沙的祖父不会喜欢这种理解，但它就在这里：俄罗斯人同意生活在某种独裁统治下以换取稳定。但人们以为这会是一

种柔软的独裁，必要时能够讨价还价。谢廖沙想像中国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或至少从报上看来像这样—中共掌握一切权力，但假如某个村庄的农民反抗，地方领导就会被撤换。压力和限制是给定的，但确切的量可被调整。此时此刻，压力在谢廖沙看来太大了，而就他所见，其他人似乎也这么觉得。明目张胆地操弄选举是一种侮辱，马卡洛夫案则痛苦得令人不忍卒读。因此该是调节的时候了。谢廖沙想像普丁会简明扼要地说：「好吧，我们来看看可以做些什么。我保留数十亿身家，你们维持你们所知的生活，觉得怎么样？」然后国家就会从逾越界限之处退让。「稳定」一词的意思就是人人都能听其自然、不受干涉，包括马卡洛夫，还有那些可能突然惊觉自己和他处境相同的人们。这正是谢廖沙在二○一一年十二月六日前往凯旋广场时，所要传达的想法。

*

凯旋广场的抗议并未取得许可—许可必须按照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程序，在行动前两週取得。而这场抗议只是人们对前一晚的所见所闻做出的回应。这些人看来可以分成两类—在许多抗争现场都被殴打和拘留过，纯粹觉得自己有责任对不公不义做出公开回应的死忠抗争者；另外是对许可与限制毫无概念的人。这两群人之间则是薄薄一层见多识广、偶尔参加抗争的人，他们每次都会衡量自己的风险。他们看过其他人被警察拘留，或者自己也被警察拘留过，知道未能取得许可意味着警察会自以为有权尽情施暴。经过昨晚的抗议和尝试游行之后，警察的行动大概会十分暴力。

谢廖沙和玛莎都对许可一无所知。但玛莎这时已经参加过一次抗争，她觉得自己略知一二。当警察似乎在顷刻之间开始前进，她抽出自己的iPhone，开始用英语对着手机吼叫。警察一定把她当成了外国特派记者或观光客—他们放过她继续前进。玛莎跑到附近一处公园，公园里有一间美式餐馆，这是全市最早的美式餐馆之一，在一九九○年代满足了海外归侨的需求。玛莎冲进餐馆，在她看到的第一个空位勐然坐下，同时在另一个小隔间里，有三名年轻男子正脱下大衣。

警察就在后方不远处。他们开始从座位上把人拉走。玛莎重施几分钟前见效的故技，她转向餐桌，开始说英语，男人们立刻接着回应。警察做完工作，留下十几个闪闪发亮的红色人造皮革空座椅扬长而去，这群人立刻切换成俄语，开始自我介绍。玛莎的新朋友和她一样，都是资歷才两天的抗争者。三人都从外国学校毕业—史丹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伦敦政经学院。这大概就是他们知道要来餐馆避难的理由。

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拿出手机。玛莎在推特上读到，《新报》一位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记者叶莲娜．科斯楚琴科

（Elena　Kostyuchenko）被拘留了。这则推特公布了她被关押的拘留中心地址，玛莎去了。她在那儿遇见一位名叫伊利亚．波诺玛瑞夫（Ilya Ponomarev）的男人，他对她说自己是公正俄罗斯党的国会议员，也是抗议的组织者。接着她遇见两位年轻女子，她们说自己是一个她从没听过的团体成员。那个团体叫做暴动小猫（Pussy　Riot）。玛莎喜欢这个名字。玛莎成为运动者才二十四小时，她的社交圈就已经扩大四倍。

*

鲍里斯．涅姆佐夫多年来都在期待这一刻发生，但谁知道它会在此刻发生──或者，既然发生了该如何应对？他熟识的人和一些他几乎不认识的人，这时齐聚于「团结」组织的办公室，他们说要让抗争者协调一致。但他们不是唯一有意如此的人。几个街区之外，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国会议员伊利亚．波诺玛瑞夫，也举办了一场市镇会议式的集会，讨论抗议行动。脸书和VKontakte上出现了各种社团，数以千计的人表述着扩大抗争的欲望。问题是要在何处、何时，以及究竟如何抗争？

这些新取得自我认同的抗争者几乎都不知道，当局早已针对抗争进行了全面限制。其中有些人听过异议者游行，像是玛莎，但更多其他人先前完全没在关注，像是谢廖沙。许可制只是限制的其中一例──此时最直接相关的一例。在莫斯科，许可通知只能在特定时间内取得，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在预定行动日十二个工作日前的一早就填好申请表递交。要是申请早了会被回绝；申请晚了则会被告知你所申请的地点，已被他人取得使用权。这就意味着社运人士必须在天亮前抵达市政府，确保自己在几小时后市府一上班，就最先走进许可核发办公室大门；接着还要跟警方交涉。倘若申请成功，核发了许可通知，警方就会圈出一个刚好足以容纳预计出席人数的范围，在其上架设警戒线，并在这个范围的出入口设置金属探测器。组织者和警方交涉出入检查的细节：人们可以携带塑胶水瓶吗？标语牌和木板呢？金属牌子呢？要是申请者低估了参与人数，他们不只会面临罚款，和警方的关系也会交恶，这对于今后的申请能否通过至关重要。

抗争新人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或许也不太愿意理解。他们可能也不愿等待新的申请通过──他们不知从何而来的抗争欲望，可能也消散得一样快。涅姆佐夫、纳瓦尼、另外几名男子，还有两名女性此时觉得必须约束这份新生的能量，他们集会讨论这个困境。有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某人已经为十二月十日的抗议活动取得了许可──不到一週之后。坏消息则是，许可通知是发给预计在莫斯科大剧院（Bolshoi　Theater）对街的小广场里聚集的三百人。在理论上和象徵意义上，这都是个好地点，从大剧院步行到红场只要一小段路，中间隔着一块名为革命广场的区域，那儿适合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

数万抗争者齐聚革命广场的景象，显然绝非莫斯科市府当局乐意看到的。他们也不愿和取得申请的女性交涉。他们联繫了涅姆佐夫，还有他们确信与抗争者有所联繫的另外几位知名人士，提出一个替代地点：沼泽广场（Bolotnaya Square）。俄文的「Boloto」是「沼泽」之意，这个广场曾经就是个沼泽；如今它是一个小岛，一边与克里姆林宫由莫斯科河隔开，另一边则由一条运河与一处住宅区相望。涅姆佐夫的公寓恰好就在运河对岸，俯瞰着沼泽广场。警方中意沼泽广场的理由很明显，它很容易被封锁，人员进出会因地理条件而顺势减慢。所有男人都同意，一场数万人参与的示威在沼泽广场举行会更有秩序。他们握手同意，甚至共享一瓶威士忌。註449涅姆佐夫确信，只要抗争者听从命令就能确保安全。他在自己的部落格发出一篇呼吁：

亲爱的朋友们！人们的安全与保障，对我来说比脸书和推特更重要。预计前来参加这次抗议的，不只有经验丰富的反对运动者，还有大量从未参加过抗争的人。让他们落得被镇暴警察毒打，是卑鄙、挑衅的犯罪行径。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註450

涅姆佐夫也和另外两位行动者一同录制影片申明这个立场，并针对沼泽广场即将举行的抗争提出具体诉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他们指的是最近两次抗议的受害者，共有将近九百人遭到拘留，其中大量人员被判处监禁十五天。另外则是重新举行选举。註451数以万计的人在为这次抗议建立的社群网站页面上点击「参加」，运动者们认为让他们前往适当地点，提出正确的诉求是很重要的，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着想。

*

沼泽广场抗议前一夜，玛莎跟她在星光餐馆（Starlight Diner）认识的新朋友们，还有她儿时的好友托利亚（Tolya）一同吃饭闲聊。托利亚一家人在二十年前移民加拿大。如今托利亚是一位电脑工程师，在莫斯科的一家公司工作。他们每个人都计画隔天要去抗议，也都无法理解为何他们得到岛上去，而不是去革命广场。他们得出共识，这个机会被白白浪费了。对他们来说，他们一直被教育应该抗拒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然而这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受到感召而加入一场集体行动。他们自然以为其他所有的新抗争者也是这样。他们怎能容许这样的机会—因办在一个除了彼此谁都没听过的地方—被白白浪费？

玛莎说，她最近在阅读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相关资料，在她看来很明显，占领才是正确的模式。前进革命广场，扎营驻

守，拒绝离开。或者前往中央选举委员会，那儿就在革命广场一个街区之外，并加以占领，要求重新选举。事实上，早在占领华尔街之前很久，乌克兰人在二○○四年就这么做过了，而且有了效果。

「我还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其中一位年轻男子说道，开始长篇大论地叙述他看到的牛津学生运动所採取的战术：「但你要跟随一个领袖，才能做到。」

他们有领袖吗？这群人开始提出不同人名。涅姆佐夫是上一个时代的残余。雅辛总是想要让人们认真看待他，因为没人把他当一回事。另一位自封的领袖谢尔盖．尤达佐夫（Sergei Udaltsov）则抱持正统的苏联观点，人们普遍觉得他似乎想成为一九二○年代的政委。那就只剩纳瓦尼了。他们喜欢纳瓦尼，即使他的民族主义理念和他们称之为「共青团方式」的做法━包括他热爱吆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的口号━减弱了他的吸引力。尽管如此，只要纳瓦尼召唤他们参加一场精彩的抗争，他们还是愿意跟随。但纳瓦尼这时仍在拘役十五天的刑期中。

「他应当从监狱里发表声明。」某人说。但时机已经太迟。

「我想你应该去跟组织者谈谈，告诉他们，他们正在浪费大好机会。」又有人说。玛莎意识到他们在对她说话。事实上，他们所有人似乎都认同玛莎为传达此讯息的合适人选。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联络任何一名组织者。因此他们隔天去了沼泽广场。另外有将近五万人也是一样，使得这场抗议成了苏联解体以来，俄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抗争。

*

那儿有一座大臺，臺上有人演说。显然，抗争场合都会准备这些。谢廖沙看着他们━他其实听不见他们━忽然意识到，他在十多年前其实参加过另一场抗争。二○○一年四月，歷经一年的恐吓威胁、警方搜索和司法诉讼之后，全国联播的独立电视臺（NTV）的记者们被告知，公司如今由国家天然气专卖公司所掌控。他们在所有广电频道办公室所在的电视塔前发起抗议。谢廖沙绕了一大段路才来到这里━电视塔离地铁站很远，而谢廖沙对莫斯科他不熟悉的地区不知道该怎么搭巴士。然后他伫立在大雨中，看着他喜欢的电视主播们，那些从他知道有电视新闻开始，就一直在萤幕上出现的熟面孔，站在临时搭建的臺上说话。有些人看来彷彿在哭泣，即使在雨中很难分辨。那时看来就像是世界末日。

在那之后，其中一位主播退出了新闻界以表心迹，改行从事意见领袖这份传统上属于异议人士的职业；另一位主播搬到乌克兰，在那儿有了自己的节目，剩下其他记者似乎都在这个完全由国家掌控的新电视世界里找到了栖身之处。有些人热烈地为普丁鼓吹，其他人则只从事文化议题或看似无害的社会议题。市府当局修筑了一条单轨铁路通往电视

塔，谢廖沙也完全忘了这场抗议。要是在他前往沼泽广场的前一天，有谁问起他过去是否参加过抗争，他必定会坚定不移地说从来没有。事实上他还会说，直到几个月前初次听闻马卡洛夫案为止，他都不曾跟这个政权起过争执。

这时有人在臺上或大臺附近非常大声地吼叫起来：「打倒普丁！」数百人也跟着喊。谢廖沙没有跟着喊。这句口号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他不是来这里推翻普丁的。他自己不想被定义为革命家—这对他的祖父来说是句脏话。亚歷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确信，出错的每件事都是欠缺深谋远虑的激烈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好的变化只能是渐进而有意图的。此外，谢廖沙也不想喊口号。喊口号会让人想起—若非谢廖沙记得、或可能以为自己记得—共产时代的游行，那是在一致性与攻击行为中追求狂喜的克里姆林宫青年运动。但谢廖沙不想狂喜，他只想表达自己是个与国家毫不相干，也不同于国家的人。为了这个目的，他繫着一条白丝带。不知怎地，过去几天以来，白色成了这场抗争的代表色。它和乌克兰的橘色一样是象徵，但也是橘色的相反。白色是纯净的，不具攻击性，而且包含所有颜色。对于谢廖沙和他此时在这里相会的人们来说，这场抗争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运动非常重要。他们宁愿这场抗争毫无政治味。

*

为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提供替代教育的社会学家亚歷山大．毕克博夫，如今将自己的研讨会转变成一个流动的调查单位。他们的目标是询问人们在做些什么，以及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问为什么。克里姆林宫、俄国和外国媒体，很快都接受了这样的理解：抗争者是一群反对普丁的中产阶级。有个常用的说法是「愤怒的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在此暗指富裕和年轻的一群。列瓦达中心的调查则显示，抗争者其实并不以有钱人为大多数—其中包含了一些穷人、许多中等收入的人，以及一些富人。他们也不以年轻人为绝大多数；小于四十岁的人约略过半，但年龄大于五十五岁的占百分之二十二。註452毕克博夫发现，他们也并不特别愤怒。他们爱开玩笑，也喜欢一幅够好笑的布条，像是「我没投票给这群混蛋，我投给另一群混蛋」，高举在众多视觉及文字噱头的手写标语之中，它在沼泽广场上受欢迎的程度遥遥领先。毕克博夫得出结论，这样的幽默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缓解了遭受侵害的感觉—人们能笑得出来的话，就不那么像是受害者了。它也示意着这些抗争者并不危险。革命家不开玩笑的。抗争者们藉由开玩笑，将焦点从克里姆林宫转到彼此身上。这场抗议看来彷佛是场竞赛，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要选出其中最风趣的人。註453随后，参与者们还会爬梳社群网站，看自己的标语牌有没有成为阅听人的最爱。

「白色，我们抗争的颜色，是个美好的象徵，」涅姆佐夫在十二月十日一篇语调欢欣的部落格发文中写道：「它意味着参与抗争的人们不抱一丝『黑暗』的想法。」这篇文章以这几句话开头：「我很高兴。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将留名于史，成为市民尊严与公民社会復活的日子。歷经十年的蛰伏，莫斯科和俄罗斯全国都觉醒了。」註454

的确是俄罗斯全国。就在同一天或这天前后，俄国境内将近一百个城市和城镇—也就是说，俄国全部的城市和城镇—都出现了抗议集会、示威或游行。其中几个地方的参与者相对人数（市镇人口参与抗议的比例）远远高于莫斯科。

涅姆佐夫在部落格文章中宣告，抗争者们「无异议採纳了」一系列诉求。沼泽广场上并没有举行投票，多数参与者也听不见演说者，但涅姆佐夫前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抗争，已是二十多年前了。那时，确实是有清单和诉求，这些事情似乎就是这么运作的。共有六项诉求。第一项是「释放所有政治犯」，指的是上星期抗议行动中被捕的人；另外五项都与国会选举相关—宣布选举结果无效；选举委员会主委革职；对作票争议提出调查报告；允许反对党参选；以及重新举行公开、公正的选举。诉求清单上并不包括要求普丁辞职，也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这些诉求并未明确提及坐牢八年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或是多数抗争者都没听过的弗拉基米尔．马卡洛夫。诉求也只字未提反对派记者遭到谋杀或新闻自由的问题。诉求有意保持在相对容易落实的最低限度内。它们模拟的是一九八○年代晚期和一九九○年代初期的逻辑，当时戈巴契夫的政治局，弱势且犹豫不决，有妥协和说理的空间。苏联各个卫星国的共产党在一九八九年「天鹅绒革命」期间，会与抗争者坐下来协商，回应这些要求。在涅姆佐夫和一同组织抗争的人们眼中，普丁政府似乎突然就像过去的这些政府一样摇摇欲坠了。

「突然」是关键词。话说回来，那些年纪够大，还记得苏联衰败过程的人，都记得这个政权看起来屹立不摇，直到有一天突然不復存在。但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为何数以十万计、年龄和收入水准各不相同的人民，在全国各地走上街头？论述这些抗争的社会科学学者全都用了「谜团」一词。

一位出生于俄国，在西方受教育的德国社会学家，进行了堪称最透彻的努力，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米夏．贾波维兹（Mischa Gabowitsch）的研究奠基于全国各地数十名抗争者的访谈，他还详细检视海报、口号及抗争形式。他的证据推翻了这场抗争是中产阶级抗争的观念，它甚至不是一场为了要保护私有财产、透过纳税换取合理政府服务之类的由中产阶级价值驱动的抗争。贾波维兹得到一个结论：对贪腐的批判，尤其是纳瓦尼对贪腐问题的叙述，为抗争创造了先决条件。纳

瓦尼的「骗子小偷党」一词提供了需要的术语。抗争者谈论着从他们身上被偷走的许多东西，不只是金钱和政府服务，还有选票。涅姆佐夫提出了一个数字，他宣称有一千三百万张选票不翼而飞。一切作票行为中最明目张胆的一种──梅德维杰夫将权力交还给普丁──也可以被表述成一种贪腐的表现。

同时，贾波维兹也提到，只把抗争看成是目睹国会选举公然舞弊所引发的反应是错误的。

相较于选举法规修改，以及清除、恐吓及预先挑选反对阵营的候选人，投票日当天的作票本身或许不是芝麻小事，但也不过是整个权力垂直体系（power vertical）操纵机制的最后一颗齿轮。这使得俄罗斯二○一一年十二月的局势，不同于二○○○年的塞尔维亚、二○○三年的乔治亚、二○○四年的乌克兰或二○○五年的吉尔吉斯。那些国家的选举操弄手段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阻止多数民意支持、或至少得到广泛同盟支持的候选人胜选。反之，在俄罗斯，先前的修法已经使得这样的候选人或同盟不可能产生。尽管如此，何以一场被操纵的选举会在俄罗斯引起自发的群众抗争呢？註455

他提出，一部分答案在于选举仪式令人难堪地遭到侵犯。换言之，正是作票的下流手段，而非作票这件事本身，引发了民愤──如同让大老远从基辅飞回莫斯科投票的谢廖沙，最后反感地投下空白票的原因。倘若抗争者反对的主要是他们所感受到的违背公德行径──不只是在投票亭里，还有普丁和梅德维杰夫先前在九月时握手移交总统职位──那么他们没有要求罢黜普丁，也没有要求政权面对自身最严重的罪行，也就说得通了。这场抗议被限制在警戒线封锁的小岛上，毫无对抗政权之意。毕克博夫的一些应答者们说，他们是为了稳定而示威的──运用普丁时代的关键字，将之转为自己的诉求。或者说，他们的请求。

即使抗争者各自属于不同年龄层，但普丁掌权的时间够久，使得其中大多数人都在所谓的「稳定」时代里度过了整个或大半个成年期。其中有些人期望普丁时代会如同他们所记得或想像的苏联时代──那是全国性怀旧的对象──按照这些记忆，时间是缓慢、可预测的，本质上是不变的。但在普丁的「稳定」时代里，事物拒绝保持不变。市场由于普丁的言行而崩盘。随机挑选的无辜人民被判刑入狱，只因为政府宣布对恋童癖展开猎巫。普丁与梅德维杰夫的来回移交，以及闹剧般的选举体验，都令人想起俄国公民是多么无力去影响生活的任何层面。这些抗议是一次重新协商，从持续扩张的党国手上尝试收回一些空间──而这个党恰好

是「骗子小偷党」。

*

十二月十五日，普丁举行了他第十次年度热线。在这个节目中，经过仔细过滤的现场观众，以及同样经过仔细过滤的来电者们提出问题，普丁一一回答。即使普丁过去三年来的官方职称并不是总统，这些以普丁为主角的节目仍然照常播送。谢廖沙看了前二十分钟，普丁回应了关于抗争无关痛痒的问题。普丁一开始看来有些紧张，但谢廖沙随即觉得，这恐怕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普丁愈说愈有信心。他甚至将抗争归功于自己：他的政权创造出许多积极的公民。他承诺在每一处投票所加装网路摄影机，向大众确保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绝无舞弊情事。这很可笑，网路摄影机对大多数变造行径都毫无用处。但至少抗争者迫使他回应了。终究，他或许是害怕了。

节目主持人曾经是独立电视臺一位勇敢的年轻记者。谢廖沙记得在电视塔的抗议现场看过他，那时每个人都想出一种方式，承诺永不放弃。如今他年长了十岁，体重增加了二十公斤，坐在国家电视频道摄影棚内的书桌后面，在俄国最有权势的男人身边显得紧张又渴望。主持人从他面前的笔电萤幕里唸出一个问题：

问：人们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抗议期间戴上了白丝带。这些丝带简直像是「颜色革命」逼近俄国的象徵。你同意这个评估吗……

答：就「颜色革命」来说，我想一切都很清楚。它们是一种颠覆社会的既定行动，而我认为这样的行动并非空穴来风。我们都知道乌克兰的橘色革命期间发生过什么事。顺带一提，我们的某些反对运动者当时在乌克兰，在时任乌克兰总统尤申科的顾问处获得官方职位。他们自然试图把这种行为移转到俄罗斯。但老实说，当我在萤幕上看到有人在胸口戴着某些东西，得跟你说实话，即使这样讲不恰当，但我以为那是爱滋病防治教育，他们，不好意思，他们把保险套别在胸前了。我只是不能理解他们为何把它从包装里拿出来。但我接着仔细看了。註456

愈讲愈难听。普丁进一步宣称，有人收了钱参加抗议，「反对派领袖」则吆喊「绵羊们，前进！」以羞辱他们。但谢廖沙几乎没听到这段，因为他已经暴怒了—除了明确指涉涅姆佐夫，他当时在乌克兰的工作被描述成近乎叛国；但不只这样，谢廖沙也被愚蠢的保险套笑话给激怒。

从那时开始，谢廖沙被愤怒驱动着。他的愤怒投入在尽其所能地制

作最多的白丝带。此时白丝带已出现短缺，在莫斯科全市的零售店里都销售一空。人们不只为了抗议而配戴白丝带，每天去上班或走在街上时也都戴着。他们把白丝带别在大衣上，繫在包包上和座车天线上。谢廖沙找到了批发商，买下了大捲大捲的白丝带，每卷宽一英吋，长数百码。要把丝带剪裁成数以万计六吋见方的长条，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他发明了一种技术。他把丝带缠绕在一张曲木椅背上，绕三十到五十次，然后战略性地剪两刀─每次剪下多达一百条。然后每一条的末端都要用打火机烤过，以免磨损。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下一次预定抗议之前，谢廖沙在自己的公寓里设立了工作坊。他在一场称为抗议工作坊（Protest Workshop）的聚会中遇见的几个人也来帮忙。他们还制作了一部教学影片，上传到YouTube。

*

玛莎参加了每一次行动，无论是抗议、筹备会议或是相关的社交场合。成为运动者两週之后，她开始了一项新工作：公正俄罗斯党国会议员伊利亚．波诺玛瑞夫的新闻秘书。这位议员曾在抗争现场演说。她也加入了抗争艺术团体暴动小猫。这个全由女性组成，成员资格不限的团体，集体举行游击表演，并将影片上传到网路。十二月时，她们在纳瓦尼及其他抗争者被监禁的拘留中心外面一处车库屋顶上演唱。一月，她们在红场上演唱，歌名叫做〈普丁尿裤子〉（Putin Pissed Himself）。那次一如其他许多次，她们也被护送到警察局，几小时后获准离去。接下来，玛莎想要让她们在国会大厅发起行动。她们要在国会会议期间穿戴尺寸不相称的多色紧身衣和头套，从一处侧翼包厢下降到议场。

结果组织这次行动的困难程度超出玛莎想像。二月二十一日，暴动小猫改在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演出，这座位于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教堂，外貌彷佛俗丽的巨大婚礼蛋糕。她们演唱一首叫做〈庞克祈祷〉的歌曲，其中恳求圣母「驱逐普丁」。她们的讯息既是针对抗争者，也是针对其他任何人。讯息这么说：「不要聚集在警方封锁的空间里，要勇敢对抗，到你不该去的地方，说你不该说的话。」而在这个例子里，她们在政教合一之处对抗教会和国家。总统选举就在两星期之后。俄罗斯正教会的牧首为普丁助选。

三月四日，就在投票所开门之前，暴动小猫的两位成员由于严重流氓行为罪而遭到逮捕，这项罪名最重可求处七年有期徒刑。玛莎并未被捕，因为表演那天她没能赶到教堂。

*

三月第一个週末，廖沙恰好在基辅，参加性别、性向与权力研讨会的其中一场。选举从远处看来变得更怪异了。普丁在第一轮投票就以百

分之六十三得票率宣布获胜，俄罗斯的白丝带群众则似乎对这个预料中的结果感到惊愕。

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当天，参与者们发起一场游行，沿着基辅的主要大道前进。他们是为了性别平权、LGBT权益，以及争取释放暴动小猫而游行。共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参与游行，警察人数则有两倍。在廖沙看来，反制示威的人数约有四倍。这是廖沙第一次为了LGBT权益而游行。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警察保护抗争者，而非威胁抗争者。他异常地振奋，即使必须穿越全副镇暴武装的警察人墙通道之间。

当他回到彼尔姆，系主任对这次游行不发一言。但她确实建议他在提交出国行程的相关文书时，改掉研讨会名称，这会是明智之举。

註428：Svetlana Reyter, “Prezumptsiya vinovnosti,” Bolshoi Gorod, August 17, 2011, http://bg.ru/society/prezumpciya_vinovnosti-8944/（二○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浏览）。

註429：“Obvinyayemiy v pedofilii Makarov priznan sovratitelem, a ne nasil’nikom,” RIA, November 29, 2011, http://ria.ru/justice/20111129/501520452.html（二○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浏览）。

註430：Ella Paneyakh, “A vot teper’ nachalos’ samoye strashnoye,” inliberty.ru, October 28, 2011, http://www.inliberty.ru/blog/255-a-vot-teper-nachalos-strashnoe（二○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浏览）。

註431：Alexei Gorshkov, “Transformatsiya otnosheniya k seksual’nym men’shinstvam kak politicheskaya problema sovremennogo rossiyskogo obshchestva,” senior thesis, Perm State University, 2007.

註432：“V Moskve eks-senator, iznasilovavshiy ‘na radostyakh ot rozhdeniya rebyonka’ vypusknitsu, otelalsya uslovnym srokom,” newsru.com, January 25, 2011, http://www.newsru.com/crime/24jan2011/senatorrapestudsnt.html（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33：Yuri Snegirev, “’Delo piterskogo pedofila’: Aleksandr Kuznetsov dvazhdy popadalsya na narkotikakh . . . ,” Izvestia, February 4, 2008, http://izvestia.ru/news/332974（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34：Igor K., “Chto delat’s s pedofilom: kaznit’ ili kastrirovat’?” pravda.ru, April 10, 2008, http://www.pravda.ru/society/family/pbringing/10-04-2008/262947-0/（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35：“Bokser Kuznetsov, zabivshiy nasmert’ nasil’nika svoyego pasynka, vyshel na svobodu dosrochno,” newsru.com, August 24, 2010, https://www.newsru.com/crime/24aug2010/boxermpedofreeomsk.html（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36：Pravitel’stvo Rossiyskoy Federatsii, “Ofitsial’niy otzyv na proekt federal’nogo zakona ‘O vnesenii izmeneniy v Ugolovniy kodeks Rossiyskoy Federatsii v tselyakh usileniya otvetstvennosti za prestupleniya seksual’nogo kharaktera, sovershayemiye v otnoshenii nesovershennoletnikh,’ vnosimiy deputatami Gosudarstvennoy Dumy N. V. Gerasimovoy, A. M. Babarovym, Ye. B. Mizulinoy,” February 2, 2010, document 357П-П4.

註437：“Glava komiteta Gosdumy po delam semyi obvinila Yedinorossov v ukryvatel’stve pedofilov,” newsru.com, November 3, 2010, http://www.newsru.com/russia/03nov2010/mizulina.html（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38：Andreas Umland, “Kak Dugin izobrazil menya ‘pedofilom,’” Ukrainskaya pravda,

November 9, 2010, http://www.pravda.com.ua/rus/columns/2010/11/9/5554710/（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39：Dmitry Yefremov, “Sosiski uber alles!” Evrazia, February 7, 2008, http://evrazia.org/article/303（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40：Ilya Dmitriev, “Zakasnykh del master,” Evrazia, March 19, 2008, http://evrazia.org/article/368（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41：关于法案第577813-5号，”O vnesenii izmenenij v Ugolovnyj kodeks Rossijskoj Federacii i otdel’nye zakonodatel’nye akty Rossijskoj Federacii v celjah usilenija otvetstvennosti za prestuplenija seksual’nogo haraktera, sovershennye v otnoshenii nesovershennoletnih” 通过的歷程，参看： http://asozd2.duma.gov.ru/main.nsf/(Spravka)?OpenAgent&RN=577813-5（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42：恋童在俄罗斯之外的国家也被视为心理障碍，即使西方精神科医师近年来都强调，恋童并非性倾向，反倒更趋近性偏离（paraphilia）。例如：http://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813669。

註443：Serbsky Center, “Informatsionnoye pis’mo,” Document UDK 616.89 BBK 56.14 T48, http://serbsky.ru/index.php?id=120&Itemid=91&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44：作者访谈谢尔布斯基培训课程参与者，二○一二年在莫斯科。

註445：“Operatsiya ‘Spaseniye’: Ostanovim nasiliye nad det’mi vmeste,” 最初发表于http://agatacrysty.livejournal.com，但这个部落格所有关于反恋童癖运动的旧文章，后来似乎全部下架了。我找到许多同一时期的回文，包括http://maxpark.com/community/129/content/769725 (July 13, 2011) 以及http://russobalt.org/forum/topic/992-operatciia-spasenie-ostanovim-nasilie-nad-det/ (July 2, 2011)（皆于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46：“Medvedev predlozhil sozdat’ v SK tsentr po bor’be s detskoy pornografiyey,” RIA, July 7, 2011, http://ria.ru/society/20110707/398540485.html ；“Devushka, vychislivshaya v Internete 80 pedofilov, budet pomogat’ Astakhovu,” RIA, July 7, 2011, http://ria.ru/society/20110707/398576027.html（皆于二○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浏览）。

註447：“Rezul’taty vyborov v Gosdumu po regionam Rossii,” RIA, December 6, 2011, http://ria.ru/infografika/20111206/508314920.html（二○一六年七月十七日浏览）。

註448：“Zaderzhanniye na marshe,” eyewitness account by blogger Zhertva1211, December 6, 2011, http://zhertva1121.livejournal.com/104729.html; Boris Nemtsov, “Miting: Chistiye prudy: Bespredel,” blog post, December 6, 2011, http://b-nemtsov.livejournal.com/2011/12/06/; “Navalny i Yashin poluchili 15 sutok za nepovinoveniye politsii,” RIA, December 6, 2011, http://ria.ru/riatv/20111206/508165390.html（皆于二○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浏览）。

註449：Yevgenia Albats, Zoya Svetova, Yegor Skovoroda, Yulia Chernukhina, and Nikita Sologub, “Dekabr’ 2011-go,” New Times, December 3, 2012, http://newtimes.ru/articles/detail/60591/（二○一六年七月十七日浏览）。

註450：Boris Nemtsov, “O zavtrashnem mitinge,” blog post, December 9, 2011, http://b-nemtsov.livejournal.com/2011/12/09/（二○一六年七月十四日浏览）。

註451：“Video: sovmestnoye zayavleniye organizatorov o mitinge 10 dekabrya na Bolotnoy,” December 9,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umeUpaoYM（二○一六年七月十四日浏览）。

註452：“Opros in prospekte Sakharova 24 dekabrya,” Levada Center, December 26, 2011, http://www.levada.ru/old/26-12-2011/opros-na-prospekte-sakharova-24-dekabrya（二○一六年七月十七日浏览）。

註453：Alexandre Bikbov, “Metodologiya issledovaniya ‘vnezapnogo’ ulichnogo aktivizma (rossiyskiye mitingi i ulichniye lagerya, dekabr’ 2011—iyun’ 2012),” Laboratorium, no. 2 (2012), pp. 130-163.

註454：Boris Nemtsov, “Mirnaya belaya revolutsiya,” blog post, December 10, 2011, http://b-nemtsov.livejournal.com/2011/12/10/（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浏览）。

註455：Mischa Gabowitsch, Protest in Putin’s Russia (Cambridge, England,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7).

註456：“Razgovor s Vladimirom Putinym 2011 (polnaya versiy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DGhhcBKdI（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浏览）。

# 第十七章　玛莎，二○一二年五月六日

早上玛莎去了教堂。这天是星期日，普丁就职前一天。城市很安静——五月初，莫斯科人会去照料别墅，把它们打开，准备在夏天前往居住。玛莎向最近数个月来遇见的几百人之一借来一幅圣像。那人是个非常有钱的人，拥有良好的人脉。许多有钱有关系的人，都藉由支持抗议者两边押宝，他也是其中之一。不论掌权者是谁，他们都想要维持有用的人脉。他们慷慨捐款给抗争组织者开设网路帐号，以至于在十二月十日沼泽广场集会之后，抗争者总有良好的音效设备和印刷精美的布条。这个男人不停对玛莎说，他想要一起做些事——按照玛莎的理解，做一些抗议的事。所以她要求从他远近驰名的十六世纪俄罗斯宗教艺术收藏里借用一幅圣像。这人出借了圣像和一位保镳，保镳在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则是护卫圣像。

玛莎带着圣像和保镳，走到了基督变容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Holy Mandylion）教堂，这座美丽的小教堂就在克里姆林宫旁边。她要去参与一项颇为标准的正教习俗，也就是将圣像带进教堂参加团体祷告，其他人会向圣像祈祷并亲吻圣像。有些人相信，圣像在物归原主时会因此更加神圣。在众人向圣像祈祷之际，会有一位或几位摄影记者拍摄照片，然后玛莎会说明她的祈祷是为了保护宪法、反对愚民政策。

人们正在祈祷。玛莎等着记者来到，但他们必定是迟到了。圣像主人打电话来，为了玛莎没有事先警告他这次行动与暴动小猫有关而对她咆哮——在他两边押宝的计算里，这么做风险过大。这通电话意味着玛莎的行动消息早已外洩。她还是没能得到一张好照片。她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失败了。玛莎感到异常平静——即使她失败了，即使她在电话里被人叫骂——她意识到，这必定是因为身在教堂。

就在这时，穿着便服的男人们走进教堂，就连教堂的看守人都认出了他们。她的嘴角向下弯曲，表情立刻从喜悦转为敌对。那些人把玛莎带到最近的警察局，开始对她叫骂。

「你在捍卫那些臭婊子，那些在祭臺上弹吉他裸体跳舞的淫妇！你是她们一伙的！」

「死玻璃！」玛莎回骂：「你们这些死玻璃正在毁灭俄罗斯！」

玛莎在最近五个月来的七次拘留中锻鍊出了这个技巧。最初几次她被捉进警察局时，都试着对捉拿她的人讲道理。然后有一次她情绪失控，发现回嘴呛他们的效果好得多。它颠覆了整个局面。警官没预料到拘留人会对他们大小声，俄罗斯男人也没想到女人会对他们叫嚣，咆哮

因此打破了他们的行为模式。要是她用他们的语言叫骂，把他们对她的侮辱同样奉还回去，效果就更好。

他们不再叫骂了，三小时后将她释放—警方不立案侦办的话，最多只能扣留她这么久。这令她如释重负，因为玛莎为了下午预定的大游行和集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玛莎这时是个经验丰富、声名远播，偶尔感到厌倦的行动者。去年冬天，她得以亲自观察政治机器运行的方式，或者说，在俄罗斯「看来像是」政治机器的那套东西。身为伊利亚．波诺玛瑞夫的新闻秘书，她得以参与公正俄罗斯党的国会党团会议。他们还在讨论恋童癖问题。其中一位议员坚持，他们必须继续推动对已定罪的恋童犯实施化学阉割。家庭委员会主席叶莲娜．米兹丽娜反对。另一位议员指控她对恋童癖游说团屈服。她则回应，她对保护孩子的努力多过任何人。她是《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健康及发展资讯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from Information That Harms Their Helath and Development）的强力推手。这项法律早在二○一○年通过，但多数条文将在这一年下半年生效。包括书籍、杂志、电影在内，所有媒体都要标示阅听年龄分级，以防儿童吸收到有害资讯。这时，米兹丽娜正在努力将这些限制和管控延伸到网际网路。她主张，这才是保护儿童该做的事，而不是化学阉割。玛莎在这些会议中同情米兹丽娜。

玛莎也看到了金钱在国会里的作用方式。全体国会议员若非富豪，就是被包养。国家预算拨给每位国会议员每月二十万卢布、可聘用五位员工。这相当于每位员工每月得到的薪水略高于一千美元，让他们得以在这个如今自诩为全世界最昂贵城市之一的城市里生活。富裕的国会议员自掏腰包供应他们庞大的团队，较不富裕的则收受他们所谓的「贊助费」，再发薪给助理和新闻秘书。他们可能还拥有一个见习助理团队，这些人工作不是为了薪水，他们反而还要付钱给议员本人，以换取政治资歷。

政治对玛莎的老闆来说是家族事业。波诺玛瑞夫出身苏联职官权贵家族，他的祖父是一位外交官，伯父则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之一。伊利亚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积极投入苏联政治，攀升为莫斯科市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干部。一九九○年代，包括年少的伊利亚在内，整个家族转而投身民营事业，直到普丁时代才重回政界。伊利亚的母亲是官派的上议院议员，伊利亚自己则在二○○七年由公正俄罗斯党提名成为下议院议员。

二○○六年，波诺玛瑞夫执行了一次堪称典范的预防性反革命行动。

他在圣彼得堡举行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期间，组织了一场官方批准的反全球化运动人士集会。克里姆林宫害怕抗议行动会阻断高峰会进行，却又不想在这种场合大张旗鼓地镇压。于是警方在行动者们乘坐火车抵达圣彼得堡时就拘留他们，然后把他们载运到市郊一处体育馆，也就是波诺玛瑞夫主持的论坛地点。被送到体育馆的许多人其实根本不是反全球化运动者，卡斯帕洛夫的联合公民阵线成员更因高喊反普丁口号而被逐出论坛。但要是有谁费心多了解一点的话——圣彼得堡有个体育馆里满是公开合法集会的反全球化运动要让世界看到，而伊利亚．波诺玛瑞夫则是他们的领袖。

按照书面记载，波诺玛瑞夫的多数所得来自国家资助机构所提供的谘询费。二○一一年他申报所得约有三十三万美元，二○一二年则提高到三十七万美元左右。註457但玛莎看到的钱大多是现金——一堆堆、一叠叠、一个个手提箱的钱——这些钱当然不会登载于任何所得申报表格上。波诺玛瑞夫身边围绕着一群玛莎绝不可能认真看待的男人，尤其是因为这些人对于自己的任务认真地难以置信：革命。就她所见，他们觉得要是自己发动了一场革命，就能跟女人上床。其中有些人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些人说他们是强硬派共产主义者，还有些人坚称玛莎应当读一本书，书名为《俄罗斯神明的重击》（A Blow from Russian Gods）。她查阅了一下，那是一部反犹太的长篇大论。註458玛莎认为，波诺玛瑞夫花时间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是因为更有能见度的抗争者早看清他破坏抗争的歷史，所以尽可能避开他；若非如此，波诺玛瑞夫就是在蓄意揩油抗争的资金与能量，像是他在十二月时另立组织委员会那样。到了某个时刻，玛莎愈来愈确信办公室里流通的部分资金来自克里姆林宫。她在三月辞职。

几天后，国会对于《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健康及发展资讯法》提出一项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一併禁止「同性恋宣传」。「恋童癖游说团」这下终于被击溃了。波诺玛瑞夫贊成修正案。

*

当然，玛莎并未期待过抗争行动会改变总统选举的结果，普丁在总统选举里实际上毫无对手。但她还是多少有所期待。从她自我宣告成为行动者到总统选举之间的三个月，发生了很多次抗议行动。沼泽广场的集会之后，是另一场规模更大的集会。然后是白色旅行（White Ride），装饰着白丝带的车辆绕行花园环路，接着是白色人鍊（White Ring），人们站立在花园环路的人行道上，包围住市中心。接着选举就到了，让这一切全都显得无用且难堪。投票日当天在莫斯科举行的抗议，感觉更像在守灵。

人们又开始讨论移民了，但玛莎意识到，这或许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想要留在俄国。这里太有趣了，远比在牛津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学位更有趣。当然，谢尔盖还是不会让她带着萨沙出国生活，但她的儿子在幼儿班表现得很好，而再婚的谢尔盖也重新找回了身为家长的责任感。玛莎辞掉波诺玛瑞夫办公室的工作之后，和安娜塔西亚去了印度度假。她们躺在果阿的海滩上，但莫斯科一再叮噹作响。那位收藏圣像的百万富豪想要发起一个组织，名为「全民的俄罗斯」（Russian for All），他想交由玛莎经营。「团结」运动的一位朋友想要组织抗议。事实上，人人都想组织抗争。大型的抗争、最终足以产生差异的抗争。看来只剩一个机会了：总统就职日。

市府当局在就职日前一天核发了游行与集会许可。他们允许抗争者沿着雅基曼卡大街（Bolshaya Yakimanka），从巨大的列宁铜像往沼泽岛（Bolotny Island）註459行进，然后在沼泽广场举行集会。看似以列宁自居的尤达佐夫，将这场抗议取名为百万人大游行（March of Millions）。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在募资，但不太可能让游行大到名副其实。除了取一个华而不实的名字，组织者们又能做些什么让这场游行得到重视？一如往常，他们很难说服参与者在集会中演说。「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们一再听到这句回答。游行前两天，卡斯帕洛夫、纳瓦尼、涅姆佐夫、尤达佐夫和雅辛五个男人聚会讨论。有人提议发动静坐示威。涅姆佐夫和尤达佐夫否决了这个想法。涅姆佐夫拒绝抗议却不搞对抗的精神；尤达佐夫则对消极抵抗的想法皱眉。

玛莎的工作是把记者找来大臺前的媒体区。她很擅长这件事，她认识所有记者，所有记者也认识她，而且她声音洪亮。当人们从游行中缓缓晃进场内时，她正站在大臺边。总会出现这样的闲散时刻，每个人都在这时试着决定要继续参加集会，还是去咖啡馆坐坐。来自抗议工作坊的几位青少年带着两部扩音器，驻守在从大街通往小岛的岔道上，吆喊着好笑的押韵口号让抗争者们开心。然后玛莎的右手边出现了骚动，就在群众应当转弯进来的位置。骚动看来很大，或者情况不妙。志工们的双向对讲机停摆了。行动电话网路则壅塞或超载—手机全无讯号。玛莎设法过去看。

纳瓦尼坐在地上。他被携带着相机和麦克风的记者团团围住。这完全不符合他的目的。记者们拒不坐下或让路。没人看得到纳瓦尼在静坐，因此也没人加入。玛莎看看自己的iPhone，时间是下午五点刚过，集会应当开始了。

然后打击降临。感觉上不算严重—玛莎在十二月看过更凶狠的—但镇暴警察抽出橡胶警棍，见人就打。其中一棍划过玛莎背后站立的人们肩膀，打中一位女子的头。女子身子一沉，瘫倒在地。玛莎听见自己在

尖叫。

「快叫救护车！」

她转身，面对一颗戴着头盔的脑袋。

「快叫救护车！」

头盔下玻璃面罩里的那张脸孔清晰起来。

「我们没接到命令。」他说。

玛莎开始尖叫得更大声。

有人丢出一颗烟雾弹。他们到底是怎么穿越金属探测器、随身物品搜查和双层警戒线把它带进来的？又有人丢出东西来，碰上某人的肩膀就碎裂。那是个热水瓶，保证会碎成一千片。警察从后方和两侧开始推挤。在玛莎面前，纳瓦尼、涅姆佐夫与雅辛在内的几个男人都坐在地上。那个女人躺在人行道上。玛莎被四面八方的力量推回去，尖叫得彷彿前所未有。镇暴警察的队列短暂分开，玛莎被挤到队列另一边，警察则把失去意识的女人抬走。警察的阵形在她背后关上。玛莎站在一片虚空中。她不再尖叫了，四周几乎全都静下来。

在玛莎背后、镇暴警察的包围圈后方，打斗似乎还在继续。而在玛莎面前，四排内卫部队官兵──穿着灰色制服的十八岁义务役军人──在跨越莫斯科河通往克里姆林宫的桥上列阵。他们身后还有橘色的洗街车构成另一道路障。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里显然太害怕抗争者了，因此觉得有必要发动战争，保护自己。玛莎走向内卫部队，在走近时高举iPhone拍摄他们。

「俄罗斯有宪法，」她对这些义务役军人喊话：「你们在违反宪法。你们接受的命令是犯罪。纽伦堡大审之后，下达犯罪命令的将军被吊死了。我们的军人也把服从犯罪命令的德国士兵吊死。犯下罪行的人就是这个下场。」

「命令不得讨价还价。」几名义务役军人齐声说道。

「它们当然可以，」玛莎说：「它们要是违背了国家法律，也会被议论。」

「不许说话！」

声音从玛莎左手边传来。义务役军人们明显闭口不语。她现在距离最前排的军人只有几步之遥。她停下脚步，把iPhone高举过头，继续录影。

「部队前进！」看不见的声音下令。

这些义务役军人手勾手，每个横排约有一百五十人，向她前进一

步、又一步。玛莎继续说话。

「你们在违背军人誓词。你们就跟里面的沙皇一样。」

玛莎察觉到还有别人在拍摄她，显然是一名记者。她看不见他，但听得见他的声音。他为她担忧。「不要说了，」他说：「他们听不懂的。」

她继续说。

「你们都那么年轻，比我小很多，虽然我也没多老。你们不知道有了小孩之后，生活在这个被你们正在保卫的沙皇统治下的国家有多可怕。」

「部队前进！」「再一步！」

玛莎还是高举双手，将iPhone举在空中，男孩们的肩膀这时磨擦着她裸露的腋窝。她感觉得到他们的兴奋。她继续说。她又连续讲了四分钟。男孩们沉默着立定。最后，一位中尉走了上来，这是个有着宽大下巴的金髮汉子，没比手下的士兵年长多少。

「妳到底想干嘛？」他问。

「你们的资讯是哪来的？」玛莎问了一个在当下似乎很合逻辑的问题。

「那里，」中尉说，出于某种缘故，他向人行道点了头。「电视上。」他过了一会儿补充。

「谁控制了电视？」这次是带着录影机的记者发问。

「政府。」中尉说。

玛莎试图向他指出，从政府当局那儿取得的资讯并非明智之举。过了几分钟，他要记者关掉录影机。然后他对玛莎说，在《俄罗斯神明的重击》这本书中会读到真理—正是以前有人推荐给玛莎的那部长篇大论。据说该书「揭发了犹太人真正的罪行」，而犹太人接管了全世界。其中一小节叫做〈犹太人的性特徵〉，一开始就提到同性恋：「同性恋不仅普及于古代犹太人，更以席捲整个城市而为人所知，例如所多玛和蛾摩拉。」中尉告诉玛莎，他的排里每一名士兵都得到了这本书。註460

*

五月六日是个漫漫长日。它开始于为错误的对象祈祷而被押进警察局，接着是与六百名内卫部队官兵直接对话，然后又来到纳瓦尼和涅姆佐夫被捉去的另一个警察局。来自抗议现场的一些人自行走到了这里，正在警察局外闲晃。其中一个人带着扩音器；抗议工作坊一度把十几部扩音器带到了现场。玛莎接过扩音器，从肩背包里拿出一份宪法，从第

三十一条开始宣读。她立刻被带进警察局里。涅姆佐夫和纳瓦尼在拘留室里，玛莎则被命令在拘留室外，可称之为大厅的空间等候。她把宪法放回包包，取出一本《时代》杂志，该期是「二○一二年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註461她翻到纳瓦尼照片那一页，交给他，然后要他摆出认真的表情。这张照片很精彩，纳瓦尼的前臂伸出铁栅栏外，手里拿着杂志，表情严肃却略带伤感。她用电子邮件把照片寄给了在美联社担任摄影记者的男友。隔天，这张照片就在全世界各大媒体刊登。註462

玛莎成为行动者以来，这或许是发生在她身上最重要的事：她恋爱了。谢尔盖（Sergey）这一天也在外面某处，记录着镇压惨状。冲突持续到深夜，那时警察仍在小巷里追赶着人们。六百多人被拘留、五十多人送医治疗，即使伤者远多于此。註463事实上，这一天从未结束。多数人获得释放，有些人隔天继续在市中心各处抗议。镇暴警察只因为人们配戴着白丝带就予以拘留。穿戴防弹背心和头盔的警察，成群结队追逐着似乎只是在城里散步的人群，将他们押上巴士，载往警察局，扣留三小时不立案释放，然后一切从头来过。涅姆佐夫在路边咖啡馆喝咖啡时遭到拘留，镇暴警察抓人时还把桌子给掀了。註464玛莎一整天都骑着一部滑板车来回奔走。她向镇暴警察宣读宪法，遭到拘留，接受採访，然后又被拘留。同时在克里姆林宫，普丁正式就任他的第三届总统。

*

玛莎坠入爱河，同时与警察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又持续了几週。人们甚至在几天之内建起一处占领运动式的营地（尽管没有帐篷，因为帐篷是违法的），接着营地又被抄掉。而玛莎还在热恋中。她带着萨沙去找前婆婆，前婆婆有一座别墅，距离莫斯科有两小时车程。然后她和谢尔盖第一次一同出游。他要去拍摄这一年在乌克兰和波兰举行的欧洲盃足球赛。玛莎喜爱乌克兰东部城市顿内次克（Donetsk），那里为了赛事而建造了新体育场，註465机场也翻修一新。註466整个城市看起来宛如欧洲的时尚杂志。玛莎在球迷区获得座位。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对足球入迷，但她真的着迷了。她对谢尔盖说，她的身体可以感受到四面八方释放出来的睪酮素。那是一次美妙的旅行。

*

玛莎在六月十日从波兰搭机回国，因为她预定要参加莫斯科政治研究学校（Moscow School for Political Studies）的夏季课程，这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记者与社科学者举办的聚会，地点就在城外。六月十一日早上八点十五分，玛莎的手机响了。涅姆佐夫的助理打来。

「每个人的公寓都被搜索了！」她说。警察去了纳瓦尼、尤达佐夫、雅辛及其他行动者的住处。他们也去了涅姆佐夫的公寓，但涅姆佐

夫不在城里。註467玛莎有一种极其苦恼的不适感。她对保母阿伊莎特（Aishat）说过，不管是谁按门铃都不要开门，即使萨沙正在祖母的别墅放暑假。阿伊莎特在夏天总是和雇主同住，她于一九九○年逃离巴库，丈夫则在当地的屠杀中丧生。阿伊莎特没有接电话。玛莎躺在床上，一波波睡意和噁心感在她头上漂浮着。

她的电话又响了，她不认得这个号码。

「你好，玛莉亚．尼古拉耶夫娜。我是侦查总局（Head Investigative Directorate）的季莫费．弗拉基米洛维奇．格拉切夫上尉（Capt. Timofei Vladimirovich Grachev）。你涉嫌煽动、组织及参与暴动。我们已将传票送到你的住处，交给巴库居民阿伊莎特，」他拼出了保母的父名及姓氏：「她似乎未取得合法户籍登记就住在那儿。」

「干！回去吃自己吧！」玛莎说着挂断电话。

阿伊莎特还是没接电话。玛莎在床上又躺了一会，然后坐起身来，回电给调查员。

「听着，我还没看到传票。过了这週末我会考虑要不要跟你谈话。」这是长假週末过后的星期一──下一个工作日就在两天后。

阿伊莎特终于接起电话时，已经过了中午。她说她非常抱歉；她知道不该开门，但警察用重物撞门，她以为门会被撞破。她很抱歉，但她做不下去了。玛莎说她也很抱歉，她会付给阿伊莎特三个月薪水做为资遣费。

玛莎最担心的是警察会发现她藏匿的大麻。结果，他们没有拿走大麻。他们也没有拿走任何一份庞杂的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报表足以将她立案起诉。他们拿走的物品如下：十五条白丝带；一整袋绘有粉红三角的黑色圆钮扣──运动者此时开始配戴这些钮扣，表示他们反对国会提出的禁止「同性恋宣传」法律修正案；一本涅姆佐夫的《普丁：会计报告》；一台玛莎用来存放萨沙的学习辅助教材、记录她从萨沙出生后所拍摄所有照片的旧笔电。他们也拿走了纸本照片：玛莎的怀孕照、玛莎的结婚照，还有玛莎手上每一张塔蒂亚娜的照片。

*

格拉切夫上尉是一位瘦高个儿，年纪和玛莎差不多，髮质很好，但髮型剪得很难看。他从三小时距离外的特维尔（Tver）地区检察署奉派前来莫斯科，协助调查沼泽广场案。这显然会是件大案。他对玛莎说，他才刚抵达莫斯科，就奉命去搜索她的公寓。

「我看到那些粉红色三角，还以为这是小孩的玩具之类的，就把它们放回去。」他说。但现场有个经验更丰富的莫斯科警官。「他说：

『你开什么玩笑？那是LGBT运动标志。』我的反应是：『什么LGBT？』他回我：『带走就是了。』」他们频繁会面几週之后，玛莎和格拉切夫上尉对彼此都放心了，于是玛莎问他为何没把大麻从她公寓拿走当成罪证。

「我们在另一次搜索中甚至连古柯硷都没动，」他解释：「这不是派我们去的目的。上级要我们搜查政治文宣。」

玛莎和格拉切夫上尉开始用非正式代名词对彼此说话。他甚至允许玛莎到别墅探望儿子。同案的其他被告—她不认识他们，但知道他们的存在—都被逮捕了，而玛莎幸运地只被限制居住于莫斯科。她无法前往一位朋友的别墅以纪念塔蒂亚娜逝世十周年。她厌恶那天必须独自一人、或是跟错误的人一起度过，但她更厌恶必须请求允许这回事。但她后来觉得更舒适了些，只是她太想念萨沙了。

玛莎的前婆婆和她的前夫一样，也是化学家。她在一间应用科学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在学术界的社经地位不高，这就意味着其研究员分得地产的村庄距离莫斯科很远，位在特维尔地区。事实上，村庄只有一半属于研究所，另一半则属于地区检察署。因此玛莎的前婆婆放暑假时，才会和特维尔地区科纳科沃市（Konakovo）调查委员会的一名上校比邻而居。玛莎在过去几个夏天都见过这位上校。她名叫娜塔莉亚，年约四十，负责照顾六十岁的母亲和八十岁的祖母，还有两个孩子：她自己的小女儿，以及另一个和萨沙同年的男孩，那是娜塔莉亚染有严重毒瘾的姐妹生下的儿子。娜塔莉亚似乎埋首于工作，对工作的实质内容毫无兴趣，她只在意自己有这么多家人要供养。她不工作的时候就是睡觉，在工作和睡觉之间则抽菸，她的这个习惯对母亲和祖母都保密。玛莎则是她的菸友。

「嘿，你也是沼泽广场案的被告，对吧？」玛莎来到别墅的第一个夜晚，她在两人一同抽菸时问道。那一夜凉爽寂静，天空看得见星星。

「对啊。」玛莎说。

「你的调查员是谁？」

「格拉切夫。」

「啊，季莫卡（Timokha）！」娜塔莉亚的声音因为认出熟人而欢快起来。「他是我的部下。我得派三个人过去，这是大案。他有做好工作吧？」

「哦，他很尽责，没问题。」

「很好。帮我问候他。」

隔天早上，玛莎从阁楼的床上醒来时，楼下有三个六岁小孩在玩

耍。她听着他们的声音。他们在玩乐高积木。她想着，其中一个孩子是我儿子，另一个是要把我送进监狱关两年那个男人上级的儿子。听起来很复杂，却又如此简单──她轻易地跨越到存在的另一端，一路上都被熟面孔围绕着。

*

她每週得到格拉切夫上尉的办公室报到两次，时间都是早上十点。他会提出人名，询问玛莎是否认识。如果玛莎得到当事人允许的话，她会说认识。反之，她会说自己记不起来──而她往往记不起来。格拉切夫上尉会让她看一些东西：「请你辨认一下。」然后把一件物品放在她面前──像是自由意志党的旗帜。为什么？她不知道，他大概也不认识。再来是警方照片没完没了地经过她眼前。一张又一张打字纸，每张黏贴着两到三张照片。别人的卧室、书桌、衣柜、书信、照片、别人的白丝带。它们属于玛莎的同案被告。这些照片是搜索他们的公寓时拍摄的。而在这栋大楼的别处，或在城市的另一角，也有十几个陌生人正在看着萨沙房间的照片，以及塔蒂亚娜照片的照片。还有从沼泽广场取得的所有物证照片，这是数千人遭受攻击之后留下的残骸：折断的打火机、压扁的原子笔、被一千只脚践踏过的遗失护照。一件又一件对玛莎毫无意义的物品，以低劣的解析度呈现在闪烁的霓虹灯下。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把我溺死在毫无意义之中，玛莎想着。

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玛莎每天都得出现在格拉切夫上尉的办公室。她先送萨沙到英语幼儿班，和记者母亲们喝咖啡，然后她们去工作，她到调查委员会。她不再居住在从小到大生长的公寓里了。经过搜索之后，有太多理由让她搬走。其一是有个社服部门的女人跑来对玛莎说，她得到消息指称玛莎是双性恋者，不适任母亲。另一个原因则是她生活的后勤条件，让她再也无法居住在距离市中心这么远的地方。一开始她和谢尔盖同居，但当然，这不是谢尔盖想要的──持续受到监视、电话骚扰，以及一个不能离开城市执法范围的女友。于是玛莎在城里租了公寓。

她阅读着自己的案卷，每次厚厚一本资料夹。透过那些完全无法理解自己之人的纪录，她观看她六个月的人生与体验（不管是抗议本身或参加抗议的人）。这一开始把她给逗乐了，一切人事物在那些人看来都是邪恶的，他们也惧怕白丝带和推特。但这种感觉很快就倦怠了。资料夹不断送来。溺水的感觉加重了。玛莎想要直接签名画押而不再读下去，但随时在房间里陪同她的调查员告诉她，这是不允许的。这人是一位高阶中尉──官阶比格拉切夫低一阶，也比他小几岁──从俄国西南部的布良斯克（Bryansk）奉派前来。玛莎因阅读而双眼酸痛，所以她一直和他说话。他和妻子多年来一直尝试怀孕，却始终无效。现在他们正在

进行体外人工授精，却还是无法形成胚胎。玛莎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她试着安慰这名高阶中尉。

冬季结束时，她的积蓄也见底了。她去请求涅姆佐夫给她一份工作。她需要一位能够理解她非常规时间表的雇主，而她知道涅姆佐夫的组织从美国一项建立民主的基金得到了一些钱。他说组织的钱不够僱用她，但他可以将她介绍给一位经营连锁餐厅的朋友。玛莎很乐意伺候客人用餐，但就算是在一家餐厅里，她的时间还是无法配合。她在一个莫斯科外国特派记者的网路社团发文：「我想要一份乔事人（fixer）的工作。」其中很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会说英语，能够联繫上任何人和任何事。她开始得到一些差事，但这些收入还不够，朋友也借钱给她。她看过几位记者工作之后，也意识到自己能试着做他们的工作。她开始为一份莫斯科市的杂志撰稿，接着为雨点电视台（TV Rain）撰稿，这是一个独立电视频道，自从数年前开播以来已有数百万阅听人，即使该频道只能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收看。

审判始于六月二日，距离案件核心的抗争已经过了一年多。玛莎看到了同案被告们。年龄从大学生到退休人士不等的十个男人，被塞进一个塑胶水族箱里。他们站立着，双手在背后交握，这是囚犯面对执法人员的姿态。他们每个人过去一年来都被关在牢里。另一位同案被告被捕时十八岁，她这一年来都被软禁在家。玛莎感受到椎心刺骨的罪恶感。当她这一年来还被允许到处走动、每天晚上还能看见孩子，她怎能为自己感到难过、怎么好意思觉得自己值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

审判与调查感觉上并没有多大差别。玛莎一年前看过暴动小猫的女团员出庭受审。那个场面很怪异，是不折不扣的女巫审判，但起码还有一套编剧手法。这场审判没有节奏，也没有起点或终点。多数日程都在律师与法官争论证据可否採纳，以及採纳次序之类的问题中度过。即使案件本身已经够荒谬，但争论的问题似乎全都与案件无关。被告的罪名从「参与公众骚乱」到「动用武力反抗政府」不一而足，最高可能求处五年有期徒刑。被告和律师的人数都太多，这些人全都大不相同，行动因此无法协调一致。一开始他们试过。当被告席里最年长的谢尔盖．克里沃夫（Sergei Krivov）宣告他抵制法庭，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其他人也全都保持沉默。但隔天，克里沃夫就毫无预警地违背承诺。

记者很快就厌倦了审判程序──没什么可报导的──不再前来旁听。玛莎不时会在脸书上发篇愤怒的文字，说这十二个人被抛弃了，有些记者和社运人士就会现身一两天。然后他们又回到各自的生活中。

萨沙在城里一间较好的公立小学就读一年级。幸运的是，学校和法院在同一条地铁路线上。但随后审判地点改成市郊的一处法院，玛沙的

晨间通勤距离因此拉长三倍。

人人都把这个案件称为「沼泽案」（Bolotnoye case）。完全正确。就连溺水的过程都是旷日废时的一团烂糊。玛莎的身体开始背弃她。她浑身疼痛。到了十一月，她开始吐血。医师们说，他们检查不出任何毛病。

註457：V.P. [Vladimir Pribylovsky], “Ponomarev Ilya Vladimirovich,” dossier, Antikompromat, http://www.anticompromat.org/ponomarev_i/ponom01.html；伊利亚．波诺玛瑞夫的所得申报资料，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俄罗斯分部存档，http://declarator.org/person/84/ ; Oleg Kashin, “Mnogolikiy Ponomarev,” New Times, October 29, 2012, http://newtimes.ru/articles/detail/58866（皆于二○一六年七月十八日浏览）。

註458：V. A. Istarkhov, Udar russkikh bogov (Kaluga, Russia: Oblizdat, 1999), copy found at http://www.libros.am/book/read/id/352959/slug（二○一六年七月十七日浏览）。

註459：编按：俄文形容词也有性别之分：它们按照所修饰的名词词性变格。例如：由于俄文的「广场」这个字是阴性，形容词「沼泽的」也就是阴性形式的Bolotnaya。「岛」这个字是阳性，因此同一个形容词就是阳性的Bolotny。「案件」（像是「刑案」）一词是中性，因此「沼泽广场案」的形容词就是中性的Bolotnoye。

註460：“6 maya: Chto dumayut po ‘tu’ storonu barrikad”，不知名记者拍摄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mgZqEMwZs（二○一六年七月十八日浏览）。

註461：“The World’s 100 Most Inf luential People: 2012,” Time, April 18, 2012, http://content.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completelist/0,29569,2111975,00.html（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浏览）。

註462：玛莉亚．巴隆诺娃（Maria Baronova）拍摄的纳瓦尼手持《时代》杂志照片：http://www.thetimes.co.uk/tto/multimedia/archive/00292/106154947_navalny_292144b.jpg（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浏览）。

註463：Doklad Komissii “Kruglogo stola 12 dekabrya” po Obshchestvennomy rassledovaniyu sobytiy 6 maya 2012 goda na Bolotnoy ploshchadi (Moscow, 2013), p. 9.

註464：“Moskva: 7 maya OMON ustroil pogrom v Zhan-Zhake,” Radio Liberty footage, http://truba.com/novosti-politika/video/moskva_7_maya_omon_ustroil_pogrom_v_kafe_zhan-zhak-335414（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浏览）。

註465：“Donbass Arena Ready to Open,” Donbass Arena website, July 2, 2009, http://donbass-arena.com/en/news/?id=9922（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浏览）。

註466：“Cyborgs vs. Kremlin,” undated report, Ukraine Today, http://cyborgs.uatoday.tv/（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浏览）。

註467：“Politsiya s utra vedyot obyski v kvartirakh oppozitsionerov,” Novaya gazeta, June 11, 2012, http://www.novayagazeta.ru/politics/53021.html（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浏览）。

# 第六部　镇压

## 第十八章　谢廖沙，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二○一二年五月六日过后，首先是震惊，而后是夏日的雾，以及沼泽广场案的逮捕—数月之内，二十多人遭到起诉（他们的案件被分割成几个部分，他们也被分组审判）。歷经将近六个月时间，震惊才得以消散，迷雾也充分平息，使得运动者们能对发生的事件自行展开调查。

二○一二年十二月，有二十六人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演员、学者、一名诗人、前异议人士，以及数名记者。每个人都以诚实正直闻名。他们的任务是审核数千页文件，包括运动者所蒐集的将近六百名目击证人的访谈，还有媒体报导、业余人士及专业人士拍摄的影片，以及沼泽广场案的案卷本身。

委员会确认了，当天在莫斯科就将近有一万三千名军警集结，其中八千多名部署于沼泽广场内部及周边。其中包括五千多名镇暴警察，以及约两千五百名内卫部队；其他则是交通警察或警校学员。每一名武装军警大约要应对最多三名无武装的抗争者。军警调度范围远及俄罗斯远东地区。

抗议组织者们不知道的是，警方在游行路线转进沼泽广场的岔道上部署了第二道金属探测闸门。先前集会使用过的沼泽岛，其大片区域也被警方用封锁线隔开。警方在这两项措施之间创造出瓶颈，先是让游行速度减慢，再让它完全停顿。集会的讲者们根本到不了臺前。因此先由尤达佐夫，而后由纳瓦尼呼吁群众就地静坐。

从委员会审视的影片中可以清楚看到，不同于玛莎所见，纳瓦尼不是唯一坐下的人，甚至不是第一个坐下的人；至少有一百人在不同时间点先后坐下，但他们的行动未经规划或协调，他们被一群群仍然站立着的人们隔开，甚至他们自己也不停地站起、坐下，显然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该怎么办。註468但在静坐还没开始之前，警方就接获命令开始进行逮捕—委员会从沼泽广场案审判中一名警官的证词取得了这个说法。换言之，事情与玛莎及许多其他抗争者以为的恰好相反，他们并非咎由自取：是警方先动手的。问题在于暴力行动是否经过预先策划。许多目击证人都回报，他们认为并看到了年轻男子渗透到抗争人群中。有些人说，这些男子直接被警察挥手放行，绕过金属探测器和随身物品搜查的步骤。这些年轻男子似乎就是夹带烟雾弹和易碎瓶罐进入、协助触发暴力行动的人。委员会得出结论：这次暴力事件是由政府当局谋划并

挑动的。註469

*

二○一二年五月七日，在镇暴警察持续于莫斯科市中心追捕配戴白丝带的人们之际，普丁宣誓就职。当天他签署了十二项命令，包括指示外交部在对美国及北约的关系上奉行警戒政策；指示内阁对移工推行强制性俄语及歷史教育；命令内阁「确保累积生育率（cumulative fertility rate）在二○一八年度前达到一点七五三」。註470接着普丁会晤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这次会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是普丁正式就职之后第一次会见外宾。

「尽管我国内政正在发生事端，但我要向您保证，总统办公厅、内阁，以及我个人，都会以二○一四年冬季奥运会为最高优先的准备事项。」普丁说：「我们认为此事至关重要。我们的合作会持续下去。」註471

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普丁数月之内几乎不提抗争，但他对罗格的谈话，却暴露了他惧怕外国人必定认为俄罗斯陷入混乱的窘境。普丁在二○○七年亲自前往瓜地马拉市，为俄国争取二○一四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他以英语和法语演说。但那场演说很怪异，在按照惯例承诺提供世界级设施、坚定提醒听众冬季运动在俄国的风行程度之后，普丁突然话锋一转，提及俄罗斯在歷史上蒙受的损失，即使不是在体育上的：「容我指出这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失去了所有的山地运动设施。你们能相信吗？直到今天，我国的国家代表队在俄罗斯境内仍然缺乏可供训练的山地设施。」註472

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将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予俄罗斯，是一种损失补偿，也是一种为它恢復体育运动设施及国家荣光的方式。这一计画的重大象徵意义，使普丁有必要在重新就任总统之后，首先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

然后普丁参加冰球比赛。他在一年半前才开始学习这项冬季运动，但身为业余队的一员迎战全俄明星队，他仍设法攻进两球，率队取胜。註473

隔天，普丁请求国会通过季米特里．梅德维杰夫出任总理的任命案。「我们的一切作为都是公开的。」普丁这么说，指的是去年九月两人宣布互换位置的意向。「丝毫没有能被解读为操弄的空间。」他并未直接提及抗争，但面对抗争者所指控的选举舞弊与窃占行为，态度十分明显：显而易见的事情哪有可能作假？国会通过梅德维杰夫出任总理之后，普丁留下来继续谈正事。正事多半是经济及人口议题。在经济方面，普丁指责国会议员提议的立法内容，显示出他们对基本经济实况缺乏理解。而在人口方面，普丁则赞许自己、梅德维杰夫和国会一同促成

了生育率提升。「这是明智的政策所造就的。」他指的是对怀第二胎的妇女提供现金补助。他暗示，现在或许正是研议在俄罗斯部分地区，将补助范围扩大到怀第三胎的时机。註474

隔天是胜利日。普丁在红场的演说臺，设于色彩缤纷的圣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附近—普丁并没有像苏联政治局的成员那样站在列宁陵墓顶端，但除此之外，苏联时代阅兵游行的样貌与感受全都回復旧观了。规模及象徵意义亦然—这场游行既是为了彰显俄罗斯的力量、又是确认它的权利而举行：

我们拥有强大的道德权利，以来秉持原则、坚决捍卫我国的立场，因为我国在对抗纳粹的战争中首当其冲……今天的青年是真正自由斗士的后裔……我们将永远忠于他们的英勇，这就意味着我们拥有未来註475……荣耀归于俄罗斯！

一万四千名男子完美地齐声三喲「万岁！」俄罗斯国歌（恢復使用苏联国歌）则开始演奏。註476

自从叶尔钦在一九九九年重新举办、普丁在二○○○年接任总统之后，胜利日游行逐步进化。普丁第一次在胜利日游行演说时，将重点放在这个假日对所有俄罗斯人的重要性。二○○一年第二次游行演说，他则以「荣耀归于俄罗斯」（Glory to Russia!）做为结尾—这句口号直到那时为止，仍是边缘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标志。年復一年过去，演说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当下、转移到了保持警惕的必要。参与阅兵的军队人数也增加，从二○○三年的五千人左右，增加到二○○八年的八千人，再到二○一二年的一万四千人。二○○七年，也就是普丁在慕尼黑演说中指控北约背叛和挑衅的那一年，他第一次运用游行演说明确指涉美国。他没有讲出国名，但他说，一如第三帝国的时代，今天也有一个国家具有「全球例外主义及发号施令的意图」。二○○八年，乔治亚战争那年，武器装备检阅（长长一队战车与导弹）自苏联时代以来第一次加入红场庆典之中。梅德维杰夫也在同一年正式就任总统，因此他这时和普丁并肩站立于观礼臺上，两人面前都有麦克风，彷彿两人要同时发表讲话。不过接下来四年都由梅德维杰夫发表演说。他的演说不以「荣耀归于俄罗斯」结尾，而选择了「祝大家伟大的胜利日愉快」。二○一○年是对德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外国元首受邀参加红场庆典，当天的游行内容加上了飞行表演，晚上的烟火表演则从十分钟延长为十五分钟，而且这一年首次宣布举行「全俄胜利日游行」—全国十九个城市举行全套阅兵游行，五十二个城市举行小规模阅兵游行。此后每一年都有飞行表演，全

俄游行也一样，举办的城市愈来愈多。註477

胜利日隔天，普丁搭机前往乌拉山区，参观乌拉尔车辆制造厂（UralVagonZavod），这家工厂才刚获得军方的鉅额合同。该工厂制造装甲运兵车、战车，以及被称作「终结者」的改造战车。「终结者」第一型不同于一般战车，有两门炮管加上两门榴弹发射器，「终结者」第二型则有两门炮管和装载四枚导弹的两组发射器。前一年十二月，普丁在电视上持久转播的热线—那场节目的开头是他坦白自己把白丝带误认为保险套—结尾是从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的厂房传来的一个视讯热线提问。在苏联工业美学的彩色重现版之中，约有六十个男人站在一起，身穿完全相同、刚熨好的黑橘两色制服，由一个站在中央的男人代表发言。他在制服外套下打了领带。

我名叫伊戈尔．霍曼斯基（Igor Kholmanskikh）。我是装配车间领班……我有个让我心痛的问题。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你来到我们的工厂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珍惜我们享有的稳定，我们不要时代倒退。我要对那些抗议说点话。要是警察不知道该怎么履行职责，要是他们对抗议无计可施，那么我和我的工人都准备好了，要站出来保卫我们的稳定。

「来吧。」普丁微笑着说。註478这些工厂职工随后组织了捍卫普丁委员会，他们在宣言中写道，普丁遭受「莫斯科游手好闲之徒」攻击。註479事实上，抗议也在乌拉尔车辆制造厂所在地，约有三十万人口的城市下塔吉尔（Nizhny Tagil）发生了，就在莫斯科沼泽广场第一次发生大规模抗争的十二月十日当天，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人走上街头。註480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的职工们坚守着只有大城市游手好闲的有钱人才发动抗议的这套叙述，并规划坐上战车，前往距离最近的大城市—叶卡捷琳堡—参加拥护普丁的反制集会。最后，他们被要求把战车留在工厂里。註481但如今普丁既然再度当上总统，他首次离开莫斯科的出访就是一趟感谢之旅—参访乌拉尔车辆制造厂。工厂职工祝贺普丁胜利日愉快，赞美他在冰球比赛的表现，并且又提到了抗争者。

「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份内事。」普丁这么说，意思是抗争者收钱办事—国营电视频道这时已经播送了一系列报导，指称抗议行动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

「国家需要稳定，你当然是唯一能为我们带来稳定的人。」其中一名工人说。註482一週后，普丁任命霍曼斯基为乌拉地区的总统全权代表—职涯从装配车间领班演变至此，堪称惊奇。以往只有得到信任的资深

官员会被任命为总统全权代表，其中大半是退役的军方高阶将领。霍曼斯基如今负责管辖人口合计一千四百万的俄罗斯六个地区，包含六位州长。

五月十日，普丁访问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的同时，政府请求国会通过《公众集会法》的一系列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将违反公众集会法令的罚款，大幅提高到相当于一千五百美元—对多数俄罗斯人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同时将「公众集会」的定义修改到了让警方得以随意把任何人群都归类为公众集会的地步。国会神速通过法案，大概是先前任何立法从未见过的。它在六月九日正式生效成为法律，就在一场预计要纪念一九九○年俄罗斯主权宣言的抗议游行前三天。註483

镇压迅速持续。《公众集会法》修订之后又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接受外国资金的非政府组织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从而令它们承受足以使其瘫痪的财务申报要求，同时发挥「红字」的功用—这些组织的所有公共传播内容都必须加上「外国代理人」字样，从名片到专栏特稿都要。八月，暴动小猫的团员们以「流氓」罪名被判刑两年，她们成了最先因为和平抗议而入狱服刑的人。在此同时，更多人因为沼泽广场案被逮捕。九月，《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健康及发展资讯法》正式生效；这时它经过修正，将网际网路纳入规范。十一月，间谍罪和严重叛国罪的相关法律也通过修正，用字遣词恢復到了成千上万人被罗织罪名处死的一九三○年代水准。按照新法规定，为那些被俄国认定具有敌对性质的国际组织工作，就有可能被控严重叛国罪。而在一个月前，俄国政府命令美国国际开发署停止在俄国境内活动；可想而知，如今新法可以用来对付该组织任何一名俄籍员工，或是它在俄国为数众多的合作伙伴。新法也使间谍罪可能适用于那些手握机密资讯却无意与外国分享、或从公开来源中蒐集到资讯的人们身上。註484十二月，表面上是为了回应美国通过一项新法案，对「严重侵害人权」的俄国官员实施制裁—即所谓《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得名于那位在莫斯科监狱里被凌虐致死的会计师—俄国通过一项法律，禁止美国人收养俄国孤儿，同时给予政府权利，立即查禁接受美国个人或组织任何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监督团体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将二○一二年的事态发展，称作「苏联时代以来最恶劣的镇压」。註485

这些新法律是完美的镇压工具—含煳地足以警告千百万人，但又可以选择性地应用。这些法律，包含在国会及电视节目上的讨论，则可视为一则完整的讯息。其示意着克里姆林宫如今掌控了一切，重新建立起严格的秩序。它们似乎也向俄国人民示意：现在该轮到他们执行秩序了。在叶卡捷琳堡，一群家长组成委员会，要求将多部书籍从市面上下架，并起诉出版商。这些书籍包括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的青少年小说《一起奔跑的人》（Someone to Run With），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是吸食海洛因成瘾的青少年；美国作家琳达和艾蕾雅．马达瑞丝（Linda & Area Madaras）的《我的身体》（What’s Happening to My Body?）丛书；以及三本关于青春期的着作。法院最后拒绝受理这起诉讼，但其中一家出版商已经把一次印量都作废，其他出版商也为了替自己的书籍辩护而投入大笔开销。同样的案件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为了求生，出版商（尤其是有触犯《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健康及发展资讯法》之虞的童书出版商）不得不停止发行可能将他们捲入诉讼的书籍。新法律的其中一项规定，禁止在任何供十二岁以下儿童阅读的书籍中提及死亡。「自然主义的」人体描写也同样禁止。可能因为一场大规模诉讼、甚至所有刷次被迫作废进而倒闭的出版商，只能谨小慎微以明哲保身。随着警惕的公民们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对藏书大发雷霆，书店和图书馆也不得不小心为上。註486自我审查是一种最纯粹的集体劫持形式。它又重新开始了。

*

列瓦达曾经从理论上说明过，周期性的抗争并不会改变苏联的社会结构。古德科夫进一步开展这个概念：周期性抗争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举措。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俄罗斯政权、限制又有多么严密，每隔一段时间，紧张总会在权威机构与社会（找不到更好的用词了—在一个公共领域几乎不存在的国家里，古德科夫只盼望有个词能形容「社会」，而不致让人立刻联想到西方社会）之间积累。这份紧张象徵着社会变革的潜力。列瓦达论证，每当这样的时候，社会都将从平静状态转为激越状态。国家的回应则始终是动用武力。

武力可以运用于国内，例如人们被逮捕、机构被关闭或整肃、法律限制更严格；也可以用于国外，像是发动战争。两种方法效果一样——一度变得更复杂的社会，重新恢復到极端简化的状态：我们、他们，以及为我们承担一切责任、获得我们全心信任的领袖。这让社会做为整体，感觉更好。平静得以恢復、变革则被预防、麻烦制造者也被制止。古德科夫开始将这个过程称为「夭折的现代化」（abortive modernization）。在苏联时代，镇压和战争以固定週期发生。古德科夫自己的研究生涯，以及列瓦达创立社会学学校的计画，都在一九六○年代晚期被一次这样的镇压中挫—当布拉格爆发抗议，而莫斯科也有人举行声援示威之后。当时只逮捕了一些人—多数人受到的惩罚是被迫放弃或中断他们的知识工作。其他人则仅被降职。这是国家恐怖在史达林死后运作的方式：惩罚少数人就足够压制许多人。

週期性的爆发，而后动用武力防止变革，这样的循环在苏联解体之后仍然持续。古德科夫这时开始重新思考苏联解体的歷史。若是将重建

过程与后苏联时代的第一年看成社会的「激越」时期，那么武力展示就发生在一九九三年，当叶尔钦炮轰国会大楼之时。它的效果一如预期，社会激烈地简化，叶尔钦确认了领袖地位──即使古德科夫心中真正想到的字眼，是俄文的「领导」（vozhd'）甚至是德文的「元首」──也正如激烈简化的时代一向发生的，民族主义茁壮成长。这就说明了季里诺夫斯基党派在一九九三年选举的大胜。二○○八年的乔治亚战争也发挥了同样功能。战争简直和镇压一样有效，因为两者都会让有意将事物复杂化的任何人名誉扫地。以下是古德科夫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想法很激烈──过去一个世纪可以看作是连续体，定期受到「夭折的现代化」碰撞。他用了整个成年岁月研究这个社会，结果其本质仍维持不变。这个想法之所以激烈，是因为没人愿意听。

*

倘若二○一一至二○一二年间在俄罗斯全境走上街头的人们，抗议的对象是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内含极权主义，且不论他们是否用了极权主义一词，那么，抗议的形式和口号就不像玛莎所以为的那样不合逻辑了。倘若极权政体的特徵之一是将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政治化，那么，极力非政治化的抗议就是一种适切的回应。倘若极权政体的特徵之一是抹灭国家之外属于个人的所有空间，那么，在被警戒线封锁的空间内举行抗议也就不是多么怪异的想法：协商出这种空间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因此，镇压从取消协商结果、在实体上摧毁抗议空间开始，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连抗争者及其反对者同样使用的「稳定」一词，在极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也有漫长的歷史。鄂兰指出，纳粹和苏联政权都会定期进行清洗或镇压，她将这些清洗和镇压称为「永远不稳定状态的工具」（an instrument of permanent instability）。变动不居乃是体制存续不可或缺的：「极权主义统治者必得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一种正常化，使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失去混血性质，在全世界各民族广泛不同而又深刻对立的各种生活方式中发生。」实际上，她这么写道：「关键问题在于希特勒和史达林都许诺要保持稳定局面，目的却为了掩盖他们想制造永远不稳定状态。」註487

当抗争者要求把「稳定」还给他们，他们所要求的是这种正常化。可是当来自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的一名普丁兵卒说，抗争者必须被粉碎，因为只有普丁才能确保稳定，他是在追求领袖的视野，真心诚意地请求领袖在当时当地动员他们。

*

俄国内外的社会科学学者，对于运用「极权」一词形容后苏联俄国

都嗤之以鼻。就连「威权」都有争议。镇压开始后不久，「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一词逐渐流行起来。最初的用语是「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由记者法里德．札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札卡利亚强调民主做为一种透过自由及公开选举选择政府的方式，与自由主义这项保卫个人自由的政治计画之间，有所区别；两者并不必然携手并进。政治学理论长久以来都承认自由专制政体（liberal autocracy）存在，例如奥匈帝国。如今则该承认其结果也必然存在。札卡利亚引用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和秘鲁，以及其他国家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不断侵犯宪法为保障个人自由而设定的权力限制。他也提到俄罗斯正面临这样的风险：

一九九三年，鲍里斯．叶尔钦出名地（而且名副其实地）攻击俄国国会，攻击行动是由国会自身的违宪举动所引发。接着他停止宪法法院运作，拆解地方政府体制，开除数名省长。从车臣战争到经济方案，叶尔钦习惯性地表现出对宪法程序及限制的漠不关心。叶尔钦很有可能本质上仍是个自由民主派，但他的行动创造了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我们只能盼望他的继任者不会滥用它。註488

「非自由民主」观念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旦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开始限制自由，就不太可能继续拥有真正自由开放的选举—即使事实上，选举仍定期举行。毕竟，就连苏联都有选举，根据苏联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此为不记名投票的直接选举：「禁止对选民的意志表达进行监督。」然而在鄂兰的命题中，就提到了极权政体如何剥夺臣民的意志，而再没有比选举制度更实在的呈现了—在苏联参与投票的每个候选人，全都能够顺利当选。

在普丁统治的俄国，多数选举都被完全消灭了。州长和参议员如今都是官派，下议院则由政党按选票比例组成，泰半消除了个人投票的意志。自二○○○年以来，每次选举的总统候选人，实际上也遇不到反对。尽管如此，还是有旗帜、看板、音乐会，以及其他选战所需的配备，也有投票。虽然看上去更像是西方民主政体了，但实际上却更像苏联。过了一段时日，「混合政体」一词取代了「非自由民主」。

在俄国，「混合政体」一词是由青年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Ekaterina Shulman）普及起来的。她写道：

混合政体是在新歷史时刻里的威权政体。我们知道威权政体与极权政体的差异：前者奖励被动，后者则奖励动员。极权政体要求参与，要

是你不参加游行，不跟着唱歌，你就不是忠诚的公民。反之，威权政体则试图说服臣民待在家里，任何太热中游行、太大声唱歌的人都是可疑的，不论歌曲思想内容或游行方向为何。註489

舒尔曼重申了胡安．林兹的定义，针对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做出差异，但省略了他对极权主义「完全政治化」与威权主义「非政治化」本质的区别。舒尔曼写道，混合政体是冒牌货，但西方观察家们往往只聚焦于假冒的其中一个面向：假冒民主。「很容易就能留意到，民主的门面是纸糊的，」她写道：「但更难理解的是，史达林的肌肉黏贴在上面。」她论证，普丁政权所动用的武力总量，按照二十世纪的标准其实微不足道。十几个政治犯之于极权主义恐怖，意义正如普丁每四年当选一次之于民主政体运行。她主张，混合政体藉由策略性地以不同程度同时模仿民主与极权，来延续其生命。

其他用以描述普丁政权的词语，还包括盗贼统治（kleptocracy）和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纳瓦尼「骗子小偷党」主题的变体。一位名叫巴林特．马札尔（Bálint Magyar）的匈牙利社会学家，拒绝接受这些用语，因为他强调，「盗贼统治」和「裙带资本主义」两者都必然包含某种自愿结盟，个人彷佛能够参与裙带系统或选择不参与，然后还能自主地—即使获利较少—做自己的生意似的。但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流亡国外的寡头们，乃至不知几千几万入狱或破产的企业家们，其命运都表明了这种想法纯属谬论。

马札尔出生于一九五二年，在匈牙利这个压迫相对较少的东欧集团国家长大。这使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但马札尔在一九七○年代晚期开始积极参与地下反对政治，因此遭受惩罚：他被禁止在大学任教、禁止前往西方国家。一九八○年代晚期，马札尔身为自由民主联盟—匈牙利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成了国家民主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到了二○○○年代，自由党逐渐失去政治地位，最终不復存在，马札尔重回社会学研究。而在维克多．奥班（Viktor Orbán）的新政权下，他再次被大学院校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于是也再次专注于研究东欧各国社会。

他强烈厌恶「非自由」之类的用语，因为这些用语聚焦于那种政权所不具备的特徵—像是自由媒体或公平选举。他认为这种用语宛如藉由「大象不会飞」或「大象不能游泳」之类的说法来描述大象—这完全没提到大象真正的模样。他也不喜欢「混合政体」一词，这在他看来彷佛是模仿出来的定义，因为它根本无法定义这个政权表面上混合了些什么。註490

马札尔开展出自己的概念：「后共产黑手党国家」（post-communist mafia state）。这个名称的前后两半都很重要。「后共产」，因为「民主大霹雳（democratic big bang）註491之前的状态，对于体制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它从共产独裁的基础上产生，是共产独裁衰败后所剩的残骸组建而成。」註492后共产国家的统治菁英最常出身于旧体制职官权贵，无论是党内还是祕勤部门。但在马札尔看来，这还不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徵。最要紧的是，一些旧势力集团演变成以单一个人为中心，由该人带领整个集团掌握权力。巩固权力与资源相对容易，因为这些国家直到不久前仍由一党垄断权力、由国家垄断财产。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情境：

在其他专制体系的例子里，或者……私有财产被转换成近似于国有财产，或者财产的正式分配多少未被触动……但在歷史上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国有财产根据可疑的规范而全被转换──至少在这些规范的社会接受度这方面是可疑的。当意图是创造出一层私人持有者，那就彷佛是意图从鱼汤里养出鱼来。註493

这些集团夺取的财产与权力，并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合法持有者。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出奇简单。

按照马札尔的定义，黑手党国家不同于其他由一人统治、一小撮菁英围绕于领袖身旁的国家。在黑手党国家里，这个小小的权力集团结构就像个大家族。家族的中心是家父长，他并不统治：「他处置──地位、财富、身分、个人。」註494整套体系的运作宛如共产时代分配经济的讽刺画。家父长及其家族只有两个目标：积累财富、集中权力。家族般的结构严分阶序，家族成员身分只能经由出生或收养取得。在普丁的例子里，他最内圈的亲信由从小在列宁格勒街头和柔道馆一起长大的人们组成，第二圈包含他在国安会／联邦安全局的同事，更外圈则是他在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同事。他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会「收养」某人进入家族，像是原先没没无闻的装配车间领班霍曼斯基，一举被提升到某种第三代堂表兄弟的身分。一个人不可能自愿离开家族：他只能被驱逐、被断绝关系和被剥夺继承权。极权主义国家的两大支柱──暴力与意识型态，成了黑手党国家手上区区一个工具而已。

*

用马札尔的话来说，后共产黑手党国家是一个「运用意识型态（ideology-applying）」的政体（反观极权主义政体则是「受意识型态驱动」〔ideology-driven〕）。镇压同时需要武力与意识型态。武力工

具（镇暴警察、内卫部队、甚至洗街车）尽管伸手可及、随时可用，意识型态却显然不那么容易取得。直到二○一二年春天，普丁的意识型态大戏，由「稳定」、哀嘆苏联帝国的逝去所构成；恢復苏联美学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神话虽罕见提及，却不断被明确宣示；另外就是美国与北约过去如何欺骗俄国、如今又施加威胁的笼统陈述。所有这些成份在「预防性反革命」期间都运用过，当时全国、尤其是年轻人都被召唤起来，与当时受到美国鼓动、危害稳定的橘色威胁战斗。普丁在十二月第一次回应抗议时，也运用了同一套形象。但杜金这时坚称这么做还不够。

十二月底，杜金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预言普丁若是继续忽视思想与歷史的重要性，就会垮臺。註495在杜金看来，普丁处理思想与歷史问题时，太过零星而不协调，由此显示了他认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到了二月，杜金应邀在反橘色势力集会中演说，这场活动由克里姆林宫策划，恰好与莫斯科的一场大规模示威抗议撞期。这是杜金至今为止最主流的一次公开露面。他从俯首山（Poklonnaya　Mountain）上一座舞臺向数万人讲话——这里存放着莫斯科从拿破崙到希特勒以来所有战胜侵略者的纪念碑——听众中至少有一部分从其他城市或市镇乘坐巴士前来：註496

亲爱的俄罗斯人民！美利坚全球帝国想尽办法要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纳入掌控。他们到处任意干预而不徵求允许。他们运用第五纵队介入外国，以为这样就能让他们接管天然资源，支配各国、各民族和各大陆。他们侵略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也被排上日程。但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俄罗斯。我们是阻止他们建立全球邪恶帝国的最后一道障碍。他们在沼泽广场和政府内部的代理人用尽各种手段削弱俄国，好让他们将我们完全交付给外国掌控。要抵抗这个最严重的威胁，我们一定要团结动员起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俄罗斯人！记得几千年来我们都保卫着我们的自由与独立。我们洒下自己和他人的海量鲜血，让俄罗斯得以伟大。俄罗斯一定会伟大！否则它根本不会存在。俄罗斯就是一切！其他都毫无价值！

舞臺上的其他男人也跟着喊这句口号。他们向空中高举右拳。

俄罗斯就是一切！其他都毫无价值！荣耀归于俄罗斯！註497

那天莫斯科的气温远在摄氏零度以下。沼泽广场的抗争者仍然站了出来，「反橘色势力」示威者则搭巴士前来，但演讲长话短说。尽管如

此，杜金的两分钟陈述仍然揭示了他所提倡的意识型态，其重点是：俄罗斯是伟大的，它是耸立于我们所知世界与美利坚全球联邦之间唯一的屏障。它包含了佛洛姆确信为法西斯意识型态关键所在的「过去崇拜」。这场演说藉由将美利坚帝国想像为「邪恶」（随手翻转了雷根的用法），暗示了俄罗斯独一无二的美善。这个观念在数日后杜金与十多位高度知名人士共同签署的一份《反橘色势力公约》（Anti-Orange Pact）里表述得更清楚。公约如此开头：

我们因为理解到橘色势力的攻击，必须团结起来抵抗，橘色势力正瞄准了我们共有的基本价值。註498

「价值」这个字是新词，而且是关键词。这套新生的意识型态如今具备了所有构成要素：国族、过去、传统价值、外部威胁，还有第五纵队。

*

杜金倡议的框架正适合镇压，它将逮捕行动、「外国代理人」法，以及由社会施行的新审查制度全都结合起来。它们全都以剷除第五纵队、保卫俄国价值的名义实施。暴动小猫由于体现了第五纵队的影子，又明显蔑视俄罗斯的传统价值，因此在镇压中成了最先被判入狱的人。一切都理所当然。她们因抗议被捕，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亵渎神明而受审。法庭证词的重点在于她们划十字的动作是否正确，以及在教堂内裸露出多少皮肤，还有些讨论涉及她们是否被异物附身。

马札尔所描述的国家，在此与古德科夫所描述的社会结合了。当国家只把武力及意识型态用作工具，社会的反应也就一如先前几代人对武力及意识型态两者的回应：动员。俄罗斯是一个统治着极权社会的黑手党国家。

「夭折的现代化」随着愈来愈多人因为沼泽广场案被捕而持续着。这些逮捕的作用一如苏联时代的选择性逮捕：它们发出警告。沼泽广场案的被拘留者看来几乎是随机选定。没有任何人是抗争领袖，事实上，多数人就算在抗争者圈子里名气都不如玛莎。由此传达的讯息是：一般民众参与抗议是危险行径。一如在看似随机逮捕的案件中总是发生的状况，人们试图从中辨析逻辑。有个公众观点普遍流行起来，那就是在其他抗议事件中被拘留过的人，以及在沼泽广场暴动的影片里被拍到的人，都是当局锁定的目标。许多青年行动者逃往国外，在乌克兰、波罗的海诸国、瑞典及芬兰等国寻求庇护。尽管如此，仍有数百人被警方留下拘留纪录，也有数百人在沼泽广场冲突的影片中被拍到，但他们多半

没被逮捕。这正是恐怖的运行方式：威胁必定是可信而又不可测的。

抗争领袖也必须予以压制。克里姆林宫在这一点上小心翼翼，或许是担心因追逼太紧又引发更多抗争。尤达佐夫被软禁在家。他在禁闭期间不得与家人之外的任何人联繫，也不得使用网际网路。但他仍不同于数十位更不知名的运动者，他还享有在干净床单上睡觉、与妻子同床的奢侈。没有多少人能起身抗议尤达佐夫所受的待遇。过了一年多，等到尤达佐夫确实从大众视野中销声匿迹，他就因为组织暴动被定罪，判处入狱四年半。註499卡斯帕洛夫被施压要求移民，否则将被起诉；他最终移居纽约。涅姆佐夫接二连三收到死亡恐吓。

纳瓦尼则在一个怪异的侵占案件中成为被告。他被控利用基洛夫地区自由派州长的不支薪顾问职务之便，安排从当地的国营林业公司盗窃大量木材，导致五十万美元的财务损失。註500这些罪名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第二次受审时被指控的罪名如出一辙—他因为从自己的公司盗取原油而被判有罪。纳瓦尼被指控犯下的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荒谬事。国家甚至提不出这笔钱损失的证据。但在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他还是被判有罪，处以五年有期徒刑。

社群网路上充满了愤怒的表述，以及更重要的：无法置信—即使案件、判决和刑期都符合了镇压的整体逻辑。谢廖沙读到人们策划在宣判当夜于红场外的驯马场广场（Manezhnaya Square）集会。每个人都如此称呼这场集会：「人民会议」——一如市镇会议。当然，不论由谁安排，它都预期了法院的判决必定不公正。但当确切刑期传来，人们还是为之震惊。心智的运作真奇怪，某件事可以既不出所料，同时却又令人震惊。

谢廖沙那天晚上大约六点来到了驯马场广场。他是首先抵达的两千人之一。警方将某些早到的人封锁在一片人行道上，并且关闭了最近的地铁站，但人们还是持续从其他街道前来，加入了被分割成三到四块的群众。合计约有一万人。这次「会议」并未取得许可。在场的每个人都面临被捕关押和鉅额罚款的风险。谢廖沙从未见过人们如此行动。这样的事情上一次发生—莫斯科人前一次冒着巨大的潜在危险走上街头，只因为他们无法留在家里听任事情发生—是一九九一年八月，那时谢廖沙九岁。

谢廖沙花了这么多时间思考人与抗争。镇压开始之后，他仔细思量，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停止工作了。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剪裁白丝带。这样讲可能太夸张，他也设计海报和横幅，协助其他计画之类的事，并参加抗议工作坊。他庆幸自己有能力这么做。他还有一间继承得来的公寓，以及够赚钱的职业，让他得以储蓄。

然后规则改变了，抗议成了几乎玩不起的高风险游戏。谢廖沙还是相信抗议。或者说，他仍然相信，当投票权被扭曲、法院也被篡夺，身为公民唯一能做的事，也必须做的，就是走上街头。但他同时又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没有权利这么说。他寻找着这种权利，挖掘自己的灵魂，想要找出自己呶吁人们承受风险挺身抗争的权威来源，但他找不到。一个人若要呶吁他人冒险失去自由、冒险落入俄罗斯监狱，他必须十全十美无可非议。谢廖沙并不十全十美。

但此时此刻，所有在这里的人都不请自来，也不问谁何去何从，自愿留下。这看起来就像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人们站立着。一开始，他们手勾手站着，和面前一排镇暴警察大眼瞪小眼；然后，过了一小时、两小时或三小时，抗争者们放开手。有些人唱起歌来，包括激励人心的俄国战争名曲；其中一首歌呶叫人们站起来，用在这里似乎很适当。有个女人从包包里拿出一本书，站在原地开始朗读。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开始喊口号：「自由！自由！自由！」或者「普丁是小偷！」或者「我们不怕！」突然在某个时刻，有消息传出检察署请求法官暂缓执行纳瓦尼的刑期，但没人相信——至少谢廖沙不信——每个人都继续留下。他们在国会大楼正面贴满了红色的圆形「纳瓦尼」贴纸。人们爬上国会大楼挑高的一楼窗臺，站在那儿，无惧于警察、罚款和摔落。这场抗议的感觉前所未有，更无关乎开玩笑、和志同道合的人叙旧、或标明非政治空间。这场抗议是关于战斗。这一点无可非议。

约莫在晚上十一点，警方似乎接获了命令。他们开始冲向群众，把人抓住，扔在地上，然后拖上囚车。他们对剩下的群众咆哮着立刻解散。有些人走开了。谢廖沙和一群人在一起，人数合计约有一百人，他们穿插在警察的队列中间。他们一开始快乐地抵抗。镇暴警察沿着街道驱赶他们——警棍打在背上很痛——但谢廖沙多半不认识的人们边笑边走，假装自己在夏天夜晚出门散步；接着大家原路折返，再次展开抗议。但这群人不断减少，广场上的人数也愈来愈少。午夜过后，谢廖沙成了现场的最后一人。但他因此就无可非议了吗？

他回到家。隔天早上，他得知大约有两百人被拘留，而纳瓦尼即将获释。这种事依照法律不可能发生：刑期宣判之后，非经被告上诉，法律上没有任何条文让检方得以要求暂缓执行。表面看来，抗争者获胜了。但感觉却一点都不像。那天早上的感受很糟，彷彿这里没有未来。註501

註468：Video of sit-in, published April 21, 20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WRHahkgoo&feature=youtu.be（二○一六年七月二十日浏览）。

註469：Doklad Komissii “Kruglogo stola 12 dekabrya” po Obshchestvennomy rassledovaniyu sobytiy 6 maya 2012 goda na Bolotnoy ploshchadi (Moscow, 2013), pp. 52-67.

註470：“Ukaz o merakh realizatsii vneshnepoliticheskogo kursa,” May 7, 2012, http://

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56 ; “Ukaz ob obespechenii mezhnatsional’nogo soglasiya,” May 7, 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40 ; “Ukaz o merakh po realizatsii demograficheskoy politiki,” May 7, 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57 （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生育率从二○○六年开始就提升，五年内从每位妇女生育一点三名子女增加到一点六名。一点七五三这个古怪的数字，可能是假定生育率会按照这道命令之前的相同比率维持成长而估算来的。但在命令下达之后，联邦统计局回报，必要生育率突然窜升。Fertility rate, total, Russian Federation, 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locations=RU（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71：“Vstecha s prezidentom MOK Zhakom Rogge,” Kremlin transcript,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35（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72：普丁在瓜地马拉市演说影片，今日俄罗斯电视臺（RT）片段，二○○七年七月五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No3DxWaW4（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73：“Vladimir Putin prinyal uchastiye v gala-matche lyubitel’skoy hokkeynoy ligi,” Kremlin report, May 7, 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60（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74：“Plenarnoye zasedaniye Gosudarstvennoy Dumy,” Kremlin footage, May 8, 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66/videos（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75：编按：普丁使用的说法是「这里有未来」（budushcheye yest’）□□不言自明地回应了更普遍通行的俗语「这里没有未来」。

註476：“Voyenniy parad v chest’ 67-y godovshchiny Velikoy Pobedy,” Kremlin footage, May 9, 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71（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77：歷年胜利日游行影片：20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6xWUqW5e0o; 20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zUNq6kkFE; 20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uT-3jeDoc; 20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VwGnCXBk; 20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UVMmOwDCZI; 20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W1vtc-euY; 20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WZCmqvkRY; 200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3Z0VsHemI; 200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_5Fr6xc38; 20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8_Q2aB3WhM; 20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Nv9a7ODxQ;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2zK-ihbCF0（皆于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浏览）。

註478：“Razgovor s Vladimirom Putinym 2011 (polnaya versiy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DGhhcBKdI（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浏览）。

註479：“Rabochiy klass Urala! Trodovoy narod Rossii!” appeal from Putin defense committee at UralVagonZavod, December 29, 2011, http://www.uvz.ru/news/3/128（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80：“Vybory: Aktsiya ‘za chestniye vybory’ v g. Nizniy Tagil,” December 10, 2011, http://kushvablog.ru/vibory/2828-akciya-za-chestnye-vybory-v-gnizhnij-tagil.html（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81：“Rabochikh Uralvagozavoda ne pustyat na tanke v Yekatirenburg,” grani.ru, January 16, 2012, http://graniru.org/War/Arms/m.194881.html（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82：“Poseshcheniye nauchno-proizvodstvennoy korporatsii ‘Uralvagonzavod,’” Kremlin report, May 10, 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82（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83：关于法案第70631-6号，“O vnesenii izmemneniy of Kodeks Rossiyskoy Federatsii ob administrativnykh pravonarusheniyakh i Federal’niy zakon ‘O sobraniyakh, mitingakh, demonstratsiyakh, shestviyakh i piketirovaniyakh’ (v chasti utochneniya poryadka

organizatsii i provedeniya publicnykh meropriyatiy, prav, obyazannostey i otvetstvennosi organizatorov i uchastnikov publicnhykh meropriyatiy)"通过的歷程，参看http://asozd2.duma.gov.ru/main.nsf/%28SpravkaNew%29?OpenAgent&RN=70631-6&02（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84：Petr Orlov, "K Bondu ne khodi," Rossiyskaya gazeta, November 14, 2012, https://rg.ru/2012/11/13/taina-site.html; "Russia Expels USAID Development Agency," BBC News, September 19, 2012,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9644897（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85："Russia: Worst Crackdown Since Soviet Era," Human Rights Watch, January 31, 2012, https://www.hrw.org/news/2013/01/31/russia-worst-crackdown-soviet-era（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486：Masha Gessen, "Russian Purge: The Horror Story of Publishing Children's Books in Russia," The Intercept, February 17, 2016, https://theintercept.com/2016/02/17/the-horror-story-of-publishing-childrens-books-in-moscow/（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浏览）。

註487：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p. 390-391. 译者按：此处中译参看鄂兰着，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页四○四；「永远不稳定状态的工具」一词，参看该书页五八一註三，略有改动。

註488：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7, pp. 22-4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997-11-01/rise-illiberal-democracy .

註489：Yekaterina Shulman, "Tsarstvo politicheskoy imitatsii," Vedomosti, August 15, 2014, http://www.vedomosti.ru/opinion/articles/2014/08/15/carstvo-imitacii（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浏览）。

註490：作者访谈巴林特．马札尔，二○一五年六月十三日在布达佩斯。

註491：编按：马札尔在此指涉的是认为这些国家的歷史始于共产主义终结的倾向。

註492：Balint Magyar, Post-Communist Mafia State: The Case of Hungary, trans. Balint Bethlenfalvy et al.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68.

註493：前引书，p. 69。

註494：访谈马札尔。

註495：Alexander Dugin, "Gorizonty bolotnoy revolutsii," Evrazia, December 23, 2011, http://evrazia.org/article/1873（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496："Serdtsu ne prikazhesh," lenta.ru, February 5, 2012, https://lenta.ru/articles/2012/02/04/poklonnaja/（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497："Alexander Dugin na Poklonnoy . . . ," video footage of rally, February 4, 2012, http://hlamer.ru/video/234949-Aleksandr_Dugin_na_Poklonnoiy-Rossiya-vse_ostalnoe-nichto04_02_2012（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498："Zapis' zasedaniya Antiorangevogo komiteta of 10.02.2012," video foot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L0e1BVlRwk（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浏览）。如今在网际网路上已无取得这份公约的文本，但公约全文在这部影片中宣读出来。

註499："Sergei Stanislavovich Udaltsov," biography, gazeta.ru, http://www.gazeta.ru/tags/udaltsov_sergei_stanislavovich.shtml?p=bio（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500：编按：这位州长恰好就是涅姆佐夫昔日的盟友，「另一位廖沙」曾经效力过的前彼尔姆市议员尼基塔．贝利赫。

註501：Masha Gessen, "Alexey Navalny's Very Strange Form of Freedom," newyorker.com, January 15, 2016,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alexey-navalnys-very-

strange-form-of-freedom; Masha Gessen, “That Blunt Russian Forc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2, 2013, http://latitude.blogs.nytimes.com/2013/07/22/that-blunt-russian-force/?_r=0（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浏览）。

# 第十九章　廖沙，二○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二○一二年八月，廖沙接到大学行政部门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必须向警方申请良民证（police clearance），才能继续教书。每个人都接到这样的电话，包括一个在百货公司玩具部门上班的朋友的朋友。行政部门解释，这是新规定，并不针对个人。

俄罗斯劳动法一向禁止被定罪的重罪犯从事教职。只是地方政府过去从来不曾想到要把这些规定适用于卖玩具的人，或是在大学院校教书的人。如今有些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全国都在搜查「恋童癖游说团」。二○一二年春天，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在禁止某人执教的一长串理由之中，增加一项「『反国家罪』判刑确定」。全国人民都成了秩序的执行者。註502廖沙去了警察局，取得自己不曾因暴力、性及政治罪行被定罪的证明。

到了八月，他觉得还行。二○一一年十一月，圣彼得堡通过了对「同性恋宣传」的禁令，註503但他以为，这种禁令不至于在联邦层级通过。毕竟，这并非俄罗斯第一部内容如此的市政条例。尽管如此，圣彼得堡仍是全国第二大城，而且是普丁出身的城市。此外，这项条例在当地还有一位特别重要的倡导者，此人是市议员维塔利．米洛诺夫（Vitaly　Milonov）。廖沙身为学者很难不留意米洛诺夫，但身为男同性恋，他觉得此人前所未有地令他感到作呕和惧怕。华丽而有时显得女性化的米洛诺夫，散发出男同志的信号—即使他现在的阅听人显然不这么看。廖沙知道，这样的事情过去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米洛诺夫是这么介绍圣彼得堡市政条例的，该条例将「同性恋宣传」的罚款从一百美元左右提高到约一千五百美元：「性偏差风行的浪潮对我们的儿童产生了负面影响。」他的议员同僚们不只支持他，他们想要更进一步。「被恋童癖伤残的儿童跳出窗外，他们自杀了，」另一位市议员在讨论法案时说：「恋童癖是对儿童生命的威胁。这种宣传至少应该判处二十年徒刑。」其他市议员接着喊话，让米洛诺夫反倒像个温和派。註504

这项条例一通过，二○一二年八月当玛丹娜要在圣彼得堡办演唱会时，米洛诺夫就试图让她因涉嫌宣传相关行为而被罚款。註505其他市议员则想查禁一家名为「彩虹」的连锁药局，以及一款受到消费者欢迎，包装上印有彩虹的乳酪。註506米洛诺夫继续加码。他和一个名为「家长监护」（Parental　Control）的组织合作，开始猎捕（这是他的用词）恋童者。这是老套的诱捕技术：乔装成青少年男孩的「猎人」在社群网路上和男人约会并敲定日期，最后在电视记者的陪同下现身。那些人被迫在摄影机前承认他写过讯息给那名虚构的未成年人，随后被送交警察

局，以「同性恋宣传」罪名立案侦办。註507在新条例下，根本无须证明讯息内容是否具有性意味，就连「会更好的—你可以开心又快乐」这样无害的讯息都明显违法。米洛诺夫下一个立法动议，则是要对教师施行强制心理测验以汰除恋童者—这个想法其实很合理，既然全国各地的精神科医师都在学习诊断「恋童性倾向」的话。註508

「同性恋宣传」禁令在二○一二年三月于联邦层级推行。国会家庭委员会主席叶莲娜．米兹丽娜接续领头倡议—她如今终于也得到了全国知名度，而且略胜米洛诺夫一筹。她为《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健康及发展资讯法》提出修正案，是属于她的计画。註509但国会法制局（parliamentary office of legal review）似乎对这项法案有所疑义—它指出，俄罗斯法律并未明确定义「同性恋」一词。註510廖沙认为这或许是一种巧妙又墨守成规的封杀法案方式。但米兹丽娜随即以一封长信还击：

同性恋宣传遍布今天的俄罗斯：有同志游行、示威，还有支持同性婚姻的电视及广播节目，白天在所有频道上播放。

同性关系宣传如此广泛地散播，对儿童的人格发育施加了负面影响，冲淡了他对于家庭是男女结合而生的概念，实际上创造了条件，限制儿童长大后选择自身性偏好的自由。註511

显然，只有恋童癖游说团才会主张延迟法案通过，这项法案在联邦国会里被称为「取消传统家庭价值之宣传」禁令。

而在电视上，争论的重心并不在「同性恋宣传」是否应当禁制，而是如同圣彼得堡市议会一般，在于这项措施是否足以保护儿童。

除了向青少年宣传而对同性恋罚款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禁止他们捐血和捐精，要是他们死于车祸，我们也要把他们的心脏埋在地下或烧掉，因为他们不适合捐赠器官维持他人生命。註512

这段话出自全国最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发表于最大的国营电视频道一部长达一小时半的特别节目开头。该节目的架构设定为辩论或模拟法庭，每一方各有两名对造和三名证人，皆为知名人士，也都是异性恋。而且说巧不巧，禁止同性恋的一方每个人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对手则是两名犹太人、一名乔治亚人和一位美国公民—老异议人士卢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支持禁止的一方细数二十世纪反同性恋法律的

光荣歷史。史达林和希特勒都迫害同性恋者，两人都认为同性恋者可能是间谍，也都认为他们将道德败坏传给军人。看来，反同性恋法律是强大国家权力的一项属性。支持禁止方的一位神父指出，情报机构确实更容易吸收同性恋者，因此同性恋者做为间谍的认知有其事实根据。难怪战争都结束了，西德政府仍遵照希特勒重新修定的法律形式维持禁制。这是健全的政策。但苏联一解体，俄罗斯却愚蠢地急于抛弃苏联对鸡姦的禁制。

「他们不能生育，」那位知名电视主持人，也是支持禁制方的队长季米特里．基谢列夫（Dmitry Kiselev）表示：「这让他们不得不偷窃健康的大多数人生下的婴儿。」同性恋宣传正是这种窃盗行为的工具。

支持禁制方的一名律师宣读宪法法院对于「同性恋宣传」的定义：「足以对儿童身体及精神发展造成伤害，在他们心中创造出传统与非传统婚姻关系社会地位平等之错误印象的资讯。」换言之，这项禁制的明确意图，正是要庄严地将次等公民地位明载于法律之中。

反禁制一方努力不懈，但理性在煽动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反禁制一方的队长是歷史学家，也是知名电视人物尼古拉．斯瓦尼泽（Nikolai Svanidze），试图表达这一切关于同性恋的讨论，都是为了将大众关注从重大问题上转移开来的操作。

「你是说孩子不是重大问题吗？」支持禁制方怒吼起来：「我们在讨论的是孩子！我们的孩子！」

基谢列夫在结案陈词中说道：「此时此刻，我们特别需要保护我们生下的孩子。我们都想要他们被爱、活得长久，带给我们抱孙子的喜悦。性少数却有不同打算。」

斯瓦尼泽则向阅听人发问：「想像一下，你自己的孩子有着非传统的性向。你会爱他爱得更少吗？你会想看到他被霸凌吗？」

观众们在节目进行中可以打电话进来投票给任何一方；斯瓦尼泽的票数从头到尾都增加得比基谢列夫更慢，此时更完全停止不动。俄罗斯的电视观众不愿意想像自己会有个同性恋孩子。斯瓦尼泽一方以七千三百七十五票对三万四千九百五十一票的差距大败。

同性恋者被塑造成了完美的替罪羊—他们是间谍，有损军心且危害儿童。且不论他们受到怎样的接纳，一切都是一九九三年在西方压力下所铸成的大错。禁止同性恋，或至少把他们关起来，是通往健康与强大的捷径，是对西方世界的斥责，也是民族人口繁盛和健康的保证。

即使是这样，当法案在国会延宕，时隔半年都还没付诸表决时，廖沙仍努力说服自己法案可能不会通过。

*

彼尔姆州州长奥列格．丘库诺夫在二○一二年四月辞职：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国营电视臺攻击了一段时日。註513他的「文化革命」计画资助者撤出了彼尔姆，戈尔捷耶夫辞去参议员职位，出售了公司，从大众视野中销声匿迹。前政治技术专家、艺术品经销商盖尔曼还在经营彼尔姆当代艺术博物馆（PERMM）。他为二○一三年的白昼之夜策划了几个节目。其中一个名为「俄罗斯巴洛克」（Russian Baroque）的展览被发现展出二○一一至二○一二年间街头抗争的照片，而被市府当局关闭。另一个节目〈欢迎你！索契二○一四〉（Welcome! Sochi 2014）则讽刺冬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这个节目才刚开始就立刻被下架。没多久，盖尔曼就从博物馆馆长职位上被撤换。再过不久，他带着全家人和策展计画一同搬到了蒙特内哥罗（Montenegro）。註514

二○一二年九月，学期照常开始，只是教学变得更难了。廖沙提交了一章论文给系上年鑑，章名为「俄罗斯的酷儿认同与人权论述」。系上的人们给予他好评。人人都喜欢这份论文，廖沙对它和自己的同事都感到开心，他们正是优秀的学者，彷彿电视上的疯狂不曾发生。然后是审查会议，结果同样这些人把这份论文批判得一文不值。他们说这是政治，不是学术。廖沙说他很乐意重写论文，但会议的共识是这篇论文无药可救。

当初系主任要求他收敛研究，结果建议演成一道命令。系上不再允许廖沙出国参加LGBT研究会议，即使旅费由对方出资；他以个人身分前往的话不受限制，但不得提及大学之名。系上新获得一笔研究社群媒体的经费。廖沙只可以在这项计画的贊助下参加国际会议──换句话说，他只要变更研究主题就好。他也这么做了。他开始撰写关于社群媒体的论文。然后他到瑞士和柏林参加会议，发表论文讨论「社群网路做为新衣柜」。他回到彼尔姆，没人发表任何意见。除了有一次，一位朋友从一场会议上发讯息给他──那时她坐在系主任旁边，系主任抱怨廖沙让系上暴露于风险之中：「我特别照顾一个玻璃，得到的回报是这样。」系主任说。这位朋友在文字讯息中全文引述了系主任的话。

这些都是事实。廖沙是个玻璃，系主任也一直很照顾他。她对他非常宽容，也很关心他，也向他推心置腹。但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打了一道耳光。

他和达莉娅还是拥有他们的性别研究中心。他们也还有经费举行一年一度的「社会科学中的性别面向」研讨会，为与会者购买茶点，并印行三百本会议论文集。

那年秋天，他和达莉娅被召唤到系上的一场会议报告中心工作。他

们决定由达莉娅报告整体工作成果，廖沙报告工作的LGBT面向。他更擅长保持冷静。

「你和我，」廖沙对系上同事说道：「我们说，我们在生产知识。LGBT人群是存在的。他们的经验是一项政治因素。」

这不是开玩笑。只要打开电视，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LGBT人群是政治中的唯一因素。系上教职员沉默地听着。那是一种可怕的、愤怒的、尴尬的沉默，但他们什么也没说，这意味着性别研究中心至少目前为止还能继续存在。

中心的许多工作是在大学之外进行的。达莉娅和廖沙很久以前就同意，教育大众性别知识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达莉娅在俄罗斯社群网站VK上（稍早名叫VKontakte）经营一个公开页面。但这件事开始变得困难起来，人们写下各种仇恨讯息，有些评论者甚至是他们以前的学生，这些人如今指控廖沙和达莉娅宣传同性恋。每次发生这种事，达莉娅都想关掉公开页面。仇恨讯息吓不倒她（她确实无所畏惧），但它们很伤人。廖沙劝阻了她。这是工作。他们在生产知识。

*

廖沙的「社群网路做为新衣柜」概念，与他自己的生活有所关联，其中许多是在线上发生的。就在他和另一个廖沙绝交后不久，一个名叫米佳（Mitya）的男人在VK上写讯息给他。他们见过一回，就在其中一场盛大的彼尔姆「文化革命」活动中。米佳有一份乍听之下难以理解的工作──他是个行销教练（marketing coach）□□以及奇异的「莫斯科生活」方式。他冥想、骑脚踏车运动、注意饮食。他有冲劲又有野心，催促着廖沙把诗作投稿争取表扬。他也要求廖沙开始照顾身体，尤其在廖沙的肾脏问题加重了之后──这是廖沙在索利卡姆斯克游戏场上，因同性恋身分遭到痛打的后遗症。他们传讯息聊大小事──他们做了什么、世界是什么模样、爱又是什么。但他们没有相约见面。他们开始传讯息一年多以后，米佳邀请廖沙到他家乡下诺夫哥罗德度过几天。那是美好的两天三夜。天候酷寒，但他们照样出门散步。彼此的谈话轻松又有趣，性爱也一样。但接着他们又将近一年不见，然后又是一年。在这中间，米佳有时一次消失几週或几个月，然后出乎意料地在Skype上现身，彷彿从未离开过。

安德烈出现在米佳其中一次缺席之时。他和廖沙同一年从彼尔姆国立大学毕业。廖沙在大一时暗恋他，但两人不曾真正交谈过──安德烈出身于富有人家，在不同圈子里交游。如今他是日内瓦的一名律师。他造访彼尔姆的时候，两人再次相逢，很快就开始每天用Skype通话。廖沙谈到系上施加的压力。

「你还留在那里干嘛？」安德烈问，意思是说：你还留在俄国做什么？「你得出来。你得开始学英文。」

安德烈不停抱怨他住在纽约的女友，直到有一天，他才承认其实那是男朋友。

「我知道。」廖沙说。

在这之后，廖沙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安德烈出柜的过程中指导他。

或许那不尽然是衣柜，但廖沙的社交和情绪生活被整齐地划分开来。在彼尔姆，他有自己的工作，达莉娅是他的密友和合作伙伴。他的爱情生活则发生在讯息中，在米佳消失的时候则只存在于想像中。他的情绪支持则由安德烈经由Skype提供。

二○一二年秋天，廖沙在巴塞尔（Basel）的会议上发表「社群网路做为新衣柜」的论文之后，顺道路过日内瓦探望安德烈。他才刚回到彼尔姆，就去和一名朋友见面共进晚餐；那个朋友带来另一位朋友。结果廖沙无法停止说话—关于会议、论文，还有日内瓦。如果他没有立刻听到那位朋友的朋友回应，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自我意识过剩—幸好他传讯息对廖沙说自己是刮目相看的。那位朋友的朋友名叫伊利亚。

伊利亚小廖沙几岁，最近才从化学系毕业，从事服务生的工作。和他约会很容易。他们之间没有廖沙在过去的关系里体验到的焦虑、竞争或执迷。他们之间不说爱。他们也没有同居。他们只是享受彼此。

*

一月二十五日，国会对「禁止同性恋宣传」法案进行一读表决。包括玛莎的前老闆伊利亚．波诺玛瑞夫在内，有几位国会议员质疑这项措施的必要性。

「你们不该如此小看这个问题！」米兹丽娜反驳：「不过两年前，百分之七十的性犯罪是对女孩犯下的。如今许多性犯罪是对男孩犯下的！想想看为什么会这样！」

结果，只有一名议员弃权，一名议员反对—尽管这位最近才奉命递补开缺议席的新手议员很快就表示，他不小心按错投票按钮。三百八十八票贊成。包括波诺玛瑞夫在内的数名议员离开议场迴避投票。註515

而在国会大门口，LGBT抗争者的人数被暴徒远远压倒，暴徒们行纳粹举手礼，向抗争者丢鸡蛋和排泄物，然后围殴他们。一位抗争者的鼻樑被打断。结果警方观望一阵子后出手逮捕抗争者，而非暴徒。一小群支持者站在抗争者这方—他们没有布条或粉红三角钮扣，并保持着必要的物理距离，以免被殴打或被逮捕。其中一位支持者是莫斯科中学名校的生物教师，他在试图与其中一名暴徒理论时被摄影机拍到。隔天，这

位和女性结婚的异性恋教师遭到开除。註516

春天来临时，列瓦达中心试图估量对于LGBT人群的民意。百分之七十三的应答者表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这项法律。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二十多年来对苏维埃人的调查，显示出人们对性少数的攻击性程度持续消退。这百分之七十三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支持什么？古德科夫忽然觉得，他的团队不知道自己在调查什么。他要求他们重新检视自己提出的问题。调查中使用的每一句话在电视上几乎全被讨论到不能再讨论，包括问题中那些预设了答案的句子在内。古德科夫要求年轻的社会学家们重新设计问卷、重做调查。他们尝试了。他们找来了认识的LGBT运动者当顾问。他们陷入困境。

表述「同志」的方式也就这么多。苏维埃人调查在传统上使用「性少数」一词，但顾问们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词是贬抑用语。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同性恋尚未成为俄罗斯政治对话主题的时代，此后长期乏人使用，恐怕并非估量目前心态的最佳用语。至于包含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LGBT」则是多数俄罗斯人无法理解的。「非传统性倾向」是国家的用语，因此不可避免地框限了问题和答案。电视藉由将「同性恋」与「恋童癖」画上等号，并提议烧掉同性恋者的心脏，也同样挪用了这些用语进行宣传战。「酷儿」甚至比「LGBT」更鲜为人知。他们实在想不到别的方法提问—克里姆林宫劫持了语言。

*

二○一三年五月九日，廖沙二十八岁了。那天晚上，他在自己的公寓下厨，招待七、八位朋友晚餐—他一个人住一年多了。伊利亚要上大夜班；他吃过晚餐就离开，直到凌晨才回来。

那天早上，普丁高喊「荣耀归于俄罗斯！」一万一千名军队游行穿越红场，画面在全国电视萤幕上播放，他们身后跟随着至少三种装甲车和战车，五种导弹发射器，以及六十八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和军机。註517伏尔加格勒市也举办了游行。那一年稍早，市议会投票决定在胜利日庆典期间使用该市的旧名，因此它在那一天的名称是史达林格勒。註518

俄罗斯全国各地当晚都施放烟火庆祝。伏尔加格勒／史达林格勒的人民在流过城市的伏尔加河堤岸上观赏烟火。烟火在晚上十点结束后不久，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弗拉季．托诺沃伊（Vlad Tornovoy）和他的朋友们离开堤岸，开始长途跋涉，返回市郊工人区的住处。午夜过后，托诺沃伊和两位朋友在他们社区的游戏场里喝啤酒。接着，他的朋友们杀了他。他们先是对他拳打脚踢，当他终于倒地不起，再将一个半公升的空酒瓶插进他的肛门。然后再插一个。第三个酒瓶只能插进一半。他

们又踢了他好几脚，其中一个插入身体的酒瓶又从体内弹出。他们把一个摊平的废弃纸箱铺在他身上点火，但火很快就熄灭。接着其中一人捡起一块四十磅重的大石头，砸在托诺沃伊头上五到六次。托诺沃伊死了。他的朋友们回家睡觉。

隔天凶手们才被逮捕。他们说明杀害托诺沃伊是因为他是同性恋。电视报导，凶手们宣称他的性向「冒犯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其他新闻媒体则取得调查员讯问其中一名嫌犯的一段影片：

探员：你为什么这么做？

嫌犯：为什么？因为他是同性恋。

探员：就只有这个理由吗？

嫌犯：对。

结果还有一位目击证人，有个男人刚好在场，他坐在板凳上观看整个杀人过程。「我不觉得有罪恶感，」他对一名记者说：「但我的确还是感到有些噁心……你知道，他们杀了他，因为他是同性恋。」这名证人并未被指控任何罪名。註519

伊利亚在凌晨时分下班后回到廖沙的公寓，再次祝他生日快乐，然后两人上床。廖沙起身，坐在电脑前，阅读托诺沃伊凶杀案的报导。这时已是电视转播反同性恋运动开始一年之后，许多人把两者连结起来。社群网路上的大量发文质问「禁止同性恋宣传」法案的推手米兹丽娜，这是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要是你指控预防犯罪的斗士犯下了更多罪行，我们就不可能打败犯罪了。」她对记者回应了社群媒体上的怒潮：「那就是愚蠢而已。」註520换言之，托诺沃伊被杀是因为卖弄自己的性向—这正是她努力想要禁止的。她保证要在往后数週之内让法案通过。廖沙这下相信，法案真的会通过了。

*

国会在二○一三年六月十一日对「禁止同性恋宣传」法案进行二读和三读。数十位运动者在国会大门口发起抗议，他们被反制抗议者殴打，警方则袖手旁观。最后警方把LGBT抗争者推进警用厢型车，载到一处警分局。反制抗议者留在现场，殴打两名落单的男同志。

玛莎睡过头，到抗议现场的时间晚了。当她抵达现场，她看见警用厢型车开走。她走到最近的警分局—她之前也在那儿待过，因此她知道

地点，也知道该做什么：带水给被拘留者，他们会困在不通风的房间好几个小时。她看见两名便衣警察和一个她认得的人一起走出来。那个人是在一月打断一名抗争者鼻樑的暴徒。那几个男人转过街角。她尾随他们。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她得做些事。

其中一个男人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他又高又壮。然后玛莎必定是昏过去了。她倒在警局旁街角的人行道上。那几个男人扬长而去。她的腹部疼痛，彷彿被某件又大又硬的东西重击过。那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晴朗夏日午后；附近上班族吃完午餐，正要回去工作。有人叫来了救护车。

在斯克利弗索夫斯基创伤中心（Sklifasovsky traumar center），玛莎无法提供尿液样本。她尿不出来，医师好心帮忙，为她插入导管。经过X光和超音波检查，他们说没有造成永久性损伤，过一两天她就可以自行排尿了。

*

法案通过后两天，国会家庭委员会与外交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有五位外国来宾出席。其中包括几年前为了在加州通过立法禁止同性婚姻而成立的美国国家婚姻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arriage）主席布莱恩．布朗（Brain S. Brown），以及法国国民阵线的运动者埃梅里克．萧普拉德（Aymeric Chauprade）。这些外国人前来赞扬俄罗斯人，并敦促他们运用这股气势更进一步。萧普拉德说：

你们一定理解，世界各国的爱国者们，决心捍卫国族独立与人类文明根基的人，此刻都看着莫斯科。他们满怀希望看着俄罗斯站出来，反对同性恋的合法化、公开合法化，反对美国祕勤局操纵的虚无主义非政府组织，反对同性恋伴侣收养儿童。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议员，俄罗斯如今成了全世界的希望……

欧洲基督教文明万岁！俄罗斯万岁！法兰西万岁！註521

同性恋者成了头号全民公敌—外国特务、即将发生的美国接管俄国之兵卒、对欧洲文明基本价值的威胁。几乎不再需要提及恋童癖，就足以表述同性恋者很危险。另一方面，对抗同性恋者的战斗，则让俄罗斯取得了捍卫欧洲文明希望的堡垒地位。

联席会议决议通过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合法国家的同性伴侣或单身人士收养俄国儿童。他们强调，就连这个做法都还不够，因为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能确保被外国异性恋者收养的俄国儿童绝对不会被同性恋

者再次收养。会后，米兹丽娜对记者表示，她要构思一个方法，将亲生子女从同性婚姻家庭中带走。註522

禁止收养法就在禁止「宣传」法一週之后通过—在国会暑期休会之前及时成为法律。这两项法案都获得全票通过。国会到了九月重新开议，就立刻提出将亲生子女从同性婚姻家庭带走的法案。註523

那一年，普丁主持了第十届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年度会议，他在这项週末的公费活动上，向一群精挑细选的外国俄罗斯专家，针对选定的主题，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这一年对俄罗斯主权与国族认同发表谈话：

俄罗斯认同正面临严峻挑战。问题兼具道德及外交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拒斥自己的根源，包括构成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宗教价值在内。他们拒斥自己的道德基础，连同一切传统认同：国族、文化、宗教，甚至性别。他们奉行的政策让大家庭与同性婚姻伴侣平起平坐，让信仰上帝与撒旦崇拜平起平坐。过度政治正确演变到这样的地步，连提倡恋童癖的政党註册都可以讨论。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羞于和惧于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样的模式正侵略性地强加于全世界。我确信，这正是通往堕落与蒙昧之路，这是深刻的人口与道德危机。註524

撒旦、恋童癖、美国侵略、基督宗教文明之死，当然还有人口威胁：这一切如今全都牵连到了同性恋者。

隔年九月，克里姆林宫宣布将与俄罗斯正教会共同主办世界家庭大会，这正是一九九五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创办的组织。它的总部设在伊利诺州，之前先后在欧洲、美国及澳洲举行过会议。在美国，监控极右翼组织的人们认为它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输出品。註525但拥有金钱、又有国家赋予其目标之崇高声望的俄罗斯人，则在组织里居于领导地位，註526如今这个组织就要衣锦荣归了。大会议程预定在克里姆林宫墙内的克里姆林会议宫（Kremlin Palace of Congresses），以及相距不远的全国最大教堂—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举行，后者正是暴动小猫在二○一二年演出〈庞克祈祷〉之地。註527

*

法律通过时，廖沙人在纽约。他和伊利亚一起出国度假。他们这半年多来一直在约会。这是廖沙到目前为止所拥有过最友善的关系。伊利亚有些不成熟，但他知道自己的局限，这两种特质都使他成为完美的週

末及假日伴侣。这一点和身处在千里之外、五光十色的纽约之中，都让廖沙不至于花太多时间思考法律通过实施一事。

教学工作于九月再次展开。预算紧缩让系上发生了某些变化。廖沙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全体学生都必修一套普及于全俄大学院校针对自己专业领域所设计的核心课程，此名为「联邦学程」；学生接着每学期还要从开设的少数课程中选修一门「区域学程」。如今区域学程被删减到只剩两门可选，每个学生在九月开学时都被要求选择一门。当该课程有超过半数学生选择时，就会是这学期开设的唯一一门区域课──在某种意义上也算「选修」了──该专业领域全体学生于是在这一学期都「必」修那门课。

因此，廖沙在他的「政治学性别取径」课程中有了两组学生，每组都有二十多人。他每週上两堂课，一堂开给国际关系专业，一堂给政治学专业（他也教一门「联邦」课，「当代俄罗斯政治进程」，每週上课两次）。教导政治学学生很愉快，但有些主修国际关系的学生清楚表明了他们不想上这堂课。每次讨论到性的主题，总会有一个学生起身走出教室──例如当廖沙要他们讨论美国学者安妮．柯德（Anne Koedt）的女性主义经典论文〈阴道高潮迷思〉（The Myth of the Vaginal Orgasm）时。另外有两个男青年，都是优等生，他们总是坐在一起，每次廖沙提及父权制，他们都轮流起身反对。

「歷史已经证明了，男人是更强大的性别，」其中一人会说：「你现在的说法伤害了家庭的机制。」

廖沙会冷静地试着引导他们回到讨论文本。

「但你引用的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研究，」另一个人又会起身说：「他们总是试图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在我们身上。」

廖沙让这一班学生观看《哈维．米尔克的时代》（The Times of Harvey Milk）并撰写心得，这部一九八四年的纪录片，叙述的是公开出柜的旧金山市监督委员米尔克的生平故事，他最后被另一名市议员暗杀。班上这两名男青年的其中一人交出报告，论证同性恋者不是真正的男人，不能成为政治人物。报告内容充满了恐同言论，但至少没有口出秽言，不像他在性别研究中心VK页面上的留言恶毒。廖沙给了这个学生A□□这篇报告在它自身的架构里至少论证清晰。

*

随后在秋天，廖沙收到达莉娅传来的文字简讯。

「有个朋友被『占领恋童癖』（Occupy Pedophilia）给诱捕了。」廖莎对这个组织略有耳闻。它是网路诱捕运动的光头党版本。他知道这

个组织在不同城市都有活动，但他不知道彼尔姆发生的事。廖沙查看了彼尔姆「占领恋童癖」（Occupy Pedophilia / Perm）的VK页面。

「我们的下次狩猎将在週四举行。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入场费两百五十卢布。」

该组织包括两千多位成员。廖沙认出了许多人的姓名：他批改过他们的报告。

他点开其中一部影片。影片里出现了达莉娅的朋友瓦列里（Valeriy），廖沙也见过他。他站在一面砌了磁砖的墙前，地点看来像是行人地下道或某家购物中心的地下室，两边各站着一个大块头的年轻男人。影片开始时，他报出自己的全名、年龄及工作场所──他现年三十岁，在一所职业学校任教。

「我们以前都用尿疗法对付恋童癖，」十分钟长的影片大约到了一半，一名暴徒说：「但我们特地为你选择了香蕉疗法。这是一根神圣的香蕉。」

从那时开始，瓦列里站立着，手里拿着一根剥了一半的香蕉。

第一个暴徒：你当同性恋很久了吗？

瓦列里：从我十八岁开始。

第一个暴徒：你是因为什么变成这样？

瓦列里：什么都没有。

第二个暴徒：怎么可能？你是被父母养大的吗？

瓦列里：是。

第二个暴徒：说不定你跟女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瓦列里：真的没有。

第二个暴徒：你信神吗？

瓦列里：信。

第一个暴徒：你信什么教？

瓦列里：我是正教徒。

第二个暴徒：耶稣怎么说的？

第一个暴徒：他这种人要被丢石头。

接着影片被剪接过，再来就看到瓦列里听从暴徒们的指令蹲在地

上，在他们的哄笑声中吃香蕉。註528

在另一部影片里，暴徒们拍下自己闯入米哈伊尔公寓里的画面。米哈伊尔年纪比廖沙大，廖沙多年来也常见到他。影片从原先必定更漫长的磨难，被修剪到了十二分五十六秒的长度。米哈伊尔在这段时间里，从严正要求暴徒离开，转为哀求饶恕。廖沙可以看到一把电击枪反覆露出。大部分影片是从敞开的公寓门外拍摄的。在影片某一刻，必定有人上下楼梯，因为暴徒嚷喊着：「喂，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恋童癖住在这里？」米哈伊尔的表情就在这时第一次变得惊恐，并且第一次说出「够了」，即使还不到乞求的地步。

影片再过几分钟，米哈伊尔倒在地上，他被殴打过。「我是基佬」这句话用原子笔写在他的秃头上。暴徒们把他拉起来，让他靠在墙上，因为他自己站不起来。然后他们押着他走遍公寓，敲开每户家门，通知邻居他是个恋童癖。这些暴徒们自我介绍，说他们代表了「防止恋童癖的社会运动」。邻居们都欣然接受。一个身穿T恤衫和牛仔裤、髮型好看的男人—看来是个年轻银行家，或者有可能是行销主管—抄下了网站名称以便观赏影片。一个年纪更大，身穿家居服的女性从她的公寓探出头来作证：「我看过！他每次都带年轻男人回来！」

影片结尾，米哈伊尔双膝跪地，保证绝不再跟男孩子往来，并且说：「占领恋童癖万岁。」他也说了「黑人去死」和「荣耀归于俄罗斯」。註529

还有一部影片是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拍摄于彼尔姆一条繁忙的街道。另一个认识的人—安德烈—被抓住、被咆哮，并被两名暴徒电击，影片里还有另外两人旁观。安德烈不停向路人嗯救，请求他们报警。但似乎没人停下脚步。但安德烈始终拒不回答关于性倾向的问题，或是他如何看待高加索地区民族的问题。电击枪不断噼啪作响，而他对每个问题也都继续回应：「这很重要吗？」最后，暴徒们自己报了警。影片结尾，安德烈被两名警员和两名占领组织暴徒押上警车后座。註530

每一部影片露脸的暴徒都不一样。他们必定轮流主演。此外还有镜头外的观众，他们每次现场观看的费用是两百五十卢布（折合约八美元）。

廖沙起身检查家门。一个人的生活，在这一瞬间完全丧失了成就感与浪漫感。家门锁着，但这时在廖沙眼中毫无用处，只要几分钟就能打破这扇门，而且不会有人知道。

达莉娅告诉廖沙，瓦列里去了警察局，试图为自己被绑架和凌虐立案，但警方威胁要逮捕他。他没等到影片被上传到网路，就辞去了职业学校的教职。

*

那年秋天，大学任用了一名新职员。他年约四十五、四十六岁，灰髮剪得很短，总是穿着西装。他的职称是校园安全顾问。在他之前有个人做过这项工作，那是一位年老的退役军人，他从不露面，就廖沙所知，他也没有正式职称。这个人却大不相同。「我想，我们现在有了第一部（First Department）。」廖沙对达莉娅说。

苏联时代的「第一部」设置在一切涉及国家机密的组织里──即使还不到多数，却已经涵盖了苏联国内大部分组织──以及从事所谓「意识型态工作」的组织之中，例如新闻媒体或教育机构。第一部人员向国安会负责，而不向他们表面上隶属的组织首长负责。

十月，达莉娅请了产假。这使得廖沙独自管理性别研究中心，这也意味着廖沙暂时接管了系上副主任的行政工作。他被告知，在这个职位上，他必须和新任安全顾问开一场介绍会，这时也才得知安全顾问名叫尤里．根纳季耶维奇．贝洛卢采夫（Yuri Gennadyevich Belorutsev）。他的办公室位于一栋旧宿舍楼里。廖沙认得这个办公室，占满整面墙的书架放满了厚厚的资料夹，其他几面墙上的壁纸染有污渍，两张用旧了的、有着木制扶手的椅子，一个不太匹配的书桌，一株盆栽，以及窗户上的白色蕾丝窗帘。廖沙的舅舅和表兄都是军官，他们也有同样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对于尤里．根纳季耶维奇来说似乎太小了，或者太旧了，更或者只是个舞臺。

「我们用非正式代名词彼此称呼吧。」尤里．根纳季耶维奇说：「这是一次友好对话。」

廖沙等待着。当长辈提议改用非正式代名词时，你不能拒绝。尤里．根纳季耶维奇的嗓音出奇柔软，如糖蜜一般。

「你们系上有鲁莽的学生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知道，民族主义者、激进共产党人、同性恋……」

「我不认为我的工作内容包含随时掌握学生的个人生活。」

「好吧，你记得要让我知道就是了。」

此后，尤里．根纳季耶维奇每星期打一次电话给廖沙。廖沙尽可能不吐露出任何一个有可能做出延伸解读的词。这在电话上很难做到。有时，尤里．根纳季耶维奇会向廖沙询问一名特定学生，廖沙知道那位学生有情绪困扰──你很难不注意到。但廖沙假装一无所知。「你觉得他需要心理上的协助吗？」尤里．根纳季耶维奇会问。

廖沙想，他需要的不是你的帮助。他会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每天都会见到尤里．根纳季耶维奇。前任安全顾问白天想必都坐在办公室里的扶手椅上睡觉。但尤里．根纳季耶维奇随时随地出现。

十二月，性别研究中心举办年度会议。廖沙主持酷儿认同小组讨论。当他走出会议室，他撞见尤里．根纳季耶维奇。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我们的年度会议。」

尤里．根纳季耶维奇拿了一份纸本议程。「看来非常有趣。」

两星期后，廖沙察觉到自己被监视了。当他回到家，总有便衣人在大楼门口逡巡。他一走上楼，对讲机会先响起，然后是室内电话，接着是他手机。有个男人的声音会一遍遍重复同一句话：「你们这种人该死。」

廖沙有时确信，无所不在的「安全顾问」、徘徊在家门前的男人，这些骚扰电话，全都彼此相关。有时他觉得自己疑神疑鬼。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没办法再继续毫髪无伤。他要是没被杀的话也会发疯。

*

「你搬来跟我一起住。」斯塔斯（Stas）说。他讲得好像两人讨论过似的。

这个选项对他们两人都好。斯塔斯才刚结束一段歷时四年的破坏性关系，独自在公寓里度过难以忍受的漫漫长夜。斯塔斯的公寓在一座安全的大楼里，有围墙、摄影机和警卫。斯塔斯是一位富裕的经理人。他对廖沙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住在哪里，无论廖沙要去哪儿，他都派自己的私人驾驶接送廖沙—其实也就是去学校上班和晚上回公寓而已。斯塔斯和廖沙为彼此下厨。夜復一夜，他们在晚餐桌上会对彼此倾诉一切。斯塔斯细述他不幸关系的全部细节，廖沙则牵挂着大学和自己的未来。他们哭得彷彿以前从来不曾哭过，两名成年男子惧怕着自己的人生，又为彼此而心碎。他们发生过一两次性关系，但这显然不是他们在一起的原因；当时廖沙与伊利亚的友善关系终于结束了，伊利亚知道自己力有未逮，如同来时那样轻易而体贴地离去。过了几个月，廖沙意识到自己现在有个家人了，一个能让他觉得安全的人。

*

二○一四年四月，廖沙正准备去上班，结果他收到一位朋友传来的讯息，这位朋友是大学的一名行政人员：「廖沙，这是什么？尤里．根

纳季耶维奇把它提报给校长了。」註531

廖沙点开网址。这是VK网站上的一篇发文，题为〈彼尔姆在想什么？彼尔姆国立大学的鸡姦文宣〉。这篇发文的内容在描述性别研究中心，结尾则吆吁行动：

这种令人憎恶的状况还要持续多久？祖国与道德不共戴天的敌人，正在用我们的纳税钱名副其实地腐化学生。我们什么时候才要终结这种事？

让大众一起来关注！写信给彼尔姆大学校长；向警方报案！我们是俄罗斯的爱国者！我们必胜！

达莉娅和廖沙的照片被张贴在文章下方。註532

「你得离开了。」斯塔斯那天晚上说。廖沙手上有一张前往纽约的机票。他前一年太喜欢纽约了，因此想要旧地重游。他开始过着双轨生活。在一条轨道上，他为秋季即将到来的新学期提交了课程计画；他也和同事们一起忧虑预算被进一步删减，哀嘆国家对政治学毫无兴趣。而在另一条轨道上，他也在为自己的研究与友谊收尾。电话恐吓还在继续。尤里．根纳季耶维奇也一直打电话来，问他：「你怎么不来见我？」

五月，斯塔斯为廖沙办了生日派对，邀请了所有朋友。以前从来没有人为他这么做过。六月，他们打包廖沙的个人物品。七月，他们驾车前往索利卡姆斯克，把廖沙的大多数物品留下，并且告知廖沙的母亲，他要移居到国外了。

「你到了那儿要做什么？」加林娜问道。

「我喜欢这男孩，」廖沙的阿姨说：「我希望你下次再带他来。」

你知道吗？他们终于接受他了。

*

斯塔斯给了廖沙一万八千美元。

「这是我对未来的投资，」他说：「我规划在美国退休，你先去做准备。」

这笔钱足够在布莱顿海滩（Brighton　Beach）付一年租金了，那儿的公寓便宜，地主说俄语，而且不在乎你有没有信用纪录。那个地区有很多俄罗斯酷儿—多半是跟廖沙差不多岁数的男人—单身或结伴。他们所有人都是前一年逃离俄罗斯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他们教导廖沙

如何将他的经歷包装成庇护申请案，如何聘请律师，以及如何在适当时机申请工作许可证。接着廖沙也帮忙指导在他之后来到的人。

八月，他写信告知系方：「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国家。」

系主任回了一封完美的混杂讯息给他：「你难道就不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困扰吗？这下我得找人接替你的教学量了。我一直都知道你会出国的。祝你顺利。」

然后他从达莉娅和另一个朋友那儿听说：尤里．根纳季耶维奇一直在找人约谈，盘问他们廖沙的事。约谈中提到了「外国代理人」这个词。此外他们也发现，〈彼尔姆在想什么？〉那篇发文的作者，曾经和他们一起到乌克兰参加索罗斯资助的研讨会。

接着他又收到系主任的来信：「我们已告知学校行政当局，你获得了赴美深造的机会。请你遵照这个说法。」

*

廖沙开始拼凑自己的庇护申请案。他写信给一位密友，也是他过去的学生，她曾在二○一三年春天接到联邦安全局打来的电话。

「在你的大学科系里，有谁在从事同性恋宣传？」

「你在开玩笑吗？」她那时回答：「我都毕业多久了。」

这时廖沙传讯息问这位朋友，她能否把这件事写成书面证词。

「亲爱的廖沙，」她回信写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来没接过那种电话，你应该清楚，诽谤是刑事犯罪。」

廖沙在心中又默默删除了一个朋友。友谊耗损的速度令人震惊。他还有日内瓦的安德烈，以及迁居莫斯科的斯塔斯。他在一段时间里仍和达莉娅通信。她关闭了VK网站上的性别研究群页面。「我不想再做性别研究了。」她写道。约莫在廖沙出国八个月后，他们似乎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註502：俄罗斯《劳动法》第三三一条：Trudovoi kodeks Rossiyskoy Federatsii, http://kzotrf.ru/; “Federal’niy zakon ot 1 aprelya 2012 g. N 27-FZ ‘O vnesenii izmeneniy v statyu 22 Federal’nogo zakona “O gosudarstvennoy registratsii yuridicheskikh lits I individual’nykh predprinimateley” i stat’i 331 i 351 Trudovogo kodeksa Rossiyskoy Federatsii,’” Rossiyskaya gazeta, April 4, 2012, https://rg.ru/2012/04/04/a602462-dok.html（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03：“V Peterburge deputaty zapretili propagandu gomoseksualizma,” lenta.ru, November 16, 2011, https://lenta.ru/news/2011/11/16/gayban/（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04：“ZakS pochti yedinoglasno podderzhal zapret na propagandu netraditsionnoy seksual’nosti,” Fontanka, November 16, 2011, http://www.fontanka.ru/2011/11/16/050/（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05：“Peterburgskiy sud podtverdil otkaz v iske k Madonne,” lenta.ru, February 6, 2013, https://lenta.ru/news/2013/02/06/madonna/（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06：“’Vesyologo molochnika’ obvinili v poddesrzhke geyev,” lenta.ru, September 28, 2012, https://lenta.ru/news/2012/09/28/milkman/（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07：“Deputat Milonov vnov’ vyshel na okhotu na pedofilov,” Fontanka, June 19, 2012, http://www.fontanka.ru/2012/06/19/188/（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08：“Milonov khochet proverit’ pedagogov na pedofiliyu,” BBC Russian Service, October 8, 2012, http://www.bbc.com/russian/society/2012/10/121008_milonov_paedophilia（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09：关于法案第44554-6号，“O vnesenii izmeneniy v statyu 5 Federal’nogo zakona ‘O zashchite detey ot informatsii, prichinyayushchey vred ikh zdorovyu I razvitiyu’ i otdel’niye zakonodatel’niye akty Rossiyskoy Federatsii v tselyakh zashchity detey ot informatsii, propagandiruyushchey otritsaniye traditsionnykh semeynykh tsennostey” 通过的歷程，参看：http://asozd2.duma.gov.ru/main.nsf/%28SpravkaNew%29?OpenAgent&RN=44554-6&02（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10：M. V. Demenkov, “Zaklyucheniye po proektu Federal’nogo zakona no. 44554-6,” November 21, 2012, http://asozd2.duma.gov.ru/main.nsf/%28SpravkaNew%29?OpenAgent&RN=44554-6&02（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取得）。

註511：Ye. B. Mizulina, “Zaklyucheniye po proektu Federal’nogo zakona no. 44554-6,” undated, http://asozd2.duma.gov.ru/main.nsf/%28SpravkaNew%29?OpenAgent&RN=44554-6&02（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取得）。

註512：Istoricheskiy protsess—gosudarstvo i chastnaya zhizn’, Rossiya 1 program, archived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vE16z6FrI（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浏览）。

註513：“Samootvod: Oleg Chirkunov dosrochno pokinul post permskogo gubernatora,” lenta.ru, April 30, 2012, https://lenta.ru/articles/2012/04/30/perm/（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14：“M. Gelman otrkyl skandal’nuyu vystavku Welcome! Sochi-2014,” RBK, June 11, 2013, http://www.rbc.ru/society/11/06/2013/861464.shtml; Marat Guelman, untitled blog post, Facebook, October 24, 2014, https://www.facebook.com/marat.guelman.9/posts/883560208322048（皆于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15：Nikita Girin, “Gey, slavyane i OMON,” Novaya gazeta, January 9-28, 2013, http://www.novayagazeta.ru/politics/56444.html；波诺玛瑞夫的投票纪录，参看http://vote.duma.gov.ru/?convocation=AAAAAAA6&from=25.01.2013&to=25.01.2013&number=44554-6&deputy=991110
于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浏览）。

註516：编按：这位教师是伊利亚．柯尔马诺夫斯基（Ilya Kolmanovsky）。他被莫斯科第二中学开除，该校是莫斯科两所以数学及其他科目教学杰出着称的名校之一。

註517：“Voyenniy parad v chest’ 68-y godovshchiny Velikoy Pobedy,” Kremlin website, May 9, 201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8089（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18：“Volgograd v pamyatniye dni stanet Stalingradom,” lenta.ru, January 31, 2013, https://lenta.ru/news/2013/01/31/stalingrad/（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19：“Volgogradskiye ubiytsy pokazali, kak zabivali I nasilovali priyaetlya—‘geya,’” Tsentral’noye Televideniye, NTV, May 19, 2013, http://www.ntv.ru/novosti/597456/; Daniil Turovskiy, “Stal geyem, chtoby ottuda sbezhat’,” lenta.ru, May 23, 2013, https://lenta.ru/articles/2013/05/23/volgograd/（皆于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20：“GD namerena do serediny leta prinyat’ zakon o zaprete gey-propagandy,” RIA, May

14, 2012, http://ria.ru/society/20130514/937227420.html（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21：“Vystupleniye Emrika Shoprada” (Russian version), http://www.komitet2-6.km.duma.gov.ru/site.xp/052057124053057048.html（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22：Report on the joint session of Committee on the Family,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13, 2013, http://www.komitet2-6.km.duma.gov.ru/site.xp/052057124053057048.html; “Deputat Mizulina predlozhila otbirat’ detey u rossiyskikh geyev I lesbiyanok,” Gay Russia, June 14, 2013, http://www.gayrussia.eu/russia/6814/（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23：“Duma okonchatel’no odobrila zapret na usynovleniye odnopolymi parami,” lenta.ru, June 21, 2013, https://lenta.ru/news/2013/06/21/siroty/; Olga Pavlikova, “Aleksey Zhuravlev: ‘Gomoseksualist ne dolzhen vospityvat’ rebyonka,” Slon, September 5, 2013, https://slon.ru/russia/aleksey_zhuravlev_gomoseksualist_ne_dolzhen_vospityvat_rebenka-987035.xhtml（皆于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24：“Zasedaniye mezhdunarodnogo diskussionnogo kluba ‘Valdai,’” Kremlin website, September 19, 201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243（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525：“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Anti-LGBTQ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WCF),”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October 21, 2015, https://www.splcenter.org/news/2015/10/21/everything-you-need-know-about-anti-lgbtq-world-congress-families-wcf; Cole Parke, “Natural Deception: Conned by the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 January 21, 2015, http://www.politicalresearch.org/2015/01/21/natural-deception-conned-by-the-world-congress-of-families/#sthash.DJXMcOU7.a9bkcdgH.dpbs（另刊于The Public Eye, Winter 2015；皆于二○一六年七月三十日浏览）。

註526：世界家庭大会的俄文官网列出了该组织七名最高领导，包含三名美国人、四名俄罗斯人：http://worldcongress.ru/；美国版官网则只列出美国籍员工：http://worldcongress.org/team.php（皆于二○一六年七月三十日浏览）。

註527：“On to Moscow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VIII, September 10-12, 2014,”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News 7, no. 4（June/July 2013), p. 5.

註528：“Okkupai-Pedofilyai Perm’: Vypusk #7,” https://new.vk.com/video124656711_165196696（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529：“Okkupai-Pedofilyai g. Perm’: Vypusk #3: ‘Krepkiy oreshek,’“ https://new.vk.com/video139331747_169305187（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530：“Okkupai-Pedofilyai g. Perm’: Vypusk #7: ‘Razmorozhennaya pilotka,’” https://new.vk.com/video232045782_169269590（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531：编按：在俄国大学体系中，校长（rector）是一所大学的行政首长—大约等同美国大学体系的university president，或英国大学的vice-chancellor。

註532：“Kuda smotri Perm’?” VK post by Genderniye Issledovaniya: Traditsionniy Podkhod, March 29, 2014, https://new.vk.com/wall-54973617_558（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浏览）。

# 第二十章　被分裂的民族

二○一三年秋天，玛莎白天待在法庭，晚上则在咖啡馆和酒吧里度过，有时她从事外国记者交办的任务或自己的工作，不过通常无事可做。她几乎总是愤怒，到了晚间结束时常常喝醉；这样的状况下她还记得许多次争吵，因为隔天早上她觉得喉头刺痛。

在这些咖啡馆流连的人，都是参加抗议的熟面孔。此时此刻，他们都回归电视频道、广告公司一以及许多例子里一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规律生活。他们也往往在晚间结束时喝醉，尤其是那些服务于政府机关的人们。有一个夜晚，其中一人用他圆圆胖胖的手拍了拍玛莎的座椅：他有事要跟她说。他说之后会有特赦，名义上与叶尔钦颁行宪法二十周年有关，但实际上是为了在索契冬季奥运会前夕改善普丁的形象。特赦总是适用于女性，尤其是儿女幼小的女性。他说，所以玛莎的磨难很快就要结束了。

她相信他，但她的朋友们对她说，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他们指出，普丁的作为彷佛毫不在乎为了办奥运改善形象这样的事。暴动小猫的团员们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其中一人宣布绝食，抗议她所在的劳役营稀少的粮食配给和每日十六小时工时，尽管她的公开信在全世界刊载，註533国家却似乎很乐意任由她饿死。全国最有名的受刑人一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将满十年，还不知几时能出狱。而在九月，俄国军人身穿无识别符号的制服，在公海上劫持了一艘挂着荷兰国旗的绿色和平组织船只，将它拖回莫曼斯克（Murmansk）的港口，分属不同国籍的三十名船员全被关押入狱。註534这些朋友们论证，正因为俄罗斯执法部门的残酷无情，令人无法想像，所以没有理由不相信它构成的威胁。

「我不会入狱的，」玛莎开始对他们说，彷佛念咒一般：「我正在穿过雨滴不被淋溼。」这是一句俗语，通常用于第三人称，但那年秋天，玛莎让它成了自己的话。尽管如此，她正是在那年秋天开始吐血的。

十二月，西方各国领袖开始决定不出席索契冬季奥运。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首先宣布不参加，波兰、爱沙尼亚、法国总统，以及比利时总理也跟进。最后，美国总统欧巴马挑选了代表团。其中不包含任何高阶政治人物，却包括了两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运动员；这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挑衅。註535隔天，俄罗斯颁布了特赦。玛莎不会入狱了，暴动小猫的团员们将被释放，绿色和平的三十位社运人士也将获释。註536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度记者会结束时，普丁宣布了一个出乎众人预料的消息，就连他最内圈的亲信都措手不及：他将要释放霍

多尔科夫斯基。註537数小时内，这位前石油大亨就被送出监狱并送往国外—前往柏林，探望重病垂危的母亲。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明确条件是他不再返回俄国，除非他想再次被捕。失去了事业和大部分财产的他，得在外国的土地上洗心革面。他在德国降落时身穿一件机场工作人员的外套，这是途中有人给他、好让他换下黑色囚服的。註538

另一方面，玛莎还在自己的城市里，身穿自己的旧衣服。既然她再也不是政治审判中的全职被告，也就没有人会载着她前往新生活。她现在该怎么办？

*

在这一年半身为实质政治犯的生活中，玛莎对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太多关注。外面世界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乌克兰正在进行抗争。乌克兰总统反悔不与欧盟签订伙伴协议，导致乌克兰人从十一月开始就不断抗议。一如九年前的橘色革命，这些抗议将政治观点大不相同的人们团结起来—想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欧洲社群一员的世界主义者，和想要挣脱莫斯科影响的民族主义者齐心协力。抗争者们再次占领了基辅市中心，并驻守下来，要坚持多久都在所不惜。一如九年前，莫斯科的每个人看来也都把乌克兰当成俄罗斯的镜子。五十多位俄国作家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乌克兰抗争者。「我们盼望你们成功，」公开信的结尾写道：「那对我们来说，将是我们在俄罗斯也能赢回权利与自由的记号。」註539

俄罗斯国会全票通过决议案，吆吁乌克兰的抗争者解散。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在投票前表示，要是乌克兰与欧盟签订伙伴协议，「将会扩张同性恋文化的影响范围，同性恋文化已经成了欧盟的官方政策。」註540

当莫斯科因为没完没了的冬季假期停止运作时，基辅的抗争还在继续。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区别由此显现，俄罗斯抗争者在最大规模的抗争之后就退却了，转而进行规划已久的度假行程，或者就只是开始照惯例大吃大喝两星期，彷彿革命也会准时上下班似的。

就在俄罗斯人从假期中清醒的同时，乌克兰国会已通过一系列法案，旨在将抗争定为非法；其中某些法案的用字遣词，近似于俄罗斯开始镇压时通过的法案。抗争者们做好自卫准备。他们用车辆和卡车轮胎、石块、人行道铺面，以及用斧头剁碎了装进麻袋里的冰块构筑路障。他们以猎枪、弹弓和汽油弹武装自己。一月二十二日军方开了第一枪，两名抗争者被杀，一人受伤。

目前看来，玛莎是个记者了—此外她什么都不是。她也在雨点电视共同主持一个科普节目，而且在特赦之后，她可以自由出国了。她去了基辅。

她是最后一个抵达的，其他所有的莫斯科记者都已经在那儿了。每个人都认识其他所有人，每个人都有一套例行公事和一个去处，每个人也都是专家。当前的形势毫不复杂：几个街区的政府办公楼都被封锁并以重兵严防；全市最重要的广场独立广场（Maidan Nezalezhnosti）□□当地人简称为「广场」—则连同邻近的两条街道一併由抗争者占领。而在城市的其他地方，生活一如往常般继续。人人都会说俄语。很难相信这是个不同的国家，尤其难以置信的是这里有人为了脱离莫斯科独立而死，唯有当玛莎置身在抗争者之间—他们一如过去每小时一样站在一起，齐唱乌克兰国歌—那时她才相信这里是乌克兰，而且她非常想看到他们胜利。

关于广场的所有报导，都是由充满自信、经验丰富且比玛莎更早到达的记者们写成。他们在抗争者中间各自培植了英雄人物与消息来源，报导全都以这些人为主角。唯一还没有人做过的事，是跟捍卫政府的军人谈话。每个人都说，这些军人就在玛莎抵达基辅的前一天开枪杀害了抗争者。

玛莎穿上高跟鞋，化了妆，很浓的妆。她把妆容想成是战斗迷彩。她去了广场，广场上由巨大的旧轮胎筑成的路障正在燃烧。在她看来，抗争者正试图让广场看起来像是个革命现场—电影《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里的法国大革命。这倒不是说法国大革命时就有轮胎了，但恶臭与火焰符合了她心中的意象。玛莎穿越了抗争者的路障。

她这时置身无人地带，这道狭长的雪地，将广场上燃烧轮胎的路障与警方的围栏路障隔开。身穿黑色长袍的男人—正教神父—伫立在这里。玛莎看见了十字架在雪中的巨大灰色轮廓—其中一位神父高举的十字架，在昏黄街灯下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她意识到，这些神父正在为路障两方的人命祈祷。她在那一刻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同时也知道会发生战争。

「你不能过去，」政府方面的一名军官说。他身穿镇暴装：「你需要安全帽。」

「如果我是记者呢？」

「你还是会被杀。」

「别担心，子弹打不到我。」她差点说了：「我会从雨滴中走过。」

「好吧。」他说着，拉开一段路障。「但不要接近金鵰（Berkut）。你会被杀的。」

金鵰（乌克兰语「金鹰」之意）是特种部队。广场上的人们说，杀

害人民的就是金鵰部队。而在政府这方，金鵰部队显然也以杀手之名着称。玛莎透过他们的黑色滑雪面罩认出他们。她缓缓接近了金鵰部队的火堆。路障两方的每个人都升起一堆火，每个人都有热茶喝，每个人也都共享火堆和热茶。就连金鵰部队也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黑色滑雪面罩下的一个人问她。

「玛莎。」

「我则叫谢尔盖。」那个面罩笑了，露出两排大牙。他不可能知道玛莎的前夫和她曾经热烈爱过的男人都名叫谢尔盖—他的意思想必只是他们两人很像，因为他们的俄文名字都是最常见的。她涂抹着战斗迷彩从另一方而来，他戴着黑色面罩，但他们来自同一个民族。

金鵰部队不想受访，但玛莎不愿离去。到了清晨三点，他们开始说话了。清晨五点，玛莎达成了她前来的目的：她感觉自己理解他们。金鵰部队军官认为他们是前来保卫和平的。他们确信抗争者是一小撮麻烦制造者，也不特别效忠于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但他们相信秩序和强大的力量。真正的领袖绝不可能让下等人在国家首都的中央广场烧轮胎。比方说，这种事就不可能在俄罗斯发生。他们甚至提到了沼泽广场。玛莎试着告诉他们，沼泽广场的状况与「广场」完全不同。他们说这是好事，玛莎可不这么确定。但她很确定，不管在基辅发生了什么，结局必定会与莫斯科的抗争不同。

「乌克兰是某种平行现实的俄罗斯。」她在自己报导的结语里写道：「那儿的一切都完全不同。」註541雨点电视的网路刊物《大象》（Slon）以全稿照登的形式刊载这篇文章：所有编辑都不反对将乌克兰称为俄罗斯的某种替代。

*

玛莎是唯一採访了金鵰部队的俄罗斯人。回到莫斯科后，她成了真正的记者。

回来才过了一天，玛莎在阅读推特时大声咒骂。然后她把画面截图，寄给雨点电视的网路编辑，只问了一个问题：「搞什么鬼啊？」（WTF?）

那篇推文是从雨点电视发出来的。全文如下：「要是能拯救数十万人命的话，列宁格勒应该向德军投降吗？」

这一天是列宁格勒解围七十周年纪念日。列宁格勒围城战持续了八百七十二天，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万。玛莎的歷练够久，知道这则推文会引发多大的麻烦，她曾在部落格里看过人们为了更小的事战到至死方休。她知道，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提出任何疑问，都不可

能不受到惩罚——而这则推文的问题暗示了国家在那场战争中最巨大、也最被当成神话传诵的牺牲，其实是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的。她也知道，雨点电视新上任的社群媒体经理才十八、十九岁，而他就要受到人生当中最惨痛的一次教训。

这则推文只存活了八分钟——频道的网路编辑从他恰好所在的健身房冲完澡出来，打开置物柜，就看见玛莎及其他无数人愤怒和担忧的讯息，立即删除了推文——共八分钟。但太迟了。火风暴开始延烧了。随后数日，圣彼得堡市议会要求关闭这个频道。一位联邦副总理公开支持这项要求。註542普丁的新闻秘书季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向频道宣战：

我要求阅听人给予毫不留情的回应。即便我们给予这种调查最低限度的容忍，但那刻起我们的民族便开始腐蚀，我们的记忆会腐蚀——我国人民的遗传记忆。我确信，其他国家会让一个跨越这种伦理道德红线的频道吃下更大的苦头。註543

玛莎去上班的时候，迎接她的是「我们」青年组织的成员，他们在雨点电视门外架设纠察线。他们带来了装满排泄物的塑胶袋，洒满频道的庭院，并丢向偶然经过的员工。

不到两週后，该频道的所有卫星电视经营者全都将它下架，多数广告商也终止合约。和丈夫一同持有雨点电视的频道总裁召开职员会议。她宣布将要进行解僱，继续留下的员工也必须减薪三成。玛莎在心里迅速做了计算，她在现况下几乎无法维持收支平衡。减薪三成意味着她得再找另一份工作补充新闻工作的收入，但她最初投入新闻工作，是因为身为政治案件被告、为了求生才加入的。她决定辞职，藉由自行离开，她至少可以让总编辑的工作稍微轻松一些。此时总裁还在说话。

「正在进行中的这一切，让我完全见不到我的孩子们，」她说：「所以从明天起，我会放个短假——我们之前就规划到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度假，放完假刚好接上达沃斯经济论坛。」

总裁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名叫阿莉亚（Alya）的女摄影师向全体职员发出这条讯息：「有人可以提供一张沙发让我睡吗？看来我得走人了。」玛莎知道阿莉亚有个儿子，年纪跟萨沙一样，与阿莉亚的母亲同住；阿莉亚并非莫斯科出身，即使用原有的薪水，在这个城市里也只够租个小房间。玛莎自己原有的两房一厨公寓被警察查抄之后就将它出租，然后在距离市中心更近之处租了相似的公寓。谁说她不能跟阿莉亚共享一个房间？总裁还在说话。玛莎向房间另一端的阿莉亚挥手，伸出

两只大拇指指着自己，然后回讯息：「我有多的房间。够你和孩子用了。」

往后几天有大量人员调动。雨点电视的一位直播节目名人，被人看到用超市手推车载着个人物品，沿着花园环路推着走。他的猫坐在他的衣物上。阿莉亚招了计程车前往玛莎的住处。那天晚上，两人都把个人脸书的关系状态改成「同居关系」。

*

索契冬季奥运会就在职员会议当天开幕。外国特派记者们在社群网路上大量散发骯脏的自来水照片，以及尚未完工的旅馆等各种荒唐故障情事。註544但开幕典礼非常壮丽，俄罗斯赢得的十三面金牌也是参赛国家之冠。要是玛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迷失方向又孤立无援的话，她的爱国热情或许会多一些。

在乌克兰，广场上的流血事件变本加厉。这时已有一百多人死亡，包括几名政府军人。二月二十一日，十万多人聚集于广场，悼念遇害的抗争者。到了晚间，广场上的群众扬言，总统若不下臺，他们就要攻向政府大楼。亚努科维奇总统逃离首都，先是在乌克兰东部寻求庇护，最后来到俄罗斯。隔天，玛莎接到一通基辅打来的电话：一月那一夜访问过的其中一名金鵰部队军官打电话告诉她，他的搭档被杀了。她也访问过那位搭档。这感觉真奇怪，简直像是她不知怎么地得负起责任似的。

一个朋友从克里米亚打电话来：所有人都在那儿，玛莎也应该来。她去了。她在抵达的当天就意识到，有些事一夜之间改变了。街上满是武装人员，他们的制服全无识别符号。他们微笑着走来走去。数小时内，克里米亚的普通人民就加入他们，他们上街来跟这些军人合照。没人能够确切知道情况，但他们觉得，这些军人是前来拯救这个俄语人口占绝大多数的黑海半岛脱离广场控制的。人们当时就这么说：「拯救我们脱离广场。」有了这些制服全无识别符号的军人驻守街头，每个人的声音听起来都欣喜若狂，表情看起来都容光焕发。

实际上全都到齐的莫斯科记者们持续发出报导，但都不被他们的编辑採用。莫斯科当局未曾确认这些武装人员是由他们指挥的，因此记者描述的见闻不能见报。玛莎甚至不确定自己现在还算不算记者──她的媒体生涯或许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她会很难解释自己为何出现在克里米亚。她为美国《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写了篇专栏。文章这么开头：「此刻在克里米亚，我这三十年人生中所见最怪异的一场战争正在展开。」註545其实她以前也不曾看过一场战争，但你不需要亲眼看到，也能知道这场战争跟其他任何战事都不一样。

三月一日，普丁请求俄罗斯国会上议院授权政府在境外动用武力──

当天就得到全票通过。那时，武装人员早已进驻克里米亚了。克里米亚街头到处充斥着看板，看板左边画着纳粹的卍字徽和铁丝网，右边画着俄罗斯国旗，附上这段说明文字：「三月十六日，我们要在这两个选项之间做出选择。」当天，在一场匆促举行的公民投票里，百分之九十六点七七的克里米亚人投票选择加入俄罗斯联邦。註546

*

克里米亚的歷史和前苏联境内任何区域一样暴力，但或许又比多数区域更令人困惑。从沙俄帝国首先于一七八三年併吞克里米亚开始，它在将近两百年间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一九四四年，史达林对克里米亚进行种族清洗，占了半岛人口大多数的鞑靼人遭到驱逐，当地的亚美尼亚人、白俄罗斯人和希腊人也被驱赶。半岛上只剩下俄罗斯族，这是史达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唯一信任的民族。接着在一九五四年，接任苏联总书记不久的赫鲁雪夫重新划定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当时未曾说明理由，日后也无法查明──至少在文献上找不到有力的解释。

赫鲁雪夫曾任乌克兰党委书记──因此引起一种猜测：他想送给这个加盟共和国一份慷慨的礼物；或者反过来说，他想弥补自己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他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人为大饥荒过后才上任，但在他任内仍造成大量人命损失）。哈佛大学的歷史学者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提到，赫鲁雪夫在二战后运用克里米亚来确保对乌克兰的掌控。乌克兰曾被德军占领将近三年。战后欧洲的划分让苏联得以保有一九三九年遵照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而併吞的大多数领土。今日的乌克兰西部因此先后被占领过三次：一九三九年苏联占领、一九四一年德国占领、一九四四年再被苏联占领。苏联是当地的新统治者，立足不稳，这使得新占领的西部领土与共和国东部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将种族清洗过后的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可能是一种殖民策略：乌克兰共和国获得了将近一百万的新住民，但他们全是说俄语的俄罗斯族人。註547

在一九五四年当时，多数俄罗斯人并没有理由怀疑赫鲁雪夫的动机。首先，苏联领袖们的多数行动，在苏联公民看来都是随心所欲的；此外，这个行动并未对日常生活带来差别。俄罗斯人仍然认为克里米亚是全国最重要的度假胜地，也继续使用它。克里米亚则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均衡作用。像谢廖沙这样出身极端特权阶级的人，在一座结构复杂的城堡里放暑假；玛莎的母亲则能租用一间当令的公寓；廖沙的母亲也能为自己和儿子各租一张床。俄罗斯人的所有故事都从克里米亚开始，这里是缔结儿时友谊、点燃爱火、丧失童贞、试用毒品，以及各式各样回忆诞生的所在地。还没在克里米亚度过夏日的人，也都认为自己总有一

天会去。这是俄罗斯人普遍怀抱着的志向。全体俄罗斯人的夏日美梦可能属于他人（另一个国家）这份意识，在苏联解体后粗鲁地袭来。俄罗斯族人在当地仍占人口大多数，但他们如今使用一套不同的货币，俄罗斯公民也需要外国旅游护照才能前往。这些年来，许多俄罗斯人发现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黑海度假胜地更舒适、价格也更能负担，但克里米亚依然是夏日和青春的象徵。

三月十八日，克里米亚公投后两天，普丁召集国会两院全体议员、各州州长及其他克里姆林宫政要，举行一场特别演说。他讲了四十多分钟，其间一再被掌声和起立鼓掌中断。最后，普丁和三名克里米亚代表——其中一位身穿厚重的黑色高领毛衣，彷佛刚从想像中的西班牙内战归来——签订条约，将克里米亚併入俄罗斯，演讲厅中的男人们和一些女人在俄罗斯国歌的乐声中肃立。当普丁和条约的共同签署者一同离去，演讲厅再度爆出一阵起立鼓掌，以及齐声呐喊：「谢谢你！」（Spasibo!）「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呐喊大概只会在摇滚乐演唱会结束时听到。这一屋子官员们的回应方式，不像是对一位带领国家赢得胜利的领袖——那种情况下的呐喊会是「万岁！万岁！万岁！」——反倒符合了「黑手党国家」模式，彷佛对一位赐予家族成员一份大礼的家父长那样欢呼。

普丁的演说清楚说明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论点。他的第一个论点诉诸歷史，呼应了自古至今任何国家对其他领土提出的歷史主张。普丁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文明的摇篮（宛如塞尔维亚一贯宣称科索沃是它的文明摇篮）。他多少承认了克里米亚发生过种族清洗：

的确，曾有一段时期，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如同苏联其他民族一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我要指出一点：千百万人在那些时期都受到压迫，其中当然以俄罗斯人占多数。註548

这并不属实，但这段陈述在苏联全境来说事实上是准确的，即使原因只不过是俄罗斯民族人数远远多于其他族群。普丁藉由这个话语上的戏法，排除了克里米亚少数民族的痛苦与恐惧，将俄罗斯人重新定位为受害者：

可嘆，看似不可能的事竟然成真了。苏联解体了……克里米亚就在这时突然成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俄罗斯意识到它不只被偷窃了，更被抢夺了……千百万俄罗斯人在自己的国家上床睡觉，醒来时却置身于他国。一夜之间，他们成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俄罗斯民族成

了世界上最大的被分裂民族之一，即使未必是最大的。

「被偷窃」和「被抢夺」这两个词的意义差别很微妙也不明确，但它们的暴力意涵明白无误。在普丁叙述的这套故事中，俄罗斯因受到胁迫而不得不承认，后苏联时代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是因为本国太虚弱，无力反对。随后，在普丁统治下，俄罗斯为了区域和平而牺牲自身的民族利益与深沉欲望，不质疑一九九一年后的国界。但克里米亚俄罗斯人不曾移动就被迫入籍其他国家，甚至发现他们成了一个不稳定国家的公民：

俄罗斯人一如其他乌克兰公民，受苦于侵袭乌克兰二十多年的持续政治危机与永久治理危机。

这段话同时指涉广场抗争与橘色革命，普丁的演说也从这里开始从俄罗斯转向美国──或者应该说，从俄罗斯的损失转向美国的获益。他说，美国资助了广场抗争，广场势力一旦获胜，就会开始镇压异己：

克里米亚──说俄语的克里米亚──会在镇压中首当其冲。因此克里米亚人民……请求俄罗斯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生命安全。……当然，我们必须回应这项恳求。我们不能抛弃克里米亚和它的人民，听任他们陷入困境。那是背叛。

普丁继续说，俄罗斯的行动不只正确，也根据了美国自己创造的先例──促成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他坚称，科索沃与克里米亚的唯一差异，在于前者得到美国支持，美国自以为能替冷战后的世界制订规范。「他们要我们所有人都吃那一套。」他说。他实际上的说法是nagnuli，这是句粗俗的话，最精准的译法是「他们要所有人翘起屁股来」，让人明确联想到同性性侵的意象。克里姆林宫的官译将它翻译成英文「要求所有人同意」。註549

普丁继续宣泄他对美国的一连串不满。在科索沃之后，「是整整一系列由外部势力操控的『颜色革命』」──乌克兰发生的只是其中两次。「被策动」发起这些革命的国家，接着就「被迫接受不适用于该国人民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标准」：

他们一次次说谎骗我们。他们背着我们做出决定，然后要我们接受既成事实。北约的东扩就是这样，军队前哨基地就设在我国的国界上。他们一直跟我们说这不干我们的事。他们说得倒轻松。

俄罗斯再也不能忍受了。「就像被压得太紧的弹簧」，它松开了：

我们无疑会面临外部势力的反对。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究竟是准备好捍卫我们的民族利益，还是我们永远都要屈服，退到无处可退。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已经在胁迫我们了，除了运用制裁，也运用国内问题。我不知道他们意欲为何：他们是寄望于第五纵队？各式各样的民族叛徒？还是他们以为自己能够对俄罗斯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引发民众骚乱？……我们必须採取适当行动。

这是一场战争演说。尽管普丁就连在演说时都对战争的顾虑一笑置之：

他们在谈论侵略，议论着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某种干预。真是怪了。不知怎地，我想不起来有哪个歷史先例是干预时不开一枪、无人伤亡就能发生的。

真是这样吗？古德科夫马上就能想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希特勒一九三八年合併奥地利时就是一例；他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Sudetenland）的接管则是另外一例。希特勒过程中从未开枪──反倒运用了一次公民投票、一场演说，还有其他不流血的工具。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演说中，痛斥西方民主国家虚伪，他说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人民真正意志的表达。他提到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兴趣，就是利用它做为攻打德国的基地。最重要的是，他提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他说这些人「以（捷克斯洛伐克）自决之名被剥夺了自决权利」。他说，德国之所以忍受这种事态──以及分割日耳曼民族的国界──起先是因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衰弱，随后是为了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但这被「曲解成了软弱的迹象」。他说，如今德国终于要坚定立场，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受压迫的日耳曼人履行其神圣使命。註550

普丁的克里米亚演说多数成分，在他先前的声明中也很常见：惯用的暗箭伤人（近年来也必须是恐同的）苏联解体的悲剧、美国的虚伪、北约的背信弃义、由美国策划的革命并将其价值强加于传统文化之上，

甚至国内的敌人—「第五纵队」。但民族分裂的概念，以及替代了法律与国界，对国外同胞负起的道德责任，却出自不同先例—直接令人联想起希特勒的苏台德区演讲。古德科夫因此开始阅读或重读那些探讨纳粹主义的思想家。他想到，自己从以前到现在对于意识型态的想法全都错了。他学过的是极权主义意识型态必定包含对未来的愿景。但这从来不是纳粹主义的关键特徵。它的愿景陈旧、承诺也很简单：回归到想像中法律全属本能、民族仍是部落的过去。

或许就是这么回事。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意识型态。正因如此，它将普丁先前提过的每一个主题全都串连起来。而从普丁演说得到的回应，以及民调资料看来，它也发挥了意识型态的作用：克里米亚将全国动员起来。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支持併吞克里米亚，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表示「明确反对」。这远远低于民调的误差边际，彷彿这些反对的人—古德科夫这样的人—不存在。註551

汉娜．鄂兰写过，意识型态不过是被逻辑上推到极致的单一观念。没有一种意识型态与生俱来是极权主义的，但任何意识型态都含有极权主义的种籽—它可能变得概括、完全脱离现实、以单一前提凌驾于整个世界。她写道：「极权主义领袖对观念本身缺乏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用处—做为行动的驱动力及正当理由。」他们从这一个选定的观念中获取「歷史法则」，而后动员人民去实现这些想像出来的法则。註552

既然现在显然有了一套意识型态，俄罗斯也就符合了任何一份传统极权主义社会特徵清单上的所有条件—或许只除了古德科夫的清单，他还在清单上多了一项：强迫贫困。

或许当一个极权社会自我重组，不再由极权政体形塑时，就是这样运作的：意识型态是最后定型的。古德科夫认为俄罗斯的极权主义是復发极权主义（recurrent totalitarianism），一如反復发作的传染病；就像传染病一样，復发或许不会像初次患病那样致命，但症状会跟第一次发病时明显有别。

*

另一个觉得普丁的演说听起来耳熟的人是杜金。他认出了自己。从杜金宣告自己想成为全国首席理论家以来，才过了五年，这个目标就实现了。普丁正在运用杜金的言论与概念，并贯彻他的预言。早在二○○九年，杜金就预言乌克兰会分裂成两个国家—东半部会与俄罗斯结盟，西半部则会永远仰仗欧洲。杜金认为乌克兰居住着两个明显不同的民族。西部是说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东部的人民则构成一个包含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集合体，但语言与文化都是俄罗斯的。在杜金看来，这两个民族的地缘政治倾向根本不同。这就意味着乌克兰不是个民族国家。它

同时意味着乌克兰的分裂是注定的──唯一的问题是能否和平分家。他当时就警告双方很可能会发生战争。註553

这远远不只关乎克里米亚、也远远不只关乎乌克兰。普丁的演说也表达得很清楚。许多年来，杜金都在等待俄罗斯声张自己是反现代世界的领袖及其应有的地位。这个观念，一如杜金的其他观念都逐渐风行起来。杜金累积了强大的盟友。当乌克兰的抗争创造出一个陈述己见的机会，他的其中一位盟友──一名长期支持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亿万富豪，向克里姆林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提议利用乌克兰陷入混乱的机会，启动併吞克里米亚及乌克兰东南部的进程。这份在亚努科维奇下臺前写成的备忘录，预告了他的垮臺。它也将广场抗争归因于波兰及英国的祕密情报机构，并建议俄罗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乌克兰东南部策动骚乱，为干预取得正当理由。这份备忘录的许多言论和观念都出自杜金。註554

二月下旬，普丁政府开始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城市策动及资助反基辅、亲莫斯科的抗争。按照计画，一旦人民能被激励，进而攻占政府大楼，并在政府大楼里决议请求莫斯科的援助，俄罗斯就会开始干预。註555克里姆林宫高阶官员向地方组织者发布指令并分派资金；杜金则与行动者保持联繫，提供战略建议并给予保证。他告诉他的人脉，俄罗斯不会止步于克里米亚，它还会支援乌克兰东南部。他则会坐在家中办公室的高背黑皮椅上，以数百本书籍为背景，运用Skype和乌克兰行动者进行漫长的会议。「这只是开始而已，」他说：「那些以为事情会在克里米亚了结的人，全都大错特错。」註556

四月初，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中心城市──顿内次克和卢甘斯克（Luhansk）的抗争者开始接管政府大楼。其中一些人配备着从当地军械库抢来的武器。註557四月七日，抗争者组织自己的政府，命名为顿内次克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Donetsk），并通过决议请求俄罗斯干预。战斗首先从东部其他城市的个别战役开始──乌克兰政府军得以阻止更多地方的政府大楼被占领──然后变成全面战争。註558美国在俄国占领克里米亚之后，已经开始对俄国实施制裁──包括对数名商人及政治人物冻结资产及禁发签证──这时扬言进一步扩大制裁，但欧洲迟疑了。註559俄罗斯最终未能在乌克兰南部挑起够大规模的暴动，但乌克兰政府军也无法在东部重新建立起基辅的权威。註560

四月十七日，普丁举行了年度电视热线。他走进摄影棚之前，两位主持人的其中一人暖场：

要是事态发展不同，我也许会说，这将是又一次年度对话，但今

天，我们有一整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倾听我们。俄罗斯如今与克里米亚和塞凡堡市（City of Sevastopol）註561统一了。自从苏联瓦解开始，我们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漫长的二十三年。为了这个理由，今天的所有问题将与克里米亚直接相关，又或弦外之音有着克里米亚的色彩。註562

这次节目持续了将近四小时。其中说了很多话。併吞克里米亚，竟与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并驾齐驱了。反对併吞的俄罗斯人则被谴责为叛徒。一位这样的反对者来到节目现场赔礼道歉。她是伊琳娜．袴田（Irina Khakamada），註563一九九九年时是唯二反对普丁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右翼力量联盟发起人之一——另一位是涅姆佐夫。节目进行前一个月，她也反对併吞克里米亚。但这时她对普丁说：

我来这儿是要说以下这些话。克里米亚始终需要有俄罗斯的身分。我经常去克里米亚……他们总是想要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它如此发生了，那就这样。你是胜利者。你确实不开一枪就进行了这次行动。

几乎察觉不到的百分之一反对者正在降伏。只有一名国会议员——玛莎的前老闆伊利亚．波诺玛瑞夫投票反对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统一。从此他就被迫离开俄罗斯。註564这时，反对併吞的一方唯一稍具知名度的人物就只剩下涅姆佐夫。

对杜金来说，这次节目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从中辨认出自身的影响力。其中几个时刻里，效忠基辅的乌克兰人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甚至被称为纳粹——普丁指出「这些领土、这些土地、这些人民的歷史过往正是如此」——言下之意是乌克兰西部被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德国占领给永久污染了。另一方面，普丁又说东部「根本上与俄罗斯相连，那儿的人民具有某种不同的心态」。节目结束时，普丁进一步说明这种心态观：

有某些特殊的性质，我想它们跟价值观有关。我认为一个俄罗斯人，或者更广泛地说，一个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有着道德目的、有更高的道德基础。正因如此，俄罗斯人，俄罗斯世界的人，并不那么专注于自我……

普丁的声音渐弱，他闲扯了一会儿，由此向全神贯注的听众透露他还没能完全吸收自己提出的观念。但没过多久，他又接着说下去：

我们的爱国情操根深柢固。这是战时大量的英雄行为，以及平时自我牺牲的来源。这是互助与家庭价值的起源。

「俄罗斯世界」这句话来自杜金。这是个地理上幅员广阔的概念，是一个俄罗斯领导下的文明愿景。普丁围绕着「家庭价值」发挥是对的。所谓俄罗斯世界，正是说明无论其边界为何，它都由价值观统一起来。杜金多年来一直提倡「普世人类价值」这个概念本身是一种误导。例如说，西方的人权观念不应适用于一个「传统价值文明」。杜金最精闢的一个说法如下：「普世人权毫无普遍之处。」

普丁在节目另一段落里，也谈到了杜金从事多年的另一件事──与共享俄罗斯世界价值的人物及组织建立联繫，即使它们位于欧洲：

我想，我们确实见证了欧洲国家重新估定价值的过程。我们所谓的保守价值正开始风行起来。就拿奥班在匈牙利的胜利，或是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法国的成功来说──她在法国的一次市长选举里排名第三。同样的倾向也在其他国家增长。很明显、明显透了。

确实如此。过去几年来，杜金重新恢復他与西方的联繫。他和法国的极右翼运动者──那些相较于勒庞的国民阵线看起来太过激进的人──以及比奥班更右翼的匈牙利人，还包括极端保守主义的欧洲人甚至以色列犹太人组织等其他许多团体建立了互动桥樑。将这些在传统政治术语中截然不同的运动者及团体结合起来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布鲁塞尔（欧盟），在哲学上反对现代性。註565他的工作成果如今实际上得到总统承认，获得了全国计画的地位。

隔天，杜金在全国最受欢迎的访谈节目中担任来宾。他以前接受过很多次电视专访，但上这个节目还是第一次。节目由弗拉基米尔．波斯纳（Vladimir Pozner）制作并主持，他是一位曾在美国工作的犹太人。这是俄罗斯电视上至今为止最具自由派、亲西方色彩的节目──而杜金受邀出席则意味着他得到了政治分量，令他成为一个不可或缺且无法迴避的来宾。访谈在敌对气氛中进行──杜金甚至一度对波斯纳说，他认为波斯纳应该从电视圈被封杀──但这个节目提供了一个讲臺，令他的观点可以尽可能传达给最广大的阅听人。杜金在节目中表述，过去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克里米亚，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东乌克兰战争──构成了一次俄罗斯復兴，一场「俄罗斯之春」。「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

了，」他继续说：「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生存在世界上并不只是被动的对象，而是自身歷史的主体。我们愈是展现出我们关怀俄罗斯人、俄罗斯境外的俄语人口，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强大，我们就愈能摆脱沉睡状态而进入动员状态……看看从克里米亚来的人们吧！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国官员或乌克兰官员的人。他们是新生代的人，新品种的人。」

波斯纳：你的意思是，这些人让我们的民族更健康吗？

杜金同意。接着波斯纳提出自己在杜金最近着作〈大俄罗斯〉里读到的一个说法，要求他详加说明。

杜金：大俄罗斯就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文明。我认为大俄罗斯的疆域约略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疆域一致，相差不会太大……

波斯纳：那么我问你。高加索也是其中一部分吗？乔治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然？

杜金：没错，当然是。它们都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但这不表示—

波斯纳：那中亚呢？

杜金：中亚—当然是，没错。

波斯纳：波罗的海呢？

杜金：我不认为。我认为波罗的海部分地区和西乌克兰，在某些条件下—

波斯纳：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

杜金：大俄罗斯。你看，文明没有这样那样的国界。

节目由此转向一场关于文明例外主义的争论。波斯纳是个很难对付的访问者。尽管如此，事情还是这样发生了：一小时专访、向俄罗斯最大一群电视阅听人阐述俄罗斯世界的观念。杜金也提到了叛徒，并在波斯纳的催促下提到叛徒应该被消灭，再追问下去，他甚至逐一点名：纳瓦尼、涅姆佐夫、卡西亚诺夫（Mikhail Kasyanov）、雷日科夫（Vladimir Ryzhkov）。註566他说出自己对这些人确信的事实，以及他确信全体俄罗斯人都应该知道的事：这些人都是被美国人僱用的。註567

杜金接受了许多访谈、也写下许多文章。局势的急迫性增强了他原先就具备的超人效率。他撰文宣称，美国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俄罗斯终于挺身迎战，全世界可能就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註568但到了五月底，他对普丁愈来愈没耐心，甚至感到失望。克里姆林宫并未发动一场拼尽全力的公开战争，反倒似乎有意创造出一个泥淖。这么做意义何在？没错，一场在东部缓慢进行的战争可以达成动摇乌克兰的目的，耗尽它的国力、弱化它的新政府，但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战术目标。杜金想要普丁公然入侵乌克兰，动用正规军，以一场扩张俄罗斯的光荣胜利为目标。实际上，这将只是俄罗斯扩张行动的开端。可当这场战争未能发生，杜金也知道原因：普丁被他根本上亲西方的温和派顾问们给制止了。他发明了一个词形容这群顾问：「第六纵队」。倘若「第五纵队」指的是杜金认定为直接向美国效劳的涅姆佐夫等人，那么「第六纵队」就不只是叛国贼，更是文明的叛徒。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藏身于克里姆林宫中。註569

杜金总是告诉自己的支持者：「我们追求的不是权力，而是影响力。」这时他又将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以缓解支持者们的失望。「我们的权力微不足道，」他说：「但影响力巨大。」註570这在他最亲密的盟友中成了某种口号。不断听见自己的言论受到俄罗斯高阶官员复诵很有帮助，他们发挥影响力的证据就在眼前，人所共见，人们都能听得出来。普丁的行动与他们的言论不一致这件事，只会更坚定他们的决心。

从外在来看，杜金的地位也改变了。他的左右手瓦列里．柯罗文（Valery Korovin）成了总统办公厅公民会议室（Presidential Civic Chamber）的一员，这个组织是为了统治公民社会而成立。杜金再也不是个边缘行动者了。即使他如今发现自己被利用做为陪衬，好让普丁的观点与行动显得温和，但这也令杜金自身的立场得以正当化。

*

四月下旬，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基辅召集了大约三百人，举行一场他所谓的「对话」。这份名单很奇怪，其中包括知名作家、不太有名的运动者，以及对霍多尔科夫斯基意义重大的人。玛莎也受邀出席，大概是因为她曾在沼泽广场案被起诉，也因为她曾在霍多尔科夫斯基坐牢期间和他通信。狱中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取得了近乎乡村长老的地位，人们写信向他提出问题、倾诉委屈。玛莎则有自己的委屈，她觉得自己被背叛、被抛弃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回信强调耐心、超脱纷争和目光放远的美德。玛莎想不起来自己的信到底写了些什么，但霍多尔科夫斯基必定记得，因为他邀请了她。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会议开幕致词时，再度强调要将眼光放远：

人们总是问我，这场会议有什么意义？……我的答案也还是一样，这个答案支持着我度过漫长的十年（牢狱生活）：为所应为。不论如何……过去十年来，我学会了长程思考，并谨记黑暗永远都会让路给光明，今天看似最不切实际的梦想，会成为明日的现实。註571

就玛莎所见，每个与会者都怀抱着同一个梦想：向霍多尔科夫斯基领薪水。据传，他想要资助一整个影子社会（shadow society）。人人都排队想要加入。玛莎决定，她一点都不想要众人趋之若鹜的事物。其实她原先约好了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会面，但时间是早上十点，但她前夜喝得太醉，所以她取消了。但霍多尔科夫斯基亲自到旅馆大厅找她，他们谈了话，她发现自己对他的喜爱超出预期，而且超出很多。他们出人意料地相似，而且不像多数与会者，他们都在心愿相违之下成了异议人士。玛莎觉得，霍多尔科夫斯基其实想要融入体制—他想当上总统，而不是总统的头号敌人。多数对抗暴君的人自己并不追求权力，但霍多尔科夫斯基想要权力，而玛莎喜欢他这点。她乐意在他的军队里成为将领，或至少在他的政府中当个官员。

数週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部属邀请她到顿内次克地区，观察当地的事态。那里很可怕。她在两年前到那儿过另一种生活的时候，曾经很喜欢顿内次克，当时摄影师谢尔盖带她去看欧洲盃足球赛。美丽的机场还在—事实上，整个顿内次克都还在原地—但机场里不再有精心排定的交通运输，那儿如今一片忙乱，紧张而愤怒的武装人员成群结队出没。他们在顿内次克仍未开一枪，但你知道迟早会开枪的。

人们在城市内外建立检查哨，并插上旗帜。玛莎看出这里的男人们都像莫斯科任何酒吧里的常客般颤抖着：安非他命的效果。他们靠着服用安非他命而彻夜不眠。玛莎和双方人马交谈。她们说着同一种语言，但他们彼此仇恨。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不是人。他们的枪全都装满子弹，而且都开了保险。

玛莎打电话给前婆婆，告诉她自己在顿内次克；前婆婆是在顿内次克长大的。前婆婆发表了一长串反基辅的控诉，在她看来，乌克兰新政府是由纳粹组成的。

玛莎离开顿内次克两星期后，反基辅战士们攻下了机场。乌克兰军队歷经一整天的战斗后又夺回机场。四个月后，机场再次遭受攻击—这次，它在数週战斗之后落入分离势力之手，但变成一片废墟—只剩下堆积如山的瓦砾、四散的飞机残骸，还有大量尸体。註572

玛莎终于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组织里得到一份工作。她要协助他对

政治犯的工作。她跟莫斯科祕密办公室的新同事们正在寻找新的办公地点，并准备筹办教育研习。这些研习是由跟玛莎差不多岁数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札（Vladimir Kara-Murza）协调举办。内容本身无害：基础公民教育。但这些研习由于得到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支持，引来了过多关注。地方官员阻止它们举行，除了向场地施压取消，甚至有一次对一处场地直接断电。玛莎讨厌自己如今成了专业政治犯，或至少是政治犯专家这样的想法，但她喜欢这场战斗。

*

欧盟、加拿大，以及西方其他数国也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们禁止某些俄罗斯国营公司上市、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高科技石油设备，并禁止向俄罗斯出售军事科技及军民两用科技。此外，多位俄罗斯政治人物实际上被宣告为不受欢迎人物。二○一二年通过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为这种个人制裁铺平了道路——玛莎的新同事卡拉–穆尔札当时就在华盛顿游说要求制裁。

企业界紧张起来。西方投资人惧怕制裁及其效果而纷纷撤资。俄国经济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骤然趋缓，但如今却似乎开始直线下跌。其他人也怕了。世界家庭大会对于原定在九月举行的盛大集会打退堂鼓；大会的预定场地是克里姆林宫和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每个人（或者几乎每个人）还是前来赞扬俄罗斯如何勇敢对抗LGBT游说团，并谈论着「性别意识型态」的危害与「人口寒冬期」的阴影，但显然考虑到制裁措施，这次会议被宣传成由俄罗斯主办，而不是世界家庭大会。註573俄罗斯正教会牧首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国会的一位副议长、文化部长还有其他人也发表演说。加拿大生命权运动者与记者约翰–亨利．威斯登（John-Henry Westen）在一篇报导里吹捧道：「想像一下，有这么一片土地，生命、家庭、信仰和文化都受到政府官方提倡。大家庭在这里不再被当成地球上的祸害，而确实被当成『人类的未来』。」註574

随着制裁生效，这个论坛对于克里姆林宫更增添了几分重要性。有些西方国家来宾在本国是民选官员——无论他们所属的政党是多么边缘，他们都具有阻断制裁实施及延长生效的潜力。目前，就连俄罗斯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也加入了制裁行列，如匈牙利，但这块制裁铁板最后总会出现裂缝。杜金也在此得到了施展影响力的契机，充分利用自己与希腊、芬兰、法国、奥地利，尤其义大利等国极右翼政党的联繫。註575他不只能当来宾——即使看似他将全副精力投入东乌克兰之际，他仍持续出国演讲——也能当东道主。他在二○一四年六月邀请了一些最有胆量的外国朋友来到顿内次克地区，向他们呈现歷史是如何被缔造的，伟大俄罗斯的未来又是如何被编织的。註576

西方强权按部就班实施制裁，他们的行动建立在普丁被迫让国家改弦易辙这个前提上，以避免俄国经济蒙受更大的损失。但在坚信自己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的俄罗斯看来，压力的逐步增加除了升高对立，别无其他意义。到了夏末，普丁也以自己的制裁回应：俄罗斯禁止从西方国家进口食物。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估计，这项禁令适用于价值九十亿美元的进口货物。由此传递的讯息是，敌对的外国将损失这些贸易金额，而俄罗斯的食品制造商则因此获利。註577真正发生的事却是食物价格在一个月内就上涨百分之十，超市能买到的食物品项也显着减少。比方说，乳酪大多消失了。俄罗斯再次成了一个最适合以食物做为赠礼的地方——来自西方的观光客或归国旅人总是带着乳酪前来。

古德科夫做了一张图表，其中有两条曲线：普丁的支持度，以及列瓦达中心的消费者认知指数。该指数取自以下五个问题的答案：（一）你的家庭经济状况过去一年来有何转变？（二）你预期家庭经济状况明年将如何变化？（三）你预期今后十二个月内，全国经济整体上将会好转还是恶化？（四）今后五年呢？（五）现在是进行家具、电视、冰箱等大型採买的好时机还是坏时机？註578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开始追踪这个指数，从二○○八年开始使用当前这套提问。就在普丁的支持度直线上升后不久，消费者认知指数开始下降。经济发展趋缓在冬季奥运会之前就显而易见，那时还有过一段短暂的乐观时期，但在入侵乌克兰两个月后，衰退转为暴跌。註579到了二○一四年春天，解僱潮开始蔓延。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稳定的卢布，兑美元匯率开始贬值。制裁让卢布更弱，反制裁让它进一步贬值，二○一五年秋季石油价格下滑更使它暴跌。十二月时，卢布在一整天之内如同熘熘球般来回摆盪，兑美元匯率最终以跌幅百分之十一作收，俄罗斯人急忙脱手货币换取耐用的物品。车行的存货被搜刮一空，电器用品店的大尺寸电视也被抢购一空。註580

古德科夫研读这两条分歧的曲线。普丁的支持度稳定维持在不寻常的高水准，持久到显然再无反常之处。消费者认知指数则持续下降。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两条曲线终究要打破目前的走势，彼此趋近的。

或者也不会。古德科夫自己曾经将贫困增补到极权主义的定义之中：他当时得出结论，短缺是极权政体存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或许在这个復发极权主义事例中——这套由下而上建立的社会结构几乎相当于由上而下强加的极权主义——国家与社会正在合作创造出短缺感。

当然，人们得找出规避制裁的方法，他们将食品标示为其他物品，或将产地标示为原产地以外的地方；于是人们有可能买到的是内陆国家白俄罗斯出产的海鲜。二○一五年夏天，反制裁实施一年后，普丁签署命令，下令销毁一切被认定为违禁品的食材。内阁随后颁布法规，命令应以「一切可用手段」，在两名公平见证人监督下销毁查禁食物，过程

必须留下照片及影片纪录。传闻提到了火葬场和移动焚化炉。有些人大吃一惊。政府竟要销毁大量食物—可食用的食物、不可否认地拥有需求的食物—在任何国家大概都是怪事一桩，但在俄罗斯却有可能尤其令人震惊。这是个在人为饥荒中死了千百万人的国家，也是接连发生过列宁格勒围城、战后饥馑、一九八○年代灾难性物资短缺，以及一九九○年代人民仰仗小片土地上的作物补偿欠薪并赖以维生的国家。总统自己的母亲就差点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饿死—这样的经验是雨点电视推文引发众怒的明显原因—但现在，总统却下令销毁食物。超过十五万人连署请求政府改变做法，将查禁的物品送给穷人，有些官员也对这个想法表达支持。

随后，一百一十四吨猪肉在伏尔加河畔的城市萨马拉（Samara）被销毁。这些猪肉标示为巴西进口，但被查获来自欧盟国家。接着被销毁的是奥伦堡（Orenburg）地区的二十吨乳酪。再来是圣彼得堡销毁的更多猪肉，还有装满三卡车的非法进口甜桃。註581这下子，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会恐怖或怪异到令人难以置信了。

註533：Nadezhda Tolokonnikova, “Pussy Riot’s Nadezhda Tolokonnikova: Why I Have Gone on Hunger Strike,”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3,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13/sep/23/pussy-riot-hunger-strike-nadezhda-tolokonnikova（二○一七年五月十日浏览）。

註534：Masha Gessen, “Northern Exposure: Protest, Petroleum, and Putin’s Dream of a Russian Arctic,” Harper’s, June 2014, https://harpers.org/archive/2014/06/northern-exposure/2/ .

註535：Masha Gessen, “Putin, Snubbed: The Russian Leader May Release Mikhail Khodorkovsky to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Western Leaders’ Decision to Skip His Olympics,” Slate, December 19, 2013,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foreigners/2013/12/mikhail_khodorkovsky_how_obama_s_snub_of_putin_s_sochi_olympics_may_lead.html（二○一七年五月十日浏览）。

註536：“Postanovleniye Gosudarstvennoy Dumy ot 18 dekabrya 2013 g. no. 3500-6 GD ‘Ob obyavlenii amnistii v svyazi s 20-letiyem prinyatiya Konstitutsii Rossiyskoy Federatsii,’” Rossiyskaya gazeta, December 19, 2013, https://rg.ru/2013/12/18/amnistia-dok.html（二○一七年五月十日浏览）。

註537：普丁记者会，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克里姆林宫逐字稿：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859（二○一七年五月十日浏览）。

註538：Masha Gessen, “The Putin Nemesis Plotting a Post-Putin Russia,” Vanity Fair Hive, July 19, 2016, http://www.vanityfair.com/news/2016/07/mikhail-khodorkovsky-putin-russia（二○一七年五月十日浏览）。

註539：“Rossiyskiye pisateli–Evromaydanu,” colta.ru, December 1, 2013, http://www.colta.ru/news/1364（二○一七年五月十日浏览）。

註540：Olga Pvlikova, “’Assotsiatsiya s YeS oznachayet rasshireniye sfery gey-kul’tury,’” Slon, December 10, 2013, https://republic.ru/russia/assotsiatsiya_s_es_oznachaet_rasshirenie_sfery_gey_kultury-1032020.xhtml（二○一七年五月十日浏览）。

註541：Maria Baronova, "'Vot oni khotyat Klichko: Klichko—on debil, on boksyor, po golove poluchal," Slon, January 27, 2014, https://slon.ru/world/baronova_na_maydane-1048640.xhtml（二○一六年八月十九日浏览）。

註542："V skandal vokrug 'blokadnogo' oprosa 'Dozhdya' mozhet vmeshat'sya Yu. Chayka," RBK, January 29, 2014, http://www.rbc.ru/spb_sz/29/01/2014/5592aab69a794719538d19a2（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浏览）；"Zdes' i seychas: Natalya Sindeyeva: Ya khochu izvinit'sya pered lud'mi, kotorykh eto deystvitel'no zadelo, takiye lyudi byli i vnutri telekanala," TV Rain, January 29, 2014, https://tvrain.ru/teleshow/here_and_now/natalja_sindeeva_ja_hochu_izvinitsja_pered_ljudmi_kotoryh_eto_dejstvitelno_zadelo_takie_ljudi_byli_i_vnu（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543："Zdes' i seychas: Dmitry Peskov: Ya ne vizhu smysla zakryvat' telekanal, no oni narushili bol'she, chem zakon, pereshli krasnuyu liniyu," TV Rain, January 29, 2014, https://tvrain.ru/teleshow/here_and_now/dmitrij_peskov_o_situatsii_s_dozhdem_ja_ne_vizhu_smysla_zakryvat_telekanal_no_oni_narushili_bolshe_ch（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544：Caitlin Dewey, "Journalists at Sochi Are Live-Tweeting Their Hilarious and Gross Hotel Experience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4,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4/02/04/journalists-at-sochi-are-live-tweeting-their-hilarious-and-gross-hotel-experiences/（二○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浏览）。

註545：Maria Baronova, "No One Has Done More for Ukrainian Nationalism Than Vladimir Putin," New Republic, March 3, 2014,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6841/bolotnaya-prisoner-maria-baronova-putins-ukraine-occupation（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546："Referendum v Krymu o statuse avtonomii," RIA compilation, March 16, 2015, http://ria.ru/spravka/20150316/1052210041.html（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547：Mark Kramer, "Why Did Russia Give Away Crimea Sixty Years Ago?"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E-Dossier no. 47, March 19, 2014,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why-did-russia-give-away-crimea-sixty-years-ago（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浏览）。

註548：普丁在克里姆林宫演说，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克里姆林宫逐字稿：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官方英文译本：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549：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550：希特勒在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大会的闭幕演说，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在纽伦堡：http://der-fuehrer.org/reden/english/38-09-12.htm（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551："'Maidan,' Krym, sanktsii," Levada Center, December 30, 2014, http://www.levada.ru/2014/12/30/majdan-krym-sanktsii/（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浏览）。.

註552：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p. 470-474. 译者按：本段叙述参看鄂兰着，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页四七○至四七六。

註553："Expert: Raspad Ukrainy neizbezhen," russia.ru, October 8, 2009, http://tv.russia.ru/video/diskurs_5615/（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54："Predstavlyayetsya pravil'nym initsiirovat' prisoyedineniye vostochnykh oblastey Ukrainy k Rossii," Novaya gazeta, February 23, 2015, http://www.novayagazeta.ru/politics/67389.html（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浏览）。《新报》认为这份备忘录出自人称「正教亿万富豪」的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Konstantin Malofeev）。但其行文逻辑，尤其文中运

用的许多词汇，则强烈指向杜金可能共同撰写。特别是「地缘政治」一词的一再使用，以及更重要的，「城市游击战」（gorodskaya guerrilya）这个似乎只会出现在百科全书里，却在杜金着作中经常使用的俄文术语。大量书面证据记载了马洛费耶夫与杜金持续至今的合作关系，可参看"Chorniy Internatsional: Malofeyev i Dugin," 俄国骇客「匿名国际组织」（Shaltay Boltay）部落格发文，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https://b0ltai.org/2014/11/27/%D1%87D0%B5%D1%80%D0%BD%D1%8B%D0%B9-%D0%B8%D0%BD%D1%82%D0%B5%D1%80%D0%BD%D0%B0%D1%86%D0%B8%D0%BE%D0%BD%D0%B0%D0%BB%D0%BC%D0%B0%D0%BB%D0%BE%D1%84%D0%B5%D0%B5%D0%B2-%D0%B8-%D0%B4%D1%83%D0%B3%D0%B8/（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55：“Dokazi prichetnosti vladi RF do poasyaganiya na teritorial’nu tsilisnist’ Urkainy,” 乌克兰检察总长室发布的电话录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6K1_vHrJPU（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56：“A. Dugin i Ye. Gubareva obsudili budushcheye Donbassa i Ukrainy,” Skype对话录影，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0yebodlM（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浏览）。发布这段影片的频道为顿内次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帕维尔．古巴列夫（Pavel Gubarev）所有，但他当时身陷囹圄，因此我推测，这通来电是由其妻叶卡捷琳娜．古巴列娃（Yekaterina Gubareva）本人录下并发布的。

註557：“Pro-Russian Crowds Storm Government Buildings in Eastern Ukraine,” from “The Ukraine Crisis Timelin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April 6, 2014, http://ukraine.csis.org/east1.htm#45（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58：“People’s Republic of Donetsk Calls for Russia to Send ‘Peacekeepers,’” from “The Ukraine Crisis Timeline,” CSIS, April 7, 2014, http://ukraine.csis.org/east1.htm#46（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559：“US, Others Support Ukraine but Europe Divided on Sanctions,” http://ukraine.csis.org/east1.htm#58; “Pro-Russian Forces Seize APCs as Ukrainian Operation Falters,” http://ukraine.csis.org/east1.htm#59; April 15-16, 2014, “The Ukraine Crisis Timeline,” CSIS（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560：“Ukraine, Pro-Russian Protestors [sic] Square Off in East,” April 8, 2014, http://ukraine.csis.org/east1.htm#48; “Pro-Russian Forces Seize Additional Facilities,” April 12, 2014, http://ukraine.csis.org/east1.htm#53; “Ukrainian Military, Pro-Russian Forces Clash as ‘Anti-Terrorist Operation’ Begins,” April 15, 2014, http://ukraine.csis.org/east1.htm#57; all from “The Ukraine Crisis Timeline,” CSIS（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561：编按：地理上属于克里米亚一部分的塞凡堡市，原是乌克兰直辖市，而后跟随克里亚米直辖于莫斯科。

註562：Pryamaya liniya s Vladimirom Putinym, April 17, 2014, Kremlin transcript,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796（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563：编按：伊琳娜．袴田的父亲是一九三九年流亡苏联的日本共产党员袴田陆奥男，母亲是亚美尼亚人；她的伯父袴田里见曾任日共副委员长，晚年与日共反目。

註564：Yuri Maloveryan, “Gosduma utverdila prisoyedineniye Kryma k Rossii,” BBC Russian Service, March 20, 2014, http://www.bbc.com/russian/russia/2014/03/140320_ukraine_crimea_duma_ratification; Ilya Ponomarev, “In Exile, but Ready to Save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4/16/opinion/in-exile-but-ready-to-save-russia.html?_r=0（皆于二○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浏览）。

註565：Marlene Laruelle, ed., Eurasianism and the European Far Right: Reshaping the Europe-Russia Relationship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5).

註566：编按：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在二○○○至二○○三年间出任俄罗斯总理，但后来公开反对

普丁，并与涅姆佐夫联手。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是前任国会议员，他与涅姆佐夫和卡西亚诺夫共同发起了一个右翼自由派反对党。

註567：“21 aprelya v programme ‘Pozner’—Aleksandr Dugin,” April 18, 2014, http://pozneronline.ru/2014/04/7669/（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浏览）。

註568：Alexander Dugin, “Nakanunye voyny—2,” Malorossiya, April 21, 2014, http://maloros.ru/new/4120-aleksandr-dugin-nakanune-vojny-2.xhtml（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569：Alexander Dugin, “Putin, vvodi voyska!” Malorossiya, May 28, 2014, http://maloros.ru/new/4687-aleksandr-dugin-putin-vvodi-vojska.xhtml; Alexander Dugin, “Russkiye zemli to suzhayutsya, to rasshiryayutsya,” Malorossiya, May 27, 2014, http://maloros.ru/new/5019-aleksandr-dugin-russkie-zemli-to-suzhayutsya-to-rasshiryayutsya-video.xhtml; Alexander Dugin, “Shestaya kolonna,” Vzglyad, April 29, 2014, http://www.vz.ru/opinions/2014/4/29/684247.html（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570：作者访谈娜塔莉亚．玛吉耶娃（Natalya Makeeva），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

註571：Mikhail Khodorkovsky, “My mozhem i khotim reshat’ samiye slozhniye zadachi, kotoriye stavit pered nashimi narodami zhizn’,” khodorkovsky.ru, April 24, 2014, http://old.khodorkovsky.ru/news/2014/04/24/18768.html（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572：Alan Taylor, “A Year of War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Donetsk Airport,” The Atlantic, February 26,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photo/2015/02/a-year-of-war-completely-destroyed-the-donetsk-airport/386204/（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浏览）。

註573：Cole Parke, “Natural Deception: Conned by the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 January 21, 2015, http://www.politicalresearch.org/2015/01/21/natural-deception-conned-by-the-world-congress-of-families/#sthash.DJXMcOU7.a9bkcdgH.dpbs（另刊于The Public Eye, Winter 2015，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浏览）。

註574：John-Henry Westen, “Conference Promoting Large Families in Russia Amazes Westerners,” lifesitenews.com, September 10, 2014,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conference-promoting-large-families-in-russia-amazes-westerners（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浏览）。

註575：Anton Shekhovtsov, Russia and the Western Far Right: Tango Noir (Abingdon, England: Routledge, 2017).

註576：作者访问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二○一四年六月于莫斯科。

註577：“Rossiya zapretila import prodovol’stviya na $9 mlrd v otvet na sanktsii,” TASS, August 7, 2014, http://tass.ru/ekonomika/1367515（二○一六年九月四日浏览）。

註578：“Indeks potrebitel’skikh nastroyeniy,” explication, Levada Center, undated, http://www.levada.ru/indikatory/sotsialno-ekonomicheskie-indikatory/indeks-potrebitelskikh-nastroenii/（二○一六年九月四日浏览）。

註579：“Index potrebitel’skikh nastroyeniy,” graph, Levada Center, undated, http://www.levada.ru/indikatory/sotsialno-ekonomicheskie-indikatory/（二○一六年九月四日浏览）。

註580：Masha Gessen, “The News in Moscow,” newyorker.com, December 27, 2014,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news-in-moscow-russia-ruble（二○一六年九月四日浏览）。

註581：Masha Gessen, “A Country Haunted by Starvation Burns Its Food,” newyorker.com, August 11, 2015,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russia-haunted-by-starvation-

burns-its-food（二○一六年九月四日浏览）。

# 第二十一章　冉娜，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索契冬季奥运会闭幕于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隔天，莫斯科法院对沼泽广场案八名被告进行宣判。数週之前，当宣判日期决定时，情况就很清楚，将日期订在普丁不再需要顾虑如何短暂散发出温和形象的第一天，结果恐怕凶多吉少。沼泽广场案或许会成为克里姆林宫报復被迫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一箭之仇的大好机会。

只有一名被告获得缓刑，这位十九岁女子先前已被软禁在家一年多。其他人—七名男性，全都在审判前就遭到羁押—各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到四年不等。註582少数群众在宣判当天聚集于法院门外，随后警方展开逮捕—警方将两百三十四人押上巴士载走。当天稍晚，人群开始聚集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驯马场广场，也就是七个月前成千上万民众抗议纳瓦尼判刑之地。但这次只有四百三十二人，他们全被逮捕。註583

涅姆佐夫当时站在人行道上接受一家法国电视臺採访，这时一名警员走近他并说道：「请你跟我上巴士。」涅姆佐夫向记者告退，跟着警员走。如果在以前，他会拒绝前往，并要求警方说明拘捕他的理由，让警察得费力将他庞大的身躯拖上巴士。但涅姆佐夫在六个月前又投入了选举政治—俄国仅存的选举政治。这时只有某些城市的市长和市议员仍由人民直选。涅姆佐夫当选了雅罗斯拉夫尔市的市议员，这座人口约有五十万的城镇，距离莫斯科约两小时半车程。他认真履行职责，大约将一半时间花在雅罗斯拉夫尔，也在该市成了公众人物。他介入调查当地的贪腐问题，同时推广地方体育。身为民选官员，警方不能随意拘留他，他这样的人需要经过特殊法律程序才能逮捕。因此他信步走向巴士，手持议员证书—然后发现自己被逮捕。

他和纳瓦尼在一间双人牢房度过那一夜。註584隔天，纳瓦尼被判处七天拘役，涅姆佐夫则是十天。其他几位行动者则被判处一週到两週不等的拘役。他们全都因为违抗警察命令而被定罪。註585传达的讯息很清楚—奥运办完了，就要加强镇压。抗争一律严惩不贷。涅姆佐夫这个傻瓜，竟以为俄国有任何法律可以保障他。

*

当涅姆佐夫身陷囹圄之时，俄国军人身穿无识别符号的制服入侵了克里米亚。涅姆佐夫在部落格上写了一篇短文，将它传给莫斯科回声电臺，他经常上这个电臺的节目，也在电臺网站里经营自己的部落格。回声电臺回信给他：他得把这篇文字改得和缓一些。他们明确要求他删去

「手足相残的战争」、「心理状态反覆无常的祕密警察特工」以及「食尸鬼在人民血泊中取乐」这几句话。涅姆佐夫拒绝了，他转而在自己的脸书页面发布这篇文章：

普丁向乌克兰宣战了。这是一场手足相残的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要为了这个心理状态反覆无常的祕密警察特工之血腥疯狂付出惨重代价。双方的年轻人都要牺牲。母亲和姐妹的悲痛无可慰藉。孩子们将沦为孤儿。克里米亚会成为空城，因为再也不会有人去度假。人民不分老幼将被榨取数十亿、数百亿卢布投入到战火之中；接着还会需要更多钱，支持在克里米亚掌权的小偷。他一定找不到其他掌握权力的方式。这个食尸鬼在人民血泊中取乐。俄罗斯将要面临国际孤立、人民贫困和政治镇压。天主啊，我们究竟身犯何罪，要遭受如此报应？我们又要再忍受多久？註586

同日，六个人来到驯马场广场，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为了你我的自由」（For Your Freedom and Ours）。这句话是双重典故：它最初是波兰人的口号，十九世纪波兰独立斗争期间由俄国的声援者们採用，而后在一九六八年，由七位前往红场，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人士再次使用。这七人当时全部被捕、被判入狱及流放西伯利亚。而这次，六位抗争者一拉开横幅就被逮捕了。註587当天稍晚，更多人来到驯马场广场，其他人则前往国防部大楼。没人确切知道该去哪里，多半是由于多年来安排地点与时间，再把消息传出去的涅姆佐夫、纳瓦尼及另外几名核心行动者这时都在狱中。当天结束时，共有三百六十二人被捕。註588正是在这一天，国会允许俄国在境外使用武力，涅姆佐夫及其他关注的俄国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对乌克兰开战了。

同时也有一场仓促策划的支持入侵游行──国会的官报称它为一场「支持乌克兰人民，反对在基辅夺权的破坏分子」游行。註589亲克里姆林宫的青年组织在社群网路上刊登了以下广告徵求参与者：

集会与音乐会，时薪五百卢布

与乌克兰最近事态有关的集会。下午三点在地铁普希金站大厅中央集合。需要五十位年轻人。回信附两张照片、名字、姓氏、年龄及电话号码报名，或电话联络89104465285，找马克西姆。事成付款。註590

这则广告透露出这类青年运动标准的动员惯习，更甚于花钱找人来

庆祝。然而，人们涌现的喜悦是巨大而真诚的，冉娜感受到身边满是欢欣鼓舞。所有人都失去理智了。冉娜体验到了政治愤慨—甚至是她的政治热情。她从未有过这种感受，就连父亲在二○○九年除夕夜被逮捕时也没有，在她竞选公职时当然也没有。这些年来，她对父亲理想的支持是智识上的—她同意父亲的论点确实有可取之处，即使未必始终如此。但这时，她觉得自己正在凝视深渊。像她祖母或同事这样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懂战争带来的灾难？在经济问题与意见上令她敬重的那些人，怎么可能不懂经济会因此从疲软落入衰亡？她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也全都沉迷于激情中。不愿分享民族喜悦的她，在办公室里和国内都成了贱民。

她想跟父亲谈谈这件事，但他又被捕入狱了。她把食物送去给他。他这次被关在一栋翻修好的监狱大楼里，磁砖地面光滑闪亮，窗框是塑胶的。食物的规定则很怪异：番茄允许携带，但禁带黄瓜。

他一获释，她就去找他谈话。

「我们得离开，」她说：「这个国家完了。」

他听着。

「我要辞职。」她说。「国家自己都没有未来了，辩论天然气垄断的未来又有什么意义？」

「别辞职，」他说：「先找另一个工作。」

「我要去乌克兰。」

「那就去吧。」

冉娜去了基辅。她向所有电视臺求职，却一无所获。父亲鲍里斯提议，他可以联繫他正在乌克兰竞选总统的朋友彼得．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请他帮忙为冉娜找个工作。

「尽管你住在乌克兰，对我的形象不会是好事。」他补充。既然俄国正与乌克兰交战，他和这个国家及橘色革命的关系也就更常被拿出来讲。他成了叛国贼的代名词。

「不要，别打这个电话。」冉娜说。不是因为他提到了自己的名声，她更担忧自己的名声。她好不容易才挣得了专属于自己的名声。

「那你得继续在RBK工作，只要他们还能用你。」

RBK是昔日的金属业大亨米哈伊尔．普罗霍洛夫（Mikhail Prokhorov）所有，他是鲍里斯的朋友，自己也曾涉入政治。他正是那个曾经提议资助冉娜，同时也资助她对手的人。普罗霍洛夫想尽办法至少从外表看来独立于克里姆林宫，因此他的媒体管道比其他多数媒体更

自由一些。冉娜有一份无须被迫公然扯谎的新闻工作——这是一种奢侈。过不了多久，冉娜和她的父亲就知道了，还有一份工作可做或许就像是一种奢侈。

*

鲍里斯和其他团结组织的运动者一出狱，立刻提交举行和平游行的申请。约有五万人在三月十五日前来参加。这个人数十分惊人，倘若民调结果没错，只有百分之一俄罗斯人反对这场战争，那么在莫斯科，几乎所有的反对者都上街游行去了。另一方面，民调也有可能只反映出一件事——如今只有最死忠的、赌上一切的反对运动成员愿意表达不同意见，即使面对民调访员也一样。鲍里斯走在游行最前端，在高举着「别碰乌克兰」（Hands off Ukraine）横幅的一排人中间。在他们身后，许多幅标语都写着「为了你我的自由」。

涅姆佐夫是集会的第一位讲者。他谈论乌克兰的内容，倒不像谈论普丁那样多：

他是个病人。……但他又不只是病人：他也是个损人利己、不诚实的人。他占领克里米亚就只因为他想要永远掌权！註591

冉娜参加了这场游行——这是二○○九年除夕夜她在警察追捕下逃跑后，第一次加入父亲的街头抗议。

游行过后数日，涅姆佐夫听说自己会在沼泽广场案成为被告。想到其他抗争领袖的遭遇，他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尤达佐夫正在狱中；纳瓦尼只因成千上万人民上街抗议而免于入狱，但他这时又面临了新罗织的诈欺罪官司；卡斯帕洛夫被威胁起诉之后移居国外。鲍里斯对冉娜说，他想谈一谈。

「我不知道能不能活过十年刑期。」他说：「你也知道，我五十五岁了。」

他每天都锻鍊身体。他滑风浪板。他爱拍自己在海滩上的照片。他穿着紧身蓝色牛仔裤，白衬衫不扣钮扣以展现自己的胸肌。他最近两三个女友年纪比冉娜还小；其实冉娜很欣赏现任这位女友——一位来自基辅、金色头髮的长腿年轻女子，因为她从来不像前几个女友那样在大人的对话里插嘴。

「我永远支持你。」冉娜说。家人支持会是囚犯能不能活着离开俄罗斯监狱的重大差别。

「你会失业的。」

「你知道的，我不在乎。」

「那么，要是他们把我关起来，你会在电视直播提这件事吗？」

「你答对了。」

*

三月二十六日，普丁首度当选总统十四周年，冉娜年满三十岁。鲍里斯在早上打电话给她。

「对不起，我今晚没法出席，」他说：「我在以色列。你能来看我吗？」

冉娜大哭起来。他们从来不曾错过彼此的生日。他们都会举办盛大的派对。「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办派对了。」她对母亲雷莎说。其他所有人都来了，每个人都注意到鲍里斯缺席，但没人问起。

下一週，冉娜飞往特拉维夫。鲍里斯在机场接她，模样宛如电影《教父》里的艾尔．帕西诺，那个角色总有一只眼睛是黑青的。只差在鲍里斯两眼都黑青。

「我去开刀割除眼袋了。」他解释：「我需要医生证明。」

他指的是雅罗斯拉夫尔市议会的强制性出席规定。但他在想什么？他以为自己可以无限期请病假留在这儿？以为要是等得够久，调查委员会就会改变主意不再追查他？他打算留在以色列吗？

他说他要留下来。他也抱怨自己在以色列不适应。冉娜说她同意。这里太挤、太热、太潮溼了。

「还有别的国家，」她建议：「天气更好。」

父亲一语不发。

他们在海滩上漫步，他谈论着自己的人生，彷彿需要为自己一生的成就做出总结似的。他看起来老了许多──而他以前从不显老。他的模样不像个超级英雄。他一直提议要去购物，想买东西送她。她拒绝了。

她离开前，他对她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在哪里。他不是在躲藏──他只想隐瞒目前不在俄国这件事。冉娜谁也没告知。就连老闆直接问她父亲是不是人在以色列，她都回答：「你在说什么啊？」

冉娜的祖母当然知道儿子在国外，而且她觉得很开心。为了确保他留在国外，她决定在莫斯科回声电臺网站上发表一封写给儿子的公开信。她把信给了鲍里斯的表兄弟安排发表。这位表兄弟把信寄给冉娜，冉娜再寄给鲍里斯。

我只有一件事要求你、恳求你──你想要的话，可以说它是我的遗嘱。不要坐牢。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是指那些爱你的人，还有一般来说的好心人。

吉娜．雅可夫列夫娜怎么会要他避免坐牢？她是在苏联时代生长的女人，因此她不能公开建议他移民。在她生命中的多数时候，流亡者都被斥责为苏联事业的叛徒。尽管如此，所有人也都知道，当她恳求他不要入狱，她其实是在请求他移居国外。由于这是一封公开信，也就明确表达了担忧──她的儿子要是移民的话，人们会认为他不爱国：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的父亲，鲍里斯的祖父，从年少时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是列宁主义的忠诚信徒，而且亲眼看过列宁演说。他在退休后获得苏联表扬，因此是一位最光荣的人。对鲍里斯幸灾乐祸的人们都无法理解，他的一切思想与行动，全都出于赤诚和热爱俄罗斯。它们绝不只是空话。顺便一提，他和普丁有个共通之处：他们都热爱俄罗斯。

当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时，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雀跃。我认为正义得到伸张了。我和我的女婿讨论这件事，得到一致的结论：普丁确立了自己的歷史地位。我们都是单纯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会怎么演变，我们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

但我现在明白了。我认为或许普丁对这一切都不再那么兴奋了。我女儿说，或许他的顾问并非一致支持这样的事态。他们有些人或许更聪明一些。

再回来讲鲍里斯。我记得在某份报纸上读过：霍多尔科夫斯基被人问到，「你这么聪明的人，明明可以躲过牢狱之灾，怎么最后却入狱了？」霍多尔科夫斯基回答他：「世上有聪明人，还有睿智的人。」

鲍里亚（Borya），请做个睿智的人。

爱你的妈妈<br>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鲍里斯暴跳如雷。在一封公开信里被自己的母亲喊话，还诉诸苏联时代的荣誉概念，幼稚地操弄他的意志与形象；但最严重的是，他被拿来跟普丁相提并论──他们都热爱俄罗斯这句断言──全都激怒了他。尽管

如此，冉娜还是觉得他那天在电话里叫骂得太过份了。他最近似乎一再过度反应。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如今在雨点电视当主播的社交名流在推特发文：「结果涅姆佐夫在以色列。由于遭受刑事调查，可能不会回俄国。」註592当他们在电话里谈到这件事，鲍里斯听来很受伤：他一直以为那个女人是他的朋友。

他是个蹩脚的流亡者。他的心不在外国。成功的流亡者为了拯救子女或财产而逃走。他逃走是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但他的人生都在俄罗斯。

几天后，他去基辅参加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会议，然后从基辅搭机返回莫斯科。他在机场拍了一张自拍照，发上脸书，同时引述了那位雨点电视主播两週前的推文。他回来了。註593

*

鲍里斯的生命此时朝不保夕，因此他加倍地拼命工作。他针对索契冬季奥运会前置工作中的贪污与诈欺发布了一份报告书。报告中提到许多人，尤其聚焦于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此人是垄断俄罗斯铁路事业的首脑，也是俄罗斯正教「传统价值」社会运动的重要资助者。他的妻子经营一个名为「母亲圣洁」（Sanctity of Motherhood）的组织，同时也是世界家庭大会的固定参与者。亚库宁生于一九四八年，苏联时代是国安会军官。他从一九九○年代起就是普丁亲信的一员。註594但涅姆佐夫的重点不是亚库宁的生平，而是他在索契做的生意，包括一份兴建四十八公里长的铁路，造价却超过五百亿美元的合同。涅姆佐夫确信这创下了世界纪录。他将这个章节命名为「史上最昂贵奥运会中最昂贵的计画」。註595亚库宁从那年春天开始对涅姆佐夫兴讼，控告他诽谤，并索赔三百万卢布──在最初提告时相当于十万美元，但在隔年冬末终于排上审判日程时，折合美元的金额就几乎减半了。註596

涅姆佐夫也开始蒐集资料，为普丁在乌克兰的战争撰写报告。其中收录了他在克里米亚及乌克兰东部动用俄军的证据、克里姆林宫列为机密的伤亡人数；二○一四年七月击落马来西亚航空客机、造成两百九十八人丧生的导弹，是由俄罗斯及其支持的乌克兰分离势力控制区内一架俄制发射器所发射的证据。它也将收录二○一四年秋天在明斯克举行的和平谈判资讯，例如俄罗斯追加签署了当时所订立的协议（由俄国驻乌克兰大使米哈伊尔．祖拉波夫〔Mikhail Zurabov〕代表），从而承认了自己也是引发冲突的其中一方。註597

涅姆佐夫在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领导了第二场和平游行──约有

两万五千人参加。註598当天，游行路线上的其中一栋大楼打出一面两层楼高的方形横幅，上面写着「叛国贼游行」字样。在美国国旗与白宫的图案下方，这面横幅画上了六个人的脸孔━两位作家、一位摇滚音乐人，以及包括涅姆佐夫在内的三位运动者。註599这六人至少有三人的全部或大半人生在俄国之外度过。涅姆佐夫的脸孔，早在四月时就曾出现在市中心一栋大楼悬挂出来的一面同样大小的横幅上，那时他在以色列。那面横幅写着「第五纵队。我们之间的异己。」成员几乎完全不一样，但必定少不了涅姆佐夫的脸孔。註600他在二○一五年一月又出现了，在至今为止最大的一面横幅上━这面横幅悬挂于一栋高楼公寓，覆盖了三层楼半。「第五纵队坚持要制裁自己的国家。他们藉由支持制裁造成了所得下降，物价和失业率升高。」接着引自涅姆佐夫部落格的一段文字，出现在他的脸孔旁边：「实施至今的制裁有可能动摇国家。普丁将要面对俄罗斯内部的危机与混乱。」註601

二○一五年除夕，阿列克谢．纳瓦尼和他的弟弟奥列格被判诈骗一家公司，即使该公司代表出庭作证，表示公司其实没被诈骗。阿列克谢被判处三年半居家软禁━当局显然试图避免另一次群众抗争━但奥列格被判入狱三年半。他成了人质。註602

随着纳瓦尼判刑、尤达佐夫坐牢，卡斯帕洛夫和波诺玛瑞夫流亡国外，涅姆佐夫如今成了唯一还能在莫斯科（以及雅罗斯拉夫尔）自由行动的抗争领袖。冬季假期结束后，他开始筹划第三次游行，时间订在入侵克里米亚周年。但这次他无法取得在市中心游行的许可。他也无法为游行争取到多少支持，就连参与运动的同侪们都不太支持。他的盟友们坚称，俄罗斯人现在更担心自己的经济问题，而非战争。涅姆佐夫对这两点都让步了：游行会在距离市中心一小时地铁车程的市郊举行━名称则是「反危机春游」（The Spring March Against the Crisis）。

就在游行日期十天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下臺一周年当天，一场政府核准的游行在莫斯科市中心举办。另一个亲克里姆林宫的青年运动━反广场运动（Anti-Maidan）在这天正式成军，公开宣告的唯一目标就是防止「颜色革命」在俄国发生。註603约有三万人参加，许多人携带着旗帜和预先印好的标语，上面写着「广场带来战争与混乱」之类的口号。一面由十多人同时高举的巨大黑色横幅以白色字体写着：「彻底清除第五纵队。」数十名游行参与者都高举着同一款海报，那是张加上了橘色相框的涅姆佐夫黑白照片，说明文字写着：「广场势力组织者。」註604

*

冉娜不打算到郊区参加游行。她也不喜欢婉转的游行名称；她要参

加反战游行，其余免谈。她反倒要去义大利度假；当莫斯科的冬天似乎总让人觉得没完没了，三月第一週正是脱身抽离的大好时机。雷莎也会同行──她在二月二十七日从下诺夫哥罗德来到莫斯科过夜，隔天一同出国。冉娜在回家路上经过鲍里斯的住处，将一个装有一万美元的信封寄放在门房那儿。这笔钱要用在讨论普丁与乌克兰战争的报告书上，报告书就要付印了。

冉娜在深夜十一点半向雷莎说了晚安，上床睡觉，把灯和手机都关掉──她总是遵守这条心理卫生规则。雷莎睡在客厅里。

深夜，冉娜被雷莎的尖叫声惊醒。冉娜知道尖叫的人是母亲，但那声音她从来没听过，那是惊骇的尖叫。冉娜一定是忘记锁门，有人闯入了。

雷莎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她坐在沙发上尖叫着。她手里抓着手机。

「他们杀了他。」她说。

冉娜打开手机和电视。手机里都是简讯，电视也播出报导。她父亲就在不到十五分钟距离外的一座桥上被人枪杀。雷莎唿吸困难。

「不要紧。」冉娜说：「我们现在一起过去。」

天空下着倾盆大雨。她拦了计程车。

「带我们去莫斯科河大桥（Moskvoretsky Bridge），麻烦你。」

「你们去那里干嘛？」

「他们杀了涅姆佐夫。」

驾驶第一次看着她。他的脸孔在街灯映照下显得愤怒。

「那关你什么事？」

「这个嘛，或许你不在乎一个世界知名人物刚才在莫斯科市中心被人开枪打死，但他刚好是我父亲。」

警方封锁了大桥。冉娜走过一个又一个警员面前，一面出示记者证和护照。「我是记者。我们是家属。我是记者。」过程彷佛永无止境。

她们在路障彼端遇见的第一个人，是鲍里斯的年轻友人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札，他是和平游行的共同组织者，目前为霍多尔科夫斯基工作。

「遗体送上救护车了。」他说：「我会跟车去殡仪馆。」

这时候驾车在城里到处跑没有意义。

「我们得想想看该怎么跟奶奶说。」冉娜对雷莎说。

她们打电话告知鲍里斯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姐姐和表兄弟，然后前往吉娜．雅可夫列夫娜家，等待早晨来临。因为吉娜．雅可夫列夫娜一起床就会打开电视或收音机，而她们必须在那里，亲口把消息告诉她。

「我要去莫斯科。」老太太说。

隔天，吉娜．雅可夫列夫娜在莫斯科带领了一场游行。这不是一场和平游行或「春游」，而是一场哀悼游行。五万人未经许可就游行穿越莫斯科市中心。他们高举着俄罗斯国旗和涅姆佐夫的肖像，以及一面写着「英雄不死」的巨大横幅。没人阻止。註605

*

冉娜手机里有几十通未接来电。人人都要求採访。她打电话给自己的电视臺。

「我想先让你们採访。」她说。

「好，我们这就开始录影。」总编说。

「我要现场直播。」冉娜说。

「我办不到。」

她挂了电话。

她转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採访。她说，她认为普丁本人要对她父亲的死负责，她是在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鲍里斯在跨越莫斯科河的大桥上遇害，克里姆林宫就在谋杀现场的背景里。克里姆林宫距离这么近，使得这座大桥随时受到监控——任何曾经试图在那儿出镜拍摄的电视记者全都知道，总统卫队立刻就会冲上来阻止他们。但鲍里斯的尸体横躺在桥上至少十分钟，总统卫队始终不见人影。发生在何处其实也不是重点。普丁长久以来持续将冉娜的父亲塑造成叛国贼，去年开始更把他说成是敌方的战斗人员——他们对坐牢的恐惧如今显得幼稚。

举行了丧礼。为涅姆佐夫五十岁生日拍摄了影片的记者帕维尔．舍列梅特主持追悼仪式。但他们判断出错，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出殡行列出发前往墓地之时，前来致哀的人们还未能全部进入灵堂。

冉娜和雷莎还是去了义大利，但英国广播公司又在那儿找上她，这次冉娜说得更多。俄罗斯警方侦办鲍里斯的谋杀案，已经逮捕一名车臣人警员。但她说，她不信任俄国的任何侦查机关。

你一直问我，我父亲是不是对政权构成威胁。他当然是。你对世界的看法是这么浅薄。眼界放宽一点。研究一下世界上的极权政体。异议人士要不是流亡——看看有多少人离开了俄国，像卡斯帕洛夫那样——不然

就是在坐牢或被软禁，或者被杀了……任何想法不同的人对极权政体都是威胁……

你会害怕回俄国吗？

一点也不，我不怕。我要回去。

你父亲被杀后有改变你的想法吗—

你知道，我一直都是悲观主义者，但这件事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倒不是说我还有幻想。但我确实完全想不到这种事有可能发生—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们杀了我父亲。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运动者。但我是个有荣誉感的人，我非常爱我的父亲，我要所有人都知道事实真相。而真相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绝不可能从俄国当局那儿得知真相。但我只想说，我现在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当局从今而后会把我当成运动者。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註606

冉娜的确回到了莫斯科。她估计自己迟早要失业—RBK的人无疑只是在等待一个藉口开除她。

鲍里斯的朋友们—过去十年来在团结组织、游行里和牢狱中陪伴过他的人们—在桥上摆设了纪念物。在当局第一次清掉鲜花和俄罗斯国旗后，他们不分昼夜派人在现场守候。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札是每天前往现场伫立悼念和守护的六个人之一。

五月下旬，波昂大学（University of Bonn）邀请冉娜演讲纪念父亲。鲍里斯死去满三个月当天，她在一间稍嫌老旧的德国现代主义风格旅馆里醒来。她阅读新闻，得知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札身中不明毒素，导致多重器官衰竭而住院治疗。所以，运作的方式就是这样。名人被一颗子弹打穿心脏，不太有名的人则在茶里被下毒。

后来她知道这间旅馆按月收租金。她可以在寻找公寓时住在那儿。经营旅馆餐厅的家族说义大利语—她可以和他们对话，即使她在这个城市里举目无亲。冉娜没想到要去别处。波昂安静、整洁又安全，已是个够好的地方。她不会再回俄罗斯了。

註582：“Prigovor po ‘delu vos’mi’ oglashen,” OVDInfo, February 24, 2014, https://ovdinfo.org/express-news/2014/02/24/prigovor-po-delu-vosmi-oglashen（二○一六年九月六日浏览）。

註583：“Na Manezhnoy zaderzhali 423 cheloveka,” OVDInfo, February 24, 2014, https://ovdinfo.org/expressnews/2014/02/24/na-manezhnoy-zaderzhali-423-cheloveka（二○一六年九月六日浏览）。

註584：Yelena Masyuk, “Nepovinoveniye zakonnomy rasporyazheniyu kosmonavta. Statya 19.3,” Novaya gazeta, March 3, 2014, http://www.novayagazeta.ru/politics/62480.html（二

○一六年九月六日浏览）。

註585：“V Tverskom sude vynosyat prigovory oppozitsionnym politikam,” OVDInfo, February 25, 2014, https://ovdinfo.org/express-news/2014/02/25/v-tverskom-sude-vynosyat-prigovory-oppozicionnym-politikam（二○一六年九月六日浏览）。

註586：Boris Nemtsov, “Voyna—eto bezumiye, eto protiv Rossii,” blog post, March 2, 2014, http://b-nemtsov.livejournal.com/2014/03/02/（二○一六年九月八日浏览）。

註587：“Shest’ chelovek zaderzhany na Manezhnoy ploshchadi za rastyazhku ‘Za nashu i vashu svobodu,’” OVDInfo, March 2, 2014, https://ovdinfo.org/express-news/2014/03/02/shest-chelovek-zaderzhany-na-manezhnoy-ploshchadi-za-rastyazhku-so-slovami（二○一六年九月八日浏览）。

註588：“Kak minimum 362 cheloveka zaderzhali segodnya v Moskve,” OVDInfo, March 2, 2014, https://ovdinfo.org/express-news/2014/03/02/kak-minimum-362-cheloveka-zaderzhali-segodnya-v-moskve（二○一六年九月八日浏览）。

註589：“V Moskve proydiot shestviye v podderzhku naroda Ukrainy,” Rossiyskaya gazeta, March 2, 2014, https://rg.ru/2014/03/02/podderjka-anons.html（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590：广告截图取自记者安德烈．马尔金（Andrei Malgin）部落格，二○一四年三月三日，http://avmalgin.livejournal.com/4376564.html（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591：Yuri Maloveryan, “’Marsh mira’ v Moskve sobral desyatki tysyach uchastnikov,” BBC Russian Service, March 15, 2014, http://www.bbc.com/russian/international/2014/03/140315_ukraine_moscow_rallies（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592：Ksenia Sobchak, tweet, April 14, 2014, https://twitter.com/intent/like?tweet_id=455701786901639169&ref_src=twsrc%5Etfw&original_referer=http%3A%2F%2Fperebezhchik.ru%2Fslukhi%2F366.html&tw_i=455701786901639169&tw_p=tweetembed（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593：Boris Nemtsov, Facebook post, April 26, 2014, https://www.facebook.com/boris.nemtsov/posts/619540304782240:0（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594：Sergei Mel’nikov, “10 vydvizhentsev KGB,” Ogonyok, November 7, 2011, http://www.kommersant.ru/doc/1802255（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595：Boris Nemtsov and Leonid Martynyuk, Zimnyaya olimpiada v subtropikhakh: Nezavisimyi Ekspertnyi Doklad (Moscow: Self-published, 2013), p. 14.

註596：Sergei Goryashko, “Vladimir Yakunin reshil nakazat’ Borisa Nemtsova rublyom,” Kommersant, May 28, 2014, http://www.kommersant.ru/doc/2481601; “Sud perenyos slushaniye po delu RzhD k Nemtsovu na 10 fevralya,” life.ru, December 10, 2014, https://life.ru/t/%D0%BD%D0%BE%D0%B2%D0%BE%D1%81%D1%82%D0%B8/146712（皆于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597：Boris Nemtsov, Facebook post, Sept. 6, 2014, https://www.facebook.com/boris.nemtsov/posts/683165751753028:0（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598：“Skol’ko cheloek prishli na shestviye v Moskve i chem otlichilsya Milonov na peterburgskom ‘Marshe mira’: Itogi 21 sentyabrya,” TV Rain, September 21, 2014, https://tvrain.ru/teleshow/here_and_now/skolko_chelovek_prishli_na_shestvie_v_moskve_i_chem_otlichilsja_milonov_na_peterburgskom_marshe_mi（二○一七年三月十四日浏览）。

註599：“Marsh predateley,” Glavplakat, Sept. 21, 2014, http://glavplakat.ru/article/319（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600：“Chuzhiye v gorode,” Glavplakat, April 11, 2014, http://glavplakat.ru/article/147（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601：“Desyatimetrovyi banner Glavplakata na Novom Arbate,” Glavplakat, January 23, 2015, http://glavplakat.ru/article/424（二○一六年九月九日浏览）。

註602：Masha Gessen, “The Bitter Education of Alexey Navalny,” newyorker.com, Dec. 31, 2014,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bitter-education-alexey-navalny（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浏览）。

註603：“Manifest,” Antimaidan, https://antimaidan.ru/page/9（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浏览）。

註604：Yevgeni Feldman, “’Antimaidan’ v Moskve: Tridtsatitysyachnoye shestviye to Petrovke,” Novaya gazeta, February 21, 2015, http://www.novayagazeta.ru/photos/67368.html（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浏览）。

註605：“Tysyachi lyudey prinyali uchastiye v marshakh pamyati Nemtsova,” BBC Russian Service, March 1, 2015, http://www.bbc.com/russian/russia/2015/03/150301_nemtsov_march_moscow（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浏览）。

註606：“Zhanna Nemtsova: ‘Putin politicheski vinovat v smerti ottsa,’” BBC Russian Service, March 12, 2015, http://www.bbc.com/russian/russia/2015/03/150311_janna_nemtsova_interview（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浏览）。

# 第二十二章　永远的战争

二○一三年七月，纳瓦尼判刑引发了那场抗议之后──谢廖沙歷经他记忆中最美好的几小时，那时他和身边所有人都在做该做的事，而不请求任何人许可。当警察最终驱散了群众，他发现自己伫立在莫斯科大剧院对街的广场里。其他人全都离开了。有些人被警察押上巴士。多数人回家去了。几个人在附近的酒吧落脚。这一夜很温暖，转角步行街上的露臺酒吧正在供应自由古巴调酒。谢廖沙还是感受得到自己和一小群人沿着人行道被推着走，离开抗议现场时，警棍戳在他背上的位置。他还是感受得到因为吆喊其他抗争者挣脱警察、原路折返、重新各就各位而变得嘶哑的嗓子。太少人听见他叫喊了。他回家去。

隔天，纳瓦尼从狱中获释之后，谢廖沙在脸书上读到，有个女人回到广场上继续抗议。他认识她──不熟，但知道她的名字，也常去她经营的咖啡馆。她一直在脸书页面上写着同一件事，吆吁人们前来，和她站在一起拒绝离开，直到纳瓦尼的所有罪名撤销、直到沼泽广场案的囚犯获释。她也在朋友的页面上留言──她有很多朋友──要求他们前来加入。他们有时会去一两个小时，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她留了下来。整整三星期，她每天都站在广场上，站在一个倒数索契奥运还有几天、几小时的时钟下。她拿着一幅俄文和英文对照的手写标语牌：「释放所有政治犯！」最初几天，她被数十名警员和几辆警用厢型车包围──他们显然预期抗争者会回来。但他们随后离开了，女人独自站在原地。她每天都上传一张自己站在时钟下的照片，时钟倒数着日子，如同囚犯一般。註607

谢廖沙知道自己应该前往，但他没去。他感到乌云再度笼罩着自己，而且更加沉重。他只能想到，他，谢廖沙，并不是无可非议的。要是他并不无可非议，他就没有权利像前天那样吆吁其他人行动。他必须自己行动。但行动又会牵涉他人，而他没有权利牵连别人。于是他不行动。不行动则是可耻的。对于不行动的羞耻，如今结合了对自己的骄傲、对自己未经授权就吆喊他人注意的羞耻，而这份双重羞耻，这份不断回头找上他的羞耻，瘫痪了他。

瘫痪状态在三月稍微缓和了。占领克里米亚之后，外在世界的喧嚣，打破了这个声音。谢廖沙联繫上了二○一一至二○一二年间抗争中遇见的一些人。他们一起列印了在广场抗争中死难的一百多位男女的肖像，并将照片护贝。他们带着这些照片来到乌克兰大使馆，沿着围墙排成一列，形成一条纪念线。註608数小时后，警方要求大使馆移除这些照片。他们解释，附近正在举行庆祝克里米亚併入俄国的集会，可能会引

发麻烦。大使馆听从了。在那之后，乌云又覆盖上来。

谢廖沙在那年春天去看一位精神科医师。他解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没有朋友，他没在工作，多数时候连家门都不出。他是个没用、没价值的人。

精神科医师开了抗忧郁药物。谢廖沙开始服药后几天，除了浑身发痒外，感受不到任何差别。至少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了——这或许是好事，康復的开端。然后他除了发痒外什么都感受不到。等到他察觉自己需要就医，等到他告诉医师他觉得自己的皮肤在脱落，他觉得自己快死了。他确实已经奄奄一息，他患了毒性表皮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这是抗忧郁药物的罕见副作用。註609有些伤害是永久性的。在那之后，每当谢廖沙努力想在早上起床，总是很困难，通常办不到，原因既是忧郁症的作用，也是抗忧郁药物的作用。

*

阿鲁图尼扬审视案主的时候，发现自己几乎没注意到普丁时代初期。在她看来，那是一段事物开始封闭的时期—当一个十多年来看似机会无限的世界逐渐闭合起来。但她即使在那时都知道自己是少数人。她的多数案主渴求「稳定」，不管那是什么意思。多年来的一切都令他们难以承受。他们的焦虑不堪忍受；阿鲁图尼扬体验到的是免受极权国家限制的「消极自由」，而她许多案主的体验却是「积极自由」—想方设法，符合标准，和别人一样。当最早的一些限制随着「稳定」的鼓声敲响、开始恢復原状，他们确实觉得平静许多。一位案主终于觉得能完全脚踏实地自行创业了—这件事她想望、却又恐惧了好多年。她和自己的事业都兴旺了一阵子。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事业还是相当兴旺。但这位案主却开始恐慌发作。太多法律事先毫无通知就修改了，太多潜规则生效，让她始终不确定自己是否错失了什么。二○一六年二月某日，她早上出门时发现，她家那条街上所有低楼层的商业楼房—那些贩售鲜花、面包、汽水和香菸的商店——一夜之间全被拆除了。

那一夜，莫斯科全市共有九十七栋楼房被拆除。市府表示，这些楼房并未依法取得执照。註610但这些楼房已经存在多年，许多情况下存在了十多年—当然，所有权人都以为自己的执照是有效的。这个女人自己的事业在一栋老旧高楼里租用空间，但她还缺少什么呢？她强烈感受到—她收到讯号—她应当培养人脉并行贿，但不知门路何在，更重要的是，她强烈觉得自己不该这么做。她接收到「该怎么做才对」的讯号，与她内心的是非观念产生冲突。要是法律规定明确而持久，对所有人一体适用就好了。

事实上，要是法律规定真的明确持久，对所有人一体适用的话，阿

鲁图尼扬的工作就会轻松得多。她会引导案主理解，她的恐惧只是投射—它们当然是投射，但她又要如何将这个女人对超我互相牴触的恐惧，和她对俄国所谓「执法部门」的恐惧区别开来？案主的世界不只是感觉上的不可预测而已。它根本被故意设计得不可预测。

活在持续焦虑的状态里，也不只这位案主—全国都在这种状态下生存。这是最老套的把戏了，持续的低层次恐惧使得人们易于被控制，因为那剥夺了他们自认为能掌控任何事的感受。这不是推动人们行动并获得成就的那种焦虑，这是人类能力所不能及的那种焦虑。这就好比你十几岁的女儿没回家—到了隔天早上，你已经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你再也不能假装她可能错过最后一班地铁、在朋友家过夜、手机也刚好没电来安抚自己了，只剩下你独自面对自己的恐惧。你再也不能坐着不动或推理。这时你会退化，过了一会儿，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无助的婴儿那样尖叫。你需要一个成人，一个权威人物，几乎任何愿意承担责任的人都行。那么，要是那个某人还想继续掌控，他就得确定你会持续觉得无助。

整个国家都感到无助。要是打开电视就能看到，而阿鲁图尼扬几乎不看电视。电视上的每个人随时都在尖叫。电视上有所谓的辩论节目—意思是，它们被这样称呼—其中有两人或更多人表面上分属议题两方，而他们每次都用一个半小时互相叫嚣。「美国想要看到我们衰弱！」有个政治人物吼叫，他恰好是签下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的史达林时代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孙子。「那俄国该怎么办？」他名义上的对手吼回去—这方本来应该是要主张与美国维持和平的，但他们在节目上就只是投射焦虑而已。双方辩士在恐惧中叫嚣之际，每次节目都穿着一身黑的主持人，也为了惊吓参与者和阅听人，大吼大叫着。註611

新闻报导和晨间节目则播放着千篇一律制造焦虑的桥段。新闻报导会聚焦于毒品的可怖或性掠食者的危害。然后有个被介绍为社运人士的人物会走进摄影棚，解释政府应对危机的作为不够。毒贩应该判处死刑！恋童者应该被阉割！这段独白结束时，通常是一男一女的两位主持人陷入恐慌，尖叫着没有人保护他们的孩子，免于毒品和恋童者侵害。这套公式近似于某种苏联传统，总有想像中的「一般大众」据称向党请求加重严刑峻法；但它最主要的目的，仍是维持一种不变的高度焦虑音调。

这个惊恐的国家，对自己焦虑不堪的公民提供了哪些选项？他们可以蜷缩起来完全被动，或者加入一个比他们更强大的整体。倘若任何财产都可能随意被夺取，人们就再也不会认为有什么事物真正属于自己。但他们可以和其他公民一同为了克里米亚是「他们的」而欢欣鼓舞。他们可以完全认同一套偏执的世界观—所有人在美国的领导下都来削弱和

摧毁俄罗斯。偏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舒适，至少它把压倒性的焦虑源头安全地置于个人之外，甚至国家之外；归属于某种更强大的事物，并将权威託付给它是一大解脱。唯一的问题是，归属本身需要时刻警觉。人们必须注意，重要的战争今天在乌克兰进行，明天就到了叙利亚。在偏执的世界观里，危险的源头是个变动不居的目标。人们可以归属，但绝不能感到自己有能力掌控。

*

按照一位美国理论家的说法，创伤是「一种超出生还者理解范围的生还歷史经验」。[註612]这是接触到一次巨大危险、而危险本身与脱险的事实都被心智适应所拒绝而产生的经验。佛洛伊德首先在一战生还者的脉络下探讨创伤，而后在他努力想要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时又讨论了一次。他在一九二○年的论文《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里，开展了死亡驱力（death drive）的观念，这股毁灭力量受到那些生还已变得不堪忍受的创伤所助长。死亡驱力强迫人们重复，向丧失永劫回归。佛洛伊德的许多门徒后来都拒斥死亡驱力观，佛洛伊德本人在晚年着作中，将这个概念扩张到包含外向的侵略行为。但日后专门研究创伤的部分学者，则将死亡驱力观与纳粹集中营或越战生还者的高自杀率联繫起来。[註613]

二战后，在精神分析领域也受过训练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杰伊．利夫顿，研究了中国战俘营生还者和广岛原爆生还者，以及在纳粹集中营成为杀人凶手的医师。他写道，研究宗旨在于「发现身陷歷史风暴中的人们之心理经验」。[註614]他用尽一生发展出创伤的临床及理论取径。他描述生还者特有的现象，他将其中一种现象称为「心理麻木」（psychic numbing）□□回应伤天害理事件的一种情绪关闭。[註615]他在对纳粹医生的研究中，确认了一种名为「分身」（doubling）的心理原则，定义为「自我分割为两个运行的整体，使得每一部分自我都做为完整自我而行动」。[註616]他也描述了他所确信的一种二十世纪特有经验：「终生沉浸于死亡」（lifelong immersion to death）的经验。[註617]

利夫顿的着作开启了关于创伤的对话，不只是个人所经验的创伤，也包括整个社会在内的群体创伤。有些情况下，群体会把生还于不可想像之事的经验代代相传。社会一如个人，回应创伤时可能变得支离破碎，也有可能麻木，或许就像尼古拉斯．艾伯施塔特为俄国的过高死亡率寻求解释时所提到的一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变得抑郁。要是艾伯施塔特当初接受的是精神分析训练而非经济学训练，他说不定会认为整个社会都有可能被死亡驱力攫取。

影响整个社会的创伤经验可能包含天然灾害、悲惨的战事、种族灭

绝、革命，以及在长期压迫形势中度过的人生。在创伤旷日持久的状况下——像是长年压迫或国家恐怖——改变会产生更严重的创伤，就连明显正向的改变也一样。当熟悉的社会结构停止运作，创伤程度可能一如物理结构在天灾中崩毁。在旧秩序之下管用的适应策略再也没有用处。比方说，二○○○年在科索沃工作的治疗师们发现，多年来被命令使唤而受害的人们，如今却渴望被命令使唤。流亡美国的赖比瑞亚人得到立意良善的美国治疗师鼓励，在自身社群中寻求支持，结果重新创造出了贪腐与剥削——在熟悉的虐待中受害其实反倒令人宽慰。註618

阿鲁图尼扬的导师们不认同「创伤」一词——这是个太过廉价的解释。这个词会显得人们彷彿被动接受自己的任何遭遇，彷彿外在的坏事会在内心中创造出可预期的坏结果。这种思考恰好与精神分析背道而驰，而阿鲁图尼扬当初选择精神分析，毕竟是因为它将肆虐于个人心灵内部的诸多不同冲突全都独立看待。阿鲁图尼扬见过一些精神分析学者，他们真心认为一个人所有的恐惧和焦虑始终都是投射，没有任何外部因素。她但愿自己也能这样想。

一位英国分析学者说过，相较于显然自发的抑郁，他更喜欢重大坏事所引发的抑郁——悲剧增加了康復机率。何其不幸，这套逻辑只适用于你能预期到有重大且恶劣之事有个尽头的情况。

*

二○一五年十月，普丁跟专门研究俄国的学者、记者召开了年度会议。这一年的会议在索契举行，前一年冬季奥运所兴建的设施，此时已经废弃。就在一个月前，普丁飞往纽约，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演说。他提议组织一个「一如反希特勒同盟的」国际反恐同盟。註619换句话说，他提议联手对抗伊斯兰国，以换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及其他相关区域的统治不受阻碍——如同苏联参与了反希特勒同盟，令它得以保有先前与希特勒谈好所获得的战利品那样。当这个提议在联合国受到冷落时，俄国开始自行轰炸叙利亚。如今普丁召集了世界各国的来宾参加一场讨论，命名为「战争与和平间的社会」。

「和平、和平的生活，一直都是、也仍然会是人类的理想。」他说：「但和平做为世界政治的一种状态，从来不是稳固的。」换言之，和平是一种反常，一种脆弱的均衡状态，他说这种状态极其难以维持。他说，核子武器的出现得力于冷战双方引进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阴影，在一段时间内——自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八○年代——「世界各国领袖採取负责任的行动，权衡一切情势与可能后果。」这是常见的苏联怀旧话语之变种——将冷战说成世界和平的黄金时代。

过去二十五年来，动用武力的门槛明显降低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对战争的免疫力，确实在心理层面、潜意识层面上被削弱了。註620

他接着将这样的事态归咎于美国，并为俄国干预叙利亚的行动辩护，但他演说的关键重点，在于俄罗斯唯有在战争中才能和平。或者正如佛洛姆在七十五年前对纳粹德国的描述：「之所以会有战争……都是命运。」註621鄂兰在对希特勒的讨论中，则描述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怀旧之情，它满足了「对匿名的渴求，似乎他们只是一个数字，发挥一个小齿轮的功能……战争被体验为『最有力的群众行动』，它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即使受难（照传统的说法，受难标志着个人承受独特的、难以改变的命运），现在也可以被解释为『歷史进步的一种工具』。」註622反过来说，这种歷史进步的（永恆运动）概念，则是鄂兰理解极权主义如何掌权的关键所在。

俄罗斯的官方话语则完全依照古德科夫对于「復发极权主义」的诊断而演进。遵循这套不可阻挡的逻辑，二○一六年九月，俄国司法部将列瓦达中心归类为外国代理人。古德科夫数月以来都预期这件事会发生，而他知道，这意味着他一生的工作终结了。「外国代理人」法要求这类组织在一切公共传播内容中都如此自我称呼。要是他们必须自我介绍为「外国代理人」，列瓦达中心的社会学家要怎么再进行调查？註623

*

多年前，阿鲁图尼扬生于一九八○年的儿子对父母亲说，他明白了他们如何「在一片绿洲中」将他抚养长大。他成长的这个家──阿鲁图尼扬的祖母所有，巨大的科学院公寓，如今这里住了四代人──在一九八○年代的私有化、一九九○年代的恐惧之中多半得到保护，甚至足以抵挡住大半瀰漫于整个二○○○年代的闭锁感。但近来，阿鲁图尼扬却发现，待在绿洲里变得很困难。

不只是国家在政治上改变了，就连她四周的城市在物理上也改变了。低楼层的商店和咖啡馆被剷平，消灭了一九九○年代出现的视平线（eye-level）城市环境。城市回復到了极权时代的规模。在阿鲁图尼扬的街区里，街道是宽敞的八线道，人行道可以让十二个人并排行走，大楼则有七层楼高的拱廊。少了低楼层商店，人们再次成为区区斑点。

接着，市府开始将整个莫斯科市中心的人行道柏油路面刨除，改铺地砖。第一次结冰就显示，这些磁砖上结成的冰面始终光滑而清澈，不如柏油路上的多数冰面，所以人们摔倒了。某些日子里，街道看起来就像是低俗喜剧（slapstick comedy）的场景。行人不停滑倒和摔倒，又

滑倒和摔倒，实在很难忍住不笑，即使人们就在你身边摔断了手臂或髋部。再来就是时候，对政权如此坚持将自己的隐喻转换为字面意义感到惊嘆了—它真的决心要折断自己的人民。

二○一六年夏天，市府再度刨除整个莫斯科市中心的人行道。数週之内，彷佛整个城市都在对自己开战。步行到商店或地铁站变得困难且不可预测—人们在低楼层商店消失后，才刚开始建立新的规律，这时壕沟、围篱和死胡同却变幻莫测地阻挡去路，逼得行人们走上马路，左闪右躲，最重要的是随时留意。不分昼夜，无时无刻，低层次恐惧状态都成了在城市里出门的一项特徵。

最后市府铺设了更多磁砖地面，如今也设置了一系列自行车道—尽管通常只是将两条死胡同连接起来的短短一段。莫斯科的新面貌有着一种经由建筑演绎出来的对称与美感。但就像建筑系大一新生那样，有人忘记把树加进透视图里了。城市街道两旁原来生长的树木都被砍掉了。一切都是石头和直角构成的。莫斯科得到了宛如坟场的几何形状与质地。

或许佛洛伊德一开始对死亡驱力就说得没错。或许一个国家正如个人一般，的确会被死亡驱力影响。或许这股能量在俄罗斯释放出来了。或许它决心要为了毁灭而毁灭，为了战争而战争。或许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都在活埋自己。阿鲁图尼扬思考得愈多，就愈不觉得这个观念异想天开。歷史上曾经有过整个文明不復存在的例子。这些文明中的生命在最后数十年和最后几天里是如何感受自己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已经消亡了一世纪—在战争中、在古拉格劳改营里，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的漠视人命之中。她以前一直以为这种漠视是疏忽，但或许应当将它理解成积极的欲望。这个国家想要自杀。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人民、人民的话语、人民的抗议、人民的爱—都会引来攻击，因为生命的能量对这个社会来说变得不堪承受。它想去死；生命是外国代理人。

至少，佛洛伊德会这么说。至少，阿鲁图尼扬读过他。未来世代的俄罗斯人或许没有这种幸运了—要是还有未来世代的俄罗斯人的话。

她捻熄一根菸，又点起另一根。

註607：这名抗争者是瓦尔瓦拉．杜洛娃（Varvara Turova）。她拍下的照片：August 4, 201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97542444759&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9,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68078068168&set=a.1019614374366.2003635.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8,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61390820991&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7,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55923604314&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5,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41214356592&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4,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34708553951&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29133734584&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2,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21098493708&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13454662617&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 July 20,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0508703623844&set=a.2095488550548.2107528.1345351749&type=3&theater（皆于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608：Sergei Yakovlev, Facebook post, March 10, 2014,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519913491459009&set=a.519916641458694.1073741825.100003210891158&type=3&theate ○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609：Marta Herstowska et al., “Severe Skin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Antidepressants: A Literature Review,” Postepy dermatologii i alergologii 31, no. 2 (2014), pp. 92-97,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12250/（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浏览）。

註610：Masha Gessen, “Moscow Just Razed Its Small Businesses and Became Even Blander,” newyorker.com, February 10, 2016,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moscow-just-razed-its-small-businesses-and-became-even-blander（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浏览）。

註611：Vyacheslav Nikonov versus Nikolai Zlobin, on Poyedinok, hosted by Vladimir Solovyev, April 21,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KWoy3RPI4（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浏览）。

註612：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6.

註613：前引书，页六三。

註614：Robert Jay Lifton, Witness to an Extreme Century (New York: Free Press, 2011), p. 28.

註615：前引书，p. 127。

註616：Robert Jay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418.

註617：Lifton, Witness to an Extreme Century, p. 151.

註618：作者访问创伤心理学家杰克．索尔（Jack Saul），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纽约市。

註619：“70-yz sessiya General’noy Assamblei OON,” Kremlin transcript, September 28, 201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385（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620：“Zasedaniye mezhdunarodnogo diskussionnogo kluba ‘Valdai,’” Kremlin transcript, October 22, 201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548（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浏览）。

註621：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enry Holt, 1994), p. 168. 译者按：此处参看佛洛姆着，刘宗为译，《逃避自由》，页一九四。

註622：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 329. 译者按：此处参看鄂兰着，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页三五五，略有改动。

註623：Lev Gudkov, “Zayavleniye direktora Levada-tsentra,” Levada Center, September 9, 2016, http://www.levada.ru/2016/09/09/14393/（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浏览）。

# 终章

二○一七年六月十二日是俄罗斯宣告国家主权二十七周年，无论这个举动意义为何。这一天也是鲍里斯．叶尔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二十六周年。这是国定假日。这个假日设立之后的最初十年叫做「国家主权宣言通过日」，但在二○○二年更名为「俄罗斯日」（Russian Day）。宣告维护国家主权——俄罗斯从苏联计画中脱离的第一步——再也不是值得庆祝的事件。这个假日必须去除政治意义，同时又不牺牲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年来，庆祝活动运用了民俗音乐、流行音乐，以及将歷史题材改编为戏剧。最后，这个假日成了众声喧哗。

二○一七年的俄罗斯日，共有一千七百二十人被逮捕——数十年来最大的一波逮捕行动。阿列克谢．纳瓦尼呼吁群众走上街头，数万人则在西起加里宁格勒、东到海参崴的全国各个城市走上街头，这是俄罗斯歷史上地理跨度最辽阔的抗争。多数被捕者都在数小时内获释，许多人被罚款，并处以五天到三十天不等的拘役；有些人则可能要在劳役营服刑几年。大约一週后消息传出，部份被拘留者在莫斯科曾被酷刑虐待，圣彼得堡的监狱看守则将有毒气体灌进抗争者关押的牢房里。

在莫斯科，八百多名被拘留者的其中一些人得在警分局院子里的板凳上过夜，因为屋内没有空间给他们，但当天城市里的场面却不那么悲惨或可怕，更多的是荒诞。这一年的俄罗斯日移交给歷史重演活动，当局并不特意指定歷史时期，但对中世纪的爱好显而易见。有些孩子身穿红色丝绸服装，让人隐约想起少年先锋队的红领巾，但多数大人都穿着锁子甲，手持盾牌和剑。即使如此，仍有其他人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制服，在装满沙土的麻布袋所构筑的路障附近晃荡。在某个时刻，有个身穿二十世纪农民服装——这套装束在不同脉络下，很容易被当成是潮人装束——爬上一堵沙袋墙，高举一幅英文标语：「普丁说谎！」他一边爬墙，一边用俄语呐喊：「普丁是小偷！」当他爬到墙顶，一个身穿内务人民委员部——二战时期苏联祕密警察——制服的男人爬上沙袋追赶他。这位抗争者从墙上滚落下来，落入另外两个身穿不同时期祕密警察制服的男人手中，这些人把他转交给了两名当代警员。

所有这些怪异的景象对外国特派记者来说都太难理解了，他们试图迴避这些迷人却难解的画面——身穿闪亮甲胄的骑士，名副其实地用盾牌保护一位青少年抗争者不被警察追捕——记者们转而聚焦于抗争者中的青少年。人人看来都同意，俄罗斯抵抗运动的新面孔才刚进入青春期。一个身穿短裤的男孩被镇暴警察压制，一名女孩冲向警方防线，警用厢型车上载满了青少年。一名俄国脸书用户上传了警用厢型车里的青少年照

片，解说如下：「俄罗斯有未来了。」他设想：「每一次对年轻人的大规模逮捕，都会加强年轻人的抗争。」相对来说，这必定导致政权的终结。

这位发文者是六十九岁的政治学者乔治．萨塔罗夫。二十多年前，萨塔罗夫正是受命于叶尔钦，设法为俄罗斯表述一套新国家观念，最后却失败收场的人。这时他将责任转移到了青少年身上。这是列瓦达的旧概念又一次反覆—免于苏维埃人恐惧、嫉羡及双重思想的下一代，将会引领自由的新时代来临。这些下一代的年纪愈来愈小。对史达林恐怖全无记忆的第一代人，未能成功克服极权遗绪；后苏联的第一代人—生于重建时期，长于一九九○年代的人—是二○一一至二○一二年抗争的面孔，但他们再也不能体现出希望；这份责任如今交给了普丁时代出生的孩子们。

玛莎看到一张她被警察拖走的照片后如此说明：「俄国抗争，数百人被捕，包括少女。」不由得被逗乐了。她被短暂拘留后释放—她还在雨滴中迂迴行进——经获释，立即开始为被捕人士安排辩护律师。她仍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主持下从事这项工作，但他缩减了资助—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设定了上限，同时俄国政府则毫无底限。被捕者人数呈指数增长，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资金无法随之增加。募资成了玛莎的一部分职责，随即成为愈来愈重要的工作。而且看不到尽头—会有更多人被捕、更多募资工作、绝无休假可能。她决心辞职。她甚至在部落格发文宣告：她会募得必要资金，确保六月十二日被捕的每一个人都有辩护律师，并会坚持到这些案件走完法律程序，然后再辞职。她要去过另一种生活。註624

玛莎的运动者人生持续了五年半。她在二○一六年竞选过公职—当时有一个国会席次出缺。註625没有获胜的希望，就连成为候选人都愈来愈困难，但霍多尔科夫斯基认为，获得选举经验是很重要的。玛莎也同意，但这段经验证明了损伤比她预期的更大。她洗心革面，戒除了酒和娱乐性用药，开始随时穿着扣领衬衫和西装外套，但她还是被自己努力想要取悦的那些人批判。知识分子认为她的语言太过尖刻且愤世嫉俗。他们多数人宁愿投票给一位反对乌克兰战争、但毫不掩饰自己恶毒恐同观点的歷史学教授。但这位歷史学教授也没能获胜；全国各地没有任何一位反普丁的候选人能在投票中取得进展。霍多尔科夫斯基想建立影子社会的计画，在书面上看来还是比现实生活美好得多。

尽管如此，比起沼泽广场案的其他被告，玛莎的人生还是充满魅力。其他多数被告都被判处劳役营的刑期。有些人在两年或两年半刑满后获释，有些人至今仍在狱中，还有其他人在等待审判—他们是后来被逮捕的。国家持续对这个歷时五年的案件添加被告。

*

冉娜在波昂定居。她在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工作，这是由纳税人资助的广播电视机构。如同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自由欧洲电臺／自由电臺（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的俄语部门，德国之声在苏联时代也曾使用短波频率对苏联广播，叶尔钦总统任内取得调幅频率，普丁时代又被收回。它如今是以网路为基础的广播机构，阅听人不多不少，但冉娜成了该臺的明星採访记者。在德国之声，没人会叫她不要钻研政治。

冉娜成立了以父亲为名的基金会。她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每年颁发奖项给展现出勇气与决心对抗普丁政权的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奖项总是面临激烈竞争，委员会也长时间热烈争辩。二○一七年六月，冉娜公开宣布，她父亲原先规划要在二○一八年竞选总统──尽管她认为，要是阿列克谢．纳瓦尼有意参选，父亲就会退让。纳瓦尼这时正在争取参选──姑且这么说──这时他正在为了召集六月十二日抗争而被拘役三十天，同时面临愈来愈多罗织而成的诈欺罪指控，足以让他入狱多年。稍早在二○一四年除夕终结的一次审判中──以确保多数放假的俄罗斯人被充分分散注意力，不会注意到宣判消息──纳瓦尼被判处软禁，弟弟奥列格则被判处在劳役营服刑三年半。目的很明显，软禁看起来是相对人道的措施，因此这次不会引发群众抗争了。弟弟的刑期会让纳瓦尼本人安分下来──奥列格是人质。纳瓦尼拒不奉陪。在弟弟允许和鼓励之下，他坚持进行自己的贪腐调查。他也拒不承认自己所受的刑罚，因为俄国法律实际上并不以软禁做为惩罚手段。他照样上街行动。国家要求他停止，他拒绝听命。国家放弃了。这时，纳瓦尼正运用自己持续动员群众上街的能力，来保障他的自由，以及性命。

二○一七年七月，莫斯科法院以谋杀鲍里斯．涅姆佐夫的罪名，判处五个人十一年到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五人全都来自车臣，据称的第六名共犯，则在警方企图于车臣逮捕他时，拒捕被杀。法庭几乎不试图查明这些人的动机；检方的说法似乎是指称这些人没有明确的理由就策划谋杀。冉娜和她的法律团队坚持要传唤车臣的高阶官员，但这些人从来不曾被讯问过。最终，这件谋杀案实际上成了悬案。

鲍里斯的运动者老友们──在他离开国会之后与他共事的这许多不修边幅的人──在他被枪杀的桥上继续维持着活生生的纪念。市府对于将大桥以涅姆佐夫命名，或在现场设立永久纪念碑的申请皆予驳回。反倒每隔两週，甚至每隔几天，市府员工就会突然前来，把鲜花和标语牌收走。一次又一次，运动者们在隔天都会换上新的。他们也持续守望。即使他们无力阻挡纪念物被移除，但他们确保了每天的每分钟，都有一位鲍里斯健在的朋友守在他丧生的现场。

*

在纽约，廖沙发现自己随时都在谈车臣问题。二○一七年春天，传出车臣的男同志被围捕、监禁、拷打，有时甚至被杀害的消息；车臣和俄罗斯官员对同性恋者失踪的问题都一笑置之。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LGBT运动者起初不愿相信这些报导，只因为它们太可怕而几乎不可能发生，但证据没多久就堆积如山。车臣将克里姆林宫的反同性恋政策在逻辑上推到了极致，使得占领恋童癖——当初在彼尔姆困扰着廖沙的这类治安维持团体——成了国家的事业。幸运的车臣男同志是那些设法逃往俄国其他城市、最终试图逃往西方国家的人。

廖沙在二○一七年春天取得庇护身分。在美国生活的将近三年里，他无法在自己的领域找到工作——取得学界职位变得难如登天，就连临时的职位也是——但他学会了英语，成为能见度愈来愈高的运动者。他被提名为俄美LGBT（RUSA-LGBT）的共同主席，这是由说俄语的酷儿协助新来者寻求庇护的组织。最后，他在一个研究爱滋病的非营利组织找到工作。

他仍然住在布莱顿海滩，这片俄国人飞地在二○一六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是纽约市极少数支持川普的社区之一。廖沙经常面临美国友人难以置信的询问，从苏联和普丁手里逃生的人，怎能投票给川普这种人？不过，这些人当然不是逃避极权主义迫害的人。他们多数在苏联帝国开始解体前就抵达美国了。要说他们在逃避什么的话，逼迫他们出国的其实是对苏联解体的恐惧。他们渴望回到想像中的过去，要是他们留在俄国，他们也会成为普丁的支持者。但在美国，他们就投给川普。

这里也有明目张胆、有时具攻击性的恐同行为。尽管许多新近抵达寻求庇护的酷儿在布莱顿海滩租公寓居住，他们的同志生活却是在曼哈顿度过的。另一方面，廖沙决定要组织布莱顿海滩同志骄傲游行。二○一七年五月，约有三百人从康尼岛（Coney Island）出发，沿着木板步道游行，以俄语和英语呐喊着反对恐同的口号。

*

谢廖沙从二○一五年六月开始，就不再回覆我的讯息和来电。

*

列瓦达中心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并因未曾主动登记而遭到罚款。中心在官方网站底下补上一行字，表示列瓦达中心「被强行加入扮演外国代理人角色的非政府组织名册」。列夫．古德科夫起初感到惊恐。要是研究者必须向可能的应答者自我介绍为「外国代理人」，他们要怎么工作下去？结果它并未构成古德科夫原先以为的那种阻碍。他意识到，在某些人看来，「外国代理人」这个称号反倒成了某种荣誉勋

章。可能的应答者看来并没有因为这个称号而却步。二○一七年六月，中心完成了「全世界自古至今最杰出人物」的这项调查。史达林高居榜首，一如二○一二年的前一次调查。普丁则首度跃居第二，与诗人普希金并列。

*

二○一五年，莫斯科精神分析学会在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内部正式升格为「成员学会」。这时已有二十三位精神分析学者成为正式会员，还有三十位候补会员—基本上是正在接受培训，但可以与案主工作的精神分析师。合计有五十三位精神分析学者，比例上每二十多万名莫斯科人之中有一位精神分析师。

二○一六年，阿鲁图尼扬的儿子季米特里．维利科夫斯基（Dmitry Velikovsky）□□就是那个曾经感谢父母在绿洲中将他抚养长大的孩子—成为追查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这个巨大离岸帐户资讯宝库的三位俄国记者之一。文件的俄国部分最出人意表的内容，涉及大提琴家谢尔盖．罗尔杜金（Sergei Roldugin），他是普丁从大学时代以来最亲密的友人之一，而他显然聚敛了大量海外资产，或是为别人保管这些资产。二○一七年春天，季米特里是全球各地四百多位追查巴拿马文件而共同获颁普立兹奖的记者之一。但相关报导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引起迴响，很快就被遗忘。

二○一七年春夏两季，莫斯科市中心的人行道（以及大部份路面）连续第三年被刨除，改铺排列得更加完美的几何图形磁砖，这令阿鲁图尼扬强烈联想到墓碑。市府也宣布一项拆除四千五百栋至八千栋建筑的计画，其中包括许多结构牢靠、建筑风格引人入胜的楼房，并以高楼取代。

*

亚歷山大．杜金做为向普丁说悄悄话的人，得以享有某种国际名声一段时日—数年来，某些分析师和新闻记者确信，他就是普丁对外开战的谋主。杜金仍继续坚称他有庞大的影响力，但权力微不足道。尽管如此，他的明星地位却意外窜升得更高。随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另类右翼」而闻名的新纳粹运动，以及运动领袖理查．史宾塞（Richard Spencer）都在公众中声名大噪；美国人史宾塞娶了俄国妻子妮娜．科普莉亚诺娃（Nina Kouprianova），她正是杜金的英文翻译和杜金思想在美国的倡导者。

*

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和三名子女的遗骸在一九九八年安葬于圣彼得堡，但二○一五年在俄罗斯正教会请求下，又将遗骸挖掘出土。据

称，教会要求确认另外两具分别找到的遗骸，是否同样为沙皇家族成员。这两具遗骸在二○○七年发现，经遗传学家鑑定基因，确认为沙皇独生子及其中一位女儿的遗骨。但教会坚持对所有遗骸进行比较研究。一旦研究完成，必定会重新举行葬礼，从而抹灭前一次葬礼和叶尔钦发表演说的记忆，那是俄罗斯领袖唯一一次为了苏联政权的暴行而道歉。但遗骸出土接近两年了，仍未重新安葬，或许由于二○一七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教会和克里姆林宫都想不出应对这个象徵的方法。

*

一度对冉娜提议同时资助她和她的竞选对手，好让自己看戏的寡头米哈伊尔．普罗霍洛夫，又进行了另外几次涉入政界的尝试。克里姆林宫一再示意，要他知道自己的斤两，他也一直不予理会。最后，当他持有的新闻媒体──冉娜以前工作的RBK□□纸媒部门刊出一篇调查报导，针对普丁的女儿如何在莫斯科获利丰厚的房地产使用特许使用权后，普罗霍洛夫不只被迫出售RBK，更被迫将俄国的一切财产脱手。他迁居纽约，曾经持有过职业篮球队布鲁克林篮网队（Brooklyn Nets）几年时间。

*

曾经说过冉娜返回莫斯科是疯了，随后为了保护自身地位而不再与鲍里斯往来的寡头米哈伊尔．弗里德曼，继续在俄国经营一家生意兴隆的银行。二○一六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他的阿尔法银行（Alfa Bank）两度出现在俄国涉嫌干预美国选举的相关报导中。其中一篇报导指称川普阵营与阿尔法银行联繫，建立起祕密管道；尽管随后有另一篇报导指出，这可能并无违法。接着，阿尔法银行又被BuzzFeed刊载的一份未经证实的情报部门档案提及。弗里德曼控告BuzzFeed诽谤。

*

任用过另一个廖沙的彼尔姆市议员尼基塔．贝利赫，在梅德维杰夫总统时期被任命为基洛夫州州长。往后数年，他享有俄国唯一亲民主派州长的名声。二○一六年六月，在警方一次故设圈套的行动中，贝利赫在莫斯科一家酒吧遭到逮捕。他被控收贿。一年后仍在审判前的羁押状态。

*

为涅姆佐夫五十岁生日拍摄影片的电视记者帕维尔．舍列梅特迁居基辅。涅姆佐夫遇害之后不久，舍列梅特开始在乌克兰主持电视节目。二○一六年七月，舍列梅特在基辅遭到汽车炸弹暗杀。

*

被控猥亵亲生女儿的公务员弗拉基米尔．马卡洛夫服满五年半刑期。他一再申请假释都被拒绝。他在二○一六年获释。欧洲人权法院拒不受理他的案件，由此显示出恋童指控是完美的迫害工具。此后还有更多人遭受儿童性侵指控。二○一七年，查出多处史达林时代集体处决万人冢的「纪念」组织运动者尤里．季米特里耶夫（Yuri Dmitriev），因为儿童色情相关罪名而被逮捕。

*

抗争期间雇用过玛莎的国会议员伊利亚．波诺玛瑞夫被控侵吞公款。他逃往国外，在加州居住过一阵子，然后定居于乌克兰。

*

二○一一至二○一二年抗争的所有重要组织者，全都面临流亡和坐牢（或是更残酷命运）的严峻选择。前世界西洋棋冠军加里．卡斯帕洛夫，二○一三年受刑事罪名的起诉威胁而移居纽约。激进左翼领袖谢尔盖．尤达佐夫正在狱中服刑四年。涅姆佐夫死了。只有伊利亚．雅辛和纳瓦尼仍在公开活动。二○一七年春天，纳瓦尼被一名攻击者泼酸，造成一只眼睛丧失大部分视力。

*

玛莎当年在俄罗斯日週末接到电话、告知公寓被搜索时，正要去参加莫斯科政治研究学校的课程，该单位被政府宣告为外国代理人，并被迫终止活动。

*

当天打电话通知玛莎的涅姆佐夫助理奥尔嘉．索里娜（Olga Shorina）也前往国外。她定居于波昂，协助冉娜营运鲍里斯．涅姆佐夫自由基金会（Boris Nemtsov Foundation for Freedom）。

*

前政治技术专家，经营彼尔姆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画廊经理人马拉特．盖尔曼，二○一三年离开俄罗斯，定居于蒙特内哥罗，目前在当地经营一个当代艺术节活动。他可能以为总人口不到一百万的蒙特内哥罗是个与世隔绝的目的地，但二○一七年却传出，由于蒙特内哥罗想要加入北约组织，俄国阴谋在该国发动政变未遂。

*

冉娜抵达父亲遇害现场时，最先见到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札，从二○一五年中毒事件中生还。他当时昏迷五天之久，最后被空运前往美国治疗，并在美国復健。他重返霍多尔科夫斯基基金会在俄国的

岗位。他也拍了一部记录涅姆佐夫生平的电影。二○一七年二月，他在涅姆佐夫最后一次当选公职的雅罗斯拉夫尔市放映这部电影。不到两天后，他再度因为全身器官衰竭入院治疗。幸好医师知道治疗方法，这次他没有昏迷多久就得以甦醒。

註624：译註：玛莉亚．巴隆诺娃（玛莎）在二○一九年二月加入俄国政府的今日俄罗斯电视臺，从事慈善项目工作。她曾向本书作者葛森说明，一方面是无处求职、生计所逼，同时在国家完全掌控一切的现状下，她仍想尽一己之力，让自己仅有的国家更适宜于人们生活。本书作者对此事的专文讨论，参看：Masha Gessen, “When a Dissident Becomes a Collaborator,” newyorker.com, March 12, 2019,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our-columnists/when-a-dissident-becomes-a-collaborator。

註625：译註：自二○○七年国会选举开始，下议院选举方式完全採用政党比例代表制，依照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席次；但二○一六年再度修法，将下议院选举方式改回过去的选区投票与政党比例代表并立制。

# 致谢

我和两个人的对话，给了我灵感开始撰写这本书。奇特拉．拉格哈凡（Chitra Raghavan）当然不会料到，她讨论创伤心理的讲座会使得我写下关于苏联终结后心理经验的五百多页新书。另一方面，阿南德．葛德哈拉哈斯（Anand Giridharadas）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对我说，我应该动手写这本书，而他确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不相信他会想到我真的听从了他的建议。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他们。

本书的研究与大部份撰写，因卡内基基金会而得以实现，我在二○一五至二○一六年间曾是卡内基全球学人之一。

二○一六年夏天，我再次有幸成为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的访问学者，在那儿写下了本书的将近一半。我享受了学院其他访问学者及研究员的支持，以及知识上的陪伴：安东．谢霍夫佐夫（Anton Shekhovtsov）、马克．里拉（Mark Lilla）、塔蒂亚娜．朱尔仁科（Tatiana Zhurzhenko），以及提姆．史奈德（Tim Snyder）和马尔西．肖尔（Marci Shore）。

我感谢我的编辑蕾贝卡．萨勒坦（Rebecca Saletan），她鼓励本书非同寻常的结构，对字数也不大惊小怪，直到最后才要我将致谢写得简短些。河源出版团队让本书得以确切而有型地问世。吉妮．迪灵（Jynne Dilling）、凯伦．梅耶（Karen Mayer）和安娜．贾丁（Anna Jardine），谢谢你们。

我很幸运能拥有伊丽丝．钱尼（Elyse Cheney）和亚歷克斯．雅各布斯（Alex Jacobs）这两位经纪人。

我感谢和我交谈、与我争论、在我撰写时读过部份内容的人—朋友、家人、同事，还有一些几乎不疑有他的几近素不相识之人—以及过程中经由其他各种方式帮助我的人：罗杰．贝克维兹（Roger Berkowitz）、卡萝．德克鲁兹（Carol D’Cruz）、大卫．丹伯罗（David Denborough）、罗伯．霍瓦斯、尼古拉斯．李曼（Nicholas Lemann）、伊斯特万．雷夫（Istvan Rev）、杰克．索尔（Jack Saul）、薇拉．申格利亚（Vera Shengelia）、雪瑞儿．怀特（Cheryl White），还有陪着我完成最近七本着作的伴侣达莉娅．奥列什金娜（Darya Oreshkina）。

但我最感恩的仍是本书的主角们，他们允许我进入他们的人生，用了不知多少个小时回答我毫无道理的详尽提问。谢谢你们，玛莉亚．巴隆诺娃、阿列克谢．戈什可夫、谢尔盖．雅可夫列夫、冉娜．涅姆佐

娃、玛莉娜．阿鲁图里安，以及列夫．古德科夫。